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张杰 赵毅衡 主编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意大利] 苏珊·彼得里利 奥古斯托·蓬齐奥 著

王永祥 等译

译林出版社

随着人类知识的成长，符号学的边界也在不断扩大，在当今这个全球信息交流不断加速的时代，拥有一个全球性的符号学方法论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为此，本书通过重点研究符号学领域的诸多杰出学者们的理论思想，不仅对符号学的边界进行了考察，还证明了符号学涉及的不只是一门普遍科学的理论知识，更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一般科学的总体性秩序，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切得以成立的基础。

苏珊和奥古斯托深度解读了新时代下的符号开放网络，为读者们展示了从符号学的起源到总体符号学的未来这一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符号学全景。


上架建议：符号学
ISBN 978-7-5447-5550-4
9 787544 755504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69.00元

◆ 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张杰 赵毅衡 主编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意大利] 苏珊·彼得里利 奥古斯托·蓬齐奥 著

王永祥 彭佳 余红兵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 （意）彼得里利，（意）蓬齐奥著，王永祥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7
（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张杰，赵毅衡主编）
书名原文：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ISBN 978-7-5447-5550-4

Ⅰ.①打… Ⅱ.①彼… ②蓬… ③王… Ⅲ.①符号学-研究 Ⅳ.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1528号

书　　名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作　　者	［意大利］苏珊·彼得里利　奥古斯托·蓬齐奥
译　　者	王永祥　彭　佳　余红兵
责任编辑	马爱新
特约编辑	张海波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625
插　　页	1
字　　数	623千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550-4
定　　价	6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主编序

无论今日还有多少礼貌周到的疑惑沉默，还有多少不由自主的讥讽微笑，符号学运动正在中国飞速发展。证明顺手可得，而且令人信服：全国每年刊出的符号学论文，出版的符号学书籍，开出的符号学课程，数量都已经非常巨大。百度一下，“符号学”这个听来依然生僻的词目，已经有464万条，须知，某些历史悠久的高校必修科目，例如“文艺学”，不过519万条。符号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无可否认。

说的人多了，关心者多了，不是坏事，但是认真的学理探索，就更是当务之急了。是符号学的“可操作性”，使它成为人文社会各科的公分母，我们称作“文科”的各种学科，都得到符号学的方法论支持。但是，当符号学被应用于各种学科时，往往会有一些概念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套语，变成了不必求其甚解的话头。因此，符号学者面临的任务不仅是普及，更是深入的学术探讨。

什么是符号？可以简单地说：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

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整个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

那么，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在西方通用的定义“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问”（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实际上是用希腊词源“符号”（semeion）与拉丁词源“符号”（signum）的同义词作循环定义。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西人转圈子。可以简明扼要地说：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人为何追求有意义的生存，为何这种追求使他成为一个文化的人。符号学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笔者二十年前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毕竟，意义问题，是所有人文学科关注的中心，而且一旦放弃追求意义，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存在”的人。

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又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20世纪60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模式，推进到后结构主义模式，从以文本研究为主要目标，推进到以文化研究为主要目标。当代全球文化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符号学保持其形式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形式研究，其锐利的批判锋芒，成为整个当代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符号学大国。《周易》是人类第一个对世界进行抽象解释的符号体系。王夫之的界定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对符号学的理解：“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1] 他的“统会”两个字，用得很准确：这是符号学作为人文总方法论的特色。

“符号学”这个现代中文学科专称，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

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周易外传》卷六，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1039页。

有人做过。”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在西方，符号学的学科史，从皮尔斯与维尔比夫人通信算起，已经超过115年；从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讲课算起，现在正好一个世纪；而中国的符号学起步并不比他们晚多少，从赵元任1926年提出“符号学”、方光焘1929年在法国研习索绪尔开始，符号学在中国缓慢地，但是不屈不挠地前行。这个过程到现在，已经接近90年，比起西方符号学的历史不遑多让。

我们惋惜赵元任之后，“符号学”这个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的确，当别的民族前进时，我们止步了。这不能完全怪历史迷路：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宏大理论，在逻辑性比较严密的学科上，一直比较钝感。中国思想者，尤其是现代学界，不耐烦于逻辑分析，更喜爱“整体把握世界”。这种学术倾向与思维方式，不能说是缺点，但是分析方法几乎整体缺席，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弊病。符号学在苏联和东欧一直非常发达，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成就，为世界符号学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印度符号学在吠陀诗学的基础上发展很快。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符号学才作为一种新奇的舶来品被介绍过来，而且一直被看作纯粹的西学。

要建立中国的符号学，必须抓两头。一方面是理论的抽象，符号诗学、符号叙述学、符号美学、符号学主体哲学，都有人在辛苦经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阐释学，与精神分析等批评理论的学科融合，都有人在做专题研究；符号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先秦诸子、《易》学、唯识宗与因明学、道家与民俗，都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在思索。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重符号学的渗透力：产业商品如广告、品牌、游戏、动漫，取名等等；社会文化如幸福感、体育、时装、名人、神话，环境、旅游等等；艺术门类如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等等，都有人在做深入的符号学钻研。只有不断地让符号学的原理经受文化实践的

考验，才能使符号学成为一门活的学问，边界开放，不断拓展。

这就是我们与译林出版社合作，推出这套"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的原因：所有选到这套丛书中的符号学书籍，都是各国符号学者做出的最新成就。我们必须时时参照，才知道国外的符号学者在哪些方面走在我们前面，而在对比中，我们也可以时时看到自己可以，甚至已经做得更好的地方。正如在一场马拉松比赛途中，我们始终看到一道跑的人，才能明白在哪一个位置我们可能超出。你追我赶，是因为我们合起来，组成了坚持快速向前的世界符号学运动。

赵毅衡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2014年8月2日，成都

中译本序

作为一般理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说，今天的符号学渐趋成为“总体符号学”；此处的“总体”表明一种方向、一种趋势、一项工程。因此，总体符号学是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符号、传播、解释是生物专有的特权。凭借“总体性”或“全局性”方法走近符号学，对“符号的生命”的研究立刻与对“生命的符号”的关注联系起来。符号活动源于生命最初的萌芽。而今天的符号科学几乎完全局限于带有人类本位主义、语言本位主义、语音本位主义、字母本位主义和种族本位主义偏见的，“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语)。

无论如何，“传播”不是内部的内容外显的外位化过程。按照这种理念，传播好比一种电子任务，它由一个生命(电子任务发布者)发出，发生于被视作起点的电子任务发布者和另一个被视作终点的生命(接收者)之间，因此，传播就发生于一个充当信息发布者角色的生命与另一个充当信息接收者的生命之间。根据这一模式，存在着一种能够传播的生命，一种首先存在，然后传播的生命，亦即，一种先于、独立于其传播行为而存在的生命。但恰恰相反，本书作者持有的观点是，传播就是生物特有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条件，就是生命的条件。

四卷本巨著《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Posner，Robering与Sebeok，1997—2004)的总体规划无疑是直接表达当今符号学究竟是什么：总体符号学、打开边界的符号学、具有跨学科研究方法特征的符号学，它包容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逻辑学、语法学、文体学、诗学、音乐学、美学、哲学等等。

总体符号学或生命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域。该术语来自尤里·M. 洛特曼(Lotman，1991)，但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1994a；现收录于Sebeok，2001b)比洛特曼在更广义的意义上理解符号域。洛特曼将“符号域”这个术语的指称

范围局限于人类文化，并声称，在如此理解的符号域之外不会发生传播（参见Lotman，1991：123—124）。相反，总体符号学认为符号活动与生命完全一致（在这一意义上，总体符号学就是“生命符号学”）；从总体符号学视角看，符号域等同于生物域——该术语是由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于1926年在俄语中发明的——因此，符号域便成了符号生物域。总体符号学昭示了符号网络的扩展性和一致性，这个网络包括洛特曼意义上的，由人类、人类文化、符号、象征和人工制品等构成的符号域。但总体符号学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该符号域是更宽泛得多的符号域（即符号生物域）的一部分，这是人类从未离开过的符号网络，而且，就他们作为生物而言，永远不会离开。

关于人类世界，符号学必须反思一下埃德蒙德·胡塞尔称为已经给定、已经完成、已经构成、已经确定的世界的可能性条件。重点关注选择性规划的世界批评性分析需要这种反思。我们的观点是，今天的符号学正在执行胡塞尔称之为建构现象学的总任务。他在1948年出版的《经验与判断》中明确指出，建构现象学的目的是描述建构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全部复杂运作。探寻世界如何建构指的是，研究一般世界的基本形式，而不是研究我们这个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从真实性、现实性和历史性角度，而且要从潜在性和可能性角度去研究人类世界的建模结构与过程。这种研究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它关涉种族特有的建构世界的方式。事实上，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他能够建构无数可能的世界。对于西比奥克来说，人类的世界建模工具可以称作“语言”。这一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实际上，与所有其他物种不同，唯有人类能够建构无数真实或想象的、具体或虚幻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参见Sebeok，1991a）。

符号的解释项是第一个符号在解释者心中创造的另一个符号，“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也许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Peirce，CP 2.228）。因此，解释项符号不可能等同于被解释符号；它不可能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它是经过中介促成的，是解释性的，因而永远是新的。对于第一个符号来说，解释项是一种反应。它就这样开启了一个新的符号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作为符号，解释项决定另一符号，而这一符号又会充当解释项：因此，解释项通往新的符号活动，发展着符号活动，是新的符号事件。因此，符号的意义是一种反应，是一个解释项，这种反应或解释项需要另一反应或解释项。这暗示了符号与符号活动的对话性。一个符号在另一对它作出反应的符号中获得意义，而这另一符号也会成为符号，条件是，另外再有一个符号对它作出反应，对它进行解释；如此往复，以至无穷。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述，符号活动三分关系中的“第一符号”，即通过符号中介而获得意义的对象，是被解释项，而赋予意义的是解释项；解释项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允许符号识别的解释项是识别解释项。这样的解释项与信号、符码和符号系统有关。一个符号的具体解释项，即解释其实际意义的解释项，可以叫做应答性理解解释项。这第二类型的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而是表达它的符用意义，赋予它介入和参与的关系：解释项对被解释项作出反应，对它表明了立场。

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的"功能圈"是一个意义生成过程模式。因此，它在结构上也具有对话性，它关涉"如果……那么……"类型的推理。在"功能圈"中，"客观连接结构"所产生的解释对象变成解释结果（由信号配置表征于有机体中），再由解释项翻译成引发某一行为使之成为"连接结构"的行为意向。这里的关键是，在这样描述的"功能圈"中，被解释项（解释对象）与解释项（它由另一解释项来解释，依此类推）之间建立起了对话关系。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而是与之建立一种互动关系。

不仅"功能圈"具有对话性，而且反过来，从严格意义上理解的传播也可依据"功能圈"来分析。换言之，在一个试图就某个物体传达某种意义的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对话性传播关系也可依据"功能圈"模式来考察。

这一自我再生系统理论与浅薄的对话思想是不相容的，无论这种对话思想是基于将传播描述为从信源到信宿的线性因果关系的传达模式，还是基于受话轮转换规则支配的会话模式。

关于对话性，理解为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的总体符号学也进一步发展了巴赫金及其"小组"提出的符号理论。对于巴赫金来说，对话是一个人的身体介入另一个人的身体的体现方式（认为身体具有个体性、孤立性、自治性这样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身体之间相互关联性和肉体交互性通过"怪诞身体"形象（参见Bakhtin，1965）最为充分地表现于大众文化、公众领域的大众化语言和狂欢节面具。相对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巴赫金发起了我们称之为"对话理性批判"的运动。正如"怪诞身体"隐含于他者身体之中一样，自我以对话方式隐含于他性之中。事实上，我们已经说明，对话与身体密切相关。

巴赫金的对话性不能与他的生物符号学思想隔离开来理解。基于该符号观，巴赫金批判了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对话关系不仅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人类世界，而且存在于更广泛的生物世界。由巴赫金从哲学层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艺术层面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关系到以全部的生命、需要、思想和行为参与到他者（包括人与非人）的生命之中的人。

这就是与世界和他者身体之间具有重要的、牢不可摧的关系的身体。关注中心由身份（无论是个体的，如自我意识，还是集体的，即社团、历史性语言或整个文化系统）向异他性的转移本身就是一种哥白尼式革命（Ponzio，1997a）。随着这样的革命中心转移，巴赫金的对话理性批判不仅开始质疑西方哲学总的趋向，而

且还质疑催生西方哲学的文化主流趋向。

将符号学从语言本位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应该归功于音乐语言。相对于符号学和其他符号和语言科学，音乐被证明是依据言语语言范式难以对付的主题。音乐语言是对语音本位主义的符号活动研究方法抵制最强烈的语言。音乐符号学必须回答这一问题："哪种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当涉及音乐时，符号学必须做好质疑自己的范畴和方法的准备。在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的条件下，音乐可以理解为符号活动。此处的"音乐符号学"不是指应用于音乐的符号学，而是指音乐的符号学视角。若没有聆听，音乐则不可设想，所以，音乐符号学就是倾听符号学。符号学应该首先采取倾听的态度，而不是依据业已存在的范畴质疑不同的符号类型。总体符号学之总体性不仅是从范围来理解，更是从倾听的能力来理解（参见 Ponzio，1993a：138—154；Lomuto 与 Ponzio，1997）。

医学上的听诊即起于听。在古希腊，音乐被认为具有治疗特征。另一方面，符号学从症候学（或曰医学症状学）发展而来。盖伦认为症候学是医学的主要分支之一。

今天的医学具有"生命权力"的功能，可以提高使身体从属于生命政治的知识力量的技术（这受到米歇尔·福柯的抨击）。医学促成身体有控制地插入生产系统。今天的医学科学有其专业研究，同时将身体视为自足的实体，强化了个体作为一个对他者漠不关心的独立身份的主导性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下，倾听变成"直截了当的、意义明确的聆听"，变成法律或"话语秩序"（Foucault，1970）强加的聆听，变成"应用式的聆听"、"想听见"、强制说话并意义明确地表述。倾听是一回事，而想听见则是另一回事。倾听是应答性理解："倾听就是说话。"（Barthes 与 Havas，1977：989—990）巴特的这一说法与巴赫金很相似；倾听关注的中心是构成符号的对话性。相反，听见，或想听见、"应用式听"都排除了应答性的倾听。因此，它属于固定了提问与应答角色的、将倾听与应答性理解隔离开来的"封闭的话语世界"（马尔库塞）。理解为对话和应答性理解的倾听会不断生成新的能指和解释项，却不会使意义固定不变。相反，"应用式听"将能指和解释项固定在刻板的言语角色的网络之中：它维护着"信徒、弟子、患者古老的位置"（Barthes 与 Havas，1977：990）。

倾听对于总体符号学，对于随时调整自己，从而保持与意义生成的宇宙一致，并理解这个宇宙的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就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激怒的个人主义和当前科学研究中的"过度专业化危机"而言，存在分离主义和以偏概全的不同倾向（无论是疏忽所致，还是存心欺诈）；对于批评性地讨论分离主义和这些不同趋向来说，倾听是很有必要的。倾听的能力是将符号学与其早期作为症候学的使命联系起来的前提。假如考虑到生命与符号活动的趋同，符号学对整个星球上

的生命感兴趣，假如研究符号最初的动机之一就是“健康”，那么，今天的符号学在全球化时代不容忽视的一项任务是呼吁人们关注生命。

现在总结一下我们相信符号学的未来需要具备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使用“符号学之先期未来”这一术语——在此处，先期未来对应于现在，因而取决于我们。我们今天要对符号学未来的先期未来负责。

这正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巴里—莱切符号学计划，现将这些条件归纳为以下十点：

第一，符号学必须建立于一套一般符号理论基础之上。此一般理论与相关的符号概念必须避免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的符号论）常呈现出来的局限性：换言之，一般符号理论必须避免语言本位主义。语言本位主义视言语符号为一般符号，因而视语言学为符号学的典型科学。（从这一观点看，巴特说得没错：符号论受语言本位主义的影响，结果被纳入语言学之中，尽管索绪尔原来的意图是将语言学纳入符号论。）

一般符号理论所提出的一般符号模式的建构不可基于言语符号。这种语言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建立于下述谬误的基础之上：我们研究任何类型的符号唯有通过言说、通过言语符号才能完成。关于一般符号模式的建构，我们的模式应该使符号最难以进行言语翻译、最具抵抗力、最难以简化、最具他性。有一种符号对这些特征作出了响应，那就是音乐符号，亦即音乐语言。音乐符号回避了话语的帝国主义。因此，音乐符号的研究不能使用符号论中实际发生的语言本位主义符号学研究方法。

第二，理解为一般符号理论的符号学必须是音乐符号学。换言之，一般符号理论应该参照音乐语言符号，以此验证其本身的一般特征，验证其作为普通符号学的效力。这不是将符号学应用于音乐的问题，而是建构一种考虑音乐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在这一意义上，“音乐”是主格而不是宾格。

第三，普通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一般符号理论将音乐的基本要素作为它的方法论条件，即倾听的能力。

符号学方法论即倾听方法论。倾听是应答性理解的解释项，倾听具有好客的气度：它欢迎其他符号，欢迎他者符号，欢迎具有他性的符号（一些符号的他性程度如此之高，我们一般只能以否定形式对其命名，即，非言语符号）进入符号学之家，进入符号学大厦。倾听是一般符号理论的条件。

第四，关于符号学的范围，它必须朝着总体符号学方向发展。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是托马斯·A. 西比奥克 2001 年出版的《总体符号学》，他于同年去世；这是他去世之前和他开始自己的研究以来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符号学应该绘制一幅总的蓝图，无论我们的符号研究兴趣是在什么具体领域，我们都能了解自己的

方位:“你在这儿。”

第五,作为一门科学,符号学应该意识到其可能性条件。作为一门科学,符号学建立于一种特殊的能力基础之上,这是人类这一符号动物特有的使用符号的能力。这是一种元符号活动能力,它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仅具符号活动能力)区别了开来。

第六,与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元符号活动的符号学不同,作为一门科学的符号学体现为元符号学。假如人类是元符号活动动物,那符号学家——进行符号科学实践的人——就是元符号学动物。

第七,作为反思符号的能力,元符号活动与责任相关联:唯有人类(现存动物中唯一的符号动物)能够解释符号和符号行为,唯有人类能够解释自我。因此,人类负有责任,是责任的主体。符号学家实践元符号学,因而肩负双重责任:身为符号学家,他/她必须为自己和他人负责,而作为总体符号学家,他/她必须为整个地球上的生命负责。

第八,符号学是一门批评性科学,这不仅是从康德意义上说,即,它审视其自身的可能性条件。符号学是一门批评性科学还因为它会质疑当今的人类世界,其质疑的依据是,这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这不是某保守意识形态所确立的终极性世界。批评符号学视世界为一个可能的世界,众多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亦即,一个可以受辩驳的世界。

第九,作为总体符号学,作为元符号学,作为(上述双重意义上的)批评符号学,作为负有双重责任的符号学,符号学必须以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为研究对象——这不仅是从认知意义上,而且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说的。换言之,符号学必须关心生命。从这点看,符号学必须恢复与医学症状学之间的关系。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记住源头的问题。更为激进地说,我们发出的信号是一个意识形态纲领性秩序的问题。

从这一观点看,如前所述,符号学就是倾听,就是求助于倾听。这里的倾听不是从包含符号学的一般符号理论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医学意义上理解;从医学症状学或症候学意义上说,符号学就是倾听。符号学必须倾听当今全球化世界的症状,识别不适与疾病的各种不同表现——包括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个人生活、环境、整个地球上的生命中的不适与疾病。

其目的是进行诊断和预后,并针对即将走向自我毁灭的全球化的世界,提出可能的疗法,为总体化、为健康的符号活动创造美好的未来。

第十,权当结语:整个计划描绘了具有巴里—莱切符号学学派特色的符号学的方向,我们对其施以洗礼,将它命名为符号伦理学。

参考文献

Barthes，Roland and Roland Havas (1977). Ascolto. *Enciclopedia*，vol. I. Turin：Einaudi.

Bernard，Jeff；Bonfantini，Massimo A.；Kelemen，János and Augusto Ponzio (eds.) (1994). *Reading su Ferruccio Rossi-Landi. Semiosi come pratica sociale.* Naples：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Bonfantini，Massimo A. (2010). *Platone*，Napoili，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Bonfantini，Massimo A. and Arturo Martone (ed.) (1993). *Peirce in Italia*. Naples：Liguori.

—— (1993). *Il dialogo della menzogna*. Rome：Stampa alternativa.

Bonfantini，Massimo A；Ponzio，Augusto and Susan Petrilli (1996). *I tre dialoghi della menzogna e della verità*. Naples：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2006). *I dialoghi semiotici*. Naples：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Bonfantini，Massimo A. and Augusto Ponzio (1986). *Dialogo sui dialoghi*. Naples：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Cobley，Paul (ed.) (2010).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Deely，John；Petrilli，Susan and Augusto Ponzio (2005). *The Semiotic Animal*. New York-Ottawa-Toronto：Legas.

Petrilli，Susan (2005a). *Percorsi della semiotica*. Bari：Graphis，2nd ed. 2007.

—— (2007a). Significs and semioethics. Places of the gift in communication today. In G. Vaughan (ed.)，*Women and the Gift Economy：A Radically Different Worldview is Possible*，108—120. Toronto：Inanna Publications and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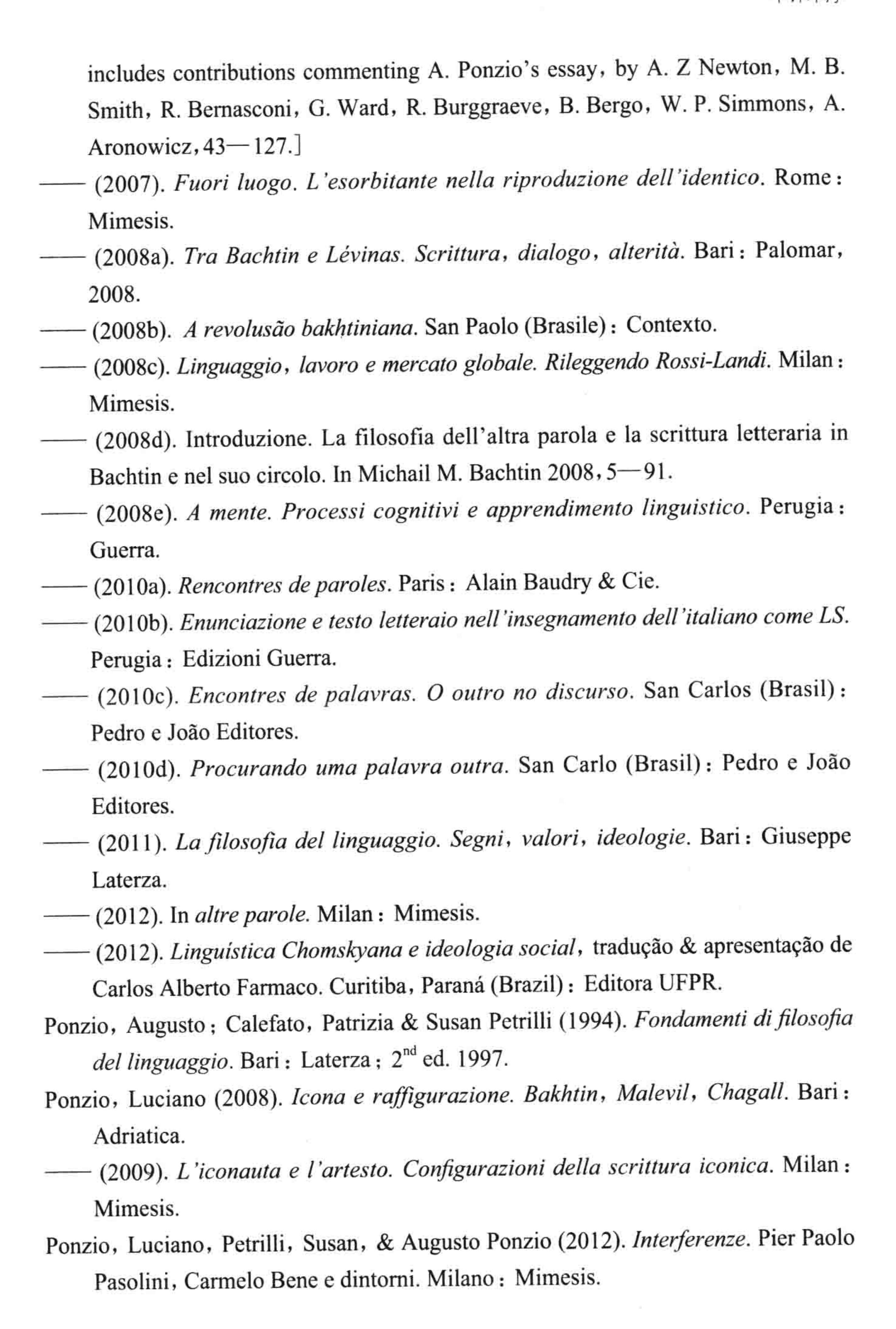
—— (2007a). (e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ome arte dell'ascolto. Sulla ricerca scientifica di Augusto Ponzio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On Augusto Ponzio's scientific research. Bari：Edizioni dal Sud.

—— (2007c). White Matters. Il bianco in questione. Athanor. Semiotica，Filosofia，Arte，Letteratura XVII，10，2006—07，ed. & Intro.，"Sulla questione bianco e i discorsi secondo cui se ne parla，pp. 9—38.

—— (2008). (ed.)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Trends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Preface，Semiot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by M. Danesi，Intro.，Life in Global Communication，by S. Petrilli. Madison，WI：Atwood Publishing.

——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Foreword by P. Cobley，xvii—x [= Semiotics，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 Editor: Paul Cobley]. Berlin: Mouton.
—— (2010). *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emio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Preface, vii—ix, Intro., xi—xiii, by John Deely. New Brunswick (U.S.A.) 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2012a).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Language*, Pref. by Vincent Colapietro. New Brunswick (U.S.A.) &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2012b). *Un mondo di segni. L'avere senso e il significare qualcosa*. Bari: Laterza.
—— (2012c). *Altrove e altriment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ritica letteraria e teoria della traduzione in, con e a partire da Bachtin*. Milan: Mimesis.
—— (2013). *The Self as a Sign, the World, and the Other. Living Semiotics*, Foreword by Augusto Ponzio, New Brunswick (U.S.A.) &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etrilli, Susan & Augusto Ponzio (2005). *La raffigurazione letteraria*. Milano: Mimesis.
—— (2007). *Semiotics Today.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 Dialogic Response. Ottawa: Legas.
—— (2008). *Lineamenti di semiotica e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Graphis.
—— (2010). Semioethics. In Paul Cobley 2010a, 150—162.
—— (2011). Jakob von Uexküll. A Master of the Sign. *Paradigmi. Rivista di critica filosofica. Evoluzione, filosofia, ideologia*, ed. Sergio Bucchi, n. 2—2011, 153—167. Milan: Franco Angeli.
—— (2013a). Biosemiotic scenarios. *Semiotica* 2013, 195, 1—36. [Review article of D. Favareau 2010.]
—— (2013b). Modelling, dialogism and the functional cycle: biosemiotic and philosophical insights. *Sign Systems Studies*, 41(1/2), 2013. Department of Semiotics, University of Tartu, Editor-in-Chief, Kati Lindström.
Petrilli, Susan; Ponzio, Augusto & Julia Ponzio (2005). *Reasoning with Levinas*. New York, Ottawa-Toronto, Legas.
Petrus Hispanus [1972 (1230?)]. *Trattato di logica* or *Summule logicales*. It. trans. A. PonzioMilano: Bompiani 2010.
Ponzio, Augusto (2006). *The Dialogic Nature of Sign*. Ottawa: Legas.
—— (2006b). *The I Questioned: Emmanuel Lévinas and the Critique of Occidental Reason. Subject Matters*, Special Issue, Vol. 3, 1 (2006), 1—42. [This issue



includes contributions commenting A. Ponzio's essay, by A. Z Newton, M. B. Smith, R. Bernasconi, G. Ward, R. Burggraeve, B. Bergo, W. P. Simmons, A. Aronowicz, 43—127.]

—— (2007). *Fuori luogo. L'esorbitante nella riproduzione dell'identico*. Rome: Mimesis.

—— (2008a). *Tra Bachtin e Lévinas. Scrittura, dialogo, alterità*. Bari: Palomar, 2008.

—— (2008b). *A revolusão bakhtiniana*. San Paolo (Brasile): Contexto.

—— (2008c). *Linguaggio, lavoro e mercato globale. Rileggendo Rossi-Landi*. Milan: Mimesis.

—— (2008d). Introduzione. La filosofia dell'altra parola e la scrittura letteraria in Bachtin e nel suo circolo. In Michail M. Bachtin 2008, 5—91.

—— (2008e). *A mente. Processi cognitivi e apprendimento linguistico*. Perugia: Guerra.

—— (2010a). *Rencontres de paroles*. Paris: Alain Baudry & Cie.

—— (2010b). *Enunciazione e testo letteraio nell'insegnamento dell'italiano come LS*. Perugia: Edizioni Guerra.

—— (2010c). *Encontres de palavras. O outro no discurso*. San Carlos (Brasil): Pedro e João Editores.

—— (2010d). *Procurando uma palavra outra*. San Carlo (Brasil): Pedro e João Editores.

—— (2011).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Segni, valori, ideologie*. Bari: Giuseppe Laterza.

—— (2012). In *altre parole*. Milan: Mimesis.

—— (2012). *Linguística Chomskyana e ideologia social*, tradução & apresentação de Carlos Alberto Farmaco. Curitiba, Paraná (Brazil): Editora UFPR.

Ponzio, Augusto; Calefato, Patrizia & Susan Petrilli (1994). *Fondamenti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Laterza; 2nd ed. 1997.

Ponzio, Luciano (2008). *Icona e raffigurazione. Bakhtin, Malevil, Chagall*. Bari: Adriatica.

—— (2009). *L'iconauta e l'artesto. Configurazioni della scrittura iconica*. Milan: Mimesis.

Ponzio, Luciano, Petrilli, Susan, & Augusto Ponzio (2012). *Interferenze*. Pier Paolo Pasolini, Carmelo Bene e dintorni. Milano: Mimesis.

Rossi-Landi, Ferruccio (1983). *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 Eng. trans. by M. Adams et al.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and Garvey. [It. orig. *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Milan: Bompiani, 1968. New ed. by A. Ponzio, 2003].

—— (1985). *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Milan: Bompiani. New edition by A. Ponzio, 2006.

Sartre, Jean-Paul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 by C. Bally and A. Secheaye. Paris: Payot, 1922. Critical edition by R. Engl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4 Vols., 1968—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ng. trans. by W. Baskin, Intro. by J. Culler. London: Peter Owen, 1959, 1974; & by R. Harris. London: Duckworth, 1983; *Corso di linguistica generale*, Intro., It. trans. & comment by Tullio De Mauro. Rome: Latera, 1967, 24th ed. 2011.

Sebeok, Thomas A. (2001).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10). Biosemiotics. In P. Cobley, 2010a, 179—181.

Uexküll, Jakob von (1909). *Umwelt und Innenwelt der Tiere.* Berlin: Julius Springer Verlag.

—— (1920). *Staatsbiologie. Anatomie-Physiologie-Pathologie des Staates*. Berlin: Verlag von Gebrüder Paetel. [Sonderheft der "Deutschen Rundschau," hrg. Rudolf Pechel]; 2a ed.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3.

—— (1934/1992). *Streifzüge durch Umwelten von Tieren und Menschen.* Reimbeck: Rowohlt; Eng. trans., *A stroll through the worlds of animals and men, A picture book of invisible worlds*. Semiotica 89(4), 1992: 319—391.

Welby, Victoria [1983 (1903)].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Ed. And Preface by A. Eschbach, ix—xxxii, Intro. by G. Mannoury, xxxiv—xlii [= Foundations of Semiotics 2].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2007). *Senso, significato, significatività*, It. trans., Intro. "Il senso e il valore del significare," vii—lx, and ed. by S. Petrilli. Bari: Graphis.

——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Pref. by P. Cobley. Berlin: Mouton. [This monograph by S. Petrilli includes a vast selection of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by Victoria Welby.]

—— (2010). *Interpretare，comprendere，comunicare*，It. trans.，ed. and Intro.，11—96，by S. Petrilli. Rome：Carocci.

序言

符号学边界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亦即，由符号的性质所决定。事实上，当我们考察符号学发展的时候，整个符号科学的进步很明显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认为没有任何符号的地方渐渐发现了符号。

符号为何物，符号在何处，这取决于现有的符号模式。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符号模式主要建立在言语符号基础之上，这就导致了这样的观念：符号是规约性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因此，符号仅仅局限于人类的社会性的符号活动领域。相对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所构建的符号学（semiotics）来说，"符号论"（semiology，费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科学）的边界就过于狭窄了。

皮尔斯的符号概念扩展了符号学的边界：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符号。在发展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时，查尔斯·莫里斯在人类和非人类行为中都识别了符号活动。与皮尔斯和莫里斯一样，托马斯·A. 西比奥克将符号学理解为总体符号学，其符号活动与生命一致。

符号学边界还由该领域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决定。

符号论（还有语言学——符号论的一个分支）的符号模式遵循了类似于"边际主义"经济学模式的模版。费鲁齐奥·罗瑟—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1992b（1968），1975a］明确表示，索绪尔的符号模式很大程度上受洛桑学派（里昂·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所提出的边际主义经济价值理论的影响。因此，其符号模式主要是将"纯经济学"的静态观点应用于语言研究的结果。当语言研究与理想的平衡状态下的市场研究遵循着相同路径时，其结果就是静态的符号概念。在这样的语境下，符号陷入一种共时性框架，陷入一种由给予与接受之间完全一一对应的逻辑所支配的框架。在今天全球经济系统中，这种等价交换的逻辑制约着所有社会关系。 xvii

然而,索绪尔模型的符号边界还由它与数学传达理论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索绪尔的符号模式以一系列二分概念为基础,这导致了其符号模式从符码与信息、传递者与接收者、编码与解码等维度的再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索绪尔符号学被描述为"解码符号学"[Rossi-Landi,1992b(1968)]。"解码符号学",或曰"符码与信息符号学",对表意与解释过程采取的是还原分析法。上述二分概念本质上是过于简化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以上概念能充分描述所有符号活动。因此,以上概念不仅被用来描述与信息传递相关的简单的信号类型的符号活动,而且还被用于描述复杂的符号活动,即与人类言语和非言语交流相关的、具有普适性和多变性的、严格意义上的符号活动。

信号是符号性程度最低的符号。信号不只是符号的一个次类,还是符号的一个构成成分。从这点看,"信号"暗示某种不同于符号的东西;"信号性"似可作为表示最低程度的符号性的更为恰当的术语。从信号性来说,信号处于解释的最底层——识别层。在以前的著作中,我们曾提议,与信号或信号性相关的解释项可以叫做"识别解释项"。在所有符号中,识别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呈现的是单一意义关系;这种关系预先由符码决定,类似于信号中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关系。

但信号成分自身无法解释一般符号模式。我们曾提议,相对于符号的解释项(解释其实际意义的解释项)可以叫做"应答性理解解释项"。这样的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它还将一种介入关系或参与关系注入其中:它对被解释项做出应答,对其表明一定的立场。

xviii 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符号绝非可以简化为信号的东西;相反,对于信号来说,符号具有一个强烈的特征:其解释潜力不是单独一个意义可以穷尽的。换言之,能指与所指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解释项符号的任务也并非局限于识别、机械的替换和对被解释符号的简单辨认的简单操作。可不像信号那样,具有高符号性程度的符号不可能仅仅通过固定的、预先设定的符码,通过简单的解码过程而得到解释。正如瓦伦丁·N. 沃洛希诺夫与米哈伊尔·M. 巴赫金(Voloshinov / Bakhtin,1929)所指出的那样,解码符号学所提供的手段不足以对人类交流的显著特征(如语际和语内多语性、多声性、歧义性、多义性、对话性等)给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一个符号模式如果坚持解释仅仅是解码,那么它就不仅仅受其机械性限制。符号模式与我们对主体的概念紧密联系:从解码或等价交换符号学视角看,主体也是以识别概念为基础的,给主体留下的他性或对话性的余地极小。这样,主体可以充分操纵其本身的符号活动,主体作为信息发送者和编码者要传递什么信息都可以按其自身的意愿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主体与其自己的意识完全一致。

相反，适用于皮尔斯符号模式的符号学趋向——归属于“解释符号学”趋向（以区别于“解码符号学”）——总是从进行中的、开放性的过程视角去描述意义的生成，而这种进行中的、开放性的过程缺乏那种可以操纵能指与所指之间交换关系的符码所能提供的保证。皮尔斯将符号置于符号活动的动态环境（提出了“无限符号活动”的概念）及其与解释项之间的对话关系之中。

从这一切来看，将皮尔斯与巴赫金联系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巴赫金也将符号置于对话之中，因为对话是符号能作为符号得以蓬勃生长的唯一场所。在对话之中，符号能够充分发挥诸如“文本”、“他性”、“应答性理解”等范畴的作用。皮尔斯和巴赫金互相独立地进行各自方向不同的研究工作：皮尔斯主要关注认知秩序的问题（认识论、逻辑、理论哲学等）；而巴赫金主要关注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小说谱系）。然而，他们都意识到对话的重要性。

此外，符号学与其他科学之间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可能仅仅涉及人文科学（包括逻辑—形式和计算机科学），可能还涉及自然科学（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这些关联都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这还取决于这些关联的性质，即究竟 xix 是对立性还是互补性关联。

如果是对立性关联，其结果之一就是将符号科学简化为“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科学，或者说，将“符号域”简化为文化符号域。在这里，生物符号在符号的边界之内没有公民权，要么就被贬为“符号学的劣等阈值”（Eco，1975）。

在符号学与生物学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催生了一种不同的符号概念，拓展了符号学研究领域。查尔斯·莫里斯反对《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所描述的物理主义概念；相反，他在生物学中发现了一种能谈论符号的语言，即一种用符号来解释符号的符号学元语言。他将符号活动定义为“某物对于某有机体来说成为一种符号的过程”[Morris，1971（1946）：336]。

西比奥克认为符号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分离，他认为莫里斯的上述定义既要限定性地解释为专指单个有机体（虽然是整个有机体），也要从更广义角度解释为泛指任何生物或任何生物系统。

符号学与生物科学就这样联系了起来，于是，符号学研究更趋总体化或整体化。其结果是大大扩展了索绪尔的“符号生命”的概念。从这种“总体性”或“整体性”研究方法中，我们立刻将西比奥克对“符号生命”的研究与他对“生命符号”的关注联系起来。在西比奥克看来，符号活动与生命是一致的。

符号活动的历史的边界也因为符号活动与生物科学之间铸造起来的这种联系而得到了扩展，其结果是，在我们的符号活动或符号环境的概念中不仅包括传达，还包括表意和表征。

在交流符号活动中，符号是有目的地针对接收者而发的，然后接收者必须能识别符号发出者要传达的意义。相反，在表意符号活动中有一个无生命环境，它充当无符号功能的“准发送者”；接收者是一个生命实体，一个生命系统，它必须完成全部符号功能。在表征符号活动中，符号发出者是通过其行为或姿势发出信号的生物；但所发出的信号并不针对某接收者，也不希求得到应答。接收者所收到的信号是被称为“症状”的符号。

xx

由于这一切，符号学的注意力从充满能量与信息的原型符号活动转移至整个地球生命进化中包括一切在内的复杂的符号活动：从原核生物到单细胞生物到构成超界多细胞有机体的真核细胞集合体。真核细胞集合体与微观世界共生共存，互相影响，一起构成巨大的符号域，亦即我们所理解的符号生物域。因此，符号活动的演化与生命的演化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本书里不仅谈到整个人类世界——尤里·洛特曼意义上的“符号域”——而且还谈到广阔的、相互之间有联系的、与生命一致的、可称之为“生物域”的各个领域。

符号学历史的边界还因为我们对其跨学科性质（包括它与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联系）的意识而得到扩展。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符号学的历史要比通常所介绍的悠久得多。无论语音本位主义和语言本位主义所提供的表面描述如何，符号学的起源事实上非常古老。

符号学从症候学（或曰医学症状学）发展而来。盖伦认为症候学是医学的主要分支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早期对符号和症状就做了研究，应该属于最早的符号学家。既然我们意识到符号学起源于症候学，我们可根据它原先的功能将其边界进行延展。我们不再需要将其局限于纯知识论领域。听诊作为医学临床的一种方法涉及到倾听他人，即病人，而病人被要求谈他的疾病，讲述他各种毛病的细节。自从盖伦以来，医学除了诊断和了解继往病史以外，还涉及听诊和其他检查方法。从这一点来看，应答性理解的符号学解释可看作对他者的应答性倾听。

由于符号学与医学和其他生命科学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联系，符号学有必要将其边界扩展至知识领域以外，涉及伦理学。这种研究路径对于总体符号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是将符号学与其早期作为症候学的使命联系起来的前提。

xxi

如果符号学关注整个地球上的生命（假定生命与符号活动一致），如果最初研究符号的动机是“健康”，那么就可以说，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符号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关爱各种各样不同的生命。符号学除了讨论各种形式的分离主义、技术主义和过度专门化以外，还能够理解整个意义生成过程的宇宙；所有这一切应该培养一种伦理责任意识。

我们提议使用符号伦理学这一术语，表示这一特别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发

展趋向。这有助于解释我们这本书的标题:《打开边界的符号学》。我们使用这一标题旨在强调符号学的整体性同时又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而其研究方法是我们称之为解总体化的研究方法。

符号学是一门跨越许多学科的范围广阔的领域。正因为如此,加之我们必须考虑到科学的发展——"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逻辑—形式科学"——因此,符号学必须做好准备改造自己、质询自己所运用的方法和范畴。符号学没有边界,其研究对象——符号网络——也是如此。这便是本书的副标题:《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本书是一完整研究项目的成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项专门的任务。

导言"步入符号学之旅"旨在作为读者的向导,为读者解释后面会遇到的术语。我们本可以将它题为"初学者的符号学",因为这部分呈现的是一系列符号研究最基本的概念。更精确地说,我们给读者呈现了我们认为如今必不可少的"谈论符号的符号"(或者叫符号活动)。导言勾勒了我们特别的符号学研究方法的轮廓,因此对本书其余部分的阅读具有重要意义。导言部分对符号学的轨迹及其目的作了探寻。

我们在导言部分还以批评性和提议性术语告知读者符号学艺术的现状。我们提出了一些全书都使用的概念,并向初学者和资深符号学家们澄清这些概念。

导言部分的编排非常像一部词典,包括12个条目,针对符号(或叫符号活动)和符号学的讨论中必不可少的一些概念和事实,这些条目都做了解释。然而,这部分内容并不仅仅是词汇表。正如导言的"主体与异他性"、"对话与推论"这两节所解释的那样,我们要为这样一种符号学研究方法提供依据:它必须植根于理解性对话和应答性、责任性倾听的符号能力。因此,本书中使用的术语与概念不仅有益于符号学初学者,而且也有益于那些愿意从有局限的或有偏见的符号模式或符号学概念中抽身离开的符号学家。在不同符号学思潮并行发展了数十年之后,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更喜欢"解释"符号学而不喜欢"解码"符号学。为此,我们打算以皮尔斯的解释符号学开始,这将为全书提供一个视角,它将在与其他学者和其他视角的对话中进一步展开。(这当然可以解释第一章的标题:"符号学之旅:从皮尔斯到其他符号学家"。)

xxii

本书第一部分"符号学与符号学家"从研究皮尔斯案头留下的问题开始。其中包含七章,每一章专门讨论一位符号学学者,在我们看来,他们都对我们要呈现的符号学研究工程的建设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是:查尔斯·S. 皮尔斯、维多利亚·维尔比、米哈伊尔·巴赫金、查尔斯·莫里斯、托马斯·A. 西比奥克、

费鲁齐奥·罗瑟—兰迪和翁贝托·艾柯。通过对这七位学者进行探究,我们为本书其余部分要讨论的问题建立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这也有助于我们听到当今符号学呈现出来的众声合唱。

除了这些以外,第一部分还反映了我们通过对话去解释符号学为我们当今时代的问题所提供的重要理论反馈。这种对话当然一直持续到本书后两部分。然而,对话在第一部分处于最为突显的地位,该部分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符号学讨论提供依据,同时揭示这些催生了我们自己观点的学者之间的异同点。

第一部分不仅探讨了符号研究中处于各种中枢地位的问题,还研究了读者问题。当然,对本书赖以为基础的主要符号学思潮的系统阐述将在与读者的对话中展开——尤其是年轻的符号学新秀,同时也包括资深符号学学者。对于后者,我们希望为自己的阐述和理论的选择提供更为清晰的解释和有力的论据。

第二部分("建模、书写和他性")和第三部分("谓词判断、辩论和传播")得益于第一部分很多材料的发展、说明和应用。在这两部分我们都要探讨符号学的核心问题。研究的焦点会转移到一些重要概念上:建模、书写(那些学者们所理解的写作,不同于摘抄文字的符形学)和传播。与它们存在密切联系的有他性、对话性、解总体化等作为方法论理解的概念。前面提及的问题将从总体符号学视角、与当今社会组织相关的历史视角和全球化视角去分析。

xxiii

这反过来又引导我们从现在新兴的意识形态结构视角对逻辑和对话的问题进行分析。

然而,我们分析的另一个焦点是以下两方面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是与谓词判断、辩论和传播有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总体性传达、共享和交流的概念。"communion"这一术语旨在表达超越地区、民族、种族、性别、身份等等限制的交流可能性。这一概念意味着:交流根植于他性的逻辑、对他者的开放性、对他者的责任(他者是遥远的、异己的,但由于全球化,他者已被转变成我们的邻居)。

因此,我们的讨论还有一个伦理维度,或更为精确地说是一个生物伦理维度,甚至更恰当地说是一个符号伦理学维度。关于符号伦理学的意义,我们现在简述如下:对符号活动的符号学反思——人类独自可以胜任——可以从我们对整个地球的生命及其未来的责任来理解。倘若符号学起源果真能追溯至医学症状学——关爱生命,保持生命健康——那么对符号学的这一界定便恢复了符号学的古老使命。

本书内容是由两位作者的意大利语论文重新整理、修订和扩充而成,扩充内容也是完整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并由苏珊·彼得里利翻译成英文,对于奥古斯托·蓬齐奥的文章译文的不准确与含糊之处,责任完全由苏珊·彼得里利承担。引自其他作者的文章的英译除非有现成的正式翻译,否则也是由苏珊·彼得里

利翻译完成;如果有现成的正式翻译,则原文引用。目前尚没有本书的意大利语版本。 xxiv

我们对马塞尔·达内西促成本书的出版致以谢忱!我们还要感谢阅读我们提交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书稿并对它提出修改意见的所有人!我们对马修·库德尔卡的编辑工作表示衷心感谢!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雷纳特·哈斯本德,在本书成书的过程中他一直是我们的向导与伙伴。

以下是两位作者撰写的章节内容的分工:

苏珊·彼得里利撰写的内容包括: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十章;3.2、5.3、6.2、6.3、7.1.1—7.1.2、7.2、8.2、9.1.2—9.1.5、11.3、12.1等节。

奥古斯托·蓬齐奥撰写的内容包括:3.1、5.2.1、5.2.5、5.4、6.1、6.4、7.1.3—7.1.6、8.3、9.1.1、9.2、9.3.1—9.3.2、9.3.4、11.1—11.2等节。

苏珊·彼得里利和奥古斯托·蓬齐奥共同撰写的内容包括:导言、5.1、5.2.2—5.2.4、8.1、9.3.3、9.4、11.4、12.2等节。 xxv

目录

第二部分 建模、书写和他性

第三部分　谓词判断、辩论和传播

导言
步入符号学之旅

I.1. 符号学的两个意义

“符号学”既指专门的人类符号活动，也指一般符号科学。

按照第一意义来看，符号学和人类具体的元符号活动能力相关。在包含符号活动的生命世界里，人类的符号活动具有元符号活动的特征——反思符号的可能。我们可将符号作为解释的对象来处理，它们与我们对它的反应无异。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符号：悬置我们对它的反应，从而得以对它进行审视。

在《形而上学》开头，亚里士多德正确指出，探求知识是人的本性。从他这一说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探寻符号是人的本性。人类符号活动是以符号学而呈现的。作为人类符号活动的符号学可以在整个宇宙中探寻那些能被视为符号的意义与意味。然而，人类思想史告诉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符号学，那就会出现使人类符号活动“绝对化”以及过于简单化地将人类符号活动视同符号活动本身的危险。

按照第二意义来看，符号学是有关符号的研究。有些学者视符号学为一门学科或科学（索绪尔），有些学者视其为一种理论（莫里斯），还有一些学者视其为一种学说（西比奥克）。符号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可以包括有机体的世界，或曰生物界（西比奥克），或者也可以包括整个充满符号的宇宙（皮尔斯）。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号学就是一种“总体符号学”。或者反过来，我们可以将其研究范围局限于言语和非言语的人类符号活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陷入到有局限的、人类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研究的危险之中。

3

符号活动就是某物充当符号的过程、关系或环境。符号与符号活动不可分离。要使某物成为符号，必须有其他某物在场。这第二件事物叫作解释项。解释项本身就是符号，因而和另一解释项相联系，依此类推，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无限的解释项链（见 I.3）。

这一切意味着：对于每一个符号来说都有一个符号活动。每一个符号是其符号活动的一部分，无法从中分离。这类似于细胞与细胞所形成的细胞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每个符号活动又和其他符号活动相联系。所有符号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根无限的链；对符号来说，符号活动形成了一种网络。正如符号是符号活动的一部分，符号活动也是符号网络的一部分。

符号的研究已经沿着各种不同方向、在各种不同的领域获得了发展。以下仅仅是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些研究视角（及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语言符号学（索绪尔、叶姆斯列夫）；语言—人类—文化符号学（雅各布森、洛特曼）；心理符号学（弗洛伊德、布勒、维果茨基）；哲学符号学（皮尔斯、维尔比、奥格登与理查兹、维特根斯坦、莫里斯、卡西尔）；文学批评符号学（巴赫金）；生物符号学（罗马尼斯、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与托尔·冯·乌克斯库尔、雅各布、莫诺）；数学—拓扑学符号学（托姆）。因为符号学已经拓展至很多不同领域，所以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研究视角更显得与众不同。

鉴别符号学各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的一种方法是：考察一个术语 symbol。这个术语已经被用作 sign（符号）的替代性术语，具有好几个不同意义（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意义）。该术语无论在日常话语还是在哲学—科学话语（包括符号学话语）中都是多义词。

在《符号形式哲学》（Cassirer，1923—1929）中，恩斯特·卡西尔将 symbol 用作 sign 的同义词。人通过符号建构文化，因此是一种符号动物。符号与符号形式相关联，这催生了卡西尔的符号理性批判，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方面（包括语言、神话和宗教）的批判。

对于奥格登和理查兹来说（Ogden 与 Richards，1923），symbol 也表示 sign。他们的符号模式是从符号（他们称为 symbol）、思维（或指称关系）与指称物之间 [4] 的相互关系来呈现意义的。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一个 symbol 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事实上，对于弗洛伊德和后来具有精神分析倾向的思想家来说，一个 symbol 就是一种特别的符号，就揭示无意识而言，它是表示各种精神的或梦的活动的符号。无意识以被象征物的符号表现意识，与此同时产生一种屏蔽和保护功能。

对于 C.S. 皮尔斯来说，symbol 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它是一种“由于习惯（我使用这个术语包括自然倾向）的缘故”所导致的符号（CP 4.531）。

在查尔斯·莫里斯看来，一个 symbol 是代替另一符号的符号，是可以作为行为向导的符号［参见 Morris，1971（1946），I：8］。

在约翰·杜威的陈述中（Dewey，1938：导言），一个 symbol 就是一种任意性的或规约性的符号。

对于费迪南·德·索绪尔（Saussure，1916：第一章）来说，symbol 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但索绪尔认为，符号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因此有别于言语符号。相对于言语符号，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点规约性（如同标志司法正义的不同级别一样），从不是完全任意的。

据阿福林切夫（Averinchev，1971）提供的百科词条"symbol"，米哈伊尔·M. 巴赫金（Bakhtin，1974）从同一性与异他性或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考虑，将 symbol 描述为一种最需要应答性理解的符号。这种符号包括统一性的神秘之温，自我与他者的并列，爱之温与无关之冷，并列与比较。符号不可能局限于一个直接的语境；相反，它与遥远的语境相关，这便解释了它对异他性的开放性。

由于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研究，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符号学思潮——可以称为"总体符号学"（Sebeok，2001a）或"生命符号学"（Ponzio 与 Petrilli，2001、2002）的思潮——逐渐发展起来。西比奥克扩展了传统符号学，即符号论的边界，传统符号学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言语范式，因而犯了部分代替整体的错误。西比奥克给这一符号学概念贴以"次传统"的标签，而他要推动的是他称之为"主传统"的符号学的发展，该传统由约翰·洛克和皮尔斯所代表，由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关于符号与症状的早期著作所代表。

西比奥克对符号生命的全局式研究方法与符号学"主传统"是吻合的。西比奥克是基于自己对人类本位主义和语言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在对符号科学或符号"学说"边界的探索中（参见其 1976 年出版的《对符号学说的贡献》一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比奥克不再关注符号学究竟是"科学"，还是"理论"，或是"学说"的争论，他将符号学领域进行了扩展，包含了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 是西比奥克于 1963 年提出的一个术语），甚至包含了更为宽泛的生物符号学和内符号学。在西比奥克的概念中，符号科学不仅仅是"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它还是从生物符号视角对交流行为所作的研究。

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巨大的宽泛性。这种普泛性研究符号学的方法体现于最近一部对当今符号学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第一、第二卷分别出版于 1997 年和 1998 年，第三、第四卷出版于 2004 年）。这部由西比奥克和罗兰·波斯纳、克劳斯·罗伯林主编的作品共计四卷，三千多页，呈现了来自 35 个国家 175 位作者的 178 篇文章。它代表了描写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的最新研究现状；它已不仅仅是单个学科甚至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文集。其触角伸向了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逻辑学、语法学、文体学、诗学、音乐学、美学、哲学等等。该指南依据第一至第三章的文章所阐述的总体符号学总的原则，收录的文章不仅仅局限

于跟人类文化（包括社会机构、日常人类交流、机器信息加工、科学研究中的人类认知过程、文学作品、音乐和其他各种艺术的生产与阐释，等等）相关的符号活动的研究。除了这些方面（即人类文化的研究）以外，该指南还呈现了涉及人类以外动物的、涉及有机体新陈代谢的、涉及所有生物行为的符号活动和交流活动的研究。

I.2. 主角：符号

我们要讲述一下“符号”在符号学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符号学流派中的历程。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给我们的主角提供一个“人像拼片”（虽然我们意识到，如果皮尔斯所言不虚——符号学的中心概念不是符号而是符号活动——那么，“主角”就是一个幻觉。参见 Fisch，1978：41）。诚然，符号很难界定，唯有同意西比奥克的说法：“符号就是符号。”

6

我们已经注意到，符号与符号活动（即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关系的过程和环境）不可分离。

当然，有不同的符号概念。符号可以是索绪尔意义上的二元（能指 / 所指）符号结构或是皮尔斯意义上的三元（再现体 / 对象 / 解释项）符号结构中的一个因素。

在我们的术语中，构成符号的基本概念包括被解释项和解释项，其中解释项使得被解释项成为可能。符号得以存在，就必须既有一个被解释项符号，也有一个解释项符号——换言之，必须有一个物体充当解释项的被解释项。皮尔斯认为，某物能够充当符号的最基本的关系是三分结构，涉及以下方面：（1）某种客观的东西（未必是一个具体有形的物体），它是预先存在的、自在的，在这一意义上相对于解释来说是“物质的”（即皮尔斯的“对象”）；（2）被解释项，即“有意义”的那一物体（皮尔斯的“符号”）；（3）解释项，对象只有通过它才获得意义。符号被简化为最基本的术语，呈现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当我们下面再谈起“被解释项—解释项”关系时，我们指的是一个（简约的、抽象的）三分结构关系，被解释项暗含了解释的对象，因此，这一表达总是理解为“对象—被解释项—解释项”。

被解释项因为受到解释而成为一个符号成分，但反过来，解释项也是一个符号成分，是一个可以生成新符号的符号成分。因此，正如皮尔斯的“无限符号活动”概念（即：一个解释项到另一解释项无限延展的符号链）所描述的那样，哪里有符号，哪里就立刻有两个符号；由于解释项可以生成新符号，马上就有了三个符号；依此类推。

从解释的对象（即被解释项）开始来分析符号，就意味着从第二层次开始。

换言之，从被解释的对象开始就意味着从符号链的某一点开始，这一点不可能被看作符号活动的起点。我们无法对被解释的符号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化，从而解释 7 符号活动的运行。

例如，皮肤上的一个斑点如果可以解释为肝脏疾病的一个症状，那它就是一个符号。这在解释过程中已经是第二层次了。如果往前追溯到最初层次，皮肤官能紊乱才是机体本身遭受异常并对其作出反应的解释。皮肤官能紊乱本身已经是一种解释性响应。

当我们说符号首先是解释项的时候，我们是说，符号首先是一种响应。我们也可以说，符号是一种反应——但前提是："反应"得理解为"解释"（这是查尔斯·莫里斯的行为主义所确立的，它与机械论相对立）。

为了避免字面的联想，我们倾向于使用"诱发—响应"这对术语，而不是"刺激—反应"。即使是对某一刺激（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诱发）所作的"直接"响应，也绝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因为这种响应要以解释为"中介"。除非我们是研究"反射作用"，否则的话，表达响应就意味着识别诱发，将其置于某一语境，使之与已知行为参数相关联（这些行为参数可能涉及简单的行为类型，如猎物—猎手模式，也可能涉及人类世界中更为复杂的与文化价值相关联的行为）。因此，符号首先是一种解释项，是一种响应，通过这种响应的解释，另外某种东西才能被看作符号，从而成为被解释项，而且，还能够生成一个开放的、由其他符号组成的符号链。

符号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多义性和单义性。信号可以定义为相对单义的符号，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种多义程度较低的符号。

I.3. 配角：解释项

假如符号是符号活动中的主要演员，那么，解释项就是其必不可少的配角。

皮尔斯在其符号学理论框架中引入了解释项概念。皮尔斯认为，符号活动是一个三元过程，其成分包括符号（或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在真正的三分结构中，一个符号或再现体是第一项的，它与第二项，即对象相关；这样它就能决定第三项，即它的解释项，假定了解释项和它本身，以及对象在同一个三分关系中是与同一个对象相关的。"（CP 2.274）因此，符号代表某物（其对象），这种代表关系依 8 靠的是"中介决定作用"（CP 8.343），"［这种代表关系］并不体现于所有方面，而仅仅是通过思想"（CP 2.228）。然而，符号仅仅在决定了解释项之后才能代表某物，该解释项"立即被那个对象决定"（CP 8.343）："符号在解释项符号和其对象之间作中介"，条件是，第一个符号在某一方面或思想或基础上被其对象决定，

并决定着解释项，“从而让解释项与对象发生关系，对应于它本身与对象的关系”（CP 8.332）。

一个符号的解释项是另一个符号，是前一个符号在解释者心中创造的符号。这就是“一个等价的符号，或者也许是更为发达的符号”（CP 2.228）。因此，解释项符号不可能等同于被解释项符号——它不可能是一种重复——恰恰因为它是经过中介作用的、解释性的，因而是新的符号。对于前一个符号来说，解释项是一种响应，因此，它开始了一个新的符号活动。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更为发达的符号。解释项作为符号决定着另一符号，这另一符号反过来又充当解释项：这样，解释项通向新的符号活动，发展了符号活动，新的符号便出现了。的确，每当出现新的符号的时候，除了“第一符号”以外，还有“第三符号”，即经过了中介作用的符号、一种响应、具有解释性的新符号、一个解释项。因此，一个符号本质上就是一个解释项（参见 Petrilli，1998e：I.1）。解释项（第三符号）可以是符号（第一符号），而符号（第一符号）也可以是解释项（已经是第三符号），这一事实使得符号置身于一个开放性的解释项网络之中。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皮尔斯的无限符号活动的原则，或者叫无限解释项的原则（参见 CP 1.339）。

所以，符号的意义是一种响应，是一种唤起另一响应（另一解释项）的解释项。这向我们揭示了符号和符号活动的对话性。一个符号在另一个符号中获得意义，因为这另一符号对其作出了响应；而这另一符号又会得到新的符号的响应和解释，依此类推，直至无穷。

在我们的术语中，三分结构符号活动中“第一符号”——获得意义的对象——是被解释项，而给予意义的符号是解释项。解释项主要有两类：用作识别符号的解释项叫做识别解释项，它与信号、符码和符号系统相关联；相反，符号的 9 具体解释项——解释符号实际意义的解释项——是应答性理解解释项。第二类型的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它还表达被解释项恰当的符用意义，使被解释项逐渐介入和参与到表意过程之中。该解释项对被解释项表明立场并做出响应。

解释项这一双焦点概念吻合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皮尔斯符号学与他的实用主义密不可分。在 1904 年致维多利亚·维尔比的一封信（有关皮尔斯与维尔比之间的通信，参见 Hardwick，1977）中，皮尔斯写道，当我们以广义看待符号时，其解释项未必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也许是一个行动或一种经历或仅仅是一种感情（参见 CP 8.332）。在这一特定语境中，符号是从严格意义上去理解的。在现实中，解释项作为一种响应，它能够表意，能使得某物有意义，从而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符号，即使解释项是一个行动、一种经历或一种感情，它也必然出现了符号，出现了符号行为。我们此处讨论的是“应答性理解解释项”，因而讨论的是符号。

皮尔斯在对解释项进行分类时总是偏爱三分法，区分了感情、实施和符号三个方面（参见 CP 4.536）。在他一份手稿中（MS 318，其中一部分出版于 CP 5.464—5.496，参见 Short，1998），他进一步区分了“情感解释项”、“能量解释项”和“逻辑解释项”。这一个三分法和另一个三分法，即“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或许是皮尔斯对解释项进行分类的最著名的两个三分法。

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对于符号类型学来说具有符号秩序意义，对于推理与论辩类型学来说具有逻辑秩序意义。究竟是像似符，是指示符，还是规约符，取决于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组织关系。由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也是根据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所以，“试推、归纳、演绎”的三分法同样取决于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

I.4. 实用主义与实效主义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还需要补充一点。在我们的符号学之旅中我们会时不时无意或有意地提及实用主义（或实效主义）。

皮尔斯在 1905 年提出了“实效主义”（pragmaticism）这一术语，从而将他自己的实用主义观（pragmatism）与威廉·詹姆斯和费尔迪南·C. S. 席勒提出的实用主义观区分开来（参见 CP 5.414—5.415）。皮尔斯反对将“做事”看作“生命的全部和终极追求”的思想（CP 5.429）。与通俗实用主义相反，[皮尔斯的]意义是一般行为法则，独立于特定的行为环境。因此，意义总具有一般性和公共性。　10

实用主义包括一系列学说和方法，由皮尔斯和詹姆斯提出，后经乔治·H. 米德、C. I. 路易斯、查尔斯·莫里斯和约翰·杜威发展。该术语首次进入哲学文献是 1889 年，当时詹姆斯在 G. H. 霍文森的伯克利哲学联盟举办了“哲学概念与实用结果”会议。但是，早在 1877 年和 1878 年发表于《大众科学月刊》的六篇系列文章中，皮尔斯就对实用主义首次作了详细阐述；这些文章是“科学逻辑的说明”系列的一部分（CP 5.358—5.587，5.388—5.410，2.645—2.660，2.669—2.693，6.395—6.427，2.619—2.644）。然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实用主义可以追溯至皮尔斯 1868 年的三篇核心文章（CP 5.213—5.263，5.264—5.317，5.318—5.357），这些文章的思想后来在 1877 年和 1878 年的作品中又得到进一步阐发。在追寻实用主义起源时，皮尔斯将尼古拉斯·圣约翰·格林称作实用主义“鼻祖”（这意味着为他自己保留了实用主义之“父”的头衔）。圣约翰·格林的思想影响了《情感与意志》（Bain，1859）一书的作者，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贝恩。

总的来说，实用主义根据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发现，重新评价了行为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形而上学俱乐部”成员昌西·赖特

也重温了达尔文。皮尔斯将实用主义的产生与“形而上学俱乐部”于1871年末、1872年初在马萨诸塞州剑桥举行的会议联系起来(参见“机会的学说”一文，CP 5.12)。这些会议是以皮尔斯和詹姆斯的研究工作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参与的有科学家、神学家和律师。达尔文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在皮尔斯的“信念的确定”(1877)一文中非常明显;他在此文中指出，实际问题的逻辑性也许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参见CP 5.366)。

根据实用主义，心理(或精神，或思想)不是笛卡尔二元论中的物质，也不是唯心主义所理解的过程或行为，也不是古典经验主义中的一组关系。相反，它是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一种功能。因此，符号的研究，尤其是口头语言的研究，是理解心理的前提条件(参见Morris，1932)。实用主义也是一种意义理论，可以理解为对某一断言之真相的实际验证。在“如何使我们的思维清晰”(Peirce，1878f)一文中，皮尔斯试图说明，“在我们脑中的观点不可能不与对事物的感知效果相关联……因而，似乎获得第三等级的理解清晰度的准则如下:考虑我们的感知对象拥有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可能具有实际的关系。那么，我们对这些效果的感知便是我们对该对象的全部感知”(CP 5.401—5.402)。

11

詹姆斯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很大修改与发展。他将实用主义转化为真理理论。他对实用主义的阐释是从工具性出发，因而也是从知识对行动与情感的要求的依赖性出发(见《信念意志》，1897)。对于詹姆斯来说，具有令人满意的实际结果就是真理。因此，他强调宗教信仰的、信念意志的、心灵理性的实用价值(亦见詹姆斯的《实用主义》，1907)。杜威也坚持这一点，并将它发展为他自己的实用主义，他称之为“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或“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在意大利，乔瓦尼·瓦伊拉蒂和马里奥·卡尔德朗尼沿着皮尔斯路线发展了实用主义，而乔瓦尼·帕皮尼和朱塞佩·普雷佐利尼则沿着詹姆斯路线发展了实用主义。费尔迪南·C. S. 席勒(参见《人文主义》，1907)沿着詹姆斯的方向定位自己的研究方法，声称知识与个人或社会的功用相关。

在詹姆斯的倡议下，皮尔斯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七场专题系列研讨，再次探讨实用主义(参见CP 5.14—5.40，5.180—5.212)。在这些专题研讨中，他将实用主义等同于试推逻辑和探究理论，因此，无疑等同于逻辑学与符号学。他于1905年在《一元论者》发表的一系列论文(CP 5.411—5.437，5.438—5.463，4.530—4.572)中，他自己的实用主义思想与詹姆斯和席勒持有的实用主义观点相形渐远，于是，他为自己特别引入一个新的术语“实效主义”取代了原来的“实用主义”。

I.5. 言语符号对符号学的影响

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将尤里·M. 洛特曼的"符号域"扩展为"生物符号域",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对符号最为详尽的论述。他的总体符号学研究法对构成符号学的假想的整体提出质疑,并表明这些假想的整体只是符号学的组成部分。正是西比奥克促进了"符码符号学"向"解释符号学"的转向,促进了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符号学向指涉但不依赖于语言学的符号学的转向(见下文)。 12

在人类的世界里,口头与书面的言语符号属于简单的符号,因为它们完成的仅仅是符号功能;所以,从非符号功能来说,言语符号没有多余内容[参见Voloshinov与Bakhtin,1929;Rossi-Landi,1992b(1968)]。这就是为什么索绪尔声称纯粹的科学不是经济学而是语言学,因为语言学是一门纯粹价值的科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语言学从一开始就充当了符号科学的又一支柱。的确,言语符号的研究已经对何为符号的标准产生了巨大影响。

尽管这么说,符号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其起源必须在非言语符号中去追寻。

从历史角度看,符号学的发展主要和医学症状学(即症候学,或症候的研究)的兴起有关。然而,鉴于人是一种"符号动物",人类生活中到处昭示着追求有符号秩序的知识的能力。

因此,如果我们接受医学症状学乃符号学之起源这一说法,那只是因为猎人、农民、航海者、渔民和妇女(其智慧和符号实践与生命的繁衍相关)没有像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那样写出符号学方面的论著,其实他们一直都参与了符号学活动。

言语符号是很重要的简单符号,口头语言在人类第二模拟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比奥克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为什么在20世纪初符号学被描述为sémiologie(符号论)。符号论讨论的是符号活动的语言—言语方面,其特殊任务——如索绪尔所说——是研究"在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尽管语言学仅仅被看作符号论的一个分支,但它对符号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认为,符号这样一种实体在社会环境中履行一种有目的的交流功能。

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Barthes,1967(1964)]一书中,言语符号与非言语符号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巴特声称,我们必须放弃语言学家的语言学,采用更为宽泛得多的语言概念,把语言看作一种模拟和组织各种语场的实践。撇开语言学家们持有的狭隘的语言学观点[莫里斯(Morris,1946)做过类似的评论;见下文],显然,"人类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意模式:语言恰是表意的基础", 13 所以有必要"逆转索绪尔的公式,坚信符号论是语言学的一部分"[Barthes,1967(1964):8]。

I.6. 表意与意味

巴特一书带来的另一转向是由传播符号论（索绪尔、布依森、普列托、穆南）向表意符号学［Barthes，1967（1964）］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意向性传播符号，而且也阐述了非意向性符号（如医学症状学中的症候、弗洛伊德所理解的“梦境”）。

巴特在其文学分析著作中还预见到“符号学的超越性”。这些著作包括《论拉辛》（1963）、《文艺批评文集》（1964）、《批评与真实》（1966）、《S/Z》（1970a）、《符号帝国》（1970b）、《萨德、傅立叶、罗犹拉》（1971）、《文之悦》（1973）、《恋人絮语》（1977c）。在这些有关文学和表意的著作中，他还将他在1975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尖锐与迟钝》，见Barthes，1982）中称之为“第三意义”的概念（意味符号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化。巴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超越了信息（传播符号学）和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符号（表意符号学），着重研究文本或写作——即着重研究文学写作特有的意义的最大开放性。此外，就这一点而言，表意的体现包括电影、图画、音乐（《形象・音乐・文本》，1977b）和摄影（参见《明室》，1980）。读者是共同作者，读者通过对话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之中，这是因为可读性文本与作者的可写性文本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在非文学作者的文本中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程度要低一些。在“讲稿”（1977a）——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就职演讲的文稿——中，巴特描述了文学写作的颠覆性，这产生于意指运作中意义的转换。由于这种转换，作者不必确定作者主体就可以说话，因而可以避开说话人必须遵守的语言中的话语秩序（参见蓬齐奥的“在巴特的符号中”，Ponzio，1994a）。

概括地说，20世纪有关符号的研究的发展经由表意符号学，越过了传播符号学的界限，进入到可称之为“第三意义符号学”、“文本符号学”，或（按照巴特的说法）意味符号学（Barthes，1982）的阶段。

14

查尔斯・莫里斯（Morris，1964）也对表意和意味作了区分，从而识别出“意义”的两个不同方面：符义学方面和价值论方面。

维多利亚・维尔比引入术语“意味”来表示她的意义三分结构中的第三层次，另外两个层次分别是“感知”（sense）和“意义”（meaning）。这一意义三分结构在她的“表意学”（significs）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表意学”是她发明的术语，用来表示她对符号、意义和解释特有的研究方法。

维尔比尝试过其他术语，诸如“感知学”（sensifics）；她最终选择了“表意学”（significs），而不选择其他现成的术语，如“符号学”（semiotics）、“符号论”（semiology）和“语义学”（semasiology）。在其1911年的著作《表意学与语言》中，她为表意学提供了一个临时的定义：“从各种形式和各种关系中对所表之意的性

质所作的研究"[1985a (1911) I: vii],"它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行为、发明、创造等各种人类表达形式有关"(同上: ix)。然而,此时,维尔比和詹姆斯·M.鲍德温、乔治·F.斯托特已经为出版于1902年的《鲍德温哲学与心理学词典三卷本》构想好了表意学的定义——该定义是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5卷)的一个词条所写(见Harwick,1977: 167—175)。与semantics (符义学)、semasiology (语义学)和semiotics(符号学)相比,术语significs(表意学)免去了专业性的联想,因而适合用来表示意义与价值之间各个方面(符用、社会、伦理、美学、经济、语言学等)的联系[见Welby,1983 (1903)、1985a (1911); 见Welby,1985a (1911)中Schmitz的"引言"]。

"表意学"这一术语考虑的是日常表达式:"这表示什么意思?"其中心是符号超越于符义学意义的最终价值和所表之意。表意学不仅是一种意义理论,它还提出一种"表意学方法",超越了纯描写主义,超越了价值论研究中那严密的逻辑—认识论的界限,而通过对其的研究让有意义的行为成为可能(参见Petrilli,1988、1998a)。表意学的核心内容是维尔比从前文所述的三个主要层次对意义进行的分析:"感知"(sense)——"机体对环境的反应";"意义"(meaning)——一个单词"打算传递的"具体的意义;"意味"(significance)——"某事件或经历具有的深远的影响、含义、最终结果"(Hardwick,1977: 169)。皮尔斯认为,"感知—意义—意味"这一三分法与他自己的三分法密切相关,对应于他的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同上: 109—111)。 15

维尔比和莫里斯都将符号与价值相联系,因此,也都将符号学与价值论相联系,这与其他研究相同概念的学者(例如Barthes,1982)很相似。用莫里斯的话来说(Morris,1964: vii):"假如我们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许问的是有关'生活'这个术语的意指问题,也许问的是有关生活的价值或意味问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还说,诸如"意义"(meaning)这样的术语的用法(包括截然相反的情况)非常普及,这一事实表明,表意与意味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关联。

I.7. 表意与意指对象

在莫里斯的术语中,to signify、to have signification和to have a significatum是同义语(均可表示"表意")。

莫里斯在《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一书中对符号学中的significatum(含义)一词的用法作了解释。符号,确切地说,能指表示其含义。莫里斯如是说:"只要满足了条件就构成意指对象,这样的条件就是符号的含义。"(Morris,1971: 94)在他关于某物成为符号之条件的描述中,含义不同于意指对象。当某物满足另一

物充当符号的条件时，前者是含义，而后者是意指对象。

所有符号都表意——所有符号都有含义——但并非所有符号都有意指对象。吸引了巴甫洛夫那只著名的狗（解释者）的注意力的铃声（符号）的含义是：存在某种可以食用的东西；在铃声符号的诱发下，那只狗所发现的、能让其作出反应（解释项）的食物，就是意指对象。然而，令那只狗非常失望的是，在现实中，那食物也许并不存在。

莫里斯在《符号理论的基础》（1938c：2）一书中使用了 designatum（意指）一词代替 significatum（含义）。每个符号，只要它是符号，就都有意指；然而，并非每个符号都有意指对象，因为并非每个符号都指代某种实际存在的事物："当被指称的内容［含义或意指］的存在实际上是指称某个所指对象时，它便是一种意指对象。"（同上：5）例如，若以符号"独角兽"指代它在神话世界中之存在，那么，该符号就有了意指对象，因为独角兽存在于那一世界。相反，若以符号"独角兽"指代动物世界中之存在，那么，该符号就没有意指对象，因为它不存在于这一世界。此处，符号有意指（Morris，1938c）或"含义"（Morris，1946），但它却没有意指对象："因此，非常显然，尽管每个符号都有意指，但并非每个符号都有意指对象。"（同上：5）

因此，含义是符号或能指所指代的意义。换言之，含义是形成一类物体或事件的一组特征，解释者对其所作出的反应与它所指代之物是否实际存在（所指）无关。

在《意谓和意义》（1964）一书中，莫里斯以术语 signification（意谓）替代了 significatum（含义），并完全舍弃了术语 denotatum（意指对象）。

莫里斯对意指与意指对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避免关于指称物的误解。在奥格登与理查兹（Ogden 与 Richards，1923）所提出的符号三角模式中，指称物总能被预见，形成了三角形三个顶点之一。相反，在其他语义理论中（参见 Eco，1975，1984），指称物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其依据是，符号所指代之物未必实际存在。这一研究方法完全排除了意指。

蓬齐奥（Ponzio，1990a、1994b、1997a）指出，符号总有一个指称物——或者用莫里斯的术语，符号总有意指。此外，如果符号所指代的指称物实际存在，那么它就有了意指对象。因此，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柴郡猫"的指称物既有意指也有意指对象。对于信徒来说，"上帝"的指称物既有意指也有意指对象；而在"上帝不存在"这一命题中，"上帝"有指称物（否则该命题就没有意义），但仅仅是作为意指而不是意指对象的指称物。

关于含义与意指，将近八个世纪以前的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 / Petrus Hispanus，1972（1230?）］在《逻辑学概要》或《讲道集》中就对其作了区分。在《讲

道集》中,西班牙的彼得详细解释并系统梳理了发展至当时的逻辑研究。他将复杂的符号活动中的符号作了语境化研究,识别了符号的基本特征。皮尔斯对西班牙的彼得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对他的符号概念非常熟悉,多处引用其观点(参见Ponzio,1990a:77—93;Ponzio与Petrilli,1996)。事实上,从《讲道集》中的符号模式与皮尔斯的符号模式之间的种种对应可以清楚地看出西班牙的彼得研究的取向:vox significativa(表意表现)= representamen(再现体);significatio或 17 representatio(符号呈现)= interpretant(解释项);res significata或representata(表意之物)= immediate object(直接对象);acceptio pro(取代)= to stand for(代表);aliquid(acceptio的意指,某事物)= dynamical object(动态对象)。

I.8. 超越言语符号范式

西比奥克对语音本位主义和语言本位主义的批评建立于建模(modelling)概念基础之上。

建模指的是依据某一模式或图式(无论是理性化的还是真实的)完成某事或再生某物的过程。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被造物主用作创造经验世界的模式。在符号学中,模式依据的是相似或同构的关系,因此与皮尔斯所理解的像似符有关联。

"建模"概念在术语patterning(模式)中也有体现,后者被萨丕尔(Sapir,1916)用来表示文化与语言初始具体的组织形式:文化模式与语言模式。在所有的社会行为中,没有哪个行为比语言更依赖于无意识机制。无意识的模式运作于自然语言的所有层次——音位、句法、语义和语用。自然语言比其他任何文化要素都会抵制理性化和个人的干预。自然语言还会变形;不过,这是由于内部的"漂移"过程。萨丕尔认为,自然语言之所以是最独裁的、最无意识的、最变化多样的文化产物,恰恰是因为内部的漂移过程。它因此而成为人类学家研究文化初始模式的最重要的工具。

"建模系统"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使用的一个术语;自1962年以来,术语"第一建模系统"一直被扎里兹涅雅克、伊万诺夫、托波罗夫(参见Zaliznjak等,1977)使用。尤里·M.洛特曼[Lotman,1977a(1967)]特别指出:"一种建模系统可以看作一种语言。"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符号学家们使用术语"第一建模系统"将自然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区分开来,使用术语"第二建模系统"来表示自然语言以外的人类文化系统。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所提出的建模概念与萨丕尔的模式非常相近。该学派赋予语言以相对于其他系统的初始建模功能。因此,如同萨丕尔(Sapir,1962)一

18 样，它认为文化与第一建模系统有关。此外，该学派指出，作为第一建模系统的语言概念不能解决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传播性问题，也不能解释语言的多元性问题，更不能解决语言的起源问题。

进一步发展和推广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概念的办法是将其与生物学家、符号学家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Umwelt）概念联系起来；这个术语可以译为"模型"（西比奥克）。西比奥克（Sebeok，1991b；Anderson 与 Merrell，1991b）采用了这一方法；他将第一建模的特征归于不同于言语的语言。语言是专门用来生成和组织世界观的，而言语是智人的一种适应性派生物，它是专为交流目的而出现的。由于智人本身特有的建模机制——语言——及其特有的特征，智人获得了向现代智人的进化。所有生物物种都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其中的事物均有一定的意义；人类却与众不同，因为他们能赋予有限要素以无限的意义，从而建构了多元化的、各种可能的不同世界。

语言多元化与"语言（言语）创造性"（诺姆·乔姆斯基）验证了语言作为第一建模机制来生成许多可能的世界的能力。

专门用作交流的言语只是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才出现。口头语言可分成不同的自然语言，它们是第二建模过程的表达方式。

对符号学中的语言本位主义的另一批评来自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未知的语言》（Kristeva，1969）一书中，她对语言学作了概述，并指出其局限。她在语言学史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在语音本位主义中、在对拼音文字的强调中，发现了这些局限。（此处还应该关注雅克·德里达在这方面的重要研究，不过我们在此不对此详述。）

I.9. 主体与异他性

由于语言哲学和符号学领域对语言的研究，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扩
19 展。然而，随着语言学的兴起，哲学传统的认识论范式依旧。特别是，言说主体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质询。

在《符号分析论》（Kristeva，1969a）一书中，克里斯蒂娃通过"符号分析"，尝试将语言学、符号学方法与心理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捷径。她将笛卡尔的自我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先验自我（话语语言学中的主体）与弗洛伊德在他的无意识概念中理论化的双重主体作比较。在克里斯蒂娃来看，无意识就意味着：表意最好描述为一种异质性过程。该过程在文学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在《诗性语言的革命》（Kristeva，1974）一书中，克里斯蒂娃区分了象征与符号。象征表示的是由语言学传统界定的语言——即规范使用的语言。相反，符号

指的是与象征矛盾的初级过程和冲动。文学写作生成于象征与符号之间的张力之中。因此,文学写作对符号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挖掘表意过程异质性体验的潜力。

克里斯蒂娃后来以心理分析框架对符号与象征作了区分。她的《残酷的暴力》(1980)、《爱情的故事》(1983)和《黑色的太阳》(1987)都是针对表意异质性问题,这也是她在其分析实践中的直接体验。的确,正如在《我们自身所未知的》(1988)中所分析的那样,与言说主体的身份和表意过程的异质性相关的问题很容易在语言陌生化环境中出现。

在其最近的一部作品《敏感时刻:普鲁斯特与其文学经验》(1994)中,克里斯蒂娃探讨了同一问题。她在该作品中分析了各种与普鲁斯特的研究相关的不同形式的陌生化,包括种族(犹太人)和性(同性恋者)。毫无疑问,通过对表意异质性和异他性问题的处理,文学写作可以丰富我们对局外人的理解。我们越是把自己看作自己的陌生人,就越能接受他人的陌生化。

异他性(或他性)指的是某物单独且自治的独立于我者的主动、意志、意识或认可的存在。在我们看来,异他性与物质性(可以理解为客观性)是同义词。实物世界相对于我者来说就是他者。从独立于意志和意识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他者。但一切事物中最具有"他性"的是他者相对于我者来说的不可约性和难以驾驭。刺杀便是他者的抵抗和我者挫败对手、他者无力还击的证据(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20

当然,"相对异他性"是另一种情况,用皮尔斯的术语来说,相对异他性从第二性的角度来看是可以进行分类的。然而,这种类型的异他性适用于跟某一角色具有相对性的我者(如父亲相对于孩子、学生相对于老师、丈夫相对于妻子,等等)。相反,作为别人的他者的异他性——列维纳斯称之为 autrui (别人)——则是"绝对异他性"。

根据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理论,从革新和发明角度理解的知识并非纯粹的认识过程。知识的前提条件是伦理知识和对他者的反应,包括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和自我的他者,自我应该欢迎并倾听他者:被解释符号(即解释对象)存在的前提是解释项的存在(即便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认知符号问题)。符号,只要它是符号,就是他者;换言之,符号具有符号的特征是因为它对他者的结构开放性,即因为它是与他者的对话。这表明:符号的身份建立于异他性的逻辑之中。

因此,各种形式的学习、知识、智慧、理解、聪敏等都出现于符号环境之中,这种符号环境渗透着他性,对他者开放,倾听着他者。认知身份受支配于他者,因而经常因符号的不稳定而被置于危机之中,经常被引人注目之物(他者作用于主体的吸引力)无情地煽动。因此,作为符号网络的一部分(由此而获得了符号的地

位)，认知符号被置于一个同样具有伦理秩序的环境之中，并在该环境中被建模。

如果是绝对异他性(非相对异他性)问题(参见 Levinas，1961、1974c；Ponzio，1996a；J. Ponzio，1998)，他者的他性既不可以简约为海德格尔共在的“我们”，也不可以简约为萨特“为他者存在”的主客关系。异他性处于主体的内部，处于我者内心深处，然而，异他性既没有被主体吸收，也没有被主体同化。因此，主体不可能成为一个封闭的整体；相反，主体经常处于对话之中——事实上主体本身就是对话关系，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尽管萨特和黑格尔有他们的观点，但“意识到自己”的自我与意识并不一致，自我也不是以意识为前提；相反，自我存在于意识之前，通过异他性与意识相关联。他者与自我、我者、自己(列维纳斯称之为 même)不可分离，但不可能包括在自我的整体当中。他者对于自我及其世界的构成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他者也是构成我者、构成世界完整性的障碍。

在 20 世纪的哲学家中，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对帮助我们理解符号学—语言学问题所作的贡献比起大多数其他人都要更大。他的方法是从批评本体论入手探讨异他性问题。他(与哈特曼、布洛赫、海德格尔、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巴赫金等一起)对重新认识本体论的哲学多元化发展运动作出了独到的贡献。这种发展趋向与被知识逻辑赋予了霸权的、以认识论术语简约化了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列维纳斯在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对话中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于 1928 年和 1929 年在弗里堡师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进而将他们的研究引介到法国。

另一位对语言与异他性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是俄罗斯人米哈伊尔·M. 巴赫金。列维纳斯和巴赫金(以及皮尔斯、维尔比和莫里斯)都教导我们：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过量、冗余的关系，是一种对客观化思想的回避，对主客关系的解除；这在语言层面上导致了话语的内部对话性，因而永远没有完整的话语(参见 Bakhtin，1929、1963；Voloshinov，1929)。

I.10. 话语与对话

米哈伊尔·M. 巴赫金和帕维尔·N. 梅德韦杰夫、瓦伦丁·N. 沃洛希诺夫组成了“巴赫金小组”，参与者还有音乐学家伊万·I. 索拉尔廷斯基、钢琴家玛丽亚·尤金娜、生物学家伊万诺夫·I. 卡纳耶夫、作家康斯坦丁·瓦季诺夫、印度学研究者 M. I. 图比安斯基和哲学家迈特韦耶·I. 卡冈。巴赫金的兄弟尼可拉也可看作该小组成员之一，尽管并非实际参与(参见 N. Bakhtin，1995：7—13)。尼可拉于 1918 年离开俄国，最终在英格兰定居，并于 1946 年在英格兰的伯明翰大学创建语言学系。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著作与他的同事有太多的重叠，如

今很难区分。尽管今天很多评论家努力确定哪些作品实为巴赫金所写，但这似乎也证实了他的论点："一个人自己的话语"中有"半他性"特征。巴赫金在以下作品中均发挥了著作者的重要作用：沃洛希诺夫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1929)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以及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在1925至1930年之间，巴赫金还撰写了各种以同一批"作者"署名的文章，以及署名卡纳耶夫的生物符号学文章"现代活力论"(1926)。甚至在巴赫金小组于斯大林统治期间消失之后(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于20世纪30年代消失)，人们依然能听到该小组成员与巴赫金不间断对话的"声音"；巴赫金一直坚持研究，直至1975年去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后于1963年修订再版，书名更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阐述了他的对话理论；该理论事实上是反形式主义和反权威的一种理论。 22

对话是或外显的或内隐的话语，其中，他者(他者未必是另外一个人)的语词干预到自己的语词。对话也是一种话语体裁。巴赫金非常类似于皮尔斯，把对话看作是思维过程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实质性对话"与纯粹"形式上的对话"。实质性对话不是由文本的对话形式(即形式上的对话)所决定，而是由文本中的对话程度所决定；文本中的对话性也许呈现为对话的形式，也许不是。换言之，实质性对话决定于对异他性开放程度的高低。

如同巴赫金的著作一样，沃洛希诺夫的作品也承认异他性关系是话语的根本特征。自己的话语与他者的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沃洛希诺夫所有著作中显著而永恒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的第三编对这种关系在各种不同话语体裁中和不同自然语言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在对"弗洛伊德哲学"的批评中，沃洛希诺夫也探讨了同一问题。在他表达的概念中，这种关系还表现为内部的自治，它独立于对话者，独立于受众的意向性。

巴赫金发现，在对话与"重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此处的重音不是指图示标记(例如一个音节上方标注的发音符)，也不是指发音(如"他讲话带有美国口音")，也不是指说话人声音中的语调。它甚至不是专指言语符号。相反，就出现于个人中间、产生于社会环境中的重音而言，它指的是人类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评价性重音。言语符号(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信号，事实上，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号。言语符号被赋予了意义的含糊性或可塑性，因此，它能对不同意识形态视角以及不同意义作出反应。由于这些特征，言语符号尤其被赋予了指称或内容意义上的主题和意义；不仅如此，言语符号还被赋予了价值判断，因而具有特定的评价重音。每个活生生的语词(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的)都毫无例外地被加了评价性语调方面的重音(参见Ponzio，1992a、1998)。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中的一段文字分析了六个喝醉的工匠之间的交谈。沃洛希诺夫 23

引用这段文字［Voloshinov，1929（Eng. Trans.）：103］就是为了阐明，同一个名词的不同重音可以表达的评价、思想、感情（甚至推理逻辑链）会有多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将对话与身份的逻辑相联系；反之，我们也可以认为对话是异他性意义上的置换。后一种对话不同于“成就式对话”，这种对话中对话者的任务就是达到一定的目标，从而维持和再确认身份。实质性意义上的对话对于论辩式推理——在身份防卫和再生方面并不固定，却对他性开放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巴赫金指出，诸如单边、僵化、直线辩证法的现象均源自硬化的对话。独白式的、单线的和整体化辩证法是以某一固定的综合性结论为取向。因此，它们需要对话理性批判（见 Ponzio，1993a），这是对支配着当今西方思维与实践的身份的批判。

巴赫金通过其“语言哲学”或“元语言学”所作的另一重大贡献与他的对话理性批判有关。此处，我们要（继承康德和马克思的做法）从文学和哲学意义上理解“批判”。在对符号、表述、文本和话语体裁的研究中，在对文学写作与大众文化的非言语表现方式（如狂欢符号）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巴赫金最喜欢使用“元语言学”这个术语。巴赫金的对话理性批判主要围绕应分的责任（responsibility without alibi）的概念展开——这是一种非常规形式的责任，它涉及存在主义“建构”，涉及我者、世界、他者之间的关系，因而不可推迟。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一个人的身体介入另一个人的身体的体现方式——因此，认为身体具有个体性、孤立性、自治性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幻觉。关于身体的适切的形象是“怪诞身体”（参见 Bakhtin，1965），这在大众文化中，在公众领域的大众化语言中，尤其是在狂欢节面具下，找到了具体的体现。这是从生物符号学视角看到的身体，是在主体世界中的有机体，与世界和其他生物（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的身体之间具有重要的、牢不可摧的关系。随着革命中心由身份（无论是意识或自我中的个体，还是社团、历史性语言或整个文化系统这样的集体）转移至异他性，巴赫金的对话理性批判不仅开始质疑西方哲学的总的趋向，而且还质疑它所折射出的文化主流趋向。

作为二人或多人之间的言语交流，对话本身可以被看作一种目的，也可以看作一种工具功能的履行。就后一情况而言，对话可以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是用以决定和评价目的和手段的手段。鉴于这些区分，马西莫·A. 邦凡蒂尼和奥古斯托·蓬齐奥（Bonfantini 与 Ponzio，1986）提出了对话的三分法，既考虑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也考虑到符用学视角。（1）本身就是目的的对话——换言之，交谈式或娱乐式对话。这种对话是为了谈话而谈话。它具有寒暄功能（雅各布森），本身有两个变体：（1.1）重复性对话；（1.2）娱乐性对话。（1.1）的例子包括某些电视交流形式，这种交流往往是重复性的。（2）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对话，它也有两种变体：（2.1）交流性对话；（2.2）竞争性对话。（3）合作性、反思性、调查性

对话。当我们使用实质性对话程度作为区分标准时，我们发现，这第三种类型的对话有三个变体（体现了对话性程度的不同）：（3.1）再发现性和启示性对话；（3.2）研究性和建构性对话；（3.3）探索性和追询性对话。（有关对话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参见 Bonfantini，Ponzio，与 Petrilli，1996。）

I.11. 对话与推论

在皮尔斯的逻辑著作中，“如果……就”的推论过程、假说的形成、“思维链”等都是对话性符号结构。

推论中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的 25 关系。在归纳中，前提与结论的关系由习惯决定，属于规约符类型。在推理中，这种关系是指示符类型，结论是前提不可避免的衍生。在试推法中，前提与结论的关系是像似符类型——相互自治关系。这既导致了高程度的创造性，同时也导致了出错的高风险性。

“指示符类型”一词来自于皮尔斯符号三分法中的“指示符”。指示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通过临近关系或因果关系或通过其他物理联系来表示对象。不过，这种关系也依赖于习惯或规约。就以敲门声与门外有人想进门之间的关系为例。此处，规约起到了将敲门声与敲门者联系起来的作用。即便如此，临近性 / 因果关系还是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如果我们打开门却发现没有人要进来就会感到很惊讶。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指示符：（1）症候，包括医学、心理和自然现象（实际临近性 + 实际因果关系）；（2）线索，例如自然现象、态势、倾向（假定临近性 + 非实际因果关系）；（3）踪迹，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非实际临近性 + 假定因果关系）。皮尔斯说：“指示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如果消除了对象，它立刻会失去符号的特征，但如果没有了解释项，它却不会失去符号的特征。”（CP 2.304）

在推理中，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的对话性程度是最低的：一旦前提被接受，结论则不可避免。归纳也具有单线推论过程的特征：尽管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但身份与重复占主导地位。相反，在试推法中，构成辩题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具有真正意义的对话性。事实上，对话性程度越高，论证就越具有创造性。

试推过程对话性程度很高，产生的反应具有很高的风险性和创造性。当我们说试推论辩过程具有风险性时，我们的意思是，它具有尝试性和假定性，将规约性（规约符特性）和机械必然性（指示符特性）的空间降到了最低程度。

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对话关系由试推法与像似性之间的关联所决定。像似符的特征是符号与其对象之间具有相似关系。然而，仅仅凭相似关系不足以 26

判定像似符。孪生兄弟长相相似,彼此并非符号关系。我在镜子里的影像和我相像,但并非我的像似符。像似符要获得规约或习惯的效果,还需要社会实践和特殊的功能发挥作用。像似符相似性是一种特殊的相似性:鉴于它是优先考虑某些相似特征,因而是基于规约的一种抽象。一张钞票与另一张价值 50 美元的钞票具有相似性,这无疑就是一种符号:第一张钞票的价值也是 50 美元。但如果二者过于相似,就连两张钞票的序列号也完全一致,其中必有一张钞票是假钞,无法在货币市场上履行合法的像似符功能。虽然如此,皮尔斯说,像似符是一种最少依赖于规约和因果关系 / 临近关系的符号:"像似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即使其对象不存在,它仍拥有使它有意义的特征;例如代表几何线条的铅笔线。"(CP 2.304)

试推法推论过程所带来的是他性和对话性最高的符号活动。试推法是一种构建假想的推论过程。在试推法中,解释事实的规则是依据它与事实之间的相似关系(像似性关系)而假定的。充当一般前提的规则可以来自与事实所属领域相近的话语领域,但也可以来自一个相差甚远或全新的领域。如果结论得到确认,它则反动于规则,并验证规则。这种反动过程使得试推法推论过程有出错的可能,因而更有风险。然而,如果假想是正确的,这种试推就具有革新性、创造性,有时甚至会让人惊叹不已(参见 Bonfantini,1987)。皮尔斯说:"试推法是一个构建解释性假说的过程。它是唯一能引进新思想的逻辑操作程序,因为归纳只能决定价值,推理只能推出纯粹假说的必然结果。推理证明的是某物一定会如何,归纳证明某物事实上的操作性,试推法仅仅表示某物也许会如何。"(CP 5.172)

试推法的动力来自于用以生成模型、推理、发明和项目的模拟过程中的隐喻。如维多利亚·维尔比所说,试推与逼真之间的紧密联系源自这样的事实:"我们的智力工具中最为精彩的是形象或图形。"[Welby,1985a(1911):13;亦见 27 Petrilli,1995a、1998a] 鉴于试推法、像似符和模拟关系之密切,我们手头的任务不是为了"文字"话语而消除比喻性或隐喻性话语;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识别并消除那些致使事物间关系神秘化、歪曲我们推理的不恰当形象。维尔比说:"我们需要一位语言学眼科医生通过某种标准化眼睛来恢复失去的聚焦力量,将我们的形象恢复到现实情况。"[Welby,1985a(1911):16]

I.12. 推论与范畴:符号学、逻辑学、本体论

第一性、第二性与第三性这三个术语是皮尔斯用以描述宇宙现象的三个范畴。这些范畴是无处不在的思维、符号和现实范畴(CP 2.84—2.94)。第一性、第二性与第三性在逻辑学中分别对应于试推法、推理和归纳;在符号学中分别对应于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在本体论中分别对应于爱的演化、机械的必然演化和

随机变异演化。

第一性（本身，原始）、第二性（对面，对立）和第三性（间性，转换）是普遍的范畴。由于所有心理操作对于皮尔斯来说都是符号操作，所以他的范畴不仅是心理普遍范畴，也是符号普遍范畴。鉴于整个现实——因而也包括存在——都充满了符号，这些范畴也是本体范畴。皮尔斯说，符号例示了第三性范畴；它体现了它本身、它的对象和解释项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因为符号充当解释项与对象之间的中介，它总是扮演第三方的角色。

符号可以作为其本身来看待，或者作为与其他某物（对象）发生关系的某物来看待，或者作为中间物（其对象与其解释项之间的中介）来看待。基于此，皮尔斯在他的范畴三分法与符号系统中另外三个重要的三分法之间建立了下述对应关系：第一性——质符、像似符、呈位；第二性——单符、指示符、述位；第三性——型符、规约符、议位（参见 CP 2.243）。

第一性有助于解释符号的形成及其逻辑—认知过程。从皮尔斯符号三分法来分析，第一性与像似性吻合。以第一性、在场、“如此这般”、纯质来呈现自己者具有类似性关系。如彼得里利所说（Petrilli，1999c；亦见下文），第一性在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感知和预测性判断的现象学中也有体现，不过胡塞尔所用术语不同于皮尔斯。 28

从第一性维度看，动态对象作为直接对象的身份还没有完结。相反，作为基础——原生像似符——动态对象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胡塞尔会说 immer wieder）将自己作为不可简约的他性强加给解释项。

皮尔斯引入“基础”（ground）这个术语来表示某物的“某个方面或性能”，它基于此而成为符号或再现体（换言之，它能代表别的某物，即对象），这当然还需要另一符号充当解释项。事实上，充当符号的事物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能代表对象，它能代表对象的仅仅是某一特定方面或某一性能或“某一思想”（CP 2.228）。这一思想构成再现体的基础。这一不确定的某物然后渐渐在某一方面确定了下来，结果成为解释项的符号。让我们回忆皮尔斯的一个例子。如果我说，“这个火炉是黑色的”，那么，直接对象“火炉”的某一方面被考虑——其“黑色”，这就是解释项的基础（参见 CP 1.551）。从感知现象学（胡塞尔、梅洛—庞蒂）视角看，基础本是未区分的材料，它通过某一过程渐渐地在某一方面得以区分，而在这个过程中，它成为解释项的符号。

第二性（对面，对立）是相对于或对立于别的某物而考虑某物的范畴。它涉及二元关系，一种对立或反应关系。从符号视角看，第二性与指示符相关联。指示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通过临近关系或因果关系或通过其他物理联系来表示对象。然而，正如上文关于敲门声与门外有人想进门之间关系的例子所示，这种关

系也取决于习惯或规约。由第一性支配的像似符将自己呈现为原始符号，由第三性支配的规约符将自己呈现为转换符号，而由第二性支配的指示符是一种对立符号（CP 2.89—2.92）。

从逻辑视角看，由第二性支配的推论对应于演绎推理。事实上，就对立论辩或演绎推理而言，结论被迫承认，如果结论所述事实不存在，那么前提所述事实也就不存在（参见 CP 2.96）。

29

从本体论视角——存在概念视角——可见第二性存在于“机械的必然演化”或必然性法则。在皮尔斯的术语中，机械的必然演化描述的是一种宇宙力量，它和“爱的演化”（创造性的爱，对应于第一性）、“随机变异演化”（机会，对应于第三性）一起，调节宇宙的演化发展（参见 CP 6.287—6.317）。

对应于第二性或对立（一种二元范畴）的是一种相对异他性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术语相互依赖。相反，有效异他性——绝对异他性，某物可以独立地、绝对地、独自地、自治地存在的可能性——将自己呈现为第一性，或原始；根据有效异他性，某物“能成其为此物，不需要参照此物内部或外部的任何它物，不需要任何其他力量，也不需要任何理由”（CP 2.85）。

一种有效异他性关系（或曰绝对异他性）仅仅在二元关系、第二性、对立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参见 Ponzio，1990a：197—214）。这种异他性不可能存在于仅仅由第二性或二元关系支配的系统之中；在这种系统中，一个要素的存在的前提是，它指称另一要素；假如另一要素被否定，这一要素便不复存在。“例如夫妻关系。这里只有真正的二项关系；但它构成了一种反作用力：丈夫使妻子成其为事实上的妻子（而不仅仅是存在于一种比较性思维之中），而妻子也使丈夫成其为丈夫。”（CP 2.84）

第三性与另两个范畴一起指导和促进质询，因而具有启发价值。前提与结论之间的推论关系基于中介，即第三性。

第三性调节连续性，皮尔斯认为，连续性存在于归约性、指示性和像似性间的对话关系之中。规约符绝不可能是纯粹的规约符，它总包含有不同程度的指示性和像似性。同样，以指示符或像似符为特征的符号也必然包含有规约符的特征，因为一个符号要以这样的身份存在，必然需要以解释项为中介，还要凭借规约。归约性是大多数符号在第三性中共有的符号维度。归约性以中介（或间性）为特征，而像似性以第一性或直接性（或本身）为特征，指示性以第二性（或对面）为特征。

皮尔斯预见到在自然内部——独立于外部行动主体之行为——追寻符号的可能性。从这一视角看，宇宙充满了符号，这些符号先于解释性意愿的行动而存在。真正的中介（不可简约的第三性）是我们经历的现实中固有的一部分，这种

30

现实作为符号现实引起我们的注意，通过解释过程变得更为清晰。第三性构成整个宇宙中的符号之间的（中介）关系的特征。皮尔斯从这个视角发现了第三性与“粘连性”之间密切的关系，即其连续性信条（参见 CP 7.565，7.570，7.571）。粘连性排除了所有分离形式，但不否认离散单位和第二性的可能性。因此，尽管承认离散单位的存在，但连续性原则不容许心理与生理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不可简约的区分（参见 CP 6.268）。这种区分可以看作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符号活动中产生的特殊单位。



符号学与符号学家

第一章
符号学之旅：从皮尔斯到其他符号学家

1.1. 摆在皮尔斯案头的问题

正如皮尔斯的理论和实践所表明（详见第59页生平简介），关于符号的科学或符号学（semiotics；皮尔斯更喜欢 semeiotic 这一术语，参见 Fisch，1986）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视角，用来描述无限种类的符号表现或符号活动，它们一直以来就为许多研究领域所关注。皮尔斯的方法不仅用于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分析，而且还打开了通向符指宇宙（signifying universe）的门户，使得我们能够探索开放的、持续延展的符号网络。虽然三元论是皮尔斯符号研究的一个基本特色，但它绝非是一种过度简化。确实，他关于符号活动过程的分析也并未隐藏任何单向阐释路径所冒的风险，亦即固定概念和范围预置的简化，此外可能还有无休止的偏移与迁延。但是许多现有的关于皮尔斯理论的文献却正将他的观点广泛用于新老学科领域。世界范围的符号网络不断延伸，日益复杂，带来了新的符指潜力，皮尔斯的符号活动宇宙也随之不断演化、充满律动。

1.1.1. 符号活动，解释与准解释者

在皮尔斯1908年12月23日写给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Victoria Lady Welby，1837—1912）的信中，年近七十的他提出了自己符号学研究的宽视角： 35

> 我无法研究任何东西——数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万有引力、热力学、光学、化学、比较解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音学、经济学、科学史、惠斯特纸牌、男人女人、酒、度量衡学——除非当作符号学的研究。（Hardwick，1977：85—86）

所有存在的事物，人类的或非人类的，只要是符号，亦即只要行使符号功能，

都引起了皮尔斯的注意。事实上，正如他在1905年的论文“实用主义问题”中所表明，整个宇宙，存在物的宇宙以及我们关于存在物的认知建构宇宙，那个更广义的我们习惯称之为真理的宇宙，存在物的宇宙只是它的一个部分，“整个宇宙如若不是完全由符号组成，也是充满着符号”（CP 5.448nl）。

在其各类作品中，皮尔斯提供了许多他认为可以被归类为符号的例子——可参看他1909年的论文《关于意义的论文》的序言部分。在致力于一般性描述的构想之时，他列举出了画像、图片、图表、手指、症状、眨眼、手帕结、回忆、幻想、概念、指示、标志、数字、信件、词、短语、句子、篇章、书籍、图书馆、信号、命令、显微镜、立法代表、音符、音乐会、表演、自然哭喊，等等，换句话说，任何能够创造出源于外在某事物的内在心理印象（参见MS 634：16—17，September 1909；CN 2：149）。在皮尔斯的眼里，宇宙整体就是一个符号，“一个广袤的代表项，一个伟大的象征符号……论元”，因为是论元，所以“必然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一首伟大的诗篇……一支交响曲……一幅画”（CP 5.119）。声称宇宙充斥着符号（CP 5.448n1），就是暗示着它内在结构上被赋予了一种能力，能产生无限的能指与阐释过程。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为了适切性，符号分析必须区分符号的现象学表现形式中两个紧密相关的层面：符号学性质的与阐释学性质的。符号学性质层面的关注意指过程的内在符号结构，从本质固有的意指能力的角度考虑符号；而阐释学性质层面则是从其所引致、同时也导致其产生的阐释反应的角度来考虑符号活动。这两个层面在皮尔斯传统的符号学视角中都有暗示。

鉴于皮尔斯意欲解释的符号种类的庞杂，其所列出的符号清单正强调了他的符号模型的一般性。他致力于构想一般性的符号理论，即，足以强大到解释所有种类符号的理论，因此一个结果就是，在其强调分析符号活动的各个不同侧面时，他的定义也经历了各个不同而且更加深化的阶段。并且，虽然一方面皮尔斯的符号定义的一般特点暗示、解释了许多不同种符号的存在，但在另外一方面，多样化的符号具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它们也对应了一个一般性的定义。皮尔斯于1897年构想出了可能是其最为广泛传播的符号结构定义：

36

> 符号，或代表项，是对于某人在某一侧面或能力方面代表了某物的东西。它对某人说话，也就是说，它在此人的思维中创造了一个相对应的符号，或者一个更加发展了的符号。那个被创造出来的符号我称之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CP 2.228）

皮尔斯所用的“semeiosis”（符号活动）一词指的是“符号的活动”，因为构词

后缀“sis”所表示的就是“行为”、“行动”、“活动”或者“某某过程”。这包含了一种“三元相关影响”，亦即，“三种主体的合作，比如符号，符号的对象与符号的解释项”（CP 5.484）。此外，皮尔斯也数次提出，因为符号的结构包含了“符号—对象—解释项”这样的关系，它具有不可约减的三元性（参见 CP 8.361）。即使有其他要素的加入，比如在《皮尔斯文集》CP 2.228 所做的定义中，他就描述了代表项的“基础”或者符号（亦即，符号所表征的对象的特定侧面，我对此对象所有的特定引申或者观点），即使当符号关系比三元要更加复杂，它也总是可以被约减至以上列出的三个基本因素之间的活动：符号—对象—解释项（也可参见 CP 1.347）。

皮尔斯反对符号的简化理解，而且（因此）反对他点名批判的二元倾向。这里，他所指的是“动态主义”，意为“对组之间的活动”。对比而言，他主张符号是不可约减的三元，富于理论与实用层面的决定性和不可逆的重要意义。它引领我们更完整地理解人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以及非人类行为中的所有可能的符号活动。

符号活动能够从符号对象的角度来分析，因此可以通过表述与说明过程的方式来做到这点，或者能够从解释项的角度来分析，因此可以通过解释与解释过程来做到（参见 Fisch，1986：329）。很明显，符号活动的这两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皮尔斯特别指出所有的“符号要求有两个准思维，准表述者与准解释者”（CP 4.551）。创造符号与解释符号的活动通过连贯性的关系而连接。如此，它们代表了两个方面，大致对应着同一个符号活动过程或者“思想”过程中的表述与解释。对于一般普遍的符号活动，皮尔斯所说的也基本如此。确实，符号活动过程或思想过程不需要与人脑相结合。文森特·科拉彼得罗这样解释道：“在这个语境中准表述者指的是符号跃出的来源，而此处的准解释者则是指符号成长的形式。没有必要存在关于准表述者或是准解释者的任何‘精神性’的东西。”（Colapietro，1989：19）用皮尔斯自己的话说就是：

37

> 思想不一定跟大脑相连。它出现在蜜蜂的行为，水晶的构造，以及整个纯粹的物质世界中。人们无法否认它的真实存在，正如无法否认物体的颜色、形状等等真实存在一样。（CP 4.551）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中，解释项符号回应被解释的符号而发展（被解释的符号在动态符号对象的另一端，可以是任何事物：一个东西，一种感觉，之前的某个解释，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解释项符号也理解被解释的符号。但是，相对于被解释的符号，解释项符号呈现出自己的符号物质性或者意指他性，其方式和被解释符号相对于解释项符号而拥有符号物质性一样（参见 Petrilli，1986、1998e）。换句话说，被解释符号同样也被赋予了他性，而且永远不能完全通过任何既定的符号

活动过程或解释路径中的某一单独的解释项符号被理解或掌握。

1.1.2. 符号的移位、身份与他性

皮尔斯符号学从符号活动在解释项所具备的推延（deferral）及回用（renvoi）的潜力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描述，无论这种潜力存在方式是内生符号活动式，跨越同一符号系统的解释项，还是间性符号活动式，跨越不同符号系统。

在皮尔斯的方法中，符号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而且从来不会局限于单独的意[38]指系统。相反，它的特色是一种移位能力，我们称之为“解释项的飞行”，它甚至能够跨越不同的符号系统。这导致了意义的增加，因为符号活动空间因意思与含义而愈加激烈地搏动。在尝试检视意指过程流动的时候，翁贝托·艾柯指出解释项推延的边界。事实上，皮尔斯视角中的解释是一个潜在的无限符号活动，并不具备那种基于双单声道或二分符号互通系统的确定性。解释远远无法确凿的律则，它总是假设性的，充满风险。再有，它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创造性发展倾向。

持续的移位向我们表明对他性的结构开放如何成为身份的一个条件，尽管看起来显得有些矛盾。他性的问题同样引出了“解释的限度”问题。关于这点，一个重要的观察发现是被解释符号相对于解释项符号的符号物质性或他性是对任意性的一种阻碍。多亏了基于双向他性的符号间对话性对抗，我们才得以避免解释过程中相对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威胁。

作为一种活动，符号活动的潜力是无穷的。这意味着符号结构的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一种转变的能力：在符号活动的某个时刻实现某种特定功能，在某个其他时刻又实现另外一个功能。单独的符号或者符号的某个方面也许能导致多样的“解释路径”，某个给定的符号活动中的解释项在另一个符号活动中也许就是对象（或者被解释符号），反之亦然。

因此，符号及其组成部分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固定的，也不局限在某个符号活动的角色或功能。恰恰相反，它们被赋予了转化为其他某物的潜力，被推延为其他某物，时刻准备将符号“完整性”去稳定化，并将其抛入危机之中。

这样的符号超越了其本身的限制。归根结底，符号表现了外位性。他性是符[39]号内有的特性，同时也是符号自我超越能力的前提条件。符号，或者更好地说，由符号活动或符号域的宏观网络中的符号关系所产生的意指路径，源于确定性和不可确定性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存在于符号特定构造与其持续移位、转变和向他者的推延之间。这个他者既是符号内在具有的，又处于符号之外，相对于既定的符号活动来说是先验的。他者，这种增加或超越，防止了符号整体的自我闭塞，因此给符号带来了一种开放的特征，以及创造性生产的潜力。开放性或者符号完

整性的去完整化是质疑与批判的前提条件，目的是为了达到判断“思维”、符号活动操作过程好与坏的可能（CP 5.108）。

作为进行中的主体间相互关联的过程，思想与主体性必须开放，面对质疑，面对他者的批判眼光，面对其他具备推理性的主题。将思想的发展视作独白单声主导的单独过程是不正确的。相反，与他性逻辑一致，与即时性演变的前后非线性相对的是，思维与主体性在连贯性与非连贯性之间演化。解释路径不断增加，拒绝完整化。确实，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视角来看，即时性本身不能被约减为前后相承的简单事实，它也是在他性的关系中被发展起来的。

1.1.3. 认识论意义上作为责任意识的知识

不错，皮尔斯符号学在首要意义上是认知符号学，而且同样注重从引申或论辩的角度审视符号，但同样正确的是，皮尔斯力图发展一种具有普遍可靠性的符号定义。认知符号是一种符号，通过它我们了解更多（CP 8.332），但是在此之外，其他种类的符号也被提出，它们的特征功能并非为了提供新的信息或知识。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称之为非认知符号的行动、结构、功能和形式，我们能够丰富关于认知符号的知识（MS 676：5—6）。

尽管皮尔斯研究符号的一般模型，他也对发展一种方法理论感兴趣。鉴于他的研究围绕着科学，其关注点便在于搜寻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种围绕着完美的认知符号的方法。同时，即便是将认知符号放在特别的高位，皮尔斯还是将他的研究导向符号活动的一般概念，也就是导向一种能够解释所有种类符号和所有符号系统的符号模型。因此，他的特别兴趣并没有使他将其宽广的研究范围缩减到特定的焦点：认知符号。

40

相反，皮尔斯不得不将科学研究——事实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问题化，而且使其具备一种双价，知识需要在知识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被理解，同样也以责任意识即以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对话被理解，以作为他性的关系的身体交互性来被理解。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并不把具备创新创造力的知识习得看作纯理论的过程。相反，从皮尔斯的视角来看，知识因为其与欲望的关联而泛出情感的色彩（参见Bonfantini，1993）。知识习得和语言学习的过程预设了符号的伦理维度。它们也预设了对他者的应答性，既包含与自我不同的他者，也包含自我的他者，自我必须适应和听从这两种他者。被解释符号如需存在，就必须有解释项，即使我们所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认知符号。事实上，如前文所述，符号只有当它是一种他者，结构上向另一他者开放，与他者对话时，才是符号。

这就暗示着符号身份植根于他性逻辑之中。因此，各种形式的学习、知识、智

慧、理解以及聪慧等现象是一个符号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个网络归根结底投射于他者，通过聆听他者而被导向。认知身份取决于他者，因为无休止的诉求于他者所激发的不安状态而始终处在危机之中。因此，作为符号赖以获得符号身份的符号网络的一部分，认知符号也在伦理型符号材料的条件中被塑造出来。

1.1.4. 解释与表征

皮尔斯提出术语“解释项”，指的是“符号的恰当意指结果”（CP 5.473）。解释项——以及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意义——是符号的成果、效果或结果，同时也是其存在的条件。此外，解释项以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意义，不能从中性导向的解释角度来处理：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并不赞成这种理解。在人类符号活动中，解释项是一个回应，它相应地引致另一个解释项，实际上同样也是开放的符号关系链中的另一个反应。这里的“回应”要从广义角度理解为与实际的行动相关。回应是对被解释符号的回应，是采取立场，是做决定，是完成一个应答性 / 责任性的行为。

41

从这个角度来看，解释项可以有不同的种类。皮尔斯引进了“情感解释项”，之后命名为“直接解释项”，用来指符号能够激发的感觉与情感，以及符号在解释者身上决定的情感。“活力解释项”或“动态解释项”让人们想起肌体型的努力。但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努力是一种精神性的，指的是情感所常伴有的行动，符号在解释者身上所决定的实际反应。而且，尽管活力解释项预设了情感解释项，反之却不亦然——也就是说，情感解释项不一定需要活力解释项（CP 5.475）。

符号的活动可能会导致其他符号或者共享此符号特性的某种东西的产生，皮尔斯称之为“逻辑解释项”。从皮尔斯的视角来看，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为的是查明那些与客观事实的证据相对的概念的“智性概念”的意义（CP 5.467）。从这个视角看，不仅在传递已获数据的方面，而且在发现和丰富认知过程本身的方面，概念符号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皮尔斯从实用主义者的视角指出了“终极逻辑解释项”，它存在于概念化过程、智性概念中的规则以及习惯改变之中。习惯是符号的结果，通过它的普遍性而分享符号的特性。从其是一种习惯的程度来看，它是一种逻辑解释项，而且因为习惯的形成标示着到达符号活动过程中的某个点，所以它也非常理想地实现着终极（逻辑）解释项的功能（CP 5.476；另见本书 10.2.7 节）。

皮尔斯文集中较早期的符号定义有一个重要的问题（2.228）。科拉彼得罗指出，一些皮尔斯派学者认为这个定义看起来可能限定为代表性符号，因此并没有真正的普遍适用性（Colapietro，1989：第一章）。皮尔斯自己在将“代表项”指代“符号”的时候，这种想法也体现了出来。皮尔斯说道：

> 我关于代表项的定义如下：代表项是三元关系中的一个主题，对应着第二个，称为对象，对象对应着第三个，称为解释项。这个三元关系中，代表项决定着它的解释项处于同样的三元关系中，对应着某个解释项的同一对象。（CP 1.541）

42

这个说法让我们不舒服，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很明显皮尔斯关于符号的原初定义是为了达到一种普适性。他的定义并不限于代表性的符号。他的目标是为了描述一切符号，同时也不降低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一个真正普遍的符号理论的目标也不仅仅是解释代表性的符号：符号活动包含了各类符号，包括命令、音符，以及无法被归类为代表性符号的连结物。而且，即使对象的活动在此类符号中并不明显，它仍是意指过程的一部分。

比如连词“and”看起来就不像一个符号，因为它明显缺乏指称对象。实际上，在话语结构中它确实有着指示价值，将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连接了起来而因此成为连接符号“and”的对象。音符指涉的是作曲家的音乐构想，这个诉诸听者的审美敏感性，继而创造了“情感解释项”（CP 5.475）。祈使句“关掉收音机”具备符号性因为说者的意志或者意愿性，即符号对象，引致了一个解释项，作为一种效果，即关掉收音机的行动——“活力解释项”——这还只是众多回应或解释项中的一种可能（比如，还可以忽视该命令而不关收音机，或者仅仅降低音量，或提高音量，或者做一个口头回答）。

对象与解释项都是不可约减的三元符号结构的一部分，不论该结构是代表性还是非代表性。皮尔斯自己强调了“代表项”这个术语并不足以体现符号的一般真实性，这个真实性更好地体现在了“媒介性”中（CP 4.3）。从一般的角度来描述的话，符号或者符号活动功能更多地存在于对象与解释项之间的媒介过程中，而不是将对象“表征”为解释项。

尽管“代表某物的某物”（aliquid stat pro aliquo）这一表达是用二元的方式描述符号关系，皮尔斯的定义指的是不可约减的三元符号结构。如此，它就为符号活动结构性的回用理论化——转移／推延——提供了条件。皮尔斯符号结构关系分析的这个特定方面由托马斯·西比奥克（1920—2001）做了突出强调，他说：

> 皮尔斯的定义包含了回用这个核心概念，或者按照雅各布森将著名的古语 aliquid stat pro aliquo 精简之后的说法：转移。它还包含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皮尔斯主张的不仅是 X 是 Y 的符号，而且还有“某人”——他

43

称之为“准解释者”,这个“某人”将 X 视为 Y 的符号。(1979 : viii)

符号不仅是别的某物的符号,而且还存在“某个人”,一个“准解释者”(CP 4.551),他将某物视为别的某物的符号。皮尔斯进一步分析其所包含的隐意,他写到:“这是符号的本质,尤其是那种通过某个角色被给予意义的符号,这存在于它被理解为符号这样一个事实中。当然,无物为符,除非释之为符。”(CP 2.308)此外他又写到:“符号只有通过其接收到一个解释才成为实际上的符号,即,通过其决定相同对象的另外一个符号。”(CP 5.569)

作为一个不可约减的三元结构,符号不能被简化为一个“代表项”的问题,这个描述符号与对象关系的术语很容易引导人们这样去看。在皮尔斯的著名的定义中(CP 2.228),他并没有明确指出绑定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种类,这不限于表征和“代表”某物的逻辑。但在同时,有关符号与对象和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类型在他的符号分类中得到了确定。两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他的三分法: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以及意元符号、命题符号、论证符号(参见 CP 2.243)。

在描述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的关系时,皮尔斯经常声称符号由对象所决定,也相应地决定了解释项,从所构成的符号角度来看,这种决定关系相对于对象是被动性的,而相对于解释项则是主动性的(CP 1.538; 1.541)。然而,对象、符号和解释项之间不可约减的三元关系的组成部分是复杂、多样而且动态的。事实上,在皮尔斯看来,对象与解释项是以直接性、动态性和最终性的方式成立的。在皮尔斯的一些描述中,对象决定符号,符号相应地决定着解释项(参见 CP 1.541),而在另外一些描述中,对象由符号所决定,也就是说,对象由符号带入存在:“符号的对象可能是符号所创造出来的某物。”(CP 8.178)确实,皮尔斯区分出了两种对象:一种是“动态对象”,决定符号的对象,另一种是“直接对象”,由符号所决定的对象。符号创造自己的(直接)对象,通过这样,符号创造了其本身由动态对象所决定而成为符号的必要条件(参见 CP 4.536)。因而,从直接对象的角度来看,对象在符号活动过程中是内在的,相对比而言,如果从动态对象的角度来考虑,它就是先验的。

44

皮尔斯最著名的三分法将符号分类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其基础是符号与动态对象的关系。

像似符号通过其内在的结构而与动态对象建立了一种关系(CP 8.335)。换句话说,它指涉对象的方式是通过某种类似,通过一种像似关系,并基于某些密切关系的吸引力:“任何事物,无论是品质,存在物,个体或者法则,只要它像某物而且被用作它的符号,那它就是该物的像似符号。”(CP 2.247)

指示符号与动态对象建立的是一个真实的关系,换句话说,对符号对象的指

涉来源于对象对符号的影响（CP 8.335）。

规约符号与动态对象的关联是通过一种法则（倾向）。正如皮尔斯所说，它“被构成为符号仅仅或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它以此方式而被使用或理解”（CP 2.307）。

但皮尔斯所描述的符号事实上要复杂的多。比如，在对象这一方面，他区分出了直接与动态对象，而动态对象本身还可以相应地被分为可能性、效果性、普通性。它的存在模态决定了对象如何作用于符号（参见 CP 8.216，1.23，6.455，8.366ff.）。

1.1.5. 皮尔斯符号模型的总体特点

研究人类符号的本质必须包括研究意义、思维和主体之间的连接，将这些视为符号的特定与复杂方面，因为它们凝缩、体现于充斥着整个宇宙的符号活动过程中。因为它们共享于符号活动中，符号的这些方面就必须共同命名。但是，皮尔斯希望自己的符号模型具备普遍性，在所有的符号活动空间都能行使功能，包括非人类的空间；换句话说，它要打破一切有限意义上的思维含义。在皮尔斯的符号学中，诸如“思维”、“思想”和“符号活动”等术语在有些方面是可以互换的。皮尔斯符号模型的特点在其作品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比如：符号是“一个对象，一方面关系到它的对象，另一方面关系到它的解释项，这些关联方式如此，以至于将解释项与对象都带入一种关系，对应着其本身与对象的关系”（CP 8.332；参见 CP 2.242）。此外，根据皮尔斯所说的，符号的“解释者”变形为它的“解释项”，“符号的恰当意指结果”（CP 5.473）。

45

所有关于符号活动形式结构的研究必须从符号、对象和解释项之间关系的三元特性开始（参见 CP 8.361）。根据皮尔斯所说，这些关系基于他性的逻辑中。如前文所述，符号之所以是符号，是因为它是他者，也就是说，是因为它指向其本身之外，超越自身。通过这种与别的某物的关系，即解释项，符号创造了意指的通道，发展了它们的多声潜力。因为是他者，符号总是一种超越，用巴赫金的话说：它总是“外化”的（Bakhtin，1992a、1992b）。

根据皮尔斯所说，符号总是出现在自然中，尽管从外在行动主体的活动中被剥离了出来；因此，宇宙充斥着符号，独立于解释性意志力的活动之外。真正的媒介化（不可约减的他性）是现实的内在部分，它在解释过程中自我体现为符号现实，无论是科学的，艺术—美学的，还是日常生活的部分。意指宇宙体现在这样的过程中，它也通过它们而产生与增强。从人类符号活动的角度来看，我们观察到宇宙在皮尔斯看来本身就有不同程度的意指性，但是人也通过对它的回应而制作新的解释项，并促进它的增长。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回答性的理解”关

系被建立（至少是潜在的）在了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人是一个符号，并因此通过与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中的其他符号的对话关系而发展。

让我们将此与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关联起来。符号的一般定义并不停留在抽象的层面，相反，它被描述为指导性的实践。因为它关系到研究与默思游戏，这就包含了（再）解释与（再）创造世界——事实上是整个宇宙——的持续性工作。此外，在这样的符号活动宇宙中，想象力——无论是科学的还是诗性的——创造了符号，并且要达到一种对事实的理解，对“所有宇宙的宇宙”这样一个真理的理解。整个真理从不是终极或确定的（参见 CP 5.506；1.406），相反，它是动态的和对话的真理，要被理解为一种变成的过程，模糊性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参见本书 10.2.7）。

46 关于符号活动与思想或思维的关系，皮尔斯说：“正如我们说身体处于动作中，而不是动作处于身体之中一样，我们也应该说我们处在思想中，而并非思想处于我们之中。”（CP 5.289 n1）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一面有着思想，另一面有着表达思想的符号。思想本身就是符号现实——“每个思想就是一个符号”（CP 1.538）——而且还以符号活动、符号流动的方式对话性地发展。正如皮尔斯反复说到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断增长和发展的（CP 2.32）。让我们这样补充，如同维尔比所说的，思想的增长发展是在一种“宇宙符号学”的角度广泛进行的——也就是说，它关系到整个意指宇宙。

1.2. 更多的问题聚焦：主体、身体与符号

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为重新定义主体作出了重要贡献，皮尔斯作品中的这个方面不应该被低估。根据皮尔斯所说的，人是一个符号，因此它与思想重叠——也就是说，它与我们一直所描述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活动重叠。此外，主体（即，自我）在他性视域中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作为一个符号活动过程以及表述与解释的动态学关系的一种表达，符号主体创生了可能无限大数目的意指路径，同样也被这些路径创生（参见本书 7.2.2）。

1.2.1. 对话自我

皮尔斯说：“人和词语相互教育彼此；人的信息的每一次增加都包含着相应词语的信息增加，且同时又被其所包含。”（CP 5.313）他还更明确地提出：

> 人的意识中根本没有任何因素不在词语中有所对应，……人所使用的词语或符号就是人自身。因为每个思想就是符号的事实，以及生命就是承载

> 思想的列车的事实，证明了人就是符号；所以，每个思想是外在的符号证明了人是外在符号。也就是说，人和外在符号是完全等同的，正如 homo（源于拉丁语，指"人"。——译注）与 man 两个词语完全等同一样。因此我的语言就是我的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CP5.314）

作为变成中的符号（参见 CP 5.313），主体以一个对话性和关系性的单位而出现，是开放的主体，是与其他符号和主体的个体内与个体间对话互联的进行过程。即使是在皮尔斯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也找到了思想与主体性的对话性概念，而且他后来也在研究中继续发展了这个概念。鉴于我们面对的是符号，我们就不能将主体的边界一劳永逸地界定；我们只能通过与其他符号和主体之间的对话接触来将主体划定出来。

> 个人只是个否定，因为个体的独立存在只表现在无知与错误中，只要他离开他的群体，离开了他和群体即将成为的状态。这就是人，
>
> "……骄傲的人，
> 对其最肯定的东西最无知，
> 他的呆滞的本质。"（CP 5.317）

人类个体生于社群，通过经验而生存，其发展是通过与该社群其他成员的经验相关联而达成，而且永远也不会与那个社群分离开：

> 我们知道只要人是单独的，他就不是完整的，他总是某个社会的可能一员。尤其是，一个人的经验如果单独存在的话那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他看见其他所看不见的，我们称之为幻觉。要考虑的并不是"我的"经验，而是"我们的"经验；而且，这个"我们"有无尽的可能。（CP 5.402n2）

基于他性逻辑，人——皮尔斯指的是自我——自身就是一个社群。确实，人就是一个对话性关联的自我的社群：

> 这里需要确定和记住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第一，人不是绝对的个体。他的思想是他"与自己所说"的东西，这个自己是在时间的推移中出现了的另一个自我。当一个人在推理的时候，是那个关键的自我在尽力说理；而且所有的思想都是符号，而且多数具备语言的本质。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情是人的社会圈（不管理解为多大或者多小），是某种松散缩合的人，在某方面比个

48 体生物性的人要处于更高的级别。（CP 5.421）

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看，主体是一种不断变换角色进行交流的现实，在说话人 / 说者和听话人 / 解释者之间来回互换，处于对话者的对话交换中。自我的话语从来就不是自己的，相反，它是对其他人话语的回响。从皮尔斯和巴赫金的视角来看，可以说词从来就不是中性的；事实上，它充满着其他人的词、思想、经验、行动和感觉。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身体也以互联实体的形式和符号材料出现，自我通过它而行动、表达和交流。但是身体并不束缚自我：

> 当跟我完全赞同的朋友交流我的思想和我的情感的时候，我的感觉传递给他，我也意识到他感觉到的东西，难道我不是既存在于他的大脑又存在于我自己的大脑吗？——简直如此。确实，我的动物生命体不在那里，但是我的灵魂，我的感觉思想注意力在……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超越了纯粹的动物性；一种本质，一种意义，尽管微妙。他不能知晓自己的本质意义；它是他眼睛的光束。但是他确实具备这种外展性的身份——就像词也有一样——这是事实，准确表达了同情、通感的事实——以及所有无私的利益——所有这些让我们觉得他有着绝对的价值。（CP 7.591）

皮尔斯将人类描述为具身性的主体。这是由身体交互性，社会性，历史和精神活动所组成。后者包含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思想，语言与意识，还有无意识或“符号意识”。最后一个是复杂斑驳的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一个“模糊部分”，被皮尔斯看作思维的主要组成部分。形成无意识的符号活动过程既不由理智所照映，也不被其控制；它们并不形成完全有意识的推理暗示。无意识是在数量意义上代表思维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在能指潜力上也较为丰富，“在敏感性方面几乎是无限超越”理性控制的思想过程和完全有意识的推理暗示（CP 6.569；亦可参见 CP7.555）。

符号是人类的，此意为它们是由人类所创造，且表达了真正人类意义上的价值，这样的符号有一种朝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及无休止性的结构倾向。人类符号是一种开放的、批判性的被解释——通过与其他符号的相互关系而不断索求验证与修订的解释项。被视为符号的主体，自我，引出对过往解释、已获知识、既得事实、习惯和信仰的审问；主体，自我，总是对批判式质问开放。如此，在符号活动中它是以存在冒险精神的角色出现的，其中固定观点、信仰和真理总是被无休止性所撼动并通过与他者的对话被抛入危机之中。

49

作为一个开放的符号活动过程和基于他性与对话性的符号材料，主体性并不困于本体论与存在的各种定义中。相反，它的特点是其具备以下潜力：转变、发展、超越角色与定义的移位，超越存在的范畴本身。它还有“超位性”的特点，体现在与通过他性逻辑而组成符号的各部分关系中。确实，这个潜力在“对话”(dialogue)一词的希腊词根里面就可以看到。远在他性哲学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第九章将回到列维纳斯)所说的他性发展之前，皮尔斯就已经用符号学的术语提出了“超在”的概念。

根据皮尔斯所说的，符号不限于说者与听者、表述者与解释者、编码符号与解码符号，或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对称交换的逻辑。相反，符号对移位开放；它们引向外面，超越自我，超越将其具体化的身体。所有这些同样适用于主体性。

1.2.2. 个人身份与粘连学说

皮尔斯对他的自我、个体身份符号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

(1) 他在1867至1868年间的作品，发表在《理论哲学杂志》上。特征表现为对人类意识的符号学解释：“只要我们思考，我们就已经向意识呈现了某种情感、印象、概念，或者其他作为符号的表征。”(CP 5.314)

(2) 他从1891年开始发表于《一元论者》的五篇文章。在文章中皮尔斯介绍了他关于偶然、机械、创造与粘连的一系列学说，并发展了他的进化宇宙学。

(3) 他晚期关于实用主义的作品，整合了他的宇宙学与他的符号学理论(参见Colapietro，1989)。

“个性”、“个人自我”、“个体自我”等所有这些概念所理论化的对象都是个体、有限和固定的自我，皮尔斯则是通过与其他自我的对话交融的方式将自我的概念区别出来。有限的自我或“个人自我”是一个“虚幻的现象”，但是因为人类的自我性，人们相信自己的繁衍生息独立于其他人，独立于他们所属的人类社群。据其相信的程度而言，他们在创造着虚幻式孤立的条件。　50

事实上，自我从来就不是与他者完全分开或隔离的。皮尔斯教导我们，完全脱离他者的人类存在是不可能的。隔离也不能保证自我的独特或特性，或是其具体性与相对于他者他性的他性。作为自我，意味着成为社群的可能一员，如上文所说(CP 5.402n2)，包含在内且需要被理论化的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经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皮尔斯的符号学引导我们在自我的社会、集群特征与自我独特、特性、相对于给定解释过程的能指他性之间建立一种连接。从这个视角看，皮尔斯理论阐释的是超越和脱离依靠第一性的任何其他事物的独立的意指能力。

这就暗示着自我的特性——其不可约减为一个指涉物的特性——是通过与

他者的关系而展现和发展的。据其独特的程度而言，自我是不可言状的（参见 CP 1.357）。如列维纳斯所说，自我说着超越所说的，体现着一种对超越词语的意义的倾向。如奥斯瓦尔德·杜克洛所说，自我的特性存在于未说与不可说之中。此外，自我的不可言状性——它的特性——并不意味着牺牲可传达性，因为自我本身能始终在某种程度上被传达，即使仅仅是为了传达其不可传达性。因而，在皮尔斯的概念中，具体的人类条件的特点在其最深刻的本质上并不表现为孤独或不语。科拉彼得罗，皮尔斯的解释者（参见 CP 7.591—7.592），评论道："作为人，就是存在于孤独与团结的张力之间——人类精神内向深度与那些内向深度的外向表现之间的张力。"（1989：118）但在同时，即使人类动物是一种交流的动物，对交流的趋向并不意味着特性的毁灭。

皮尔斯采用"粘连"这个术语来指连续或第三性的学说（见 CP 7.565，7.570，7.571）。连续的原则并不是否定具体的单位，第二性；但它的确排斥了所有形式的分离主义。它排除了所有形式不可约减的区分以及有关精神与物质的具体化——比如，行走与睡眠，生与死——和有关自我—他者关系的具体化（见 CP 6.268）。人类，世界，宇宙，世界全体，都根据连续和他性的逻辑而发展。它们惊人的一贯性来源于它们作为基于他性逻辑的过程的互联性。自我与他者不排斥对方，从根本上来说，自我的身份甚至是特别地通过它与他者的关系而组成——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和自我的他者，人类他者与神性他者——无论这种关系是有效的或是想象的（参见 CP 7.572）。

应用粘连的原则，皮尔斯致力于一种个人身份的非简化概念。最终，他得出三种意识：肉体意识，"仅仅是人的一小部分"；社会意识，"人的精神体现于他者，继续生长与呼吸，存在时间远比表面观察者想得要长的多"；还有精神意识，使得人类成为"一个永恒真实，体现在整体的宇宙中"（CP 7.575—7.576）。

作为自我意味着处于在他者关系中成为一个自我。这个过程从未完成（参见 CP 6.157），而且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他性，对应着第一性、指向及相似性。从皮尔斯的视角来看，自我是形成中的存在——不是独立的单位，而是连续的存在，特点为未完成性和未终结性。从即时的观点来看，自我作为他者，超越了包含过去和发现当下的某种程度上的实现，总是投射向未来（见 CP 6.155）。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我被投射成未来的解释项，且从未被一劳永逸地定义。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意味着否认自我的符号本质，否认符号活动，否认自我作为自我的身份。作为一个与他者和其他符号相互关系中开放的朝向形成的符号活动过程，作为基于他性逻辑的符号，自我在时间维度被导向未来，这个维度包含了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对于自我 / 他者的再解释和再创造。

1.2.3. 意识、身体、世界

身体在意识发展中扮演着中心角色。意识作为我—自我，我—他者，被解释—解释项关系是具体化的意识。身体是意识和人作为符号全面发展的一个前提。皮尔斯在人—符号与词—符号之间创立了一种我们所说的同源关系，它帮助我们避免了过度简化：自我不是一个东西，也不能被约减为一种与生理身体、纯粹动物性的认同关系（CP 7.591）。这个方法强调了符号的物质性，不论是一个词语，还是一个个体：在后者的情况中，符号永远与身体相关。 52

但是皮尔斯同样也提出“我们并非被关在一个肉与血的盒子里”（CP 7.591）。这里的“肉与血”指的是生理身体，只有通过抽象化的过程才能与符号活动身体区分开来。人类生物体只要是活着的，就已经是符号活动生物体，文化符号也通过身体而被获得。符号，无论是词语还是人类，都与身体相关。他们具有物质性，即使并不直接明显，如做梦或“默想”。事实上，物质—超符号工具性的物质性与最终总是拥有一个物质所指的符号物质性只能通过抽象化的过程才能区分。自我与其他身体相关联地发展；通过这些其他身体，它超越了自己的边界，这些边界是其所经历的世界的边界，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词语可以被理解为身体的延伸，具身自我的表达；回应巴赫金所说的，词语构成了一座桥梁，连接了某人自己的身体与其他人的身体。从物质性的角度来说，身体是从生理材料与符号材料的关联中出现的，如此，它将自己展现为表达和与其他身体调解的手段。

随着语言的习得——口头符号系统——我们被抛入了社会世界。这个条件激起了符号与意义的极大增长，也因此激起了我们的感知、认知和情感世界与我们的欲望和想象力的潜力的扩大。思想过程与主体性的发展与增强通过词语，词语总是导向他者，相对的他者和绝对的他者，外于我自己的他者和组成自我的身份的他者。所有这些对应着互身关系的增长，即某人自己的身体与他人身体的关联，无论是有机的、人类的、非人类的还是非有机的。通过语言习得我们超越了所处的世界，也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儿童与其他身体有了关联——正如皮尔斯所说：“将那个语言和类似于中心位置的身体相连接。”（CP 5.232） 53

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主体性不仅关系到智力、文化和历史—社会生活，也关系到情感生活、内在性以及伦理维度。皮尔斯讨论了认知、意志、情感、欲望和感觉的运作与发展。他声称“没有理由设想一种内视的力量；因此，唯一监视心理问题的办法是从外在事实作引申”（CP 5.249）。维尔比也严厉批判了内省的概念及其对人身份的暗示；这出现在她未出版的手稿中，尤其是她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论述（可参见“I and Self”，1907 年 11 月 23 日，Welby Collection，York University Archives，Scott Library，Toronto）。

情感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通感，与他者感同身受和融合。这不排除

独特个体的具体性或特性。皮尔斯写道：感伤主义“极大尊重可感心灵的自然判断”（CP 6.292），但他也补充说这并不排除科学思考。用皮尔斯的视角看，感伤主义——“可感心灵”的概念——正如科学方法一样，需要一种对自我和知识的互联、主体间性的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对诸如通感、感觉、融合、特性等为了科学研究成功发展的价值的重要性的强调。我们在他的“进化的创造论”（CP 6.295）中也碰到了这个概念的这些暗示。

关于意识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是将思想放在一边，包含它的符号放在另一边。相反，“只有通过外在事实思想才能被知道。那么，唯一能够被认知的是符号中的思想。但是不能被认知的思想并不存在。因此，所有思想必然是在符号中”（CP 5.251）。通过在思想与社会互动、思想与话语、思想与思想之间建立本质上连续的关系，主体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指出了思想本身的主体间性特点：“所有思想都是符号，那么所有思想都将自己表达给其他某个思想，必然决定其他某个思想，因为这是符号的本质。”（CP 5.253）

54

意识是思维展现的整体，在符号中被模型化，因而一种身份的关系能够在思维与符号活动之间确立：“意识的内容，思维的整个现象展示，是源于引申的符号。”（CP 5.313）符号是思想形成的材料；它们是交流得以达成的手段。皮尔斯在词语和主体之间所做的类比（或者说，同源对应）也能够体现出他将主体定义为“外在符号”的可信性：“人和外在符号是完全一样的，就如同 homo 与 man 这两个词语都表示人一样。因此，我的语言是我自己的总和；对于人，那就是思想。”（CP 5.315）

皮尔斯对主体性是批判的，因而，对那些将精神生活归类为私人领域的概念也是批判的。一方面，在私人的和精神的现象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定，另一方面，里面与外面、内在与外在、内向与外向的公众生活之间的界限也难以划定。相反，皮尔斯将主体性描述为“外展的身份”——这个表述强调了这些极点之间的连续关系。换句话说，精神生活，自我，主体在符号推延的外展链中被模型化。意识与无意识通过在社群和公共拥有符号而产生和增强。

与维尔比和巴赫金（见 Bakhtin 与 Voloshinov，1929）很相似的是，皮尔斯认为内在世界来源于外在世界——由从外在世界内化而来的符号组成。这不排除可能形成私人的或秘密的符号，在公共和正式场合未说的符号。私人的符号——或者也可以说“秘密的符号”——使得主体得以保持与公众和外在世界的距离。人类生存在一个至少是双性——内在与外在——的世界中，一个感知的世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内在的世界，由私人符号系统、想象和默思（musement）组成的世界（CP 5.487），还有一个外在的行动与习惯的世界。在这个双世界中，互话反应性与内在对话关系中的内外互动不仅反映而且模化了外在

的对话，反之亦然。正如科拉彼得罗解释皮尔斯时所说（参见 CP 5.493）："内外世界的互动主要存在于经验（外在世界对内在世界的直接作用）和审思（内在世界通过习惯操作对外在世界的间接作用）中。"（1989：117）而且在这种身处包含了私人符号、秘密符号、想象和默思的双世界的可能性中，皮尔斯找到了一个人类特有的符号维度。 55

与其"外展身份"的自我符号学研究方法一致的是，皮尔斯反驳了可知性的原则：

> [我们]对我们直接经历的以外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以各种方式所能知道的一切都跟经验相关。我们思维的所有创造都是来自经验的拼接。因此我们的观点只是关于真实或换位了的经验的观点。一个词语只能表示它所唤醒的观点。因此，我们甚至只能谈论可知的对象。汉密尔顿和不可知论者们所谈论的不可知只是一种不可知的可知（Unknowable Knowable）。绝对不可知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不可知是一种唯名论的异端邪说。（CP 6.492）

皮尔斯坚持"'绝对不可认知'是无法想象的：'一个词语的意义是它所传递的概念感知，绝对不可认知的事物没有意义因为它不附有任何概念感知。因此，它是无意义的词语'"（CP 5.310）。如果不可知能够被概念化，这得归功于可知；如果未知能够被感知，它是通过已知的激发（详细研究可参见第十章）。任何事物，包括自我，都是其现象表示的总体，在原则上不对应不可知体。但是，说自我是可知自我并不是否认思维和无意识中的黑暗和神秘区域。换句话说，皮尔斯否认了绝对不可知的可能，一如他否认"个人自我"作为完全与其他的主体分隔独立的概念（见 CP 8. 8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透明性和完全可得性的概念。事实上，他承认内在性对于人类来说至关重要。

未发出、未写出的思想，梦，非正式的意识或者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能关联到巴赫金式的"寡言"概念，但是只有对照外在的表现才能被解释——所有这些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存在模态都指向难以捉摸、不可知、不确定、可变性。这样看来，我们的思想和他人的思想都能被认为是理性思考所能触及的。 56

1.2.4. 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

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类思维是一种现象展示，是基于引申法则而发展的符号。思想的引申性与元思想一样，将思想和引申过程都当作是它的分析对象。主体意识到自我存在是通过意识到他者存在的同样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对话的角色

是决定性的。同理，正如面对两种不同的个性一样，随着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距离以及他性程度的增加，一个人对他者的感受与思想的理解和回应能力也相应增加。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接近我另外的自我与接近我之外的自我和我之外他者的自我，在本质上并非是不同的问题。

意识通过符号活动而发展，这个过程的导向从外面到里面，从外在到内在，从公众到私人，反过来却不是如此。因此，意识是内在化过程的结果；这也就暗示着，为了了解意识，我们必须将眼光放到外在化过程，朝向社会世界和人际关系，而不是朝内。正如本文指出的，主体所生存的世界最起码是个双世界，包含了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以及内向性和外向性的不停互动。

我们已经描述了皮尔斯关于内在私人世界和外在公众世界以及连接二者的连续性的概念，必须强调的是这两个维度的特性以及他们所带有的任务。私人世界的存在暗示着与我们公众世界、正式世界保持距离的可能，以及从公众世界建构一个不同的尽管也是相关联的符号与价值系统的可能。意识到一个人自己的私人世界，非正式意识，暗示着能够批判性地区分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保持与他者世界、外在世界和公众意识的距离，超越了讲述个人世界相对于他者世界的特性。

57 内在导向意味着知道如何区分想象的空间与真实有效的空间。这意味着能够看到在从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在有效真实的世界中的行动如何为了默思游戏而被我们的想象行动倾向所模化。相应地，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外在存在和经历的自我行动所模化。

思维不是“存在于”身体里面某处的东西，孤独的且不可理解的，受缚在单一的身体中，并这样与真实世界相关（CP 5.128），仅仅在之后才被包在语言中。我交流我的词语、思想、情感、注意力的那一刻，这些就进驻到他者的身体中；通过这种方法，我自己的词语是一个物质世界，能够在同时进驻许多地方。

身份向外投射，超越了身体的界限（皮尔斯说：“生物机体只是思想的一个工具”，CP 5.315）。尽管有这种超越，自我还是坚持并增强它的价值意识。身份是“外展的身份”（CP7.591），身体交互性，主体间性，是它获得其特定性以及作为他者的独特性的关联条件。当我们用符号活动过程来描述主体性的时候——记住，根据他性逻辑，符号一直超越着自我的界限——我们实际上在宣称身份从来就不是终结的，独白的或者单独发声的，从来不局限于一个地方。相反，它有在其他地方同时物质化的力量。它是外位化的，多样的身份，如此也就和词语相似。

1.2.5. 习惯和默思游戏

皮尔斯在用符号活动——引申过程、行动和习惯——描述了自我之后，他接

着发现了理性意识能力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最好被理解为对某人自己的引申的控制。控制指的是批判、核查和驳斥的能力，以及根据标准、典范和期望而对行为做出反应或者约束行为的倾向。用皮尔斯的话说，控制包含了"一种形成习惯的意思，或者用一种给定的方式对给定的刺激予以回应的倾向"（CP 5.440）。自我控制与自主行为相联系，因此，对于某一给定的解释项符号来说也与自我的自由和自主相联系。此外，自我控制总是关涉到他性，归根结底是控制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些符号表现了某种程度的符号物质性，意指他者以及相对于给定解释路径的阻力。 58

皮尔斯的构想暗示着行为习惯与解释过程的等级性。我们能发现一个递进关系，从低级别的符号活动距离和批评（行为习惯和主体的解释模态基本保持不变），到中间层面（解释行为可变），一直到元层面（符号活动本身是解释的对象）。皮尔斯指出"控制本身可能被控制，批评本身面对着批评；理想状态下，这个顺序没有明显绝对的限制"（见 CP 5.442）。

重要的是要记住，从皮尔斯的视角来看，自主与能指自由与自我控制是关联的。因此，想象，白日梦的倾向和默思游戏——所有那些归根结底都对向所有心智能力（见 CP 6.286），因其促成新的替代的习惯构造（本身是将默思游戏中的收获转化为实际行为的结果）——也与自我控制相关联。此外，人类的白日梦和反思理想、渴望和激情的倾向是能指过程的道德或者伦理维度。控制与批评同样也属于道德领域——因为它表现在实现理想与目标的冲动之中（MS 675，15—16）。

所以，经验的蛮力、想象的力量，最终还有绝对他者的引力，都是对作为主体和意识的自我的重要影响和模型。理想并不直接作用于存在物；相反，它们模化存在物，而且在这其中它们尊重所模化的事物的本质。因此，理想施加影响的模态根本不是蛮力；相反，它是被皮尔斯称作"创造的爱"的东西。将意向放在一边，创造的爱的效果是使得处于这种影响下的事物实现。

1.3. 皮尔斯符号学中被忽略的重要方面

在皮尔斯的哲学中，偶然、爱与必然是宇宙演化发展的三个模式（值得注意的是，M.R. Cohen 在 1923 年编撰的皮尔斯作品集的名字就是《偶然、爱与逻辑》）。 59 我们将关注爱或"创造"的问题；这将为讨论与皮尔斯相关联的维尔比的作品提供一个平台。

在"进化的爱"（1893a；《一元论者》中发表的五篇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中，皮尔斯区分出了宇宙中运作的三种基本进化发展模式：偶然进化或"偶然"，指的是由偶然性所调节的发展，或如皮尔斯所说的"偶然变动"；机械进化或"机械"，

由必然性主导，“因机械必然性的进化”；以及爱的进化或“创造”，由爱的法则引导，“创造的爱的进化”。

1.3.1. 宇宙中三种进化模式

选择这三种进化模式作为分析对象的学说分别是“偶然主义”、“机械主义”和“创造主义”，而“偶然”、“机械”和“创造”则表示“绝对偶然、机械必然和爱的法则在宇宙中分开运作的命题本身”（CP 6.302）。

每个进化模式都包含了另外二者的痕迹。因此，他们不是纯粹的；相反，他们互相影响。换句话说，这些模式以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程度一起运行，它们达到不同的均衡状态是进化过程的结果，决定这些过程的时而是偶然，时而是必然，时而是爱。偶然、机械与创造三者全然不互斥，它们分享着相同的一般要素；进一步说，这些要素在创造的进化中表现得最为清晰。皮尔斯用几何学的语言将偶然和机械描述为“创造的退化形式”。换句话说，创造包含了其他两者，将它们当作自身的退化状态（参见 CP 6.303）。

偶然与创造共有一种再生创造的倾向，“被保留的形式使用本身赋予的自发性而与其原初达到和谐”。皮尔斯进一步写道，这“仅仅显示了正如同创造不能有反面而必须拥抱与它最相悖的东西、将其作为它的退化状态一样，偶然也是一种创造”。与创造的过程很相似的是，偶然再造过程的产物与再造物之间有着相似关系。但是，偶然进化以排斥的方式进行，而且非常具有象征性，因为是由偶然性决定的；相反，真正的创造通过“积极同情”和在“被创造”中的吸引或相似而进行——也就是说，通过“源自思维连续性”（参见 CP 6.304）的解释项而进行，通过组成宇宙的符号活动物质的开放的解释过程而进行。

60

连续性的概念包含了规则性的概念。同样来自维尔比的构想——宇宙充斥着意指过程——通过符号的发展在一个一般结构中被敲击和表达出来，连续性因此而预设了基于他性的关系逻辑，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对话性”。但是，连续性和互联性的原则基于他性，这意味着它们基于离散的单位。因此，宇宙和符号活动所处的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建立在连续与非连续、规则与不规则、秩序与无序、秩序与混沌的运作动态中。根据皮尔斯所说，机械性的整体导向是由“内在的向善”而决定。从这个视角看，创造型的进步也与此类似。但是尽管它与创造可能相近，机械缺乏了进化的一个决定因素——“自由”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创造的爱的典型特征，它对应着偶然（参见 CP 6.305）。作为一个由必然和规约所主导的程序，机械性具有很强的指示性。

如我们所预期的，从通过相似、吸引和同情的发展角度来看，创造具有很强的像似性。创造性的进化被由爱的法则所规制——维尔比可能也会这么说，这是创

造的与无私的爱，朝向他者的爱。作为“退化的创造性”，它也预见了偶然（象征性）和必然（指示性）的行动。但是，在形成无限符号活动连续（粘连）流的解释项关系中，创造性进化的主要典型力量是那些具备吸引、相似、自由、偶然和像似等特性的东西。

维尔比，与皮尔斯一样，确定了宇宙发展的三个主要模式：“星球的”、“太阳的”以及“宇宙的”。这个三元关系指出了复杂度和意指力递增的三个层级，对应着她的意义三元：“含义”、“意义”和“意旨”（参见 Welby，1893b、1896、1903、1911a、1911b）。宇宙发展和增强是通过意指路径中的符号产制和解释而达成的。这些路径存在于一个伴随着符号与含义增长而不断扩大的网络。

特别考虑人类符号活动的话，进化发展是通过与客观事实世界、真实发生于外在世界的造物之间的有效事件的关系被理解的。但是它也通过与默思游戏和对未来可能世界的假设的关系被理解，无论这些世界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人类符号活动意味着元话语的能力，探索与加强客观化和客观性符号的关系的能力，以及思想过程的潜力（但我们要记住皮尔斯也用“思想”这个术语来做“符号活动”的同义词，在此过程中人类思维并不一定包含在内）。这个能力，也能被理解为“元符号活动”而被称为“符号学”，为人类独有，因为我们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制模工具，叫做语言（参见本书 5.1）。 61

皮尔斯和维尔比都尝试发展出一种符号与意义的普适科学，能够解释所有符号活动过程，人类的与非人类的，口头的与非口头的，包括它们的所有种类、复杂性和表达形式，都是相对于人类特有的意义世界，说的不仅是意指，也是意思或含义。我们不能以任何中性诉求而用纯粹描述性的术语来研究符号的生命。这样的一种方法对于完全理解由使宇宙充满生机的力量而推动的人类事物来说，只能是片面的，不够的。对于人类意识和人类行为的充分理解，需要一个符号的概念，它的界限不仅延至西比奥克所提出的“动物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的方向，同样也延至我们能称为“宇宙符号学”的方向（由皮尔斯和维尔比所发展），包含了“地理符号学”和“太阳符号学”（参见 Petrilli，1998a）。

1.3.2. 作为符号学问题的价值论问题

从人类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目光必须包括伦理学、美学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既如此，它就必须超越符号活动过程的逻辑—认知边界，来思考价值论方向的问题。这个方法要求我们关注人类的评价与批判的能力和倾向，以及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样我们就能够朝着我们提议称为“符号伦理学”或维尔比称为“表意学”（参见本书 2.2）的方向迈进［在之前的文献中被称为“道德符号学”（ethosemiotcs），后被称为“目的符号学”（teleosemiotics 或 telosemiotics）；参见

Petrilli，引自 Ponzio，1994b：297—301；Petrilli，1998e；也可参见本书第十、十一和十二章］。事实上，在维尔比的符号与意义理论中，她着重彰显了“表意学”，以强调她的方法特别关注“意旨”的问题——价值观角度的意义——因此也特别关注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表意学”的术语表示了对诸如价值、适切以及符号的意指范围等事物的关心。所有这些都预设着对人类参与符号生命的特别关注，这不仅是从纯粹知识论的角度，也是从效率和使用的角度来考虑的。

62

皮尔斯的认知符号学，与他关于人类社会行为和人类兴趣的全面研究是协同发展的。从这个视角来看，知识的问题必然预设着价值的问题。“合理性”是一个开放的辩证—对话的意指过程，是不受偏见束缚、导向他性逻辑的思想的发展。因此，合理性是一个不可终止的符号活动，受到连续性或粘连性原则的规制。我们可以从皮尔斯的符号学视角引申：他性和符号的对话构想相当于他的连续性或粘连性学说的一个前提，在宇宙和人类事物的发展中，“所有存在都是连续的”（参见 CP 1.172）。从自我和他者的双向逻辑关系中——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和自我的他者——出现了合理性和连续性在创造过程中增长的一个条件。皮尔斯超越了符号学中知识论的界限，他的朝向可以被称为实用—伦理的或操作—评估的——或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符号伦理的，用维尔比的术语说就是符号意义的。在他研究的最后阶段，皮尔斯将注意力转向了规范科学。他思考美学和伦理学，因此也思考诸如终极之善或至善的问题，然而他既非指个人快感（享乐主义），亦非社会之善（英国实用主义），而是指“进化过程”的本身——更准确地说，是“合理性的增长”：

> 几乎每个人现在都会同意至善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进化过程中。如果是这样，那它不存在于个体单独的反应，而存在于某种一般或持续的东西中。粘连性建立在这样一个概念上：合并、正在变得持续之物、正在变得法则规约之物、正在变得充满一般观念之物，只不过是同一个合理性增长过程的一部分。这首先被逻辑学领域的数学精确性所证实，然后在形而上学层面也被推及正确。这不仅与皮尔斯所用的实用主义并不相悖，还将它包含在内作为一个步骤。（CP 5.4）

63

理性和知识的最高发展通过合理性的创造力量而获得，被爱、创造的力量所点燃：“将创造投射到独立并将它们吸引到和谐。”（CP 6.288）皮尔斯参照了约翰福音和伊曼纽尔·斯维登堡的通神论发展了他的进化观，在他的构思中，人类符号活动被爱的力量所增强，这里的爱要被理解为朝向他者，对他者的关心。合理性富有一种力量，能够将一个人对于陌生人、外界物和一个人对他者的恐惧转

化为对他者的同情。而且实际上，在其文章《思维法则》（1892a）中，皮尔斯就断言粘连所预示的进化种类是通过爱的进化，被爱所温暖的理性成为合理性，可憎的变成了可爱的：

> 每个人都能看出圣约翰的宣讲是进化哲学的公式，它教导我们，增长仅仅来自于爱，我不会说是来自于自我牺牲，而是来自于迫切实现他者最高冲动的冲动……我能让它们增加，并不是出于我观念中那冰冷的公正，而是通过如同对待园中花朵一样珍惜照顾它们。我们从约翰福音中所得到的哲学表明这就是思维发展的方式。至于宇宙，只要它是思维，而且因此有生命，它就能够进一步进化。爱，在可憎中发现可爱的种子，渐渐将其温暖成生命，而且使其可爱。那就是粘连所呼唤的一种进化，每一个仔细读我的文章《思维法则》的学生必须看到这点。（CP 6.289）

1.3.3. 爱与逻辑

我们现在朝着列维纳斯的主体哲学方向发展皮尔斯的话语。爱将他者的恐惧转化成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对他者的恐惧，他者在自我中所激发出来的恐惧，直至一个变得完全为他者负责，一个人为自己所面临的一切错误承担责任的程度。爱、合理性和创造性给予他性和对话的逻辑，而且正如我们从文中所引的人物身上所学到的，它们滋养着人类意识的进化动态，如果不是全部宇宙的动态的话。

关于由爱点燃的理性的皮尔斯式概念让人想起维尔比在逻辑和爱之间做的连接。比如，参考如下选自寄给皮尔斯的信件段落，时间为1903年12月22日：

> 依我总结，我们在情感与智力，感觉与理智之间树立了高墙，我非常明显地看出我们因此而失去和正在失去多少东西。当然区分是必须的。我也不愿意这点有所模糊。但是我想这样说：比如我们最高标准的爱和动物的之间区别在于它们暗示着一种逻辑秩序。我们知道自己爱，爱什么，如何爱，还有最重要的是为何爱。因此，这个逻辑是建立在我们用来与之相对的感受本身之上。但是在我们眼中逻辑看起来仅仅是“形式的”，仅仅是结构的，仅仅是论据的问题，“冰冷且无情”，我们需要一个能表示“逻辑与爱”相结合的词。这就是我在“表意学”一词中所尝试提供的。（见 Hardwick，1977：15）

64

在研究达到深层阶段，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皮尔斯将主体性、自我描述为一组行为、实践和习惯，并确定出了其中一个基本特点，称为“power”，与“force”相对。具身性自我是一个朝向终点的力量中心，一个“目的”。这也许和维尔比在

她描述其三元关系中第三个要素的意义价值的时候所理解的“意图”和“终极价值”相关，这个要素就是“意旨”(另外两个要素是“意义”和“含义”)。力量不是“蛮力”；相反，它是“合理性的创造力量”，伴有不友好的怀疑，因为粘连的导向而统御着其他的所有力量（参见 CP 5.520)。我们能说力量——合理性的理想——是打开自我来接受由他性逻辑所吸引的能力。它与对他者反应的倾向一致，而且这种倾向的属性就是对话。

如前文所述，自我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换句话说，它不是不可分、封闭的整体，也不是连贯、不矛盾的身份。因为它是一个符号，自我就被分成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从说话、决定、争论、讨论和恢复意识等活动可以明确看出，自我从结构上和构造上都是他者。自我不是独语性的，相反，它由多元的声音、逻辑、对话成分所模化。因此，自我的身份是对话的，复调的，非完整化的。仿照皮尔斯的说法就是，自我能被视为一个社群，被赋予了批判和投射的能力，这个能力与被视为更加流动更不紧凑的个人的社会群体相互动（CP 5.421)。他者对于身份来说 65 是结构性的；同时，它代表着通过发展进化过程塑造身份的外在引力。这个过程由爱的原则和他者引力所操控——有效的他者，认知的他者，伦理的他者和美学的他者。

值得一提的是，皮尔斯和维尔比所考虑的东西在当代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著作中也再次出现，他研究的是他性的关系。比如，列维纳斯在《他者的人文主义》（1972）中宣称，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社会经验中，我们也经历着对他者的欲求，这个欲求是基本的运动、纯粹的传输、绝对的导向、意义。列维纳斯批评当代哲学分析语言的方法，因为它们拒绝任何第三维度而坚持阐释结构和表达自我的具身个体的文化努力。这个第三维度是对他者的导向，他者不仅是在文化表达工作中的合作者和邻居，是我们艺术工作的客户，也是一个“对话者”。列维纳斯将对话者定义为向其表达的人，为其庆祝的人，是导向的术语，同时也是基本的意指。换句话说，在为一个人庆祝之前，表达是与他的关系，我向他表达，他的存在是我的文化表达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我面前的他者不包含在被表达的存在的整体之中；相反，它逃避存在，只相对于存在而作为它的引子、表面和附加。他者既不是文化意指，也不是简单的给定项。更加极端的是，他者是原始的意义，是表达本身的意义可能。确实，仅仅是因为他者，诸如意指的现象能够自己进入存在（参见 Levinas，1972：49—50)。

我们将注意力从宇宙进化发展的形式——偶然、爱和必然——和特别参考自我及思想的符号活动——将对话和他性放在符号的中心——挪开，进入逻辑领域来考虑推理过程，我们发现在皮尔斯的话语宇宙中，宇宙学、符号学和逻辑是通过一种相互暗示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皮尔斯已经教导我们，自我也是一个符号，

依据推理的法则而发展（CP 5.313）。（关于逻辑与符号学的相互关系，以及推理过程和像似符号、规约符号和指示符号这三元，参见本书 7.2.2）。而且，皮尔斯和维尔比的思想系统之间的互通之处也在持续出现。 66

在偶然发展中——从符号学角度来说，它对应着象征性，从逻辑论证的角度来说，它对应着归纳——偶然决定着新的解释路径，带有不可预测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固定在"习惯"中。矛盾的是，偶然产生秩序——换句话说，偶然结果产生法则，法则本身则根据偶然的活动而寻获一种解释（很明显，矛盾的解释）。这就是体现在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1998（1859）] 中的原则。但是，在皮尔斯看来，达尔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他的研究中的价值的结果，可以在适者生存的原则中被体现。这些价值是对当时主流价值的一个回应，后者基于身份逻辑，归根结底可以被总结为一个词，"贪婪"。

机械发展与指示性和演绎相关。新的解释路径由必然所决定——内在的必然（观念和已被接受的解释项的逻辑发展），并由相对于意识的外在必然所决定（环境）——不可能冒险做出关于最终结果的长远预测。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逻辑被理解为必然事物，是与机械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发展的局限存在于认为只有一种逻辑程序是可能的——继而假定由前提所获得的结论是无可避免的。这样，所有其他的论据模式都被排除在外，因此也排除了自由选择的可能（参见 CP 6.313）。从这点我们可以猜想，机械发展，压缩限制，不测事件以及机械必然都主宰着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不妨碍其他解释形式的可能，事实上它们一直活跃，即使是在机械程序的统御之下。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是指示型的，从论证的角度来看，它是演绎型的。结论和前提之间的关系受到相互压缩的规制，因此被赋予了低程度的他性和对话性。

相反，皮尔斯在其 1893 年的论文"进化的爱"（CP 6.287—6.317）中提到，在创造发展中，解释项之间的迁延的特征是像似性和逆因推理。人类符号活动的进化，语言和非语言的进步，最高程度上的含义、价值和意旨的产生，创造性，创新性，娱乐性以及欲望——所有这些都在逆推的、像似的和创造型的符号活动过程中表现了出来。根据创造的爱的法则，创造，思想的进化，或者更好地说，符号活动，既不是由偶然也不是由盲目的必然所规制；相反，正如皮尔斯所宣称的，它是"由在思维占据其之前具备神性的观念本身的直接吸引，同情的力量，即通过思想的连续性"所规制（CP 6.307）。例如，皮尔斯引用了天才的神性：思维在观念被理解或占据之前就被它影响，通过此吸引，观念在他的身上施以作用，存在于符号之间的相关连续性语境中，而符号则处于宇宙的巨大符号活动网络，或符号域中。 67

创造、逆推和欲望的概念紧密相连。皮尔斯事实上在欲望和意义之间确立了

明确的关系。这两个概念共同存在于符号域和价值圈中；此外，还都与符号和价值相连，因此也与作为价值和可求性的意义相连。在维尔比和玛丽·埃弗斯特·布尔（Mary Everest Boole，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乔治·布尔的妻子）的通信中，二人就思维法则和逻辑、爱、激情和力量之间的关联做了详细的描写［参见 Welby，1929：86—92；Boole，1931b（1905）、1931c（1909）、1931d（1910）；Petrilli，1998a］。

创造发展的终点是进化过程本身（宇宙、思想、语言和主题的进化），意指过程和一般符号活动的连续。创造进化附随着假设、发现和通过创造性、解释项之间的吸引以及粘连性的混合效果而达成的质的飞跃的节奏；因此，没有哪个单独的存在物、观念或个体能够独立于其他事物而存在。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看，自我，远非孤立，它是一个由欲望驱动、基于大爱的交流体。因此，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通过思想的连续和创造的爱，大爱或同情的理解与认同是符号迁延的主导力量。某个重要观点同时出现在一些个体面前，每个个体并未被赋予任何特殊的力量，每个人都独立地达到这个观念（作为属于相同大符号域的结果），这可以被认为是上述情况的一个表现（参见 CP6.315—6.316）。

爱朝向具体而不是抽象。它指向一个人的邻居。这不一定是本地的空间意义；它也可能是相近的意义，关系到一个人，"我们在生活和感受上离得近"。在像似性、逆推和创造性明显的地方，爱就是驱动力。约翰福音的进化哲学教导我们增长来源于爱，皮尔斯就此福音书阐明，爱不是牺牲自我或满足他者的自我冲动，而是牺牲一个人的个人完美以达到邻居的完美，是"实现另一个人最高冲动的强烈冲动"。运用我们从圣约翰那里所学到的，可以根据皮尔斯做出这样的引申，思维和其所存在的宇宙通过爱的力量而发展，这里的爱是对他者的朝向，是关心他者。在《思维法则》（1892a）里，皮尔斯提醒读者，粘连所预示的进化是通过爱的作用的进化，主要特点（如前文所述）是在可憎中找到可爱的种子，将其温暖成生命，让其可爱（CP6.287—6.289）。

68

皮尔斯强力地对比"基督福音"和"贪婪福音"，在前者中，进步的能力被描述为依赖邻居之间的同情关系，而根据后者，时代的主要趋势取决于宣扬一个人的个体性或者先于他者的自我身份（参见 CP 6.294）。这里，我们能够在皮尔斯对个体至上的批判和维尔比对主体的批判之间画上平行线。维尔比从我和自我的关系角度出发研究主体性，批判了自我将"自我性"转化为"自私"或"自私性"的倾向。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发展出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的原则，都基于改自 19 世纪政治经济的个体概念。达尔文把这个概念应用于生命科学，将它从经济发展的领域翻译到有机进化的领域。相反，皮尔斯将进化的创造理论放在高位，他甚至在他自己对这门学说的强烈吸引之中看到了可能的证据，因为

它对应着理性心灵的自然判断。

回顾亨利·詹姆斯，皮尔斯区分了自我之爱——指向被认为等同于自我的他者的爱——和创造之爱，指向完全不同之物，甚至对于自我是“敌对的和否定的”。因而，创造之爱指向他性的他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提出一个爱的连续，从高度的身份上升到高度的他性。但是维尔比和皮尔斯都教导我们真正创造的爱是由他性逻辑所引导的爱；它是对他者的爱，没有对他者的隐秘意图。我们可以说他性逻辑是创造逻辑、爱、他性、对话和逆推共同组成了符号、含义以及真实、可能或者纯粹想象的世界的衍生内核： 69

> 上帝之爱，其反面并非是恨，否则撒旦便拥有与其同等的力量。但是它是一种将恨包含在内并作为其不完美阶段的爱，一个安忒洛斯——是的，甚至需要恨和可憎来作为它的对象。因为自我之爱不是爱；所以如果上帝自己是爱，他所爱的肯定缺乏爱；就像照明物仅仅能照亮的地方一样，无光即黑。那个斯维登堡派亨利·詹姆斯说：“毫无疑问，爱别人身上的自己和爱同于自己的别人，是非常有限的造物特有之爱：但是没有什么比得上创造之爱，其所有的亲和只为本质上对其最具敌意和最为否定的事物而保留。”（CP 6.287）

1.3.4. 大爱理解与维尔比的母义

这个方法也能够与维尔比的符号、意义和主体理论联系起来，可以被描述为有关超验的理论。在这样的语境下，超验的概念指的是超越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束缚人类的边界的能力。因此，我们现在所用的超验术语指的是超越身份逻辑的界限和它的重复或者确定，其根据是能被称为他性逻辑的认识环境，这一逻辑毫无确定性，反而是基于猜想、假设和风险。

在其写于20世纪初一系列未出版的手稿中，维尔比提出了一个原创的概念，母义（后来被替换为原始义，以及它的变体，初始义）（维尔比选集，Box 28, Subject File 24）。这个概念在她的自我、意指过程和世界观的分析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参见本书9.1.2）。在她努力描述含义产生的两个主要形式时，维尔比一方面区分出了“含义”或者“母义”，一方面也区分出了“智力”或者“父理”（事实上，这些跨越了性别差异）。这些含义产生和解释的形式能在理论上被分开；在实践上，它们紧密相连，导致含义的应用的产生，其中术语“含义”包括了“意义”和“意旨”。 70

根据维尔比所说的，母义是含义和批判能力的产生来源；它由他性逻辑所引导，因此对应着通过情感、感知、直觉和认知跳跃等广泛和创造意义上的认知能

力。根据皮尔斯我们可以说母义是在被占有或在占有我们之前凭直觉知晓的观念。从皮尔斯式大爱或同情理解和认知以及巴赫金式回应理解的意义上看，母义是人类固有的一种知识能力。维尔比说：它是“一种人类普遍的遗产”，而且它没有性别限制，但是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女人一般会以其主要的守护者和传播者的姿态出现。

从逻辑和论证的角度来看，维尔比所描述的“智力”或“父理”能够与归纳和演绎相联系——与身份逻辑主导他性逻辑的推理过程相联系。从符号学角度来说，它能与符号的规约和指示维度相联系。对比而言，“母义”——维尔比也称之为“种族义”——包含了由他者主导的意指过程。它指的是含义的创造和生成力，是将看似相距遥远其实互相吸引的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从论证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将母义与逆推型的逻辑程序相联系，因为他们是由他性价值、创造性、对话性、自由和欲望所主导。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这对应着符号的像似维度。

为达到知识——包含智力的和科学的知识——和一般的表达潜力的充分发展，它们必须建立在母义的基础上。此外，母义包含了父理（即便是潜在的），而反过来却不成立。因此，母义和智力或者父理都必须恢复到在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的水平上的原初辩证和对话关系的条件中。

表意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参见 Welby，1983、1985a）是方法论上的要求，意在把握区别——绝非隔离或分隔——和同一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维尔比在 1904 年 6 月 29 日给皮尔斯的信中所写的内容就很有趣：

71

> 但是在我的逻辑中（如果你允许！），我看不到绝大的沟壑，而仅仅是实践和理论问题所用方法之间的有用的区分。所以，在这些问题中，我的座右铭是“不混淆，不分隔”。而且，我一度认为——我希望没怎么错——你也看到了在原本只是个有关区分的问题上挖掘沟壑以分隔的灾难性结果，而且看得足够敏锐清晰。（Hardwick，1977：21）

这些评论是维尔比就以下皮尔斯在 1904 年 5 月 7 日的信件中所写的内容的论争性回应：

> 理性经常犯大错，因此在实际事务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依赖本能和思维的潜意识运作，以期成功。因此，在我的逻辑中，实践和理论问题的适用方法之间是有沟壑的，在后者中我丝毫不允许本能，“自然”理性等等的出现。（Hardwick，1977：19—20；亦见 CP 1.616—1.677）

在维尔比所理解的逻辑领域，引起含义的最广的维度——原初或原始维度，"母义"、"种族义"、"种族母性"、"母体"的层面——与理性、智力生活以一种辩证的互依和相互补充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维尔比的构思中，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如果这样分类的话，都绝不能与原始含义相分离。事实上，表意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恢复"回应理解"（巴赫金语）或"大爱或者同情理解"（皮尔斯语）与对应于原始义或母义以及理性生活的相互授权之间的关系。这对批判性含义的全面发展是必须的，因而对掌握最大价值、意义和完整的经验意图也是必要的。表意学为其本身设定的任务是恢复不变的母义主题和智力建构之间的关系。

维尔比说，原始义是"直接、无意识和解释性的直觉"。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它组成了"价值层面上通往动物本能的后续阶段"。因此，如同她在《原始义和表意学》（1907b）中所说的，原始义或母义既是"原始的和普遍的"，又能在人性发展的所有阶段出现，尽管程度不一（Welby，1985b：ccxxxviii）。根据列维纳斯所说的（1974c），我们可以说母义对应着意指之前和之后的意旨。母义关涉真实，因为它是人类实践的一部分，母义也关涉理想，因为它是在产生真实和可能世界以及一般意指过程时人性达到连续和完美的途径。

72

维尔比的逻辑构想与母义相联，它也能够与皮尔斯的方法联系起来，他用"自我降从"来描述逻辑的大原则。这不表示自我必须为了终极胜利而放低姿态；而且即使已获胜利，它也不可以作为支配性的目标（参见 CP 5.402n2）。自我降从是支配一个人与他者的关系的规则；是将自我降从于他者、任他者驱处和听从他者——按列维纳斯的说法就是行好客之道——的能力。

母义的概念强调人性对发展出一种激进的批判性社会意识的需要，这种意识能够为了未来的世代而超越传统的束缚（我们能称之为具体的抽象）。

皮尔斯发展了创造的爱或创造的概念，主张爱的逻辑所产生的进化结果来源于指向某具体事物的爱。与其类似，尽管独立于皮尔斯，维尔比还是将母义逻辑导向一个人的具体的邻居——与某人相近或相似的邻居，不受时空限制。在提出"具体邻居"概念之时，她批判了"模糊空虚的抽象的威胁"，比如"未来"一词的误用。

在推理和论证的层面，我们已经声明创造的爱的实践是由他性逻辑所规制的逆推实践。换句话说，逆推实践通过他者表现；它们转向相邻的他者，"临近"的他者（列维纳斯语），作为"具体抽象"的他者（马克思语），以及作为具体符号材料的他者。同样也要记住，符号材料的概念指的是主体为了存在，而不是以约减的方式被认同为主体，它必须在某些点体现于物质材料中。

根据前文所述来考虑皮尔斯的符号学，意味着将他"超越他本身"，进入到一个符号伦理学的维度。我们为自己设定的这个任务，不仅要回到皮尔斯，同样也

73 要回到维尔比。在这方面，我们肯定，皮尔斯和维尔比的有些方面不能被忽略。

1.3.5. 从皮尔斯的视角看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解释（将符号放在符号活动和它与解释项的关系的全面语境中）和巴赫金的语言哲学（符号只能作为对话语境中的符号存在）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个联系。从这个方法中产生的“新”的符号模型最终免除了“代码与信息符号学”、“解码符号学”或“等价交换符号学”的基本假设（参见 Ponzio，1984；以及本书 1.1）。

与信号对比而言，符号是指向复调性和多逻辑性的（由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做出了区分，参见 Bakhtin 与 Voloshinov，1929）。这偏向于对常新不同的意指语境的灵活适应。符号活动实践的多样现实正强调了使用用来解释它们的模型和方法论的重要性，以及解释诸如对话、他性、复调、多逻辑性、符号的语义灵活性等等问题的重要性，而并非将多样复杂的符号现象强行纳入到独一单调的思想系统中。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在“符码”和“信息”，“语言”和“言语”，“集体单一系统”和“个体差异使用”等范畴居主位的时候。这些范畴是“解码符号学”或“代码与信息符号学”的典型特征，它们是对索绪尔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曲解的一部分。这里我们指的是以约减的方式从位置转换中的对象角度来描述交流。根据相对较近的符号理论研究，这个交流模型的局限很明显，比如费鲁齐奥·罗瑟—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1921—1985；也参见本书第五章）在《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1961，1998 年新版）中所做的批评。他讽刺性地将解码符号学描述为“邮递包裹理论”。

今天符号学能被描述为超越解码符号学，分为交流符号学（索绪尔、布依森、普列托）和意指符号学（巴特，1967）；也能被描述为朝着解释符号学发展（皮尔斯、巴赫金、巴特）。在解码符号学中发展出来的范畴经常表现为约减的；相反，解释符号学解释了符号活动过程的复杂性，因为它具备广义、灵活和批判的符号概念，

74 以及含义、意旨和可解释性的理论（参见 Eco，1984：43）。

巴赫金强调了符号的对话特性，与其类似，皮尔斯提供了关于解释项关系的本质对话性解释：连接解释项的逻辑是一种双向逻辑（参见 Bonfantini 与 Ponzio，1986）。这意味着解释项符号不能将它自身随意强加于被解释符号；换句话说，解释项并非绝对或无条件地与被解释相关。在通过对话性来理解皮尔斯的解释项链条时，我们会避免将解释过程当作一种自由读取，通过这种读取，解释项（及解释者）的意志将被解释项击打为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参见 Eco，1990：42）。这就使得皮尔斯和巴赫金的立场之间的联系更加有趣。

通过巴赫金语言哲学的视角来读皮尔斯的符号学（反之亦然），能帮助我们

将符号放在推理、解释和对话的动态语境中；同样，它也能帮助我们澄清意指过程中符号关系的其他方面（参见本书7.2）。比如，我们提出，关于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意义都能通过“解释路径”来考虑。这个概念为目前符号学—哲学论辩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提供了有趣的解决方法。这些包含了符号的复调性与模糊性的问题；意义和所指事物的关系；符号之间的跨符号关系，涉及符号与符号系统是否相互独立，各显自主的问题；以及能指（sign vehicle 符号工具，signans 符号）相对所指（designatum 指称物，significatum 意指物，signification 意指和 signatum 所指物），尤其注重相对于解释过程中所确定的所指的能指过量概念。意义可以理解为符号网络中的一个可能解释路径——与其他解释路径和同一个符号所发散出来的其他意义交织。此外，在远离符号交织的过程中，符号有可能会在不同可选的意指路径中转换；这解释了符号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语义可获性，也解释了它们的符号物质性。符号在对话关系语境中繁荣。这个语境由四个因素决定：（1）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2）论证中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特征是不同程度的对话性，具体取决于它们是关系到演绎、归纳还是逆推）；（3）多样的语言和非语言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扩张的符号网络中形成了开放和无限的解释链；（4）来自不同解释路径的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参见 Ponzio 与 Petrilli，1998）。

75

解释项要么是“识别解释项”，要么是“应答性理解解释项”。识别解释项执行辨认层面的解释功能——在较低的他性和对话层面，所涉问题包含对音素或字素，语义内容，语形因素，句法结构等等的辨认。相反，应答性理解解释项关注符号的符用维度。在应答性解释的情况中，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特征为对话性、积极参与以及他性。符号解释的这个维度与话语意识形态维度密切相关，事实上应该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所有方法的出发点。

关注解释项和被解释项之间的对话关系有很重要的启示。比如，它对我们理解诸如“语言能力”、“表述”和“句子”(借用语言学术语)等概念非常重要。诺姆·乔姆斯基所创的范畴，比如表现和能力，再次提出了传统的问题、术语和机械式对立（比如，意识与经验，行为主义与心灵主义，身体与精神，内在与外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但并没有提出解决办法。语言研究的乔姆斯基式方法从说者产生和理解无限数量的句子的能力角度解释语言能力；这样，它们强化了既定经验的被动感知。相反，皮尔斯和巴赫金强调主题和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对话关系，从制模和解释的角度看待语言。

在康德、胡塞尔，尤其是皮尔斯之后的现代理解中，经验表现为一系列的解释操作，包括逆推型的推理过程，通过它，说话的主体完成、组织和关联着多少显得零碎、片面和离散的数据。经验就是这些操作，因此相对于事件输入的有限性而

言，经验是创新的，在质的方面更加优越。在某些方面，经验与能力相重合。语言 76 习得也能参照推理—逆推操作来分析。逆推和语言学习（永不完整）相互支撑：语言学习利用逆推过程，逆推过程相应地从语言学习中获益。两者都必然基于过往时代的语言解释工作——赐予我们如今的语言材料和工具的工作。

我们可以借助皮尔斯和他的符号理论来构建能够跨越能力和表现、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二元性的语言理论。在这个框架中，远离乔姆斯基式深层结构的概念，我们提出一个“解释性语言理论”，关于它的不同层级、先行词和派生词的理论都不再成立。“解释性语言理论”（能用于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解释了一个人理解表述或语言符号的方式，即从它们和作为其解释项的另一个表述的关系角度来理解。所有表述都由它们的解释项产生、突出、确认和加强。在这个方法中，一个表述或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的解释项只不过是“未表达的”，直到其表达或说明的条件实现。

皮尔斯式符号学的发展的另外一个贡献来自于查尔斯·莫里斯；实际上，可以说有一个“皮尔斯—莫里斯式符号模型”。莫里斯符号学的两个关键方面在于：（1）将符号活动归属到生物体——这点在后来由皮尔斯发展为生物符号学，以及（2）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莫里斯在《意谓和意义》（1964）中就其做了明确的阐述。对比将符号学约减为人类符号学，将后者视为认知、描述和意识形态上中性的方法而言，当今符号学的最有前途的趋势之一就是用全面的方法研究生命的符号和符号的生命（西比奥克说过，符号活动与生命相重合），以及恢复符号活动的价值维度。我们已经提出了“符号伦理学”的术语（参见 Ponzio 与 Petrilli，2003；以及本书第十二章），作为研究符号活动的方法，关注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从全面的符号学的视角（Sebeok）的角度来批判分割主义和错误的或者虚幻的整体性。

解释符号学所提出的符号模型是动态的，它植根于无限符号活动的概念——从一个解释项符号到另一个的开放迁延链。组成符号网络的解释项之间 77 关系的支撑逻辑是非对应、超越和他性的逻辑，不是等价交换的逻辑。解释项符号表达的要多于被解释项，后者相应地被赋予了它自身的符号连续性或意指他性，从而抗拒任何单独的解释或解释路径的武断性。在解释性符号学的框架中，符号总是符号场景的一部分，其中所有的组成部分——符号工具（能指），意义（所指），所指物，解释者，解释项，以及规约符号系统的代码——都被当作复杂而清晰的符号活动过程的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方面。

我们所提的符号模型是由不同种类的理论组成的，来源于不同的而又与对话性关联的语境：解释理论（皮尔斯），对话性（巴赫金），他性（列维纳斯），表意学（维尔比），以及有关价值的符号学（莫里斯）。此外，我们的符号模型也解释了对符号

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罗瑟—兰迪，沙夫）。

皮尔斯式符号和语言研究的另外一个有趣方面关系到翻译理论。根据皮尔斯的符号模型，某物作为符号存在的情况必然包含了翻译的过程：符号活动是一个翻译—解释过程。在意义的确定中，翻译对于符号组成的本身至关重要，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在作为符号性的必然条件的可替代性范畴，符号与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得以清晰表现。换句话说，符号不仅替代某物，也能相应地被其他某物所替代。因此，意义可以被定义为一些能被另一相反的符号材料所替代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材料的种类。因此，在解释项符号的角色中，意义能作为先前发展不足的被解释符号的可能替代品。换句话说，正如皮尔斯所教导我们的，一个符号的存在，要感谢其他符号作为他的解释项，因此这个符号的意义就是将它翻译为某个更进一步的符号。符号仅仅存在于符号间相互翻译和替代的关系中，原来的符号的给定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先行的。符号活动、解释和翻译之间的相互关联在维尔比的表意学中是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它也从这个视角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符号模型（参见本书 2.1.3 及 2.1.5）。　78

生平简介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 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14 年卒于马萨诸塞州米尔福德）是世界著名的美国科学家、科学史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及哲学家。他常被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他提出了一般符号理论，并将之等同于逻辑学、推理理论（尤其是逆推），以及后来的实用主义（皮尔斯也称之为实效主义）。皮尔斯于 1859 年毕业于哈佛学院，并于 1863 年从哈佛大学新成立的劳伦斯科学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作为一名科学研究者，他在美国海岸及大地测量调查局工作了三十一年，并于 1891 年退休。他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9—1884）、波斯顿的洛威尔研究所（1866）、哈佛大学（1865，1869—1870，1903，1907）以及剑桥的私人住宅（1898 以及其他年份）做过短期的逻辑和科学哲学的讲学，除此之外，他独自工作，处于学术圈之外。他生前难于出书。他所出版以及之前未出版的作品选编在皮尔斯选集中（Collected Papers，CP），第一卷出版于 1931 年。M. R. 科恩所编的皮尔斯文选《偶然、爱与逻辑》已经在 1923 年出版。现在他的作品正按年份整理成 30 卷的评注版，总名为《查尔斯·皮尔斯文集：编年版》（Indianapolis：Peirce Edition Project），第一卷出版于 1982 年。　79

第二章
关于维尔比

2.1. 缘何“表意学”？对意义理论的贡献及其他

“表意学”这个术语由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于1896年创造，用以表示她要赋予其符号和意义理论的特别观点。她意欲以该术语突显其研究方法的伦理维度，强调符号、意义与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表意学还以表意过程的语用维度为取向。维尔比倡导一种意义研究三分法：“感知”、“意义”和“意味”。这将是她在其整个研究中要探究的一系列其他三分法的基础。她还将表意学描述为“阐释哲学”，“翻译哲学”和“意味哲学”。

维尔比更偏爱“significs”（表意学）这一术语，而不喜欢米歇尔·布雷亚尔（1897）的“sémantique”（符义学）和皮尔斯的“sem（e）iotic”（符号学）。她曾考虑使用“sensifics”（感知学）和“signics”（符指学）这两个术语来表达“表意学”，但最终这两者都放弃了：放弃“sensifics”（感知学）是因为它与物理感知层次上的感官世界关系过于密切，而放弃“signics”（符指学）是因为它无法传播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她发明了全新的术语“significs”，并选择使用该术语，为的是不会因为联想到当时通行的其他术语而影响她的思维，如：sematology（语义学）、semasiology（语义学）、semiotics（符号学）、semiology（符号论）和semantics（符义学）。通过创造新词“significs”，她可以自由地探索符号与价值的关系，从而探索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的关系。

维尔比与其他语言学者讨论了创造“significs”这一术语的必要性，包括：布勒阿尔、安德烈·拉朗德和亨利·柏格森（法语）；乔瓦尼·瓦伊拉蒂和马里奥·卡尔德朗尼（意大利语）；滕尼斯（德语）。她还（以英语）与英国的乔治·F. 斯托特、80 约翰·M. 鲍德温、约翰·斯劳特和C. A. 斯特朗，以及美国的皮尔斯讨论该术语，并说服了他们中许多人关于该术语的有效性。

表意学探讨与人类行为发生关联的符号与价值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实际的

和伦理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从未以行为主义或机械主义的用语而庸俗化或简单理解。表意学是维尔比对大约自 19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10 年代初的争论中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反映。她的研究关涉与意义、语言、知识、术语、传播、表意行为、人际关系和主体性相关的问题。她在其最重要的理论专著《什么是意义？》的开篇这样写道：

> 人类提出疑问，就有答案等待着他。但首先他必须学会说话，学会真正"表达"自己和这个世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学会表意和发出信号。他首先必须发现、观察、分析和评价他通过触觉、听觉和视觉所感受的一切的感知，它为了实现其利益实际所表之意，然后是行动的意义——意图、行为的动机、每个结果的原因。因此，他终将看到（什么的？所有经验、知识、事实和思想的）意味、终极意义、核心价值、重要含义。[Welby，1983（1903）：6]

表意学超越了纯粹的描写主义，在符号学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和认知界限之外研究符号。维尔比的表意学超越了符义学；它源自这样的设想：符号、意义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对每个可以想象的人类兴趣和行为的领域都具有核心的重要意义（见 Petrilli，1998a）。表意学将成为日后其他人关于传播的社会和心理维度的研究的起点。这些维度将在 20 世纪前半叶荷兰的表意学运动中获得重视（见 Heijerman 与 Schmitz，1991；Petrilli，1998a）。

2.1.1. 一位女性表意学家

维尔比是一位独立的学者、哲学家和表意学家。她同符号学之"父"皮尔斯一道，被视为 20 世纪符号学之"母"。

81

她关于语言、表意过程和解释的研究源于她对《圣经》和一般神学问题的注释的兴趣。她于 1881 年出版了《链接与线索》，体现了她对《圣经》及其阐释的思考。标题表明了作者将宗教话语与其他领域的人类经验和研究联系起来的意图。该书在当时正统的宗教界引起了争议，成为她大量学术交流信函中的争论焦点。维尔比批评了当时宗教话语内在的缺陷，她将其描述为陈旧的语言形式——不可避免地滋生语言混乱的形式。她声称，这种混乱主要源于一个错误概念：语言是一个由固定意义组成的系统；此外，唯有动态的语言观（语言如同人类经验一样可以发展变化）方能对付这一错误概念。

维尔比强调"语言批判"的必要性——尤其是修辞语言——和"批判性语言意识"发展的必要性（见 Welby，1891a、1892b、1893b、1897、1898）。她批判了所有科学，尤其批判了生物学和进化理论，她确信重要的科学发现提供了新的经验，

根据这些经验，所有话语（包括宗教话语）都可以得到更新，都可以变得更有意义。

维尔比对现代的符号、意义和语言的理论所作的贡献主要是通过信函和出版重要的著作而完成。这些著作包括《什么是意义？意味发展的研究》（1903；这是她出版的最完整的理论著作）；《表意学与语言：我们的表达和解释资源的清晰形式》（1911；这是对表意学的呼吁）；还有论文“意义与隐喻”（1893）和“感知、意义与理解”（1896）。除了无数报纸、杂志和科学期刊文章以外，她还在科学、数学、人类学、哲学、教育学和社会福利等领域非公开发表了许多论文、寓言、警句和小册子。然而，她许多著作从未出版（关于这些著作的来源，见生平简介）。

在两本不同的书里可以找到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的选集：《什么是意义？》（1983，Achim Eschbach 编）和《表意学与语言》（1985，H. Walter Schmitz 编）。除了专门撰写维尔比方面的书籍、编辑其作品以外，施米茨还编辑了两部关于维尔比及其表意学的文集（Schmitz，1990；Heijerman 与 Schmitz，1991）。有一部维尔比文集以意大利语出版：《意义、隐喻和阐释》（1985b，Petrilli 编）。

82

维尔比通过信函与他人交流思想，与她那个时代许多学者建立了联系。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以外，她还与伯特兰·罗素、查尔斯·K. 奥格登和费尔迪南·C. S. 席勒互通信函。两本书信集由她女儿妮娜·卡斯特（亨利太太）编辑：《大型生活的回音》（1929）和《其他维度》（1931）。自那以后又出现了一些其他小型的文集（参见 Petrilli，1998a；Schmitz's introduction in Welby，1985a：ix—cclxvii）。然而，她的大多数信函仍然没有出版。

1903 年，皮尔斯受委托为《国家》撰写维尔比的《什么是意义？》的书评。（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书评里，他将维尔比的书与同样出版于 1903 年的罗素的《数学原理》一书联系起来；参见 Hardwick，1977：157—159）。在这次书评之后，皮尔斯与维尔比便开始了定期书信往来，而这对于他们俩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他们的通信几乎持续至维尔比逝世。如今许多符号学家称，皮尔斯著作中一些最重要的表述可以在他与维尔比的信函中找到（参见 Fisch，1986；Hardwick，1977）。

2.1.2. 意义的三个层次

如同皮尔斯一样，维尔比经常以三分法思考问题。从进化论视角看，她的意义三分法——“感知”、“意义”、“意味”——构成了三个层次，体现了越发复杂的生活表意领域不断增强的实践重要性、表达潜力和阐释能力。在任何一种人类符号活动（最终是言语符号活动）中，这三个层次都可以同时存在。表意学研究这三个意义层次中每个层次的符号之间的关系。维尔比在发展其思想时提出了许多三分法，下面这段关于意义三分法的描述引自其《什么是意义？》一书。正如她所说，“感知”这一术语可以有不同意义，可以是更为具体的、限定的意义，也可

以是包含另外两个层次的更为宽泛的意义。

> 当我们有意识地集中训练每一种意义上的感知时，我们将第一次意识到意义是什么，意义可能是什么，并能提升至最高层次的感知——意味的感知。这绝非仅仅是对“感知”一词进行的文字游戏，而是对其意义域的研究。
>
> 严格来讲，不存在单词的感知这样一种东西，只存在单词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环境、心理状态、指称关系、属于该词的“话语世界”。单词的意义是它要传递的意图——使用者的意向。意味总是多方面的，它通过表达其要义、对我们的诉求、对我们来说的重要性、情感力量、理想价值、道德方面、其全部或至少社会的范围，不仅强化了意义，也强化了感知。所有科学，所有逻辑，所有哲学，关于美学、伦理学、宗教的全部争论，最终都归结为这一点：真善美的感知是什么？其意义是什么？其意味是什么？亦即，我们为什么关心真善美？我们为什么珍惜经验？我们为什么要寻求意味，并依据诸如万有引力或自然选择等准则而恢复无数可观察的事实的价值？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表现，就好像是被尚不为人所知的自然刺激的居高临下或持续不断的压力所“表现”出来的一样。[1983（1903）：5—6]

83

维尔比在其1896年的论文中提出的三分法——“感知”、“意义”、“解释”——由她于1903年替换为“感知”、“意义”、“意味”，因为“解释”这一术语体现的是在所有三个层次都存在的过程。在意义的三个层次中，最特别的一个层次，将维尔比符号理论区别于其他层次的当然是“意味”。她所使用的这个术语表明，意义可以通过它所有的表意价来描述，而且，一般符号的特征以及言语符号的特征是可以具体说明的。因此，在维尔比的语言中，“意味”是最能表达表意学总走向的基本术语。

在《什么是意义？》中，维尔比将她自己的思想与东方哲学以及《吠檀多精髓》中所描述的“明确的”、“表明的”、“暗示的”意义三分法联系起来；她在下面这一段文字中对《吠檀多精髓》有所引用：

> 必须记住，表意学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暗示了感知、意义和意味之间的精细区分。这种三分法有多种形式，也许其中最显著的一种来自东方：“（属于一个词的）意义是三方面的，即：明确的、表明的和暗示的。明确的意义是由［词的］外延传递给理解的意义；表明的［意义］是由［词的］暗示内容所传递的。就让这些成为词的三股力量吧。”［1983（1903）：46］

84 正如施米茨指出的那样（Welby，1985a：xcvi—xcvii），维尔比用以解释“三种主要意义层次”或“表达类别”的其他三分结构包括以下这些：与感知相关的是“倾向”、“表意”和“机体对环境的反应”；与意义相关的是“意向”和“它要传递的具体感知”；与意味相关的是“理想价值”、“基本兴趣”和“理想用途”。对于被理解为三分结构中第一个术语感知来说，指称关系是“言语的”（或更精确地说是“感觉的”），也是“本能的”；对于被理解为三分结构中第二个术语意义来说，指称关系是“意志的”；对于意味来说，指称关系是道德的。也就是说，我们感到不舒适，我们看见某物在一定意义上是真实的，我们意欲（亦即打算）做某事，我们谈及不可高估其意义的某个事件。维尔比这样写道：

> 如果我们不能掌握我们所谓“意义”的奥秘，那么人类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依然是失败的。我们一直在寻觅目标；让我们追寻主旨吧；我们一直在寻找行动或过程的最终目的；让我们追寻其感知、其意义，尤其是其意味吧。（同上：47）

维尔比根据科学（特别是生物学，还有天文学和宇宙学）的进步发展了她的意义、知识和交流的进化论思想，她根据该进化论思想和她的三分意义结构，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精神过程”：“本能”、“知觉”和“概念”，而且依据“从第一个模糊的感觉经由意识达到智力的上升”，提出了“意识”、“智力”和“理性”。这三个意识等级或层次（因此也是经验层次），或三个“经验类型”或“知识类型”，包括“行星层次”（该层次对于所有实用目的都相当成熟）、“太阳层次”（亦可描述为“哥白尼层次”，“科学活动层次”，与之联系的是光的隐喻）和“宇宙层次”。随着由“直接”至“双重间接”的发展，该三分结构对数量和质量的扩张的描述依据的是解释过程，因而（按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经验来看）依据的也是表达价值：

> 我们已经暗示过，此处可以再重复一下，我们唯一充分发展的清晰世界是行星层次的世界，它也是卫星层次。因此，根据已经设定的路线，让我们对
> 85 行星层次的感知世界、太阳层次的意义世界和包括两者在内的看得见的宇宙层次的意味世界进行比较，看看它如何证明自己的正确。
>
> 所有“行星层次的”知识都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或通过归纳或演绎过程而直接获得。我们可以完全“接触”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相反，“太阳层次的”知识与此就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间接地探索太阳和其他行星，这对于过去称之为恒星的天体，甚至是这些恒星以外深不可测的外太空来说是不

可能的。因此，“宇宙层次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双重间接的，如同我们需要对应于分光镜的第三个仪器，可以给我们提供连接在望远镜上的照相制版所记录的恒星的光谱。

一种思想体系可以是关联、解释和解放的手段；除了从某一指定的视角，或者从某一指定的意义上说，它还可以通过识别有效性和感受其自身不足而吸收其他体系。这里所有可以公式化的系统大概都是行星层次；寻找关于它们是否还有其他身份的重担落在了思想者的身上。这种证据一定取决于任何系统的预测能力以及协调能力和吸收能力……

不管我们对可知事物（的整体）持有怎样的观点（无论是一元论、二元论还是多元论），不管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我们至少不得不将精神与身体看作不同的领域来谈论。公认的类比标准和隐喻的缺乏，将同级性事物与比较性事物的混淆，以及将二者与说明性事物和纯粹修辞性事物的混淆，会导致将反射之物与充其量为折射之物或仅仅是婴儿对人的图像形象或神话星座的“符号”相混淆。

因此，尽管首先得强调，此处作为人类遗产提出的意识（因而还有经验）的三个等级或层次一方面是身体的“等级”，另一方面是精神的“等级”，这种提法必须按照前述意义进行理解……

“太阳层次”对科学活动负责，这些科学活动因文明时代的休闲与保护而变得可能，受越来越复杂的脑力劳动需求的刺激而产生。天体物理学家已经成为“太阳中心论者”的代表；但他不满足于此。他总是要探索并努力解释宇宙太空深处的奥秘。因此，他也为我们上了一堂课——最为重要的一堂课。[1983（1903）：94—96]

86

2.1.3. 意味、翻译、阐释

维尔比将表意学描述为“意味哲学”、“翻译哲学”和“阐释哲学”——这些术语强调了她的符号与意义理论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维度［参见1983（1903）：161］。

她在《链接与线索》（1881）中开始集中探讨表意实践与解释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该书中，她确定了四条解释原则：（1）字面意义问题；（2）消除感知的风险；（3）语境的重要性；（4）作为统一性条件的辩证法问题。她还确认了思维系统结构中不同感知层次之间的矛盾性与互补性所发挥的根本作用（参见1881：31—36）。

她将翻译描述为阐释与理解的方法。因此，它是探索关于符号和意义的反思领域的手段，在解释实践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的确，从表意视角看，翻译问题是意义理论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因为翻译过程对于符号（包括言语和非言语符号）

来说是根本性问题，在符号活动的生成中翻译过程没有系统或类型学边界。基于此，维尔比发现了翻译理论与修辞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隐喻、类比和同源在思维与交流过程形成中的重要性。如同皮尔斯（但独立于皮尔斯）一样，维尔比坚称大脑活动是自动的翻译过程。所有符号和表达式在经受后来的翻译和阐释过程之前，其本身已经是翻译了；这也和皮尔斯的符号概念和解释符号学融为一体了（见第一章）。

维尔比视表意学为增强意义与意识（即意味）的一种方法，因此也是加强并掌握作为理解和解释之前提的翻译过程的方法，也是普遍的行为表意方法。表意学有助于我们在考虑我们所理解的"语际"翻译的同时发掘意味、阐释和翻译之间的关系。如果考虑到我们（根据罗曼·雅各布森的术语）所说的"符际"和"语内"翻译过程，维尔比所指的意思远不止如此（Petrilli，2003b）。

87

2.1.4. 脑力训练的方法

表意学探讨的是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理论）中的意义与意味问题。因此，它寻求"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一问题让我们质疑经验的价值，特别强调人际和社会关系，强调人类对责任行为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仅与学者相关，而且与走在大街上的人也相关。在这一意义上说，表意学是一种脑力训练，它不仅具有伦理和符用意义，而且具有教育意义。

维尔比提出了一个术语，系统阐述她关于其研究对象的思想——感知与意味的生成，言语语言与关涉责任问题的表意过程之间的联系。言语语言是她最优先的研究对象——然而，附带说明一下，言语语言只有被置于它与表意世界中非言语语言和符号系统的无限翻译关系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她要从表意学视角分析符号活动，为此提出一个准确的术语来研究语言和意义，就此而言，"意味"这一术语似乎特别有趣。

在将严格的符义学意义上的表意与价值论意义上的表意联系起来之后［这是查尔斯·莫里斯在《意谓和意义》（1964）中系统讨论的问题］，维尔比不仅关注她的意义三分结构中的"感知"和"意义"，而且事实上主要关注"意味"问题。意味与一般的经验价值相关联，就这一点而言，意味暗示着其最为复杂的意义行为以及对这种分析层面的复杂性意识。

随着与不同兴趣领域、话语世界和符号系统之间的对话性互动关系的增多，责任意识也随之增强。一个符号的意义一旦通过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对话关系得以表达，阐释与理解则得以增强。的确，阐释能力以及对宇宙的表意价值与意义的意识，同超越任何单个整体的限度、视之为更大的"解总体化的"整体之一部分

的能力一起增长；换言之，由于他性逻辑取向的阐释，随着与符号网络中任一被解释项之间的对话性疏离（米哈伊尔·M. 巴赫金的说法，见本书3.1），这些方面随之增强。 88

维尔比专门提及言语符号系统，她认为，不关注意义的歧义性和多义性就会有独白性解释实践的风险；当独白性解释实践被强加给文本的时候，文本便遭遇教条与正统的暴政。相反，关注语词的歧义性——其语义可塑性——则有助于文本表现力和表意潜力的发挥（见本书2.3.2）。

就符号的符义价值"可塑性"而言——因而也是从积极意义上理解的符号表意歧义性的潜力（用巴赫金的术语可以称作"对话多逻辑性"）——维尔比主张需要有强有力的"语言学良心"来避免混乱。这暗含避免"语言陷阱"（维尔比自己的术语）的意愿；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歧义性是发展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前提，并基于表意学方法——维尔比将这个方法描述为"诊断"与"翻译"的结合——将歧义性与混乱区别开来，这才能成为可能。

下面摘自《什么是意义？》的一段文字是对目前为止所讨论的表意学基本方面的有趣综述：

> 遗憾的是，习俗规定诊断这一术语限用于病理学领域。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术语来表示"深入了解"的能力，这是经过表意学方面的训练才具有的能力。我们必须养成这样的意识：我们就是诊断师，我们要在最大程度上培养自己发现真正差异（无论多么不明显的差异）和解读符号的能力，这些符号都表示一定的感知与意义。诊断可以称作表意学的典型过程，正如翻译是其典型形式；在形式逻辑原理无法直接或简单地提供帮助的情况下，这两者的结合一定有助于对潜在混乱或似是而非的断言的侦查。但这种形式的研究绝非取代或代替已经确认的学科，或转移人们对已经确认学科的注意力，这种形式的研究宁愿让那些学科更有效，因为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日常经验和兴趣有更明显的关联。这还显示出对语言传统和未来更加尊重的道德价值；事实上，在为难以想象的清晰表达之极限的扩张做准备时，这还会生发一定会对思维产生有益影响的语言学良心，因而在定义上逐渐地、自然地达成共识，这在有序的自由中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知识的不断拓宽提供了所有可能。[1983（1903）：51—52] 89

2.1.5. "普通意义"批判

维尔比提出了意义多价性和多变性理论，同时提出了对"普通常识意义"或"普通明显意义"的批判。维尔比确信，文本（包括《圣经》）需要从被简单地理解

为解码的阐释偏见中解放出来。在这里,“常识”这一术语的使用具有贬义,指的是非批判性,以及将感知狭隘地认同为简单普通的意义(或者如维尔比所说的认同为“想象的”意义)。然而,维尔比在其他著作中使用的“常识”具有褒义,甚至用它表示语言的先验论。

维尔比对“普通意义”谬误的批判(这是她的意义可塑性理论的另一面)是贯穿于她的研究的主线之一。她在《什么是意义?》一书中宣称,“有一样东西不是意义的内容,那就是‘普通意义’,即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的意义”[1983(1903):143]。维尔比想要表明,如果认为文本可以在单一的、绝对的、明确的、对所有时代都有效的阅读中发展,那就错了。

相反,单一文本可以生发不同的解释路线。这便引起维尔比从理论高度阐述了对选择性意义、替代性解读选择、识别行为的选择性进程等进行实验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她仔细考察了文本的“符号抵抗”能力——文本的“表意”或“符号物质性”、任意叠加其他解读或阐释后的他性(参见 Petrilli,1990b、1998e)。在《链接与线索》中,维尔比具体提到了寓言故事的阐释,她批判了这样一种解读寓言的倾向:“如果这些寓言是我们写的,那我们自然的心灵……会表达什么样的意思。”(1881:54)

从他性或符号物质性与阐释可能性(单纯凭此只能部分解释文本)的生成之间的对话关系来分析文本意义的构建,可以将维尔比的地位与当今对“解释的限度”(这是翁贝托·艾柯 1990 年著作的标题)的争论联系起来。

2.2. 启程:训诂与《圣经》

维尔比尽管(或许正由于)完全缺乏正规教育,却是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开放的学者之一。事实上,她将那种缺乏视作激发她进行研究的好奇心和开放思想的前提。她指出她童年时跟母亲周游各地的经历对她的重要性——她们的旅游经常带有戏剧性转折,并最终以她母亲惨死于叙利亚沙漠而结束,留下维多利亚独自一人,直至贝鲁特的救援到来。在 1903 年 12 月 22 日致皮尔斯的信函中——皮尔斯充分认识到她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到之处——维尔比提到以下事情:

> 我或许可以提一下,我从未受过任何通常意义上的教育。相反,我和我母亲在非常困难甚至磨难的情况下,周游世界很多地区。现在的设备当时都还不存在!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我有些独立地看待事物的方式。但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评估时应该考虑到缺乏系统的脑力训练这一因素……我提及我童年时代不同寻常的经历,部分只是为了解释我看待和处理

事物的方法：我要说的关键是，我的方法中的价值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这暗示着一种被忽略的遗产，一种未被探索的矿藏。这一点我已经在《什么是意义？》中努力说明了。（Hardwick，1977：13—14）

2.2.1. 意义问题与《圣经》阐释

维尔比最初的研究致力于宗教、神学和训诂问题，以及与经文阐释相关的问题。因此，她已经确定了其后来关于意义问题的研究的核心议题：语言学良心的概念；普通、常识、明显意义的性质（即，"语言陷阱"的性质）；基本的符号（尤其是言语符号）歧义性；文本阐释的概念。她系统阐述了对单一意义（如今，我们可以用巴赫金的术语称之为"独白"）的批判，从理论上阐释了符义灵活性、可塑性和多变性（这些被视作言语符号的基本特征）的存在，阐释了符号和表意过程就任一单个文本生发多种解释路径的潜力。基于此，她提倡在系统阐述真理时发展一种更加敏锐、更有洞察力的语言良心，其效度不可避免地与语言和逻辑的正确使用相关联。在《链接与线索》的"语词"一节中，她写道：我们必须"从尽可能多的'点'对同一广阔区域的真理进行审视"。事实上，她将带有模棱两可、教条和正统等特征的训诂中的许多问题恰恰归咎于训诂未能做到这些——未能考虑到这样一点：唯有通过处理符号的歧义性，通过处理构成语言、经验和表达价值的视角、逻辑和声音的多元性，方能企及真理。如同巴赫金一样，她声称，真理从根本上说是对话性的。 91

2.2.2. 为了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方法问题

维尔比认识到在对话关系中考虑宗教问题的必要性：宗教问题与科学、哲学的其他反思、研究领域之间的对话关系。她反对意识形态独白的倾向（因此反对无条件和无疑问地接受教条和公认真理），视宗教为这样一种符号与价值系统：它在一个不断被转变的世界里与其他系统进行对话性互动。她确信，《圣经》可以从历史与教条的瓶颈中摆脱出来，继而开始新生，而且，它可以通过与现在建立相似的关系而做到这点。在她那个时代，尽管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必须加以更新才不致误解，解释《圣经》著作的可能性还有待于调查。在现代，具体的神学和教义的问题只能通过"现代化的"思维回答，这就包括对各个知识和研究领域的进步的解释。下面是维尔比致反基督教有神论者查尔斯·沃塞的信函中关于这些问题的一段有趣的文字：

你说你"不嫉妒我这样的任务"：（1）改变关于新约的现行的解释；（2）以我们的理性和良心调节整体的精神和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俩都活着，我

> 祈祷我可以看到你不仅帮助改变而且还提出并扩充现行的解释……很难超越或净化或深化流行的或表面的真理思想,这自然是自明之理;必然更难的是你也要强化你如今在那些思想和生活水平仅仅是满足于看得见的、眼前的、安乐的事情的人身上亲眼所见的真理……获得关于真理的进步性、不断扩大的认识的条件是智力和道德耐心上的,不带虚假或者邪恶,而带着未完成性,对时间完满的忠实等候……记住,思想的上升与扩展(你称之反转,在某种意义上你是正确的)在自然事物中(带有进步之光)与在精神之中同样必要。("V. W. to the Reverend C. Voysey",1879—1882,见 Cust,1929:39—40)

92

维尔比在 1888 年所著的"科学与宗教的真实性"一文中论及这些问题。在其中,她分析了出现于科学与宗教间关系中的"真实性"概念,特别指出,这种关系是一种解释延伸关系,而不是同一性关系(同上:103—104)。她写作的时代是一个主要受进化论驱动的深刻的文化革命时代,她将文化历史的这一阶段描述为通向重新理解人类的科学与批判的时代(同上:202—207)。这样的问题经常出现于维尔比的信函中("V. W. to Reverend F. G. M. Powell",1885—1886,见 Cust,1929:134;"V. W. to Dr J. W. Farquhar",1888—1890,同上:218)。作为一名虔诚的英国国教徒(在英国国教圣公会中,教会权威与国家权威是一致的),维尔比毫不犹豫地宣布她关于教条问题的立场、她关于从科学进步视角解释和修正宗教话语的必要性的立场。维尔比指控普通社会机构抵制科学、艺术、哲学思维和历史的进步所塑造的真理,从而肆意推行愚昧;在对普通社会机构的这种批判的背景下,维尔比在致教会的一位发言人的信函中,责备教会对科学进步的掩盖:

> 我真希望能像您一样有更多的学问!教会的发言人经常置她于引起误解的处境。她有时甚至被迫盲目而顽固地抵制这样的意愿:这种意愿通过科学与批判,已经并正在就其教义的方法、精神和目的不断地给我们以启迪,其本人也是一个活着的、呼吸着的和成长着的完整意义上的"生物体"。问题始终是,使徒、先知和圣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是先驱和领袖——最先吸收、同化和阐释事实。我们认真审视他们当时所说的一切。但除了其永恒的核心,它只是现在要最先超越的事物,带着全新的广阔的荣耀之光,实现而不是摧毁旧世界。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以前从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在我们看来是"固定"或"静止"的所有东西之中都有运动——就如同在每个恒星系一样,每个分子中都有运动。因此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关于精神的思想都如同得了干腐病一样,充斥着一个隐喻的世界,它无法匹敌上帝创造的

世界，因而不能真正为我们代表上帝的意愿。（“V. W. to the Reverend W. H. Simcox”，1886—1891，见 Cust，1929：202） 93

维尔比抨击了一直在抵制开拓性、创新性思想的“异化”和“疏远”的机制，她强调，由于当时宗教和文化领域的权威缺乏自我批评，人类的进步正受到压制（“V. W. to R. H. Hutton”，1886—1888，见 Cust，1929：203—204）。她对研究精神和认知勇气大加赞赏，无论其努力与勇气有多么古怪和不健全。她谴责那些正在用以打压反叛性思想家的手段——教会的官方机构和教会机构的代表所践行的审查制度、正统的短视主张、教条、非启蒙思想的传统教规等等。在与玛丽·埃弗斯特·布尔的通信中，她讨论了教会权威的可信性（法学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在致维尔比的信函中批评了“教会主义”）。除了有一个著名的丈夫、数学家乔治·布尔以外（她会帮助丈夫的研究，见 Cust，1929：86n1），M. E. 布尔本身也是作者，出版的著作有：《爱教授的逻辑：自然与教育中的节奏》（Boole，1905；私印于 1890 年）、《符号化研究方法》（Boole，1909；私印于 1884 年）、《激情铸就为力量》（Boole，1910；现在均收录于 Boole，1931a）。所有这些都是心理分析的前导。布尔与维尔比的通信部分讨论神学问题；她们的通信表明，她们致力于促进社群层面上的互相理解、兴趣融合、偏见批评和反思（“M. E. Boole to V. W.”，1882—1885，见 Cust，1929：86—87，90）。

在方法论层面上，维尔比选择科学讨论作为她的模式——即：超越视觉极限的推理程序的运用。她以批判和革新的态度，重新解读基督教教义及其价值，思考光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以此与以信仰为名义的神秘化进行对比。对照她 1886 年的小短文“光”，维尔比在致林恩·林顿（小说《克里斯托弗·柯克兰德》的作者）的信函中提出了下述观点：

我也害怕神秘主义和唯灵论，因为我相信，（神秘“令人费解”、“使人困惑”——它对我们来说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从这一意义上说的）“神秘”正是上帝为了解释清楚而显示的上帝之光。既然上帝成为光，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可理解的问题都暗示着一个可理解的答案？是否意味着我们只有发现了答案方可满足？假如我们没有能力获得答案，我们就没有能力构想相应的问题。每一次“为什么”的探寻都由这样的上帝之光注入我们心间，我们至少通过上帝之光了解了答案。 94

我们对上帝之光在道德、智力和精神方面能为我们所做事情的估量往往很差、很狭隘；因此，人的认识能力的不断增长，科学、历史和普通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张，往往剥夺了我们仅有的那一点点光；我们颤抖着，不敢直视上

> 帝自己的事实;我们在误称为真理的黑暗中颤抖。然而,如果使用上帝的赐予,我们有时甚至能推断我们不能看见的东西。天王星与海王星并非直接发现的,而是靠推断发现的。整个真理世界无疑隐藏在生活话语的深处,有待于耐心的、忠实的研究者无谓地使用上帝赋予他的,就好比上帝之光使得他能够运用的工具[去探索]。("V. W., to Mrs Lynn Linton",1886—1888,见Cust,1929:174—175)

2.2.3. 知识中的光、爱和进步

光问题的讨论在维尔比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我们甚至可以说,她的哲学就是光的哲学。下面仅仅是摘自她的著作中强调这一方面的几段摘录。

在《链接与线索》的"爱之光"一段,维尔比思考了上帝作为光的隐喻,她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宗教类比之一;她在《什么是意义》[1983(1903):98]中也提到这一点。她将上帝的存在跟光与爱的王国联系在一起。任何没有受到这些价值支撑的东西都属于黑暗的王国,因而是罪恶、邪恶、愤怒、暴怒、轻蔑、愤慨、仇恨、恶毒、诅咒、痛苦和毁灭的王国。任何地方如果与光不相容,问题并不在于光——上帝——而在于那些无法容忍光的人。这就好比某人患有眼部炎症,于是只得因为自己的疾病而避开阳光。

在具体提及新约全书中的一系列诗篇时,维尔比以"逃离即将来临的暴怒"的思想作归纳,并评论如下:

95

> 我们将要逃离哪里?永远远离罪恶,远离邪恶,远离暴怒和愤怒,远离仇恨、恶意、盛怒、狂怒的王国。我们将要投奔谁?投奔我们的圣父:去往生命之源,他是爱,是和平之作者,是一切慈爱之父。我们总是从仇恨的王国逃至博爱的王国,从远离上帝的黑暗的王国逃至上帝出现的光的王国。让我们将他看作正义的太阳。在太阳中没有黑暗,没有寒冷,只有光和热。所以,在正义的太阳中只有光与爱——生命与善良。但是,假如我们放弃太阳的益处,住在极地冬季冰冷的阴影中,我们将在那里发现所有属于那个世界的东西,只是不可以谈及我们已经离开的太阳的"严寒"。我们不可以说"太阳结冰了"。所以,假如我们选择了诅咒、痛苦和毁灭的王国,离开了我们心灵的太阳,那么,我们将真切地发现黑暗的东西;但是,让我们提醒自己不要以为它们存在于生命的太阳之中。
>
> 假如我们离开神圣的光与空气的王国,下降至地球内部,我们在那里(远离太阳)将再次发现黑暗的东西,尽管不是致命的严寒。我们会发现令人窒息的有毒气体;但是,同样,我们不可以说这些东西存在于我们所离开的

户外光天化日之下;那里没有那些东西(Rom.ii.8)。是的:愤慨与暴怒——耻辱与恐怖——仅仅属于邪恶。假如我们顺从邪恶的力量,而不是全能和善良的上帝,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他那里获得收获,收到他的所得,分享他的特性。我们选择了暴怒为“父”,远离了上帝,所以无法看到他。只有心境纯净者可以看到他;他们能看到什么?祝福与诅咒,爱与恨,生与死?……

让我们再回到作为光的上帝。眼部或大脑患有炎症的人必须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假如允许一束光射入房间,对他都是一种折磨和伤害。但不会有人因此说“太阳发炎了”,或“光里有炎症”!大家都会说,是那个人本身有炎症,天赐的光永远是一样的;差别在于光所照射的东西。让病人的大脑或眼睛痊愈吧,然后他就可以回到光的王国(他的病态曾让他远离那里)。(1881:7—9)

下面一段摘自“绝不放弃:永远变换”一节,探讨的是光与阴影之间的联系,探讨的一方面是真理与理解,另一方面是谬误、虚假意识与神秘化:

96

当你看到一个思想如同人类一样影响深远,而且总是会推陈出新,不妨问问自己:强调所有这一切的真理是什么?千万不要将自己的注意力固置于滥用而对事物或思想的使用变得盲目。千万别因为油画而让漫画使你恶心。不要满足于抗议和拒绝,因为它们本身乃死亡之物或产生死亡。要持认同与建构的态度;所有不具真理性和生命的事物都会在你触碰它们时土崩瓦解。因此要以善良战胜邪恶。

最亮的光使得最黑暗的光成为阴影。所以,每当你看到人的心里很深的迷信或物质主义的阴影,那就探寻一下那束导致该阴影的光。

似乎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反对许多有成果的真理的低级方面,而不表明或不指出它们的高级方面。因此,许多精神信条的美妙大厦就好像被打扫装饰过了一样;它被荡涤了许多虚假的、无价值的、扭曲的或者堕落的事物;这甚至具备了被充满诗情画意的解读而装饰美化了的意义;但它从不虚空。

那一原则——否定原则——似乎是致命的;它在摧毁而不是建设。产生的空间必须遵循大自然的真空法则;它一定需要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吸收呈现于它面前的任何东西;它吸收的某种形式的邪恶或许比它驱逐的邪恶糟糕七倍。无论真理被损毁、扭曲、误用、误解或误读的程度有多大,我们无法承担丢失哪怕极少许的或一点点的真理的代价。缠扰开拓者的主要诱惑是消除阻碍性困难和问题,为了行走于光明与秩序之中而忽略或放弃一些东西,

尽管这些东西在它们真实和最高形式上是珍贵的——事实上常常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我渴望看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发现的好的、真的、有用的、有成效的东西,都能以它能容许的最为纯在的形式,与其他所有好的东西处于正确的关系之中。在我看来,这是在实施神的方法。因为上帝按照我们实际情况对待我们,使用最基本的材料来显现天国的荣耀;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屈尊俯就和用他的神触而使之变化。(同上: 232—234)

在“太阳是唯一”一节中,维尔比借助于寓言特有的隐喻色彩继续她的论述,讲述了下述故事:

97

曾有一个人很渴望我们应该理解只有一个太阳——太阳是唯一:所以他否认太阳光的存在,说那与太阳的统一性不一致,还说太阳散发的热也是如此。他于是去坐在冰冷阴暗处,以证实他只有太阳,没有别的;遗憾的是,他被发现饿死冻僵了。

我对太阳崇拜的理解超过自然崇拜,因为自然只是活的灵魂,而太阳是提供生命的动力。

如果移走太阳,那这里的“自然”便会冻僵死去;但若拿走我们所说的自然——这个世界和其中一切东西——那太阳照样闪耀以满足其他需要。他如同奔跑的巨人一样欢欣喜悦!(同上: 238)

在“真理”一节,维尔比批判了那种将某一概念上升至普遍真理的地位却不承认其局部性的倾向;换言之,她指出了以偏概全的谬误。这让我们将她的方法与巴赫金的“解总体化方法”联系起来(见本书3.2)。

我们能看到的最纯正的真理将是我们的第一目的。那是什么呢?我们也许认为真理是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前者一定超出我们目前的知识范围,除非只有一种形式。我们不可能找到完美的全能者(Job xi. 7,8,9);但由于我们的认识范围仅是一个视点(表达性语词!),我们仅能看到一个经常被扭曲的片段。因此,有没有这样一种真理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视其为整体,同时它又可以对所有其他影响我们高级本性,并在提高我们本性时获得扩展的东西进行解释?爱是不是那种形式呢?在那里,我们不会受束缚我们的枷锁妨碍;在那里,我们拥有神的能力,从而领悟神性的丰满……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的概念充其量是马赛克式的;而图片,即主题,是整个宇宙。我

们怎样才能后退足够的距离来调查全局？（同上：242—243）

真理是多面和多声的：正如维尔比所说，它"涉及多样性，因而会出现通往真理的聚合路径的矛盾"（同上：245）。这一解总体化的真理概念获得科学知识的支持，与巴赫金有关运作于社会文化生活和主体之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也有联系。维尔比说：

各种事物为了集合于核心真理之中，必定来自许多不同方向，每一事物与另外某一事物方向相反——如果穿过中心，其路线会与相反方向的路线相合。所有路线聚合起来的统一的真理涉及多样性，因而会出现通往真理的聚合路径的矛盾。

98

极端现象没有变得不和谐与相互抵触，难道是因为它们走得不够远吗？（还因为，就我们看到真理的能力而言，它们从未走向自我不信任的极端！）"极端的"思想家没有对立，难道是因为它们无意识地处于真理弧形的两端，这两端之间距离如此巨大，以至于弧线都未被我们所觉察，如果他们只是继续往前走，他们终将发现结合点？但是让我们谨防一种离心力，那就是自我，否则我们就处于飞离弧线的危险之中了。有人或许要说，在真理世界就如同在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只有一边处于阳光之中，因此，假如你一直走，你会进入黑暗；是的；但千万别停下，那正是保护措施，因为这样你就能再次进入光明，最终了解光明的价值！当我们见到前面的光的时候（它总是存在于真理之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并非是回归到原点。（同上：245—246）

2.2.4. 从《圣经》注释到翻译方法

维尔比的《感知的谷粒》（1897）是有关语言、传达和教育学问题（有关整个文化与社会）的思想的文集，以警句、短篇小说和寓言形式写成。维尔比相信，术语的精确与概念化的精确有关。例如，不妨考察一下在"光及其意义"一节有关术语"光"在不同科学话语领域之不同意义的思考——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带有哲学思想的感知：

我们或许认为，只要我们限定自己使用诸如"光"这类大家都在使用的、所有人都理解为同样意义的、好的、简单的普通词汇，我们就一定安全。如果说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充满光线，那将是明显的废话。"看不见的光"显然是一个悖论，明显是胡说八道：我们几乎也可以采用那句著名的话：月亮使得一切都如木塞一样亮。人们所称的"光"或它在所有语言中对应的词汇，

指的是能够"被看见"的、使得"看见"成为可能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这里至少没有歧义。说科学界比普通大众世界对这个词汇的使用的水平要低,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实际上写的是黑色的光,即勒邦的"lumière noire"(《自然》,1896年8月13日)。尽管拉沙·科恩博士说得没错("日常生活中的化学"):伦琴射线"不是光,因为我们无法看见它们",汤普森教授(《自然》,"忠告讲座",1896年7月30日)谈起过"看不见的紫外光",并且说,"所谓光,我指的是以一定速度传播的横向振动",因此包括能穿过将近一英里距离的、人口稠密的街道的墙壁和身体的电"波"。纽康姆教授在近四年前说(《自然》,1893年11月30日),我们最好将"光"一词从物理学中去除掉。他建议使用非常简单的术语"radiance"(辐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该词似乎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术语。他指出,该词的派生词很容易形成。其动词"radiate"(辐射)用来表示散发辐射;"radiometry"(辐射线测定)表示对辐射的测量;我们应该放弃"transparency"(透明)或"translucency"(半透明)等术语,改用"tranradiant"(透射)或"transradious"(透辐射)。还有人撰文请求在其他情况下作出同样的区分;一位作者建议(《自然》,1894年2月22日)以术语"irradiate"(照射)代替"illuminate"(照明)。不过,凯尔文勋爵对于该问题的论断应该说得上是一锤定音。在《知识的六扇门》中他写道:"如果我清楚地将光定义为我们意识所感知为光的事物……将不会碰到什么麻烦。毫无疑问你是看到那个事物的:如果你看得到它,那它就是光。"当热辐射的频率超过某个给定限度的时候,"它不是光,因为我们看不见它;它是无形的紫外线辐射……"

99

X射线的发现使得这个区分比任何时候都要有价值。但是我们看到这完全被忽略了。甚至英国皇家学院面向儿童的圣诞讲座(1896—1987年)也是关于可见和不可见的光,就好像科学明确要求儿童的思维应该绝望般的糊涂,完全搞不清他们其实再也明了不过的词的意思!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了"光"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因用法的变化而被讹用的感知。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唤要"更多光明,更多光明"。现在这当然已经得到回答。必须改变我们的祈祷,转而呼唤"更多的感知,更多的意指":光明自然会来。但是,这光只在视觉范围内可见和存在;正如"声音"携带着听一样,"光明"携带着看。现在,精神之光好似我们所拥有的最真实的隐喻之一。让我们节约而不是摧毁我们的资源吧。(1897:§§80—81)

维尔比起初是在她对《圣经》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构思光及其隐喻的。渐渐地,她将思想转化为符号、意义和意识的理论。她发展出了"太阳意识"和"太阳

经历”，指的是人类的智力、理智和道德需要。她将太阳视观描述为双目性的和间接的，处于一个三元关系的中间位置。这个关系的第一层涵盖着存在的星球维度，第三层是宇宙维度。　100

符号的转换价值清楚地出现于维尔比关于光的反思之中。在她后期的作品——尤其是《什么是意义？》里面，维尔比系统地构思了这个概念。根据这种转换方法，符号的意指和表达能力在符号之间、文本之间、经验域之间和话语空间之间跨越的时候会被增强。转换的过程被描述为“包含转变、转异和转形，使得我们一直太过满足于含糊不明，以至于几乎将我们自己困在前视觉局限的表达变得半透明和透明，并将其视为所有媒介的媒介”[1983（1903）：153]。

维尔比在宗教、科学和哲学领域的思考汇聚在了她对真理、普遍性以及最终对人类经验的意义的追寻中。她通过应用表意学的这个统一视角，将这些反思融入了她的符号、意义和解释的理论中，目的是作为这种追寻的回应。下面这段选自《什么是意义？》的文字清晰表明了维尔比的总体研究：

> 因此在表意学中我们不是要在既存的历史体系或者思想方法之外再增加一个。相反，其目的在于而且确实包含对所有追寻真理的方式的类化与转换——称为一种作为阐释协调所有方法的方法。它解释了对普遍性的广泛要求，以及这必然会在我们对所思考的任何真相的认识和真实性构建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通过这个内在原理，人本能地认为精神层面的哲学和情感层面的宗教（如果它们真能恰如其分地如此称呼）必须带给我们由经验给予、由科学方法证实的所有事实的意义——必须作为测试观点的自动考验炉。而且必须记住，这个意义是无比丰富的，展现了对不同种族、社会和个人之中变幻的思维复杂性的精妙反应。但是，如我们所见的，意指绝不能跟行为事件的意义或意图相混淆，而是在于它对于我们的价值，为我们所意指之处，为人类所形成的重要性、意义和影响。
>
> 因此，哲学和宗教在显示的时候绝对有任意程度上的自由，只要它们忠实于某些条件。这些条件不是“根本的”（因为智慧与良善不能由精神的砖石“建成”，正如它们不能由记号、机械和律法的系统建成一样），而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是思想和情感的生成细胞。（同上：99—100）　101

2.3. 将表意学理解为“生物感知学”

表意学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论，其目的是要桥接和强化各种科学、理论趋势和人类经验实践，无论它们是科学的，还是关涉日常生活。在这个条件下，强

化意味着通过理解/翻译的符号活动来增强批判的、表达的和创造的潜能——归根结底就是增强维尔比意义三角中所勾绘出来的意味：

> 表意学是要集中、协调、解释、关联、聚焦和实现所有真正的大师们的努力，来得出所有形式的经验的意义；而且据此将意味特性的各种表现加以清晰地分类——表明在感知、意义和意味之间的区分不仅是确凿无误的，而且也充满着现实的问题。（同上：54）

"感知"、"意义"和"意味"是维尔比最重要的意义三角中的三个术语。作为意义的第一层级，"感知"指的是从生命体、感受和感官的角度来看的意义生成过程；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这是广泛生物符号活动维度的意义。"感知"因此也能够更为具体地延伸到人类社会符号活动的领域，用来考虑意指过程的实用伦理维度，这些过程预设了生命感知。在一般的使用中，"感知"也能够被作为大众接受的"意义"术语的同义词。在这个广泛的意义上，"符号"与"感知"之间的关系问题占据着表意学的中心要位。

2.3.1. 感知及其生命基础

为构思复调术语"感知"的能指范围，维尔比是从生物体对其生存环境中刺激的直接自发反应着手的：符号在理解状态中的生物体对先前符号进行反应时产生于能指过程，这些符号被赋予了感知和能指价值、给定的暗示和指示，它们还相应地直接或间接地激发新的反应。当符号活动经历意义的各种级别之时，对世界的动物或者更广义生物层面的生命感知反应是由象征级别能指过程的发展所预设的。尽管广义生物符号活动意义上的"感知"是生物界所共有的，但作为生命适应和进化的条件，"意义"和"意指"却是人类能指行为所特有的。感知或意义的这三个层级共同决定了经验的价值：

102

> 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生物体是与我们称为物质或物理世界的"环境"密切相关的能量的网丛，而且，它通过名为调整的过程而持续或生存；因此，不适应的（未调整的，不能适应其周遭环境和自身的）则被消灭。我们与所生存的世界完全"相连"（包含所有感官），也如此生存繁衍。因为感知是这种适应的典型方式，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说感知在其所有的"感知"上都成为了一个恰当的术语，用以描述创造该生命体和此星球上的"经验"的价值之物。
>
> 但是这个生物形式的"感知"是我们与近似人类甚至灵长类生命形式所

共有的。在人类中，通过可比作该星球或者“太阳系”其他星球的整体单位，它上升为更高级的形式，不仅体现在词语感知或理性人，或常识等词组中，（当该词被正确使用时）也体现在意义中，即通过意志的、意图的、目的的和理性理想化的感知。人类看到并处理意义，因为他是超越这个次级世界、这个星球的更高级集团的成员；他将它的意义理解为与它之外、周围和之中的事物的关系。这一整个动物“王国”（如果不包含植物类的话）共享这个感知——世界：意义感知——最高级的感知——标志着新的起点：它开启了独特的人类纪元。

在这里，科学再一次成为启示者。她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能量”来自太阳；它们必须全部被称为“超过的”，真正地“超越”我们的世界和交流方式的界限。此外，我们只要说话，便是向宇宙发出一种震动。（同上：27—28）

维尔比在《感知的谷粒》（1897）、《意义和隐喻》（1893）以及《感知、意义与理解》（1896）中就影射了这个立场。以下来自《感知的谷粒》的选段介绍了这样一个假设，感知的生命维度及其独特的人类维度——因而还有能指过程的语言、思想、美学和伦理层面——是紧密互联的。今天我们可能会换句话说，它指的是能指过程的生物符号活动基础： 103

感知？什么是感知，我们说感知是指什么？指的是看、听、闻和摸？或者指的是属于词语的东西？或者是在我们心怀安慰地说那是个理智的人、那是理智的事情、我能看到那个道理的时候所珍视的彼此身上的价值？或者是我们称为会议的意义、否决感、责任感、一个时代或种族的宗教或哲学意义等微妙的东西？这个问题一被提起，就会引起关于“触觉”和“词语含义”之间有任何可寻的联系的反对。现在穆雷博士已经表明这样的联系可能是存在的。因此，当我们问起什么是感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答案。我们需要新的意义上的理智之士。（1897：7—8）

以下来自《什么是意义？》的选段中，感知的双向所指——一方面是生物世界，并不一定指人类世界，另一方面是独特的人类世界——被作为贯穿人类符号活动领域的能指连续性的条件。维尔比的思想能让我们回忆起莫里斯在《象征主义与现实：思维本质的研究》中所提出的象征层面的生物性基础。莫里斯的这部作品在1993年出版，但是它对应着他在1925年的博士论文（参见本书第四章）。《什么是意义？》是这样说的：

> 在所有的意义上，感知可以被称为智力、道德和美学世界之间的连接或联系。因为在所有的意义上，正是因为感知，它们才成为可能。双向所指是其条件。而且，必须期望未来的教师和考官都会看到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而发展为意义和意指）而展开工作的必要性，正如从新的中心点向外和从新的圆周向内一样。我们说两件事物是无感知的：（1）无意识的；（2）无意义的。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将通过意识到智识从第一个朦胧的感受的上升认同为从该表达最广泛意义上（当然是从动物世界开始）的含义到该表达的意义（即，它的引申所指）、最终到达它的意指的上升，意指是感知或意义所能呈现的最高形式。同样还是因为在新的意义上，思想里面没有不是已经存在于感知中的事物；而且，“除了思考本身之外”我们不能在感知的延伸意义上做任何补充，因为无感知绝无可能是智识的；它绝无可能是理智的，它在根本上并不仅仅是无意义的，也是不重要的，是“可忽略的”，不足道的。

104

> 在这个意义上，智力存在于感知，尽管是潜在的可能和能力；正如感知又相应地（不存在于物质而）存在于动作和变化中一样。这里，如往常一样，我们需要词语来描述我们视为“动作”的物理形式的现实。当我们说我们深受感动或者鼓动，提及充满能量、加速的思维等等的时候，我们是在含蓄地承认物理动作能够转换为某种我们视为“更高”的事物。但是存在的这两种模式不能被混淆，正如“存有”和“存在”不能被混淆一样，它们应该被仔细区分。可定义的智力在意义阶段开始，其本身被理性所超越。但我们这里必须提防将理性的优势强加给智力或者“理解”，从而似是而非地诉诸理性以求获得反抗逻辑的自然法则。感觉论必须要包括意义角度的感知才能涉及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需要一个词来指代如此获得的综合体。反而言之，不仅理性主义而且柏拉图哲学都必须要将最完整意义上的感知包含在内才能吸收感觉论。在英语的用法中，让人欢欣的是，理性的远未超越智识的，它与理智的相结合；明智的同样与其紧密结合，对于事物的最高意指和它们的可理解的意义来说，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1983（1903）：48—49]

通过她的意义理论，维尔比试图创建符号与感知之间关系的一般模型，用来解释能指过程和整体的表达性。她对口头语言的关注只是她自己特别兴趣的一种表现。同样的，尽管她关心人类表达和交流尤其是口语符号，她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却持批判态度，对其局限之处她深明于心。

2.3.2. 语言的弹性和意识的进化发展

在谈论口头语言的时候，维尔比使用生物世界的类比。这是因为她需要证明

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其生物特性，即它的“弹性”和相关的“表达潜力”。事实上，考虑到言语行为和生物层面——或更好地说，生物符号活动层面——的能指行为之间的深刻的生成与功能相似之处，她对此相似之处的描述所使用的同源方式要比类比方式更多。 105

维尔比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构思对“弹性语言”的需要，她将这个生物学的意义视同为实用、伦理和美学的意义。比如，艺术家将材料塑造成美的组合体，参考的是生物的模型；作家特别欣赏口头语言的“感官价值”。她在《什么是意义？》中写道，弹性而非刚性才是准确性的前提，从而也是这个星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所有方面进化的前提：

> 我们确实需要的是真正弹性的语言。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生物活动中的刚性从来不会确保准确性——实际上是致命的。生物体只能通过恰当地处理在越来越复杂的条件下每个新的危急事件来生存。只有与类型的持久性相吻合的最大程度的弹性才能带来所需的对各种条件的适应性。（同上：60）

维尔比将词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类比为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基于两组之间同源关系的相互适应性角度来看。对于适应、发展、表达性以及成功交流来说，口头语言与一般符号的弹性维度是必要条件。关于口头语言，维尔比称为“坏语言”的广泛现象表明语言的表达潜力需要在其因为误用和概念化不足而失去的地方被恢复：

> “坏语言”的表达应该获得更加广义的应用，而且应该包含词语的浪费和误用，言语滥用，表达混乱，艰难获得和缓慢增长的语言标准的退化……语言是人类最宝贵的“工具”……相比较其他的智力活动来说，它仍然是出奇地落后，而且……无论是要篡改经过漫长艰难的习得而已经获得的表达宝库，还是要在最低程度上浪费其区分力，在道德上都是错的。（同上：63—64）

维尔比的立场得到了实用主义者费尔迪南·C. S. 席勒（1864—1937）的支持。他们1900年在牛津相遇，席勒从1897年开始就在那里任教。他们之间的通信从190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11年。 106

席勒也将弹性原则放在他自己通过“人本实用主义”（参看Schiller，1907）构建的语言观和世界观的中心。但是，关于口头语言，与维尔比不同的是，他没有归因于其称为“教学可完善性”的原则。同样，尽管他是维尔比最尖锐的批评者

之一,但他基本上接受了她的意义和交流理论的基本方面。二者都批判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牛津哲学,尤其是由同时代的弗朗西斯·H. 布拉德雷、阿罗德·H. 若阿欣和伯纳德·博赞基特所发展出来的形式逻辑。席勒（1912）尤其也批判了伯特兰·罗素思想体系的某些方面。

根据他们从过程、能量、活动、运动、变化、行为等角度形成的关于思想—语言的构思,维尔比与席勒都明确批判了“纯粹思想”是由普遍永恒的法则固定的论断,也批判了相关的语言和意义理论。

在1920年牛津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意义’的意义”上,意义的问题被公开辩论。主要的发言者有席勒、罗素和若阿欣。同样参会的还有阿尔弗雷德·西季威克,以及《思维》杂志的代理主编C.A. 斯特朗。这场辩论的结果后来以同名发表在了该杂志上。

在维尔比看来,人类出现在宇宙——人类纪元和历史的开始——是从原始生命形式向更高级表现的进化发展中的另外一个阶段。与其他生命形式不一样的是,人类——维尔比的首要分析对象——被赋予了口头语言的能力。维尔比参考人类符号活动领域,预示了今天传播、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的发展,她发现了借由文化与科学进步的帮助而超越感知经验界限的能力的进化发展的驱动力。她一直提及生物学、宇宙学和天文学的领域,来支撑她关于人类世界能指过程——不被约减为一个认知事实的过程——的进化视野。如前文所述（参见本书2.1.2）,
107 她把她的意义理论和感知、意义与意味的三角,以及她关于知识和意识的理论连接在了一起,她将这些理论发展为三个阶段——星球的、太阳的和宇宙的。从她称作“直接”能指过程出发直到“双向间接”,她描述了伴随着宇宙经验延伸而超越感知、知识和表达既定界限的智力、美学和道德扩张。[参见Welby,1983（1903）：94—95]

除了精通人类科学之外,维尔比还紧跟严密的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她广阔的知识和经历反映在了她的语言中。比如,她的许多反复出现的描述就是采自于人类生理学的领域,比如在以下选段中她就是在视觉和思考之间建立了一种类比：

> 当然,两件事情必须记住。第一,当我们类比地使用视觉的生理过程时,我们必然获见一切可能所知的事物。因此,我们无权把眼睛说得就好像它适应于看近的,而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看到远的(因为我们在对比哲学与科学或日常生活时就经常这样讲),相反,眼睛是“专注于无穷”的;而需要肌肉努力的是对可感知事物的视觉。第二,我们不仅通过感官窗口看与我们自己世界同样真实的繁星遍布的宇宙——用望远镜看这个宇宙只能看得更深而看不

到尽头——我们也能创造一种机械眼(敏感片),可以“看见”并记录超越了望远镜展示给人眼的更远的恒星和星云的世界。(同上: 103)

维尔比表意学的一个任务是发展出一种理论语言学工具,能够依据科学的进步而重思和重估人类的历史——语言和话语、行为和信念的发展。她超越了米歇尔·布雷亚尔从“语文—历史”语义学视角所做的意义研究的界限,正如她超越如今我们称为“言语行为理论”或者“文本语言学”的界限一样。维尔比关注能指过程在宇宙中的扩张和转变,人类只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因此,她的意义理论必然足够广义到能够解释此类过程。她希望提供一个广义的模型,根据这个模型,独特的人类符号活动能够从感知的、认知的和表达能力的普遍视角来被更好地理解。 108

2.3.3. 符号与生命进化:研究计划

维尔比关于能指宇宙的视角足够广阔,使得她在构建语言和意义理论的时候能够将人类与非人类、语言与非语言的符号包括在内。

根据托马斯·A. 西比奥克(2001a)所代表的现代生物符号学以及符号活动与进化、符号活动与生命之间所存在的联系,我们可以说维尔比是对照无机物研究有机生命、对照非人类生物研究人类、对照非语言符号研究语言符号等方面的先驱人物。

维尔比关于语言和意义的理论以及她自己对语言的直接使用表明她那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时代哲学传统的立场。维尔比重估了这个传统,她所根据的是从可变性和波动性描述存在和能指过程以及从不可变性与固定性描述存在和能指过程之间的矛盾。

维尔比的研究必然受制于其时代的思想环境以及科学的发展阶段——自然的、严密的人类科学——尤其是其以批判性视角看待的达尔文进化论。她对比喻性生物型语言的依赖反映了当时由达尔文主义主导的文化氛围。进化论所带来的文化革命在维尔比时代达到顶峰,引发了关于人类根本的新理解。她将文化史的这个特定阶段称为“科学与批判的时代”(参见 Cust,1929: 202—207)。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在其批评者与拥护者、传统科学家和神学家与进步论者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一个著名的进步论者是托马斯·H. 赫胥黎(1825—1895)。他以批判的方式支持达尔文的理论,深得维尔比敬重。他们之间的通信——从 1882 到 1885 年——有一部分见于《更大生命的回响》(Cust,1929: 81—82,102—103)。达尔文关于有机生命进化的学说以及他关于自然选择的学说撼动了奉行神创论、坚信神性统治自然的神学的根本基础。人类最终意

109 识到了其在自然界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对规约地球生命的进化法则的服从。

维尔比将欧洲文化价值观的这次深刻转变的过渡阶段比拟哥白尼式和培根式的革命。在这两个例子中，思想理论的成功和扩散都受到神学偏见、过时的教条的语言专制和脱离常规的概念术语的威胁。维尔比还相信这个文化革命的新阶段将会超越前者；她认为仅仅积累知识是不够的——更有必要的是反思所获得的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意义。换句话说，必须将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价值论和伦理的术语，对于人来说它们意味着“将其关于宇宙的知识道德化和人格化，以此将其统一，并与人自身相联系”。这种转化的前提是理解并表达，“它的本质、条件、形式功能的范围、未实现的潜能与所有的价值”。在《表意学和语言》（1911）的开篇中，她主张这是表意学的首要任务：

> 可能有许多人隐约地意识到，而且会承认我们现在机械力量和控制的巨大飞速发展将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也许这不仅会影响到构想并应用它们于广大且明显无限目的的思维本身，又会影响到关心思维领域本身，即其内容与范围的思考者。
>
> 因此我们即使不是真正推断，也可能会觉得人类思想正处在力量发展所对应的门槛—— 19 世纪“新生”的科学方法仅仅是这些发展的前奏和准备。事实上，如果我们否认这个结论，或者怀疑这个假设，我们可能最终会阻止此类发展——或者冒着迫使其以不良的形式出现的风险——正如三百年前科学发现的精神在其取得巨大成就的边缘被羁绊和拖住一样。现在这个解释部分地——如果仅仅是部分地——与当时一样……因为在培根之前的时代，对现象的研究、对“事物导因”的追寻受到神学成见和指责的阻挠，与将现实排除在宇宙之外、在关于人类和自然的一切论证或讨论中自信满满地占据其位的思想术语一样多。进步主要来自于打破传统术语所造成的这些障碍，排除虚构的公理，直接到达事物本身，从而理解它们“为自身”为整体所要展示的一切。所有的条件——尤其是最高条件，迫切的需要——都已为第二个相似的进步而存在，但它们处于另一个层级，而且目的更高。因为现在所迫切需要的即将到来的进步应该不仅仅是培根式探索的继续，或者对通常理解中的物质系统特性进行一系列推断的数据收集，而是理解，向生命和思想的可靠条件、已获得的丰富知识的最终转化。但是人没有做到这个转化——将其关于宇宙的知识道德化和人格化，以此将其统一，并与人自身相联系——其思想拖了后腿，在精神层面他落后于实际的经验。我们在这个时代确实落后，因而没能获得大的一般性的转化，是一个损失，主要源于我们对理解并表达其本质、条件、形式功能的范围、未实现的潜能和完整价值的一致

110

忽略。因此,在我称为表意学的第一篇中,我们必须修复这个真正无人性的错误;我们现在必须研究表达,正如我们长久以来一直研究“自然”和“思维”的所有范围一样。[1985(1911):1—3]

对维尔比在1890年之前十年的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当时已故的威廉·金登·克利福德的《演讲与论文》(1879)。大约在这个时候她发现了“归纳式推理”,与乔瓦尼·瓦伊拉蒂(1863—1909)所描述的实验方法相关的奇怪的推理形式,更准确地说是逆推。在她探索经验的首要因素时,维尔比开始抛弃哲学和心理学,转向生物学和物理学;这也部分地因为克利福德的《演讲与论文》。因为这个新的方法,她很快就将意义和能指过程的特定问题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在她努力理解存在和凭直觉了解宇宙的含义时,她抛弃了演绎式推理,以逆推的方式出发,从结果到问题,从哲学到物理学再到将她引向意义问题的经验要素本身。在她1889至1891年间写给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的信中,她说道:

两三年前,我发现我从事物的错误——演绎——一端开始了研究(随着解释的进行)。因此我强迫自己回头,一步一步往下;直到我发现了能被所有人接受为首要的东西才满意。从哲学和心理学直至生物学和物理学,以及经验要素本身,我发现在这些之下到处都出现着首要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时间与空间、运动与质量、身体与意识等等都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思维”与“自我”——“理智”或“道德感”都是什么意思?而且让我惊奇的是,我好像发现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问过这个问题,或者公开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变化存在于所有连续性。科学的人们承认,仅仅通过简单重述一般的立场不足以针对这些问题,无论这些立场多么强而有力。因为,它们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是在人们假设它们可能来自于经验的更深层次,能给我们带来新的重要信息。所以,作为开始——为我们提供关于现实的真正知识的“绪论”——我们需要一门新的科学,意义在其变化中的科学,或者“语义学”。(Cust, 1929: 268)

111

维尔比从其当时的语义学退回,创造了“表意学”的术语,以将她自己研究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和当时已存在的方法做出区分。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她仅仅是在考虑了一系列其他的可能之后才创造“表意学”的术语——包括“语义学”、“语理学”(阿尔塞纳·达梅斯特泰所理解的;参见“Welby to Lloyd Morgan”, 1889—1891,同上: 276),“感知学”,“象征学”(参见“Welby to Norman Pearson”, 1888—1890,同上: 239)和“符号学”——这些都曾被明确地向她建议过。

维尔比一开始所提出的表意学原本是作为表达和意指的科学，不仅是在口头语言的层面，也贯穿整个宇宙，不仅涵盖人类符号活动，而且包含更广义的生物符号活动。维尔比注意到了科学的进展，她将对巨大的能指宇宙的研究转向了意指的首要因素——占据了存在并延伸到所有生命过程的各类符号层级和系统。

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维尔比通信的关注点开始更加明显地从神学转向了当时的科学—哲学争辩。与她通信的人包括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弗朗西斯·H. 布拉德雷、查尔斯·梅西耶、休林斯·杰克逊、乔治·J. 罗曼纳、沙德沃思·霍奇森、安德鲁·朗格、奥古斯都·沃勒、奥利弗·洛奇、乔治·克鲁姆—112 罗伯逊、弗里德里克·波洛克、康威·劳埃德—摩根和约翰·廷德耳。在这些年里，维尔比写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文，发给了通信者以求批评反馈（这是她的习惯）。在《三个阶段的法则》（1886b）中，她应用进化论分析行为习惯、思维、伦理和形而上的问题，以及思想、感觉和行动的关系（参见“F.H. Bradley to Welby”，1886—1888，同上，1929：167—168；“Mrs W.K. Clifford to Welby”，1886—1888，同上，1929：168—169）。《太阳学的演化》（1886b）引发了关于缺乏相应认知条件基础的宇宙日心说的辩论。维尔比这些年所写的其他关键文本还包括《精神进化中有中断吗？》（1890a）以及《精神进化中的明显悖论》（1891a）。

她所处时代科学发现所带来的新的哥白尼式革命向世人展现了宇宙的动态性。维尔比特别想要追寻人类宇宙在所有能指和表达方面，以及在认识论、认知和伦理层面的动态性。她在给林恩·林顿的信中写到：

> 在过去我们认为万事万物都以地球为中心，而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错误。如果我们要想理解或把握地球所属的太阳系的特性和法则的话，我们必须从太阳出发……
>
> 为了宣扬对那可能剥夺我们希望的真理的不变忠诚；这真理就像哥白尼天文学一样，从我们的世界脚下扯掉我们曾认为永固的思想和信仰的石头——这是我们可怕的信任与负担。我们必须接受这痛苦的教训，追寻万有引力的平衡和使得整个世界围着一个“太阳”在一个巨大的、本身“无根基的”且又无尽的运动中环绕前行的吸引力的节奏，而不是要获得支撑信仰世界的基础。（“Welby to Linton”，1886—1888，同上：177）

从今天我们称为生物符号学的视角来看，维尔比在考虑知识、记忆、意义和经验发展中的能指引申、整体能指过程的生物学基础时，强调了生命感知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联。这个高度超前的立场被生理学和生物学应用于社会和心理学问题而取得的进步所证实。这个研究强化了思维生命（心理活动、大脑活动、个体和

113

社会“精神机体”)与物质世界(精神活动的对象——今天我们会说符号的具身性、身体与符号的关系)之间、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以及符号活动与超符号活动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

> 认识我们的使命及其作为细胞单位的界限,是我们最有价值的品质,但是如果没有了生物学感知的补充,那么它将是最易被误导的品质之一……经验表明你不能将精神活动领域隔离对待,除非是在最表面或传统的意义上。而在生理学领域,这必然尤其如此。我们不能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建起无法穿透的高墙。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不能画出一道线说神经行动在这里结束在那里开始——不论你怎么称呼超神经系统!像你所说的,双目视觉是最后的物理接触。但是“知识”、“记忆”和其余所有我们称为“精神经验”的进入之后,我们便立即接触到了海洋,无论是像水的还是像空气的,实际上都遍及并流淌在我们之中,吸进来又散出去。(“Welby to Augustus Waller”,1889—1891, ibid.: 262)

关于基础的和必然的——因而关于权威的和不可逆转的——都被天文科学扔进危机之中。在一个由律动、曲线和引力驱动的动态多维度宇宙中,连真理的概念都被重新展现,最终能够被科学地视为开放的无终结的动态过程。这听起来像个悖论,但真理——正是由于是对话性的符号材料——如果要回答而且以某种方式实现其作为真理的身份的话,必然服从去稳定化、危机和审问。

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所有都在运动,接受改变。换句话说,连续性植根于变化,区别并不意味着分离或隔离:“下”会变成“上”,“物质”会变成“运动”,“神经活动”会变成“心理活动”。关于后者,维尔比评论说伴随着“物质”身体的心理活动仅仅是关系到身体本身的精妙和敏感的一种复杂敏感的表现;因此,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 (我完全)假设元运动与运动无法分开,尽管它们实际上相对不同:大约在哪个点上我们可以设想它会发展为神经活动?假使我们用以分析我们称为“物质”身体的最终组成的方法比它们现在要精密透彻上百倍,而且通过新的辅助手段,我们重新发现我们身体中远低于或远高于我们目前的感知范围的所有组成部分:难道我们不应该期待发现所伴随的神经活动会更加精巧敏感?而且它之前正是因为此精巧而逃离了我们的观察,正如石英纤维逃离肉眼观察一样?(“Welby to C. Lloyd Morgan”,1889—1891,同上:276—277)

114

在《什么是意义?》(1903)中,人类世界中的"语言"、"意识"、"智力"和"思维"也是通过运动、作为在他者中的生命动态表达而被考虑:"如今语言在其可辨别的最初形式上被承认是'运动'的;它之前代表的是行动,而不是物体。尽管有例外,语言的主要象征性是活跃的。因此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元运动',它以名为'意识'、'智力'和'思维'的特殊形式持续存在。"[1983(1903):192]

从我们可以成为宇宙符号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我们将视野转向宇宙的微观维度,或相关的宏观维度,或原子物质,或此物质中所含有的宇宙力(参看 Deleuze 与 Guattari,1980),物质的固态性和实质性都是幻觉。实际上,物质是由运动和活动组成的,因而属于动态的存在;所以物质的连贯性——其对抗外来力的能力——决定于它自身的能量和活力。维尔比一方面确定了属于第一存在的思维和运动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确定了属于第二存在的物质。遵循这个逻辑,她提出精神是物质的——它超越了体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现实和理念的特点的界限。她在给林恩·林顿的信中写道:

> 你还没有把握我关于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不认为存在什么独家清洁剂和去味剂,尽管毫无疑问地存在朴实之物甚至也同样丰富。但是也有土壤具备表达性的语言功用……关于物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是抵抗。那么,因为精神是终极的能量,它意味着抵抗:即,物质的概念存在于"精神"的概念中。("Welby to Lynn Linton",1886—1888,Cust,1929:175)

115

关于当时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维尔比采用了自己的立场。这两极是作为关于存在的转化过程的抽象理论化表征而出现的,所有离散的单位都据此通过连续性的关系而对话关联(参考皮尔斯关于粘连的学说;参见本书第一章)。离散的单位是过渡性的,不稳定的,因为物质具备内在的结构动态性,即运动和静止之间的张力的对话式表达。而且,因为它的转变的潜力,物质总是第二位的和临时的,而运动是第一位的和永恒的。在下面的选段中,维尔比在写给埃德蒙·麦克卢尔的信中描述了她自己表现为在唯心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动态互联关系的哲学倾向。而在同时,她的立场又不能被约减为其中的任何一个:

> 我的立场是唯心的现实主义,吸收融合了唯物主义,将其变为组织的一分子。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将中心概念从物质转化为运动,从第二位的、暂时的、偶发的和辅助的静态转化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原初的、创造的、指导的、结构的、进化的和实行的动态。因此我的唯心现实主义是真正的唯心主

义。它拒绝限于自我标榜、藐视事实、沦为绝望主义或教条主义或纯在疯狂的自我崇拜的幻想和自然的猎物的"观念"。它触及了科学唯心主义的内核，将归纳法奉为与现实相联系的精神连接和知识的圣礼：归纳，其神圣仪式是观察、假设和实验证明。("Welby to E. Maclure",1888—1890，同上：232—233)

在另外一封写给麦克卢尔的信中，维尔比描绘了一个研究计划，它建立在她意欲发展的七条原则或概念之上：

我整个一生或几乎整个一生有过某些观点，现在日趋发现与当今科学前沿出人意料地不谋而合(我想我跟你说过，可以说是克利福德教授的论文首先让我从另一个起点开始所有的思考)。

其中一些原则或概念如下：

1. 反转。将任何思想或观点视为可反转的工具或装置；反过来应用以检验。我也只是在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能够反转的装置才是完美的那一天才发现的。

116

2. 转化。经验的每一个部分，尽管各有其发展，但应该都能够被转化为他者，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被检验。

3."思维"里的三层或三级；我现在所知道的由休林斯·杰克逊博士所得出的神经系统观适用于思维。

4. 拥有促进推动(或稍微暗示)力的有机层面，处于字面和隐喻义之间(参考"有机记忆"，哈特曼称为"无意识"之物)。这将我们带向了新科学：

5. 语言—比喻，隐喻等等——它再次将文明带向人类思想史和思想过程……

6. 空间扭曲。我总觉得曲线必然是比直线更加基本，因为如果你创造一根足够长的明显的直线，它可能会是一根曲线；但是，如果你创造一条曲线，无论有多长，它最终都不会变直。而且在我看来，曲线总是第三种或者最高种类的运动，是影像的秘密所在，因为生物全是曲线的，只有无机物才会有角度。因此，我关于人性或历史的图解一直都会是曲线的和开放的。

7. 用动态的替代静态的。任何一块被称为"物质"的东西，都是能量的复杂体。"东西"总是第二位的、临时的；运动总是第一位的、永恒的。这里藏着身份的秘密，"形式"的秘密——当然还有"特征"的秘密——据此我们辨认并渐渐意识到个性……(比如我总感觉我并不是一块东西，而是一种运动；而且关于氧化的旧观念总让我感到苦恼。现在我知道自己是火炉，而非

所谓的燃料，我便舒服了）。

因此我们回到了“道，真理和生命”。除了过渡的原则和手段之外，什么是“道”？藏在其被正当且完全使用的命题之后，是向上之路？那真理呢？是先于进步的固定产物、道所最终指向的静态目标？是一块东西，一个事物，存于冷漠不变的僵死之中？不，它是不断变化的活动的复杂体……那生命呢？难道它不是将生命跟“无生命”区分开来的活动？难道生命不是一种脉动、悸动、激动、呼吸、体现、表达、词语……？

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方面，我都发现，这些思想，尽管有些粗糙，都和科学先锋们的发现相近似，比如克拉克·麦克斯韦，汤姆逊，赫兹，伯顿·桑德森和门德列夫，更不用说其他的名人了，比如赫胥黎，廷德耳，卡尔·皮尔逊。（同上：265—267）

117

2.3.4. 文化进化中的生物与环境

通过借鉴心理学家、哲学家、人种学家、人类学家和科学家，如查尔斯·达尔文、康威·劳埃德—摩根、麦克斯·缪勒、赫伯特·斯宾塞、威廉·詹姆斯、乔治·H. 刘易斯、托马斯·A. 赫胥黎、A. 朗格、A. W. 豪伊特、爱德华·B. 泰勒、詹姆斯·G. 弗雷泽和约翰·杜威，维尔比评述了人类物种进化中的一个悖论。

看起来似乎进化是生物体与外在世界之间动态关系的开放式未完成的结果，这种关系本质上是相互的：世界将“实际意义”加给生物体，而生物体则致力发展和改变外在世界。但矛盾的是，这种相互性似乎以一种新型的被视为“脑力或智力”的“有机能量”的渐渐出现而终结。人类进入了世界，发展出了不包括非人类动物在内的一系列行为实践。这些行为实践的特点是浪费，表现在实践、工作、健康、能源、食物、庇护和牺牲——人类祭品，为了不存在的个体、神明、死者、“鬼魂”以及与他们相对应者的利益。有关想象生活的某些现象的出现是作为一种堕化的表达倾向。换句话说，它们貌似是被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所导致，这个过程分散了直到当时还一直被用于生存与发展的能源（比如：某些原始群落施行的死者崇拜是如此复杂，使得生者的生存都变得艰难）。曾经“偏离”或“异常”的人类行为演变为极端的习惯和模式。维尔比在她的一些文章中考查了这些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中有：《精神进化中有中断吗？》《精神进化中的明显悖论》《〈精神进化中的明显悖论〉摘要》（1890b）以及《民俗的重要性》（1892a）和《什么是意义？》的第 22—25 章。

在维尔比的时代，关于原始宗教——被广泛视为人类思维发展早期阶段的重要表现——的主导人类学理论预设并概念化了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中的一个可能中断。维尔比尖锐地批判了这个假设，并着力展现为何这是不可接受的。她用表意框架分析了智力的进化，将其意义理论应用于人类学，以描述能指过程是如

何以转化的方式从原始的形式发展到更复杂的形式。她提出不间断进化的过程或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连续性的理论。为证明自己的论点，她确定出了思维发展中的三个层级或者中心："感知"、"想象"和"智力"。最初，维尔比（1890b）将貌似与连续性原则相悖的社会文化行为（如死者崇拜）解释为原始人的"坏转化"。在后来的研究中（参考《什么是意义？》第22—25章），她继续从对环境反应的角度来解释原始人这种看似自毁式的方式，强调"感知—组合"只能支配"意义"和"意指"，而且影响在实际反应中所展现的对环境的理解/转化。她引进了"激动"的概念——理解为对某种外物的反应的行动（能够与西比奥克的"联适应"的概念相联系）——据此她区分开了"生成"和"自生"或"创生"的概念。根据这些概念，人类生命的出现是作为生命和能量的连续流中的动态反应。因此，概念本身就是反应和理解，它们在更大的符号与能指过程流中被接收并被传递： 118

> 可以认为，尽管原始思维的感知系统显然比后来更加完全地主导，而且对来自于自然的其他各领域的更加微妙的吸引也产生反应（因为特定的大脑型反应加在了脊柱上），意义系统也高度发展，但仍然处于初始阶段；而我们现在至少默认了的意指的要素还尚未被同化。换句话说，智力的原始形式可以被认为是对某些类型的能量敏感，它受到激发，将这些类型以某种方式转化为某种宗教崇拜，然后形成正式的教义；正如它被激发将饥饿感转化为吃东西一样，在更高的层级，它则被激发将整个经验转化为明确的宣述。只是，在这最后一种情况下，因为性命攸关，转化必须是正确的；在刺激形式更加间接的情况下，转化纯粹是试探性的，因而可能会错误得极为荒唐。即使其原则留存了下来，一面是最高级的科学性，一面是最高的宗教性、诗性或我们当今的哲学思想，其最早的应用仍然是可憎的，也是奇异怪诞的。
>
> 但是，从表意学的视角来看，这将是我们应该期望发现的。人类的感知—世界包括很多需要用意义—感知来理性理解的东西；而这个感知，这个对意义、意图、企图、目的、经验的"终点"的敏感性，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在意指的感知——现在是意指的认知——以及对重要性、终极价值和所有经验所有知识中至高时刻的感知中达到顶点。[1983（1903）：193—194] 119

维尔比最终将原始群落的世界观和行为视为他们对自然和宇宙整体的直觉本能理解的表现和实际转化。她用神话批评补充了她关于原始思维——她直接的分析对象——的反思，她的目的是要从科学的角度展现哲学家们、人类学家们和一般评论家们在此类问题上所做的许多研究的毫无价值之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维尔比在原始群落和儿童之间建立了一种比较关系（这是

其研究方法的典型特征)。下文来自《精神进化中的明显悖论》:

> 无疑儿童常犯大错,需要更正。但这些没有古代迷信中的那样详细、一致和复杂,也不包含对死亡现象的恐惧担心或者虚假引申。而关于儿童是"信仰鬼神的",正如赫伯特·斯宾塞先生所指出的,这也明显是基于戏剧性的。他们天生是模仿者和"演员"。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因为人在儿时没有其他长辈更好地教导他,他会将自己的幻想模式化,它们会跟其他的习惯倾向一样,变得有组织性,而且持久。但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展示为何之前更早的对应变得如此无效从而允许这种持久;为何这种初期的比喻力竟会偏离这么远。(1891a:306)

原始群落的这些行为和观点是对环境的感知反应的转化,是向更高级更复杂的活动形式发展的前提,是"事物与思想之间不断对应"(同上:307)的结果。但如此的发展——有机和生理层面的发展——在想象和情感的生活中找不到对应,120 它们反而倾向于毫无正确可能的偏离。从思维的角度来看,貌似人类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区分对立的现象,如幻觉和现实、声音和回音、事物与影子、事物与镜像、能量与物质,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做梦中。维尔比认为像这些对立是"普遍经验"的标志。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导致信仰和至少是消极意义上的过分和怪异的行为:"鬼魂",死者的影子,相信神和人类组成了某种自然的家庭,以及由呼吸、回音、影子、镜像和做梦而激发的宗教崇拜。

考虑到这些,维尔比质问为何存在的原始状态并没有从一开始转化为精神发展的过程,其中想象力和表征的初始力量被调整和平衡(同上)。通过类比进化论,她提出假设,思维的进化由常识所激发的应用阶段开始,然后进入比喻阶段——想象、表征和通过意象制造的意指。正如她在《精神进化中有中断吗?》(1890a)一书中所指出的,"鬼魂论"倾向于忽视应用阶段,将一般想象力转为无联系的混乱的幻想,它们又立即被转化为持续的而且常常有害的行为实践。这将准确的事物限制至今(参见1890a:973)。在《精神进化中的明显悖论》(1891a)中,她引用了弗雷泽的《金枝》,评论该研究貌似凸显了这种悖论——复杂的浪费形式的出现,比如"伤害社群未来母亲们的不自然的处理"(1891a:317)。这在自然的经济性倾向可能扮演阻止角色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所有这些似乎都出现在人类大进步的时代,这些进步因为火和冶金术的发现、工具和武器的发展以及美学领域的成就而扩大(维尔比让我们想起了法国发现的克罗马农人的山洞中的壁画)。

不管怎样,维尔比对来自于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不同出处的报告——科学论文、旅行文献、传道士的记录等等都持极为批判的态度。维尔比对此类报告和来

源于它们的人类系统发生论中的明显矛盾所持的批判态度基本是方法论性的。我们知道，她是从进化的视角来关注能指过程以及它们的发展的，尤其是语言符号。 121

维尔比从三个一般的话语层面的能指过程视角处理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的问题：(1) 原始群落的语言和非语言话语；(2) 学者理解原始群落话语的话语；(3) 她自己的话语，质疑 (a) 她对其他学者阐释的阐释，(b) 她对其直接研究对象的阐释，原始群体的话语，以及 (c) 它们对现实的阐释，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维尔比强调“普遍推论的不连贯性”和建立在错误前提基础上的推理的不连贯性。从这个视角，她警告读者不要在不能互相解释的语境中来释读外来的文化和人：

> 那么，所缺失的一环在哪里？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在任何夸大意义上的互相交流都是最新的精神产物。
>
> 但是难道我们没有被语言的模糊性背叛吗？它们诱导我们将这些观点归结到原始的受感知束缚的思维上。(同上：319)

维尔比不接受原始群落在他们与感知世界的关系中制造了中断的假设。因此，她反对了存在一个朝向非感知世界的突然转换，因为这个假设容易忽略自然所固有的对“正确反应”、对生物与环境之间的“通信”的倾向性。相反，维尔比深信这种内在倾向的连续性，这个倾向需要在语言学的层面被重视，适当理论化并且被视为在进化发展的所有新开端中的推动力：

> 迄今为止进化的所有理论难道不是真正暗示原始思维已经冲淡了它低智祖先的所有符号，并且赐予了我们所能追寻的最早的他们的后代以实际上的心灵白板吗？难道它们不都包含这样的假设，即原始人类从一开始就对环境做出反应，而不是从原生质时代和原生动物温床继承一种内在的做出正确反应或回应的倾向。从那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倾向，它在发展的每一次全新阶段都必然被携带并使用。(同上)

精神进化中的中断假设也许解释了那些很容易被认为是愚蠢怪异的宗教崇拜的激增，因为它们要求牺牲时间与劳动，以及生命。但也正因为此，这个假设不能解释“正确思想”或者对这些宗教崇拜的批判能力的发展(同上：320)。在维尔比看来，她认为这个中断假设以及思维发展中的逆转是错误的，扭曲了宇宙中 122

的进化运动。实际上,中断假设将“真实的”与“重要的”描述为突然让位于“无理由的”和“无意义的”。维尔比本人提出了自然与生物体之间的持续通信理论,其相应的持续发展超越了就偏离的角度而言被概念化了的理论。

2.3.5. 表意过程的生物基础

维尔比关于思维与其进化和个体性发展的构思能与皮尔斯的构思相联系,尤其是他的文章《逻辑与精神主义》(大约写于 1905 年,CP 6.557—6.587)。皮尔斯也认为意识和理性只是组成人类思维或者精神活动的无意识或者半意识的能指过程的表层。

与维尔比很相似的是,皮尔斯主张无意识或者半意识过程——他所说的思维的“模糊部分”——是作为理解所需的敏感性及能力之极限的各类形式的意识和理性推断的前提。他反对将思维认为是完全呈现于自身、在单一的意识中直接体现自身的笛卡尔式概念,而倾向于“生动的意识,受制于注意力和控制,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涵盖我们精神活动的一小部分”。

在描绘他对与完全意识共同存在的无意识或半意识的分析时,皮尔斯提出了三个命题:“(1)思维的模糊部分是主要的部分;(2)它比其他的部分一贯要准确得多;(3)它在敏感性方面几乎是无比精妙复杂。”(CP 6.569)

在《精神进化中有中断吗?》中,维尔比评析了原始人因为可用分析手段和表述的不足而对存在物进行坏“转化”的假设。她认为对原始人类进行客观化分析的现代人类完全缺乏对原始文化——“他者”或者“外来”文化——的理解。现代观察者们需要通过批判意义和语言使用来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而且要能解释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包括心理学和语言的心理侧面(1890a:973)。

123

维尔比在《精神进化中的明显悖论》中构建和确定了关于系统发生的两种理解方式。她对第二种解释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能从她使用“明显”来修饰“悖论”中看出:

> 要么(1)我们假设在思维进化中有绝对的中断和逆转;一个不必要的松散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中的想象力放弃了此前造就其拥有者的一切有序的反应力,继而创造了宇宙的一种荒诞无稽。
>
> 或者(2)我们——如果不假设存在——至少要问在原始宇宙学和自然史中是否有一种基本的关于外在事实的真正的“精神影子”;与不中断的结构、功能和有机反应的序列的有意识对应中的不中断的回应连续性;它就好像是一个有可靠迹象的矿藏,是我们所带有的,而且推动着越来越具体的表达。(1891a:321)

维尔比总结道，那个“悖论”——如果我们必须要提及它——存在于原始人对存在的错误转换 / 理解中，同样存在于现代学者对原始能指过程和表达形式的转化 / 理解中。通过引用比她的《精神进化中的明显悖论》更早的《摘要》，维尔比这样评价这两种解释：

> 15. 如果我们选择前者，那么原始人主要就是将其注意力和其利益牺牲都放在了所有祖先精力都必然要忽略的东西上。一个复杂的文明确实疏于和外在的自然相联系；但是正是它的最高的产物——科学思维——重新获得了明显失去的关联，并给予了我们被称为科学真理的东西。
>
> 16. 但如果我们接受后者，我们会发现多数看起来完全无根据或者恐怖的东西可能最终证明是基本事实的错误转化：自然联系的连续性实际上是不中断的——而且我们所需要的是依据心理学最新进展的有关意指的更仔细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语言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表达的方面。（1890b）

124

维尔比和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费尔迪南德 · 托尼斯都坚持对共同术语工具作为一个关于不同种类思想、原则、观点和理论的多样性的批判性理解和讨论的平台的需要。而这都批判了关于思想的过度简化、理性式—机械式阐释，以及很大程度上源自向物理科学的简化的语言阐释。此外，他们都在源自生物学界的新的生命论动向中发现了对当时简化主义倾向的批判式反应的开端。在《维尔比奖稿注释》（1901）中，维尔比评论了托尼斯的研究，并提及了自己1887年未发表的文章《精神生物学》（Welby Collection，York University Archives）。其中她根据现代生物科学研究了语言和思想过程。她也指出了与托尼斯立场的对应之处。在这方面，她引用了托尼斯以下的文字：

> 灵魂中的精神生物，就像身体上的大脑一样，形成了一种与感知有着可能且实际的连接的复杂组织，这个组织的根本功能是区分异同，即同化与分离，接受与拒绝，肯定与否定，在人身上通过拥有作为判断功能和思想的言语符号系统而完成自我。（Tönnies，引自 Welby，1901：199）

在她与生物学家乔治 · J. 罗马尼斯（1848—1894）于1890至1892年的通信中，维尔比从不同层级的符号活动的角度描述了动物世界的思想过程，而且指出了它们与人类符号活动的某些相似之处。维尔比这时正在研究一种人类智力进化的理论。在这方面的努力中，她考虑了关于此类话题的公众辩论的结果。这反

映在了《什么是意义？》第22至25章。在皮尔斯关于该书的书评中，他强调了这些章节，甚至建议读者先读这些部分。

通过批判阅读当时的人类学理论，并考虑到心理学的最新进展，维尔比发展出了一种关于语言和表达，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最广泛意义上的能指过程的生成—动态理论。在她研究的这个阶段，她关于“感知”的概念预示了她在1907年之后将系统理论化的概念，如“母性感知”，“种族母性”，“首要感知”和“原始感知”。（见下文）125

从进化的角度出发，维尔比将思维或人类大脑视为生命形式进化的一个结果。我们人类在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有“言语”的能力——“清晰且有逻辑的表达”的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进化理论的语境中，维尔比引入了她的“语言学批判”，或者“语言批评”，即其符号与意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其非凡的能指力，维尔比将言语或者口头语言——清晰的有逻辑的表达——描述为进一步生命进化的起跳板，事实上也是宇宙进一步进化的起跳板，也将其描述为人类潜在意指的基础。这解释了为什么她会如此重视人类的批判、语言和概念能力，以及这些能力的伦理维度，它们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有关责任的问题。

根据维尔比所说的，这个能指能力可以通过如实验、理解和跨符号系统的转化等方法发展到最高级别，其目标是获得所有经验的最大价值或者要义。维尔比从表意学的角度强调了将人类知识道德化与人性化的需要（超越了单纯的数量含义），并通过这样做而获得人类所有经验的终极含义和价值。实验的方法——逆推过程就是通过此而被理解——有助于生成处于最高水平感知或要义的意指经验。

“表意学”（1902）的字典条目由维尔比与鲍德温和斯托特共同写出，此条目在她1896年的文章《感知、意义与理解》中所提出的三个意义层面上发展了她的立场。维尔比提倡用符号—理解的方法来处理意义的问题，它超越了传统的方法。后者倾向于通过形式与概念的关系角度来简化地分析意义问题。相反，就像皮尔斯处理他的理解符号学一样，维尔比关注符号与它们解释项之间的关系。

维尔比关于“所感”（1902）的字典条目由她与斯托特共同写出，其理论化的对象是关系到“感知”的能指过程的生物学基础。后者是从维尔比意义三角的第一层角度——参照“感觉的”领域因而也是生物学领域——以及更广泛更综合的角度来理解的，因而“感知”包括了能指过程的目的论、价值论、伦理和美学的层面，它们同时植根于有机生命性：126

所感［拉丁语 Sensus，一种感知］。感觉的（参见本书，同样也是其在外

语中的同义词）；属于或来源于感知。

J. 格罗特谈到了“所感”直觉和知识（*Explor. Philosophica*, ii. 156, 158）；他也用了感受的术语。

（2）不涉及声音或形式，即严格意义上的词语、句子或问题的口头特征，而是涉及它的重要性或目的。

亚里士多德将定义分为“口头的”与“真实的”，更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将它们转换为“所感的”与“真实的”。因此在 J. S. 密尔的说法中（*System of Logic*, chp. vi §4），“一个根本的命题……是纯粹口头的命题”，即仅仅涉及其所使用的意义，“口头的”就是“所感的”。本人表示的就是这个意义。参见《口头的》（亦表示意义的外语同义词 2；V. W., G. F. S.）。（Welby 与 Stout, 1902：515）

感知的生物基础同样反映在以下来自《表达的社会价值》（1908c）的选段。维尔比区分了“感知”与“所感”，以及“口头的”：

但是，“口头问题”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太过控制了我们对表达条件的无意识态度，所以需要注意到这个方面。

如果将所有社会问题中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感知问题）称为仅仅是口头上的，那会怎样？如果我们此处一直就是在做着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混淆，会怎样？难道我们从来就没考虑到，“感知”一词包括了原始生物的第一次反应震颤，和共同利益感，或者兄弟情，或者如同其他的“感知”一样使得人类社会成为可能并超越高贵的希望的责任荣誉感？我们难道不仅忘了常识感的价值，也忘了一词一语的意义的价值？如果我们只屈从于实际结果，比如脑力活动的纯粹经济性，从而注意到这些事物，我认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必然需要一个词，“所感”。我们必须认识到“口头的”问题仅仅是语言的一个语音的、图像的、字母的，至多是历史方面的问题。这些不是我们可以称为所感问题的问题——关系到（不知不觉变化的）意义的问题，我们或者我们的祖先在这意义的基础上使用词语。[1985e（1908）：cclix—cclx]

127

在《感知、意义与理解》（1896）中，维尔比已经排除了替代术语“表意学”的其他表达。比如她反对新词“感知学”以及相对应的动词“感知化”，因为它们与感官世界的关联太过直接，有过度简化的风险。与仅仅更倾向于表示语言形式、声音、书写的术语“口头的”相反，术语“所感”在使人们想起它与有机领域的关联之外，还描绘了该词语的能指价值。

维尔比所使用的另外一个关键术语是"理解"。这个术语出现在她文中的题目之中，是其意义三角的第三个层级。然而很快之后，她又抛弃了"理解"，转向使用"意指"，因为"理解"指的是一种包含在了能指过程所有三个层级和方面中的活动，而不仅仅指第三层级。

在其初始意义上，术语"感知"对应前理智生命，对应意指的原始层级，解释者—解释项对形成其环境的符号的无差别的有机—本能反应的原始层级。在这样的理解中，"感知"的概念本质上是有机性的，包含了所有生存于这个有机世界的生物体。如前文所述，它是适应这个世界的能力的前提，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经验的世界，一个"感知到的"世界。此外，因为感知关涉完整的生物世界，而不仅仅是动物世界，"感知"的能力（不像"意义"的能力）并非人类所特有。"整个动物'王国'（如果不包含植物的话）共享着感知世界"；在进化的历程中，"意义感知的出现——最高种类的感知——标志着新的开始：它开启了独特的人类时代"[Welby，1983（1903）：28]。

所有能指行为，所有从有机到认知到价值的经验，都预设了感知层面的理解能力。"感知"也表示能指过程的实用方面，因为它暗示着符号使用、条件与——在高级形式的动物中的——精神状态、所指物等等，即便只是在前意识的层面。同时，术语"感知"在其所有的能指意义上都组成了经验的价值，其中包括意义的感知和意指。在广泛的意义上，"感知在所有的意义上"都被用来表示能指过程的"价值"，符号活动的"价值"，它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领域的一般导向。因为它指经验价值，感知也关系到这个世界的智力、伦理和美学的维度："感知在其所有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智力、道德和美学世界的联系或连接。因为在所有的意义上，是感知使得它们成为可能。"（同上：48）从这个视角来看，术语"感知"获得了一种特殊化的意义——由"在什么意义上"这个问题所引发——关系到单独符号对个体解释者 / 解释项的适切性。

128

所有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都被赋予了广泛而全面的意义——该意义不仅仅是从意图角度来被理解，也是从超越意图和预见、朝向意指的角度来理解，该意义能够产生更多的事物，一种相对已知、已定和已说的能指增量。这一能力能够关系到能指过程的伦理维度，因而也关系到朝向他者的开放能力，批判、接纳和责任的能力。

维尔比从表意学的角度研究能指、解释和多重意义区分的能力，批判的能力，指称过度或超越的能力，以及创造新词与替代词的能力。这样描述出来的符号活动在逻辑、符号学和价值论相交叉的地方发展；它也是人类特有的。维尔比主张人类复杂精妙的最具创新、创造和意指水平的能指过程能力对应着有机生物的发展、本能的生命和感官与冲动。用今天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她对存在的动物符号

活动（甚至更广义的生物符号活动）领域和人类符号活动领域之间连续性与相互回应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事实上，我们今天知道符号活动的各个领域全部属于能够被称为大"符号生物域"的领域，而且相应地，这也是"宇宙符号活动"的具体表现（参见 Petrilli，1998a、1998e）。

从人类符号活动的视角来看，表意学关系到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包括日常生活和智力生活，而且也不宣称具有任何形式的哲学或者符号学意义上的无所不能。表意学将关注点从能指行为及其可能条件的立场转到了广义的人类经验上。而且，维尔比对符号生命的表意学研究方法让我们想起了批判性意识与人类符号使用所特有的责任联系的普遍必要性。在1903年11月18日写给皮尔斯的信中，她提到了她与意大利方面的联系，数学家与哲学家乔瓦尼·瓦伊拉蒂。维尔比写道，她对表意学的构思来自哲学、符号学、价值论和实用主义的交叉： 129

> G. 瓦伊拉蒂教授……与你一样，都认为准哲学部门和领域——我称为表意学——的实际延伸是重要的。因为后者在我看来似乎发现接受这样一个延伸会带来这样一个时代，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再说"哦，我才不管（或者管不着）哲学的研究。它不是我的领域"。因为那将不仅是表示对理性层面的无动于衷，也是对可以说是给生命带来了人性价值的特征本身的无动于衷，即（1）它从生物到逻辑的所有意义上的"感知"与感知力；（2）它的意图，有意识和愈发具体和理智的，我们称之为"意义"而且（公开承认）用语言表达；（3）它的意指，它对所有其他宇宙事实的承担、地位和理解。（Hardwick，1977：6）

维尔比对充斥着三元秩序的宇宙观特别感兴趣。这反映在了她的"感知"、"意义"和"意味"的意义三角中，以及她相应的区分"行星"、"太阳"和"宇宙"的关于意识和知识的三元理论中。因此，在对批判存在的方法的寻找中，她将三元论视为分析的可靠工具。在这个风格基础上，她批判了黑格尔吸取了三元秩序的活力与转化力，从而逆转了它的含义并僵化了思想本身的根本活力，因而使得它变成了某种打开所有经验的敲门砖（参见她写给 Charles F. Keary 的信，1886—1888，见 Cust，1929：170）。事实上，根据维尔比所说的，存在的三元秩序优势在哲学中已经被概念化，尽管还不充分。实际上，她批判了强调理论主义的倾向，它与生命过程相异，不能引致对符号活动与原符号活动的不同层级的更好理解。

维尔比所写的还包括未发表的论文《三重法则／三个阶段的法则／三元／三元倾向》（1886b；维尔比档案中可找到长条校样版），她尝试将她对理解宇宙方法的搜寻进行系统化。许多年之后，在1903年12月22日写给皮尔斯的信中，她附 130

加了这篇文章。她呼吁对三元倾向进行更多的思考。三元倾向是客观呈现在所有地方的“表达模式”或“表达层级”，存在于有机生物界和无机物世界，存在于覆盖生物现象的符号活动和物理现象世界：

> 关于三元关系，我很了解错误可能会呈现出三元形式，因此获得似是而非的价值。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课题应该要被提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我犹豫很久是否寄给你随函所附的极度不连贯的尝试处理三元论的文稿，我把三元论作为一种表达的模式或者表达的层级。你会很容易了解它的一般意义。我希望有能之士可以在真正广义的基础上对待这个课题。因为很明显，对三元层级的倾向在物理和生物现象中都客观存在。我在我的相当广泛的科学阅读中惊异于此，而且很奇怪地发现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Hardwick，1977：14）

维尔比分析历史、人类物种的进化、文化形式和系统的发展以及科学与知识的进步，出发点都是发展到不同程度的能指过程，这种发展既是“书面”或“实际”意义上的，也是“隐喻”或“比喻”意义上的。但是，她也明确声称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从这个视角，她甚至提到了意义的第三层级，意义的中间过渡区，在这个区域“字面的”和“隐喻的”沿着一条从低隐喻性到高隐喻性发展的连续体而聚合在了一起。相应地，关于世界的经验沿着不同程度的直接性和间接性，在从感知到知识到具备高水平他性和超本地化的符号和意义的转换中变化，其中首要的是隐喻的使用和用间接的观察看待事物的能力。在她看来，世界的构建，主要是通过隐喻化过程，以及随着我们的知识库因为日常生活新经验和科学研究进步而变化繁荣所产生的意义转变。

回忆维尔比所举过的几个例子：“太阳升起”这个表达在现代有着与前哥白尼时代所不同的意义价值；“传染”也随着微生物的发现而被加上了不同的内涵；相似的还有如“太阳”“行星”“宇宙”“天空”“地球”“思维”“物质”“灵魂”和“身体”等词语，它们都因为最近的科学研究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和能指内涵。不管怎么说，意义在一般被视为“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两极之间持续摇摆。这些表达标志着理论的抽象化，它所关于的真正能指过程在具体的经验中从来不是纯粹字面的或者纯粹隐喻的。维尔比事实上警示我们不要倾向于过度简化和简化主义：

131

> 在通过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在感官认知的简单直接性之外，我们有各种形式的间接知识。其中最明显的可能存在于视觉的

情况之中……

现在,我们习惯于理性认为好像在追寻事实或者真理的过程中,只能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样。我们所面对的要么是某种字面或实际的事物,要么是隐喻。前者是事实,后者顶多只是有用的解释,根本上是随便的和偏颇的,因而绝不能被作为证据。

但是,假如我们仅仅视为隐喻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是间接观察到的、不得不类比地表达的事实呢?假如存在一个中间区域,在其中我们应对的既不是纯粹字面也不是纯粹隐喻的,而是直接、间接和双重间接的经验呢?[1983(1903):139]

维尔比将能指首要性(对应皮尔斯理论中区别于指示与象征的像似符号)加入隐喻——事实上是一般意义上的比喻式表达。她走在了语言起源现代研究的前列(参见Sebeok,1991b:ch. 5),最早将言语——口头语言——视为人类的一个具体特点。更有趣的是她承认制造"图像"、想象和默思以及最终"象征化"等方面的能力是人类特有的、先于口头语言的首要的和非衍生的特征。换句话说,在维尔比看来,言语(在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双重层面)次于偏爱创造力和创新地制造"图像"、间接能指过程的能力;因此,言语次于人类模化无限可能世界的能力,而这是真正将人类与动物王国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特色。这样一来,口语强化并进一步发展了比喻式表达和想象的能力。换句话说,尽管在进化的阶梯上物种特有的口语符号系统比人类建模能力出现的要晚,但它扩大了象征层面的表达性。因为这个原因,它对独特人类时代的开始起到了帮助作用。因此在维尔比的描述中,人类物种要通过它的创造性和想象的能力以及言语和象征化的能力而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132

言语产生的时刻,是理解产生思维的时刻也是比喻生成的时刻的标志。在言语时代之前,图像是初期的。然后它出生了。那一时刻这就是秘密。我们藐视"纯粹的"比喻,等等。我们因此藐视人与野兽之间的区别。没有野兽能够用词语想象宇宙,更不能象征化。(未标日期的手稿,Box 30,File 44,"Significs-Ambiguity",Welby Collection,York University Archives)

通过援引区分表面相似(类比)与生成—结构相似(同源)的生物科学,维尔比确定了知识与一般能指过程进化中她称为"更强"因而也是更有效的一种"类比"——同源。她因而区分了作为分析方法论工具的类比和同源:

> 所有种类的比较，从最荒谬不可用的到最实在最完整的，都作为“类比”而堆在一起；之后我们被严肃地告知关于类比无可争论。但是一些被含糊地称为类比的比较实际上是同源；其他一些实际上是等同；从这些完全可以开始适当地争论。[1983（1903）：21]

维尔比确定了思维、语言与世界之间同源类型的相似关系——可在结构与生成层面而不仅仅是在表层发现的相似关系。这两种相似，类比的和同源的，又相应地关联不同种类的推理——演绎、归纳、假设（即逆推）——它们的特点又体现为不同程度的对话性与他性，以及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创造能力（本书第一章）。

133 通过结论：表意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全面恢复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中逻辑与生物之间的连接——恢复所有能指阶段的感知，从本能—生物性层级到伦理价值层级，即作为意指的感知。作为从“表意学”或“目的符号学”视角（参见 Petrilli，1998a）——或如我们所偏向的，“符号伦理学”视角（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所做的逻辑与感知、感知与价值的关系恢复的结果，表意学在其追寻复杂的人性时，阐述了将逻辑延伸至其严格知识论的边界之外，从而连接有机层级以及伦理层级的可能。

生平简介

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在符号学研究中地位相对较低，但她对意义理论和我们对符号的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从本书的视角来看，她是符号学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我们认为她的人生值得拥有一篇比其他更加知名的符号学家更长的生平简介。

维尔比属于英国贵族的最高圈子。她生于 1837 年 4 月 27 日，是查尔斯·詹姆斯·斯图亚特—沃特利阁下（1802—1844）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父是第一位华恩克里夫勋爵三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其母是埃米琳·夏洛特·伊丽莎白夫人（1806—1855）。埃米琳·斯图亚特—沃特利夫人是一位作家、诗人和旅行家，是第五位拉特兰公爵约翰·亨利·曼纳斯与第五位卡莱尔伯爵弗雷德里克·霍华德之女伊丽莎白·霍华德夫人的第二个女儿。维多利亚·维尔比在 1837 年 6 月 17 日在圣詹姆斯教堂受洗于索尔兹伯里主教，受名维多利亚·亚历山大莉娜·玛丽亚·路易莎·斯图尔特—沃特利，皇家公主殿下亚历山大莉娜·维多利亚和肯特女公爵（太后）作为她的教母，约翰·欧文作为教父。她的名字随她的第一教母。这件事在五天之后意义更加巨大，维多利亚公主成为了第一位亚历山大莉娜·维多利亚女王，并将签名简单改为维多利亚女王。1861 年，维多利亚·维尔比被钦命为维多利亚女王皇家侍女，并在皇宫度过了将近两年（1861—1863）。

1863年7月4日她在贝尔浮瓦嫁给威廉·厄尔·维尔比勋爵(1829—1898)。维尔比勋爵为军官,国会议员,高级郡长,在其父1875年去世后成为第四位准男爵,袭增姓格雷戈里。因此,维多利亚·维尔比的姓氏就变成了维尔比—格雷戈里。她在1880年代末之前都是以全名发表文章,1890至1893年是以维尔比夫人阁下的名义,1893年之后是以维多利亚·维尔比的名义,尽管在签署所有官方或商业文件时仍然用全名。1887年,其子查尔斯·格琳·厄尔·维尔比勋爵(1865—1938),国会议员及战争办公室国家副国务卿,迎娶玛丽亚·路易莎·海伦娜·赫维(死于1920年),维尔比的正确名字为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或者V.维尔比夫人,因为她的儿媳现在获得了将"夫人"放在其教名前面的权利。结婚后,她的儿子也获得了在丹顿庄园生活的权利,而维尔比则搬到了敦尼弗斯。她另外两个孩子是维克多·阿尔伯特·威廉(1864—1876)和埃米琳·玛丽·伊丽莎白(也称为"尼娜",1867—1955,画家、女雕刻师和作家)。尼娜后来撰写了母亲的传记,编撰了两卷她的通信集。在婚后最初的几年,维多利亚·维尔比在1872年促成了皇家刺绣艺术学校的创立。 134

维尔比一点也不受宫廷生活的吸引,在婚后她退隐到了丹顿庄园。在那里,她得到丈夫的全力支持,开始了她的研究。她对现代符号、意义和理解的理论有巨大贡献,1896年她引入了新名词"表意学"作为她自己关于符号、感知(在其所有的意义上)和价值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方法。她为报纸、杂志和科学期刊撰写了大量文章(著名的有《观众》,《解释者》,《双周评论》,《公开法庭》,《自然》,《心灵》,《一元》和《希伯特杂志》,以及《哲学、心理学与科学方法杂志》),而且还独立出版印刷了一系列的散文、寓言、格言和关于广泛主题(科学、数学、人类学、哲学、教育、社会问题)的小册子。她也出版了六本书。除了其少时(1852)出版的一本旅游日记、一本包括其通信节选的批判思考神学与宗教问题的书(《联系与线索》,1881)、一本关于祈祷的书(1892)之外,维尔比还写了一本关于寓言、批判思考和格言的集子(《感知的谷粒》,1897)。之后她又写了两本特别关于表意学的专著:《什么是意义?关于意指发展的研究》[1983(1903)]以及《表意学与语言:我们表达和理解资源的清晰形式》[1985(1911)]。其他关于维尔比的有价值信息资源还包括她女儿写的传记《漫步者:埃米琳·斯图亚特—沃特利夫人及其女儿维多利亚的旅行故事》[1849—1955(Cust,1928)],以及维尔比与其他各个对话者之间的两卷书信集,涵盖了1879—1891年,以及1898—1911年,分别为《更大生活的回响》(Cust,1929)以及《其他维度》(Cust,1931)。她与皮尔斯的通信以《符号学与表意学》为名发表(Hardwick,1977)。

从1863到1912年维尔比去世,她都是科学界和文学界领军人物的朋友和灵感之源。她与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的450多位通信者定期 135

保持着联系——这足以证明她在当时文化圈中的影响。她通过这些通信来进行与其他人的持续对话性的理论构建。维尔比在 1870 年开始给政客、宗教代表、贵族和知识分子写信，由此发展出了一个书信网络，它在 1880 年之后迅速扩大。她用这个网络作为其观点的宣传媒介和传播这些观点的工具。通过她在维多利亚王朝所居的高位，她在政府与贵族圈中广泛结交。她对宗教和神学问题的兴趣使她能与当时的教会领袖保持联系。后来，她开始欢迎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从而创建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沙龙。维尔比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原创性广为人知，但她从来没有接受她所期望的公共认同。为了避免阿谀奉承，她匿名发表作品；或者她会用笔名或者名字首字母或者仅仅“维多利亚·维尔比”来签名。她唯一珍视的荣誉是“被工作者视为一位严肃的工作者”（Hardwick，1977：13）。她没有所属机构，但她是亚里士多德和人类学学会的成员，也是社会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03—1904）。

随着维尔比研究的进展，她渐渐推广表意学研究，将她的广泛兴趣汇聚到表意学的视野中。在 1897 年她发表完两篇里程碑式文章《意义和隐喻》（1893）以及《感知、意义与理解》（1896）之后不久，《思维》杂志创立了维尔比最佳表意学论文奖。1898 年，它第一次被颁给德国社会学家费尔迪南德·托尼斯，因其发表了《哲学术语》一文（1899—1900）。表意学获得官方认可的重要时刻是三卷本《哲学与心理学词典》（Baldwin，1901—1905）中的条目“转化”（Welby，1902）、“表意学”（与 J. M. 鲍德温和 G. F. 斯托特合著，1902）以及“所感”（与 G. F. 斯托特合著，1902）。但是，这个她所期待的官方认可直到 1911 年才出现，大英百科全书出版了“表意学”一词，其中历经了三十年的“辛劳努力”。荷兰的表意学运动发展为两个阶段（1917—1926 与 1937—1956），就是通过荷兰心理分析师、诗人和社会改革家弗里德里克·冯·易登（1860—1932）基于维尔比的表意学的思考而发展的。

维尔比的科研作品现有两个档案：约克大学档案中的维尔比集（加拿大多伦多）以及伦敦大学图书馆中的维尔比夫人图书馆。后者包含了她个人图书馆的上 136 千部藏书和二十五箱小册子、复印稿、剪报、宗教传单、讲道集和不同作者的演讲出版本。另有四箱未标号，包含了维尔比出版物的大多复制品。她的科研和文学作品在约克档案中，有四十二箱。前二十一箱包含了维尔比基本上未出版的通信，覆盖年份为 1861 年到 1912 年。后二十一箱是主题文件（维尔比自己确定的题目）。这些包含了笔记、摘录、关于各类主题的评论——生物学、教育学、伦理学、优生学、影像学、语言和意指、逻辑和意指、物质和运动、数论、哲学和意指、表意学（九份文件）、时间，还包含演讲、课件、其他作者的讲道集、许多未出版的散文和维尔比的诗歌集、图表与照片、翻译、校对稿、她的一些出版物的副本、报纸剪摘等等。维 137 尔比于 1912 年 3 月 29 日在丹顿庄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死后葬在了格兰瑟姆。

第三章
关于巴赫金

3.1. 作为对话理性批判的语言哲学

当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够生成多种解读时，其重要性便越显突出。米哈伊尔·M. 巴赫金（见第126页生平简介）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研究在沉寂多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自那以后，多种不同视角的研究围绕他而展开。他的部分著作是在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并逐渐地但未按编年顺序被出版。其中包括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作品；这些著作最近才为人们所了解，从而让人们对巴赫金的研究有了进一步认识。

巴赫金的思想贯通众多学科，现在正被应用于他本人从未直接涉猎的领域。我们过去着力于对他的研究和著作进行研究，然而我们发现，可以回顾我们早期对巴赫金所作的阐释，根据新发现的巴赫金著作，对我们已熟悉的巴赫金著作进行再阐释，从不同视角对其重新思考，并作进一步发展，这样做会大有益处。

在下面一节中，我们从总体上回顾，并从语言哲学视角来考察巴赫金的研究。

3.1.1. 文学哲学与语言哲学

无论人们想如何运用巴赫金的思想体系，用巴赫金自己的术语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文学哲学（或文学理论）与“语言哲学”。

巴赫金发现，文学哲学与语言哲学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要想将专属于巴赫金的著作与他的合作者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都是由他们署名）的著作分割开来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除了交织于这些 138 作品之中，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与文学哲学还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道德哲学。事实上，巴赫金原来的兴趣在于道德哲学——尤其是责任问题。他最早的一篇论文写于1919年，与发表这篇文章的杂志一起集中探讨了与艺术相关的问题。从那时起，巴赫金就已经将艺术问题和责任问题联系在一起。

巴赫金对“有限责任”根本不感兴趣；“有限责任”与身份问题相关。就艺术话语（尤其是与文学文本相关的艺术话语）而言，他对艺术家的身份不感兴趣，对文学体裁或文学潮流也不感兴趣。在对语言的研究中，巴赫金对身份范畴并不关心。在所有这些问题和学科中，“巴赫金革命”（见 Ponzio，1998）将人们的注意力由身份转移至异他性问题。

巴赫金感兴趣的是责任，一种可以理解为对他者的“应答”的责任——应分的责任。在巴赫金看来，具有美学价值的是他者而非我者的价值。他分析话语的目的是强调其中他者话语的存在，这是一种导致原来话语具有内在对话性的话语。就语言而言，巴赫金认为，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起作用，语言中的身份通过这两股力量的斗争而得以确立，其结果是，身份被赋予了他性。巴赫金以前缀“meta-”表达了他关注的焦点朝着异他性方向的转移，他将他自己关于语言的研究归类为“metalinguistics”（元语言学）。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的根源在于他的研究焦点超越身份界限的转移。他的文学哲学沿着同样的方向，超越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限制，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由连贯而稳固的身份价值所决定的，包括语言身份、文化身份、民族身份、话语体裁身份，或其他任何类型的身份。

在对符号的研究中，巴赫金并未局限于言语符号；他也涉猎非言语符号。在讨论其关于符号（包括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研究时，他拒绝使用术语“semiotics”（符号学）（这一点在其 1970 年代的笔记中表达得非常清楚）。因此，此处我们也必须以“metasemiotics”（元符号学）来讨论他的符号学理论。

139

在下面两小节中，我们将探讨异他性在整个巴赫金理论框架中的作用。第一小节讨论巴赫金的文学哲学；第二小节讨论巴赫金的理论范畴对语言哲学所作的贡献。文学哲学与语言哲学是巴赫金的哲学工程这枚硬币的两面。当我们走近巴赫金的理论，我们发现，（从元符号学视角看）它属于道德哲学领域。

3.1.2.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署名是沃洛希诺夫）一书和“文本问题”一文中，巴赫金使用了术语“语言哲学”表示他的研究，这一术语横跨多领域多学科，然而，这些众多领域和学科都关涉语言与符号。他的研究焦点在于这些学科的接触点和交叉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一书中，巴赫金强调语言与符号关系的对话性。换言之，符号学与语言哲学具有对话联系：符号学具有哲学成分，而语言哲学具有科学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巴赫金将语言哲学称为“元语言学”。他将这一术语应用于他自己特别的理论研究之中，包括对符号、表述、文本、话语体裁

的研究，以及对文学作品与大众文化的非言语表达方式（最著名的是他对狂欢符号的研究）之间关系的研究。

甚至到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当符号学这一术语被广泛接受为研究符号的科学时，巴赫金从不使用该术语来表示他自己的研究；他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区别于其他诸如尤里·M.洛特曼这样的学者。

很难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之间划一界线。尽管我们可以将语言哲学与符号学研究中被看作特定符号系统语法的具体领域（包括语言学）区别开来，但普通符号学必然具有哲学性质这一事实使得普通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区别变得更不确定。

我们也不可以仅仅通过下列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声称普通符号学研究各种类型的符号，而语言哲学仅仅研究言语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专业语言）和那些研究言语语言的学科。实际上，语言哲学也研究言语和非言语符号，对这些符号从符义学、逻辑—符形学或符用学视角进行描述。

140

语言哲学与符号学之间关系的问题，跟更高层次的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相关。作为一般符号科学，因而也是众多语言科学之一，符号学不同于语言哲学。然而，普通符号学（与专门符号学相对，后者是另外一回事）无法将其本身从关于其本身的范畴的哲学研究中分离出来。

语言哲学探究与"符号学领域"相关的、超出语言之外的内容，亦即符号科学的领域。参照巴赫金的做法——他应用"元语言学"这一术语来强调他自己超越语言学界限而研究语言的方法——我们可以使用"元符号学"这一术语来阐释我们对语言哲学的理解。

提及语言学和超越语言学界限的必要性实际上就间接提到了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传统。早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费鲁齐奥·罗瑟—兰迪已经开始批评符号学中以索绪尔语言学及其符号概念和语言价值作为理论模式的趋向。不过我们此处所指的还包括分类语言学以及转换生成语言学。所有这些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局限：他们的分析对象是脱离了具体交流语境的句子——去语境化的句子（对立于对话性的表述）。关于这一点，我们推荐读者读一读罗瑟—兰迪的《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Rossi-Landi，1992b；1983年英译本）和《语言学与经济学》（Rossi-Landi，1975a），再读一读蓬齐奥的《语言生产与社会意识形态》（Ponzio，1992b；1973年意大利语原版的扩展和更新版法语译本）。后一部著作对索绪尔语言与交流理论和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提出了详尽的评论。蓬齐奥在《语言哲学（2）》（Ponzio，1991）和《符号、对话与意识形态》（Ponzio，1993a）中对同样的问题作了进一步阐发。

3.1.3. 巴赫金的符号模式

以单一目的为指向的单向性、预定性逻辑被多义性、意识形态的多向性和符号的多逻辑性置于危机之中。符号一旦不再被看作单个的要素，或者说，符号一旦被分成若干成分，那么就很难说清楚符号始于何处又止于何处。符号是过程，141 是各种关系的交织，而不是事物。符号总的、整体的意义与其具体交流语境、与社会互动、与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取向都是分不开的。

在阐释符号时，仅仅识别符号是不够的。阐释需要"积极的理解"。符号的意义在于更多的内容——这一额外部分与那些使我们能识别出符号的诸要素均有关联。意义形成于那样一些意识形态意义方面：它们跟符号活动的情景语境密切相关，它们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对符号的理解需要应答、需要观点，从这一意义上讲，对符号的理解是一种积极理解。对符号的理解产生于对话关系，反过来，它也生成对话关系：符号在对话的应答中得以发展（参见 Bakhtin，1970—1971）。

就言语而言，符号是完整的表述；它与社会语境不可分离，和符号归属的意识形态领域或话语体裁不可分离（巴赫金在"1970—1971 年笔记"中所说的"无穷多样的话语体裁"：他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著作包括"言语体裁问题"，见英译本 Bakhtin，1986）。表述是一个具有社会和历史特性的关系的一部分，是一个活生生的文本，不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表述不是一个孤立的、依据语言单位与抽象语言之间关系进行阐释的独白性表达。

从皮尔斯的符号概念的语境来看巴赫金的符号概念，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符号模式，它可以比其他任何模式都能更好地解释符号或符号活动的复杂性，因为其他模式总是倾向于将符号简约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 signifiant（能指）和 signifié（所指）。显然，我们这里说的是索绪尔模式的符号论（《课程》中的索绪尔，而非研究回文构词法的索绪尔）。索绪尔符号论不仅仅把符号设想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等价交换。而且，如巴赫金本人所说，这样的理论仅仅把语言生活的两极理论化，所有的语言现象和所有符号现象均在这两极之间发生。这两极就是统一的系统（langue，语言）和单个说话人对这一系统的个别使用（parole，言语）。

如皮尔斯所示，符号或再现体对于某人来说代表某物。那个某物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对象，只要它能在那个某人的心里创造出"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也许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一个解释项（CP 2.228）。因此，我们可以补充说，符号的意义是一个（开放的）类别，它包括这个符号和它所有可能的解释项。而意义与符号的对象之间的中介功能是通过其他符号的中介来实现的。皮尔斯说，一个符号的存在依赖于"第三性"范畴——换言之，一个符号预设着符号本身、其

对象和解释性思想(解释性思想本身也是符号)之间的三分结构关系。符号如果在解释项符号和其对象之间作中介,它总是发挥第三者的作用。 142

符号得以发展,是因为它跳出其本身之外,是因为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所说的关系不是等价交换关系。然而,等价交换构成了信号的特征(从这点看,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的分析发人深思),在这里,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这与符号形成了对比。

更准确地说,一个信号的意义就是包含了该信号及其解释项(这些解释项仅仅依赖于替换关系)的类别(例如,红灯具有一单个意义,因而是信号——其意义就是能替换红色的意义的类别:以拼写或发音形式存在的"停",或张着双臂的警察,等等)。

毫无疑问,这个符号还包含了信号性因素及与其相关的自我一致性;然而,这不能构成其符号特征。理解符号不仅仅是识别其固定和可重复要素的问题。符号具有语义和意识形态的灵活性,这一点使得符号能适应于不断更新的、不同的表意语境。在有符号的地方,信号性和自我一致性的因素被符号具有的特征所超越:可变性、矛盾性和多声性。

> 在一个人的母语中,即,对于某一特定语言社团中一位成员的语言意识来说,信号识别当然被辩证地消除了。可以说,在掌握一门外语的过程中,信号性和信号的识别还能被感觉到,还有待于被征服,那门外语还没有完全成为一门语言。掌握外语的理想境界是以纯符号性取代信号性,以纯粹的理解取代识别。(Voloshinov,1929,英译本:69)

这就是所谓"符号是自我身份与他性的对话性整体"这一说法的意义所在。考虑到允许符号识别或鉴别的因素,符号的实际意义还不止这些。其实际意义形成于它的意识形态意义方面,这些方面是该符号所特有的。另外,这一实际意义与其符号活动的情景语境密不可分。 143

巴赫金[署名为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1929)]坚持认为,在符号的两个方面之间存在一种对话关系。他把这两个方面叫作"意义"(符号中所有那些可以再生的、稳定的、受支配于识别过程的方面)和"主题"(符号中那些新的方面,它们需要积极理解、应答、观点,并且与符号活动发生的具体情境相关)。针对言语符号以及"主题"与"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巴赫金作了如下评论:

> 如果不把意义表示为主题的一个要素,即不把它构建成一个具体实例中的表述,那就连传递一个特定单词的意义也不可能(例如,在教授另一个

人外语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主题必须以意义的某种确定性为基础;否则它就丧失了与过去和将来的联系——它会完全丧失其意味。(同上:100)

3.1.4. 巴赫金的对话

巴赫金认为,对话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本身如何,无论意识到这一点与否,一个人的话语总是暗含他者的话语。对话不是自我发出的主动行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所显示的那样,个人参与对话不是出自对他者的考虑,相反,更为重要的是,个人会冲破他者的阻力而参与对话。

话语因为被动参与到他者话语之中而具有对话性。对话不是多种视角的综合;恰恰相反,对话具有执拗的一面。自我以对话方式隐含于他性之中,正如"怪诞身体"隐含于他者身体(即另一人或非人存在)之中一样。

对话与身体密切相关。在脱离身体的思想中不可能存在对话。巴赫金的对话概念和柏拉图式对话不同,多少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不是认知层面的,不是真理功能性的;相反,它是伦理性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对他者应分的责任,一种强加给我们的、应分的责任。

巴赫金的对话排除了各种形式的平等、排除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惠互利。从这点看,对话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和不可逆转的。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点,那么那些受到热捧的巴赫金阐释者们——诸如托多罗夫、霍尔奎斯特和韦勒克——都从根本上误解了巴赫金的对话概念。其证据是这样的:他们都把巴赫金的对话研究跟马丁·布伯、扬·穆卡罗夫斯基和柏拉图的对话研究方式相比较。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关于对话的理解都是基于对相遇、一致、趋同、妥协、综合等概念的意义的滥用。

144

具有标志性的是:托多罗夫以"互文性"取代了巴赫金的"对话",以"超语言学"取代了"元语言学"。然而,互文性将对话简约为表述之间的关系,超语言学将元语言学简约为针对话语研究的一个分支,与这个分支相对的是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langue)。

这种解读方式如果说没有完全抹杀巴赫金思想的革命性,至少是抑制了它:由巴赫金从哲学层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艺术层面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涉及到的是具有普泛性的人、生活、思想、行为等。

康德发起了"纯粹理性批判",萨特发起了"辩证理性批判";巴赫金则发起了"对话理性批判"。尽管弗拉基米尔·克里辛斯基(Krysinsky,1998)提出将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穆卡罗夫斯基的概念相比较,但巴赫金不是将对话理解为说话人表达观点的手段。

根据巴赫金的观点,对话并非我们所选择之物;相反,我们遭受了对话,我们

受制于对话。对话不是对他者的开放态度的结果；恰恰相反，对话指的是不可能对他者采取封闭态度。这一点在悲喜剧中对漠视的尝试上表现得很清楚。

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巴赫金理解的对话是不可能对他者漠视，是对他者的"无法漠视"。换言之，敌意、憎恨、夸耀式漠视都不能看作漠视。即便无法漠视沦落为憎恨，他者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艺术层面上阐释"有思想的人的意识的对话性"（Bakhtin，1963）时在其小说中竭力表现的。

巴赫金的对话理性批判与表现于大众文化（公众场合的粗俗语言，尤其是戴着狂欢节面具的、以"狂欢化文学"来表现的粗俗语言）中的"怪诞身体"概念相关。巴赫金的对话理性批判构成了对个体中的自治概念的批判：换言之，自治是一种幻觉。因此，他的批判是就意识或自我对个体身份的批判，正如就社群和历史语言或文化系统（在这里理解的身份是依照主流意识形态倾向而与他者的分离）对集体身份的批判一样。

145

在其最后撰写的一篇论文（Bakhtin，1974；收于巴赫金 1979 年文集）中，巴赫金写道：

> 文本只有通过与另一文本（语境）接触方能得以生存。我们要强调，这种接触是文本（表述）之间的对话性接触，而不是抽象要素之间对立的机械性接触……这种接触背后是人之间的接触，而不是事物之间的接触。（Bakhtin，1979 年英译本：375）

在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1929，1963）和拉伯雷（1965）的重要著作及其理论性和方法论研究中，这样理解的文本才是主人公。因此，我们可以说，巴赫金的理论是一种文本理论——具体说，是文学文本；它也是一种对话理论，对话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发展。

文本是所有人文科学重视的对象，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文本（包括书面的或口头的，言语的和非言语的）生产者的人。巴赫金的研究方法正是和这一特殊对象——文本——发生了关联才显出其特殊性的。积极理解——应答性理解，对话性理解——是这种研究方法中的主要成分。文本的具体逻辑是一种双向逻辑，是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文本的意义通过问答的逻辑而获得；这些不是抽象的、绝对的、非人的逻各斯范畴，而是具体的对话性范畴。对话预设了两个交谈者之间非对称性的疏离；它预设了不同体验的问答在特定时空中的产生；它预设了说话者和应答者的不同时空体。

正如巴赫金在"言语体裁问题"（Bakhtin，1952—1953；英译本见 Bakhtin，

1986）中所说，话语体裁可以分类为第一类（或简单类型）——日常对话体裁——和第二类（或复杂类型）——文学体裁，它们吸收了日常的、普通的、客观的对话交流，使之客体化。作为第二类体裁的一个成分，第一类体裁对话可以这样描述：它失去了和真实语境的直接联系，失去了与日常生活目的的联系，因而失去了它

146 的工具性和功能性。至于它的对象和形成其语境的其他话语，第一类体裁的话语离开了决定它的独白性语境，进入到描述它的话语语境。

这便是言语交流的复杂语境，其作者以间接、直接和自由间接言语的形式及其变体使直接话语客体化，并将其吸收（讨论见 Voloshinov，1929，第三部分）。

巴赫金认为，对话的复杂性可以通过被描述的话语及其内部对话性来研究，而这种复杂性存在于第二类体裁——文学话语体裁之中，尤其是小说之中。第二类体裁让我们能发现在第一类、简单的、直接的、客观的言语体裁中所没有的对话方面。巴赫金声称（Bakhtin，1952—1953），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特别有趣，这里的分析对象是被看作对话交流的细胞的表述，而不是被看作语言系统的细胞的句子或命题。（后者是一个抽象概念，巴赫金在其对"抽象客观主义"的批判的语言研究中有讨论；关于这些方面，参见 Voloshinov，1929，以及巴赫金 1928 年有关语言学研究倾向的论文，该论文英译本收于 Shukman，1983：31—50，意译本收于 Voloshinov，1980。）

> 片面地只依据第一类体裁，不可避免地会把整个问题庸俗化（行为主义语言学就是这种庸俗化的极端表现）。第一类和第二类体裁的相互关系本身，及后者的历史形成过程，有助于说明表述的本质特性（尤其能说明语言与意识形态、世界观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问题）。（Bakhtin，1952—1953 年英译本：62）

依据不同的文学体裁或次体裁，文学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身份维度和差异—漠视关系的限度。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从一个既有参与性又无法漠视的视角描绘他性的结构。由于早期对责任行为哲学的兴趣，巴赫金继而产生了对语言哲学的兴趣，语言哲学可以理解为元语言学或文学哲学。此处的短语"of literature"（文学的）是一种主观属格，与文学（言语艺术）生成的哲学或世界观（而非支配

147 文学的哲学观）相关。

根据巴赫金的观点，文学语言的元语言和元符号本质使得我们能够用语言理解超出语言学和符号学之外的东西。通过文学语言终于可以理解外来词——我们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其他人的他者话语，而且指他者话语在"同一"主体的话语中的回音。文学语言充分阐释了话语的对话本性，及其内部对话性。

在朝着多逻辑性发展的运动中，文学作品克服了语言的独白性和有限的对话性。文学作品产生的这种张力正是出现于文学表达的过程中——例如，通过不同形式的转述言语，通过每一体裁的具体规则，通过不断更新的文学表达体验等等。只有当作者就他所描述的事件弄清自己的处境，将自己置身于其本身的表述之外，从而达到"外位"或"外化"的状态，文学活动才算真正开始。置身于外意味着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保持距离或他性关系，以便抑制整体的重构。

与作品的他性相辅相成的是对自我的驱逐、对整体的解构、对回归自我的逃避。在外部发现自我是文学创作活动的一部分：讽刺、间接交流和外位化是同一现象（作品的他性）的不同方面。作品的对话——尤其在复调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话——具有不同于在文学之外实现的对话的特征。在文学中，语言的对话潜势得到尝试，并被推到极限，在这里，交流、相对和相反的他性、能指对所指的依附、主体性、真理、语言的经济性、工具性和能产性等等，都被既无功能性又无生产性的话语超越——被预设外位化关系和绝对他性的话语超越。

3.1.5.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生物符号学

巴赫金在 1924 至 1929 年间那段狂热的学术活动中，在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撰写了"现代活力论"一文。在极其多产的这几年中，他出版了不同主题的四本书（弗洛伊德、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然而，他只在最后一本书里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其他三本（连同好几篇文章）都签署了沃洛希诺夫或梅德韦杰夫的名字。巴赫金早期的著作包括"现代活力论"（1926）。此文分两期刊于俄国流行的科学杂志《人与自然》上，署名作者是他的好友、生物学家伊万·伊万诺维奇·卡纳耶夫。同样，巴赫金对"现代活力论"的著作权不存在争议。 148

巴赫金在列宁格勒的生活非常艰难。他患有骨髓炎，随着他健康状况的恶化，他开始领取国家补贴，但非常微薄。他和他的新好友卡纳耶夫搬到一起住。自 1924 至 1927 年，他们共享一个公寓，巴赫金和他妻子住在一间大的、但家具陈设简单的房间；"巴赫金小组"的另一位好友康斯坦丁·瓦季诺夫对其描述如下："两床杂色毯子 / 两个破旧的枕头 / 两张床紧挨着！但窗口有鲜花……狭窄的书架上放着书 / 坐在两床毯子上的是他们两个人 / 一个是脸色苍白而透着浅蓝的男子 / 另一个是他少女般的妻子。"（Vaginov，"Dva pestrykh odejala ……"；转引自 Clark 与 Holquist，1984：99）

卡纳耶夫极大地刺激了巴赫金对生物学的兴趣。正如巴赫金本人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1937—1938，见 Bakhtin，1975，英译本 Bakhtin，1982）一文的笔记中所叙述的那样，正是由于卡纳耶夫，他于 1925 年夏有幸聆听

了列宁格勒生理学家阿列克塞·A.尤克托姆斯基所作的生物学方面的"时空体"讲座。该讲座影响了巴赫金小说中的时空体概念。巴赫金进一步说明,"该讲座也触及美学问题"(同上)。尤克托姆斯基本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衷心的读者。

最为关键的是,巴赫金的研究要归功于当时的生物学研究,诸如尤克托姆斯基的研究:不妨回顾一下巴赫金将身体与世界之间关系概念化为一种对话关系,身体在将其世界建模的过程中应答着它的环境(参见 Clark 与 Holquist,1984;Marcialis,1986;Salvestroni,1986;Tagliagambe,1986)。同样对巴赫金很重要的还有伟大的地球化学家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Vernadsky,1926)的研究,其"生物域"的概念将构成巴赫金的生物符号学视角的基础。

我们还可以将巴赫金的研究与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的研究联系起来。事实上,在"现代活力论"中,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被称作活力论的代表,该理论认为,在生物之外有某种特别的、超物质的力量构成了生命过程的基础。实际上,乌克斯库尔对活力论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并未完全接受该理论,正如他对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理论的概念持批判态度一样。如他在其1934年所著作品中所言,与其说他对有机体—机器的活动感兴趣,不如说他对这一机器的驱动者更感兴趣。他也在寻求以符号解释生命。

149

因此我们可以说,乌克斯库尔和巴赫金都从符号学视角研究生命问题。巴赫金越来越深入研究与文学符号相关的问题;即便如此,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论是在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具体指的是神经中枢系统——列宁格勒曾是该领域的世界中心之一)以及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科学研究语境中构思完成的。尤其是,我们只有在发展之中才能完全理解他的对话主义概念;而这些发展催生了现代生物符号学研究,包括乌克斯库尔的生物学研究。

在"现代活力论"一文中,巴赫金将其对活力论的批判直指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生物学家汉斯·德里施的研究。正是德里施声言: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存在差异,正是德里施从彻底摆脱周围环境的自治的角度阐释有机体的动态平衡。相反,在他自己关于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描述中,巴赫金坚持认为,有机体与其周围世界构成了一个一元单位;此外,他反对生命力量与物理—化学过程的二元概念。

在其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巴赫金批判了活力论者和反射论者以及弗洛伊德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例如有关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机械论)。在巴赫金看来,所有这些不同立场的观点都发出了错误的科学断言:通过淡化身体与世界直接的对话关系,他们或者使活体失去其物质形态,或者以机械论关系将其物化。巴赫金关于符号的沉思是这一批判的根本内容。其符号理论促进了我们对生命过程和精神过程以及历史—文化关系(例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

系）的理解。该理论对我们理解这些过程的另一贡献在于，我们以对话模式取代了单边的、终结性的机械辩证法。雅克布·冯·乌克斯斯库尔的研究发展路线与此相似。对于巴赫金和乌克斯斯库尔来说，被研究的过程是一种符号活动。乌克斯斯库尔没有应用对话模式，然而对话模式对他那个著名的"功能圈"来说具有重要作用。这一"轴心模式"，"这一简单但并不单一的图式……构成了建模控制论，它非常重要，没有了它则无法掌握语言的演变"（Sebeok，1994b：122），这种模式可以描述为一种既具对话性又具符号活动性的模式（参见 Krampen 的文章，收录于 Posner，Robering 与 Sebeok，1997—2004，1：252—253）。 150

从皮尔斯和莫里斯符号学来看，在"功能圈"中，"客观连接结构"所产生的解释对象变成解释结果（由信号配置表征于有机体中），再由解释项翻译成引发某一行为使之成为"连接结构"的行为意向。因此，在当前语境中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在上文描述的"功能圈"中，对话关系可以确立于被解释项（解释对象）和解释项（由另一解释项所解释，依此类推）之间，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而是与被解释项建立一种互动关系。

同样，"功能圈"在结构上具有对话性；此外，从严格意义上理解的交流对话本身可以在"功能圈"的语境中分析。换言之，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对话性交流关系可基于"功能圈"模式进行研究。从托尔·冯·乌克斯斯库尔介绍的"功能圈"（参见托尔·冯·乌克斯斯库尔的"生物符号学"一文，收录于 Posner，Robering 与 Sebeok，1997—2004，1：447—456；亦见托尔·冯·乌克斯斯库尔的"符号活动的种类"一文，收录于 Sebeok 与 Umiker-Sebeok，1992：455—470）所描述的过程来看，我们讨论的对话类型并非对应于信息符号活动、表意符号活动或表征符号活动，而是对应于交流符号活动。在解释项将被解释项解释为符号之前，对于需要从身份识别和应答性理解进行解释的人来说，被解释项已经是一种解释项反应。

3.1.6. 对话理性批判

然而，从所谓的"总体符号学"视角来看，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不仅仅是对自然和文化的不同领域中的分离主义和虚幻自治的批判（Sebeok，2001a）。

作为康德和马克思之后的文学和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巴赫金对"语言哲学"或"元语言学"的根本贡献是他的对话理性批判。巴赫金的符号概念及其多义性、对话性和多逻辑性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提出的是单边的、僵硬的、石化的对话概念；因此它的特征是假对话，最终是假辩证。巴赫金经常严厉批评"独白性辩证法"。在"1970—1971 年笔记"中，他从起源上描述了独白性辩证法是如何在话语的对话性中形成的： 151

> 我们从对话中消除了声音（不区分声音），消除了语调（个人的和情感的语调），将抽象的概念和判断从生动的词语和应答中剥离出来，把这一切塞进一个抽象的意识中，于是便得出了辩证法。（Bakhtin，1970—1971 年英译本：363）

巴赫金的对话理性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应分的责任，这是一种非规约性的责任，针对的是与我、与世界、与他人之间关系中的存在主义“建构”——换言之，它针对的是不可转让的责任形式。

巴赫金的“论行为哲学”一文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但直至 1986 年才以俄语出版（见 *Filosofija i sociologija nauki i tekhniki*：*Ezhegodnik 1984—1985*，1993 年英译本；参见 Bakhtin，1922a）；在该文中，巴赫金坚持他者参与的不可避免性；他者指的是具体的他者——并非从知识论意识所理解的抽象他者。自我在这个世界中占有一个特有的位置，并通过可应答性参与对其做出反应。可应答性参与也指对迫使我应答的他者的理解。行动的可应答性首先是对他者的可应答性；自我具有不可替代性，我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不可能放弃这种可应答性达到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的程度。只有“可应答向心性”才使得这成为可能；因而它变成“牺牲的向心性”。

人们可以尝试逃避这种应分的可应答性，但仅仅这种消除自己负担的尝试就足以证明这种可应答性的分量及其必须在场。巴赫金说，并非全部具有明确和专门应答性的确定性功能都可以消除个人的可应答性；它们只能“详细说明”它，即，它们会突显人们无限的、无保证的、应分的道德可应答性。离开了绝对可应答性，具体的可应答性便失去了意义，便成为随意的、技术性的可应答性。因此，在仅仅变成一个角色、行为、技术性能的表征时，作为“技术性活动”的具体可应答性就变得不真实，变成一种幻觉。

巴赫金将现代社会的危机描述为现代行动变成技术行动的危机；他从行为和具体动机与产品的分离（这导致空洞的意义）中识别出这种危机的起因。这种阐释与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语境下所提出的阐释相似，尤其与《欧洲科学与先验现象学的危机》（1954 年出版的遗著）中所作的解释相似。然而，不同于胡塞尔（对他来说理论至上主义仍然存在），在巴赫金那里，意义不是由目的性意识赋予的，不是由先验主体赋予的，而是由这个世界上应分的存在的独特性所表现的应答性行动赋予的。在巴赫金看来，生命哲学只能是道德哲学。

“论行为哲学”（Bakhtin，1993）陈述了巴赫金研究的前提，在该著作中，巴赫金评论了“第一哲学”或“道德哲学”的基础。巴赫金认为，“第一哲学”或“道德

哲学”主要研究存在的独特性和不可简约的他性。这种研究方法呼唤的不是“我”这个主体直接和客观的视角，而是间接和客体化的视角，(文学作品语言中形成的)“他者”的观点成为中心。这种研究方法还对巴赫金所说的“元语言学”(他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使用了这一术语)提供了解释：活生生的动态的语言现实无法通过直接的语词掌握，因而也无法通过语言学范畴掌握，那些语言学范畴是从具体的有音调的语词的内部对话性中抽象出来的。

3.2. 跨学科视角和解总体化方法

有些思想家从某一知识和经验领域开始自己的研究，而最终广泛涉足其他的、有时相去甚远的领域。这未必是因为他们希望发展一种完整的、终极性的、细密的、声称可以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然而，如果这是其目标，即：其目标是通过综合各种不同人类经验领域而形成一个终极性的、自治的完整体系，那么，所产生的完整体系大多仅仅是表面上的完整。

153

还有相反的情况：看起来是跨学科的体系事实上是集中于某一具体问题研究的结果。亦即，思想家就某一问题思考非常深刻，许多其他领域的人类知识和意识不可避免地发挥作用。在这里，跨学科包容性的产生并不通过主张完整体系的建立，而情况恰恰相反。换言之，跨学科包容性是通过避免整体化而获得，通过我们可称之为“解总体化方法”而获得，甚至通过研究某一单个问题而获得。这正是巴赫金的研究方法。

3.2.1. 从艺术批评的边界开始

巴赫金专门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他进行的研究不仅打破了文学研究内部的边界，而且打破了整个艺术话语研究的边界。他希望表明，很好地理解文学文本——其实是任何文本——需要从其内部跳出，要从该文本可能涉及的尽可能多的视角和学科去理解文本。换言之，巴赫金的研究方法是，文学文本最好通过“vnenakhodimost”(局外人)的概念去理解。

可能涉及的学科视角包括以下方面：有关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研究，这种研究在理论层面(普通符号学)上和关涉各种不同文化形式(例如民间传统、庆典、仪式、神话、祭仪)的更为具体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关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关系的心理和精神分析研究；有关社会阶层和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关历史与结构之间、遗传和形态研究方法之间联系的研究。虽然巴赫金将其研究方法具体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关涉所有人文学科，然而，巴赫金从来没有忘记他对文学话语这一特殊问题的特别兴趣。

的确，正如《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英译本 1978，署名为梅德韦杰夫）一书所描述的那样，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批评的主要焦点与他们对文学话语这一特殊性问题的处理有关。巴赫金还批评了这样一些学者：他们自欺欺人地相信，只要通过运用社会学方法和假马克思主义口号就可以达到形式主义者所设定的目标。

154

巴赫金从文学本身这一视角探讨文学写作问题。他涉足于文学领域之外并不意味着从非文学视角研究问题，正如他们没有主张过任何整体化研究。巴赫金始终是从文学视角研究问题的——他置身于文学内部。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进行了可以称之为反系统的、解总体化的批评研究，通过这种研究，他揭示了连接文学与文学外部的内部线索——他揭示了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外部相关联的结构互文性。根据巴赫金的观点，文学文本得以作为具有特殊性的文学文本而存在和发展，正是因为它参与了外部的宇宙（从伦理性意义上说也是如此）。

然而，巴赫金并非仅仅集中于文学研究。他也不仅仅是关注"文学"与"生命"（这是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 1928 年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之间的联系，或者是"艺术"与"生命"之间的联系［该问题的讨论详见他最早的论文"艺术与应答"（1919），英译本见 Bakhtin，1990］。相反，从他整个研究范围来看，巴赫金关注的是整个人文科学，而不仅仅是文学。

下面是对巴赫金所探讨的人文科学的概述，同时描述了他对每一种人文科学的态度，以及他对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取向的态度。在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所有的著作中，巴赫金都讨论了人文科学中的方法问题。

巴赫金所偏爱的人文科学，亦即他的文学理论中最常出现的人文科学，就是一般符号科学。此处我们选择不使用 semiotics（符号学）这个术语，是由于巴赫金对人们普遍接受的系统科学意义上的符号学——"结构符号学"，符号系统的研究——持批评态度。为了使他自己构想的符号科学研究方法有别于其他，巴赫金更喜欢"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参见署名沃洛希诺夫的 1929 年的那本书，其标题就包含这个术语，另见他作于 1959—1961 年关于文本问题的论文）。然而，我们如果参照皮尔斯的解释理论使用"符号学"这个术语（按照皮尔斯的解释理论，符号总是某一具体符号活动的一部分，符号活动是解释项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很容易发现，皮尔斯和巴赫金在符号概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毫无疑问，巴赫金主要关注的是言语符号的研究：这些符号毕竟是文学创作的材料，用巴赫金的话说，是"言语艺术"的材料。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品中提出的关于语言学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在该书中巴赫金批判了索绪尔语言学及其对俄国语言学的影响）、《形式主义方法》（1928）以及"论诗学与语言学的边界"（1930，见

155

Voloshinov，1980）。

在这些以及其他著作中，巴赫金通过与雅各布森、俄国形式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的学术对话，探讨了语言学对诗学文本的研究和理解所具有的潜在贡献。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Bakhtin，1963），巴赫金回归他的批评研究，为他的言语语言研究提出了“元语言学”这一术语。巴赫金使用这一术语的目的是提出一个超越于当时人们正常实践的语言学限度的研究方法，并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表述，从而集中于诸如对话主义、对话关系、话语的评价取向、隐含意义或省略推理法等等范畴。他在“长篇小说的话语”（Bakhtin，1934—1935）一文和收录于1975年和1979年文集的其他著作（现在已有英译本；参见Bakhtin，1981、1986、1990）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研究方法。

我们也不可低估巴赫金对心理分析的兴趣——更精确地说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这催生了1927年以俄语出版的、署名为沃洛希诺夫的著作《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这本书应该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阅读：当时正发生着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之间关系的重要辩论，同时巴赫金对心理学及其与符号科学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兴趣。他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把他引向列维·S. 维果茨基，巴赫金对其观点多数认同（特别有趣的是巴赫金1925年对意识问题的研究）。此外，《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有好几页篇幅探讨心理学与符号科学之间的关联。在《弗洛伊德主义》中，巴赫金阐发了他对弗洛伊德和无意识的兴趣，这些是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的一部分，即从“正式”和“非正式”意识形态的区分进行的研究。此处，巴赫金从主体没有意识到的社会意识形态阐释无意识。

巴赫金视意识形态理论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然而，他不仅把意识形态看作众多学科中的一门学科，而且还看作研究所有其他人文学科的一个视角，包括语言学、心理学、心理分析、一般符号科学或语言哲学、文学理论（见巴赫金在《形式主义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对包含俄国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显然，巴赫金的研究中另一重要人文学科是文化人类学——人种学、民俗学研究或更具普泛意义的文化学。这一特殊视角贯穿于他大部分研究工作之中：不妨考察一下他在狂欢化文学、怪诞身体符号、公众集市语言、小说话语起源等等方面的研究。 156

3.2.2. 符号与信号

关于一般符号理论，巴赫金的观点可根据他所作的符号与信号的区分来描述。基于此，巴赫金不仅反对反射学（当时很盛行），而且还反对以刺激—反应关系为基础的庸俗行为主义。他还批评了从识别过程视角解释符号的过于简化倾

向,只有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明确单一意义时才能从该视角解释信号。

正如现在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巴赫金对于符号简化为信号的批评——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一章、《形式主义方法》(使用了不同术语)和他其他一些著作中都有涉及——与他有关"意义"和"主题"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分不开的。

意义涉及符号的可重复、可再生的方面;它只需要解释项所作的识别或鉴别的努力。"主题"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涉及符号的创新方面;它指的是具体环境中给出的意义,因此需要解释者积极的或应答性的理解。

在巴赫金看来,符号的另一基本方面是其物质属性。符号要存在,就必须有一个主体,即一个具体的对象,它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所代表的东西,无论是一个物体还是一个思想。然而,符号的物质性不仅因为它的物理属性,还因为它(哪怕是所谓的自然符号)在历史传统、特定文化中具有其位置,并基于此而在客观上具有某一特定意义。这样的意义可以修饰,但只是作为需要对已经具有物质的、客观的、有抗力的、自治的自我存在的某物进行修饰所作努力的结果。这就是"符号物质性"的意义所在。

就语言学而言,巴赫金描绘了基于符码概念并将符号简约为信号的研究方法。巴赫金全部的研究是要说明:语言生命不能包含在语言体系(语言的规则系统)和言语或个人的言谈这两极之间。言语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其充分理解只有通过对话性符号活动来完成,这些符号活动将不同历史语言、构成某一历史语言的不同内部语言、不同文本、不同话语体裁、不同文学体裁、不同个人话语联系起来,将个人话语与他人话语联系起来,将构成某个个人话语的不同声音、不同内部话语联系起来。

157

巴赫金从这一事实之中识别了言语符号的特殊性:言语符号不具有符号之外的工具性功能(参见 Petrilli, 1986, 1990a)。从这一意义上说,言语符号是一种 par excellence (独特的) 符号。其表达力大于非言语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言语符号可以描述并包含非言语符号。言语符号可以履行元语言功能;它们有将言语符号本身作为讨论对象的特权。另一重要因素是,言语符号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尽管如此,非言语符号也可以表达意识形态意义。言语符号的这一特殊属性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言语符号是思想和意识的主要物质材料。

3.2.3. 关于意识形态

无意识也是由言语符号构成。这一点在巴赫金对弗洛伊德的解释中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此处巴赫金超前于雅克·拉康的心理分析解释。基于此,并由于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任何对立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如前所述,《弗洛伊德主义》提出了正式与非正式意识形态的区分,这

一区分在巴赫金对拉伯雷的解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除了代表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以外，在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也是意义重大的贡献。在该书中，他强调大众文化的自治和独创的特征，因而还有抵制官方文化、既定权利、统治秩序的抵抗能力——这种抵抗能力也许是被动的和无计划的。换言之，巴赫金根据传递意识形态的符号之间的冲突来追溯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发展。这样描绘的辩证关系也被赋予了物质性和客观性；因此，它独立于想要主宰或消除它的理性意志或期望。

巴赫金通过分析不同文化时期人们对拉伯雷的不同态度（他沿着类似于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和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批判思路阐发了他自己对启蒙主义的批判），通过重新审视文化历史——例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联系中，巴赫金关于康拉德·布尔达克的思想非常值得关注），对现代西方文化历史提出了新的阐释。 158

关于意识形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注意，虽然巴赫金回归马克思与恩格斯，但他赋予"意识形态"以不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术语的意义。对巴赫金来说，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虚假的意识或歪曲的思想。相反，它显示一种社会倾向，一项与某一特定群体或特定阶层相联系的社会工程。它可以很容易地从革新、革命、科学等意义上定位，正如同可以从阻碍、神秘、保守的意义上定位一样。巴赫金在他的著作中所明确提出的意识形态的唯一定义出现于"什么是语言"一文的一个脚注里（1930，署名为沃洛希诺夫）。我们将其引用如下，以显示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但我们无意将他对意识形态的分析的范围缩小至这一唯一定义："让我们将生活经验的整体——这些生活经验的整体反应和折射社会生活以及与它们有直接联系的外在表达——叫做生活意识形态。"（Voloshinov，1930，英译本：108）

关于社会科学，巴赫金对所谓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谓对社会学、语言学和文化科学的重要贡献（见 Marcellesi 等介绍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的语言理论，1978）。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从统治着前苏联理论界的机械主义思潮中判明了自己的方向，先于安东尼奥·葛兰西、费鲁齐奥·罗瑟—兰迪和雷蒙·威廉斯等思想家，早在 1929 年就指出，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若是与符号的中介作用分离则不可能得到辩证的解释。言语与非言语符号在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跟那些试图根据孤立的结构与上层建筑等范畴来界定语言的构想相反，巴赫金相信，这一马克思主义隐喻唯有置于有关普遍的语言与符号的研究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

3.2.4. 无意识与意识形态

根据巴赫金(参见 Voloshinov,1927):弗洛伊德从性和年龄概念入手,扩展和丰富了人性的自然主义视域,对此进行了令人敬佩的尝试;然而,弗洛伊德没有 159 完全把自己从他自己的生物主义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针对生物主义倾向,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都认为,人和生物个体并不是一回事: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人只是一个抽象物。联系到这一点,我们应该记得,《弗洛伊德主义》中的题词来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个论题。奇怪的是,这一题词在这两本书的英译本中都未出现。其内容如下:"人的本质不是每个个体内在的抽象物。人的真正性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使用了格·V.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这一引言论题的译本;因此,我们还必须注意,"Menschlichen Wesen"这个表述被不准确地译成了"人的本质"而不是"人类的本质"(关于马克思的《提纲》的翻译,参见 Schaff,1974)。

在我们阅读《弗洛伊德主义》时,引起我们注意的倒不是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和实践的评价。在这方面,可以考虑布鲁斯的书的 1976 年和 1987 年两个英译本收录的两篇有趣的论文(参见 Ponzio,1992a:115—145)。尽管如此,我们考虑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弗洛伊德的批判时必须牢记出版日期。巴赫金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主要在于弗洛伊德对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在个人心理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缺乏关注;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在巴赫金的《弗洛伊德主义》出版之后的弗洛伊德自己的作品中,弗洛伊德对这些方面都作了探讨;《弗洛伊德主义》其实是"在社会性的彼岸"(Bakhtin,1925;见 Voloshinov,1980)的扩展版,巴赫金撰写此文时弗洛伊德很多主要作品都还没有发表。

澄清这一点之后,我们需要注意,巴赫金在后来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在这一较早的书里就提到了。《弗洛伊德主义》提出了分析心理的语言—符号视角。这不可避免地涉及从言语语言和言语符号角度,从意识与意识形态关系角度,对心理生活进行描述。正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在建构关于语言、意识形态与意识相互关系的话语理论时,重点关注"语词"、"表述"、"语言"和"言语反应"("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等范畴。

内部言语未必在外部言语中找到表达形式;即使这样,内部言语也不比外部 160 言语更缺少物质性。事实上,言语语言并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互动与互相理解的表达形式。它在意识中也是可识别的;的确,没有了语词和内部语言,我们将永远无法意识到任何东西。此外,鉴于言语反应是纯粹的社会形成物,而不是某些人声称的中性之物,我们应该注意到心理和意识语言都是意识形态的。

《弗洛伊德主义》第九章,"作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内容",专门探讨了意识、意

识形态和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里，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特别说明，无意识就像意识生活一样，必然地存在于言语符号之中。因此，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不是在无意识与意识之间进行截然的区分，而是认为它们应该被看作意识生活的语言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因而提出了“非正式意识”与“正式意识”等术语以取代之。“行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被用来指代渗透到人类行为之中的正式与非正式意识形态、内部与外部言语。相对于被接受的、正式的意识形态来说，非正式意识形态与所有那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具有他性的东西有关；它关涉所有那些矛盾的方面；它包括诸如梦、神话、笑话、妙语以及病理学构成词的所有言语成分等人类表达形式。主导意识形态与内部言语之间的距离越小，内部言语就越容易转变为外部言语。正式意识与非正式意识之间的差异越大，内部言语就越难以转变为外部言语，就统治系统和主导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来说，他性、相对性和分解的程度就越大。

当转变成外部言语之后，内部意识在形成中就更趋于清晰和精准。相反，当内部言语因为非正式意识与正式意识之间的差异而难以转变为外部言语时，内部言语在言语层面上的动机会下降，往往会被排除在言语化行为域之外，因而被排除在人类特有的行为之外。然而，也有一些情况下，与正式意识相抵牾的倾向未必会将自己转变为模糊的内部言语，并有完全从社交语境中消失的危险。对立的力量事实上也许会介入到反对正式意识形态的正面斗争之中，甚至于产生一种在某种程度上非正统的意识形态。

161

意识和意识形态有不同层次，不过没有原则性区别：区别由详尽阐释意识内容的程度决定——由运用社会材料和工具（符号材料和工具）的不同能力来决定。个人心理的内容和整个文化的内容都属于同一个生成过程；个人意识的生产结构和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的生产结构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不同层次的意识与意识形态对应于不同层次的符号阐释和言语阐释。因此，《弗洛伊德主义》中有这样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出的、用以研究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复杂意识形态结构，也可以用来研究初级的符号表达形式和更低层次的个体意识。

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的意识—无意识的概念必须和巴赫金当时提出的、并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中阐述的符号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巴赫金的符号模式并非基于能指与所指的二分原则，也非基于符号系统与表述（语言 / 言语）的二分原则。相反，它基于解释者的反应——解释项；因此，解释绝不是简单地识别前一个符号，而是一种应答性理解的行为。这一研究方法暗示了符号之间基于相互异他性的具体对话关系的存在。符号活动或符号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生生的关系而生成——当然不是构成符号系统的符号之间的抽象关系。这一描述尽管或许很简单，但从中应该可以明显地看出，巴赫金的符号模式与皮尔斯的

非常类似。事实上，巴赫金的积极或应答性理解的概念可以很容易地与皮尔斯的“动态解释项”联系起来（参见 Ponzio，1984）。如同皮尔斯一样，巴赫金认为，人就是符号（参见 Sebeok，1986；Ponzio，1990a）；的确，人类的意识—无意识包含了符号—意识形态材料——主要是对话结构的言语材料。

3.2.5. 价值问题

巴赫金的研究方法和他关于人文科学的多元兴趣最终与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巴赫金最直接关心的问题是美学或艺术价值，特别是文学价值。然而，由于他是在他性和外位性范畴中识别美学价值，他必定也要涉及其他类型的价值。

162

此处尤其重要的是巴赫金从伦理学视角对价值的处理。他在 1919 年的论文中就已经将“艺术”与“应答”之间的关系理论化了，此文标题中就包含了这些术语。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或美学价值的来源是他者范畴而不是自我——巴赫金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20—1923）一文中也提出了这样的主张——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艺术价值必然包括围绕他性问题的伦理秩序问题。文学是对价值及其在人际关系中的功能进行实验的场所；事实上，文学写作可以用作价值的试验场，可以让价值超越社会规约的限制。

这一方法还涉及对语词对话性的实验。尤其当我们考察诸如小说这样的体裁时，文学语言提供了在日常语言有限范围之外研究对话性的可能。巴赫金恢复了美学价值与语言价值之间的联系、美学价值与人的价值之间的联系，这种考虑不仅基于身份，而且也基于他性。

巴赫金在其符号与意识形态理论的语境下，提出了人、自我、无意识与有意识的理论。与那些将主体看作完整的身份（这是一种与自我一致的身份，它无法作任何形式的批判，无法与现行的话语秩序保持距离）的理论倾向相反，巴赫金将他性、外位性等价值置于身份的核心地位。换言之，从巴赫金视角看，他性、对话性、辩证法、复调、多语、多义、歧义等等，都是作为人（实际上是所有的身份，包括“单个”自我的身份）的主体赖以建构起来的价值。在这一方面，除了已经提及的巴赫金著作以外，参见巴赫金自己为《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写的前言。（另见 Ponzio 在 1992 年发表的关于巴赫金的专著，尤其是其中 181—188 页，这是他 1980 年专著的修订扩展版。另见 Ponzio，1997a；Petrilli，1990c、1993b；有关符号学方面的自我概念，见 Sebeok，Petrilli 与 Ponzio，2001。）

巴赫金所描述的语言价值比语言学家们所描述的要丰富得多，也更复杂得多。他对语言价值的分析不仅局限于语言要素之间、音位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横组合轴的语词与纵聚合轴的语词之间的关系。巴赫金认为，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语言价值还涉及话语的对话物质性。换言之，语言价值与对话价值一致，因此

163

可以根据语词的对话能力来计量。这里所涉及的术语是对话：然而，不是形式上的、表面意义上的对话（正如参与对话的两个说话人之间的言语交流），而是那种甚至可以在单个的人、单个的表述的声音中表现出来的实质性对话。巴赫金通过这些概念将语言学常规性的制约抛在身后，从而进入到他称之为“元语言学”的领域。

巴赫金指的不是语言学边界在量上的增加，而是质的飞跃、价值的变化：他以他性取代身份。这只涉及在话语的内部对话关系中，在不同语篇、不同历史语言、不同话语体裁等等之间的对话关系中，识别语言价值。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对话价值来理解的语言价值，如果根据他性逻辑将其置于高层次的对话、外位性和置换之中，最终会转化为美学价值。

从这一视角来看，美学价值与认知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认知价值也可以对话性来计量，从最高程度的对话性到最高程度的独白性变动不等。然而，认知话语基于自我范畴，因而基于话语主体的识别，认知话语以某一特定的主题、方案、结论为导向，鉴于此，它不可能达到美学话语同样程度的开放性和他性（尽管它具有革新和革命的认知能力）。

虽然如此，正如巴赫金在他不同阶段的研究中所强调的那样，认知过程也需要他性范畴。例如，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他阐述了官方文化向非官方文化、民间狂欢文化、怪诞身体等开放的重要性；这正是促成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代现代科学知识增长的原因。

这一点在巴赫金后期的作品（尤其是在1970—1971年笔记）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从对话的视角看，艺术实验超越了科学实验，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的某些方面的理解（如巴赫金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时所说）——关于人与他人、与自然互动体验的理解——这一切在独白性框架下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他自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中，巴赫金一向关注价值问题。此外，由于他的跨学科视角以及他对价值之于人的意义的专注，他有关价值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任何一门人文学科。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和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关于洛特曼，见 Bakhtin，1970—1971，英译本：135；Bakhtin，1974，英译本：155，169），巴赫金的研究在处理关系中的价值问题时不是运用封闭的系统——语言符码，langue（语言系统），所谓的“诗学语言”，或者甚至于整个文化系统（这里须注意，对于巴赫金来说，其主要问题也是言语符号、文学和文化文本中的特征和价值）。巴赫金的视角总是对话性的：语际性、互文性、跨文化性。这就是为什么巴赫金没有将其价值研究局限于单一人文学科的界限之内，而是考察价值对于人的普遍意义，它构成人文学科划分的基础。

3.2.6. 对话方法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巴赫金在其整个研究中都运用了同样的方法；即，他通过具有置换和开放特征而不是合并和封闭特征的程序将不同（有时相去甚远）的领域和研究对象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性，它恢复了与对话的联系（对于辩证法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种对话性的 / 辩证的方法——即本章开头我们称之为“解总体化”的方法。

我们注意到，巴赫金在 linguistics（语言学）一词前面加上前缀 meta-（元）来描述他对（言语）语言的研究方法（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事实上，我们可以将这一前缀加在他研究的所有学科名称之前，巴赫金本人将他的研究明确描述为“哲学研究”——一种针对可能性条件的批评研究。

价值必然通过符号来表达，这一事实使得巴赫金对总的符号科学或符号学发生了兴趣。他设计的解总体化方法使得他能够将他关于符号和价值的研究超越任何单一学科的边界；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行激进的批评，旨在指导实践。在有关生成符号和价值并进行传播的辩证 / 对话过程的研究中，巴赫金实际上反对将这二者具体化的倾向。

生平简介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1895 年生于奥勒尔—1975 年卒于莫斯科）是一位俄国哲学家。他于 1920 年在维捷布斯克认识了梅德韦杰夫（Pavel N. Medvedev，1891—1938）和沃洛希诺夫（Valentin N. Voloshinov，1884/1885—1936），跟他们结下了合作性友谊。他们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组建了“巴赫金小组”。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于 1929 年在列宁格勒出版。在这之后是长时期的沉默，直至 1963 年其扩展版才问世（英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4）。在斯大林政府统治时期，巴赫金被驱逐出官方文化，并被流放至库斯塔奈。在 1965 年，他出版了《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英译本，1968）。1975 年巴赫金作品集首次以俄语出版，1979 年其另一作品集也成功出版。之后他未发表的著作以及他和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已发表作品的新版本相继问世。自那以后，很多不同视角的专著探讨了他的思想体系。这些专著包括 Ponzio（1980）、Todorov（1981）、Ponzio（1981）、Clark 与 Holquist（1984）、Holquist（1990）、Morson（1990）、Ponzio（1992a、1994a、1997a）、Emerson（1997）等。

第四章
关于莫里斯

4.1. 行为主义符号学与实用主义符号学

查尔斯·W. 莫里斯所构想的符号学（参见第153页生平简介）——实际上他将这个术语写作“semiotic”——提出了符号的一般描述，包含属于生命世界的一切。他旨在用自己的方法解释一切种类的符号。为此，他从生物学语言的角度构建了自己的符号学术语；这点在他的《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莫里斯为他的符号理论选择生物学框架，这也引导了费鲁齐奥·罗瑟—兰迪——他最敏锐的解释者之一（他于1953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莫里斯的专著），从行为主义生物心理学的角度来描述他的研究。

4.1.1. 间接说明

莫里斯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他对生物学的兴趣产生于他开始研究符号或者象征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早在他写博士论文《象征主义与现实》（*Symbolism and Reality*，1925年写成，1993年才出版，1981年出版过德语版）的时候，“象征性”与“生物学”就已经是他关注的焦点。在论文中名为“一些心理学与生物学结果”的一章和他的《思维的六个理论》一书“前言”中，莫里斯已经表明，他打算基于思维与象征过程相趋同的观念来发展象征主义的一般理论。

莫里斯将符号学描述为一门“行为的科学”。这个术语并不是指被称为“行为主义”的哲学—心理学趋势，而是指一门“科学”——有待发展的学科，一个“领域”（借用他自己的话）。莫里斯的立场受到乔治·H. 米德、爱德华·托尔曼、克拉克·L. 赫尔、奥图·纽拉特的深刻影响。他从纽拉特那里活用了“行为学”术语。与那些将通过研究老鼠而发展的心理学原则运用于人类的行为主义者（莫里斯的一个评论者如此批评道）不同的是，这些学者所努力的方向是朝着一个行为的一般理论——或者用莫里斯所偏好的术语，“行为学”——既能够描述人和老鼠的

167

行为，同时又能解释它们的差别。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也对莫里斯符号学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在《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与科学经验主义》（1937）以及“科学经验主义”（录入《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1938）与“皮尔斯、米德与实用主义”（录入《哲学评论》，1938）中表现得很明显。同样在1938年，他出版了《符号理论的基础》，是为符号科学的奠基之作。在“皮尔斯、米德与实用主义”中，莫里斯坚持认为在皮尔斯与米德、或者前者原创的实用主义与后者较近的实用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他在《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运动》（*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1970）中也提到了这些问题。

在《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一书中，莫里斯发展并巩固了生物学、行为主义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求助于生物学来创造符号学的术语并不意味着消极意义上的“生物主义”。在他的作品中，莫里斯从未倾向于约减主义，也就是说，他从未屈服于将话语的多元世界约减为一元的诱惑（在这个语境中，一元的生物学话语），也从未表示过形而上的想象或存在的自然幻觉，而忽视符号活动的历史—社会维度。在这方面，莫里斯将自己与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新实证主义者的公开的物理主义拉开了距离。

莫里斯发展了实用主义的意义概念，这引导着他关注符号，也关注价值。他的《生命之路》（*Paths of Life*）出版于1942年，《开放的自我》（*The Open Self*）出版于1948年。这些作品都关注人类的偏好行为，描述了不同文化中的“重大选择”。在《人类价值的种类》（*Varieties of Human Value*，1956）一书中，莫里斯集结了他关于价值的实验研究的成果。在《意谓和意义：关于符号与价值关系的研究》（1964）中，他继续研究价值，与他的符号研究相关联，也巩固了符号学与价值学之间的联系。英文术语meaning指的不仅是符号的语义维度（意谓，signification），也指它们的评估维度（意义，significance）：“某物的所指和所指的价值或意旨。”（1964：vii）这本书确定了莫里斯将符号学视为“跨学科事业”的研究方法（同上：1），其关注符号的所有形式和表现，关系到人类与非人类，正常符号与病理符号，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个人符号与社会符号。

168

4.1.2. 莫里斯与皮尔斯

当我们将莫里斯的方法与皮尔斯的方法做比较时，他的行为学和生物学导向就变得更加清晰。皮尔斯为我们呈现的意指问题，在研究符号学时无法被搁置一旁，这就需要能更精准地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首先，必须提到术语的问题：莫里斯反对不确定和模糊的术语（比如，心灵主义的术语），赞成来自于生物科学的术语，它们客观地研究人类生命和非人类动物生命的行为。这里，莫里斯正回归皮尔斯，

但同时也意欲超越。

在《符号的符号的符号》(1948b)中，莫里斯解释了他与皮尔斯的关系。他宣称《符号、语言与行为》中采用的立场并不源于皮尔斯。他的符号研究观点选取自源于米德的“行为学”，后者在1922年出版过《意指象征的行为学解释》。从这个视角来看，《符号、语言与行为》可以被视为米德《思维、自我与社会》的一个发展：“我从未听说米德在讲座或谈话中提到过皮尔斯。也仅仅是在后来，我才真正地研究皮尔斯，奥格登与理查兹，罗素，卡尔纳普，还有后来的托尔曼以及赫尔。所有这些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符号、语言与行为》的创作。”(1948b，见1971：445)

同时，在他1946年出版的书中，莫里斯的确写到了皮尔斯。他基本上接着上文写道：

>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觉得《符号、语言与行为》的指向上的立场并非来自于皮尔斯，这事实上是对他的符号学方法的“坚决贯彻的尝试”。(同上：445)

169

在《符号、语言与行为》的附录“符号活动的一些现代分析”(1946，见1971：335—340)中，莫里斯提供了一个有关皮尔斯为符号学所作贡献的有趣段落。他首先评论了皮尔斯明确地将符号活动与包含中介或“第三性”的过程相联系；他常将二者等同。另外，除了将符号活动与中介过程相联系之外，皮尔斯还明确地将符号活动与心理过程相联系，二者实际上趋同。从这个视角看，基于刺激与反应二元关系的行为主义与皮尔斯的三元模式是有距离的，除非刺激—反应关系也由带有“强化”功能的第三个因素作为中介。

莫里斯从广泛的中介过程中寻找符号活动；同时，他确定中介过程不总是包含符号。那时的主张是符号活动是中介过程，其中的中介因素是一个解释项，但是莫里斯认为这个描述是有限制性的。在我们看来，莫里斯视为“限制”的东西与皮尔斯自己的视角完全一致(同上：338)。

同样，关于皮尔斯的符号学，莫里斯想要表明的是符号活动——与心理过程相同，因为在皮尔斯的概念宇宙中，符号活动与思维重合——并不局限于行为的情形。实际上，皮尔斯提出(CP 4.551)“思想”以及符号活动，“不一定关系到大脑。它出现在蜜蜂，水晶和整个纯粹物质世界”。这个论断使得莫里斯将皮尔斯的方法描述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范例。

而且事实上，莫里斯认为皮尔斯从思维的角度定义符号是他的方法的另一个局限。比如皮尔斯曾说：“符号是代表项，它的某个解释项是思维的认知。”(CP

2.242）皮尔斯没有加上标准，来确定思维或思想何时参与进来，这是确定某物是否为符号的一个标准。而且，尽管皮尔斯声称"每个思想都是一个符号"（CP 5.253），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也声称，思考在没有可作为符号的某物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符号是使之成为思考的工具（CP 5.283）。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莫里斯反对了皮尔斯将符号——所有符号——定义为引发其他符号。符号产生新的符号不能被作为一个定义标准，因为这包含了一种循环，即符号被定义为产生符号的某物，它又产生另一个符号，并不断重复下去。莫里斯评论道："符号，至少在人类的层面，确实常常产生一系列的符号活动，但是我看不到任何理由证明这个关于符号的事实应该被加到'符号'本身的定义中。"（1946，见 1971：339）

170

皮尔斯最让莫里斯感兴趣的地方，除了他所说的皮尔斯的心灵主义局限之外，是对行为的重要性的强调。皮尔斯主张，为确定一个符号的意义，我们必须找到它所产生的行为的习惯。莫里斯希望皮尔斯的这一主张能在自己的符号理论中有所发展。根据莫里斯所说，皮尔斯反对笛卡尔式心灵主义、将它替换为"行为的习惯"的概念，这是英明的，尽管他也在自己的理论中大谈心灵主义。莫里斯认为，通过这样做，皮尔斯将符号导向了一个更加充分的符号活动描述。

莫里斯也赞扬皮尔斯拒绝将人类符号活动和动物符号活动之间做出区分。

莫里斯从皮尔斯对符号研究的贡献中吸取了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没有必要为了达成符号学的重要目标而将一个理论归属到确定的心理学或者哲学行为趋向。其次，符号不需要基于心灵主义来获得作为科学的地位；相反，它要基于行为学，一种行为的一般科学，它包含符号行为。

4.1.3. 回到皮尔斯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莫里斯反对那些不欣赏他从事和延续皮尔斯研究的批评者的决心。比如，这个决心就表现在他对亚瑟·本特利的回复中。后者通过杜威对《符号理论的基础》的批评来关注莫里斯与皮尔斯的关系。

杜威特别提到莫里斯对"解释者"和"解释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他批评莫里斯"倒置了皮尔斯的立场"（1948b，参见 1971：445）。在《符号的符号的符号》中，莫里斯通过回顾他 1946 年的书回应说道，尽管这本书并不是取材自皮尔斯，但它实际上是对后者"符号学方法"的"坚决贯彻的尝试"（同上）。此外，在他给亚瑟·本特利的回复中，莫里斯也趁机回应了杜威的批评。

在莫里斯看来，杜威没有抓住皮尔斯在"解释者"与"解释项"这两个概念之间所建立的紧密关联。事实上，杜威分析符号如何运作时，他（至少在他批评莫里斯伪造皮尔斯之时）将符号—解释项的关系与符号—解释的关系以及解释者

171

的角色（我们知道，在莫里斯看来是生物体）分开考虑。但是，符号没有解释项便不存在；没有解释者也不存在，因为解释项是符号对解释者的效果。事实上，因为解释者如果不是解释项开放链中的一个变异的话便不存在，解释者也是一个解释项，而且也就是一个符号。在《四种缺陷的一些后果》（1868b）中，皮尔斯主张人与符号，解释者与解释项，相一致。同样，这些术语指向符号活动的不同方面；因此，他们相一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一组中的两个术语中的某一个可以被去掉（参见 CP 5.264—5.317）。

莫里斯指出皮尔斯赋予“解释项”以不同的意义，是这个讨论中的另一个有趣点。皮尔斯实际上区分出了“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逻辑最终解释项”。而杜威对莫里斯的批评源于他对皮尔斯的解释项的误解，尽管莫里斯通过引入指称物（《基础》中的所指物）这个概念来努力减少该术语的模糊性。杜威用的“解释项”和莫里斯的指称物的意义一样，他没有意识到莫里斯的“解释项”指的是符号对解释者的效果。莫里斯也指出，在其他情况下，杜威自己也强调了符号概念的这个方面；这里，他引用了《逻辑》中杜威讲述的以某种相对于符号的方式行动的预备倾向。

莫里斯致力于澄清他与皮尔斯的关系，对应于杜威和本特利所提出的论题，这说明这个关系以及皮尔斯符号学与他自己的符号之间的连贯性对他来说有多重要。我们甚至能假设，莫里斯决定符号需要生物学的基础，是为了再强化这种连贯性。不管怎么说，除了皮尔斯理论中被莫里斯视为心灵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面之外，莫里斯的行为学与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之间谈不上有实质的区别。

4.1.4. 从科学经验主义往前

莫里斯将实用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相结合，得出了他称为科学经验主义的学说。起初，这是由逻辑实证主义推动来发展统一科学的项目的一部分。从这个视 172 角出发，在米德的影响下，莫里斯渐渐概括并发展出了他的行为学。他的《思维的六个理论》（1932）帮助我们理解了他在形成自己观点之时的与美国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本书综览了美国哲学中的种种趋势，包含了对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思想背景下实用主义的讨论。在这方面，莫里斯的《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与科学经验主义》（1937）同样也有帮助。

莫里斯在 1938 年（见上文）的作品讨论了皮尔斯原创的实用主义和米德版本的关系。这里，他指出二者有着以下共同点：皮尔斯和米德都重视符号的理论；二者都接受思想与符号活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都认为最终性、偶然与创造性在思维—世界的关系中很重要。同时，莫里斯指出了这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皮尔斯采用了他称为形而上学的方法，而米德的方法则被描

述为语境与场景方法。

这里我们不关心莫里斯对皮尔斯的理解，但是我们确实希望强调，莫里斯接受了米德的行为主义（或实用主义），发现了后者的实用主义方法与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似乎莫里斯的行为主义（莫里斯渐渐将其与科学统一运动所构建的物质主义命题区分开来）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主义，基本与皮尔斯而不是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相一致（尽管莫里斯在 1942 年的一篇文章《今天的威廉·詹姆斯》中发现了詹姆斯对自己的影响）。

莫里斯对物质主义的教条论和简化论持批判态度，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莫里斯行为学的生物学基础对于他这种批判态度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他的生物学方法使得他决定了符号活动的边界，扩展到并包括了生物界。

4.1.5. 莫里斯的行为学

现在我们能够强调符号活动的某些可能的重要方面，再预提一些看法。莫里斯在《符号、语言与行为》中开篇写道，他“相信”“符号科学”必须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以及“行为科学的框架内”（1946，参见 1971：80）。但是，他在《基础》中已经使用了“行为学”的术语，声称符号的问题是“从行为学的角度”构造的，并提出重要的一点，“符号定义的这种理解没有必要”。他解释道：

173

> 它在这里被采用，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观点已经以某种形式（尽管不是华生式行为主义）在心理学家中广泛传播，而且还因为符号学发展史所表明的许多困境似乎是因为符号学在大多数时期都是与官能和内省心理学联系在一起的。[1971（1938）：21]

在莫里斯的观念中，符号科学与行为学相互暗示。在他看来，基于生物学的符号科学能够在行为科学里找到一席之地；但在同时，行为学还未充分发展以达到他的目标。然而，假定符号与行为互相关联，那么行为科学或行为学实际上能通过符号科学而获得发展（1946，参见 1971：367）。

观察的概念在定义符号条件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观察”，“观察的”和“可观察的”指能被看到、摸到、听到和闻到的一切——能通过感官被感知的一切，无论是直接感知还是通过某种工具性延伸而感知。这样的一个符号行为的条件——观察——形成了莫里斯在《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中提出的符号概念的界限（或定界）。

此外，关于符号活动过程，莫里斯选择了生物体作为行为的主体和解释者。“生物体”的意思是拥有“肌肉和腺体”（在“回应”和“反应”的区分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的整个生物，而不只是某生物的一个部分（比如细胞）。但是，我们从托马斯·A. 西比奥克那里了解到，行为的主体和符号活动过程的解释者“可能只是某生物的一部分”，甚至是在微生物的层面（不是莫里斯说的“肌肉和腺体”；参见西比奥克《符号活动的进化》，Posner 等，1997—2004，1：437）。尽管有这样一个重要区别，西比奥克在他 1997 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莫里斯时，他将符号活动定义为“符号的过程，即，在此过程中，某物对某生物是符号”，尽管他将生物体的概念扩展到了在整个生物形成之前，理由是生命在符号链中某个早得多的点上产生。莫里斯将符号活动扩展到了超出人类文化的领域，尽管还未包括微生物学，也未包括近期突飞猛进的分子符号学。尽管有着这些局限，不变的事实是莫里斯在生物符号学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一般符号学。 174

同样还要注意，“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区别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从这个视角来看，罗瑟—兰迪关于《符号、语言与行为》的细致分析就很有用。这就意味着有些操作能够从整体和结构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实际上，这时解释型操作开始起作用。西比奥克正确地提出，仅仅是随着生命的开始——具体到人类则是指该物种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水平——由自身组成部分和结构而决定的非生物现实才清晰地出现。换句话说，我们称作非生物现实、物质现实的东西，预设了生物现实，即符号活动。在这点上，西比奥克与维勒达成一致，后者宣称“只有通过［生命的］代理，才有可能构建存在的宇宙，即我们所说的现实”（同上）。

罗瑟—兰迪指出，整体—局部的区分关系到确定的场景与确定的操作。这个区分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看到。比如，某生物一般被视为一个整体，其成员与器官则被视为局部；对比而言，书架上的书一般却不会被看作是该书架构成的整体的局部。因此，整体—局部的区分随着完成某操作所需的条件而变化［参见 Rossi-Landi，1975c（1953）：65］。

当今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包含了莫里斯未能预见的整体—局部区分。与莫里斯一致的是，符号科学的生物学基础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最新进展的基础之上。所以，重要的一点是，符号学这个特殊领域中的研究者要和生物学以及其他科学保持与时俱进。西比奥克本人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莫里斯的功劳：如前文所述，从其理论构思的早期阶段开始，他就已经接触了生物学，而且，他也十分重视生物学对充分理解哲学和符号学的核心作用。 175

4.2. 符号学与生物学

将莫里斯借用生物学的语言纳入考虑，对于我们充分理解他的符号理论很重

要。他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为讨论符号发展一个恰当的语言工具——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符号［参见 1971（1946）：75］。这个方法使得他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人类符号学”视角，且这个视角和一般符号学常常被混为一谈。同时，对比美国结构主义者（首先参考 B. F. 斯金纳），莫里斯并未将自己局限于运用通过观察非人类动物的行为而发展的术语来解释人类行为。相反，他是将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符号。他的视角明显是“生物符号学”的，包含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动物符号学”和“人类符号学”（尽管这些术语并非是莫里斯的），而这二者都基于生物符号学。

4. 2. 1. 标准，而非定义

莫里斯所讨论的生物明显处在宏观生物的层面，即带有“肌肉和腺体”的生物。因此，他就将微生物排除在他的理论框架之外。在我们将此对比西比奥克的符号学视角时——他主张符号活动与生命重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莫里斯是这样描绘符号活动/生命的关系的：没有生命，符号活动不可想象（即，有符号活动的地方就有生命），但没有符号活动，生命是可以想象的（即有生命的地方不一定有符号活动），因为“生命”既包含又超越了符号活动。没有生命，符号活动不可想象，但“符号活动”并不一定耗用生命；因此，没有符号活动的生命可以想象。“反应”与“回应”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呈现了符号活动领域的定界，它不是由任何一种“反应”组成，而是由作为肌肉或腺体反应的“回应”组成。

176

《符号、语言与行为》借用生物学和物理科学中的未分析的术语，如“生物”、“反应”、“肌肉”、“腺体”、“感官”、“需要”、“能量”，等等。这些术语和选自日常语言中的其他未分析的术语相结合，如“行为”、“条件”、“原因”、“影响”和“场景”，来分析（完整或部分地）用于符号学的术语，被分析的术语。

关于它们的解释，还缺乏一般的共识。而且，莫里斯在《符号、语言与行为》中定义的其他术语还包括：除了“刺激”和“回应”之外，还有“预备刺激”、“回应倾向”、“回应—序列”和“行为—族类”这四种表达。莫里斯通过这些术语构建了他的符号学术语，与其借自生物学的未定义术语相结合。关键术语“符号”只是部分被分析，并无定义（1948b，见 1971：436）。他定义过的一些术语有“解释者”、“解释项”、“指称物”、“所指物”、“指称”、“意指”、“符号—工具”、“符号—族类”、“信号的”、“象征”、“语符”、“归属者”、“指称者”、“鉴定者”、“规定者”和“设计者”。

这是莫里斯在《符号、语言与行为》中所呈现的术语结构。他声称他的方法在科学上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他明显指出了其获得未定义术语的话语领域。同时，他认识到了其提出的定义的局限和对等物；他的目的是要建立证实或驳斥这些术语的条件。

莫里斯为根据以下概念确定符号创立了标准(此处,他坚持说“标准”,而非分析符号时的“定义”)。在描述某物作为符号存在的充要条件时,莫里斯并没有表示“当且仅当所定条件符合之时某物才是符号,而仅仅是当这些条件符合时,那么符合条件的任何事物都是符号”[1971(1946):89]。而且,他也允许其他判定符号条件的可能性的存在。事实上,将符号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倾向于不谈定义:“不给出符号的一般定义似乎比较明智。”(同上:238)莫里斯不提供符号定义,而是将自己限定于描述某物作为符号的充分条件[同上:85—89;nG,96—99;亦见 Rossi-Landi,1975c(1953):58 及 n8]。所谈的概念如下(Morris,1946,in 1971): 177

刺激:“作用于生物感受器的人和物质能量。”(367)

刺激物:“刺激的源头。”(同上)

预备刺激:“影响回应其他刺激的刺激。”(365)这里,莫里斯也区分了“回应”与“反应”:“预备刺激必然在刺激时导致该刺激的生物的反应,但是这个反应不需要是回应(肌肉或腺体的活动)。”(同上)

回应:“肌肉或腺体的人和活动。因而就有任何生物的非回应的反应。”(同上)

回应倾向:“生物在某个确定的时间状态,在某些附加条件下,某个确定的回应会发生。”(361)

回应序列:“任何连续回应的序列,其中第一个部分由刺激物激发,最后一个部分是对这个作为目标物的刺激物的回应。”(366)

目标物:“部分或完全去除激发回应序列的生物状态(需要)的物体。”(362)

行为族类:“任何一组回应序列,它们由相似的刺激物激发,并终止于作为相似需要的目标物的物体。”(360)

基于这些明显的生物学概念,莫里斯构建了下面两个“定义”(这样的不恰当说法是为了方便需要)——一个初步定义和另一个更加精准的定义——所定义对象是“至少一组某物可被称为符号的条件”(84):

(1)“某物 A 控制朝向某一目的的行为,某物 B 控制在所观察到的情形下有关该目的的行为,如果 A 与 B 的控制方式相似(不一定相同),那么 A 就是一个符号。”(同上) 178

(2)“任何一个事物,A,是一个预备刺激,它在激发某个行为族群的回

应序列的刺激物不存在的情况下导致某些生物对此行为族群的回应序列在某种条件下做出回应的趋向，那么 A 就是一个符号。”（87）

因此，在构建其用于谈论符号的术语工具时，莫里斯转向了生物学语言。换句话说，生物学在术语的层面占据了莫里斯符号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位置。

4.2.2. 谈论符号的生物学术语

莫里斯在《符号、语言与行为》中提到的第一个理论家是皮尔斯，并在确定“符号”意义的时候采用了他的观点。莫里斯转引皮尔斯的话道：“我们只要确定它所产生的习惯。”（同上）莫里斯说道：“符号因此可以从它们导致解释者的行为的倾向角度来描述和区分。”（同上）

在《符号、语言与行为》的术语表中，莫里斯提供了“回应倾向”的定义：“生物在某个确定的时间状态，在某些附加条件下，某个确定的回应会发生。”（同上：361）“生物”的定义并没有提供，尽管莫里斯将此术语用于所有生命体以保持他宽广的符号学视角。但是他定义了“回应”：“肌肉或腺体的人和活动。因而就有任何生物的非回应的反应。”（同上：365）回应倾向由“刺激”激发，即“作用于生物感受器的人和物质能量”。莫里斯继续明确地区分了“反应”与“回应”：“刺激导致生物反应，但不一定是回应”；他特别指出回应是“一种肌肉或腺体的反应”（同上：367）。

如同他在《符号的符号的符号》（1948b）中所解释的，他 1946 年的书的目的不在于呈现一门符号的科学，而是这门科学的绪论；他将发展该门科学的任务留给“众多不同领域的众多世代的众多研究者”（同上：434）。建立一个绪论包含了搜寻精准的术语——谈论符号的符号——的巨大努力。

这个问题涉及到定义词与被定义词之间的关系。定义词可以成为被定义词，尽管会需要另外一个定义词，而这个定义词也可能相应地变为另一个被定义词，等等。莫里斯意识到形成符号科学的关键词，如“符号”和“意义”，必须被定义，而用来定义这些术语的术语不能被定义，因为这些会要求新的定义词，如此就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序列。

179

莫里斯在《符号的符号的符号》开始部分说的“术语不是科学”（同上：435）对我们来说应该更加清晰。他的意思是被选来定义符号的术语不能被无限地定义下去。

麦克斯・布莱克误读了莫里斯所说的“专门符号学必须为我们提供如利箭般的词语”，将其理解为表示《符号、语言与行为》毫无术语缺陷。事实上，莫里斯仅仅试图减少当时术语的模糊性。在回应布莱克一再坚持该书是“一箭筒弹弓”

而并非“一束完美的利箭”时，莫里斯说道：“大卫王用弹弓对付歌利亚，效果可观。”事实上，正如布莱克自己在《模糊》（1937，出版于《科学哲学》）中所说的，精准只是程度上的（同上）。

不管怎么说，在他发展符号科学的努力中，莫里斯的主要关注点并非是定义术语，而是审视它们的使用条件。为了这个目的，他区分出了被分析的符号与未分析的符号，对应确定的研究领域（同上）。他的目标是确保符号科学中的关键词经过了分析；用来分析它们的符号必然地保持未分析。

用来谈论符号并使得它们可被分析的（未分析的）符号来自哪里？为了研究需要，我们能从现有的科学或 / 和日常语言中选取未分析的符号。许多未分析的术语，比如“它”，“没有”，“称为”和“产生”必然是取自日常语言的。“未分析术语的充分性取决于它们的使用目的。”（同上）

在未分析术语的基础上，要么当我们声明了使用它们的充要条件时，科学的被分析的术语可以全部被分析（或“定义”）；或者，当宣称了使用它们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时，它们只能被部分地分析（或定义）。

回到莫里斯符号学方法中的生物学所扮演角色的问题，现在更准确的一个回答应该是，它为他提供了未分析的符号，即定义词。莫里斯原本能够采用诸如“观念”、“思维”、“思想”和“意识”等未分析的符号来谈论符号。但是相较于借用“心灵主义”的术语——众所周知，它们在应用方面缺乏一般的共识，莫里斯更倾向于借鉴生物学和物理科学。因此，他没有选择行为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心理学导向来与心灵主义对立；相反，他的选择是方法论上的。在这点上，他也是非常清晰的： 180

> 《符号、语言与行为》的生物学导向因此首先是方法论上的，而且不包含对被视为心理学说的“行为主义”的维护和“心灵主义”的反对。也不像我的批评者们所暗示的从老鼠或者狗开始着手研究；就生物而言，婴儿或者哲学家一样可用。（同上：436）

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中，莫里斯已经表明，他对行为学的偏好并不基于偏颇的反心灵主义，或者意图否认符号活动中的“个人经验”：

> 从行为学的视角来看，通过 S 来描述 D，包含着通过对 S 的回应来回应 D。后面将更加明显展现的是，没有必要否认符号活动过程或者其他过程中的“个人经验”，但有必要从行为学的视角否认这种经验有着核心重要性，或者它们的存在使得符号活动（以及符号、指称物和解释项）的研究变得不可能或不完整。（同上：21）

莫里斯强调他的行为主义主要来自于米德，以及托尔曼与赫尔。事实上，跟其他将通过研究老鼠而发展的心理学运用于人类的行为主义者不一样的是，这些学者尝试发展一种行为的一般理论——或者如莫里斯所说的“行为学”——能够解释人与老鼠的行为，同时也能解释它们的差别。

4.2.3. 莫里斯研究中的生物学与象征主义溯源

我们已经知道莫里斯从一开始就对生物学感兴趣。他对象征符号与行为的双重兴趣在他 1925 年的论文中就已经出现，即《象征主义与现实》(1933)。在这本书中，生物是从跨学科视角来分析象征行为的对象和出发点，这些视角包含了逻辑、心理学、物理学和生物学。 181

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它的第三部分，“一些心理学和生物学结果”，其中莫里斯考虑了科学发现对我们世界观的革命性影响——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莫里斯不是第一个将生物学术语引进关于人的科学的人。生物学范畴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化环境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思想充满了诸如“不适应”和“生物与环境的互动”等表达 [Morris，1993 (1925)：27]。在这方面，莫里斯的贡献是独特的，因为他严谨科学地对待生物学，而并非仅仅肤浅地比喻引用，或者做着缺乏真正的生成和结构关联的类比。

莫里斯对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尤其感兴趣，他着手用生物学的语言来描述这个问题。因此，他用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来谈思维与现实的关系；这样，他就是根据“人类生态学”来考虑了心理学问题。他从这个视角出发，将象征主义放入了生物学语境，考察了象征行为的生成方面：“这将使得此前的论点变得有血有肉，呈现出完整的生机。”(同上：28)

他的关注点在于象征主义的生成面与功能面，他认为二者只有在基于生物学的一般行为理论框架中才能被阐释清楚。以刺激—回应过程为开端，并考虑替代刺激情形，这就需要分析思考过程形成以及人类主体“解决问题活动”中象征的补充使用。这并不是将象征放到替代刺激的位置，替代刺激仅仅是不能承担选择性角色的刺激的替代物。此外，象征是一种更加复杂的事物，在象征中，“远处的刺激增加了新的情景元素，正是这个记忆扮演了选择性的角色”(同上：31)。

4.2.4. 包含象征的行为

在仔细讨论了亨特记录于《动物与儿童的延迟反应》的华生研究实验的基础上，莫里斯区分了三个“行为级别”：(1) 不包含替代刺激的行为；(2) 包含非象征性的替代刺激；(3) 包含象征的行为 (参见同上：35)。 182

在包含象征的级别，生物的适应能力需要新的维度与意义。这时就有可能通过不直接出现但同样是象征表征能力的结果的物体或刺激而控制当下的行为。这个机制使得思想和思维得以发展。此外，根据莫里斯所说的，包含象征的行为是自由行为，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行为，而是一种“反思的能力”，是由考虑与选择的过程延迟了的行为。如果我们将象征行为的发展与生物适应行为放在同一个发展线上，诸如“自由”、“控制”、“考虑”、“意志”、“欲望”和“智力”（根据过去的经验解决现在的问题的能力）就能够用生物学来建立和解释。莫里斯说：“包含象征的行为是绝大多数生命形式具备的学习过程的复杂延伸。”（同上：37）象征的出现意味着那些不可通过触觉尝试的公开的试误过程可以在精神层面尝试，最终也能够被置于一旁而不会对生物造成致命危险。能够基于以往的经验用其环境的一部分作为另一部分的符号的生物获得了“弹性”以及非象征行为中根本看不到的“适应度”。

莫里斯未能从生物适应的进化角度来解释语言的价值。当语言象征符号开始出场——包含语言的全部象征技能——第三级别行为的生物学价值就大大增加了。这发生在人类的世界，他们能够通过语言象征而接触到过去的经历，不仅是自己的语言象征，还可能有那些使用相同语言的整个社群的语言象征。

诸如科学预测和艺术创造等复杂的活动在语言的基础上是可能的，莫里斯在 1946 年称之为“后语言符号”。从最简单的生物到可能最复杂的生物（即，人类——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行为过程中的差别是一个层级的问题，也体现了质的飞跃：“对表达的需求——将经验译为象征形式——与对食物和爱的需求一样具有生物迫切性。”（同上）莫里斯诙谐地用心理分析的术语从进化的角度指出，从不能具备象征行为的生物演进为能够具备生物行为的生物，从而能够使用语言和后语言象征，这个发展过程能被看作外向与内向生物的区别：

183

> 这是事实，不论象征化的特定事物主要是非触觉的生物早期行为，或是主要是非特定特性的事物或触觉方面，用心理分析的术语来说就是：不论象征者是内向还是外向。艺术家与科学家，唯心论者与唯实论者，经常代表这种性格对立的两个方面。（同上：37—38）

象征能够用在反思过程，来解决触觉领域的特定问题，也能用来通过比现实更加契合的欲望来建构一个环境。莫里斯也思考了西比奥克（继皮尔斯之后）称为“默思游戏”的问题，指的是想象、做梦、神话与艺术的世界，也指哲学与科学创造性。

莫里斯对使象征行为成为可能的条件感兴趣。他将这些条件视为研究的一

个最终领域。他考虑到了对环境变化的进化适应过程，强调了对“即时发生”的刺激和替代象征充分回应的能力的极大重要性。这相应地影射了人类基本的预测能力（同上：44—45）。

4.2.5. 一般语言象征与口头语言象征

莫里斯在《象征主义与现实》中提出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方面关系到一般语言象征与口头语言象征之间的差别。这里，语言象征的发展等同于一种象征水平的扩展（即复杂度的增加）。事实上，语言象征与词语形式的口语声音超越了身体运动和外部世界的物体运动，为特定人类意义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口头语言简单易得，而且在任何情形下都易于使用，包括在夜晚；它能使双手空出，而且不需要任何特定物体，也没有空间限制。出于这些和其他所有原因，它替代了（虽然并非完全替代）其他的象征化手段。此外，口头语言为通过形成人类思想的词语的近似口语的使用而达到自我刺激和控制提供了机会；这等同于社会交流过程的内在化形式，对自我的发展很重要（同上：45—46）。

184

莫里斯在《符号理论的基础》的介绍部分作出了如下思考：

> 人类是主要的使用符号的动物。当然，非人类的动物也对某些作为其他某物的符号的事物做出回应，但这些符号不具有在人类口语、文字、艺术、测验工具、医疗诊断和信号设备中所体现的那种复杂和精巧。科学与符号不可分割地相互关联，因为科学既给人提供更加可靠的符号，还在符号系统中体现它的结果。人类文明依赖符号及符号系统，人类思维同符号的运作不可分离——如果精神真的不与符号运作等同。（1938c，见 1971：17）

莫里斯在 1925 年的研究（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支持这样的原则：宣称人类行为——以及明确的符号行为——有生物学基础，这不是将人类行为降到非人类行为的级别，或者如莫里斯说的，“不公正地对待这些活动的独特本质”[1993（1925）：46]。相反，用生物学的方法研究行为和象征揭示了真正人类世界的创生与特性。

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中，莫里斯反思了符号学对整合各类科学的最终的贡献（社会、心理及人文主义科学，即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美学等等；以及形式科学，即数学、逻辑和物理、生物科学）。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符号学话语的同时，莫里斯也没有搁置生物学；相反，他强调了生物、物理科学（比如物理学和化学）的可能贡献：

> 可以证明,符号的概念在整合不同于物理和生物科学的社会、心理和人文主义科学的方面很重要。而且,由于下文即将展示符号只是由关联复杂的功能过程的生物和物理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任何此类形式科学以及社会、心理学与人文主义科学的整合都会为此二类科学与生物及物理科学的整合而提供相关的材料。(1938c,参见 1971 : 17—18)

185

莫里斯所有的研究——尤其是他 1925 年的论文《象征主义与现实》,《符号理论的基础》,《符号、语言与行为》以及《意谓和意义:符号与价值关系的研究》(1964)——在导向上都能被描述为生物符号学,且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研究都表现了紧密的连贯性。

从这个视角来看,《符号、语言与行为》是其研究中这个侧面的最强有力的表达,而且不应该被视为突然转向或转变的结果。尽管《意谓和意义》直接谈到符号与价值、符号学与价值论的关系问题,莫里斯研究中这个特定方面的前提已经在《象征主义与现实》中提出,其中象征活动是根据它在生物解决问题时的功能来辨认的。价值的问题预设了诸如考虑、自由和思想等相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相应地预设了生物性发展,一方面包括生物对直接刺激的反应,另一方面包括了人类象征主义,其中语言和口头声音以及书写记号的使用组成了物种特有的重要资源。

4.3. 符号、符号活动的维度,指称物和语言

我们现在将关注莫里斯符号学的一些重要方面:符号不存在于符号活动之外的特性;普遍被误解的符号活动三元维度,和它的符义、符用及符形方面;所指物与指称物之间的区别;作为人类动物的物种特有属性的语言的定义;对语言学家所从事的语言学的批判;以及一般语言学新方法的提议。

4.3.1. 最反抗权威的术语:符号

我们已经看到,莫里斯在《符号、语言与行为》中提出了两个构想来分析符号。如他所预见的并在 1948 年的文章(1948b,见 1971 : 436)中所明确提到的,每个构想都是片面的分析(此处强调:并非定义)。第一个构想是为了初始的导向;第二个是为达到更高的准确性。但是,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符号"是一个被分析了的术语,尽管只是部分如此。第一个构想使用"行为"这个术语,使得"行为相似性"与"目标导向的行为"等表达变得不明确。第二个则是在与赫尔、托尔曼和他们的一些同事讨论了几个月之后发展出来的。

186

为读者方便起见，此处重复之前提到的两种构想：

（1）“某物 A 控制朝向某一目的的行为，某物 B 控制在所观察到的情形下有关该目的的行为，如果 A 与 B 的控制方式相似（不一定相同），那么 A 就是一个符号。”[1971（1946）：84]

（2）“任何一个事物，A，是一个预备刺激，它在激发某个行为族群的回应序列的刺激物不存在的情况下导致某些生物对此行为族群的回应序列在某种条件下做出回应的趋向，那么 A 就是一个符号。”（同上：87）

莫里斯在 1948 年自己提出，相对于第一个构想，第二个提供了某些优势：

1. 不使用“行为”这个术语。

2. 将生物视为符号的解释者；但这并不要求生物对符号的反应与它对符号所指称的东西的反应一样。

3. 它不要求在符号出现与不出现的场合有同样的反应。

4. 最后，它不要求某物一旦成为符号就立即会有回应（即，肌肉或腺体反应）。（参见 1948b，见 1971：437—438）

但是，莫里斯说，所有这些优势的代价是“不易操作的复杂性”（同上：438）。这种不易操作性尤其与某些用于第二构想的术语缺乏精准性有关，比如“倾向”与“需要”，后者暗含在“回应序列”的定义中。提出第二构想两年之后，莫里斯指出了它的弱点。比较有趣的是他提出说“反应”可能比说“回应”要好，后者是包含“肌肉与腺体”的特定种类的反应。莫里斯这次同意布莱克的说法，认为目标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他的第二构想引向符号仅仅意指目标物的观点。从这个视角来看，第一构想更加可取，因为它不要求符号仅仅意指目标物。莫里斯说，我们不能希望要求符号，比如“黑”，来仅仅意指目标物。莫里斯对其术语操控的精心投入，可能是导致其难以控制他的第二构想的根本原因（是“混沌”理论的一种共证）。在他 1948 年的文章中，莫里斯得出结论：“‘符号’这个术语明显需要比我之前所给的或我知道如何给的更好的基础。”（同上）。

187

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中，莫里斯已经致力于描述符号的特点。他将符号简称为 S（因其功能而成为符号），指称物为 D，解释者的解释项为 I，并将符号描述如下：

对于 I，S 是 D 的符号，前提是 I 凭借 S 的出现而考虑 D。因此在符号

> 活动中,某物通过中介而考虑另外某物,即,通过第三个某物。符号活动因此是一个中介化的考虑过程。(1938c,见 1971 : 19—21)

符号或符号活动的其他组成部分在符号活动之外不存在:

> 符号、所指物、解释者或解释项的特性是关系型的特性,事物通过参与符号活动的功能过程而具备这些特性。因此,符号学无关某种特定物体的研究,而是(仅仅)关系到参与符号活动的一般物体。(同上)

在《意谓和意义》中,莫里斯回到了分析符号的问题上。他重复强调其作为所有符号一般理论的符号学构思,关涉人类与非人类动物,正常与病理,语言与非语言,个人与社会的符号;这样,他就使符号学成为了一项"跨学科的事业"(1964,见 1971 : 401)。

但是,莫里斯没有打算尝试一个符号的定义。相反,他的目标是确定其使用的标准。为此,他把符号加到一个包含五个他认为是"符号学的基本术语"(同上)的门类中。莫里斯说,符号活动或符号过程或符号行为,能够被视为一种五个术语之间的关系: v, w, x, y, z:"在某种条件 z 之下, v 在 w 中建立以某种方式反应的倾向, x,对应某个物体 y(且并非作为刺激而反应)。"(同上: 402) 188

当此关系成立, v 就是符号, w 是解释者, x 是解释项, y 是意指, z 是语境。因此,根据莫里斯的构想,我们能够说,如果某物在解释者那里决定了一个解释项——它决定了在某种条件下(即语境)以某种方式对某物做出反应的倾向(即意指),它就是符号。莫里斯引用了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的"蜜蜂舞蹈"的例子(1962):舞蹈是符号;其他受此舞蹈影响的蜜蜂是解释者;这些蜜蜂因舞蹈而以某种方式反应的倾向是解释项;食物源——舞蹈为蜜蜂所指引的对象——是意指(同上: 402—403)。但是,也是在这本书中,莫里斯强调,他关于符号的构思并不解释所有我们称为"符号"的事物。它不是符号的定义,而只是"仅仅给出将某些事件认作符号的条件"(同上)。

莫里斯新的符号构想成功地避免了他之前的构想所引起的一些批评和反对,也同样避免了莫里斯本人在《符号的符号的符号》中通过其批评者的帮助而发现的一些弱点:说所指物,对象 y——意指——不是作为一个刺激,即不出现于直接经验中,并不是否认我们能指称在直接经验中的对象,比如我指着面前的桌子说"这是桌子"。实际上,莫里斯提出,这种说法指的是物体对象(桌子),它只有一部分是被直接观察到的,其他的部分(桌子的后门,下面,未抽出的抽屉,等等)无法被观察到。

符号分析中提到的对被观察部分和未被观察部分的区分，满足了反对莫里斯符号概念中可观察原则的批评者，他们将其评断为行为偏见（罗瑟—兰迪在他关于莫里斯的专刊中也表示了他对莫里斯使用可观察性的行为标准有些担心）。莫里斯评论道，他在1964年新构想的符号主张作为解释者的生物能亲自经历符号，最终人类在内省的基础上对此做出描述。尽管莫里斯的方法具有行为导向，而且189 其符号行为的分析从属于客观研究，但是，行为构思必须能延伸到作为解释者的任何生物。这就解释了莫里斯符号学视角的生物学导向。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基于自我观察的符号分析局限于拥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尤其是人类生物，这种符号分析就会很有限。事实上，符号学应该提供一个关于所有符号的一般理论，因此能够关联任何生物。莫里斯在他的符号学解释中，尤其是在他通过与"行为学"关联来描述符号学的时候，达到了高水平的意识与均衡。

> 符号学必须处理动物、习得语言之前的儿童以及自我观察报告缺失或不可靠的个性混乱中的符号活动。但是，关于符号活动的自我观察报告并非由行为符号学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行为。（同上：402）

从这个视角来看，组成反应倾向的对象——莫里斯所说的意指——属于符号活动过程，而且以此相对于符号活动而存在。换句话说，正如莫里斯所特别指出的，反应倾向的对象并不自己组成实体；相反，它与某些行为过程共同而且相对存在。在特定的情况下由蜜蜂舞蹈所导向的觅食行为会在新的情况下变为对新的巢穴的探寻，此时蜜蜂仍由其舞蹈所导向。因此，在莫里斯构想中的意指并不从属于"具体化"的存在（其本人语）。

此外，某物作为符号的语境可能是由其他符号组成，也可能不是。

最后，正如解释者不一定是人类意识的主体但可以是任何生物一样，解释项以某种方式因符号而具备的反应倾向不一定是主体性的。莫里斯说，这样一种倾向能简单地理解为或然的（同上：402）——作为在某些条件下因为特定符号的出现而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的可能性。

莫里斯没有放弃他根据在《符号、语言与行为》中所提出的重要假设做出的针对任何生物符号活动的描述，通过分析某物成为符号的条件（以及所有可能包190 括在内的困难），他成功地将其1964年的构思免除了此前构思的不准确性和模糊性。一贯不变的是他的坚韧执着，他不断寻找一种研究方法，以及作为他构建一门科学（他称之为"semiotic"而不是"semiotics"）——能够解释所有形式的符号——的精确的科学术语。这是可能的，因为他意识到了符号学的中心不是用定义围起一个"符号"的反抗性的概念，而是恰恰相反，要形成一个分析符号的构

思，同时尊重它的多样性与不可约减的他性。

因为这种态度，莫里斯开始将生物学作为他的符号学术语来源之后，他借用的生物学术语并没有沦为生物主义的约减形式。相反，他发现将符号活动引向所有生物，更容易避开以偏概全的谬误——将符号活动中能观察到的部分错误地当作全体——比如，人类世界的符号活动。

所以，当莫里斯转向生物学来确定符号学的绪论时，他这样做是为了解总体化的批判（他所有研究的特点），而不是从整体化或约减的角度出发。我们还能指出，生物学对莫里斯来说是一种免除符号、意义和语言的独白视角的手段。语言学家在将莫里斯所理解的一般语言学等同于语言符号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屈从这类限制，正如符号学家将符号学约减为人类符号学，或者更严重的是将其视为符号学的一个特权分支。相反，莫里斯用这些术语进行了对话式的对抗，通过这些术语，他完整地回应了其他人的挑战。

4.3.2. 有关符号活动维度的误解

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中，莫里斯将符号学分为三个分支：符形学、符义学和符用学。这些分别对应符号活动的三个维度：符形维度，符义维度和符用维度。基本上，这个三分法主要来源于两个影响：一方面是逻辑—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另一方面是米德和皮尔斯的实用哲学（参见 Morris，1970）。这解释了莫里斯早在1938年是如何意识到了不将符用学从符号学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性，以及不将符号活动的符用维度从符形和符义维度分开的重要性。 191

符号学这三个分支的区分是莫里斯符号理论中最著名的方面。尽管他的描述被成功地运用在了其他符号学框架中，但在区分方面却被普遍误解了。主要的误解关系到一个事实，即意义一般被完全与符号活动的符义维度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它是呈现在所有三个维度中的。当莫里斯提出用符形学处理符号关系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否认符形学包含着同样也是符号关系一部分的意义。同样的，莫里斯提出因为符用学关注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它也就处理符号与符号的关系，因而也处理意义。有一个学者在追寻符号活动三元维度中的意义以及凸显意义问题与符号学三个分支的关系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就是罗瑟—兰迪（参见第六章）。

莫里斯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因此他的关注点不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关系，而是从解释者、解释项以及二者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符号学关系。

莫里斯也关注符号活动的符义维度。这就将他自己的行为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者伦纳德·布龙菲尔德所采用的行为主义区分了开来（1933，1974）。事实上，布龙菲尔德极力避免“心灵主义”，信守语言研究的行为学方法，对符义学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结果之一就是符义学问题长期被美国结构主义者忽略。

在《基础》中，莫里斯在符号学三个分支和三个哲学趋向之间建立了连接："形式主义"或"象征逻辑"关系到符形学；经验主义关系到符义学；而实用主义则关系到符用学。事实上，莫里斯引用了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和米德，将"符用学"描述为明确起源于"实用主义"。而且实际上，《基础》的第五章"符用学"是这样开篇的：

> "符用学"的术语明显是参照了"实用主义"这个术语而被创立。一个可信的观点是，实用主义的恒久重要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将比以往更加密切的注意力引向了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上，而且比以往更加深刻地评估了这种关系在理解智力活动中的关联性。"符用学"的术语帮助我们标识出了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和米德在符号学领域中所取得成就的重要性。同时，"符用学"作为一个特别的符号学术语，必须获得自己的构想。"符用学"所指的是符号与其解释者关系的科学。"符用学"必须与"实用主义"、"实践的"和"实用的"相区分开。（1938c，见 1971：43）

192

4.3.3. 所指物和指称物

莫里斯为符号理论所做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关系到所指。在符号学的发展过程中，指示符号学与非指示符号学是对立的。这个争论的起始点是查尔斯·K. 奥格登（见第 153 页生平简介）和艾弗·A. 理查兹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描述的著名但常常偏离常规的语义三角。这个三角呈现了三个顶点，称为"象征"、"思想或指示"以及"所指"。在意义取决于"象征"与"思想或指示"的关系中的假设下——部分来源于索绪尔的二元概念，即符号取决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所争论的问题变成了"所指"应不应该从这个三角中被排除。非指称符义学的支持者包括斯蒂芬·乌尔曼［《符义学：意义科学导论》（1962）］和翁贝托·艾柯［《符号学理论》（1975，英译本 1976）］。后来，艾柯（1984）抓住了所指概念与符号活动的关系；他通过援引雅各布森的回用概念而含蓄地恢复了所指。

假如我们查验莫里斯在所指物与指称物之间所做的区分，所指问题与围绕它的误解就会很容易解决。这个区分最初由莫里斯在《基础》（1938c）中提出。他在《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中用变体术语又一次处理同样的问题，并在后来的作品中再次论及。尽管如此，他在 1938 年所建立的立场还是最令人信服的。

他在《基础》中提到："被指物确实作为指向指示对象而存在的地方，是指称物。"（1938c，见 1971：20）比如，如果符号"独角兽"指向对象，而且我们认为独角兽存在于神话世界，那么这个符号就有指称物因为它存在于那个世界。对比而言，如果符号"独角兽"指向指示对象而且我们认为独角兽存在于动物世界，那么

193

这个符号没有指称物，因为它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这里，符号有所指物（Morris，1938c）——或者如莫里斯在后来所说的，意指物（1946，见下文）——但它没有指称物："因此明确的一点是，每个符号都有所指物，但不是每个符号都有指称物。"（同上）通过使用莫里斯在所指物与指称物之间的区分，我们能够避免有关所指的误解。在奥格登与理查兹（1923）所提出的符号三角模型中，所指总是被预见，而且组成了三个顶点之一。对比而言，在其他的语义理论中（参见 Ullman，1962；Eco，1975、1984），所指被完全排除，理由是符号所指的并不总是作为被符号所指而存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无法解释所指物。相反，符号总有所指——用莫里斯的术语说就是所指物——而且，如果这个所指作为被符号所指而存在，它就会有指称物。比如，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柴郡猫"是所指物，也是指称物；对于信奉者来说，"上帝"作为所指既有所指物也有指称物，但在"上帝不存在"这个命题中，"上帝"有所指（否则该命题无意义），但只具备所指物，而不具备指称物（参见 Ponzio，1990a、1994b）。

如我们可能预想的，《符号、语言与符号》中所提出的这种区分保留了下来而术语改变了：所指物被意指物所代替。莫里斯说道："任何因满足它们而成为所指物的条件被称作符号的意指物。"[1971（1946）：94] 他说，符号或符号工具能被说为意指一个意指物。意指，有意指，有意指物可以作为同义词。在莫里斯关于某物作为符号的条件描述中，意指物，与跟它重合的所指物非常相似，与指称物则是区分开来的。所有符号都有意指物，能够意指，但不是所有符号都有指称。意指物表达了符号能够拥有所指物的条件。所以，如果条件确定符号有所指，符号就被赋予了意指物和所指物。蜂鸣器（符号）吸引巴甫洛夫实验中的那只众人皆知的狗（解释者）的注意，它的意指物是有某种东西可吃；狗所找到的食物使它受符号所激而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解释项），这就是指称物。然而让狗深感失望的是，后者可能压根不存在！

194

在《基础》的第二章中，莫里斯使用了所指物这个术语，而没有用意指物。每个符号，只要是符号，就有所指物，但不是每个符号都有指称物，因为不是每个符号都指向真实存在的东西。被指向的东西（意指物或所指物）作为被指向而存在的地方，指称的对象是一个指称物。换句话说，所指物或意指物是符号或符号工具所指向的东西；它是一组形成一类或一种对象或事件的品质，解释者对其做出反应，不取决于所指向的事物是否根据符号所赋予它的存在价值而真实存在。在《意谓和意义》中，莫里斯用"意指"替代了"意指物"，而完全放弃了"指称物"这个术语。

4.3.4. 语言与一般语言学

莫里斯将符号学视为行为学的一部分——符号学符号行为与更广义的行为学理论关联——他将符号划分为信号与象征。这个区分是反复出现的，莫里斯担起了将其概念化的任务。根据莫里斯所说的，已经区分出信号与象征的研究者包括罗伯特·M. 耶基斯（见 Yerkes，1943）以及苏珊·K. 朗格（见 Langer，1942）。

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莫里斯尤其关注朗格这个“高度受惠于其老师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之后又受到恩斯特·卡西尔强有力影响”的学者（Sebeok 与 Petrilli，1998）。莫里斯在他 1925 年的论文中就已经开始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象征主义的问题。因此，他很快就认识到了卡西尔所作的重要贡献。他在《意谓和意义》（1964，其第一章现在包含在莫里斯 1971 年的专著中，名为“符号与行为”）的开头中写道：“恩斯特·卡西尔将人称为‘符号动物（animal symbolicum）’，而不是‘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有不少当代作品已经展现了这个概念的适当性。”［1971（1964）：402］

根据莫里斯所说的，符号在替代另一个符号来指导行为从而意指被替代符号所意指的时候，它就是象征；否则，它就是信号。换句话说，象征是“一个由解释者所产制并且作为其他某个与之同义的符号的替代物；所有符号都是信号，而象征则不是”（同上：367）。因而，信号是“一个非象征的符号，即，不是由其解释者产制，并非作为其他某个与之同义的符号的替代物”（同上：366）。

195

在朗格看来，信号是“宣示其对象的”符号，而象征则引导解释者“构想其对象”（1942：61）。用朗格的话说：

> 符号［即信号］表明了存在——某物、某事件或状态的过去、现在或未来。潮湿的街道是下过雨的符号。屋顶的拍打声是正在下雨的符号。气压计的下降或月晕是即将下雨的符号……口哨意味着火车要开了。（1942：57—58）

用作象征而非信号的术语并不一定会在对象出现时引起恰当的行动。如果我说“拿破仑”，你不会向这个欧洲帝君鞠躬，就好像我在介绍他一样；你只是想到了他而已。如果我提到某个我们都认识的史密斯先生，你可能会接着“背着他”告诉我某个关于他的事情，但不会在他面前说这件事。象征不是对象的代理；相反，它们是构想对象的工具。构想某物或某场景与明确地朝其做反应或感觉其存在不是同一件事；象征的直接“意义”是构想，而非东西（同上：60—61）。

根据莫里斯所说，信号与象征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象征由生物解释者产制，比信号的可靠性要低，信号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显得比较可靠。但是，

莫里斯提到，因为信号的可靠性也有不同的程度，所以区别也只是程度上的区别（1946，见 1971：57）。

很明显，“雨”这个词根本没有说出正在下雨或是已下过雨或即将下雨。但是当某人在特定的情况下说“雨”——比如，在我离开屋子而他正进屋子的时候——这对我的作用就如同我们自己看到下雨或听到雨点拍打屋顶，从而导致我备雨伞的行为。在这方面，莫里斯指出朗格所确立的区别不是绝对的；相反，它跟特定情形相关。他用讽刺的口吻说：“某人听到屋顶雨声拍打就仿佛在雨中般采取行动，和他听见‘拿破仑’一词就仿佛真的站在拿破仑面前般采取行动并无二致。”（同上：127）

196

莫里斯认为，通过他的象征定义，他是从这个术语的一般使用意义上来确定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也确定符号学只有在这样的一种分歧中获益，才能成为一门确定的科学。在莫里斯定义的基础上，象征的特点是自足性（因为它是由解释者产制的）、规约性和变化的可能性（同上：102）。莫里斯的象征概念与皮尔斯的相似，而他的信号概念则能与皮尔斯的指示符号概念相联系。尽管如此，莫里斯的二分构式与皮尔斯的三分构式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此外，皮尔斯将像似符号划分为第三种符号，与象征和指示符号相对应，而莫里斯仅仅将它视为象征的一个小分类（同上：102）。

通过一般行为理论的基础，莫里斯想要为定义“语言”确定标准——他认为这个术语有歧义，尽管对符号学来说至关重要（同上：112）。在我们看来，《符号、语言与行为》的这个部分（42—58）可能最有理据且最具备专题性。莫里斯开始参照生物（西比奥克将符号活动与生命等同考虑）来描述符号行为，设想区分“人类动物的符号”和“非人类动物的符号”（同上：128—134）。

莫里斯开始通过运用排除语言与交流关系的标准来定义语言。他知道，语言的定义不能基于交流。语言必须跟交流分离。这意味着交流相应地能与语言区分开；实际上，“交流”这个术语不能够被限制于语言交流（同上：45）。

莫里斯研究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不将词语、口语声音作为语言的条件，尽管语言也是这样。换句话说，在莫里斯看来，语言不能被约减为口语，口语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语言。莫里斯的“语言”指的是发声语言，也指视觉和触觉语言等等，取决于所介入的符号工具特性，不需要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口头语言。

很明显，莫里斯所使用的“语言”与语言学家所使用的完全不同。跟其他符号学或符号论研究者不一样的是，莫里斯的方法既不取决于也不从属于语言学。这种相对于语言学的自足性贯穿于他的整个符号学研究中。用莫里斯自己的话说，专门的语言学家

197 会反对我们从语言定义中省略语言符号必须是口语声音的要求。在我们看来,将这种要求包括在内没有理据;坚持这种观念无异于坚持由不同材料建成的建筑物不能都称作建筑物。(同上:116)

尽管语言学家的观点如此,莫里斯还是建议“普通语言学”这个术语应该被用于一般的语言研究,“语言学”这个术语用于作为语言小分类的书面语和口语研究。

此外,莫里斯建立了“语言”定义的五个标准(同上:112—114):

1. 语言是由多样的符号构成的。

2. 在语言中,每个符号都有一个为一些解释项所共有的意指:这是解释者—族群所共有的意指,但对于个体解释者来说当然也可能有意指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不能被认为是语言学意义上的。

3. 组成语言的符号必须是共符(comsigns),即它们必须能够被解释者—族群产制。共符可以是生物自己的活动(比如姿势),或者是此类活动的产物(比如声音,物质载体上留下的印记,或者所构筑的物体)。

4. 组成语言的符号是多元情景符号,即来源于在不同情景中意指相对稳定的特定符号族群的符号。

5. 组成语言的符号必须形成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结合的相互关联的符号体系,以产制一系列的复杂符号活动。

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莫里斯提出了以下关于语言的定义:

语言是一组多元情景符号,具有解释者—族群成员所共有的人际意指,符号能够由解释者—族群产制并能以特定方式组合以形成复杂的符号。(同上:113)

更加综合的定义是:

198 语言是一组多元情景共符,通过它们的组合方式而被限定。(同上)

以下定义则更加具有综合性。“系统”这个术语包含了组合的标准:

语言是多元情景共符的系统。(同上)

而且，因为符号族群是多元情景式的，最简形式就是：

> 语言是共符族群系统。（同上）

鉴于这样的标准，语言也能够被称为“语符系统”（同上：114，363）。

从广阔的符号学视角而不是约减的语言学视角定义了语言——从而将语言从口头语言和交流中区分出来——之后，莫里斯接着考虑了后语言象征（同上：122—125）。

在基于生物行为的符号学的视角下，莫里斯把在语言之前的信号与象征概念化，同时也概念化了并非是语言象征的语言信号。他也确定出了后语言象征，并描述如下：

> 可由解释者产制并与语言符号（语符）同义的象征。这样的象征可能是个人的或是人际的，其本身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成为语言（语言系统）的要素。（同上：365）

在个人后语言象征概念的基础上，莫里斯能够用行为学的术语描述诸如思想和观念产生等心理过程——事实上就是思维概念的本身。

个人后语言象征是对于个人有效的替代刺激。它们可以是外在也可以是内在的——外感受刺激（一个人“默诵”词语以记住刚对其所说的话）——或者内感受刺激（“自言自语”）。

对比而言，人际后语言符号不仅对一个人有效，而且能够成为共符，甚至语言中的要素。人际后语言符号系统是文化的材料。

回到个人后语言象征，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是思想的材料，来源于外在符号的内在化。从这个视角来看，“大声说话”与“自我思考”是语言符号与后语言象征之间的区别。从这个区分出发，莫里斯提出以下相对于“思维”或“心灵”术语应用的替换：我们要么将所有符号活动都视为“心灵”过程（貌似是皮尔斯的立场），或我们将“思维”这个术语限制于产生语言符号或后语言象征的符号行为（与米德极为相似）。

199

4.3.5. 人类和非人类符号

根据我们所呈现的分析，莫里斯在区分人类与非人类符号的时候并无困难。问题仅仅是根据此前所列的五个标准所定义的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属性还是它也

出现于非人类动物中（同上：128—131）。

如果“语言”被视为与“交流”同义，那么毫无疑问非人类动物也具备语言；相反，如果参考前面的五个标准将语言与交流区分开来，那么动物当然就没有语言，尽管它们的确会交流。能使我们谈论语言的条件中有一些貌似能够用于非人类动物，但是这些条件并非一同出现。

在这点上，莫里斯以下所说的话尤其重要：

> 但是即使这些条件符合了［即非人类动物交流中的所有其他要求都满足］，第五个要求是更难逾越的一道槛。因为尽管动物符号可能相互关联，而且如此关联能够使动物具备推理能力，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符号是由产制这些符号的动物根据组成语言系统的符号所必有的组合限制而组成。这样的考虑特别赞成此处定义的语言为人类特有的假设。（同上：130）

人类能将他们的符号组合成复杂的符号；非人类动物不能这样做。归根结底，这种“组合的能力”是区分人类语言和非人类动物符号的所在。这种方法与西比奥克的方法很接近，他说语言（他也将语言与交流功能区分开来）的特点是句法——根据有限数目的符号和特定的一组规则而产制无限数目的组合的可能。莫里斯如下总结他对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符号的区分的讨论：

200

>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人类语言（及其使之成为可能的后语言象征）远远超越了动物的符号行为。

他接着补充了以下评论（与西比奥克关于人类符号的构想接近）：

> 但是语言行为仍然是符号行为，语言符号存在于他们预设的简单符号之上而且永远不会完全取代它们。这种连贯性与非连贯性一样真实，人类与动物符号行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也一样真实。（同上：130）

现在我们对于研究人类符号的符号学——“人类符号学”的生物学基础应该有了一个清晰的概览。用并非来自莫里斯而是当今符号学的术语来说，我们现在知道了人类符号活动是动物符号活动的一部分，二者都属于生物符号学的领域。由于人类符号的特点展现在语言中，而且通过后语言符号得到发展，毫无疑问的是它们分享了其他动物世界共同的特点。这可能是莫里斯对符号学的最大贡献：他扩大了它的范围，发展了一种整体视角，对应着符号活动整体中的特定差异。

生平简介

查尔斯·莫里斯（1901 年生于科罗拉多丹佛—1979 年卒于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研究工程学、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1922 年获得理科学位之后，他于 1925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31—1958 年任教于该校。

查尔斯·凯·奥格登（1889—1957）是一名无可非议的博学之士，因其与艾弗·A. 理查兹合著的《意义的意义》（1923）而出名。奥格登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是讨论哲学、艺术、科学与宗教问题的"异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剑桥杂志》及《心灵杂志》（1923—1952，一份普通语言心理学刊物）的编辑。在其从事的各类事业中，奥格登创立了"正语研究所"，发明了基本英语，为没有英语知识的人所设计的包含 850 个单词的国际语言。 201

他的研究深受其与维尔比夫人及理查兹的关系的影响（见第二章）。从维尔比的意义学与《意义的意义》一书所提出的意义概念的关系角度来看（参见：Gordon，1990a；Petrilli，1995b、1998a：173，218；Caputo 等，1998），未出版的奥格登与维尔比通信记录（大约持续两年，从 1910 至 1911 年）值得注意。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奥格登极力推广意义学，在 1911 年他为"异端协会"撰写了关于"意义学进展"的文章（参见：Ogden，1994b）。

在《意义的意义》中，奥格登与理查兹提出了一个符号的三元构式。他们对解释和意义的描述视角源于符号、解释项与对象的动态互动的关系过程——或者用作者的话说，象征、指示与所指之间的动态互动。在这本书里，皮尔斯对符号学的重要性得到承认，并在附录中加上了专门关于他的一部分。因此，皮尔斯的观点第一次和其他重要人物的一起被引介到英国。维尔比也被提到，但是她的研究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第五章
关于西比奥克

5.1. 建模系统理论与总体符号学

因为托马斯·A. 西比奥克（见本书第175页生平简介），符号学渐渐成为“总体符号学”。从总体符号学的视角来看，符号与生命相重合，符号活动是生命体之中的行为。

> 读过西比奥克作品的人都惊愕于他对各种世界语言与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对心理学家、大脑神经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和动物行为学专著的自如援引，哪怕里面有上百种的物种，从单细胞生物，到昆虫、鱼、鸟，甚至高等哺乳动物。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了解他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所撰写或指导的作品的索引里包含了不计其数的作者、语言、民族和物种的名字，以及这些作品的大量的参考书目。（Lévi-Strauss，见 Bouissac、Herzfeld 与 Posner，1986：3，前言）。

总体符号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建模”，它被用来从符号活动的角度解释生物体中的生命与行为。因此，总体符号学——我们也能称之为“生命的符号学”——也包含建模系统理论。

5.1.1. 作为建模过程的符号活动现象

建模的概念在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研究中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他从莫斯科—塔尔图学派（A. A. 扎里兹涅雅克、V. V. 伊万诺夫、V. N. 托波罗夫和尤里·M. 洛特曼）吸收了这个术语，该学派使用这个术语来指自然语言（“第一建模系统”），以及其他人类文化系统（“第二建模系统”）。但是，西比奥克将建模的概念做了拓展，超越了人类符号学领域。从生物学家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所提出的主体

203

世界概念的角度来看，西比奥克的模型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外在世界模型”。在最近的生物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上，西比奥克证实了建模能力在所有生命形式中都可以观察到（参见 1991b：49—58，68—82；1994b：117—127）。

目前所介绍的术语需要做一些解释说明。研究所有生命形式之中和跨生命的建模行为需要一个由生物符号学发展出来的方法论框架。这个方法论框架是由西比奥克在其符号学与生物学的交汇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建模系统理论。建模系统理论从建模过程的视角来分析符号学现象（参见 Sebeok 与 Danesi，2000：1—43）。

将符号学作为建模系统理论，符号活动——关系到所有生命形式的能力——能被定义为“一个物种以其独有的方式产生与理解其处理、整编感知输入所需的特定模型的能力”（同上：5）。

建模系统理论的应用叫做**诸系统分析**，其在初级、二级和三级建模系统中做了区分。

初级建模系统是内在的模拟建模能力，换句话说，它是一个能使生物以物种特有的方式模拟某物的系统（同上：44—45）。西比奥克将人种特有的初级建模系统称为“语言”。

二级建模系统包含“指示性”和“延展性”建模过程。非语言形式的指示性建模在各个物种中都有记录。相反，延展性建模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因为它预设了语言（初级建模系统），西比奥克将其与口语区分了开来（人类二级建模系统；同上：82—95）。

三级建模系统包含高度抽象、基于象征的建模过程。三级建模系统是人类的文化系统，莫斯科—塔尔图学派错误地将其称为“二级”系统，这缘于混淆了“口语”和“语言”（同上：120—129）。

204

5.1.2. 批判以偏概全的谬误

整个宇宙，因为意指，都进入了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参见 Sebeok，2001a）。符号学是“生命科学”与“符号科学”合而为一的地方。这意味着符号与生命合而为一。因而，人类生命是符号宇宙中的符号。

西比奥克拓展了传统的符号研究的边界，并因此提供了一个比“符号论”要综合得多的“符号学”研究方法。“符号论”——索绪尔所预想的科学——的局限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建立在口语范式的基础上，受以偏概全的谬误的破坏；换句话说，它错误地将部分（即人类符号，尤其是口语符号）视为全部（即所有可能的人类和非人类符号）。在这样的迷惑之下，符号论错误地宣称自己是符号的一般科学。当符号的一般科学自己选择“符号学”这个术语时，它相对于符号论及

其错误而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西比奥克将符号研究的符号论传统称为“小传统”;相反,他所推广的由约翰·洛克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以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他们早期的符号和病征研究所代表的传统被他称为“大传统”。

在他的许多出版物中,西比奥克提出了一个符号学的广泛视野,与生命进化研究相重合。因为他的研究(主要受到皮尔斯、莫里斯和雅各布森的启发),符号学领域的概念和符号学史都经历了一场革命。正因为有了西比奥克,现代符号学将其理论视野扩展到远远超出了20世纪60年代符号研究所能预见的范围。

西比奥克对“符号的生命”的研究方法是“全面的”或“整体的”,而且能直接与其对“生命的符号”的关注相关联。他相信符号活动与生命相一致;即,符号活动肇始于生命的第一次涌动。这引出了符号学的一条基本公理:“符号活动是生命的判据属性。”

“总体符号学”为符号的生命和生命的符号提供了连接点和观察点。与符号学“大传统”一致,西比奥克对符号生命研究的全面方法预设了他对人类中心论和口语中心论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在他探索符号科学或“学说”(如他自己所称的)的边界活动中,西比奥克开放了这个领域,将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他在1963年引入的一个术语)——或者更广的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和内生符号学(endosemiotics)包括在内。在西比奥克看来,符号科学不仅是“社会中符号的生命的科学”(Saussure,1916:26)——对文化中的交流的研究——也是从生物符号学视角对交流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的特点是理论解释能力的最大化。

205

5.1.3. 符号活动边界

西比奥克的“符号活动的进化”(见Sebeok,1991b;重印于Posner、Robering与Sebeok,1997—2004,I)开篇问道:“什么是符号活动?”问题的回答用皮尔斯的一段引言开始。西比奥克评论皮尔斯关于符号活动或“符号的活动”的描述(CP 5.473)作为不可约减的三元过程或关系(符号、对象与解释项)特别关注解释项是如何被产制的;因此,它关系到在理解符号或符号的目的性(即目的导向的)解释过程中所包含的事物。

我们不仅有作为其他某物符号的符号,我们还有一个“某人”,一个“准解释者”(CP 4.551),将某物解释为另外某物的符号。皮尔斯进一步分析了这个描述的含意:“这是符号的本质,尤其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之所以变得有意义是因为其体现于被理解为符号的事实的特性。”(CP 2.308)还有:“符号仅仅由于它获得了解释才变成实际的符号,即,由于它决定了同一对象的另外一个符号。”(CP 5.569)

从解释项以及符号解释活动或者从符号推论的角度来看，符号活动能够通过解释而被描述。皮尔斯特别指出所有“符号都要求至少两个准思维（Quasi-minds）；一个准表述者（Quasi-utterer），一个准解释者（Quasi-interpreter）”（CP 4.551）。解释者——思维或准思维——“也是一个符号”（Sebeok，1994b：14），准确地说是一个回应；换句话说，一个解释项。解释者是一个应答性的“某人”。

在《符号活动的进化》中，西比奥克继续引用莫里斯（1946）来回答“什么是符号活动”的问题，后者将符号活动定义为“某物对某生物来说是符号的过程”。根据西比奥克所说的，这个定义只能暗示符号活动过程中生物体的出现。从此可以得出，符号活动随着生命进化而出现：

206

>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必须假定詹姆斯王钦定版本《圣经》（创世记 I.3）中援引上帝说“让有光”必然是个错误；上帝可能说的是“让有光子”，因为光信号形式（Hailman，1977：56—58）的电磁辐射即发光的感知要求有活的解释者，而生命在 3 亿 9 千万年前还并不存在。（Sebeok，见 Posner 等，1997—2004，1：436）

在莫里斯看来，符号活动中的生命体是一个宏观生物；根据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它可能是一个细胞，细胞的一部分或者甚至一个基因组。

在《符号活动的进化》中，西比奥克检视了符号活动之前的宇宙和宇宙诞生之后的问题。这里，他指的是现代宇宙学的主导范式——大爆炸理论。在地球出现生命之前——最早的生命形式追溯到太古代，3 亿 9 千万年前至 2 亿 5 千万年前——只有物质现象：非生物原子的互动，后来是无机分子的互动。这些互动可以被描述为“准符号学的”。但是“准符号活动”的概念必须与意大利肿瘤学家乔治·普罗迪（见第 175 页生平简介）所说的“原始符号活动”（参见 Prodi，1977）概念区分开。（普罗迪被称为“当代生物符号学勇敢的开路先锋”，西比奥克夫妇 1992 年编著的里程碑式《生物符号学》一书正是献给他的）实际上，在物质现象中，“原始符号活动”是个隐喻。西比奥克认为符号活动关系到生命。他区分出了非生物互动和“原始的交流”，后者指的是通过内生粒子的信息传递，比如神经元组件，其中的传递是通过蛋白质粒子而完成。

因为在我们地球生物域之外还没有生命的例子，银河系其他地方——更不要说太空——是否有生命 / 符号活动的问题是完全开放的。因此，西比奥克说，我们只能说“宇宙生物符号学”和“外星符号学”是目前还没有研究对象的姐妹科学。

根据当今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符号活动的环中至少有一个链肯定是

活着的地球生物。甚至可能只是某生物的一部分，或者人类所做的人工延伸。毕
207 竟，符号活动是地球生物符号活动。如上文所说，西比奥克的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符号活动与生命重合一致。符号活动是区分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所在。因而，符号活动并不总是存在于宇宙中：符号活动和有生命物在生命的发展中拥有共同起源。

将符号活动与生命相互等同给符号学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艾柯所构想的角色，他在1975年将符号活动与生命的结合描述为关涉"符号学的次等门槛"。在艾柯看来，符号学是一门文化科学。对比而言，西比奥克将符号学理解并实践为一门生命科学，将其作为不能仅仅被约减为符号学的一个"部门"的生物符号学。

5.1.4. 西比奥克的符号活动宇宙

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比奥克开始在剑桥大学学习。他深受奥格登与理查兹《意义的意义》（1923）一书的影响，而那时该书还未成为符号学经典。而且，他受益于与两位符号学大师的直接接触，二人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了他的老师：莫里斯和雅各布森（参见Sebeok，1979、1986、1991b中相应部分）。

现在让我们列出并区分西比奥克符号学研究中多面"符号活动宇宙"的不同侧面。西比奥克的符号活动宇宙包含以下方面：

- 当今科学中出现的符号的生命与生命的符号：动物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符号；成年符号；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符号；正常与病态形式的交流能力消解与恶化的符号。
- 人类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人类非语言符号包括依赖于自然语言的符号以及不依赖自然语言因而超越语言学范畴的符号。这些包括"寄生性"语言的符号，比如人工语言；"体态语言"符号，比如北美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人的手势语，以及聋哑人的语言；婴儿的符号；以及更加表现出文化依赖性以及自然生物特性的人类身体符号。
- 208 受控于意志的人类有意符号，以及无意、无意识符号，比如"聪明的汉斯"案例中的人与非人类动物交流所表现的符号（参见Sebeok，1979、1986）。在这些条件下，动物看似能够进行某些表演（比如，数数），仅仅是因为它们对训练师的无意或不自觉的暗示的回应。这一组包括了所有水平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生命，以及所有形式的撒谎（西比奥克也在动物中发现了这些并进行了研究）、欺骗、自我欺骗和诚实。
- 最高程度复调下的符号，以及特征为独调因而也是信号的符号。
- 从指示性、像似性和规约性等所有细微差别角度审视的符号。

● 最后，"符号大师的符号"。通过这些，我们能追寻符号学的起源（比如，其与占卜和医学的古老联系）。正如西比奥克在对美国符号学进行研究时所做的（1991b），我们还能够确认出对这门科学的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作为"隐符号学家"）的贡献的研究者，而且确立符号学相对于国别或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符号大师的符号"也包括轶事、证词和个人回忆的描述性符号，通过描述这些符号学大师的性格、行为和日常习惯来展示他们不仅仅是学者，也是常人。就连这些符号——"人性的，太人性的"——也没有逃出西比奥克的符号学兴趣范围。

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索绪尔符号传统所构想的符号科学。

5.1.5. 总体符号学

对西比奥克来说，符号学不只是研究社会文化生活圈的符号的科学——如上文所描述的"社会中符号的生命的科学"（Saussure，1916：26）。在考虑无意交流（意指符号论）的符号之前，符号学仅仅关注有意交流的符号（交流符号论）。这些是追随索绪尔的符号论的主要趋势。对比而言，西比奥克之后的符号学不仅是人类符号学，也是动物符号学、植物符号学、真菌符号学、微观符号学、机器符号学、环境符号学和内生符号学（对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层级的有机体内部的信息控制系统的研究）。所有这些都存在于生物符号学或者就是一般的符号学术语的保护伞下。 209

西比奥克争论道，生物学基础，也就是说生物符号学，处在人类动物交流与意指研究的中心位置。从这个视角来看，生物学家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康拉德·洛伦兹的老师，西比奥克所研究的最多的隐符号学家——属于符号学史。

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统一了其他领域的知识和被人类实践一般分离的对象，这种分离或是因为专业化而情有可原，或是因为缘于短视的分割而被认为无用甚至有害的倾向。这种态度也不免意识形态的暗示，常常戴着"以科学的名义"为动机的扭曲面具。

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动物行为学和语言学，心理学和健康科学，以及从基因学到医学符号学（症候学）、心理分析、老年学和免疫学等医学专业科学——如西比奥克所认为的，都在符号学中找到相遇、互换、系统化与统一化的地方。同样必须要强调，这里的系统化和统一化不能理解为静态"百科全书"式的新实证主义，不论形式是知识和语言学实践的排列组合，还是将知识约减为一个单独的科学领域及其相对的语言（比如，新实证式的物质主义）。总体符号学能作为一个元科学，将所有与符号相关的学科作为它的领域。它不能被约减为科学哲学，尽管作为一

门科学它与哲学进行着对话。

西比奥克成功发展其总体化观点要归功于他视角的不断创造性转换——这个方法尤其偏爱跨学科的关联和新的解释实践。这样,他在其他人只能看到简单“事实”和脱离交流、解释过程的事物关系的地方发现了符号的关系。此外,这种视角的持续转换也偏爱新的认知领域和语言,二者可以对话互动。它们是已经存在的领域和语言的对话式被解释项—解释项符号。在他探索各类科学的边界时,西比奥克将符号学的这种开放特性称为“符号的学说”。

5.2. 符号学与符号活动

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不仅仅是符号活动的研究;它也正好执行符号活动的相关功能。符号学的全面性方法不仅关系到它纵观全局的能力,也关系到它做出全面回应的倾向。

5.2.1. 符号学统一功能的三个方面

我们现在能考虑西比奥克符号学研究中出现的符号学统一功能,同时牢牢记住其三个紧密相关的方面都属于相同的解释实践,明显表现出逆推创造性的特征:

> 描述—解释方面:符号学离析、描述并解释符号——被解释项—解释项关系。这些可能由以下方式被关联:
>
> (a)由连贯性和因果性(指示关系)的关系而关联,而且因此直接或必然特定;或者
>
> (b)尽管他们在指示层面存在距离,他们也可以在假设的像似性的基础上而被关联
>
> (b1)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像似关系主要是服从某些传统的结果(像似—象征关系)
>
> (b2)在其他情况下,像似关系主要是趋向创新的结果(像似—逆推关系),而不是对传统的服从。
>
> 这些被解释项—解释项关系不仅存在于主题化的对象中,而且也存在于各种科学的解释实践中。

因此,符号学的描述—解释功能也根据康德式批判而被实践于涉及寻找因果推理的可能性或条件的认知过程本身上。

方法论方面：符号学也是对调查方法和知识获得的探究。从这个视角并相对于第一个方面来看，符号学并不将自己局限于描述和解释；它也提出关于认知行为的主张。也是在这个方面，符号学克服了科学界狭隘专业主义的倾向，也因此克服了分离的倾向。 211

、 伦理方面：关于这个方面，在较早的材料中我们提到“道德符号学”和“目的符号学”。我们现在提出“符号伦理学”（参见：Ponzio 与 Petrilli, 2003）。这里，符号学的统一功能关系到人类生命整体的提议和实际导向（即，从全面的生物学和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关注点在于我们可以称为“幸福的问题”。希罗多德明显认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因为早在他的《历史》的第一本中他就描述了吕底亚末代国王克罗伊斯的覆灭，克罗伊斯把自己想象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西比奥克为这个故事提供了自己的理解。永恒的幸福对于克罗伊斯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能准确解释他两个儿子的世界（和符号）：一个能说话，一个聋哑因而没有名字。

西比奥克的《克罗伊斯的两个儿子：希罗多德的交流神话》（见 Sebeok, 1979）反思了符号学的这第三个方面，即依托于神话、大众传统和某些文学体裁（巴赫金将之描述为属于“狂欢化文学”，来源于大众文化）的智慧问题。与克罗伊斯的聋哑儿子类比的话，我们能想起李尔王沉默寡言的女儿柯德莉亚；或者《威尼斯商人》中的铅匣子的“沉默”和简朴——与一般预想相反的是，这是一个符号，里面装着鲍西亚的照片。

关于符号学统一功能的这第三个方面，将被考虑和经历所分离的事物重新连接得到了特别关注。在如今的世界，生产的逻辑和决定任何事物都能用来交换和商品化的自由市场规则威胁着人性，使其可能对非功能型的矛盾符号变得麻木。这些符号从组成身体的重要符号到与他人交流情感的貌似无用的符号，应有尽有。现如今，如果我们要提高生活的质量，重新思考这些符号以及它们的关系绝对必要。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所强加于人的生态条件使得自我与身体以及环境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扭曲（参见，Sebeok，1979 中的“符号自我”；亦见 Sebeok 等，2001）。此外，符号学的这第三个方面使得理性世界观与神话、传说、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大众传统相连，关注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第三个功能富于人类行为的启示：我们今天不能或不愿释读的生命符号以及那些我们不知道如何释读的生命符号，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恢复它们的重要性以及与人性的关系。 212

研究符号的功能常被认为有助于理解符号的本质。西比奥克就此提出怀疑，

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符号本身作为一个终点的功能，代表着一种相对于符号功能与目的的过量。比如这种过量在人类和动物的仪式行为中就可以看到，在语言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在交流功能之外，语言能被当作一种游戏，即“默思游戏”（皮尔斯与西比奥克使用的术语），没了这种游戏，想象、幻想和高度逆向推理等活动就绝无可能（Sebeok，1981b）。

5.2.2. 符号活动与符号学："符号学"，另一个含义

极为重要的是，西比奥克给“符号学”添加了除了“符号的一般科学”以外的另一个含义，即人类符号活动的能力。早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符号活动与符号学：未来有什么？》中他构想出了这个概念（见 Sebeok，1991b：97—99），对建立符号学的先验基础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和元科学如何可能。他写道：

> 符号学是纯粹人类形式的研究，包含了对符号活动的思考——无论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方式。可以预言，这种研究将随着我们物种的生存而持续，在过去大约三百万年里，我们的物种已经以一系列的人种形式而存在，并有各种名称——在各类特征中突出反映了具备同步认知能力的大脑容量的增长——能人、直立人、智人、尼安德特人，以及现在的新人。换句话说，符号学所指向的正是人类思维所普遍具备的幻想特性，通过反射内心的方式关注其自身的长期认知策略以及日常技巧。洛克将此称为对“人化理解”的追寻；皮尔斯称之为“默思游戏”。（同上：97）

213

在《符号活动的进化》中，西比奥克解释了符号学各类分支和不同种类的符号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从微生物到超级王国和人类世界。特别是人类的符号活动，人类符号过程，因为西比奥克称为“语言”的物种特有的“建模工具”而被作为“符号学”的代表。这个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几乎可以肯定能人被赋予了语言，但没有言语。西比奥克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大致对应了豪斯特·米勒在《进化、认知和言语》中所做的认知与言语的区分（Müller，1987；参见 Sebeok，见 Posner 等，1997—2004，1：443）。

5.2.3. 生存与撒谎

在意大利，早在艾柯将符号学描述为研究撒谎的学科之前（见 Eco，1975；亦见本书第七章），乔瓦尼·瓦伊拉蒂（见第175页生平简介）已经声称符号可被用于偏差与欺骗活动。他为朱塞佩·普雷佐利尼的《说服的艺术》（Prezzolini，

1907）写了一篇评论，名为《说谎者手册》。瓦伊拉蒂研究的一些方面出现在一部他的作品集中，费鲁齐奥·罗瑟—兰迪对其做了分析（参见蓬齐奥1988年的专著，其中包含的“复调、对应与撒谎”一节，论述了罗瑟—兰迪与瓦伊拉蒂的关系；亦见第六章）。西比奥克本人也在《意大利的皮尔斯》（1982）中讨论了瓦伊拉蒂，并与皮尔斯相联系。这里，西比奥克描述了符号相对于现实的非同构特性，并分析了符号被用于撒谎——作假、幻术和欺骗——以及符号的掩盖和假装的能力（其研究中的另一个主题）。

欺骗、撒谎和幻术对于像西比奥克一样的符号学家——他们对任何地方的符号都深深着迷——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行为形式。比如，他被魔术师的符号所吸引，而且一直都在谈论聪明的汉斯的行为类型和魔术场景。人们当时认为这匹马知道如何读写；实际上，它只是很好地理解了驯马师所发出的信号，不管他是无意的还是故意要作假（参见“从终点处看起点应该找什么”，Sebeok，1979：85—106）。 214

西比奥克探索动物世界中的撒谎能力有着双重的动机。第一，他致力于揭穿动物能“说话”的观点——它们被赋予了语言这种人类特有的能力。有时他会揭穿骗子的把戏，有时他又会破除幻术。通过理论反思和观察记录（有时以诙谐的口吻呈现；参见“反对立场”，见Sebeok，1986：145—148），西比奥克做了很多来揭穿那些忽视并剥离人与动物之间物种差别的荒唐可笑、毫无疑问没有科学根据的结论。

第二，西比奥克想要探索非人类动物是否与人以同样的方式撒谎的有趣问题。动物符号学告诉我们符号并不专属于人类世界，可以说非人类动物中的符号使用也意味着它们具备撒谎的能力（参见“动物能说谎吗？”同上：126—130）。

5.2.4. 语言和言语的起源

长久以来，科学界忽略了人类语言如何起源的问题。它被认为不值得讨论，即使讨论了，所得的结论通常也是幼稚的无基础的（一个例外的情况是乔治·法诺的《语言的起源与本质》，1972，英译版1992）。尽管一般观念如此，西比奥克从未忘记起源的问题，也没有低估它的重要性。他主张人类语言是物种特有的。因此，他常常尖锐地嘲讽那些热烈支持教圈养灵长类动物学习人类语言的人。此类项目基于动物可能会说话的错误假设——或者更加可笑的是，它们具备语言的能力。西比奥克在语言和言语之间做的区分（1986：第二章）正是他对这些有关动物交流的错误结论的回应；这也等于是对话语中心主义的一般批判，它倾向将科学观察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原则的基础上。

根据西比奥克所说的，语言是作为人类进化史上的一种适应而发生并演化的，比言语要早的多。语言不是一个交流工具（关于这点，西比奥克与乔姆斯基 215

一致，尽管后者并不在语言和言语之间做同样的区分）；换句话说，语言的特定功能不是传递消息或给出信息。

取而代之的是，西比奥克将语言描述为一种初级建模工具。每个物种都被赋予了一个“产制”自己的世界的模型，而属于人类的模型叫做“语言”。但是，作为一种建模工具，人类语言跟其他生命形式的建模工具完全不同。它的区别性特征被语言学家称为句法——根据操作规则将单个元素排序的能力。对语言学家来说这些元素是历史—自然语言中的词语、短语和句子等等，但西比奥克指的是一种无声句法。因为有了句法，人类语言——不是被视为历史—自然语言而是一种建模工具——就类似于积木，它能够将有限的部件进行无限重组。作为建模工具，语言能够产制无限的世界；换句话说，相同的部件能够被拆分并重新组合，来建构无限的不同世界。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语言，人类动物不仅能够像其他物种一样产制世界，而且正如莱布尼茨也曾说过的，他们还能够产制无限的可能世界。这就将我们引回“默思游戏”的问题上——继皮尔斯之后，西比奥克认为这种人类能力对于科学研究、所有形式的调查研究以及小说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艺术创造同样重要。

跟语言一样，言语也是作为一种适应而出现，为了交流这一目的，它要远远晚于语言，准确来说是随着智人的出现而出现。言语组织并外化了语言。因此，语言通过联适应过程（进化生物学家的术语）而最终成为一种交流工具，这强化了人类原本就拥有的非语言能力。言语相应地为进行（二级）建模而被联适应（参见 Gould 与 Vrba，1982：4—15）。

5.2.5. 像似性和语言

西比奥克相信作为建模工具的语言通过像似的方式与其模化的宇宙相关联。这个主张与皮尔斯和雅各布森的主张遵循着同样的思路，他们二者都强调像似符号的重要性。同样重要的一个联系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尤其是参照“图景化”（picturing）的概念。

216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开始处理产生语言—思想的过程以及符号—认知的过程。然而，在他后来的《哲学研究》中，他将这方面的研究搁置一旁，转而关注“意义即使用”和语言规约（语言游戏）的问题。《哲学研究》被人们典型地视为维特根斯坦研究的转折点，尤其是分析哲学家。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及其重要性，尤其是它与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像似性方面的研究的关联（参见：Ponzio，1991：185—201；1997a：309—313）。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名称与命题：用于命题的名称或“简单符号”与它们的对象或意义之间的关系是规约型的。整个命题或“命题符号”与它们的所指之间的关

系是一种相似型的关系。命题是一种逻辑图景（CP 4.022,4.026）。实际上，因为命题也是规约性的—符号的，他们根本上还是基于表征关系，即像似关系。与皮尔斯的“存在图示”很像的是，这种关系被描述为比例型或结构型。

正如罗瑟—兰迪所讨论过的［1992b（1968）］，像似关系也能通过区分类比、同构、对应来解释和分析。而且，类比和对应之间的区分很符合西比奥克自身研究的总体方向，因为它与生物学相关。

这种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方法对于知识理论和研究认知过程与心理学也有启发，西比奥克在心理语言学和心理符号学的语境中讨论了这些问题。他将符号学与神经生物学相联系，将思维描述为反映周围世界或主体世界（Umwelt）的符号系统或模型。模型是一个像似符，一种图解，其中最适切的关系是时空性的。这些关系不是永远固定的；相反，他们可以对应（类似于）人类生物的内在世界（Innenwelt）而被调整、改变然后再次被调整。这个模型可以比作一个图解或一幅地图，在此基础上，人类思维从符号网络的一个节点转换到另外一个节点，且每次都会选择一个被认为最恰当的解释路径（参见 Sebeok，1986：第七章，“动物中参照游戏的命名：一个假设”）。

217

5.3. 西比奥克的作品与符号活动的命运

我们认为这样说并不夸张（可能只有一点点）：正因为有了西比奥克，符号学才获得了自我意识，就像哲学精神因黑格尔而获得自我意识一样（黑格尔对自己这样说）。对黑格尔来说，哲学自我意识与哲思的终结相联系；对西比奥克来说，意识到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活动能与符号活动终结的可能性相联系。仿效西比奥克所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符号活动与符号学：未来有什么？”

5.3.1. 四部曲

在十年之间，西比奥克出版了一套四部曲专著：《对符号学说的贡献》（1976），《符号及其大师们》（1979），《默思游戏》（1981a），《我想我是动词》（1986）。

在《符号及其大师们》的开篇中（参见第一章“自然和文化中的符号活动”，第3—26页；及第四章“符号学中的普世主义”，第61—84页），他将该书描述为“过渡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最近的哲学—语言学与符号学论争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这个评论的话，它可以延伸到他所有的研究中。但是，我们这里所指的是从以语言学（因而也以口语符号）为中心的“代码符号学”，向也能用来解释“文化的”或“自然的”非语言符号自足性和任意性的“解释符号学”的过渡。

在关于符号学和符号学大师的研究中，西比奥克讨论了“文化的”和“自然

的"符号学研究方法,该方法可简单凝缩到两个名字中:索绪尔与皮尔斯。符号研究从"代码符号学""过渡到""解释符号学",正是由这两个象征性人物所代表。至于目前,则是以皮尔斯为主导。

西比奥克较早的一本书《对符号学说的贡献》(1976)有着很强的理论偏见;在这本书中,他已经表达了对解释符号学的偏向。《默思游戏》(1981a)这本论文集认为符号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方法论工具及其潜在的使用;在风格方面更显得主题不明,尽管它也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比而言,中间的那本《符号及其大师们》考虑了代码符号学与解释符号学这两种可供选择的符号学所分流出来的218 不同可能性。《符号及其大师们》不仅是一本简洁紧凑的理论作品,它还提供了思想史上反映重要符号学者思想的符号研究中的各种选择、立场和阶段的全面概观,不论他们是直接还是间接处理符号的问题。

西比奥克的作品使我们成为符号学研究(逆推型)转折点的直接见证人和解释项。在其研究中,他探讨、评估和尝试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确定了可能的分析对象,也勾画了符号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边界——或更准确地说,暗示了符号学的无界性。

5.3.2. 作为符号学说和元符号活动的符号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性的,西比奥克既没有用尊贵的"科学"也没有用"理论"这些术语来命名符号学。取而代之的是,他反复地表示对"符号学说"的偏爱,这个术语源自洛克,他主张学说是一个原则与观念的主体,模糊地组成一个知识的领域。西比奥克也用皮尔斯所理解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术语(即,参考康德式批判)。也就是说,西比奥克为符号学赋予的任务不仅是观察和描述现象——这里指符号——同样也是询问体现符号特征和将符号具体化的可能性,既指符号所被观察到的情形,也指它们必然成为的情形(参见Sebeok,1976,"序言")。

"符号学说"的谦逊同时又宏伟的特点使得西比奥克对其可能性进行了康德式的批判质问:符号学说是自问的符号科学,尝试为自己做出回答,也思考自己本身的基础。作为符号学说,符号学也作为一种哲学实践,不是因为它幻想能够替代哲学,而仅仅是因为它不幻想符号研究可以不用解释思考其可能条件的哲219 学问题。

5.3.3. 从非人类解释者符号到人类解释者动词

《我想我是动词》(1986)是西比奥克四部曲的第四部。此后,其他重要的作品也很快相继问世,包括《动物符号学论文集》(1990),《美国签名:符号学研究

与方法》(1991a),《符号就是符号》(1991b),《符号学在美国》(1991c),《符号:符号学入门》(1994b),《如何与不说话的动物交流》(1998a),和《总体符号学》(2001a)。不能忘记的还有他一些重要的早期作品,如《动物符号学视角》(1972),以及他许多编著,包括《动物交流》(1968),《视景、声音和意义》(1978),以及《动物如何交流》(1977a)。

关于他的出版物,我们不再列举,只需要记住西比奥克从1942年开始就一直在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他的作品体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与探索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阐释了符号活动宇宙,并就其无尽的多样性、种类和表现做了大量的解释。

在《我想我是动词》中,他将自己的许多兴趣集合在了一起。这本书是关于符号学广袤空间的新研究计划的起跳板。书名让人想起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临终的话,其回响带有皮尔斯式的含意。实际上,在皮尔斯看来,人就是一个符号,正如所有生物都是符号一样。但是,西比奥克选择动词而非名词来表现这个符号的特征,是为了强调人类世界中符号的一种不断变成、改变和更新的状态。

西比奥克符号学说中重要的一点是生存是符号活动。维持生命、繁殖生命以及在科学的层面解释生命必然包含着符号的使用。西比奥克将生物和符号活动的宇宙之间、生物学和符号学之间的直接关联加以理论化。他的研究延展了皮尔斯所提出的人是符号的看法,因为它补充提出符号是一个动词:进行解释。根据西比奥克独特的现实观,解释活动与生命活动相重合——在他自己的情况中,解释活动与其整个生命相重合。作为研究者,终其一生他貌似就是在说:如果我是一个符号,任何是符号的事物对我来说都不是外在陌生的(nihil signi mihi alienum puto)。而且,如果处于无休止的符号链中的符号必然是“解释项”——皮尔斯用来描述符号效果,这个效果本身也是符号——那么“解释”就是能够帮助我了解自己的最好动词。

西比奥克的立场与索绪尔的立场相距甚远,后者将符号科学局限于人类文化的狭小空间,甚至是将其约减局限于有意交流的符号。相反,对西比奥克来说符号生命没有哪个方面会被排除在符号默思之外,正如符号学本身不接受限制一样,无论这些限制是取决于还是来源于认识论上的看法。但不管我们可能怎么想,西比奥克的作品并没有宣称自己具有无所不知的科学或哲学身份,也没有表示能不加区分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220

西比奥克意识到了他致力于探索的领域以及他所分析的问题的广阔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表现了他的解释所具备的内在的审慎、灵敏和谦让。这不仅对于他在符号的不可靠领域所做的探险是如此,在与让人迷惑的符号之符号的领域

（他探索符号学之处）的关系中，更是如此。

5.3.4. 欧洲与美国符号学：一个对话

在《符号学在美国》中，西比奥克在三个紧密相关又易于区分的层面分析了美国符号学。

在第一个层面，他就体现美国符号学特色的各种理论趋势、视角、问题、领域、专业和机构做了系统的历史研究。就历史层面而言，他担负起了重建美国符号学起源的艰难工作，确定了处于彼时话语体系中还为被称为“符号学”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研究至今还被认为仅仅是和符号学稍微沾边，如果不说是完全与其分离的话。

第二个层面是理论性和批评性的。西比奥克所采取的立场，对应了符号学的特定问题：包括关于符号学领域定界、一般符号模型的构建等问题。还包括更加具体的问题，关系到这门科学或“符号学说”的各个部门和次部门的问题。这第二层面的符号学问题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比第一层面更加全面综合的图景；因此，这本书避免了限于历史描述主义的危险。

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三个层面与第二个层面相关联，是因为西比奥克在发展和说明他的理论观点的时候，加上了他个人的观察和有趣的轶事。西比奥克本人也通常作为这些故事情节的主角。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符号学发展过程中的紧密参与——他数十年致力于此，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西比奥克与其书中的许多人都很熟识，而且关于这些邂逅都有着许多的记忆。这些全都出现在了他对体现符号宇宙的特色的问题与导向的描述中。

221

参照以上三个塑造因素，西比奥克的另外一本书《符号及其大师们》就与《符号学在美国》很相似。同样在这里，西比奥克话语中的历史、理论—批判和轶事线索相互交织——比他其他的书都要多，尽管几乎在他所有的文字中都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传成分。《符号学在美国》值得与《我想我是动词》一书作比较，其中他自己的经历明显影响了他选择讨论的话题、作者和人物特色。

西比奥克所有作品中直接且引人注目的地方可以被描述为他的“对话”和“复调”方法（均为巴赫金式术语）。西比奥克促进符号之间，不同等级符号之间，不同解释实践、领域和学界之间，以及符号“大师”之间的关系，包括那些之前从未直接接触过彼此或那些甚至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与符号打交道的人（他称之为“隐符号学家”）。

在皮尔斯的思想体系中，很明显的是他也认识到了思想发展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进化中（人类思想过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话”的重要性。他在1904年12月2日写给维尔比的信中，皮尔斯——已经被学术圈排挤在外，不得

不独自研究——写出了与她本人观点相一致的内容："毕竟一种哲学只能口传，此中有反对与诘问的机会。"（参见 Hardwick，1977：44）

从西比奥克漫长的教学生涯和他百折不挠地致力于培养"探索者群体"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他认为对话的连续有着极高的重要性。正如艾丽丝·史密斯（Iris Smith）在她为西比奥克的《美国签名》写的前言中所提出的，这位大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特生活方式验证了个人思考必须以其他人的思考作为衡量标准。

5.3.5. 生命之后的符号活动的命运

222

符号学领域延伸至遍布所有地球生物体系，从较低的分子机制领域，到较高的名为"盖亚"（Gaia）的假设实体，后者在希腊神话中指"地球母亲"——20 世纪 70 年代被科学家引进，用来指代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包括无数种地球生命的互动。

正如西比奥克引用《格列佛游记》中的典故时所说的，符号活动从分子基因学和病毒学的小人国世界展开，延至格列佛的人类世界，最终到达盖亚的巨人国世界，即我们浩大的生物—地理—化学生态系统。

那么在此之外呢？我们能否说符号活动延至盖亚之外？"之外"这一术语是指空间还是时间？超越盖亚、盖亚之外，或者说这个浩大的生物生命期之外的符号活动有没有可能？西比奥克本人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体现在他的文章《符号活动与符号学：未来有什么？》的名字中。

在西比奥克的研究中，他反思了过去三十到四十年中符号学重大的整体进步和扩大。从符号学作为任何一种信息交换和相关符号系统的研究这样一个简单定义（他对此持批判态度）开始，西比奥克将符号学理论化为调解现实与幻象之间的"默思游戏"：

> 符号学的中心专注对象是有无限系列的和谐幻象；它主要的使命是调解现实与幻象——支撑现实的底层幻象，并搜寻可能最终潜藏在该幻象之后的现实。从今以后，这个逆推式的任务将变成未来人们追求的特权，只要年轻一辈能够被引导而留心他们所选出的药师的建议。（1986：77—78）

西比奥克所提出的关系到符号活动的命运的问题源于他对符号学之于符号活动的责任的意识。我们的主张是总体符号学现在应该发展为我们所说的"符号伦理学"。

5.4. 西比奥克的符号学与教育

5.4.1. 符号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

在《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里的一节"符号学与学校"中,莫里斯提出使用符号学作为教育的基础并不是要将它引进为独立的学科,或者将术语引入学校体制的早期阶段。相反,其目的是向教师展示我们在教育过程的每个阶段的表现中符号所扮演的角色,符号如何达到各种目的,它们如何促进和阻碍现实交流。

223

> 在高等教育的层面,具体细致的符号学研究能够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在早期阶段应该做的充分使用符号的训练的重要性。(1946,见 1971:326)

换句话说,符号学对教育的贡献是方法论上的,从教育的理论基础到教学的具体方面。教育的符号学研究既是关于教育的,也是关于符号学的。在《符号学手册》(Nöth,1990)中,温弗里德·诺特在第三章"符号活动、代码与符号学领域"中专门用了一段("教学")来描述符号学与教育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涉及到:作为符号活动与交际过程的教育互动(参见:221—222);符号学在学校课程教学中的角色(比如母语和外语教学);外国文化中的非语言和视觉交流;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符号学;教学方法论的符号学基础;作为学校课程的视觉艺术和媒体语言(参见:222—223);最后,还有符号学作为学校和大学的特定科研领域(参见:223—224)。

诺特将西比奥克列入那些帮助符号学进一步发展为大学学科的人群之中(参见 Sebeok,1976:176—180;1979:272—279),他们设计教学大纲和讲授课程,并在符号学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参见 Sebeok、Lamb 与 Regan,1988)。

但是西比奥克对于教学领域方法论研究的最大贡献是通过他在符号学领域的创新观点而作出的。马塞尔·达内西的《符号中的身体:托马斯·A. 西比奥克与符号学》(Danesi,1998)一书的目的正是思考西比奥克的研究对一般意义上的教学的启发。这本书解释了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方法,进而向教育学家和教学法研究者介绍并展示他的研究能为他们的领域提供的启示。

5.4.2. 西比奥克的研究对教育的启发

目前,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方法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跨学科。因此,他对教育实践和教育领域研究的未来的贡献不在于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学习理论。他关于学习过程中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使用的符号学视角也并不排除从其他角度所做

224

的描述。

西比奥克拓展了传统符号学的疆界，后者受到将部分（即人类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当作整体（即所有可能的符号，人类的与非人类的）的基本错误的误导。对比而言，如前文所描述的，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是“生命科学”与“符号科学”交汇的地方，因而也是意识到人类是符号宇宙中的一个符号的地方。这一研究方法预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批判，当然涉及到如何发展教育目的和方法的问题时，二者无疑也有着积极的效果。

根据达内西所说的（1998：61），西比奥克符号学与教育研究和实践相关联时，有两个关键点。首先，学习和符号活动是同时发生而且功能互补；其次，人类发展中的所有种类的学习，如同儿童期的结果那样，是建模的过程，能被描述为从像似性到文化象征主义的“流动”。儿童将通过身体习得的知识和技能模型化，这些知识技能首先是以像似的方式习得，后来随着他们将人类自然初级建模改变为文化语境中的二级和三级建模，再以象征的方式习得。西比奥克关于人类建模的分类在教育符号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达内西（同上：28）在参考西比奥克的“交流、语言和言语：进化学描述”（1986，第二章）时解释道，把语言看作主要是出于交流目的而发展的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与西比奥克一样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本质上是“思维工作”；言语是“耳朵和嘴巴工作”。

因为有了句法，我们知道人类语言——像积木一样——能够用无限的方式重组有限的组件。作为建模工具，语言能产制无限的模型，这就将我们带回到“默思游戏”的话题。不同语言的激增以及“语言创造性”（乔姆斯基）证明了语言——作为一种初级建模工具——产制许多可能世界的能力。

乔姆斯基坚持“（口头）语言的创造特性”，但是他的语言学不能解释自然语言的多样性［也不能解释任何一个自然语言中的“内在多语性”（inner plurilingualism）］。原因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预设了内在的普遍语法。实际上，人类发明出多样的自然语言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初级建模能力的直接结果，因此也是发明多样世界的能力的直接结果。换句话说，自然语言的多样性来源于语言的“默思游戏”倾向——或者如詹巴蒂斯塔·维柯所提出的，人类特有的语言“诗性逻辑”倾向。

225

5.4.3. 从教育到语言和言语的相互适应

关于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西比奥克评论道，这需要编码与解码能力的相互适应。语言是为了交流而被“联适应”（首先以言语的形式，即为了“耳朵和嘴巴工作”，后来是以文字的形式，等等）；同时，言语也是为了（二级）建模而被“联

适应”,即为了“思维工作”。但是,在“在什么意义上语言是‘初级建模系统’?”(《符号就是符号》第五章)这一问题上,西比奥克补充道:“因为绝对的相互理解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这个系统仍在微调和修理之中。”(1991b:56)

达内西指出,西比奥克对教育领域和一般教学法研究的评论很值得注意。请看如下摘自《符号就是符号》第七章“朝向语言的自然史”的关于教学的启示:

> 有理由假设,说话所要求的编码能力对理解言语所要求的解码能力的适应或微调,以及解码能力对编码能力的适应与微调,用了大约两百万年才达到最低限度的部分(完全的理解是一种奢侈品;多数情况下我们多数人并不怎么知道另外一个人究竟要和我们说什么)。即使是今天,人类还没什么特别的言语器官,只是由一个原来被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功能的器官通道组成:食道和呼吸道。跟其他声音一样,言语被耳朵接收,耳朵又有着另一个进化源头,而且还是一个新近获得的感觉器官。(同上:70)

人类思维在意义和概念中移动,达内西(1995,2000)称这种移动方式为“想象式的心理航行”,发生在一个解释路径的网络中,这个网络所根据的是形成我们常称为“文化”的复杂系统或宏观网络的关联。

因而,“语言能力”与“交流能力”这两个概念都不足以解释思考与说话的行为——表述与推论。这些能力都是一种有机概念能力的一部分——(如达内西所展示的)将各种概念起源的心理方案转变为语言和交际结构从而创造恰当和适切的信息的能力。这种概念能力包含三种次能力:(一)隐喻能力,即产制隐喻上恰当的概念的能力;(二)反映能力,即选择反映信息的恰当概念领域的语言结构和范畴的能力;以及(三)文化能力,即跨越信息所使用的不同话语领域和概念领域的能力。

226

真正的“语言能力”包含组成新的隐喻联系的能力、提出新的知识组合的能力、发明新的表征的能力。这是人类象征行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是人类物种特有的初级、二级和三级建模系统的基础。

参照口语和思想的关联特征,与达内西一致并与笛卡尔式思考主体模型相反,我们可以说人类根本就不是理性思考者;相反,他们是灵巧的“猜想者”。“猜想”,正如皮尔斯所说的,是论证的特点,关联文化宏观网络中相隔较远的不同术语的风险越高,论证就越能创造和革新。

5.4.4. 符号学与“接近发展”的远见

达内西尝试通过以下这句话来总结西比奥克对一整代符号学家的教导:“符

号中的身体”——也就是说，生命是由符号活动定义的。对于人类物种，这意味着符号活动时连接身体、思维和文化的纽带（参见 Danesi，1998：16）。《符号中的身体》正是达内西关于西比奥克与符号学的专著书名。西比奥克考察了自然与文化中符号活动的表现类型，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在人类符号活动中，符号、身体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与西德尼·M. 兰姆（Sydney M. Lamb）和约翰·O. 雷根（John O. Regan）的对话《教育中的符号学》中，西比奥克做了如下评论：

> ［皮尔斯说］整个宇宙充斥着符号。后来他又有深意地补充说宇宙可能确实完全由符号组成。这个说法的难题在于它不可被证实。如果你相信宇宙充满了符号，而且正如兰姆教授所说的，我们都有一个宇宙的心理模型，一个内化了的心理模型，它只将符号接受到思维之中，而不接受任何其他事物，那么，如果还有其他什么事物留在思维之外的话，它将无法被证实，因而也不是知识。这被称为激进的唯心主义立场。而作为温和的唯心主义立场，我们会说我们感觉也许还有着什么东西。比如，赫拉克利特说过还有着他称为“逻各斯”（logos）的东西。但谁知道呢？而且我认为这一激进的唯心主义立场与某些形式的量子力学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确定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我们不同意，那他就得证明还存在着某个我只能通过符号的手段来了解的东西。（Sebeok、Lamb 与 Regan，1988：12）

227

西比奥克还主张，像似性是默认形式的符号活动，而且可见证于产制与所指有某种直接模拟关系的符号的能力的迥然不同的物种表现中。根据这个方法，像似性是各种生命形式的基本意指策略。表征的像似性方式是符号通过复制、模拟、模仿或相似而与其所指的关联。在他的各个作品中（1979、1986、1991b、1994b），西比奥克都展现了不同物种中像似性的各类表现。像似符号可以是听觉的，视觉的，嗅觉的，味觉的或者触觉的。也许人类的所有符号也是在与它们的指涉域的模拟关系中开始的。与皮尔斯一样，西比奥克将像似性视为人类物种的原始表征策略。达内西（参见 Danesi，1998：10）认为像似性是符号研究中最具有关联性的一个方面。他强调像似性在连接符号活动、身体、思维和文化的纽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西比奥克在其 1986 年的专著中用最后三章评述了这个角色。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体现为像似性的表征行为。“像似性实际上是这个联系的证据。”（同上：37）达内西把表征的像似性方式是身体性符号活动的初级手段这个构思称为像似性假设（同上：18—20）。

因此，西比奥克符号学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感官推论假设”（“the sen

implication hypothesis”,同上：17),认为符号活动基于感官的体验领域。这个原则在洛克那里有着哲学先例,洛克认为所有观念首先都来自于感受,然后才是反思;但它也与建模理论相关联:通过身体而习得的东西在不同物种所拥有的各种

228 内在建模系统中被模化。实际上,一个物种是根据它们自己独特的解剖学结构和自己的建模系统来感知的。正因为有了其物种特有的建模系统,即西比奥克所说的语言,人类才是改造世界的建模者,而且有一种以无限不同的形式来再造其世界的卓越能力。

西比奥克生物学所描述的人类建模中与教育相关的部分就是达内西所说的“自然学习流程”——儿童习得语言的符号活动过程。这个过程通过身体和人类初级建模系统而发生,而且从像似性开始一直进行到儿童在文化语境中所学到的建模形式。达内西说(同上：61),自然学习流程原则意味着学习者的符号活动能力与其符号活动阶段的确定——而不是所要学的知识对象——就应该是教育的焦点。西比奥克建模理论对教育的主要启发是方法论性质的。

如果教师熟悉人类学习所包含的符号活动的形式,他们将会更好地帮助学习者获得知识和技能。达内西说,成功学习的关键实际上毫无疑义地取决于一个学习阶段在哪一个点上可以进到俄国心理学家和符号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1962)所说的学习的“最近发展区”。关于教育的符号学方法在理解每个特定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域上不可或缺。

5.4.5. 从总体符号学与教育到对生命的责任

另外一个论点可以加到达内西所提的关于总体符号学对教育的启发的论点中去。我们认为教育所达到的目标中应该也要包含批评、社会意识和责任行为的能力。西比奥克的生命符号学与教育者和教学法研究者受众相关,这是因为它对关于现今条件,即全球化条件下交流的综合批评理解的启发。

当今世界的特点是由电脑推动的新工业革命,全球自由市场,还有遍布整个生产周期(生产、交换、消费)的交流普遍性。在这样的语境下,交流被资本主义

229 利用压榨以获取利益。这对交流来说是一种危险;我们面临着摧毁交流本身的风险,这里的交流要理解为整个星球的生命存在可能(Ponzio 与 Petrilli,2000a)。

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所冒的风险,而且传递给他者(尤其是后代),以及通过采用和我们的社会体系本身一样的全球视角来教他们责任感:这意味着领会交流与生命之间的联系。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或生命符号学正提供了这样的视角。

在时空的双重意义上,西比奥克的星球视角都为同期性的研究方法创造了条件,同期性并不限于同期性本身的范围,它允许对责任的假定,即应分的责任的假定(参见：Petrilli 为 Sebeok,1991b 的意大利语版本写的序言;亦见 Petrilli,

1998e；Ponzio 与 Petrilli，2001、2002、2003）。

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的跨学科焦点，以及他对身体和物种之间互相关联的符号的注意，共同预设了一种教育方法，使之摆脱了有偏见的、有限的和扭曲的观点，也摆脱了在当前条件下的交流实践。这就是西比奥克的研究对教育的另一个启发，也是达内西总结"西比奥克所说的话"时用的"符号中的身体"这个表述的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我们所预想的，符号活动正是连接身体、思维与文化的纽带。

生平简介

托马斯·A. 西比奥克，1920 年 11 月 9 日生于布达佩斯，2001 年 12 月 21 日在印第安纳布卢明顿逝世。他于 1937 年移民到美国，1944 年成为美国公民。1944 年他成为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教师，之后成为 1969 年成立于巴黎的国际符号学会会刊《符号学刊》杂志的第一位主编。西比奥克是符号学被确立为一门现代科学的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推进"总体符号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他的研究主要受到查尔斯·S. 皮尔斯、查尔斯·莫里斯和罗曼·雅各布森的启示，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

乔治·普罗迪（1928—1987），"一方面，他是其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肿瘤学医学生物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是符号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形式逻辑的一位具备高度独创性的贡献者，同时也是一位值得注意的文学人物。普罗迪对这个领域（免疫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最早贡献是《基础：意指的材料》（*Le basi：materiali della significazione*，1978）"。（Sebeok，"Foreword"，Capozzi 编，1997：xiv）

230

乔瓦尼·瓦伊拉蒂（1863—1909），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过他与维尔比的合作，下面一章也将会讨论到，因为他的哲学和费鲁齐奥·罗瑟—兰迪所提出的语言哲学联系得很好。所以，此处稍微提及他，也将有所帮助。

瓦伊拉蒂是一位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他是朱塞佩·皮亚诺的学生。他于 1892 年和 1899 年在都林大学讲授数学和物理学；后来他又在意大利一些不同城市的各个公办学校教书，包括巴里在内。他与维尔比、弗朗兹·布伦塔诺等人有过通信，而且他尊崇并发展了维尔比的意义学。他承认皮尔斯实用主义的重要性，并将之引介到意大利知识界。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成为了出众的语言哲学、科学史和认识论方面的创新式思想家。瓦伊拉蒂研究的一个中心目的是揭开表达歧义与语言逻辑错误的面具。在他的文章中（收集在《文稿》中，

1911、1987)，瓦伊拉蒂指引我们关注源自语言错误使用的语言混乱，并提出寻找“有效的教学设计，培养感知语言歧义的习惯”（写给维尔比的信，1898 年 12 月 12 日，见 Vailati，1971：141）。

在《提问的艺术》（1905）中，瓦伊拉蒂提出“这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产生偏见性的句子和机械式定义——应该被换为“假如……你会怎么做”或者“为了……”等等，强调概念或定义与行为、语境和预期之间的联系。与维尔比一样，瓦伊拉蒂特别强调“这对你、对我们意指着什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在《逻辑的比喻》（1905）中，瓦伊拉蒂展示了隐喻不仅出现在日常语言、修辞学和诗学中，也出现在逻辑和数学中（比如“基于”和“上升”等表达）。在《代数语法》（1908）中，他从符号学的角度将口语和代数语言做了比较。

在独立于皮尔斯的前提下，瓦伊拉蒂意识到了在实验与发现过程中逆推的重要性。在意大利，继续沿着瓦伊拉蒂所指出的方向来研究语言的明确而有规划的工作的代表是费鲁齐奥・罗瑟—兰迪的研究（见 Vailati，1972、1987、2000；Petrilli，1990a；Ponzio，1990b；Quaranta 编，1989）。231

第六章
关于罗瑟—兰迪

1968年，意大利学者费鲁齐奥·罗瑟—兰迪（见第226页生平简介）出版了《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Rossi-Landi，1992b（1968），英译本，1983]，该书直至今日都还因其时事性和洞察力而不同寻常。在当今资本主义时代，信息交流是生产的构成要素，“非物质性劳动”是主要的经济资源，罗瑟—兰迪预见的问题现在仍被看作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不仅在生产周期的中间环节（根据市场逻辑，即流通或交易环节），而且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尤其随着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整个通讯网络的到来，信息交流都起着主导作用。我们一旦认识到商品即信息，信息即商品，那么很显然，消费本质上就是信息的消费，生产就是信息的生产。

罗瑟—兰迪详细阐释了社会再生产中的语言生产、语言劳动、语言资本等概念，同时识别了跟物质生产的对应关系。正如目前日常用语中某些术语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概念现在被视作描述当今社会再生产周期的基本概念。我们所提到的术语包括“非物质资源”、“非物质资本”和“非物质投资”；如今这些术语的流行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它们对今天的知识社会的发展和竞争非常重要，这就取决于教育、信息和专业知识。直到最近，物质生产和语言生产分别以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形式出现，尽管在深层的起源和结构层面上，它们具有同源的关系，但它们被看作是彼此分离的两类生产。在所有这一切中具有新意的是，在全球化通讯的世界里，语言生产和物质生产已经融为一体。随着计算机（一个装置内既有硬件又有软件）的出现，以下两方面的联系趋势愈发明显：一是劳动和物质产品方面，二是劳动和语言产品方面；语言劳动（这是一种“非物质劳动”）的优越性如今已是显而易见。换言之，语言劳动正引导着生产和发展的过程。

232

罗瑟—兰迪1968年著作的基本假设是，语言生产对社会生活来说意义重大，因此和器具、制品的生产是一致的。[他会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更系统地阐述这一思想，例如《语言学与经济学》（1975a）。]罗瑟—兰迪将言语语言描述为一种产品系统，并根据非言语符号系统将其他产品系统概念化。这种研究方法使得他将语言生产的概念扩展为符号生产。当我们应用这一框架时，显而易见的是，原先

在言语以外的领域提出的概念——如“消费”、“劳动”、“资本”、“市场”、“财产”、“剥削”、“异化”和“意识形态”——可以应用于语言研究。同样，与言语语言的研究有关的概念也可以应用于非言语符号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消费、语言劳动、语言资本、语言异化，等等。罗瑟—兰迪的研究为普通符号学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它包括结合了语言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他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具有普适性也很有见地，其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通信生产的社会里，对科学进行划分毫无根据，事实上完全是一种时代错误。

6.1. 罗瑟—兰迪的语言哲学

6.1.1. 他的符号学研究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至 80 年代，罗瑟—兰迪在意大利进行的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开拓性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他的研究方法既是一元的又是多元的；其总的研究路向可以这样描述：它是在符号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语境中对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正如罗瑟—兰迪本人在下面这段引文中所声称的，他的思想体系在普适性方面经常被简约为其中一个方面：

233

> 在欧洲大陆，人们以为我是一位不重视历史和社会的符号学家，或是一位语言或分析哲学家；而在英语国家，人们认为我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分析家，或认为我仅仅是一位黑格尔派哲学家，或仅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等等。（Rossi-Landi，1992a：2）

罗瑟—兰迪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阶段。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50 年代，包括他 1953 年的著作《查尔斯 · 莫里斯》（1975 年修订扩展为《查尔斯 · 莫里斯与 20 世纪符号学》，其中增加了他 1975 年的一篇论文“关于符号大师的符号”，现收录于 Rossi-Landi，1992a：17—57；参见 Petrilli，1992c 中的“罗瑟—兰迪与莫里斯之间的通信”）和《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1961，重印于 1980 和 1998）；后一本书可以看作他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的总结。

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60 年代，包括四本书。《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1992b（1968），英译本 1983] 提出了普遍的语言生成和符号生成理论，其也是普遍的语言劳动和符号劳动理论，为语言学与经济学之间对应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符号学与意识形态》（1972，重印于 1979 和 1994）则在前一本书的基础上做了扩充，增添了一些重要的论文，例如“语言相对论的意识形态”，此文后来作为单独的著作以英文出版，题为《语言相对论的意识形态》（1973）。《语言学与经济学》（1975a，

重印于 1977）一书是以英语写于 1970—1971 年，该书是《当今语言学趋势》系列丛书的第 12 本。

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70 年代，著作包括《意识形态》（1978a，重印于 1982）。在这一阶段，罗瑟—兰迪讨论了意识形态与言语语言之间的关联，特别重点探讨了语言异化问题。他还写了各类文章，后来收录于《哲学方法论与符号科学》（1985a）。

这三个阶段中有多篇论文在罗瑟—兰迪去世后收录于《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1992a，S. Petrilli 编），其中有一些文章是首次以英语出版。该书是罗瑟—兰迪本人筹划的，但在他生前未能出版的许多作品之一。

234

罗瑟—兰迪的研究对于当今社会信息交流的批评性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人类是从语言劳动与非语言劳动（即符号劳动）的结合中符号化生成的，他们受支配于社会编程。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描述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阶段，在该阶段中，信息交流与市场一致，因此，商品和信息都被盲目迷恋，与生成它们的社会关系隔离。在这一语境中，人类越来越受制于社会异化过程，因此也受制于普遍的语言异化和符号异化。这些问题在罗瑟—兰迪那里都得到探讨，他通过运用与符号批评有关联的意识形态批评的手段阐发了自己的思想。

6.1.2. 共有言语理论

在《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一书中，罗瑟—兰迪阐发了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作品中就已经表达的关于符号和言语语言的思想。在 1961 年的这部作品中，他跳出索绪尔的视角、跳出语言系统（langue）和个人言语（parole）的简约二分法而研究语言。因此，他没有将交流的概念局限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个体被认为彼此互相独立且在交流过程之前就预先存在。

《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在融合两种不同传统方面是一次突破性尝试：一是带有德国和欧洲大陆影响的意大利传统，一是英国分析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更精确地说，该书算得上是第一次尝试，第一次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传递给查尔斯·莫里斯的带有牛津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胡果·丁格勒的操作主义要素的思想路线，移植到欧洲大陆非唯心论历史主义的躯干中的尝试。

该书第一版包括一个很长的关于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分析附录；该附录在 1980 年第二版中被删除（见 Ponzio，1988）。罗瑟—兰迪高度评价的一位意大利学者是乔瓦尼·瓦伊拉蒂（1863—1909）：他是最早欣赏皮尔斯符号学及其实效主义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也是与维多利亚·维尔比有通信往来的学者之一（见 Petrilli，1988；Ponzio，1990b）。

罗瑟—兰迪在《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中第一次介绍了他的“共有言语”概

235 念,以表示通过言语进行的操作。他认为尽管在具体的现实中会出现非常明显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但这些操作是人类进行成功交流所必不可少的。这一概念的基本设想是:所有人类社团的生物和社会结构中都存在基本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凌驾于所有可能的历史和地域差异。

在1961年之后,罗瑟—兰迪将共有言语的概念发展为"语言劳动"和"普遍的符号劳动"。后来[首次在1994(1972):201],他在研究分析中引入更宽泛的"社会再生产"概念。尽管在1961年之前,罗瑟—兰迪已经通过他的共有言语概念批判索绪尔,但只是在1968年《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一书中,他才专门讨论费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正式的"索绪尔。共有言语与牛津的普通语言的概念或新实证主义的理想语言的建构无关。罗瑟—兰迪解释说:

> 在所有真实的或可能的语言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的组成部分,那就是"集体言语",我有段时间称之为共有言语;我们可以将它区别于索绪尔的个体 parole(言语),区别于牛津人的普通或日常或通俗的语言,区别于通用模型创建者的专业的、特殊的、理想化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这三个概念的综合体。共有言语是对[整个人类]语言而不是某一门语言的描述;它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描述。作为调查过程中所进行的描述,它部分保留着某一特殊语言的性质。[Rossi-Landi,1992b(1968),英译本:40]

罗瑟—兰迪在《意识形态理论词典》[《意识形态》12,1970:38—44,重印于 Rossi-Landi,1994(1972):301—308]的"符号学"词条里指出,索绪尔的符号模式的优点是指出了 signifiant(能指)与 signifié(所指)的联系。然而,罗瑟—兰迪(同上:21ff)建议使用奥古斯丁的术语 signans(能指)和 signatum(所指),以避免索绪尔的 signifié 带来的心灵主义歧义,并指出,索绪尔的符号模式带有将符号整体具体化的危险,它将符号整体看作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实体。与这种模式相反(甚至与克劳德·香农和瓦伦·韦弗的信息论所提的模式相反),由皮尔斯
236 提出后经莫里斯发展的符号模式,指的是作为分析起点的符号环境或符号活动。诸如符号载体、意义、指称物、解释者,甚至符码等因素被视作符号活动整体的一部分;事实上,它们呈现为同一符号活动过程的不同方面。

罗瑟—兰迪提出共有言语概念以对抗牛津分析哲学所提出的"普通语言"概念。英国分析哲学最严重的局限之一是,尽管有迹象表明相反的情况,但它却误将某一特定的自然语言的特征——如英语——当作普通的、日常的和通俗的

语言。

"普通"语言的一般和抽象层面与处于历史发展中某一特定时刻的"自然"语言的具体层面之间的这种混乱现象经常发生。这种说法适用于牛津分析哲学的语言概念及其最新的发展,也适用于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该理论误将某一语言(又是英语)的具体特征视作人类语言的普遍结构。乔姆斯基用以解释其理论的句子无法译成其他语言,这足以说明该问题的存在。塞巴斯蒂安·苏姆扬指出了乔姆斯基转换模式中最根本的局限:它将两种不同抽象程度的要素混为一谈——理想语言和自然语言。因此,乔姆斯基的理论模式无法应用于他用以描述的语言以外的自然语言。这导致苏姆扬将他自己的生成语法二元渐变论与乔姆斯基的一元渐变论进行比较。与乔姆斯基不同,苏姆扬区分了两个不同的抽象层次:基型语言和表型语言(参见 Shaumyan,1965)。

罗瑟—兰迪的共有言语概念与多语现实(即彼此不同的成千上万种语言的共存)并不矛盾。相反,它有助于解释多语现象,正是因为它谈到了不同语言在满足表达和交流需求时所履行的功能的相似之处。共有言语通过每一单个语言为满足社会表达和交流需求所提供的手段、方法和资源的多样性,解释了语言的差异、多变和多元的特征,并证明其合理性。这种多样性是所有语言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但让我们记住这一点:鉴于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没有任何事物是完成性和终极性的)。有些研究方法追溯语言多样性的源头至某种原始语,或追溯至人的理性或生物本性的普遍语言结构;与这些研究方法相反,共有言语概念既没有忽视也没有低估乔治·斯坦纳(Steiner,1975)所说的"巴别塔之谜",即语言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罗瑟—兰迪所提出的共有言语没有神话般统一的意味,没有所有语言共同起源的意味,更没有依照自然法则统一人种的意味。他在 1961 年那部著作中对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而 1968 年那本书里说得就更清楚了。他在 1968 年的著作里以劳动阐述了共有言语的概念:

237

> 各种不同语言所履行的功能的相似之处源自这样的事实: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般形式,即将任一人类社会与前人类(仅仅动物)社会区别开来的基本劳动和生产关系,都必须得到表征。[Rossi-Landi,1992b(1968),英译本:41]

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参见《意识形态》,1982,1.3 单元,尤其是 1.3.5 单元;1985a),罗瑟—兰迪继续研究并进一步阐发了表达和交流需求的概念以及基本社会过程的概念。

共有言语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于牛津分析哲学的语言概念;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在罗瑟—兰迪撰写《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一书时，英国分析哲学在意大利或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被看得有多么重要。恰恰相反，当时处理理论问题时，分析哲学还没有获得被重视的地位。罗瑟—兰迪的研究在当时非常具有突破性——以《查尔斯·莫里斯》(1953)为代表，其后是他对莫里斯的《符号理论的基础》的意大利语译本和评述版(1954)，后来是对吉尔伯特·赖尔的《心的概念》的译本(1955，重印于1982，事实上与其说这是译本还不如说是改写！)——以至于《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一书问世时，就所讨论的理论潮流而言，处于完全被忽略的局面。因此，罗瑟—兰迪的研究受到误解，不仅因为他所探讨的问题，而且跟他研究问题的方法有关，因为他的研究与哲学研究所关注的主导性概念不一致(见罗瑟—兰迪在《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一书1980年版中的导言；又见他1978年的论文"论后莫里斯时代的一些问题"和他在《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一书1983年美国版中的导言)。罗瑟—兰迪是在一个具有悖论特征的形势下撰写并出版了他1961年的著作：他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被忽视的，或被认为不值得关注，被认为"高估"了语言问题。从这点说，莫里斯被误认为是一位"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学家"，罗瑟—兰迪的书至多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分析哲学的贡献。

238

在赖尔的一些更为著名的文章里，他曾尝试区分使用与用法。这一区分或多或少对应于语言与语言体系的表型区分。罗瑟—兰迪在尝试语言学背景和非语言学背景下识别语言的普遍状况上更进了一步。我们可以说，共有言语具有存在维度。

《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一书决心解释语言使用而不仅仅是对其描述；它的思想路线已经勾勒出来，正朝着《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一书和关于维特根斯坦构想的使用概念发展。在该书中，罗瑟—兰迪提出了语言生产理论，任何语言单位都可视作个体和社会语言劳动的产品。根据这样的概念，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思想似乎与某种已经产生的东西有关，却忽视了那个东西是如何产生的。罗瑟—兰迪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同时也根据皮尔斯和布拉德雷的思想，阐发了他对语言使用概念的批判。如罗瑟—兰迪所说，维特根斯坦缺少劳动价值的概念，因为"他从语言对象出发，只往前进，从不回头"[1992b(1968)，英译本：31]。

在他给《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一书美国版本所写的导言中，罗瑟—兰迪阐明，该书中许多思想"在1961年那本书里已经存在，只是以胚芽形式存在而已"。不管情况如何，我们认为，《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有其本身的价值，无论后来有什么发展，它本身代表着语言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事件。我们不得不赞同罗瑟—兰迪的说法：他自己在《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第24—27页)中阐述的对1961年那部书的批判需要修改(见《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1980年版他写的导言：25—26)。他沿着历史唯物主义路线进行语言符号学反思，从他这一研

究项目来看，共有言语的概念或许有点“心灵主义”味道；因此，必须从社会劳动角度对其重新阐释。然而，如果我们撇开罗瑟—兰迪后来思想的发展，单独考察共有言语思想，那么他自己的批判即使不是完全不合适，那也有点“过分”。 239

罗瑟—兰迪本人在《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1980年版的导言（26）中交给了我们正确解读他的作品的钥匙。共有言语的概念提出了一个模式——它是一个理论构建而不是直接描述真实的过程，尽管它指的是真实的过程。相较于分析哲学家所提出的普通语言的概念和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和生成语法的概念，共有言语是一个具有解释功能的模式，是一种我们可以应用于不同语言的假说。换言之，共有言语（或“言说”）的目的不是描述语言的使用，而是要提出一个能解释语言使用，因而能应用于所有语言的理论模式。在这一意义上说，包含语言使用的理论并非就是心灵主义的，在本体上也不存在于自然语言之前：罗瑟—兰迪的模式是解释性假说的结果，它提出了一个理解真实语言现象的理论手段。

在他1961年的著作里，罗瑟—兰迪——非常类似于苏姆扬——提出了一个二元渐变语言理论。该理论根据他的共有言语假说（基型层面），解释了某一特定自然语言中具体语言用法（表型层面）；该假说的效度随着我们将其推广至更多不同语言而增强。罗瑟—兰迪在给《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第一版写的前言中有一段话给我们做了这样的解释（1980：9）：

> 无论是生物心理学或社会学类型的符号行为科学研究，还是语言学家关于各种语言事实的分析和历史研究都被排除在外。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提供的是有关研究现象的认知推理型的理论或学说。相反，我只是想提供一种结构性背景，作一点阐释的尝试。要研究语言中先验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要采用先验演绎方法。

这是一种假设演绎法——或更恰当地说是“试推的”方法，这让我们想起皮尔斯的“试推法”概念，它根据使得事件成为可能的一般条件的假设来解释某一事件。 240

6.1.3. 先验的语言

“共有言语”显示的是各种语言之间尽管存在差异却具有共同之处的部分。毫无疑问，当我们说话时，我们是以某一自然或历史语言（如意大利语或英语）来进行的。此外，言语总是于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发生于某一民族语言的某一特定语类之中（家庭语言、伦理语言、科学语言、神学语言、诗学语言等等）。然而，尽管言说总是发生于某一特定的民族语言中——事实上是发生于某一语类——但在各

种差异中也总是能够发现永恒普遍的因素。

简言之,"共有言语"中可重复的操作确保了它的相对恒定性。即使这些操作并非绝对恒定,其恒定性也足以让我们将其视作相对于不同语言和不同语境中的相同操作。共有言语关注的是使意义和交流成为可能的一般条件。此处的"可能"是从伊曼努尔·康德的意义上理解的,它关注的是语言中先验的部分——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使得这些事实成为可能的条件。

对于罗瑟—兰迪来说,共有言语具有条理化功能。通过这样的解释,语言研究就是寻找语言和人类言说在其表意能力方面的总方法论[参见 Rossi-Landi, 1998(1961):158ff]。共有言语告诉我们语言是如何运行的;它标示出我们说话时不可避免地进行的操作。在这方面,罗瑟—兰迪的研究受到康德先验逻辑的启迪,他继而又对其进行了修改。共有言语坚持康德所搁置的内容——语言的总条理化能力。有意义的是,罗瑟—兰迪对康德的重新解读渗透着恩斯特·卡西尔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渗透着"康德式皮尔斯"的影响,还渗透着一些英国分析家的影响。

先验存在于语言。共有言语不应该被简化为"表达出来的语言"结果;相反,它关注语言"内部和隐藏的结构"(同上:165)。这一概念暗指 innere Sprachform(内部语言形式)的概念,是卡西尔从卡尔·威廉·冯·洪堡特那里借来的术语,与语言是 energheia(活动)而不是 ergon(产品)的观点有关。我们相信,罗瑟—兰迪采取的是反对乔姆斯基"笛卡尔语言学"(这是乔姆斯基 1966 年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在该文中,他试图将冯·洪堡特和康德的思想吸收到自己的观点中)的超前的批判立场。乔姆斯基的语言概念无法摆脱古典的选择:意识还是经验,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说,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康德的批判及其对抽象理性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的超越。卡西尔发展了一种具有语言学结构主义特征的理论视角。然而,不同于结构主义中的描述和分类方法,卡西尔指出,有必要说明语言结构如何形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先已存在的形式的研究上。

241

卡西尔后来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结构语言学可以定义为苏姆扬意义上的动态理论——该理论不是静态地识别语言的共时性,而是集中考察语言共时性的动态方面。因此,卡西尔的理论不仅不同于分类学结构语言学,也不同于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行为主义除了诉诸 17 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以外别无他法;他坚持认为,语言行为的研究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心灵主义和先天主义所提供的方法[参见 Rossi-Landi, 1998(1961):142]。

皮尔斯符号学也与康德哲学有关联。事实上,皮尔斯提出了一个"新的范畴目录"(CP 1.545—1.549),这个目录以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重新解释先验和超验。皮尔斯符号学明显是反笛卡尔的,它认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二元区分枯燥而

抽象，对其加以拒斥（参见他1868年的文章"有关人的某些官能的问题"和"四不能的一些推断"，收录于CP 5.215—5.263和5.264—5.317）。

罗瑟—兰迪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提出，共有言语是一种具有条理化功能的先验之物。他从这一点作出判断：在对表意过程的研究中，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和逻辑—语言学研究与历史主义的对立并不一致，且具有任意性，在撰写《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时，该趋势在意大利哲学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罗瑟—兰迪还指出，现代历史主义在话语的区域方面对语言研究作出了必要的贡献。

有关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历史主义，罗瑟—兰迪强调他对笛卡尔的知识模式所作批判的重要性：只要笛卡尔的知识模式建立于证据与推演的基础之上，它就不可应用于历史或"人文"科学。罗瑟—兰迪还意识到奥古斯特·孔德的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他对孔德继承于贝奈戴托·克罗齐和乔瓦尼·秦梯利（此人当时仍具影响力）的实证主义带有偏见。孔德认为，绝对的经验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并指出，科学知识不仅仅存在于事实的积累；它还涉及到事实之间的关联和对事实中恒定要素的追寻。基于此，人们制定了能够预测现象的法则。 242

《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一书讨论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的一节揭示了他（受黑格尔启迪）的新唯心主义对哲学中逻辑语言学方法的影响。然而，布拉德雷基于英国哲学怀疑论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克罗齐和秦梯利的新唯心主义有很大区别［参见Rossi-Landi，1998（1961）：87—95］。布拉德雷的怀疑论唯心主义影响到经验主义。乔治·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都直接受到布拉德雷的逻辑思想的影响；此外，罗瑟—兰迪在形容词"logical"（逻辑的）与"empiricism"（经验主义）和"positivism"（实证主义）这些术语的关系中找到了历史基础。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并不可以追溯到传统的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对立。因此，在罗瑟—兰迪看来，这些概念对于那些仍处于"前逻辑"阶段的经验主义者和那些仍陷于形而上学的、反经验主义阶段的唯心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参见同上：95—96）。

罗瑟—兰迪高度重视经验主义者对心理主义所作的批判（罗素有关逻辑性而非心理分析的反休谟论辩），高度重视伯纳德·波尔查诺、布拉德雷、弗朗兹·布伦塔诺、戈特洛布·弗雷格、亚历克修斯·冯·迈农、瓦伊拉蒂、胡塞尔和丁格勒等学者们对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所作的批判。罗瑟—兰迪的目标是：不仅要在逻辑经验主义方面，而且要在共有言语方法论上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将罗瑟—兰迪的研究方法与康德关于人类学与哲学的区别联系起来。然而，通过研究先验的语言和考察具有条理化功能的共有言语，罗瑟—兰迪的目的是继承康德并超越康德。事实上，从早期的"共有言语方法论"

的说法到后来1985年《哲学方法论与符号科学》一书所提的“哲学方法论”说法，
243 “方法论”这一概念频现于罗瑟—兰迪整个研究之中。

先验与思想相关，被看作模式而不是事件——被看作世界的图片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据此，罗瑟—兰迪坚持认为，先验是可以通过共有言语方法论在语言中识别出来的。然而，先验在言语中更能准确地被识别，言语可理解为“具体的语言行为”，语言通过言语而实现；或者更具体地说，先验可以在与所有人有关的言语部分被识别，精确地说，先验可以在共有言语中被识别，共有言语是社会实践中相对可重复的、恒定的一套人类技巧。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尽管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异，但从生物和社会角度看，这里的重复性和恒定性指的是各种描述的基本范畴、结构、能指和所指层面。

罗瑟—兰迪依据其共有言语方法论提出了一对重要区分：起始意义（即显性意义）和额外意义（即隐性意义）。该区分属于这样一个总体构思：将意义视作真正的交流与阐释过程的一部分。这一区分不可简化为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区分。乔姆斯基将语言与其交流功能，与其社会的、主体间的、对话的维度分离开来。相反，罗瑟—兰迪的“起始意义”关涉经验、实践、价值、对特定环境的熟悉程度和说话人（从有限的家庭群体到整个文化社群的大语境，再到跨文化语境的说话人）。“额外意义”由表意实践的主体间性和对话性决定；额外意义预设了对他者观点以及文化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了解和判定。

起始意义与额外意义的区分超越了用途确定的意义与依赖于语境的意义之间的区分。隐性的、间接的、潜在的、隐藏的、缺场的、疏远的、次要的、无意识的意义不仅存在于依赖语境的意义中，而且存在于相对某一特定交流环境的自主意义中。隐性意义还存在于传统所确定的意义中。无论怎么说，“起始意义”和“额外意义”在语言和言语中、在“意义”和“主题”（沃洛希诺夫）中、在“直接解释项”
244 和“动态解释项”（皮尔斯）中都是积极的。

在其第二阶段的著作中，罗瑟—兰迪主张，共有言语可以通过劳动、通过经济科学的范畴，在一个总的符号生产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

6.1.4. 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

在其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中，罗瑟—兰迪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语言是劳动，不同的语言是劳动的产品，这使得语言现象开放于经济学范畴。罗瑟—兰迪的研究路径为传统的语言问题研究方法（如心灵主义、行为主义、语言规约论、语言是自然事实，等等）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20世纪60和70年代，在行为主义语言观和心灵主义语言观之间的论辩远远没有结束。相反，由于乔姆斯基在当代语言学中的名望，他尤其促成了这一论辩的继续。事实上，乔姆斯基拒绝凭借

刺激—反应模式的解释，拒绝依赖于语言的重复、训练、习惯等范畴的解释，这类似于莫里斯·梅洛—庞蒂（1942）有关人类行为的观点。然而，拒绝行为主义不一定要像乔姆斯基那样借助于心灵主义观点，也不一定要放弃关于人类行为的指涉主体的过去经历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解释。相反，拒绝行为主义就是从一个不同于行为主义的视角解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并不一定是心灵主义视角。

个人与环境之间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关系。在人类这个层次上，辩证法就是劳动，如梅洛—庞蒂所说（1942），劳动展现"使用对象"和"文化对象"，如书籍、乐器，以及人类与心理—化学刺激之间的语言。按照这样的推理思路，言语语言很显然不可以（根据因果关系和刺激反应关系）看作客观现实的自然事实、次历史事实、镜像。语言也不可以看作非自然的东西——规约的结果，它应用的规则类似于游戏的规则。相反，语言是通过辩证关系、通过自我与其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而得以存在。其起源必须在基本的人类需求中探寻，例如确保生存和与他人交流的需求。 245

根据诸如梅洛—庞蒂所持的观点，我们赞同罗瑟—兰迪在《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一书中所提的主张："根据我们的观察，语词和信息不是自然存在的，它们是人类生产的，因而我们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它们也是劳动的产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起人类的语言劳动。"[Rossi-Landi，1992b（1968），英译本：36]

如果说将语言理论化为对"现实"的被动反应，或者从心理语言学视角，将语言看作刺激—反应，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乔姆斯基的理论关于人类智力创造性能力的假定、仅仅从活动角度考察语言的做法，也是不可接受的。关于这一点，罗瑟—兰迪有如下说明：

> 我有意地说成劳动而不是活动，是因为作为产品的语词和信息构成了具体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以此为起点。如果我们仅仅将语言视作活动，我们就会失去跟这一现实的联系；（根据亚里士多德著名且依然有效的区分）活动的终点存在于活动本身而不是活动之外，而工作的终点存在于工作之外或工作之上的某种东西。（同上）

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语言提供了无限可能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只受限制于概念和短语形成的规则。这些规则部分具体而特殊，部分具有普遍性；然而，它们并不受制于具体的实践操作或具体的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乔姆斯基在其语言行为研究中不考虑语言对这些外部刺激的依赖。但是，我们不清楚如何能像乔姆斯基（1968）那样将连贯和得体看作语言使用的基本特

征。事实上,只有当我们不是将语言仅仅看作普遍性的天生的活动,而是看作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劳动时,我们才能谈得上相对于某一环境的连贯和得体。罗瑟—兰迪这样写道:“单纯的活动可能甚至是对劳动产物的自发接管,正如我们在它们呈现为伪自然对象物的新的直观性中所发现的一样。”(同上)“自发”这一术语跟罗瑟—兰迪总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此处显然是从马克思意义上
246 使用的。换言之,它表示的不是言说主体的自由、责任和自发的情况;相反,它表示的是消极。它指的是由惯性完成的行为,因此是一种主体不负责任的行为,主体不对其亲自应答的行为(参见 Korsch,1971)。

为了从劳动的角度理解语言,我们必须拒绝将语言使用简化为单纯的行为或活动(关于劳动与活动的区别,另见本书 6.2.2)。如罗瑟—兰迪所说,如果语言不具有劳动的特征,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它要么是一种自然的事实,要么是某种非自然的、超越历史的东西。对于前者,我们的信念是:语言是人类生物本性的一个区别性特征,而

> 对于后者来说,语言在本质上是外在于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某种东西。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要接受某种形式的本体二元论,最终导致诸如神创造人类时将其分为灵魂和身体两部分的解释(也许最近的解释是,灵魂的注入发生于进化过程)或形而上唯心主义者思维中人类“精神”超越历史的存在。[1992b(1968),英译本:37]

一旦把语言与技术置于同一层次上比较,我们便不再需要效法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1900—1901)中的第四逻辑研究,以及他之后的乔姆斯基,不再需要坚持他们那个包含各种实际语言的先天普遍语法假说。不同语言之间的类似之处并不比不同文化的工具系统之间的类似之处更令人奇怪。这两个情况均可从使用工具和言语信息的现存环境的类似之处(而不是彼此的差异之处)得到解释。它们也可以从各种典型的人类需求中得到解释,其中,从不同文化中身体与世界之间互动的不同特征来看,语言使用即是一种功能。事实上,不同的文化尽管存在差异,但因为它们同属于一个星球而被结合在一起。

与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其他类似的观点相比,罗瑟—兰迪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测试那些观点的手段,通过应用经济学范畴,他获得了受来自其他方面
247 的、使用不同概念的方法影响而有所修改的类似观点。

第二,更严谨而有效的理论构想要感谢使用的术语是讨论语言交流问题时从来不使用的、不属于言语习惯的术语这一优点。因此,这些术语不是过于滥用的

术语，也不是被赋予不同意义的术语。而且，这些术语在古典经济学里已经得到详细的分析和清晰的定义，不会那么模棱两可，也不会那么语义多变。

第三，依据语言学与经济学（另一人文科学）之间的联系而增添了一种可能：将语言学更为有趣的贡献融入到更宽泛的研究人文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之中。

6.1.5. 作为人类特权的语言

无论如何，即使是那些持有不同观点或认识论视角完全相反的人，似乎就以下论题也已经达成共识：语言不是自然的事实，而是人类的惯例，因而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事实；语言与现实之间没有比喻上的类似性；语言形成过程亦即分析和阐释经验之过程；经验在不同语言中的组织和分类方式不同；词和短语本身毫无意义；词是工具资源，只有在使用之中才有意义。

这些关涉语言基本方面的论点听起来与罗瑟—兰迪阐述的论点相似；然而，这些论点往往因为阐述方式而出现问题。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这些论点，我们都必须处理好如何对其阐释的问题，因为用以阐述这些论点的术语经常带有歧义。

例如，当我们说语言是社会产品时指什么意思？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根据何种标准区分自然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当我们说语言是一种人类活动时，我们显然需要解释“活动”和“人类”的意思。而且，我们一旦承认任何语言都是某一社群的产品，我们将如何谈论个体对语言的贡献？如果语言形成的过程也是选择概念和对象并对彼此进行区分，进而确定其组成部分和特征的过程，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它是如何构成的？它有哪些组成部分？　248

罗瑟—兰迪认为，语言是劳动而不是活动，不同的自然语言是劳动的物化与沉淀；他的这一论点与这样的观点有联系：语言不是自然事实，而是人类的文化事实，是一种社会功能。该论点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与言语的关系。按照卡尔·马克思的理解，语言是一种“人类”事实。换言之，语言是运作的结果，其终点不在于活动本身；此外，这些运作不能立即满足需求，而必须通过劳动为中介。“人类要想得以形成，”罗瑟—兰迪根据黑格尔早期的观察这样写道，“就必须打破这种即时性：在需求与满足之间必须插入劳动。”（同上：36）

除了自然属性以外，语言还是人类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产物，是劳动的结果。当我们说语言是人类的劳动时，我们还要说，语言不是纯粹规约性的东西，不是任意过程的结果，同时语言规则的形成也不像游戏规则那样。我们必须像考虑任何其他劳动过程一样考虑语言，亦即，要参照真正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操控性和转换性劳动一样，语言在这些关系中有其根源和合理性。

这还要求我们采取反对契约性偏见的立场，“它［契约性偏见］存在于将各种语言的规约性特征（规约性的原因和意义是历史社会性，亦即非自然性）投射到普遍的语言及对它的理解之中，使语言成为已经得到发展的诸个人之间的一种规约或契约”［Rossi-Landi，1994（1972）：20］。契约性偏见颠倒了顺序，因为主体之间的区分——它们作为个体的存在——已经预设了语言的使用，即一个社团的语言手段的使用［参见 1992b（1968），英译本：13］。

罗瑟—兰迪认为，语言具有规约性——契约性——的观点站不住脚，其论点与梅洛—庞蒂在《感知现象学》（1945）中有关语言一节所阐明的立场类似。和梅洛—庞蒂一样，罗瑟—兰迪坚持认为，如果说语言有什么预先注定的规约、预 249 先确定的协议，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个人在真正习得语言之前就已经在说某种语言。

此外，如同操控性劳动一样，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它需要使用集体和社群的技术［参见 Rossi-Landi，1992b（1968），英译本：38］。学会一门语言就意味着学会使用多少年来通过劳动为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工具。它就意味着学会使用和依靠语言工具和材料来劳动，从而构建能够满足我们交流需求的信息，对业已产生的语言材料进行新的劳动，进而生产更进一步的产品（同上：46—47）。某些符号和技术是由单个的说话人创造并发挥作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言语是个人的；但是，言语也是社会事实，这是因为，它只能发生于通过过去的交流运作业已形成的语言社团之中。罗瑟—兰迪写道，言语是“个人的，这只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的：某一工匠或工人的劳动是个人性的……那一运作，那一特定的运作，是个人性的，因为它被认为是个人的；但是，该运作的模式是社会的”（同上：39）。

6.1.6. 语言劳动和语言使用

当我们将罗瑟—兰迪的研究方法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阐述的语言概念进行对比的时候，罗瑟—兰迪研究的独创性就突显出来了。他对《哲学研究》中的一些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这些思想包括：语词是工具；从全局看，语言是以我们利益为导向的手段；言语是各种人类活动中的一种活动，它与这些活动之间相互影响；一种语言在其公共语境中才具有意义；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但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相反的是，罗瑟—兰迪将语言阐释为劳动，这一阐释强调，仅仅认为语言是一种可以在主体间得到检验的“公共”事实、仅仅认为语言行为至少在两个人之间发生，这是不够的。此外，语言的“公共语境”应该被看作社会语境。仅仅描述已经得到发展的诸个人互相交谈时所发生的情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诸个人是因为讲了一种给定的语言才在社会中发展成为现在这样。正如马克思［1953（1857—185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所说,个人只有作为某一社团自然的成员才能把一种语言作为他自己的语言而跟它产生联系。

意义即用法理论最终证明也是不充分的。该理论从语言游戏发生的环境简单地描述语词的使用;它排除了对某一用法何以产生的研究。结果,用以交流的手段被描述为给定的、自然的东西,而不是历史的、社会的东西。"我想说,"罗瑟—兰迪写道: 250

> 维特根斯坦缺乏劳动—价值的概念,即某一特定对象的价值,此处指作为某一语言劳动产物的语言对象。他从这一语言对象出发,只往前进,从不后退。[1992b(1968),英译本: 31]

罗瑟—兰迪声称,语言分析不可仅仅局限于单词使用的观察和描述上。相反,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语言劳动"上,任何具体的意义都是通过它得以形成;因此,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语言劳动的各组成要素上——包括动机、社会关系网络、兴趣、经济条件和主体在历史语境中具体的需求——研究时利用考察的语言片段作为语料。

当这些条件被利用之后,语言分析便可以避免沦为尤尔根·哈贝马斯在《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中所描述的"语言学唯心主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意味着要克服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任何限制,因为那会阻止我们建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如果哈贝马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批判指的是诸如维特根斯坦或温奇的语言理论,抑或甚至于牛津分析哲学,那他的批判是有效的。然而,如果将社会语言学研究建立于罗瑟—兰迪(他将语言与社会劳动的关系理论化,从劳动的视角描述语言本身)所提出的语言观之上,那么哈贝马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则不再成立。

6.1.7. 论言语交流与非言语交流之间的同源性

罗瑟—兰迪认为,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和信息的生产与流通是相同社会过程的不同方面——传播过程。不存在"自然"的部门强迫我们将信息和商品分配至不同的区域。在罗瑟—兰迪看来,这就证明,将经济学的范畴应用于语言研究,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彼此说话和交流信息并不仅仅靠发音和拼写单词。"人是在和整个社会组织进行交流",罗瑟—兰迪如是说[1992b(1968),英译本: 67]。 251

由此可以说,所有文化现象都可以视作基于符号系统的交流现象,非言语交流必须和言语交流平等对待。我们必须将每一单个的文化事实作为符码聚集起来的信息进行处理和理解。这样,普通社会学理论与普通符号学理论就一致了

（参见 Eco，1968）。“任何符号系统的研究对于任何其他符号系统的研究都有用，因为在研究一个或另一个系统时，我们所研究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同上：57）在我们考虑下列情况时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明显了：对于商品和语言信息这二者而言，符号学讨论的是同一问题——产生信息并使得交换和交流成为可能的劳动（参见 Kristeva，1969a）。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58）在研究婚姻和亲属关系系统时应用了语言范畴——这是将言语交流理论框架应用于非言语交流的绝好例子。罗瑟—兰迪则相反：他将非语言交流符号系统中提出的范畴——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所描绘的古典经济学范畴——应用于言语语言。尽管如此，列维—斯特劳斯和罗瑟—兰迪处理交流问题的方法之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列维—斯特劳斯将适用于语言的范畴应用于非言语交流的研究，在罗瑟—兰迪看来，列维—斯特劳斯证明自己这么做的合理性的推理过程不太可靠。正如艾柯所解释的那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些文章诉诸“所有符码基本的组合原则”，诉诸“植根于人类思想的功能的初步机制”。因此，由社会关系、神话和语言构成的宇宙变成“发生于人类背后的游戏环境，在这场游戏中，如果人类不是作为一个顺从的声音来参与其中，参与表达一场复杂的游戏、一场超越了他并取消了他作为责任主体身份的游戏，那么他就没有参与其中”（Eco，1968：296）。换言之，人类个体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关系；相反，他们不得不由他们遵循的宇宙法则将彼此“联系”起来。

反之，罗瑟—兰迪将人类视作历史中具体的主体，视作文化和交流系统中负有责任的行为者，从而阐述了他的言语交流与非言语交流之间具有同源关系的论点。语言劳动和生产具体物体的非语言劳动可置于同一层次。“假如我们不想承认某些人类的东西可以在没有人类自己干预的情况下而存在，那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每一份财富或价值，无论如何去理解，都是人类完成的而且可重复的劳动的结果。”［1992b（1968），英译本：36］人类通过工具和信息的生产而在历史中获得塑造定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将人定义为一种会劳动和说话的动物。正是这统一的定义让我们能够将这两种模式的社会行为视作同源。

252

物质生产和语言生产之间结构的同源解释了安德烈·马蒂内所描述的语言双重分节的概念（Martinet，1960）。句子向词、语素的分节，再过渡到语素向音位的分节，这其实与语言生成的实际过程恰好相反［见 Rossi-Landi，1992b（1968），英译本：119—121，158—159］。说话人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语言劳动的：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先从起初不很清晰的语音开始，但这些语音后来被清晰地转换成语词、短语和渐趋复杂的句子。

双重分节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化机器；它也忽视经验事

实和语言行为赖以存在的需求。它搁置了语言生成问题、句子使用问题，仅仅局限于对句子成分的描述。罗瑟—兰迪发现，当我们将句子分析或“指令”（如马蒂内所说）为词和语素、将语素分析为音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言说任何“语义内容”，它被“附加”于句子层次而非语素和词的层次，被“附加”于语素层次而非音位层次。这对生成语义内容的人工操作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将句子分解为词和语素、将语素分解为音位是抽象的分析工作，它与社会性的语言劳动几乎没有关系（在社会性的语言劳动中，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原本就已形成），不可与此混为一谈。

罗瑟—兰迪在 1968 年作品的第六章（同上：118—152）提出了语言生产的同源构想，它不同于“双重分节理论”，具有潜在的跨学科性，因为它在目的上具有前学科性。谈及前范畴层就意味着质疑已经形成和定义的科学思想，还意味着批判科学专业化，以至于无视原先发展科学专业化的人类需求。 253

6.1.8. 意识形态和语言异化

当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范畴视角考察语言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文学中遇到的另一重要现象：语言异化现象。语言与非语言技巧的总体方法以关系到一般性技巧的过程——忽视劳动功能的过程——考察语言异化。

> 这样，说话人失去了与自然和其他人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与交流原先主司语言的形成，以具体的生产操作（及其产品，可理解为使用—价值）形式成形并存储于语言之中。自那以后，语言产品仅仅作为成品被传承下来，其产品模型正在重新生产，目的仅仅是消耗代号，为生产系统提供养分。语言应该满足的需求——主要是能够真正表达自我的需求和在劳动分工中进行交流和真正被他人理解的需求——已经转移至背景之中。[Rossi-Landi, 1994（1972）：172]

罗兰・巴特（Barthes，1967）认为，在语言异化的情形中，某一门语言的精心加工制作是由一个决策小组，而不是由全体说话人来完成的。言说主体遵循的是“标识技术”——预制语言。作为言说主体，我的生存状况是：被自己的言语言说、是超人模型的被动重复者、是整个现实的代言人（这个现实并非由我建构，其目的与功能也非我所能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言说主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以如此方式言说，然而，我属于这样的语言生产过程：它从我生命最初就开始制约我，将某一世界观强加于我，使得原创性的或不同的工作活动相当困难［Rossi-Landi，1992b（1968），英译本：62—63］。 254

仅仅通过对偏离预定的范式或在被视作自足系统的语言界限内提出的范式进行谴责，或者，仅仅通过建构自己的语言模式，语言异化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以这些术语提出该问题就意味着从语言与它本身的关系来考察语言，因而提出了仅仅是句法的问题（见 Semerari，1965 中的“句法和新科学”）。相反，我们必须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中考察语言，并将语言现象与非语言现象联系起来。这样，通过打开一扇朝向生命所体验的世界的窗户，语言分析就可以很好地发挥有效的治疗性功能。

在《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第四章“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英译本：83—106）中，罗瑟—兰迪从意识形态问题与社会的符号学研究路径之间的关系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在这里，他承认他自己的视角是意识形态视角，并试图对其进行阐释。他认为，以劳动及其产品来描述的语言不仅应该与已经形成的现实联系起来——胡塞尔提出的“已经形成的世界”（参见 Husserl，1948）——而且应该与目前还不存在的，但可基于历史语境来想象的、可设想为一项工程的现实联系起来。这关涉社会现实的概念，因为，如果人类没有忘记某些具体操作的意向性，如果人类实践没有具体化，那社会现实的概念就会出现。罗瑟—兰迪本人解释说，支撑其研究方法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动态而非静态特权的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它建立于未来而不是过去，建立于历史内部而不是外部……这种类型的规划催生的不是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科学，而是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科学**”[Rossi-Landi，1992b（1968），英译本：106]。

6.1.9. 社会再生产

罗瑟—兰迪的《意识形态》[英译本译为 *Marxism and Ideology*，即《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1982）] 开启了他研究的第三阶段。该书是对他早期在“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1992b（1968）] 中提出的思想所作的长篇和详细的阐述；在该书中，他还在他关于社会再生产的思考框架下提出了新的思想。该书例证丰富，并附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跨学科参考书目。

罗瑟—兰迪在撰写他的论文集《哲学方法论与符号科学》（1985）时有一个可行的假设：在关于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的复发性困难的出现是因为缺少中介要素。他认为，这个中介要素就在于所有人类社群中运行着的整个符号系统，包括言语和非言语符号。这场游戏中的要素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在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阐述中必须加上符号系统。因此，这本书的中心议题是从符号活动视角考察的社会再生产：

255

一旦我们至少瞥见符号系统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位置，我们就可以说每

> 个类型的符号都必然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一个功能。……假如存在某个形而上学信念从根源上被该研究方法证明站不住脚，那么这个信念便是：也许永远不可能发现一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效的、所有人类都共有的符号类型。然而，不能由此推断，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再生产中，或者在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再生产中，无法发现共同要素并对其进行有效研究。（Rossi-Landi, 1985a：144）

罗瑟—兰迪认为，我们必须能够在某个地方捏住社会再生产的一端——如果我们拽动这一端，它就通往这一种类型的符号。罗瑟—兰迪认为我们应该拽动的这一端就是方法论上的"符号剩余"概念。符号剩余存在于所有人类社群的符号活动的能指和所指中。罗瑟—兰迪的符号剩余理论在他由共有言语方法论发展而来的通用符号活动方法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2. 多形式研究之旅的轨迹

6.2.1. 从共有言语到通用符号活动

罗瑟—兰迪 1985 年去世之时正同时撰写好几部大篇幅著作。在应《意识形态》的出版社要求所写的 1978 年生平简介打字稿中，他提到下列作品即将问世：

> 《从分析到辩证法》，1949 至 1976 年期间发表的论文集，包括三篇未发表的手稿。
>
> 《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1952 至 1976 年之间用英语发表的论文集，包括各种未发表的手稿。
>
> 《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包括三篇已发表论文：一篇是 1976 年用意大利语写的"一位作家的意识形态研究标准"；另一篇是 1977 年用英语写的"符号活动介绍"；第三篇是 1978 年同样用英语写的"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256

带着给罗瑟—兰迪项目之一画上圆满句号的目的，《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S. Petrilli 编）于 1992 年问世了。然而，书中材料不是由罗瑟—兰迪本人编写，也无法追踪所有他原打算收录进该书的未出版手稿。而且，他原本考虑的时间跨度被延长了，现在包括了 1978 年之后发表的论文。最近的一篇文章"意大利符号学史片段"于 1984 年在举行于巴勒莫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年会上宣读（1988 年发表）。所有那些在作者计划之外添加的文章都与原计划涉及的主题密切相关，而且也都是用英语撰写。这样，《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的时间跨度为 1952 至

1984 年（如果以出版时间计算，则为 1953 至 1988 年），因而对罗瑟—兰迪一生的作品提供了有趣的（如果不是穷尽的）概览。对于不熟悉罗瑟—兰迪的读者来说，该书综合了他的研究的主要方面；对于专家来说，该书在强调其研究的整体性特征的同时，可用作通向他充满问题的、多形式的求知之旅（在除了该书以外的许多其他专著和论文中也有论及）的有益指南。

《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由 14 篇文章组成，它们不仅在主题层面，而且在研究视角上都彼此密切相关。该书包括四个部分："符号学史上的符号及其大师们"、"作为认知和评价工具的符号"、"符号、语言异化和社会再生产"、"符号与物质现实"。在这四个部分之前是罗瑟—兰迪撰写的简短的前言，题为"侧记"（1984），还有苏珊·彼得里利撰写的绪论。该书收录了罗瑟—兰迪完整的作品书目。

第一部分的文章涉及当代的人物——尤其是瓦伊拉蒂、维特根斯坦和莫里斯——和语言哲学和符号科学史上特定的时期。罗瑟—兰迪还提及意大利符号学史上特殊的阶段以及莫里斯以来符号学领域总体上最新近的发展。在该部分第一篇文章中，罗瑟—兰迪提到，他不是作为职业的思想史学家而关注这些思想 257 家（还有其他人，例如尤金尼奥·科洛尔尼、布拉德雷、丁格勒、胡塞尔和赖尔），而是作为对探讨问题感兴趣的理论家去关注他们。在《查尔斯·莫里斯》（Rossi-Landi，1953）中，罗瑟—兰迪采取的是同样的研究方法。

在《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Rossi-Landi，1961）中，罗瑟—兰迪希望确定语言思想的一般条件：那些使语言使用成为可能因而在某一历史语言之外依然有效的条件。他的共有言语理论旨在通过识别不同个体语言中那些共同的和永恒的要素，来建构一种解释语言使用的一般模式——他也称之为"言说模式"。

在《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Rossi-Landi，1992b（1968）]中，罗瑟—兰迪以语言劳动来阐释共有言语。他依据"同源法"，将与物质生产相关的范畴应用于语言生产现实。正如他于 1965 年 3 月 20 日与莫里斯的通信中所说：

> 我现在正致力于语言研究，寻求变革——这一次要尽力认真对待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语言的观点。认真对待语言学家是因为一个明显的理由：大多数"语言哲学家"很少按照实际情况考虑语言学；认真对待经济学家是因为一个不很明显的理由：我在这两个领域（经济学和语言学）的某些分析中发现了有趣的一致性。（Petrilli，1992c：99—100）

在《符号学与意识形态》[1994（1972）]、《语言相对论的意识形态》（1973）、《语言学与经济学》（1975a）和《意识形态》（1978a）等理论著作中，罗瑟—兰迪继续将他的共有言语理论发展成为通用符号活动理论。在《哲学方法论与符号

科学》(该书在他去世前几个月问世),他提出了社会再生产符号学概念。在这里,他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整个语言、文化和社会生产中,在社会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系统。

罗瑟—兰迪对社会再生产概念的重点关注在后来两项计划(1981 年 5 月和 1984 年 8 月)中也很明显,该计划是为了一本题为《符号研究导论》(一直未能出版)的书。根据这两项计划(罗瑟—兰迪曾将这两项计划发给奥古斯托·蓬齐奥,希望他做他的合著者),第一章全部讨论社会再生产概念。根据第二项计划,该书最后一部分将讨论符号异化,最后一章讨论语言与意识形态(见 Rossi-Landi,1992a:viii—xxix,彼得里利撰写的前言)。

258

6.2.2. 为了"同源法"

如前所述,罗瑟—兰迪于 1961 年提出"共有言语方法论"、1985 年出版的著作标题涉及"哲学方法论",这些都绝非偶然。实际上,罗瑟—兰迪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1985 年的整个理论创建之旅可以被视作由共有言语方法论通往通用符号活动方法论之旅。罗瑟—兰迪称他所提出的方法为"同源法";所以,他在 1972 年的论文(现收录于 Rossi-Landi,1985a)以及在这之前所写并导致《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1968)一书成书的论文中提出了"社会再生产的同源性"理论。同源法不仅仅是对结构分析和动态分析进行类比,识别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该方法等同于探索制造工具之人与讲语言之人之间的同源性,这引领罗瑟—兰迪提出了他关于生产同源性的一般理论——符号与非符号生产的同源性一般理论。

《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收录了发表于 1978 年(尽管撰写于 1972 年)的论文"关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重叠"。此文对《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有大量引用。它呈现了关于一对对范畴的研究,这些成对的范畴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并得到解释:"交流与行为"、"语言与思维"、"生产与消费"。形成这些成对范畴的术语彼此不是同一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互相转换。除此之外,罗瑟—兰迪的研究中另一对基本范畴是"劳动与活动",他在《哲学方法论》第一章对此作了清楚阐释。

关于 1968 年的那部著作,罗瑟—兰迪继续从不同于活动的劳动视角阐述了语言的概念。活动不是编制程序,它本身就是目的;相反,劳动调节需求与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关系。为了这个目的,劳动采用了具体的工具和材料,这些工具和材料都与具体的模式和程序相关,带有其具体目的。此外,社会符号活动中劳动与活动的区别也关涉符号与非符号之间的区别。步行活动在沙地上留下的足迹不是符号;而且,这些足迹成为解释性劳动的对象之前都一直保持着非符号的状态。然而,如果劳动与活动之间的区别在于这一事实:劳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是某

一程序的一部分,而活动不是,那么,这不一定意味着劳动意识到其对象和程序。正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劳动事实上也许是"异化的"劳动;或者,想起弗洛伊德,我们便可以说"梦的劳动",意思是,就连梦的产生也是劳动。正如将梦转译为叙述和分析它的话语是一种劳动结果——一种阐释性劳动结果一样,无意识也是社会产物,梦也是劳动的结果。罗瑟—兰迪说(1985a:7),劳动可以在没有意识的程序下完成,这"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式运用或马克思的弗洛伊德式运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接触区"。

259

6.2.3. 罗瑟—兰迪阐释中的莫里斯

在《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中,罗瑟—兰迪公开批判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的概念,而且以马克思的术语进行批判;这致使他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理论的局限在于缺少劳动—价值的概念。

正如对维特根斯坦一样,罗瑟—兰迪经常回归莫里斯,继续他开始于1953年专著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之旅互不相同,却经常相互交叉。尤其是,他们都讨论了价值问题。莫里斯特别对美学和伦理价值感兴趣;罗瑟—兰迪对语言和经济价值感兴趣。他们定期通信超过二十五年(见下文),这些信函验证了罗瑟—兰迪对莫里斯关于符号与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的影响,亦即对莫里斯关于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关系的研究的影响——莫里斯关于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意谓和意义》(Morris,1964)中达到最高理论体现。

在有关莫里斯的专著中,罗瑟—兰迪批判了莫里斯的《符号、语言与行为》(Morris,1946),集中讨论了以目标为指向的行为概念,认为莫里斯预先假定了行为与以目标为指向的行为之间的区别。莫里斯的举例涉及带有某种目的的有机体:觅食的狗、向既定目的地进发的司机。但是,存在所谓的没有指向的行为吗?而且,如果对有指向的行为(进入小轿车、踩下油门、选择某一路线,等等)建立一个等级结构,我们这是不是在回避目的顺序问题呢?这个目的顺序问题关系到狗的行为指向(最终是为了满足其需求)和那个去往某城镇的男子的行为指向。"或许更为糟糕的是,"罗瑟—兰迪说,"人类究竟指向什么?动物指向什么?"

> 在缺乏所有其他说明的情况下,我们无从了解人类和动物通常做什么;因此我们无从区分目标指向行为和无指向行为。或者,我们也许是从已经达成的目标的视角就行为谈目标指向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它是否指向某个目标,除非是我们通过比较而识别的具体行为。的确存在目标,但未必就是那一特定目标。在引入目标概念时,莫里斯也许受影响于一种实效主义典型的矛盾,受影响于目标的本体化问题。符号

260

> 行为概念赖以存在的目标概念本身似乎没有建立起来。[Rossi-Landi,1975c(1953:71)]

在“《符号、语言与行为》中作为生物科学的符号学”和“符号行为与交流行为”部分,罗瑟—兰迪指出了莫里斯符号学的生物基础。他也谈到了将寻求目标的行为与其他种类的行为区别开来的问题,通过这种区别来确定某物何时才是符号。在此情况下,他得出结论说,简单的符号行为不可与简单的非符号行为区别开来。他甚至坚称所有行为都是符号行为:“此处我们不仅仅是讨论莫里斯的思想,而是讨论事物本身。我们的论点是,任何行为都传递某种信息,相反,离开了行为,则无法传递任何信息。”(同上:31)根据罗瑟—兰迪的观点,无法设想有任何动物(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行为没有传递任何信息。如果传递了信息,那就表明任何行为都是符号行为。

罗瑟—兰迪在这一特定语境中所提出的观点的一个局限(虽然在他其他作品中没有提出这一观点)是,他从交流中识别符号活动。我们现在知道,符号活动并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理解的交流;相反,符号活动也是一种建模过程。换言之,我们通过符号活动,在建构可能的新世界中,阐释、塑造并生成意义。托马斯·A.西比奥克(参见 Sebeok,1986、1991b)关于作为建模工具的“语言”与交流指向的“言语”之间的区分——附加说明:前者先于后者——证明了罗瑟—兰迪的带有偏见的局限的错误所在。另外,在确定描述“语言”的标准时,莫里斯也区分了“语言”和“交流”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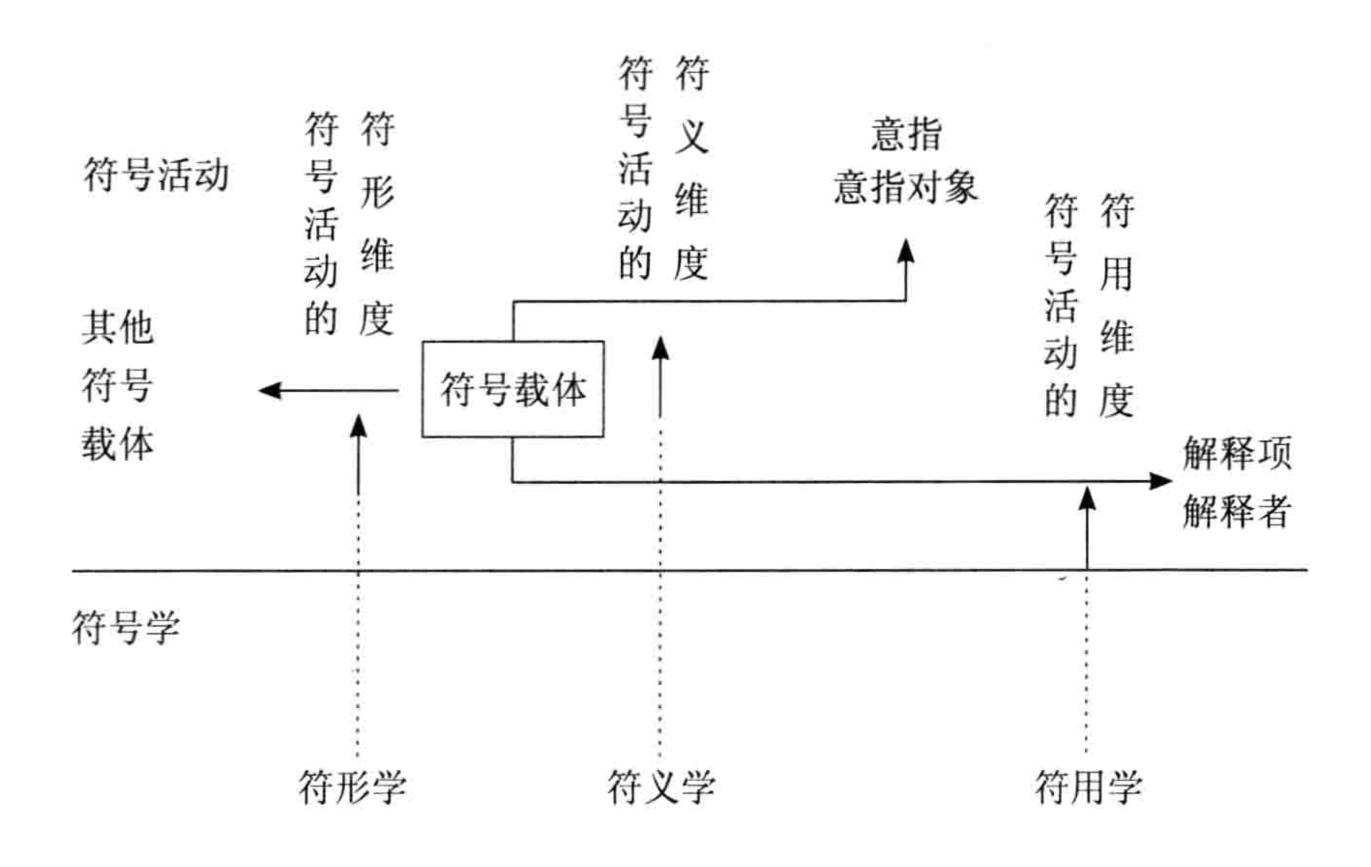
更为有趣的是罗瑟—兰迪的这一论点:行为是符号活动,因为它总是某程序的一部分(参见 Rossi-Landi,1992a:31—32)。罗瑟—兰迪说,“今天我们知道,所有行为都是程序化的——建立于符码基础之上的”(同上:34)。在这里,他所指的既包括言语行为,也包括非言语行为。因此他问自己:这样是否剥夺了莫里斯基本直觉的价值和信度。他这样回答自己:

261

> 我想说不会;真的,我想说刚好相反。正是莫里斯以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并且是第一次系统地将普通的行为概念与普通的符号概念结合起来。然而,我们要说,他沿着一个比他自己想象的,或者说比他所预见到的更有成效的方向出发了。这两个概念的结合蕴含着很大的潜力。情况只允许最初的发展——人类和生命科学的全景开始变化。莫里斯的局限必须历史性地考察。(同上:34—35)

罗瑟—兰迪做了大量工作揭示莫里斯的符号活动三个维度中意义的存在:

符形、符义、符用。因此，他宣称意义与符号学所有这三个分支都相关，以此支持莫里斯［参见 Rossi-Landi，1994（1972）：64—72］。在努力区分符形学、符义学和符用学时，罗瑟—兰迪提及莫里斯本人在他 1939 年的文章“审美与符号理论”（Morris，1971）中提供的图表（见图表 1）。



图表 1

表格顶端代表符号活动，即某物作为符号运行的活动；底部代表“符号学”（莫里斯喜欢 semiotic 一词，而不喜欢 semiotics），即普遍的符号科学，它又可进一步三分为符形学、符义学和符用学。莫里斯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中区分 semiotic（符号学）和 semiosis（符号活动）时说：“作为一门科学，符号学利用特别的符号来陈述关于符号的事实；它是一种讨论符号的语言。”（Morris，1938c：8）的确，莫里斯为他自己设定的任务之一就是创建一套谈论符号的符号系统。

图表的顶端显示了符号载体（充当符号的物体）如何与意指发生关联，并最终与意指对象（我们后面再讨论其区别）发生关联。这一关系涉及符号活动的符义维度。然而，符号也与解释者有关系，解释者针对符号产生了解释项。这便涉及符号活动的符用维度。另外，符号一定与其他符号载体发生关联，这便是符号活动的符形维度。符号总是涉及符号活动所有这三个维度。因此，只是为了分析，我们才将符号载体与意指（最终与意指对象）的关系区别于符号载体与其他符号

载体的关系，并将这两种关系区别于符号载体与解释者（只有被赋予解释项的解释者）的关系。这样，包含三个分支（符义学、符形学和符用学）的符号科学主要关注符号活动及其三个维度——符义维度、符形维度和符用维度。

仅仅将意义赋予符义维度，而不是从符号活动所有三个维度去追寻意义，那就意味着将符号整体简约为其中一个部分——就符义学而言，这一部分指的是与意指和外延之间的关系。同样，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排除了符用和符义维度的严格意义上的符形维度，正如解释者与其他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排除了符形和符义维度的符用维度。每当有符号活动，即有符号出现，所有三个维度都涉及其中，都是符号学的对象。

罗瑟—兰迪的“论后莫里斯时代的一些问题”（Rossi-Landi，1978b，重印于1992a）尤其有趣，因为这是他关于莫里斯的最终的、最成熟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他发展了莫里斯的行为概念，从它与社会再生产和交流等概念的关系中对它进行考察。这篇文章中有一节是“符号与价值”，在这部分，罗瑟—兰迪第一次考察了符号理论与莫里斯的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

263

在莫里斯《符号理论的基础》（1938）的1954年版意大利语译本的前言中，罗瑟—兰迪说：“在出版了《基础》之后，莫里斯的研究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阐述符号概念和总的符号理论……另一个方向探讨价值问题。”（Morris，1938c，意大利语译本，1999：62）在他1964年著作《意谓和意义》中，莫里斯最终将这两个研究领域结合了起来：他对价值的研究与对符号的研究几乎一样多，同时，他抛弃了仅仅研究符号便能判断价值的思想。事实上，他相当一部分研究是致力于价值理论的，尤其是致力于伦理与审美价值判断问题（参见《人类价值种种》，1956）。

莫里斯这一方面的研究尤其与罗瑟—兰迪关于价值与意识形态的研究相关，罗瑟—兰迪是从李嘉图—马克思视角对此进行研究的。相对于当时符号学的主导趋势（主要研究与认识论相关的问题）来说，这些问题的独到之处便非常明显了。然而，莫里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最为著名的著作（1938年和1946年著作）中所提出的符号理论。相反，罗瑟—兰迪大量参考的是《意谓和意义》这本书以及莫里斯早期关于价值问题（包括审美价值）的作品，这对他走近这位符号大师的学说的整个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

6.2.4. 莫里斯与罗瑟—兰迪之间的通信

莫里斯与罗瑟—兰迪之间的通信自1950年开始一直持续至1976年，刊发于1992年《符号学刊》的一期特刊（苏珊·彼得里利编），其中有一篇介绍性文章，题为“社会实践、符号学与人学”。这一期呈现了罗瑟—兰迪致莫里斯的大约

六十五封信函以及莫里斯致罗瑟—兰迪的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信函(有些已遗失)。这一期还刊登了罗瑟—兰迪另外两篇文章,一篇是早期的“论价值:合作性探究”(1951,原来发表于意大利期刊《方法》),另一篇是“语言异化问题”(1970,原来以英语、意大利语收录于联合出版商倡议出版的双语卷册中)。罗瑟—兰迪致莫里斯的第一封信写于1950年6月23日,最后一封信则写于1976年12月23日。莫里斯致罗瑟—兰迪的第一封信未署日期,但明显是对罗瑟—兰迪第一封来信的回复;最后一封信写于1976年10月26日。全部信函均以英语所写。

莫里斯与罗瑟—兰迪之间的这些信函之所以有趣至少因为两个理由。第一,通过这些信函,我们可以重构他们互相影响的学术发展;因此,这些信函是对思想史的贡献。第二,这些信函的价值表现为更为严格的理论层面:它们往往以非常独到的方式探讨有意义的问题。结合我们对莫里斯和罗瑟—兰迪所了解的情况,这些信函揭示了莫里斯符号学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方面,这些方面是莫里斯遭遇罗瑟—兰迪的解释性研究工作过程中所阐发的;与此同时,这些信函突显了罗瑟—兰迪本人的研究与当下符号学研究的相关性。

264

例如,在1951年6月10日给罗瑟—兰迪的回信中,莫里斯对他自己的行为概念作了如下评论,强调了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所有他的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 你认为我应该仔细界定“行为”这一概念,关于这一点,我想请您参看我的文章“符号的符号的符号”[1948]。为了科学的目的,我认为“行为”与其他任何概念一样,是一个很好的未下定义的术语。如果“符号行为”和“优先选择的行为”要成为作为科学的符号学和价值论的基础,那么它们当然需要仔细分析。我认为我现在比我当时写书时能把“符号行为”处理得更好;而且,在我下一本关于价值论的书[1956]中,我对“优先选择的行为”的阐释将会比你看的我那篇文章更清楚。我将我的符号学和价值论视作(年轻的)科学,而不是“哲学”。有关我对哲学的观点,我再次想请您参看我在《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一书中的讨论。

莫里斯1952年9月14日的信函证实了他一贯以来对符号与价值之间关系或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关系的关注。在该信中,他对刚刚在纽约召开的关于“符号与价值”的会议,同时也是受到强烈反响和积极参与的会议,表示非常满意。他提到,关于同一主题的另一场会议将在哈佛举行。

罗瑟—兰迪是莫里斯作品的批判性读者,莫里斯对此非常欣赏。这表现于1953年8月31日的一封信中;此信是莫里斯对罗瑟—兰迪关于应对牛津学派的

日常语言哲学、交流理论和语言学的建议的回复：

265

> 我对牛津学派没有多少研究，尽管我意识到其重要性。然而那得等一会儿。我打算有朝一日把《符号、语言与行为》重新修订一下，然后就可以考虑你的建议和批评，以及关于牛津学派、交流理论和语言学的发展。但在接下来的18个月左右时间里，关于价值的那本书［Morris,1956］是我头等重要的事情。

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罗瑟—兰迪于1951年11月14日致莫里斯的一封信，描述的内容是，罗瑟—兰迪亲身经历了牛津学派哲学家对莫里斯关于语言与符号之研究及其对普通符号学之介绍的反应。符号科学的术语与牛津学派所使用的日常语言的术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牛津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落。那里的人尽管成果稀缺且无组织，但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胸怀宽广…… 人们以为，他们对他们王国之外发生的事情不予关注，并以此为荣，其实情况未必如此。比如说，您的大名在那里人人皆知，尽管普莱斯教授在做关于“思维与符号”的讲座，我也从来没有听他引用过您。我经常提及您，以及丁格勒、布里奇曼和其他人。他们一直对此非常宽容，直至现在。可以肯定，在我看来，您对技术化的必要性感觉甚好，但这在牛津学派这里却受到忽视；它被视为违背他们的主（日常语言）的罪过，更不用说圣父（常识）和圣灵（澄清）了。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觉得有必要为他们过于特殊的结果建构某种普遍性的框架。在这里，人们终于（不是至少）有机会见到来自各地的许多学者，有机会开阔自己的胸怀。

在1952年12月27日的一封信中，罗瑟—兰迪透露了他对莫里斯符号学的兴趣，认为莫里斯符号学是一种“理想的（或技术性的）语言”，既能处理原始术语问题，也能处理“理想的”、“技术性的”或“特别的”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关系。在回复罗瑟—兰迪时，莫里斯就他研究中“话语领域”与“理想语言”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评论。在这里，他没有指涉形式逻辑的理论框架。这封信写于1956年1月10日：

> 我对“话语领域”还没有给予很多思考。但我临时想到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限定要谈论的领域，因此，我们也许同意仅仅谈论甲房间里有什么。第二，界定使用的语言，因此，我们也许同意仅仅以经典物理学语言来谈论。第

266

三，上述两方面的结合，因此，我们也许同意仅仅谈论甲房间里有什么，而且仅仅以经典物理学语言来谈论。对于这些用途，我看不出它与“理想语言”之间有何必然联系。

在下面摘自1966年4月16日信函的一段文字中，罗瑟—兰迪述说了他关于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比较研究。他还述说了他另外两篇论文（分别写于1965年和1966年）。第一篇论文“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将作为一章被收录于他1968年的同名专著之中：

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力于语言问题的研究，区别是，我现在正努力考虑：（1）传统大陆哲学，主要指（当代欧洲）黑格尔—马克思传统；（2）语言学和其他对语言感兴趣的学科，而不是把我自己局限于哲学家关于语言的言说。在沉默将近五年之后，我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即“Language as labour and trade”（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不过用英语说这个题目不是很好听］；我会在几周内寄给您，同时我还要寄去另外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定在五月初出版（一篇关于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另一篇关于言语语言和非言语语言）。

在1966年4月16日和1967年3月21日的信函中，罗瑟—兰迪描述了莫里斯关于价值的研究，将它与他自己的“黑格尔—马克思转折点”联系了起来，这将催生他的《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罗瑟—兰迪参考了莫里斯在《意谓和意义》中所描述的价值类型学，仔细思考了莫里斯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他还分析了莫里斯在其三种类型的价值和三个符号学维度的类型学中所建立的关系。罗瑟—兰迪试图在“莫里斯行为主义”和他自己关于作为劳动的语言和作为商品的信息的理论之间找到关联。这一探寻催生了罗瑟—兰迪关于莫里斯符号学/价值论与他自己的语言异化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Rossi-Landi, 1970；以及1970年12月17日罗瑟—兰迪致莫里斯的信函）。下面的内容摘自1967年3月21日罗瑟—兰迪致莫里斯的信函：

267

在三种类型的作为价值的意义与符号学三个维度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但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他们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除了其他方面以外，我现在要做的是为“语言异化”思想寻找基础；我必须能够以“言说的商品”来描述说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完全适合更为普遍的异化批判，但这又需要一种社会理论，而这是维特根斯坦以及大多数其他“分

析家”所缺乏的。因此我回归黑格尔和马克思寻求理论基础。

6.2.5. 关于符号与非符号的物质性

在《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一书中，构成第四部分的三篇文章——“符号与身体”、“物质符号学宣言思想”和“走向符号剩余理论”——介绍了物质以及物质性概念，特别强调符号的物质性。其他相关概念包括剩余、符号剩余和非符号或身体剩余。在这种语境下，罗瑟—兰迪还探讨了“非言语信息的身体剩余”（Petrilli，1986，1990b，1998e）。这些概念在他的研究中是最基本的，都与社会再生产原则有不可避免的联系。

罗瑟—兰迪是在他1974年的论文“符号与身体”（现收录于Rossi-Landi，1992a：271—276）里首次提出以下命题：

一、所有符号都是身体

二、并非所有身体都是符号

三、所有身体都可能是符号

四、符号不是身体

五、所有身体都是符号

一、二、三这三点描述的是符号学物质性模式的特征，而四、五两点描述的是唯心主义模式的特征。

罗瑟—兰迪对符号整体——或者是他所谓的“细胞”——进行隔离，他将符号整体描述为一个由signans（能指）和signatum（所指）构成的单位（他选择了奥古斯丁的术语，以避免索绪尔的signifié带来的心灵主义歧义）。基于此，他阐述了符号剩余的概念。不可简约的身体、社会物质秩序剩余存在于能指和所指双方。在能指一方，身体——包括自然的身体和人工制品，但都是社会性的——充当符号载体。在所指一方，社会剩余可以归类为皮尔斯意义上的解释项——既可以理解为内包、感知、意义，又可以理解为外包、指称物、意指。换言之，符号具有双重物质性特征：物理的和社会历史的，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符号活动领域的符号物质性特征。　268

罗瑟—兰迪区分了符号与非符号，然而，他的本意并非确立两种存在模式——一是符号事物，二是非符号事物——似乎符号就是符号，独立于交流和阐释过程，独立于人类的社会历史关系。并非每件事物都是符号，但不可否认，任何事物一旦进入符号活动网络便成为符号。

罗瑟—兰迪的本意不是简单地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进行区分。相反，他的目的是研究从符号状态到非符号状态的转换过程，反之亦然，并且解释其转换条件。这便解释了为什么他为《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一书的标题选择了“在……之间”

这一表述。

罗瑟—兰迪批评符号学泛理性主义倾向——认为世界单纯由符号构成的倾向。因此,他批评符号拜物教,批评那种借助于抽象范畴进行任意性分割的倾向。他提出一些概念,为分析符号与非符号提供共同的基础,但同时也能解释符号生产(以及再生产)的机制及其多元性。

6.3. 交流、大众媒体与意识形态批判

6.3.1. 与语言和非语言生产相关的人化过程

下面一段摘录除了揭示罗瑟—兰迪的研究的总趋向以外,还为我们提供了批评性阅读本节关键问题的锁钥。这段话介绍了罗瑟—兰迪有关社会再生产符号活动的一般研究的基本概念,其中包括"人化"、"语言与非语言生产过程"、"社会规划"和"意识形态":

> 随着资本有机结构朝着有利于其永恒部分的方向逐步改变,工人的价值已经下降;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变革都变得更为昂贵。这已逐渐证实了非人事物的结构,它仅仅是提及20世纪科技巨大发展的一个方法。但从资本的永恒这一面来看,人本身被压倒了:在生产中人被完全榨干。有必要从人所归属的超人结构去审视人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或许会认为,在新资本主义被宣布生效之前不太可能研究支持非言语行为的无意识程序……人显然是根据所有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程序而行动,而不仅仅是在新资本主义环境里行动。如果资本有机结构的新资本主义变化使得证实这种程序成为可能,或者支持它,那么相关的意识能有助于制定新的和更人性化的程序设计。但是,如果规划这些程序的用途就是要具有自由的特征而不是更加精制的压迫,那我们显然必须诉诸更为普遍性的人与社会的理论;如果要完成规划,就必须诉诸革命实践。一切的基础都是政治性的。[1994(1972):201]

269

罗瑟—兰迪关于符号活动、社会再生产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两极表现于他关于人类化和非人类化过程的研究之中——一方面是成为人的过程,"人化"过程,这涉及人类逐渐出现于历史舞台时生物材料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另一方面是"异化"过程,这首先是从语言—意识形态异化(因而是主体异化)视角考察的(参见 Rossi-Landi,1970;Ponzio,1992b)。就前一情况而言,对人类的描述是:他们在具有历史和社会特征的符号材料中得以形成;就后一情况而言,对异化的危险的描述是:人类被他们自己生产的符号所压倒,这些符号是他们在这一

特别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在市场逻辑和“技术革命”的语境中所生产的。

人化的最早期符号出现于某些高级灵长类动物开始劳动和生产物品之时。劳动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具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类型：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在人类世界里，若没有语言劳动，非语言劳动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亦然——语言劳动除非与非语言劳动联系在一起，否则也无法产生。罗瑟—兰迪在其早期作品［1998（1961）］中就发现了非语言物质生产和语言物质生产之间的一种同源关系；这样，他为他理论化的同源法奠 270 定了基础［Rossi-Landi，1998（1961）、1992b（1968）、1994（1972）、1985a］。

劳动总是与符号系统相联系，这些符号系统依据某一社会规划而运行。劳动具有目的，并导致产品；同时，产品预设着劳动。活动是没有产品的输出；因此，它留下的仅仅是痕迹。劳动决定了预设着意向性、社会规划和意愿的变革，这种意愿调整着劳动的供应，尽管劳动者本人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即使劳动者没有意识到他生产产品的目的，但他的生产能力——往往是通过无意识学习过程获得的——却未必受到影响。有意识的生命和无意识的生命都是通过符号阐释工作而形成——通过人化过程中的劳动而形成。弗洛伊德曾提到过“梦幻的劳动”。但意识的程度是次要的，因为所有社会行为都是根据某一社会规划而进行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学习活动的结果。

人类、社会现实和劳动（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劳动）同时出现，互相交织。我们必须以劳动开始：罗瑟—兰迪认为，正是劳动从一开始创造了社会维度，劳动立刻成为劳动与产品的混合物，劳动立刻以各种交换形式而出现。随着生产网络的扩展，劳动分工和交换——罗瑟—兰迪赋予其人类起源价值——变得更为复杂和清晰。一旦有了制定好的各种预设着劳动规范的交换秩序，人类便开始出现了。人们已经识别出三种交换秩序：信息的交换、商品与劳务的交换、女人的交换，后两种也涉及信息的交换。罗瑟—兰迪说，人类个体就是这样通过劳动规范，通过渐趋机构化的交换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通过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的结合，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言语和非言语阐释性工作，人类获得了社会和历史的确定。

6.3.2. 符号学视域下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异化批判

罗瑟—兰迪关于符号活动、社会再生产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另一极关涉异化问题，因而关涉由资本现实和身份逻辑统治的世界里的非人化问题。劳 271 动者也是语言劳动者，“完全沉浸于一个自然世界，过量生产的产品已经将这个世界转化为市场；在这里，操控大量的符号系统已经将他们从人类转变为消费者”［Rossi-Landi，1982（1978），英译本：238］。人类原本是积极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

中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生产的主体，却转变为被自己生产的产品压垮和榨干的消费者。人类劳动忘却了自己的作品，忘却了劳动本身的意义。这便导致意识与实践的分离；其结果是社会和语言异化的情形，这涉及到“他性的牺牲”，这是资本和市场逻辑的核心特征（参见 Ponzio 与 Petrilli，1999：35—52）。

关于这些过程，罗瑟—兰迪提出了主体性批判，建议恢复人类劳动与其产品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方法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发展批判性哲学的建议，这种批判性哲学基于包含他性的人文主义中的马克思思想。他在阐释资本和市场逻辑的努力中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使意识“去异化”，恢复主体作为真正的人类主体的特征［参见 1992b（1968），英译本：83—106］。这涉及到恢复某些真正具有人性的价值，例如批判性意识、责任、创造性、自由——用巴赫金的术语，可以描述为“对话性应答”的条件，可以描述为“绝对他性”的主要条件（见第三章有关巴赫金的内容）。

在有关主体建构的研究中，尤其有趣的是罗瑟—兰迪的“一位作家的意识形态研究标准”（以意大利语写于 1976 年，现收录于 Rossi-Landi，1985：第八章）。在这里，如同之前的巴赫金一样，他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视其为真正人的价值形成的最可能的场所。他阐述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是从强调作者 / 主体着手，在最初形成作者 / 主体的语境中恢复他，这有助于克服对作者 / 主体的盲目崇拜（参见同上：187）；相反，第二个方法强调作者 / 主体的历史—社会语境及其摆脱即时语境的能力。罗瑟—兰迪对影响主体 / 作者的因素与主体 / 作者获取超额的能力作了区分。超额存在于主体 / 作者为了建构一个不同于自己但好于自己的社会而产生的新价值；这些新价值传递给了读者。我们对主体 / 作者及其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评判可以通过重构主体、社会语境和超额之间的关系而进行，此时要记住一点：在使用“超额”这一概念时，罗瑟—兰迪——非常像巴赫金，但独立于巴赫金——是在研究外位的概念（巴赫金的局外人）。用罗瑟—兰迪的话来说：

272

> 文本可以看作发生在舞台上的活动，因而指向布景。所有的文本都包含或暗含舞台与布景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重构这种辩证关系。假如作者在他自己的社会再生产方面有一些超额，那就好比舞台灯光朝着舞台背景延伸了一些；如果他将自己局限于重复获取的价值，那就好比舞台布景往前进了一些，从而把布景本身与舞台混在了一起。（Rossi-Landi，1985a：191）

罗瑟—兰迪指出了他的研究中两个主要参考领域：一方面是普通语言学、分

析哲学和美国符号学，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外加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方面的读物［与恩佐·戈利诺的会谈，1969，现收录于 Rossi-Landi，1994（1972）：210—294］。罗瑟—兰迪从这些领域借用了一些概念工具，构想了一个人类“全球科学”的项目。这种研究并未宣称无所不知；它只是确认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全球性”并将其理论化。此外，全球性要求，研究世界的科学都要具有全球性。罗瑟—兰迪以其同源法揭示了相互关联对于整个符号宇宙和对于特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性。他描述了如何识别下述同源关系：语言与劳动之间、语言劳动与非语言劳动之间、我们今天所谓的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语言学与经济学之间［1992b（1968），1975a，1985a，1992a］。

罗瑟—兰迪以非语言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之间的同源关系为先决条件，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视角分析了社会再生产，商品被视为符号和信息，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脱离社会关系的商品。在这样的语境下，他引入了一系列新颖的概念（如今是非常相关的概念），例如“语言劳动”、“语言资本”、“语言货币”和“语言异化”。在努力恢复人类行为的普遍性、恢复意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时，他将商品解释为信息（受马克思《资本论》启发），将信息解释为商品，“人们从各个不同方面谈到信息转变为商品”，在一次会谈中他这样说着，并冲着本杰明、克劳斯、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戈德曼、列维—斯特劳斯、古尔维奇、列斐伏尔等等点头，因此“为什么不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为什么不将信息即商品的解释和商品即信息的解释置于同一层级？为什么不尝试一种统一的解释？”［参见 1994（1972）：214—215］。

273

在意欲建构一种具有历史取向和唯物主义取向的普通符号学的项目中，罗瑟—兰迪提出了如下假设：生产系统、符号系统和意识形态相互关联，同步发展。根据他的描述，依据某一特定的社会规划证明语言与意识形态彼此之间具有辩证的联系，两者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一定涉及符号——事实上，意识形态唯有通过符号而产生——但并非所有符号（信号甚至更少）都具意识形态。此外，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这种固有的相互联系恰是他阐述符号和意识形态、将主体从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先决条件。他的一个可行的假说内容如下：

> 恰是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或者以更为一般的术语来表述，是符号系统和异化之间）密切的相互联系蕴含了引入语言学上（符号学上）去异化（去意识形态化、去神秘化）的程序的可能，最终目的是将语言劳动者（即作为语言说话者的人类）从主导性的共识网络中解放出来，促成新的共识，实现建立新型社会的计划。［Rossi-Landi，1982（1978）：197］

符号不仅传递而且生成意识形态。这样,语言、意识形态和相关的主体概念唯有通过符号批判方可去神秘化,这种符号批判可以分析某一特定社会语境(即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某一流程)中的符号生产、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罗瑟—兰迪意欲建立"新型的、更为人性化的程序",作为他的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发展274 一种新型的、更有意识的人文主义,它强调人类的符号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符号活动的人类维度。他要将符号学发展为解释性的、批判性的科学,这种科学对于规范符号行为的社会规划能随时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必然涉及到放弃被错误地等同于科学性的新实证主义的中立立场。根据解总体化的世界观来看,根据这样一种认识:人类行为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程序化——因此这种程序化具有历史和社会规定性,具有政治取向——符号学的位置就是批判文化符码,并制定替代性程序。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符号学、语言哲学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突显人类的社会关系,在人类那里,以前仅仅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符号之间物化的关系。这一联系也指向意识形态与符号之间在理论层面上的互相蕴含关系。言语符号不仅是传递意识形态的手段与工具,而且是生成意识形态的场所,是创造意识形态的材料。意识形态现实是符号现实:哪里有人类的社会符号,哪里就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反之亦然:凡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都被赋予了符号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以隐喻的方式描述了意识的符号意识形态性,把意识描述为由社会符号材料构成的、连续不断的对话链。

> 这根意识形态的链条在单个意识之间伸展着,并将它们联系起来。毕竟,符号只产生于众多单个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单个意识本身就充满着符号。只有当意识充满意识形态的(符号的)内容,因而只有在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意识才能成其为意识。(Voloshinov,1929,英译本:11)

非常类似于"无限符号活动"(皮尔斯)的概念,非常类似于依据他性逻辑、在解释项符号与被解释项符号的对话互动中形成的"解释路径"理论(参见Ponzio,1990a:15—74;1993a:177—220),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将符号的意义置于它与解释它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之中加以识别。无限延长的符号链永远不会275 被打断,形成了客观的和社会性的意识与意识形态材料。这些并非脱离于外部公众世界的内部心理过程的结果;因此,意识与意识形态材料绝不是个人的、绝不是主观的东西。与以单线因果关系机械地解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相反,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连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都告诉我们:个人的意识是社会意识;

还有，普遍的社会现实——从社会性的生产关系层面到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生产层面——就是符号现实。的确，知识和语言的获得只有在某一特定的符号意识形态语境——构成社会交流并成为社会交流特征的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以符号为中介的、对话性的、辩证的关系——中才有可能。

6.3.3. 社会规划与多媒体传播

在本章开头引用于《符号学与意识形态》[Rossi-Landi，1994（1972）]的一段文字里，罗瑟—兰迪清楚地告诫我们，要谨防如下危险，即无意识地屈从于社会程序，屈从于看不见的"精制压迫"的形式，这种"精制压迫"形式戴着神秘面罩，并被反常地误以为是解放实践。如今，大众传播工具的广泛影响，以及构成多媒体传播网络基础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广泛影响，代表了这种危险。

由于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这种多媒体传播网络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这已经催生了一种社会文化现实，即通过充斥于网络的信息构建的现实——这些信息从数量、即时性、速度和流通等方面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例如，电视正在提供无数的频道和服务。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频道和节目之间遥控切换，并创造我们自己的互文本；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和传播自己的节目。

先进的科技（尤其是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在电子信息领域带来真正的"革命"，这不仅在专业领域，而且在日常生活（包括休闲时间）中，都产生了影响。由于大众媒体和电信的无所不在，由于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广泛使用，通讯网络变得越来越强大，通过一种类似自我再生的过程达到了庞大的比例。276 由于各种服务和链接——调制解调器、便携式传真机、移动和卫星电话、电子邮件、因特网（我们通过这些可以查阅卷宗、预订旅馆房间甚至开办公司——"虚拟公司"现在已成为现实）——每个人访问并使用通讯网络都不再有时空障碍。

由于科技的进步促进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的发展，人类的符号达到了越来越高的表意（表示复杂性和社会符号物质性）水平。表意过程中的符号活动越复杂，符号程度越高，那么，在人类符号活动中促进人化过程的社会要素和生物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反馈机制的效果就越强。不妨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或许不久就有可能将人体与人造器官融为一体；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那半机械人将成为事实，而不是科幻。再考虑一下诸如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事故，或是获得授权的、对不知名的人进行放射性影响测试的实验，所带来的广泛而又破坏性的影响。绝不可以让技术革命蒙蔽我们的眼睛，从而看不见负责任行为的必要；健康的符号活动，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符号活动，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未来，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负责任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不可忘记，承担责任的能力是我们作为人类、作为"符号动物"（被赋予了叫做"语言"的独特的第一建模机制的动物）的生物构

成的一部分（见本书 12.1.2）。

在大众传播和电信层面上，先进技术和符号信息量的增多带来的一个直接的负面影响便是信息超负荷和信息消费主义的产生。我们还得评估一下社会异化的危险程度，以及将市场上的产品（无论语言还是非语言产品）神秘化和物化的倾向。随着生产的信息冗余部分越来越多，作为主体的个人尽管积极参与了生产过程，却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因为参与未必是有意识和有目的性的。就连人们以为会免于技术革命负面影响的语言劳动者们，也以各种方式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符号市场蔓延，在这个市场中，意识与实践在一个生产周期里变得越来越分离，生 277 产目的是生产本身，它基于实施市场价值却损害人的价值的理念。

至于作为使用者—消费者的主体的地位，很明显，传播网络不受控制的发展无法保证更高程度的批判思维、创新、负责任的参与和自由。相反，主体有屈从于看不见的、对应于资本和市场逻辑发展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危险，因而有屈从于压迫和剥削形式的危险，这些压迫和剥削形式因为在整个全球性的社会再生产系统中“无形的”传播而未被人们意识到。这样一种状态要求我们反思这样的问题：获取自由流动的信息能否让我们控制思想和符号市场？电子设备与使用者—消费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主体究竟是自己创建自己的文本，还是作为体制中的、作为从特殊阶层利益考虑的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作为某一社会规划和意识形态中的没有自己思想的仆人，屈从于符号市场的产品？现在的情况是有利于批判意识的发展，抑或是滋生新形式的社会异化？是谁在控制调节信息的生产、交换和流通的传播渠道？其目的是什么？那种控制实际上捍卫了什么价值？

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求我们考虑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划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希望其答案具有科学和伦理上的有效性，我们就必须超越符号市场的副现象层面去考察符号生产过程以及为其定位的社会规划。罗瑟—兰迪将统治阶级定义为“对某一社团的言语与非言语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实施控制的阶级”，他的这一定义得到了今天的社会现实的支持；他关于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具有符号中介性质的理论也是如此。

统治阶级决定哪些程序和意识形态可以调节某一社会的整体行为。意识形态就是社会规划，而主导某一社会的社会规划是由当权的阶级制定的［参见 Rossi-Landi，1994（1972）：203—204］。我们可以效仿罗瑟—兰迪，将统治阶级看作控制传播渠道，并为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制定规则的阶级。这样，在西方的“民主”中，大众传媒是社会规划的主要场所。因此，大众传媒在全体大众毫无 278 思想的支持下行使社会权力和控制力。的确，大众传媒在构建共识的过程中已经显示其强权与无所不在的特征，在开始于 1991 年海湾战争的新世界秩序中，大众传媒就成功地传播了战争之“正确与必要”的意识形态（参见 Ponzio，1995a；

Ponzio 与 Petrilli，2000a）。

6.3.4. 文化资本与社会异化

在当今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再生产中，文化体系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这有几个重要的影响。第一，很难将意识形态利益与资本发展中的客观物质利益分离开来。意识形态融入到生产过程的整体之中，并促进利润的生产。第二，鉴于文化是由符号构成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符号而传播——事实上，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符号而产生——文化体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便涉及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生产——其作用在当今的社会再生产中越显重要。“文化资本”这一说法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是当今现实的反应。语言和非语言劳动生产并发展着文化资本；如同所有生产资本的过程一样，在一个生产周期中，剩余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反过来又增加文化资本。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主体都不一定意识到劳动最终的成品；更为重要的是，主体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为可以归类为劳动。罗瑟—兰迪说：

> 人付出了劳力，却没有意识到他为了某种目的而付出了劳力，因而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劳动。其目的如果是由一个未被意识到的社会程序强加的，那它或许就是超个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有别于意识冷漠或无意识地执行计划的活动。［1967—1972，15/16/17（1971）：22］

如前所述，我们正在描述的这种状况直接的暗示就是：服务于资本发展的意识形态是看不见的，而且，在我们大多数行为中反映出来的剥削大多是难以觉察的。当今时代——全球化时代——是最难以批判意识形态的时代，因而也是最难以分析社会异化的时代。从这个视角看，跟大众传媒相关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与审查制度有关，微妙（不是非常微妙）的审查形式在无人注意和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渗透进入传播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审查制度促进了被异化主体形成的过程。全球性传播给我们呈现的往往是一个统一的、独白性的整体，它即使不会致使批判性思维完全不可能，也会使它非常困难。跟它形成对比的是一种基于他性逻辑，（因而）是无法漠视差异逻辑的多逻辑性体系。 279

大众传媒技术的主体往往会屈从于符号市场的需求；这样，主体的他性，主体的独特性，服从于身份逻辑。访问传播网络给人以自由的假象，而此时主体实际上承受着充斥于市场的自由流动的符号和信息所带来的无形的剥削和压迫。多媒体资本的利益大幅度地调节文化现实。然而，当宣告意识形态“危机”抑或甚至于意识形态“末日”时，当“异化”、“阶级利益”、“社会剥削”等表述被宣布落伍

时，这些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而不加追究。当今的文化体制实际上需要一种文化资本再生产循环的批判，这种批判应重点关注符号、意识形态和普通社会规划所发挥的作用（参见 Rossi-Landi，1992a）。

符号和意识形态正越来越多地涉入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结果，个体已经承担了一个必须重新审视的角色。主体会无意识地融入该主体自己也不知道其目标的过程；“异化的主体”这一术语对此无法完全解释。“异化的主体”想当然地取代了主体概念，而事实上，这个概念因其特别的意识形态特征需要受到质疑。就“有形的异化”而言，主体受到忽略、谴责，被社会宣称为反常、病态、“精神异化”，因而对整个体制毫无用处。“无形的异化”——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如今关注的不仅仅是工厂里的生活；它延及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社会生活空间。不同于“有形的异化”，无形的异化服务于整个体制。于是，就“言说”主体而言，我们至少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异化：一是心理病理异化，它对应于我们所说的有形的异化；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这种异化将异化的言说者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劳动者置于同一层次。 280

6.3.5. 符号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当罗瑟—兰迪正在发展其学术思想时，社会再生产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言语与非言语交流——言语与非言语符号——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资本主义宣布自己生效之前，还不可能研究构成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之基础的社会规划。同样，在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从而削弱资本的有机部分（即：劳动者的价值）之前，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去神秘化，并进一步揭示生产过程中主体被剥削和压迫的状况。在本章开头引用的一段文字里，罗瑟—兰迪宣称［Rossi-Landi，1994（1972）：201］，“人显然是根据所有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程序而行动，而不仅仅是在新资本主义环境里行动”。新资本主义对资本有机结构的变革使得这种程序的面纱有可能得以揭开。

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再生产周期在技术上非常先进，以至于很难看到程序设计过程以及这些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宣告；对异化和剥削的批判已被斥为时代错误。社会再生产系统已经被神秘化，并装扮成人类历史的自然结果；这就给人造成这样一个总体印象：该系统是无法逃脱的；因此，批判或革命实践的项目被斥为不切合实际，被斥为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社会政治层面，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宣告。然而，事实上，这个时代已经随着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两者的影响而被深深地意识形态化了。但宣告意识形态的危机或终结就相当于根据虚假的意识、虚假的思想和虚假的实践（这些都具有“无形的异化”的特征）而采取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样的立场是很

难去神秘化的，除非将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批判结合起来。拒绝意识形态的概念就意味着认同既定秩序；这样的态度服务于这个体制，但对批判，因而对替换性社会规划的发展、对解放实践都是致命的。

在维持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背景下，电信和大众媒介——这是表示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符号中介关系的绝好表述——的作用相当关键。被利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电子革命是一回事，意识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尽管这两者未必互相排斥。正如罗瑟—兰迪所说： 281

> 新的意识形式和新的心智的建构将会体现于所有的实践层次和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但若没有全新的社会实践制度，这样的建构也就无法完成。它涉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构，包括将所有主要的符号系统替换为更适宜的符号系统，从而为创造可以生活于新社会关系之中的新人类奠定基础。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这项任务必须优先于其他所有事情。这项任务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政治的首要地位。所有真正的革新家最深远永恒的职责就是慨然投身于这项任务，无论他们宣告自己为“革命者”与否（革命者这个角色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实践——理论——实践这样一个辩证的循环中的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的个人努力作出了贡献，他们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Rossi-Landi，1982（1978），英译本：344]

在符号学的语言中，在解释项符号层次，当解释项符号与被解释项符号之间建立了对话性批评的关系时，革命就完成了。这个关系植根于他性逻辑和能指过度，而并非处于可产性的层面，或者为基于身份逻辑和一般差异的系统服务的层面。他性、对话性和创造性等价值构成了逃避生产逻辑的条件，因而也构成了批判主体性和社会、语言异化的条件。解释项之间基于他性、对话性和创造性的关系使得主体抵制消极融入一个原本自然的自我再生系统。

假如人是符号，假如符号属于一个或多或少异化的环境——罗瑟—兰迪（同上：242）所说的“虚假意识和实践的环境，它也是在话语层次上表达自己，因而变得真正意识形态化了，或者说，从我们谈论它那一刻起，它就是这样了”——那么，我们要想克服社会和语言异化，摆脱非人化过程，就要建立一个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我们所提倡的方法是基于对话性、他性和应答性理解的逻辑，以及外位逻辑。这样，它也许有助于打断生产、交换和消费周期的狂热节奏—— 282 这个周期是服务于维持现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这样，我们也许就能够维持创造性、差异、自由、非异化的自我和真正的人性。

6.4. 在“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罗瑟—兰迪

6.4.1. 意识形态学说与社会交流项目符号学

在1967年春,罗瑟—兰迪创办了期刊《意识形态》。该项目总的原则是“非学术性和反专家性”。该刊及其附属活动持续至1972年。

1979年春,另一期刊《人文科学》第一期问世,该刊也是由罗瑟—兰迪创办。它是由巴里的Dedalo Editrice出版商出版。其办公室位于巴里,由奥古斯托·蓬齐奥负责。该刊第六期(1980年12月)是其最后一期。

《意识形态》第一期没有介绍或社论。专刊或专栏的社论和介绍在1968年第三期出现。后来,这些社论和介绍由Edizioni di Ideologie出版商出版,书名为《意识形态的纲领性著作》(Rossi-Landi,1972)。该书包括《意识形态》于1970年第12期开始出版的《意识形态理论词典》的部分序言。这些序言的目的是考察、阐释并重新界定构成人文科学基础的一些概念,如semiotica(符号学);或者政治界及相关理论争辩中使用的概念,如calcolatori e cervelli(电脑与人脑)、corpo(身体)、progresso tecnologico(技术进步)、razzismo(种族主义)等。

《意识形态》发表的第一篇社论“意识形态补充阐述”已经在杂志《第十六》(1968年春)的第13卷刊载。这篇社论再次列出了《意识形态》意欲涉及的主题清单——该清单在《意识形态》第一期已经刊登。与此同时,此文回应了罗瑟—兰迪的一篇名为“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第一期即以此文开始)283 的文章中所分析和界定的“意识形态”概念。

> 这是《意识形态》第三期,亦即1968年第一期。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本刊意欲研究当代意识形态问题。既可以从一般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结构着手,分析其系统的和常见的方面,也可以集中讨论几个需要更新的话题:共产主义多中心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倾向、平民主义和(或)工团主义或社团主义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政治天主教的一些倾向)、资本主义与经济发展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人的科学以及这些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特征的理论基础(这是否仅仅对于新资本主义表现形式才成立,还是在更深层次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概念作为某种社会规划或项目中必然包含的虚假思想和虚假实践而提出。对于后者,我指的是一种基于历史的社会建构的设计。[Rossi-Landi,1967—1972,3(1968):1]

在“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一文中，罗瑟—兰迪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他放弃了意识形态乃虚假意识的伪定义，这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的负面评价（这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这个概念的特定意义所作的推断；进一步追究的话，这是“理论家们”创造的术语的负面内涵）。

罗瑟—兰迪的项目基于意识形态乃社会规划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使他能够保持意识形态乃虚假意识的定义，并从理论上证明其合理性。然而，该解释也将那个定义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提供的不仅仅是描述性或相对性的解释。因此，罗瑟—兰迪将意识形态描述为“虚假思想和虚假实践”（消极意义），将它作为“社会规划”来考察。这样，他就能够在承认所有意识形态话语不可避免的历史制约条件的基础上探讨问题。与此同时，他的研究方法相当于提出一个可以辩证地克服虚假意识和虚假实践的终极批判。这样，意识形态就可以作为革命的思想而被“拯救”并得到积极的评估。

罗瑟—兰迪将意识形态置于跟它最为相关的框架之内——异化的人类环境。这完全吻合《意识形态》所贯彻的逻辑—历史方法论，同时也对立于专业化的分离主义，对立于将研究对象从它所归属的整体中抽象出来的倾向。罗瑟—兰迪将 284 这同一方法应用于 1968 年的论文集《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Rossi-Landi，英译本 1983；1992b（1968）]、1967 年关于意识形态的论文与后来的《符号学与意识形态》[Rossi-Landi，1994（1972）] 一书（该书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意识形态研究，认为意识形态与符号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意识形态学说唯有通过符号学中介才能成为现实；这是因为意识形态通过符号来传递其本身，而符号则通过符号系统的研究得到检视和阐释。就这一点，罗瑟—兰迪在《符号学与意识形态》的前言（1971）中声明：“没有得到意识形态学说支持的符号学只是一门脱离实践的专门科学，尽管它将自己描述为一般的符号科学。”[Rossi-Landi，1994（1972）：8]

根据罗瑟—兰迪，以意识形态作为对象的论述切合理解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般符号学思想；它基于逻辑—历史方法，使用抽象概念将现实的整体历史性地隔离开来，但又将它们融入到更大的整体之中，从而决定其具体的结构。罗瑟—兰迪相信，为了对抗专业化——研究符号系统的各种不同学科的分离主义——符号学必须成为一门总体性的科学，这门科学处于源自必要、独立和抽象的操作的研究对象所在的整体之中。符号学对将意识形态及研究对象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制度持反对立场；这样，符号学便清晰呈现了主导该制度的社会规划。换句话说，符号学不仅仅能揭示维持（即使是无意识地）人类行为的力量；正是因为它的整体视角，因为它揭示了作用于社会制度的力量——从而使得它们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它们的政治功能均显而易见——符号学表明自己是符号系统的

批判，是新型的、更为人性化的项目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符号学研究超越了有关社会交流的研究中通常遭遇的局限性（那些年，罗瑟—兰迪心里一直想着诸如精神病学家阿尔伯特·E. 舍夫兰和符号学家爱德华·T. 霍尔的处境）。社会交流的符号学研究必须处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对支配符号系统如何融入某一社会组织的利益进行描述的问题——权力状况的问题。这一研究认为，每一符号系统都是一个整体，其功能不仅仅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作用，而要取决于那个整体作为一个部分所起的作用”；因此，每个项目必然受制于更高的社会层次。这便是以某种方式预示和组织行为的意识形态（如果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话）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罗瑟—兰迪将统治阶级定义为：对构成某一社团的言语与非言语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实施控制的阶级［《意识形态理论词典》中的词条“Programmi della comunicazione”（交流项目），参见《意识形态》16—17：34；重印于 Rossi-Landi，1994（1972）：203—204］。

285

正如罗瑟—兰迪开始在“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一文［1965 年发表于《新潮流》杂志，后来以专著出版（1968；见 Rossi-Landi，1992b）］中所构想的那样，符号学承认非意识形态的社会现实空间的存在。通过撕下构成所谓“自然”、“自发”、“给定”、“现实”的事物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假面具——既包括普通行为领域，也包括科学或文学领域——符号学向人们表明，每一个行为要么不可避免地被置于阶级社会的维护和再生的项目之中，要么被置于批判和废除阶级社会的项目之中。于是，符号学成为去异化的、革命的实践。

6.4.2. 以偏概全的谬误

关于抽象以及“抽象客体”与“整体”之间关系的一个错误观点是：一个抽象的客体不仅具备原本被忽略或遗忘的整体的特征，而且具备其全部特征。正如罗瑟—兰迪在“符号学笔记”［原来于 1967 年发表于《新潮流》杂志，后来收录于《符号学与意识形态》（Rossi-Landi，1994）］中所说，这样的谬误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没有对符号论与符号学进行区分。

选择“符号学”而不是“符号论”来表示一般的符号科学，这不仅仅是术语偏好的问题。作为符号系统研究的符号论——包括后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符号系统——不可与作为研究所有类型符号的一般科学的符号学混淆。通过避免将符号学与如此定义的符号论等同起来，符号的研究将自己从符号论的语言本位主义中解放出来。就其本身而言，语言学依然是一门独立的语言科学，它与一般的符号科学之间的联系表明，语言学外在于其对象的描述及其分析方法的确定。在《意识形态理论词典》中，罗瑟—兰迪将词条“Semiotica”专用于对符号学的解释

[Rossi-Landi, 1967—1972, 12（1970）: 38—44]。

符号学是克服独立学科专业化的理论场域，罗瑟—兰迪从这一视角提出，要考察语言生产、言语交流与物质生产和交换之间的关系："我试图将两个整体（在一个更大整体里的语言生产整体和物质生产整体）结合起来，进而揭示这一更大的整体的一些结构。"[Rossi-Landi, 1994（1972）: 288] 286

这便是罗瑟—兰迪从《作为劳动与市场的语言》（1968）到《哲学方法论与符号科学》（1985）所走过的路径。在某一意义上，他的计划是将马克思对待商品的方法当作交流事实而非事物之间的关系来发展。但由于该方法使他能够将政治经济学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来考察，他便能够从语言现象与李嘉图—马克思时期的经济学范畴的关系中研究语言现象。这让他可以进一步反思语言的使用与交换（语言市场层面）并重点关注语言生产的社会关系（语言劳动的社会关系）。

随着研究的继续，罗瑟—兰迪又为我们奉献了一篇重要的长文［刊于《意识形态》16/17,（1972）: 43—103］，探讨物质劳动与语言劳动之间的关系。此文后来再次发表于《语言学与经济学》，现在也收录于《哲学方法论与符号科学》。罗瑟—兰迪更为具体的目标是通过他称之为"同源法"（前面提过）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物质人工制品与语言人工制品之间的关系。

这种方法不是识别直接和表面的相像关系（如类比），而是识别同源性——被认为是互不相关的事物之间、与不同知识领域相关联的事物之间在结构和起源上的相似性。物质人工制品与语言人工制品尽管有明显的区别和学科起源的差异，却可以看作同一整体的部分，因为它们都是人工劳动的结果。这样，同源法有助于对分离于所属整体而存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实体化继续批判。这促进了关于如何克服科学中的分离主义的讨论。

> 同源要素打破了专业化：它迫使人们同时考虑不同的事物，它扰乱了不同的次整体的独立作用，并呼吁一个更宽广的整体，这个整体的规律不是其组成部分的规律。换言之，同源法是一种反分离的、重构的方法，故而不受专业人士的欢迎。[Rossi-Landi, 1967—1972, 16/17（1971）: 62；见 1985a: 53] 287

罗瑟—兰迪发现并分析的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之间的同源性受到控制论最近的发展的证实。正如罗瑟—兰迪本人于 1985 年 4 月在巴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所说：

> 大家可以沿着我称之为同源性的生产计划线路登高至某一点，在那里

> 发生着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就是：这两种生产彼此融合。这是在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计算机的生产中，硬件（专业术语，即：以复杂材料构成计算机的物质实体）与软件（即：程序）结合了起来，这样，一整套在逻辑上可以表达的语言关系融合在一起了。因此，非语言的、客体的和语言的材料几乎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彼此融为一体了。（Rossi-Landi，1985b：171）

在他1967年那篇刊登于《意识形态》第一期最开头的文章里，罗瑟—兰迪将意识形态置于恰当的语境之中——异化的人类环境——并结合同一整体中的另外两个成分（虚假意识和虚假实践）对它进行考察。罗瑟—兰迪坚持认为，在参照后两个对象而进行考察的意识形态可以描述为社会规划。

6.4.3. 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

罗瑟—兰迪以异化的现实具有社会历史性这一思想为开始，并基于下述假设考察意识形态：

> 在自然与人、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交流中（其间，人渐渐地成为不同于自然的东西，并意识到如此多的差异），一定有某些现实的基本运作迷失了或被混淆了，有一些虚构的基本运作被引入：其结果便是，文明的进程（包括人类本身在所谓的历史中提出的理论）因为那些迷失、混淆的真实运作，因为那些侵入的虚构运作，而没有成为本应该的样子。亦即俗话所说，文明的进程篡改了自己……异化是一种篡改，是历史形成和展开过程中的一大故障。（《意识形态》1：3）

288

如前所述，罗瑟—兰迪对作为概念的意识形态的研究的巨大贡献是，他向我们表明，尽管人们会说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但它不完全是虚假意识。他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两个区别：程度的差异和质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与这样的事实有关：虚假意识是不够发达的、不够确定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是更为发达的、更为确定的意识。从这一点来看，虚假意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对应于意识与思维的关系：虚假意识存在于低层次的概念阐述中，而意识形态存在于更高层次中。更精确地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话语理性化——对虚假意识的态度或状态的理论上的重组。

第二个差异，即质的差异，关涉意识形态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言语语言的使用：意识形态是在某一具体语言中使用符号阐释和言语形式的虚假意识。这两个差异可以综合为：意识形态不同于虚假意识，因为它是虚假思维。罗

瑟—兰迪说：

> 这与黑格尔的基本直觉一致，它将“理论”精神的完整阐释置于意识与思维之间的某个位置，即：直觉与表征之间。正是在表征的第二阶段（想象阶段）才出现符号，正是在表征的第三个阶段（记忆阶段）才形成语言。

他在括弧里又补充说：

> （用黑格尔的话说，因此就有可能出现虚假意识或意识形态或心理学的现象学——也许今天人们可以说，符号学现象学仅仅关注出现于语言之前的东西。）

然而，根据罗瑟—兰迪，意识形态不仅仅通过虚假意识和虚假思维就可以得到解释：它也是虚假实践。就虚假意识和虚假思维而言，人们实际上脱离了实践。因此，意识形态既是虚假思维，也是虚假实践。在虚假意识、虚假思维、意识形态与虚假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跟意识形态表现为社会规划这一事实有关。为了理解意识形态，我们再次必须考察其语境。根据罗瑟—兰迪： 289

> 这一直是一个整体各组成部分——在这个情况里原先是两个部分——的分离问题。整体是在复化的两个不同阶段（意识层和思维层）被把握的。在反思自己直接的虚假意识（以及该意识的虚假实践）过去，并发现自己与虚假实践并置，甚至在紧迫性上处于这些因素之下，思维试图通过优化程序来拯救自己，这些程序至少给它以这样的幻觉：它是一个不很破碎的家庭的成员，而且是一个活跃的成员。因此，我正在阐述的定义绝不是因脱离实践而变得虚假的思维的定义，这就是全部。在法律上，它也是虚假实践的定义，因为它与思维相分离……没有思维会因为不是虚假的特征而独自（独立于它与实践的关系）感到愉快：因此，只有基于思维，唯有如此，才能衡量和谴责虚假思维。[Rossi-Landi，1967—1972，1（1967）：7]

每一意识形态都是社会规划，考察意识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罗瑟—兰迪可以确定创新的或革命的规划与保守的或反动的规划之间的差异。能够将意识与实践汇聚在一起的思维、行动和社会项目是革命的；对此设置障碍的社会规划则是保守的。

《意识形态》第三期的社论“意识形态补充阐述”再次回归这样的理念：作为

虚假思维和虚假实践的意识形态必然生成某种社会规划——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必然生成一个旨在以历史为依据来构建社会的规划。意识形态的学说作为社会历史领域的一般科学而被提出。这体现于该刊的副标题:当代历史笔记。在这篇社论中,罗瑟—兰迪确证了《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征,他设想该刊朝着创
290 新的、革命的、去异化的社会规划方向而迈进。在该文中,他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将它置于其特殊语境的辩证关系之中——快速工业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将它发展为上层建筑批判和互补性的经济结构批判。因此,在他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心理和语言融合技巧所作的系统阐述的、详尽的理论批判。

6.4.4. 符号学和人文科学批判

这样,意识形态的去神秘化不仅与新资本主义制度语境的现实描写有密切联系,而且与有意识的意识形态阐述工作也密切相关。概括起来说,《意识形态》第三期的社论传递了下面这一表述的含义:人文科学批判。在事后看来,这一选择强调了《意识形态》与罗瑟—兰迪后来创办的另一杂志《人文科学》之间的连续性,尽管这两者之间有许多差异。

《意识形态》表达的人文科学批判尤其以学科的分离和零散的特征为目标。在第三期的社论中,罗瑟—兰迪除了暗示将语言学视作符号学一部分的必要性以外,还重申必须将社会学和政治学统一起来。同样,他拒绝将精神分析与心理学分离,也拒绝将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分离。此外,他驳斥纯粹形式逻辑将辩证法排除在外的主张,驳斥边缘和计算机经济学仅仅研究市场结构但忽视生产结构的主张。

就史学而言,将意识形态学说看作社会历史领域的一般科学的理念蕴含着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关联的踪迹:它们之间是辩证的关系。甚至史学也以社会规划的某种形式而发展;因此,尽管史学的话语具有历时取向,却以其他人文学科促成的共时结构的阐释为起点。但史学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对它有指导作用的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模式的应用。它在其他人文学科方面的信息输入尤其表现于对这些模式的验证。正是通过为纠正或放弃某些具体的意识形态模式提供刺激,
291 史学的修正才以一种有效、辩证的交换方式,不断地反转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债务关系。

《意识形态》不仅通过不同文章提供足够的篇幅进行史学的阐释,而且还专门辟出双期合刊(7/8,1968)探讨“古巴革命的历史根源”、另一长约600页的合刊(14/15,1970)探讨“中国革命的研究”。后一合刊包含300页的、以小字号分两栏排版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意大利语参考文献”(1945—1970)。《意识形态》

正在寻求一个全局性视角，批判人文科学彼此分离，却不诉求于哲学超科学或“真知”的重新发现：

> 要让人文科学批判具有系统性，我们就有必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长处——逐步地、明确地提出一个关于诸人文科学之间关系以及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关系的方法论，目的是创建一门人类的全球性科学。假如我们希望开启真正跨学科的研究，那么，这个方法论就必须具有前学科性，避免不诉求于哲学超科学的专业化的局限性，也就是避免掉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1967—1972，13（1968）：“社论”；现收录于《意识形态的纲领性著作》，Rossi-Landi，1972：15]

6.4.5. 研究与去异化的实践

《意识形态》总的策略根植于实践的需要。创新的或去异化的理论研究被视作创新性实践的工具。因此，它得在革命实践的应用中去检验和修正。

然而，虽然《意识形态》明确与马克思主义左派激进文化结盟，根据“当前在西方和受到多中心矛盾动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危机”（我们说的是 1968 年），《意识形态》认为以政治术语来铸造自己的角色或身份过于鲁莽。《意识形态》编委会认为，如果另外再作声明来表明自己在当时众多左倾少数派中的立场，那是毫无意义的花言巧语；编委会视“左派异议”这一术语本身为一种神秘化，且宗派的、分裂主义的辩论常借用该术语（这种辩论经常受到表面上“啰嗦的极端主义”的支持）。 292

编委会还认为，让研究的意识形态效忠于本国或西方左派直接的政治期望，也是一种神秘化。还有一种神秘化是这样一种信念：第三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立场和革命经历可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复制。意大利议会外的左派小团体经常将这些运动及其革命成就解释为即兴之作、自发之事——这是《意识形态》不赞许的一种态度，不仅在意识形态阐释层面上，而且在史学阐释层面上都不赞许。

前文提及的有关古巴革命历史根源的特刊还有一个宗旨是对古巴经验的史学阐释作出又一批判；其主要目的是“谴责”那些小团体的自发冲动和造反精神：因为他们支持无政府主义唯智论的意识形态立场，反对理论和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参见 1968 年 5/6 期“社论”，现收录于《意识形态的纲领性著作》，Rossi-Landi，1972：17—19）。《意识形态》的第 18/19 合刊（1971—1972，但出版于 1974 年）是该刊最后一期，其中有超过 651 页的内容专门写何塞·马蒂；这一期部分是为了表达探寻一种工具，它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古巴和拉美在历史与文化上的重

要性。

《意识形态》的取向是去异化的、革命性的实践，所以，针对对理论的拒斥和唯智主义对理论的蔑视，《意识形态》持完全对立的立场。在其9/10合刊（1970）的社论“革命与学习”以及后来13/14合刊（1970）的社论“新生力量与中国革命”中，该刊再次拒斥这样的虚幻想法：其他人（尤其是中国人和古巴人）的革命经历可以迁移至西方新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尽管依然支持意识形态批判，但“革命与学习”一文坚持认为，“换位假说”暗藏两种典型的欧洲人的缺陷：“将他人的成果占为己有从而省去生产产品的麻烦的愿望；自以为是地以为懂得如何依靠自己操纵这些成果。”[Rossi-Landi，1967—1972，9/10（1970）：“社论”；现收录于《意识形态的纲领性著作》，1972：20—21]

至于革命过程中“政党”的作用，《意识形态》拒斥那些所谓政党无用的自发性理论。但与此同时，它对西方工人运动史上的“社会主体”（如“政党”、“工人 293 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持批判态度。甚至认为这些“主体”过于抽象，需要置于其具体语境中考察。因此，第三期的社论拒绝承认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广为传播于意大利的“极端语文学主义”。“极端语文学主义”仔细调查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以寻找其“裂痕”和“左翼替代品”。这种语文学主义以短视的眼光看待世界；它只能在诸如“政党”的抽象主体里发现内部矛盾。这就导致了

> 僵化的“阶级”或“政党”历史的构建；它武断地终结了在这些“主体”中运行的辩证法，对这些主体进行调查，以确定对抗力量的基础，而这股对抗力量是随着全球性的社会发展而出现和发展的。（1968年第三期“社论”，见Rossi-Landi，1972：16）

社论有一段解释即便放置于当今左翼政党之间或内部的论辩之中进行考察，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这段解释，社论最后坚持认为，以新形式出现的全球性社会对抗证明了“政党”这样的有机组织存在的合理性，但反之不然。

6.4.6. 新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劳动概念

刊于9/10合刊的社论（1970）“革命与学习”描述了西欧新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当时世界政治的某些倾向。就今天这一发展阶段而言，这些倾向在当今的世界表现非常明显。这些倾向包括：资本主义稳定性已经提高；社会民主日益扩展；工人阶级内部劳动分工更加细化，生产者与产品分离程度更高。

有关最后一点，社论就个人与生产之间关系所作的评论尤其富于洞察力：指向生产的个人活动逐渐被弱化，因此，现在的活动似乎与生产相分离。这被认为

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超越个体的组织与技术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发展将人类从日常的生产要求中解放了出来。但与此同时，这些发展也增加和扩大了生产的责任，使之更为神秘化，以至于造成这样一种幻觉：一个人可以不劳动、不直接参与生产、不必在他直接依赖的可识别的雇主身边劳动，就能生存。 294

从这些有趣的方面来看——由于整个生产系统都愈发复杂的组织，以及服务业尤其是通讯服务的发展，这些方面在今天更为明显了——我们值得回顾一下，当年罗瑟—兰迪就强调语言本身的劳动维度，并研究符号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人类也进行语言劳动；劳动未必是在有意识或有意向的情况下完成。

在重印于《哲学方法论与符号科学》（1985）的《意识形态理论词典》的各种词条（“劳动与活动”、“人化”、“非商业交易”、“劳动结构”）中，罗瑟—兰迪分析了劳动概念，考察了劳动在人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思考了劳动与活动之间的区别。他指出，劳动与活动的区别在于这样的事实：不同于活动，劳动是有计划的、有意向性的，它遵循一项规划；然而，与此同时，劳动未必伴随着对其目标和规划的意识。劳动就意味着执行规划，这是它不同于活动之处；然而，这些规划也许是有意识的，也许是无意识的。

这对于“异化的劳动”和“语言异化”（“异化的语言劳动”）这些概念来说具有明显的含义；此外，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的分析构成了联系。然而，这还关涉弗洛伊德所说的“梦幻的劳动”的可能性。在“劳动与活动”一文中，罗瑟—兰迪声明，承认未意识到规划的劳动的可能性就意味着允许“马克思对弗洛伊德的使用或弗洛伊德对马克思的使用的特殊接触区”[Rossi-Landi，1967—1972，15（1971）：22]。

6.4.7. 罗瑟—兰迪关于意识形态的思考的进一步发展

罗瑟—兰迪在为《意识形态》杂志工作期间，撰写了最为重要的一些文章，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又对这些文章进行了改写和扩充。他有一篇关于语言的长文是受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的启发，直接引用了他们关于美洲印第安语言（纳瓦霍语、霍皮语、温图语）的研究；这篇文章题为“语言相对论理论”[Rossi-Landi，1967—1972，4（1968）：3—69]，后来于1972年以专著形式再次发表，题为《符号学与意识形态》[Rossi-Landi，1994（1972a）：117—188]，后又以英语出版，题为《语言相对论的意识形态》（1973）。 295

罗瑟—兰迪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兴趣很明显出现于专著《意识形态》（1978a）。该书特别具有价值的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与共识的达成”这一部分；罗瑟—兰迪在这里的意识形态概念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相关联。根据罗瑟—兰迪，葛兰西虽然使用的是前符号学术语，却已经发现了符号系统在社会再生产中、在

“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说，罗瑟—兰迪关于意识形态的思考是对葛兰西的直觉的发展（有关罗瑟—兰迪与葛兰西之间的关系，参见 Ponzio，1991：205—291）。罗瑟—兰迪在《意识形态》中以符号学术语表述了葛兰西的“新君主”的概念：

> 新君主的基本结构将由一直相互作用的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系统构成，这些符号系统重新组织就可以实现革命性的社会目的论。只有这样，而且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实施政治权力的人所坚持的社会实践才可能促进和施行新意识形态。[Rossi-Landi，1982（1978）：76—77]

在创办了杂志《意识形态》之后，罗瑟—兰迪又加入另一杂志《人文科学》（参见 Rossi-Landi，1979—1980）的工作之中；如前所述，该刊创办于 1979 年，持续了两年时间。

在“致读者”（此文为 1979 年 4 月《人文科学》第一期创刊文）中，罗瑟—兰迪指出，在意大利还没有一本杂志从跨学科视角重点探讨人文科学问题；他然后强调了这本新杂志与 1967 至 1972 年的《意识形态》杂志所承担的工作之间理想的连续关系。这本新杂志的目标是发表跨学科的文章，从人文科学视角看，这类文章一直是《意识形态》杂志最有意义和最持久的方面。他将《意识形态》的闭刊与造就该刊的历史时刻的终结联系起来，“与最近的和久远的意识形态模式的中止（有时是反常）联系起来，而就在《意识形态》办刊期间，受这些意识形态模式的激励，或至少诉求于这些意识形态模式，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现在必须在 21 世纪初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意识形态》这本刊物。在比较这两本现在都不再存在的刊物时，我们或许会发现，今天我们最缺失的不仅仅是《人文科学》的“科学而精练的构想”，更是赋予了《意识形态》生命的那种献身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

296

生平简介

费鲁齐奥·罗瑟—兰迪（1921 年生于米兰—— 1985 年卒于的里雅斯特）对意大利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早年，罗瑟—兰迪不仅从意大利文化，而且从奥地利和德国的文化传统、从英美各思想流派吸取了思想和方法论的营养。他的诸多文章与专著都是首先以英语出版。他多年旅居国外，主要是英国和美国。1962 至 1963 年，他任教于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1963 年，他任教于奥斯汀市的德克萨斯大学（他后来多次回到该校）。在 1964 至 1975 年期间，他担任过欧美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曾在哈瓦那大学和圣地亚哥大学（古巴）

教授哲学和符号学课程。除了帕多瓦的教学任命（1958—1962年）以外，他直至1975年才以莱切大学历史哲学教授身份回到意大利的学术界。1977年，他成为的里雅斯特大学理论哲学全职教授。

罗瑟—兰迪对莫里斯的批判对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翻译了莫里斯1938年的一本重要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但对他的思想同样产生影响的还有美国实用主义、操作主义，和英国分析哲学（1951至1953年他居住于牛津），另外还有维特根斯坦和赖尔的研究（文献Rossi—Landi，1955便是对赖尔的《心的概念》译本）。罗瑟—兰迪还复兴了当时“次要的”意大利传统——该传统以拥有如下重要人物而感到自豪：朱塞佩·皮亚诺、乔瓦尼·瓦伊拉蒂、马里奥·卡尔德朗尼、费代里戈·恩里克斯和尤金尼奥·科洛尔尼——以抗衡由贝奈戴托·克罗齐和乔瓦尼·秦梯利所代表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

罗瑟—兰迪不仅以作者身份，而且以主编和译者身份，对学术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担任多种不同刊物的编辑或编委会成员，其中有些是他创办的。这些刊物包括《方法》（1949—1952）、《西方》（1955—1956）、《新潮流》（1966—1968）、《辩证人类学》（1975年起）、《意识形态》（1967—1972）和《人文科学》（1979—1980）。这些刊物对符号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关罗瑟—兰迪的研究的批判性研究，参见Ponzio（1988）。蓬齐奥还有以英语撰写的著作讨论罗瑟—兰迪理论研究的具体方面（Ponzio，1990a，1993a）。在Ponzio（1990a）中包含彼得里利撰写的一篇题为“符号的物质性”的文章（Petrilli，1986b）。有关罗瑟—兰迪思想的另外两个文献来源是：*Il Protagora*的专刊（Petrilli编，1987）和《关于费鲁齐奥·罗瑟—兰迪的著作》一书（Bernard等编，1994）。

297

第七章
关于艾柯

我们最后这一章以翁贝托·艾柯（见第259页生平简介）来结束对当代符号学重要人物的纵览。首先，我们要陈述他对解释符号学（或皮尔斯符号学）的成功、传播和阐述所作的重要贡献。艾柯做了大量工作，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和文本的解释成分。与此相关的是他对“解释限度”的质疑，解释问题必然暗示解释的限度。他的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不断回归符号与指称物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也与解释问题相关联：在符号所代表的解释性计划中，指称物或对象的作用是什么？艾柯最初对符号—指称物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非指称语义学”（Eco，1975）。后来他承认，指称物在符号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这受到了皮尔斯及其“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分法明显的影响）。在这第二阶段，艾柯引入rinviato（回用）概念，从而恢复了指称物（Eco，1984）。他从对象原先如何吸引主体对同一对象的兴趣的角度，即对象如何吸引主体对其解释的兴趣的角度，再次回到这个问题（Eco，1997a）。我们与艾柯的对话旨在表明，处于他关注中心的问题归根结底关涉解释问题，只有从应答性理解角度去理解解释并进而说明异他性的符号活动维度，才能充分论述他关注的问题。在下面的第三部分“谓词判断、辩论和传播”中我们将回到这些问题。本章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我们的观点：“从298 解码到解释”和“解释与应答性理解”。

7.1. 从解码到解释

7.1.1. 艾柯对意大利解码符号学向解释符号学转向的贡献

在为罗科·卡波兹主编的《阅读艾柯》撰写的前言中（Capozzi，1997：xiii），托马斯·A. 西比奥克说，皮尔斯在意大利的出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在“意大利的皮尔斯”（Sebeok，1982）一文中，西比奥克已经指出了索绪尔“符号论”与皮尔斯“符号学”之间的融合。“我以为，这一特别趋向或许受到了翁贝托·艾柯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最具权威性和最引人瞩目的研究工作的推动——特别是

在他的《符号学理论》中，他引用这位美国先驱的次数是引用那位瑞士先驱的次数的五倍。”（Capozzi，1997：xiii）

无论是从一般符号理论的发展来说，还是从特殊符号学不同寻常的繁荣来说，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的几年是对意大利符号学起决定性作用的几年。那几年有一个明显的转向：由解码符号学向解释符号学的转向；解码符号学直接或间接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而解释符号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皮尔斯—莫里斯的传统。艾柯有两本书——《符号学理论》（Eco，1975，英译本 1976）和《符号学与语言哲学》（Eco，1984，英译本 1984）——可以视作这一传统的体现。确实，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可以视作意大利符号学早期阶段的终点和当前很有皮尔斯味道的发展趋向的起点。费鲁齐奥·罗瑟—兰迪 1953 年论查尔斯·莫里斯的专著第二版也于 1975 年问世绝非偶然。即便如此，意大利符号学中很多问题和视角都超出了索绪尔的影响，甚至超出了皮尔斯的影响；因此，意大利在那几年的符号学景观相当复杂。此处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些因素：米哈伊尔·M. 巴赫金的研究的介绍、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及其表意学的重新发现、罗瑟—兰迪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符号学研究领域开始的开拓性工作。

意大利最近在批判性思维和理论方面的蓬勃发展应该置于欧洲以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发展的语境中考察，应该置于与各领域之间的关系中考察。这些相互联系催生了符号学方法、理论和实践的繁荣发展，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符号之“历险”（见 Ponzio，1990a：第一部分）。此外，从纵向来说，符号学研究与史学重构在相互依存中发展——许多发表成果从古代和中世纪思想中追寻符号的生命（例如：Corvino 等，1983；Evans，1987；Manetti，1987；Peter of Spain，1972，意大利语译本 A. Ponzio，1985、2004；Ponzio 与 Petrilli，1996；Posner 等，1997—2004：第一卷）——从横向看，符号学研究中到处散播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特殊符号学。 299

艾柯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一书（亦见艾柯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一文，收录于 Capozzi，1997：1—13）中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类特殊符号学、普通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用他文章里的术语，是“语法、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艾柯 1984 年著作的标题清楚地表明，他坚决将普通符号学与哲学联系起来。下面一段话摘自他的引言：

> 我相信，符号学在本质上是哲学，因为符号学不是研究某一特定的体系，而是提出普通范畴，不同的体系可依据这些普通范畴进行比较。对于普通符号学来说，哲学话语既不是劝告性的，也不是紧要性的：它仅仅是构成性的。（Eco，1984，英译本：xii）

在 1997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陈述道："普通符号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哲学思考符号活动问题的方式。"（见 Capozzi，1997：4）

除了指出普通符号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外，艾柯的专著标题还强调：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这是与普通符号学不易区别开来的领域——并不完全重叠。要完全理解符号学话语，我们就必须从哲学视角探讨符号学——特别是语言哲学（而且不仅仅是言语语言）。

我们可以说，语言哲学探讨的是"符号学领域"或符号科学——或符号"理论"（莫里斯）或符号"学说"（西比奥克）——的边缘、外围突出和多余部分。想起巴赫金用来描述他关于语言的思考的术语"元语言学"（超出语言学的限度），我们可以将语言哲学描述为"元符号学"（关于这一点，见 Ponzio，1994b：9）。

同时，在艾柯看来，作为特定符号系统的语法，特殊符号学不必对它们赖以为基础的范畴进行哲学思考——然而，这并不是否认它们的哲学基础。这一陈述是对采取相反立场的艾米里奥·加罗尼的回复（参见 Garroni，1977，以及收录于 300 Mincu，1982 的加罗尼的辩论性回复）。加罗尼坚持认为，即使特殊符号学也许更为强调实证研究，但它们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它们借以运行的范畴。切萨雷·塞格雷（见 Marrone，1986：153—163）也认为，"特殊符号学"必须讨论哲学问题，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具体的理论框架下运行，它们本身必须在某个阶段面对符号活动的一般问题。

意大利的符号学实践者在各种不同领域从事研究，除了哲学和语言学以外，这些领域还包括美学、心理学、信息理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文学、数学、生物学、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符号学理论已经得益于不同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贡献；这些贡献反过来又通过各个领域运用符号学工具而丰富了这些领域本身。当被要求指出意大利符号学的代表，并说出它们与其他欧洲流派有何不同时，艾柯（见 Mincu，1982：68）提及了结构领域、关于像似符和文学的思考、哲学推理的重要性（"正是在意大利完成了从源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向源自皮尔斯的哲学符号学的转向"）和作为社会符号学的意大利符号学；意大利符号学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有趣的嫁接，与之相反的是法国符号学，它具有强烈的心理学取向，从心理分析那里获得了移植。

今天的符号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超越了解码符号学（如果我们愿意换个说法，又叫符码符号学或等价交换符号学；参见 Bonfantini，1984：28ff）——解码符号学可细分为传播符号学（索绪尔、布依森、普列托）和表意符号学（巴特）——并沿着解释符号学（皮尔斯、巴赫金、巴特等等）的方向继续发展。换言之，符码符号学已经被解释符号学超越或吸收。意大利符码符号学已经连续受到学者们的质

疑，如罗瑟—兰迪的《符号学与意识形态》[1994（1972），不过他的评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961年的《意义、交流和共有言语》，1998（1961）]、艾柯的《符号学理论》（1975，英译本1976）、蓬齐奥的《意大利符号学》（1976）、加罗尼的《识别符号学》（1977）等。上述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包括文章和特刊——推进了后来以解释符号学为取向的著作的出版。这些包括Eco（1984、1990）、Bonfantini（1984、1987）、Rossi-Landi（1988）、Ponzio（1990a、1993b、1994b、1995c）、Caputo等（1998）以及邦凡蒂尼以意大利译文编辑的两部皮尔斯文集（Peirce，1980、1984b；现收录于Peirce，2003）。 301

“符码符号学”这个术语暗指这样一个一般符号模式：在信息被表达和交换之前，符码已经先于符号的实际使用而得到界定。鉴于符码基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双向对应，它只需要解码，而不需要涉及创造性或应答性解释的风险。符码符号学是对索绪尔的歪曲，它依据索绪尔的发送者 / 接收者模式修订了传播的信息或数学理论（见Shannon与Weaver，1949）。因此，与符码符号学相关联的是这样一种传播理念：传播互动就是将一个物体从一地运输至另一地。我们应该记得，罗瑟—兰迪[Rossi-Landi，1998（1961）]早就表示反对将传播理解为一个邮局寄送包裹、另一邮局接收包裹的情况。

从皮尔斯解释符号学（还有巴赫金语言哲学；参见“皮尔斯与巴赫金之间的符号学”，Ponzio，1990a：251—273）来看，这一模式显得尤为不恰当；从社会文化变革来看也是如此；社会文化变革趋向于新的表意实践，这些实践不赞成符码与信息的两极分化，因而从符号的多声性和多用性方面弱化了符码的霸权。而且，符号活动中的意义与解释过程中完成的翻译工作不可分离，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符号如果离开了另一充当翻译符号的符号，那它也就不存在了。

西比奥克从“转导”角度解释了编码和解码的概念。转导由一系列信源与信宿的转换组成，这些转换的完成就在于对意义与外化的语符串（如口语、书面语或手势）之间可能的同源性的解释。作为信源的编码或转化的转导，在信宿一端变成解码或再转化，这在信息被解释之前就已完成：

> “转导”指的是一种能量形式向另一种能量形式的神经生物学转变，正如光子撞击脊椎动物视网膜时所经历的情况；我们知道，它引起视觉神经冲动，这种冲动通过四个中间的化学变化阶段，将视紫红质（眼睛视杆上的一种感光物质）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当信源和信宿就整个交换过程中运用的转换规则“意见一致”时，信息就可以说被“编码”了。（1991a：28） 302

至于“符码”概念，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发生了有关该概念的使

用和滥用的辩论（见 Eco，1984：256）。艾柯用“百科全书”代替了“符码”概念。切萨雷·塞格雷（Segre，1983：144）说，当我们只关注符码化和运用规则建立的层次，我们就会忽略“以索绪尔符号模式为起点无法研究的”表意过程，“相反，[表意]应该置于符号生成模式的中心，放在无限符号活动更为复杂的结果中考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艾柯 1976 年的著作中，从传播和表意符号学向解释符号学的转向与皮尔斯在意大利的出现是分不开的。艾柯对皮尔斯符号学的兴趣很明显地表现于他对以下方面的研究：符号（再现体）、解释项和对象之间的三分关系；符号生成过程；试推法机制、文本阐释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百科全书以及皮尔斯的无限符号活动的概念来解释的符码概念和词典符义学概念。艾柯在《解释的限度》（1990）和《翻译与过度翻译》（1992）中重温了开放问题（《开放的作品》，1962）。在《康德与鸭嘴兽》（1997a，英译本 1999）一书里，他将注意力转向皮尔斯的“动态对象”和“基础”的概念，从而预设了被理解为语言哲学的符号学所无法回避的认识论（艾柯在《康德与鸭嘴兽》中阐发的主题见本书第十章）。然而，当他让自己远离索绪尔符号论和本体结构主义的时候（Eco，1968），能指与所指之间、符码与信息之间的二元关系导致他早在 1976 年（在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皮尔斯符号学与艺术研讨会”上宣读的关于皮尔斯的解释项概念的论文里）提出了下列主张：“我要澄清的是[他]现在的研究方法必须贴上皮尔斯主义的标签。”（引自 Capozzi，1997：xiii，西比奥克的前言）

艾柯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符号学中符码概念所发生的情况；它也显示了皮尔斯如何一直影响着向解释符号学的转向。关于这个主题，303 最有价值的是由波斯纳、罗伯林和西比奥克主编的四卷本《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1997—2004）中的 120 号文章“艾柯的地位”（詹保罗·普罗尼著）（第二卷，第 12 章“当今符号学思潮”，pp. 2311—2320；尤其参见 §4“符码理论”和 §6.2“符码变化与符码转换”）。

根据艾柯（Eco，1976），符码支配从信源到信宿的信息转换；然而，符码本身不能担保表意的发生，因为在下面甲、乙、丙中，没有乙，则甲与丙的联系无法建立：甲，由内部组合限制支配的一套信号；乙，关于世界状态的一系列思想中有可能成为交流内容的一个思想；丙，信宿的一组可能的行为反应。

甲、乙、丙三个系统可以叫作“符码系统”。一个符码系统是“其中每个价值均以位置和差异才得以确立的系统；只有当不同现象共同参照于同一关系系统时才出现的系统”（Eco，1975，英译本：38）。正如普罗尼在收录于《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的文章中所说，艾柯综合了“叶姆斯列夫、结构主义方法与皮尔斯的解释理论”（译自 Posner 等，1997—2004，2：2314）。他继续说：

> 艾柯从皮尔斯那里吸取了解释项理论,但接受解释项理论就意味着接受无限符号活动,这是皮尔斯符号概念的主要特征……处理好这个无限可不容易,但根据艾柯,"无限符号活动……虽然似为悖论,却是建立一个可以完全靠自我的手段检查自我的符号系统的唯一保证"。(译自 Posner 等,1997—2004,2:2314—2315)

此外,为了区分"词典"与"百科全书",为了解释充斥于符义学百科全书的"迷宫"形象,艾柯使用了吉尔·德勒兹和菲力克斯·迦塔利所阐述的"根茎"模式(见 Eco,1984:80ff)。该模式表明,任何符号活动都是无限的解释项网络的一部分。

皮尔斯符号学在意大利的出现成为 1990 年 12 月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的一系列学术演讲的主题(见 Bonfantini 与 Martone,1993)。

7.1.2. 皮尔斯在意大利

上述国际会议"皮尔斯在意大利"("艾柯和我自己都参加的",西比奥克在其为卡波兹撰写的前言中如是说,Capozzi,1997:xiii)于 1990 年 12 月 5—7 日在那不勒斯举行(会议录以会议名称于 1993 年出版),此次会议与 1989 年 9 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诞辰 150 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一起,堪称有关皮尔斯符号学世界的研究的重要事件。 304

此次会议回顾了皮尔斯的成就及其思想在意大利的传播;从这一点看,会议名称"皮尔斯在意大利"与会议的规模和会议议程都不一致。从更广义视角看,"在意大利"这一表述指的是一个地点,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学者来到这里参会,从不同理论和历史视角探讨皮尔斯思想。从根本上说,此次会议在意大利而不是其他地方召开绝非偶然。皮尔斯的思想在意大利已经引起了浓厚兴趣,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继续。我们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但也绝无轻视其他国家学者所作贡献之意),继美国之后,意大利是皮尔斯学术研究中心之一。意大利对皮尔斯研究的这种关注可以追溯至乔瓦尼·瓦伊拉蒂(此人与维多利亚·维尔比也有交往,而维尔比是皮尔斯主要的学术对话者之一)。

瓦伊拉蒂与皮尔斯之间的联系在《皮尔斯在意大利》中也有论及,这无疑是皮尔斯研究在意大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理由。一篇论文(马里奥·夸兰塔著)讨论 1900—1960 年,另一篇论文(阿图罗·马尔托内著)讨论 1960—1990 年;两篇论文分别题为"皮尔斯在意大利(1900—1960)"和"皮尔斯在意大利(1960—1990)"。这两篇文章追溯了自瓦伊拉蒂和马里奥·卡尔德朗尼的实用主义至皮

尔斯研究在意大利的复苏的发展历程(经常被中断,从未连续发展)。瓦伊拉蒂承认皮尔斯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与此同时,他充分意识到威廉·詹姆斯版本的实用主义与皮尔斯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体现于贝奈戴托·克罗齐和乔瓦尼·秦梯利的研究的唯心主义的兴起中断了皮尔斯实用主义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人们对皮尔斯的兴趣通过约翰·杜威被重新点燃,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再次赢得这样一些意大利哲学家们的支持:朱利奥·普雷蒂、马里奥·达尔·普拉、卢多维科·杰莫纳特和尼古拉·阿巴尼亚诺。

阿巴尼亚诺在其《哲学辞典》(Abbagnano,1971)中介绍了"试推法"术语。他追溯其根源至亚里士多德,但认为是皮尔斯将其理论化。尤其具有价值的是宁法·博斯科1959年有关皮尔斯的专著《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博斯科也是论文"从科学到形而上学的皮尔斯"的作者,此文收录于《皮尔斯在意大利》。博斯科还强调区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与皮尔斯的"实效主义"之间区别的重要性。在文章中,她重点论述了皮尔斯的学术理论、他的本体论以及它与逻辑和符号之间的密切联系。在1959年著作中,博斯科认为,可以将皮尔斯的本体论描述为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如果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为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即便如此,皮尔斯研究当前在意大利的复兴从一开始就与马西莫·A. 邦凡蒂尼的研究相关,他坚持皮尔斯本体论的现实主义特征:考虑到对象是符号学的"原动天",皮尔斯的符号学视角不可能与现实主义本体论分离。

罗瑟—兰迪结合瓦伊拉蒂所作的研究,也沿着皮尔斯启发的思路进行探索,按照莫里斯开启的传统继续研究,正如他在1953年有关莫里斯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该书在1975年版中被完全修改和扩展)。

皮尔斯的哲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进入意大利符号学领域。在那之前,如我们前文所述,意大利符号学一直深受索绪尔符号论大旗下的符号理论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皮尔斯在意大利的复兴肇始于艾柯的工作和邦凡蒂尼对皮尔斯的《论文集》所作的翻译。根据邦凡蒂尼(Bonfantini,1987:14—16),我们不能说皮尔斯在意大利或欧洲的影响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事实上,那时的符号研究倾向于关注符号生成问题而不是符号解释问题,而新皮尔斯符号学是解释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真正在欧洲的发展更迟一些,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邦凡蒂尼推动的意大利语版皮尔斯著作(分两卷,分别是1980和1984b)对皮尔斯学术思想在意大利的复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两卷后来被人们期待已久的、同样由邦凡蒂尼编辑的文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著作》(2003)所取代]。该学术著作涉及皮尔斯符号学的核心问题——试推法、假想推理和发明创造。此外,新皮尔斯符号学的兴起发生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刻,即,当

人们将关注焦点放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人类抽象的超级自我身上的时候。处于关注中心的是需求、欲望、人的自由；客观性和本性，用来解释而不是抨击并暴怒地转换成自己的东西；生态主义、和平主义和社群精神及欢乐。（Bonfantini，1987：15）

毫无疑问，这是对皮尔斯符号学复兴的有效语境化，尤其是在我们考察皮尔斯研究中那些不太明显但仍然是根本性的方面的时候。例如，让我们看看他对主体、人、异他性与对话之间的关系、认知符号学与价值和欲望的范围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处理。为了更充分地理解那不勒斯会议的影响和三年后出版的会议录，我们本章将重点讨论这些方面（其中还验证了邦凡蒂尼考虑的因素）。这个关注焦点应该有助于解释皮尔斯对于今天皮尔斯以外的研究的重要性（见本书第一章）。的确，解释符号学为批评性地解释当今全球化交流与生产的世界提供了足够的工具（见本书 11.1 和第十二章），因而也为批判生产力意识形态（它作为当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现在正为整个人类社会确定方向）提供了足够的工具。邦凡蒂尼说，目前，“意义的生成不再被新皮尔斯符号学家理解为意义的产生，而是理解为意义的构成和推断，理解为意义的解释、选择和深思熟虑”（Bonfantini，1987：15）。 306

《皮尔斯在意大利》有四个部分：（一）“关于皮尔斯的介绍”；（二）“皮尔斯在意大利：历史（故事）与解释”；（三）“符号活动逻辑与实用主义”；（四）“皮尔斯以外的皮尔斯：试推与概览”。 编者在序言中解释说，目录这样安排是为了突显以下阅读轨迹：皮尔斯在意大利的成功；欧洲和意大利走近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的方法；对其重要性的反思（p.3）。

第一部分包括热拉尔·德勒达尔、克里斯蒂安·J. W. 克洛舍尔、达里奥·安提塞利、杰西·佩尔茨和西比奥克的论文。第二部分，如其小标题所示，讨论皮尔斯研究在意大利的情况，该部分从两个意义上对此进行讨论：从历史上重构皮尔斯在意大利的影响，分析当今深受皮尔斯研究影响的潮流。该小标题也可以从克洛舍尔的论文所表示的意义上去理解；克洛舍尔的文章写的是皮尔斯在意大利的旅行（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锡拉库萨和埃特纳火山）。该书第二部分除了克洛舍尔的文章以外，还包括卡尔罗·西尼和翁贝托·艾柯的理论性论文以及夸兰塔、马尔托内和博斯科（上文提及过）所写的三篇史学论文。克洛舍尔还有一篇论文收录于第一部分：“观点，偏离还是盗用：关于皮尔斯的著述”；在这篇文章里，他从语文学视角批判了八卷本皮尔斯著作文集，理由是：皮尔斯早期的著作的收集很杂乱，全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 307

第三部分“符号活动逻辑与实用主义”包括卡尔—奥托·阿佩尔、詹保罗·普罗尼、毛里齐奥·费里亚尼、科拉多·曼焦内、萨尔瓦托雷·维卡和安东尼奥·圣图奇所撰写的论文。该部分最后的“皮尔斯、实用主义与意大利哲学”又回到皮尔斯对意大利哲学的影响的问题；因此，如果将此文放在第二部分会更好些，第二部分讨论的是同一问题；即便如此，将此文放在第三部分也有其理由，因为它的研究中心是与实用主义相关的逻辑问题。第三部分收录了一些有关逻辑、认识论与符号学理论之间关系的有趣论文。在“先验符号学与真理”一文中，阿佩尔提出在目前有关真理理论的争论中对真理的先验条件进行符号学分析。在“三个推断的逻辑”一文中，普罗尼（曾与邦凡蒂尼合著论文讨论试推法类型学）提出推理过程的分离。在普罗尼看来，皮尔斯的推论理论特别重要，因为它遵循两个重要的统一过程：（一）它将数学逻辑与科学逻辑统一起来；（二）它将科学—数学知识与常识统一起来。通过数学、科学和日常知识而进行的推断没有原则性的区别。普罗尼坚持认为（Proni，1990：224）这种统一遵循了古代哲学理想化的普遍逻辑，但我们认为，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趋向：根据相似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同源性）而不是对立来解释差异性和特殊性。费里亚尼在文中描述了皮尔斯在符号学、图表和推理过程之间建立的关系；曼焦内信息翔实的论文集中讨论了皮尔斯和逻辑史。皮尔斯完成了一项有趣的工程：在理论交错的开放逻辑中将认识论与伦理学统一起来。这体现于1923年的皮尔斯论文集《机会、爱与逻辑》（该论文集是在尼古拉·阿巴尼亚诺的倡议下，由M. R. 科恩主编，以意大利语出版）。在一篇相同标题的论文中，维卡分析了皮尔斯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在第四部分，罗赛拉·法布瑞奇西·列奥同样对此关系进行了考察。

第四部分重点讨论逻辑、符号学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特别讨论了试推法推理。因此，它与第三部分有紧密联系；事实上，第三部分可以视作第四部分的起点。第四部分的论文考察了各种体现试推法的实践和领域。邦凡蒂尼和莫罗·费拉雷西分别在他们的论文“工程发明符号活动”和“从皮尔斯开始：为了发明符号学”中分析了创造性实践；伊凡·扎蒂尼在阐释作为符号活动的行为时分析了行动的意义。其他讨论的内容包括试推法在史学中的作用（帕特里齐亚·菲奥里著“史学中的试推法与归因”）、在科学与计算机逻辑中的作用（洛伦佐·马尼亚尼和马可·拉莫尼著“计算机试推法”）、在音乐中的作用（卢卡·马尔科尼著“音乐中的试推法与符号活动”）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关于最后一点，蓬齐奥依据皮尔斯和莫里斯的范畴再一次系统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在逻辑符号学领域，第四部分还包括两大“对抗”：皮尔斯实用主义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之间（由法布瑞奇西·列奥讨论）、皮尔斯符号学与恩斯特·卡西尔哲学之间（由朱利奥·拉约讨论）。

308

在结束有关皮尔斯在意大利的重要性的讨论时，我们要提醒读者关注西比奥克的出版物及其意大利语译本。西比奥克是继莫里斯之后最重要的皮尔斯符号学促进者之一；此外，他拓宽并重新划清了皮尔斯符号学的边界。除了这一切以外，西比奥克还做了大量工作，重构了皮尔斯以前和以后的符号学历史，其中特别强调了符号学在美国的发展（参见 Sebeok，1991c 以及 1992 年在乌尔比诺符号学与语言学国际中心举行的相关研讨会——这是皮尔斯思想在意大利的另一个重要的传播中心——这次研讨会会议录作为《符号学刊》特刊出版；参见 Deely 与 Petrilli，1993）。

在“无限的符号活动与漂移”一文中，艾柯沿着皮尔斯的脚步，继续研究“解释的限度”这一概念；此处，他区分了“解释”与“密封的漂移”之间的区别（根据德里达，后者逐渐变成解构主义）。“无限符号活动”与解构之间的区分是艾柯的《解释的限度》一书的核心内容；在某些方面，这一区分对应于实效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区分。艾柯特别提到文本解释问题，让我们关注实用解构主义方法与基于无限符号活动概念的方法之间的冲突。面对文本多元解释的潜能，艾柯运用无限符号活动的概念，基于解释者社团作出的共识性判断——这可能是暂时的——从理论上阐明解释可能性的限度。

309

7.1.3. 努力解决传播与表意间的对立这一难题

艾柯通过《符号学理论》（1975）一书，对索绪尔“符号论”与皮尔斯“符号学”之间的对抗作出了巨大贡献。事实上，该书在促进解码符号学向解释符号学转向这一工程中是一部关键著作，因而值得我们详细分析。该书在讨论“传播符号学”与“表意符号学”、“指称语义学”与“非指称语义学”时，揭示了在克服解码符号学过程中内在的困难。

艾柯公开反对将符号学简化为一种传播理论的倾向，这种理论将符号视作为了交流目的而故意生产出来的东西（参见 Buyssens，1967；Mounin，1970；Prieto，1966；Segre，1969）。他就这一问题指出，即使解释源自社会规约、自然事件或无意向性行为，表意（因而还有符号或表意功能）也是可能的。符号是基于社会规约的任何事物，是具有符号功能的可能的解释者；换言之，符号是可以取代其他某事物的任何事物。

因此，在没有意向性交流的情况下，表意也是可能的。例如，对于医学上的症状来说，在没有暗含交流意愿的情况下，照样存在明显的表意关系（参见 Eco，1975，英译本：18）。

假如我们接受符号是源自自然事件的思想，我们就必须澄清推理与符号行为之间的关系。艾柯声明说，虽然某些推理是符号行为，但并非所有推理都是符号

行为。它们只有基于社会规约，基于符码——只有当一个被感知的事件及其原因或可能的结果，和基于社会规约的符码相关联——才能成为符号行为。

根据艾柯，由于一个符号功能的条件包括一个可能的解释者的可能的解释和一个社会符码的存在，因此，无意向性的行为虽然没有试图交流，却也可能成为符号行为，从而具有意义。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符号，条件是存在一个规约允许它代表其他某物。这就需要打破原来将符号与“事物”、自然符号与人造符号盲目隔离开的符号学界限，进一步扩展符号学的范围。然而，与此同时，这就导致下述结论：刺激不应该被视作符号，因为对于这类现象来说，行为反应不是由规约决定的（同上：19）。 310

就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在《符号学理论》中，艾柯在多种不同意义上使用了“传播”这一术语：他与传播符号论的支持者们（布依森、普列托、穆南）从一样的意义上使用该术语，但也赋予了它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意义。例如，在我们已经讨论的《符号学理论》的章节中，“传播”被理解为旨在基于共同的符码向某人传播某事的意向性人类行为。在上文所提的那一部分之前的 0.3 节“传播和 / 或表意”以及后面一节“表意和传播”中，艾柯将传播定义为一个信号（未必是符号，因而也许没有表意）通过传递者从信源沿着信道到达收件者或信宿的“旅程”。可能会出现没有表意、没有符号系统、没有表意交流的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传递的仅仅是刺激或信号。此处，“传播”表示没有符号的过程（无论它们是根据社会规约而具有意向性和可解释性，还是无意向性）——它们仅仅是刺激、信号［为了避免歧义，我们应该记住，所谓“信号”，普列托（Prieto，1966，1975）和塞格雷（Segre，1974）均理解为意向性标志］；因此，“传播”这一术语表示这样的过程：一个信号发出之后不要求信号接收者依据表意系统、符码给出解释性回复。这样一来，对此处“传播”的理解与艾柯用以表示信息发出者打算通过共同符码向信息接收者表达某种意义的过程是不同的。

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意义的传播，我们会使用术语“传播 1”和“传播 2”。“传播 1”是从传播符号论的支持者们主张的意义上去理解的。“传播 2”是从信息论的意义上理解的，是一种信息过程（很可能是两个机械装置之间的物理信息），它传递的不是符号，而是可计算的、独立于其意义（信号）的信息单位。“传播”的这两种意义的区别出现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考察“传播 2”时，认为它独立于表意过程和表意系统而发生——没有由符码建立的符号功能。事实上这正是艾柯对待传播的方式。此处，传播的发生既没有信息发出者，也没有信息接收者。相反，“传播 1”表示表意、符号功能和符号系统过程。

当艾柯在《符号学理论》中赋予术语“传播”多种不同意义时，这难免影响到“表意”的意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传播与表意之间的关系。在《符号学理论》 311

中，当传播被理解为“传播 1”时，表意被认为独立于传播。表意在没有传播过程的情况下成为可能。艾柯谈论征兆和无意向性符号时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相反，当传播理解为“传播 2”时，表意成为某些传播过程（以某种方式表示传播过程的过程）的特征。此处，表意是一个特别的传播过程，其中，接收者是人，过程的完成要依靠符码，该符码确立在场与不在场实体之间、指代物与其关联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对每一个可能的接收者都有效的对应关系。根据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传播 1”还是“传播 2”，艾柯讨论中的“传播”与“表意”之间是相互关联还是彼此独立的关系也就发生变化和倒转：

传播 1：
没有表意的传播：不可能；
没有传播的表意：可能。
传播 2：
没有表意的传播：可能；
没有传播的表意：不可能。

例如，艾柯的《符号学理论》第 16、17 页的“传播”和“传播的”是从“传播 1”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其他地方的“传播”的使用则指“传播 2”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中术语“传播”的语义矛盾带来了一些困难。于是，对于给定的过程来说，传播的特征有时被肯定，有时被否认。事实上，就传递信息单位的机械过程而言，艾柯指的是没有传播功能的信号的传递；他说，接收装置跟符码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收到任何传播，不理解任何符号。然而，他描述这样的机械模式还有一个目的：描绘一种非常简单的交流环境。

这就导致艾柯的《符号学理论》中“传播”的第三个意义——在人类交流中它在意义上就等同于“表意”。有时，艾柯对这两个术语会互换使用。“传播 3”的意义就是从“传播 1”向“表意”的转移。

312

无论如何理解“传播”，艾柯在传播符号学和表意符号学之间建立的关系与其说是考察传播与表意之间关系的结果，不如说是考察传播过程与表意系统之间关系的结果。事实上，艾柯是通过将“传播”与“过程”概念相联系，将“表意”与“系统”概念相联系，从而确定传播符号学与表意符号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鉴于人类所有传播过程都以表意系统为前提，所以，传播符号学依赖于表意符号学。实际上，在艾柯那里，传播与表意（如我们所知，如果是有意向性的人类交流问题，这两个概念就彼此一致了）之间的关系是过程与系统之间的关系；“表意符号学”是“表意系统符号学”的缩写，而“传播符号学”是“传播过程符号学”的缩写。

简言之，艾柯的观点是，人类传播（交流）过程的研究必须基于符号系统的研究。从当前符号学研究水平来看，这个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已经被“表意符号学”和“传播符号学”的支持者们所接受了。这种显而易见（源自艾柯的术语）并不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两种符号学”之争中长期存在的窘境——尽管奥马尔·卡拉布雷斯和埃吉迪奥·穆奇（Calabrese 与 Mucci，1975：20）在解释艾柯时有他们的主张。艾柯在“表意符号学”与“传播符号学”（前者被视为表意系统的理论，后者被视为传播过程的研究）之间建立的关系是艾柯理论的本质内容，它与从历史角度看“两种符号学”之间的差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传播符号论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传播过程，而且尤其阐述了所有符号系统；它认为前者只有建立于后者基础之上才能成为可能。因此，当艾柯将符码的研究归于“表意符号学”时，当他将过程的研究留给“传播符号学”时，他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表意符号论”和“传播符号论”被视为历史参照，那这个方法就没有了基础。

卡拉布雷斯和穆奇（Calabrese 与 Mucci，1975：29）宣称（如同艾柯本人明确宣称的那样），在《符号学理论》中，“两种符号学”之间的对立简单说就是规则与过程的差异；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表现出牢牢掌握了艾柯的论述。然而，在事实和历史层面上，这个对立不能简化为这样的差异；因此，应该补充一下，艾柯建立的关系不可以被用作那个从历史意义上理解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歧义或许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艾柯讨论社会传播过程与表意系统之间关系的时候，就好像描述传播与表意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得出有关表意符号论与传播符号论之间关系的结论，并对此提出建议。此处，艾柯观点的合理程度仅仅限于他对“过程”与“系统”之间关系的讨论。

313

传播的定义揭示了艾柯理论的某些矛盾；表意的定义也是如此。这使得我们从有限的关于表意的认识［将表意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交际，参见 Eco，1975，英译本：8）］过渡到对其更为宽泛的认识［包括任何智能装置进行的传播，无论是机械的还是生理的（参见同上：9）］。

至少可以这样说，很奇怪的是，艾柯居然首先引入“表意过程”概念——被理解为传播过程的表意过程，其中，信息接收者是人，信号需要解释性反应——然后他又问这个概念是否可以应用于非人类、非文化的传播行为。此外，在说明如果作否定回答会很冒险之后，艾柯回过头来将表意领域限制在严格意义上的人的世界，重申了他一开始关于表意的观点。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艾柯从理论上阐述了不是传播的表意（传播 1）和不是表意的传播（传播 2）。这里的问题是，传播的还原视图一旦被放弃（这是艾柯与表意符号论和传播符号论共同的偏好；参见 Ponzio，1976：18—34），传播与表意之间的区别（以及传播符号学与表意符号学之间的区别）是否应该搁置不予考

虑。不过我们在此只是提及一下该问题。

7.1.4. 意义与指称物：努力解决符号学中指称论与非指称论间的对立这一难题

关于意义与指称物之间关系的问题，艾柯的观点接近于斯蒂芬·乌尔曼（Ullmann，1962）和罗曼·雅各布森（Jakobson，1963）的观点。在《不存在的结构》（Eco，1968：33）中，艾柯声明：从“符号论”视角看，指称物问题不具相关性——他在1971年和1973年著作中重复了这一思想。另一方面，他在《符号学理论》中说，符号学主题首先是内容，而不是指称物（Eco，1975，英译本：62）。此外，当他重申指称物在涉及表意条件时不具相关性，只有在涉及真值条件时才重要的时候，他将表意条件与真值条件之间的阈限（以及关涉前者的符码理论与关涉后者的真值理论之间的阈限）视作一种内部的阈限，视作符号学内部的“政治—实证”界限，而不是一种“自然的”界限。他以上所指的是一个暂时的界限，而不是一个进入非符号学领域的界限。 314

关于意义与指称物之间关系的问题，艾柯本人发出了他从《不存在的结构》和《内容的形式》到《符号学理论》的思想演变的信号。这种演变体现于从“反指称”符号学向“非指称”符号学，再向“非直接指称”符号学的过渡。

在这“演变”的所有阶段中一直保持不变的是：在涉及表意条件时，指称物不具相关性。在艾柯的研究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表意理论里应该取消对指称物的依赖；该思想源自一个尽管广为传播却是错误的“指称物”概念。支持非指称符义学的论辩只能基于针对指称物的具体化的、还原的方法。

艾柯有理由抵制指称物的思想；然而，当他的论点被用作下述结论的基础时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符义学必须处理符号与符号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能指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同时不放弃生成无限符号活动的符号互相指称链。

艾柯只有通过运用有关指称物的错误思想方能支持他的论点：指称物在符号活动的研究中不具相关性。其中有些思想源自符号学—哲学传统，其他则源自艾柯本人对那些视指称物为符号活动基本要素的作者的错误解释。

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及奥格登和理查兹以及亚当·沙夫（Schaff，1960、1974、1975；参见 Ponzio，1993a）和 L. O. 瑞斯尼科夫（Rjeznikov，1964）等学者系统阐述的指称理论。在艾柯1968年著作中，表面看，这些学者互相关联，而且与布卢姆菲尔德也有关联（布卢姆菲尔德基于机械论的前提，将意义与指称物等同起来；而沙夫特别强调对语言和一般符号系统中的物质现实的反应作历史辩证的解释）。在艾柯看来，瑞斯尼科夫与沙夫之间似乎没有区别，他视他们为唯物主义学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艾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说‘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立场是由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决定的”（Eco，1968： 315

33n18)。

这里我们不再赘述这些评论和解释,因为在其他著作中已有讨论(有关沙夫,见 Ponzio,1989;1993a:4.4)。无论艾柯关于这些以及其他学者的观点是什么(尤其是奥格登与理查兹,他使用了他们的“指称物”概念),事实依然是,关于指称物,艾柯没有能够找到办法替代基于幼稚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他提供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消除指称物,或者精确地说是,视指称物为符号实体,但有一个前提:指称物等同于符号本身的意义,或等同于另一个充当相关符号解释项的能指的意义。在《符号学理论》中,艾柯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赋予指称物以符号实体的特征,这是他指称理论的一部分。

艾柯本人在支持非指称符义学的论辩中就使用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指称物思想。这一论点只有基于幼稚的机械唯物主义指称物观点才经得起推敲。

在努力将符号学从“指称物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时,艾柯最终将他的论点建立于意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他开始的意愿是将符号学从危险的意义与指称物等同观中解放出来,但最后他本人把意义与指称物等同了起来。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他将意义等同于指称物,而是因为他运用皮尔斯的“解释项”和“无限符号活动”概念,将指称物等同于意义。

我们赞同艾柯对幼稚唯物主义的指称物和符号思想(尤其是像似符问题)的拒斥;此外,有人提出回归有关“指称物”、“符号”、“像似符”等概念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此批判艾柯符号学理论,我们对此也表示反对。然而,在有关指称物概念的评论中,艾柯陷入某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所犯的同样错误——这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的一个错误:在物理学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他们将关于物质的错误概念所带来的危机误以为是物质本身的消失。同样,根据有关指称物的错误解释,艾柯得出结论:指称物本身必须从符号环境中消除,因而必须从表意理论中消除。

316

艾柯关于指称物的推理基于两个前提条件(Eco,1975,英译本:66—67)。

> 第一,指称物一般来说要么是一单个具体实体,要么是一抽象实体。

这一前提是虚假的,因为不可能笼统地概述什么可以充当指称物。指称物可以是一单个具体实体(不是符号之外的实体、一个“自在之物”,而是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它因此成为符号活动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文化实体),也可以是一抽象实体,这取决于符号环境(或符号活动)。一个指称物可能是一具体对象,也可能是一想象对象;它可能是一被认为具体但后来证明是想象的对象,或者相反;它可能是存在于某一语境中的某物,也可能不存在于该语境,等等。

第二，假如指称物是一个抽象实体、一个文化实体，那么它就是意义。此外，我们必须将术语“外延”从所有指称假说中解放出来；该术语所表示的是意义。

这个前提也不够精确。它导致了艾柯本人所说的危险的意义与指称物等同观。这种等同观不仅源自将意义等同于指称物——这是艾柯所正确地反对的——而且源自将指称物等同于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指称物就是意义的符号。符号的指称物就是意义并不表示它是同一符号的意义。如果它是什么的话，它是另一符号的意义——是在符号活动中担任指称物角色的意义。但对于第一个符号来说，其意义是一回事，其指称物则是另一回事。无论怎么说，一个符号的指称物是另一符号的意义这样的情形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当语言被用作语言本身的元语言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这不是一般情况。在其他情况下，指称物不是符号，而是某一事物、一个语境、一个事件、一个想象的物体，等等。甚至当使用一个符号就能发挥其他符号（不仅包括第一个符号的符码，也包括其他符码）的作用时情况也是如此。指称物永远是文化实体（这并不表示指称物不可以是物质，除非你持有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物质观）。

317

当我说，“现在，把那门关上！”我指的是某一行动，某一现存的、有待改变的事物状态，某一临时时刻，等等。这些指称物中的每一个都会具有优先于其他指称物的地位（**现在**，把那门关上；现在，把那门**关上**；现在，把**那**门关上；现在，把那**门**关上）。例如，只有当有人问我，“你说‘门’的时候是啥意思？”我才会认为符号的意义是一个指称物。

简言之，充当意义是一个功能，充当指称物则是另一功能，正如充当解释项是不同于充当解释者的功能一样。这些功能中没有一个可以简化为任何其他功能，哪怕是在一个意义可以成为指称物或解释项等的符号环境中，或在一个指称物可以成为解释者或解释项等的符号环境中。

艾柯的推理基于一些无法接受的前提，可以粗略概括如下：指称物要么可视为一单个具体实体，要么是一抽象实体——在这一情况下，指称物等同于意义，结果符号所表示的就是意义。这就导致两种不同功能的混乱，这两者（连同其他的功能）同时存在于符号活动中：一是能指表达的功能（意义），二是符号指称的功能（指称物）。用更为简单但不够准确的话说，符号的两种不同功能被简单化地等同了起来：表达和指称。

表意理论必须考虑作为符号活动基本要素的指称物的功能。没有了指称物，

就没有意义，也就没有“符号”。符号不能指称自己的意义；相反，它通过指称不同于它本身的某物来表达它的意义，这与那个某物在场与否，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等等都没有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确断言：相对于物质对象是否在场来说，相对于某一事物状态是否存在（当符号指称的是对象或事物状态时）来说，符号是自治的，但相对于指称物来说，符号不是自治的。知道“water”与H_2O意义相同，知道H_2O与“acqua”意义相同，却不知道这些说法指称什么，这不足以让它们发挥符号的功能。无论一个符号指称什么，它所指称之物都可以充当其他某物的符号，或那个符号的解释项，这一事实仅仅意味着，符号活动的不同角色（的台词）每次遇到不同符号环境都可以由相同的演员诵读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一个符号指称什么都是另一能指的意义（即使它在另一符号环境里可以这样）。当我说“这儿是一支铅笔”时，那个物体铅笔（或者甚至是另一个物体，假如我搞错了，或者我在撒谎）就是“铅笔”的指称物；在这一特定的符号环境中，该指称物不充当符号或解释项。然而，在另一环境中，它也许就成了符号或解释项，例如，当我出示物体铅笔（或另一物体，假如我搞错了或在撒谎）时，我说“这就是‘铅笔’这个词的意思”。因此，指称物不是其他符号的意义，即便有可能成为意义。在某一符号环境中，不同的角色是分配好的，彼此间不可互换：充当符号的角色不可同时充当指称物，充当指称物的角色不可同时充当意义或解释项。角色的交换当然是可能的，但交换角色之后符号环境就不同了。

318

毫无疑问，“无限符号活动”（艾柯使用的是“unlimited semiosis”这一表述）表明，符号不是以某一具体的意义而存在，因为对象可以成为另一对象的符号，或充当同一意义的解释项，或充当能指的指称物。但这并不否认这样的事实：每当一个符号充当一个符号的时候，它指称的内容不是充当符号，而是充当该符号的指称物——它可以是一件事物、一个环境、一个事件、一个想象的物体、一个具体的物体或者甚至是另一个符号。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它跟工具成为生产资料，如借助于另一把锤子修理锤子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充当生产资料的不可能同时又是工具，尽管在另外某个场合它可以用作工具。

正如将劳动描述为只有工具但没有生产资料的环境是错误的，同样，将符号活动描述为只有意义和能指但没有指称物的过程也是错误的。指称物可以反过来成为符号，而作为对现实进行解释和组织的前一次符号活动的结果，它充当的是指称物，但这些都不重要，即便在某一环境中使用的材料是先前符号活动的产品。

因此，符号未必指称其他符号。“不间断的”、绵延的符号链［如艾柯（Eco，1973：110—111）依据无限符号活动和解释项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他在贝克

莱唯心论和休谟不可知论中确定该理论的根源绝非巧合]实际上不停地被不充当符号的指称物(尽管在其他场合它是符号或会成为符号)打断。 319

7.1.5. 符号生产与意识形态

在《符号学理论》中，艾柯参照罗瑟—兰迪[Rossi-Landi，1975a、1992b（1968)、1994（1972)]的研究探讨“符号生产”问题。在第一部分“表意与传播”之后，全书其余内容分为两部分：“符码理论”和“符号生产理论”。然而，不论艾柯使用了什么术语——他(1975)谈到“符号劳动”和“符号生产模式”——他指的是在他的符号学理论框架下的符号社会生产问题。

在《符号学理论》的前言中，艾柯在以下的区分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尽管并不完美)：一方面是(他本人提出的)符码理论与符号生产理论之间的区分，另一方面是语言与言语之间或语言知识与言语行为之间的区分。他从个人劳动的角度思考符号生产：这完全是使用特定符码的符号而进行的个人运作——实施信息传播表意系统所预见的可能性。

如艾柯所言，关注社会符号生产的符号生产理论的起点并非一个或一系列符号被生产出来时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下的“生产”意味着“使用”)。相反，符号生产理论必须研究符号生产的社会结构，因为通过这些符号生产的社会结构，特定的价值、符码、信息发布和解释的规则、惯例和个人符号行为才能发挥作用。换言之，一个符号生产理论必须研究规则的生产，这些规则支配信息编码和解码，因而也支配构成某一社会制度中信息传播基础的动机、兴趣、项目、社会规划和物质条件(有关所有这些方面的内容，见 Ponzio，1972、1986、1988、1989、1992b、1993a：4.2；另见本书第六章)。从这一视角看，罗瑟—兰迪的“符号劳动”概念很重要，它不同于一些表面上相似的方法。

符号劳动绝不能理解为主体内在固有的活动，或必然发生于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真实心灵中的“有目的的行为”或“精神上的运作”(这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残余)。符号劳动的研究绝不能根据对预先存在的行为或运作的意识来考察。最后，该研究的结果绝不能被赋予对完成那些行动或运作而不自知的人的启蒙任务。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与新唯心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新唯心主义——完全不同)，符号劳动一方面是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是模型理论。社会实践是超越 320 个人的、社群性的、将原始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它创造了人类，并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创造了历史。在这一语境下，模型理论指的是理解和解释实践本身的模型的理论构建[参见 Rossi-Landi，1994（1972)：38]。

艾柯的符号生产理论具有歧义，因为它事实上是介入信息的解释与发布的个别操作(选择、发明、指称、质疑、命令等等)的理论。因此，艾柯的术语“符号生产

模式类型学”（对应于他的《符号学理论》中的一章）并非指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与结构。这里的“生产模式”不是从马克思意义上去理解的；它仅仅关注的是个人行为。这并不是否认个人行为的研究在符号学中的重要性。然而，事物必须有恰当的名称，必须按照其实际情况去认识：当我们实际讨论的是“言语行为理论或符号的使用”时，我们就必须这样说。将这种理论当作符号生产理论将会产生误解，从而产生使研究神秘化的威胁。

艾柯有关意识形态这样一个符号学范畴的分析一定是受害于他的符号生产理论的缺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分析研究在这一符号学理论领域处于边缘地位。（有关艾柯的意识形态思想更详细的分析，见 Ponzio，1993a：4.3）

艾柯没有能给意识形态下一个定义。“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Eco，1975，英译本：360）不是意识形态的定义（参见 Schaff，1967、1968）。意识形态定义问题必须区别于客观真理价值观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两个不同（尽管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可混淆。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一回事；对其所作的认知问题的评价则是另一回事。因此，虽然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这一观点被赋予了定义的价值，但事实上它不是定义——相反，它是对意识形态价值问题的回答。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该答案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某一历史时期（即：当资产阶级从一个革命的阶级转变成一个总是保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定秩序的保守阶级的时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321

此外，以符号学术语描述意识形态的例子和模式表明，艾柯研究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沙夫所说的“思维定势”。这指的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意见，它们不受控制，它们源自习惯、根深蒂固的期望、评价和情感趋向，以及被绝对化的观点。这种思维定势构成了单词和句子意义不可分割的部分，属于符用学维度。艾柯讨论的“意识形态内涵”事实上是单词和词组中模式化的方面，准确地说，他陈述的思维定势建立于交织在一起的符码通讯系统和无可争辩的超级符码的基础之上。因此，思维定势不可与意识形态混淆，尽管思维定势一般来说是意识形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沙夫，虽然意识形态无法离开思维定势而存在，但思维定势不是意识形态的直接成分。意识形态与思维定势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它们互相影响，但又互不相同。思维定势塑造意识形态；同样，意识形态影响社会思维定势（参见 Schaff，1975：84—85）。

艾柯的意识形态符号学概念的另一个局限是，他认为可以避免功能—基因法，可以仅仅研究意识形态的结构，而不研究驱动意识形态的成因和机制（见 Eco，1975，英译本：290）。正如沙夫所表明的那样，除非我们将意识形态的成因和功能纳入考虑，否则给意识形态下定义和对其进行描述都不可能。

意识形态学说必须从作为全球性社会（言语和非言语）交流研究的、同样关

注符号社会生产结构的符号学理论中获得支持。

7.1.6. 拓展符号学的边界

如果语言哲学可以描述为元符号学，那么，有三个论点表明，由于语言哲学的影响，符号学的边界已经被超越。在识别其边界时，我们将以艾柯的《符号学理论》为参照。

第一个论点关涉指称物问题。在《不存在的结构》（1968）中，艾柯根据雅各布森和乌尔曼的观点提出："指称物问题从符号论视角看不具相关性。"在《符号学理论》中，他声称："符号学对象首先是内容，而不是指称物。"艾柯有关意义与指称物之间关系的这一立场的变化体现于他从《不存在的结构》和《内容的形式》到《符号学理论》的思想演变，用艾柯自己的话说，这一立场的变化可以描述为从"反指称"符号学向"非指称"符号学，再向"非直接指称"符号学的过渡。指称物被排除在表意条件的研究之外——被排除在"符码理论"之外——并被归于真值理论的范围，这是错误地将指称物看作外在于符号活动、看作非文化实体，错误地将指称物等同于意义的结果。事实上，指称物是符号活动的一部分，不应该等同于该指称物的符号的意义；这也表现于皮尔斯对符号三分的分析中：再现体—解释项—对象。同时，将"有指称物"等同于"是真的"，就意味着没有考虑莫里斯提出的对下述两方面的区分（见第四章）：一是符号（永远）指代某物（其意指），二是符号（不是永远）指称某种存在（这是从符号赋予它的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存在）的事物（其意指对象）。这一区分已经出现于西班牙的彼得的《讲道集》或《逻辑学概要》之中：指代（代表某物）有别于称呼（代表某种存在的事物），两者都有别于意味（有意义）。就艾柯来说，他（1984）通过使用术语回用（修改自雅各布森）恢复了指称物与符号活动理论的相关性。他作了符号永远拥有指称物（意指）与不一定永远拥有"指称物"（意指对象）的区分，还作了指称物与意义的区分。对于将指称物排除在符号活动之外这一错误，有一个纠正的方法是将指称物视作"隐性解释项"。由于我们要指称的不是"硬碰硬的、铁的事实"或"活生生的具体事物"，而是充当被解释符号的事实、事物，它们也可能成为解释项符号，因此，可以认为指称物属于一个隐性解释路径。

另一个将符号研究转移至符号学既定界限之外的论点关涉艾柯（Eco，1975）所谓的"符号学的下限"。这一术语涵盖非人类和非文化群体的行为。多亏了西比奥克，我们现在知道，符号研究不可以仅仅局限于"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科学"，还必须考虑动物符号的传播——甚至更宽泛地说，生物符号的传播。然而，还不仅如此，西比奥克坚持认为，动物符号行为和生物基础处于传播与表意研究的最核心地位。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一文中，艾柯说：

322

323

> 假如我们将所有要么标题中含有符号学这个关键词、要么刊发于标题中含有这个关键词的期刊的研究文章，都作为符号学研究的例子，我们发现，该研究已经扩展至自然界（从动物符号学到植物符号学的发展），免疫学家对细胞符号活动的兴趣，以及大脑科学、人工智能与符号学的交织。二十年前，在《符号学理论》中，我将符号学所有这些方面都置于我称之为"符号学下限"的禁忌阈限之外。不过，这首先是一种谨慎行为：人们可以从职业角度决定不讨论一系列问题，但这并没有宣称这些问题不存在。（收录于 Capozzi，1997：5）

第三个论点关涉符号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语言的反思也突破了符号学作为一门关注语言哲学的科学的界限——艾柯的"符号学极限"（1975）这一说法所体现的发展。现在有必要超越这一阈限，并且反思"符号与主体"（Eco，1984）之间的关系，因为（艾柯承认）这些术语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从平等和身份角度考察的符号与僵化的主体概念相关；而置于开放的符号活动之中的符号与易于不断建构和解构的主体相关（参见 Sebeok 等，2001）。从皮尔斯视角看，主体是一个开放式的符号与解释项链。

7.2. 解释与应答性理解

7.2.1. 论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符号模型

艾柯对皮尔斯符号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对符号（再现体）—解释项—对象的三分关系的研究，对诸如试推法、符号生产、文本（及其与读者的关系）的解释、符码与词典符义学（他根据百科全书和皮尔斯的"无限符号活动"概念重新阐述的思想）等问题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艾柯让自己渐渐远离索绪尔符号论，远离本体结构主义（参见《不存在的结构》，1968），远离能指与所指、符码与信息之间的二元关系。早在 1975 年，他就全力研究皮尔斯的解释项概念。

324

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1984）中，艾柯重点关注理论问题，回顾和重构了符号学思想。他考察了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中的五个基本概念：符号、意义、隐喻、象征和符码。在该书的引言中，他宣告了自己的意图是根据符号模式发展的不同阶段描述 20 世纪符号学的发展：

> 首先必须注意，当代符号学似乎受到选择痛苦的困扰。基本概念究竟是符号还是符号活动？……审视一下本世纪符号学思想诞生的历史，比如说从

> 日内瓦结构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发现符号学起初似乎是有关符号的思考；但后来，这个概念渐渐陷入危机并被消解，兴趣转移到文本的生成、文本的解释、阐释的游移、可生产的冲动，以及符号活动的乐趣本身上。（1984：xiv—xv）

艾柯呼吁人们，有必要克服符号与符号活动之间的选择，有必要“重新发现，原来的符号概念不是建立在平等、符码确立的固定关系、表达与内容之间的对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推理、解释、动态的符号活动的基础之上”（同上：xv）。

我们认为必须通过解释符号学阐释那些艾柯的研究方法没有探讨（至少是没有直接探讨）的概念，包括符号的对话性及其基本的他性或异他性。正如皮尔斯的阐述所清楚体现的那样，解释符号学需要这种类型的发展。

事实上，皮尔斯符号学是在对话语境中确定的方向，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对话结构和实践（见第一章）。他的思维—符号理论指出了自我的对话性结构，这可以想象为充当符号的思维与充当解释项的另一符号之间的对话。皮尔斯的符号模式在今天的符号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都被广为接受，并逐渐替代索绪尔的模式；后者随着结构主义的传播，曾经不仅对语言学（和符号论），而且对其他人文学科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325

索绪尔的符号模式根植于一系列二元对立：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语言的组合轴与聚合轴（Saussure，1916）。这使得索绪尔符号模式与传播和重构的数学理论（参见Shannon与Weaver，1949），以及符码与信息、传递者与接收者等术语发生了联系。这解释了为什么索绪尔符号学被描述为解码符号学、符码与信息符号学或等价交换符号学［参见Bonfantini，1984；Ponzio，1992b；Rossi-Landi，1992（1968）］。尽管这些概念对表意和解释过程有过于简化的趋向，但人们认为它们恰当地描述了各种符号活动——不仅包括与信息传播相关的简单的信号型符号活动，而且包括复杂的、关涉整个人类交流及其不同方面的符号（有关符号与信号的区别，参见Voloshinov与Bakhtin，1929；Ponzio，1992a、1997a、2001）。

此外，正如罗瑟—兰迪以及后来蓬齐奥充分说明的那样，索绪尔符号模式——解码符号学的主要参照——很大程度上受洛桑学派（里昂・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所提出的边际主义经济价值理论的影响。索绪尔的符号模式主要是将“纯经济学”的静态观点应用于语言研究的结果。将语言的研究跟理想化平衡状态中的市场研究同化导致了静态的符号观。符号被置于共时视角下考察，受支配于给出与接收之间完美的一一对应的逻辑范式——受支配于等价交换的逻辑（它调节着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中的所有社会关系）［参见Rossi-

Landi,1992（1968）、1975a；Ponzio,1992b]。

解释符号学揭示了构成解码符号学基础的符号模式的不足之处。解释符号学的“重新发现”无疑受到表意实践中兴起的新社会文化取向的支持，这种新社会文化取向不能接受符码与信息、语言与言语、语言系统与个人言语之间的两极对立。因此，促成语言生活以及一般社会文化生活向心力的表意实践赋予统一的符码系统以特权，将符号的多逻辑性、多语性、多重音性和多可用性（它们都被弱化）置于不利处境。另外，相对于解码符号学特有的二分法所蕴含的整体化主张，326 解释符号学的范畴解释了巴赫金和诸如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哲学家理论化的“不可简约的他性”（参见 A. Ponzio，1994a、1995a、1996a；J. Ponzio，1998）。

我们认为正是解释符号学的这一方面对其综合价值具有真正的决定性作用。有关符号学的二分法，符号学探寻的范围无疑超越了具有索绪尔 / 叶姆斯列夫 / 格雷马斯取向的符号学家与倾向于皮尔斯的符号学家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倾向似乎是二分法与三分法之间的对立。在我们看来，事情的实质不在于二分法与三分法之间的对立。相反，它主要在于下述两种符号模式之间的对立：一种符号模式倾向于以复杂的符号活动将事物过于简化，另一种符号模式（如皮尔斯所考察的模式）似乎会更恰当地处理符号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因素。获得这样的结果不是简单地依靠空洞的三分形式，而是依靠皮尔斯三分法的具体内容——他的三分法所提出的范畴、符号的分类、他的符号模式的动态性（该模式描述的符号基于解释项到解释项之间的回用作用）。换言之，诸如“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等范畴，“再现体”、“解释项”和“对象”构成的三元结构关系，基于归约性、指示性和像似性的三分符号特征，所有这一切都帮助我们从符号学视角揭示了符号的异他性和对话性。

在过去已发表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努力强调皮尔斯逻辑的对话性和多逻辑性。他的逻辑的长处不在于那个已经得到黑格尔辩证法证明了的三分法程式，这里的三分法是从符号生命的基本对话性中抽象出来的，它会滋生形而上学的、抽象的、独白的辩证法。在巴赫金 1970—1971 年笔记中，他解释了黑格尔的独白性辩证法是如何形成的：尽管黑格尔辩证法根植于至关重要的对话性符号环境之中，但它从对话中抽取了声音（分裂的声音），消除了一切（个人的 / 情感的）语调，将活生生的语词变成抽象的概念和判断，因而获得的是单个抽象的意识。皮尔斯本人反对黑格尔的分析系统框架，反对疑心病似的寻找目标的辩证法——反对单边取向（而非开放、对抗式）的辩证法（有关皮尔斯和巴赫金的对话与辩证法之间 327 的关系，参见 Bonfantini 与 Ponzio，1986；Bonfantini 等，1996）。

符号学的选择不是在二分法与三分法之间，而是在独白性与多逻辑性之间。由索绪尔符号论提出的符号模式的局限不是由二分法决定的。相反，其局限是因

为这样一个事实：二分法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等价交换中获得体现，复杂的符号生活被简化为符码与信息二分模式（参见Ponzio，1990a：279—280）。

正如巴赫金与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英译本1973）中所说，解码符号学提供的工具不足以对人类交流的特征进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这些特征包括多语性（尤其是“民族”语言内在固有的多语性）、多声性、歧义性、多义性、对话性和他性。因此，言语交流不可能如索绪尔理论上所阐述的那样包含在语言与言语这两极之间。符号的明显特征是其解释潜力无法在一单个意义中穷尽，它绝不可减约为信号。换言之，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前所述，意义并非只是信息发出者根据明确的传达意愿所表达的有目的的信息。这就意味着，解释项符号的工作并非局限于基本的鉴定性操作、机械性替换或仅仅是对被解释符号的辨认。与信号相反，符号性程度很高的符号不可能通过解码过程，通过指称某一固定的、预先确定的符码而得到解释。

另外，符号模式融入到我们对主体的观念之中。从解码或等价交换符号学视角看，主体根植于他性和对话性程度很低的身份概念。因此，主体与其自我意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主体完全能够驾驭自己的符号活动，主体作为信息发送者和编码者，可以让其传达的内容服从于自己的意愿。

相反，有些理论倾向于皮尔斯符号模式，可以统称为解释符号学，它们以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来描述意义的生成，这种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缺乏（被赋予了调节能指与所指间交换关系之任务的）符码所提供的保证。

解释符号学提出的符号模式的详细阐述基于下述皮尔斯范畴：解释项三分为“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对象细分为“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符号三分是“规约符”、“指示符”和“像似符”，等等。皮尔斯将符号置于动态的符号活动语境之中；他提出“无限符号活动”的概念，阐发了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辩证、对话的关系。有意义的是，蓬齐奥将皮尔斯与巴赫金联系起来。如同皮尔斯一样，巴赫金借助于“文本”、“他性”、“应答性理解”和“互文性”等范畴，将符号置于对话语境之中——这是它作为符号能繁荣发展的唯一环境。虽然彼此独立地在不同方向上进行研究（皮尔斯主要关注认知问题，巴赫金关注文学语言），但这两位学者都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

328

7.2.2. 解释与符号研究中的对话性

所有这一切生发出来的是一种辩证的或“双向逻辑的”（建立于对话基础之上的辩证）符号模式，这里的符号与符号活动完全一致。辩证考察的符号不再是被赋予了清晰界定的意义的自治单位，或是被赋予了由该符号与符号系统中其他单位之间的机械对立关系决定的价值的自治单位：“一旦符号不再被简约为一个

单个要素，或分解为多个成分，那就很难说清楚符号的起始了。符号不是东西，而是过程，是各种关系（社会关系）的交织。”（Ponzio，1990a：260）

巴赫金的“文本”概念无疑要比被视作孤立单位的符号概念更为宽泛；然而，如同符号一样，文本也只有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方可繁荣发展，才能被人理解：即文本互相之间辩证/对话关系的互文语境。随着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动，文本的意义在其他文本的边界获得发展。巴赫金语：“文本互相之间以及文本内部的对话关系。特殊的（非语言的）性质。对话与辩证法。”（Bakhtin：1959—1961，英译本：105）

这种研究方法允许语言文化生活中的离心力充分发挥作用。它从理论上将他性、多义性和对话性阐述为符号身份的构成要素。解码符号学提出的范畴往往会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当应用于话语分析、写作和意识形态时尤其如此。相反，解释符号学及其意义、意味和可解释性（如同艾柯所说的“interpretanza”，参见 Eco，1984：43）理论，加上解释符号学宽泛、灵活、批判性的符号概念，能够对表意和传播作出同样程度的阐释，从而对人类交流互动作出更具穷尽性的描述。

329

解释符号学提出的符号模式是动态的。它并不基于对等逻辑，也不是基于符号与符号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语言系统与表述之间、语言与言语之间的等价交换。相反，它与构成开放的符号链的符号之间不断延伸的思想有关——与由被解释符号到解释项符号的回用的思想有关。符号活动中的这两个因素（被解释项和解释项）只有置于符号活动之中才能表现得很清晰，联系它们的是一种由高于一切的超额与他性逻辑所决定的非对应关系。

根据这一方法，解释项符号永远不会与先前的符号（即被解释符号）完全对应，但会阐释更多的内容（如皮尔斯所说，参见 CP 2.228），进一步发展、丰富被解释符号，赋予其新的意义。解释者/解释项针对某事作出反应，这也同时使其成为符号，并继而催生另一个解释性的反应，以此类推。从这一点看，解释项符号的任务并非局限于对前一符号的识别；相反，它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应答性理解”（参见 Bakhtin，1959—1961）。这表明符号之间存在着一个具体的对话关系，它由交互他性原则调节。

巴赫金（Bakhtin，1986：127）说：“让人听到便已经是对话关系了。话语希望被人聆听、让人理解、得到应答，然后再对应答作出回应，如此往复，以至无穷。”符号活动源于这种活生生的关系，而不是构成符号系统的符号之间的抽象关系。巴赫金的“应答性理解”类似于皮尔斯的“动态解释项”。如同皮尔斯一样，巴赫金相信人就是符号（参见 Sebeok，1986），原因是：意识与无意识都是由符号材料构成的——由对话性结构的言语材料组成的［关于这一点，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Bakhtin 与 Voloshinov，1927）说得很清楚］。

对于解码符号学的窘境，皮尔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逃脱的方法。他的《论文集》包括的符号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但1931年才问世。皮尔斯的论文做了大量研究，恢复了被人遗忘的与中世纪深奥的符号研究的联系（例如，他经常引用西班牙的彼得的《讲道集》）。在他1867年的著名论文“论新系列范畴”中，皮尔斯分析了他认为最适合对符号和符号生活的多面性质作出恰当分析的概念。对这一描述阐述得更清楚的版本一般认为是他于1904年10月12日致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的信函。谈到符号与知识之间关系时，他这样表达他的意思：

330

> 符号是我们通过它便可以多了解事情的某种东西。除了知识以外，在现在这一刻，在这一刻的意识内容中（其知识的存在值得质疑），我们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得通过符号。因此，符号是这样一种物体，它一方面与其对象发生联系，另一方面与解释项发生联系，从而使得解释项与对象发生联系，对应于符号本身与对象的联系。我或许会说“与它本身相似”，因为对应就在于相似；但也许对应狭隘了一些。（Hardwick，1977：31—32）

根据皮尔斯，符号是对于某人来说在某个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代表某物的某种东西。说对于某人，是因为符号在解释者心中创造了“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也许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亦即，它创造了一个解释项符号（CP 2.228）。此外，说符号在某个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代表某物，是因为它并非指称整个对象（动态的对象），而是指称它的某一部分（直接对象）。因此，对于皮尔斯来说，符号是按照第三性范畴而存在的；它预设了符号本身、其对象和解释项思想（解释项思想本身也是符号）之间的三分关系。符号总是扮演第三方的角色，就是因为它在解释项符号与其对象之间起中介作用。

皮尔斯符号学重点讨论了解释项概念。它在解释项中识别了意义（这是索绪尔符号论未予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取代前一个符号的另一个符号中识别了意义。作为符号，解释项只有通过开放的回用链上的另一个解释项而存在（这个开放链基于解释过程的潜在创造力）。从这点说，符号活动并非因为可以诉诸一个先于符号活动就业已固定的符码而可以先天地得到保证；事实上，在确定和维持符码的解释过程之外，符码本身并不存在。“中介”与解释和无限符号活动密切联系，它是皮尔斯的另一个基本概念。符号通过解释项做中介，没有了解释项，符号则无法表达其意义；然后，无论在什么解释行为中（从最简单的感知到最复杂的知识），解释项又作为中介促成与对象的联系。符号并非居住于符号内部，而是在符号间的关系之中。皮尔斯符号学是一种认知符号学（但并非仅限于此；见第一章）。逻辑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设想：知识是通过符号的中介作用

331

而获取的——的确，没有符号，知识将成为不可能。解释符号学将能指与所指的二分关系替代为对象、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三分关系。生成的符号类型（无论是规约符、指示符还是像似符）取决于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支配关系；但无论哪一方起支配作用，解释项依然扮演根本性的角色。意义在开放的解释过程中动态地演进：解释项符号与被解释符号间关系的他性程度越高，亦即对话性程度越高，那就会有越多的解释成为积极的对话性应答、创造性的重新阐释、创新发明，而不仅仅是重复、逐字直译、同义替代和辨认。

无限符号活动、以对话性应答为特征的解释过程、由被解释符号到解释项符号的推延或回用，等等，根据以上方面进行的有关表意过程的描述，对身份理论和主体理论均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与解码符号学视角的描述相反，从解释符号学视角看，身份与主体不再作为连贯和统一的实体而出现。在该研究方法中，他性被置于身份的核心地位——的确，他性是身份的构成成分，因此，身份被认为是在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辩证和对话动态过程中发展演变的，无论这种辩证和对话动态过程发生在构成单个意识的思维过程之中，还是在不同意识间的关系之中。身份、主体和意识在开放的符号活动中发展；它们在思想符号和解释项间交流中的应答性理解、对话性和他性的动力中演变。这样一来，对于皮尔斯和巴赫金来说，自我是对话性地建构起来的，这种对话性自我建构是在思想符号与解释项之间开放的、不断延伸的翻译 / 解释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一框架中，自我总是具有他性，自我从未以确定的形态存在过。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自我才能作为自我有效地存在。因此，自我—他者的关系不仅存在于更为明显的各种意识之间的关系之中，而且还存在于构成单一的“个体”意识的多种“自我”之中：

332

> 主体不包含解释过程，他不是先于解释过程而存在的，也不能从外部控制解释过程：主体是一个符号解释项关系链，他在这里识别自己，中肯地说，经历他人的自我并不比识别“我的”符号解释项关系（我通过这些符号解释项关系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更为复杂。因此，皮尔斯说，正如我们常说的，是身体在运动中，而不是运动在身体中，我们也应该说，是我们在思想之中，而不是思想在我们内部。（Ponzio，1990a：268）

符号在归约性、指示性和像似性的辩证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着。这便解释了符号与解释项之间、一个论证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中不同的对话性程度。一个符号绝不可能是纯粹的规约符；它总包含着指示性和像似性的痕迹。同样，当一个符号的主要特征是指示性或像似性时，它总有一定的归约性。换言之，正如规约符一样，指示符和像似符也同样需要解释项的中介作用并求助于规约。因此，

所有符号同时包含不同程度的归约性、指示性和像似性成分。例如，言语符号虽然从根本上说是归约性的，但也包含一定程度的像似性。（有关推理过程各范畴之间的对应关系——试推、演绎和归纳——将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的三分法，还有爱的演化、机械的必然演化和随机变异演化等宇宙哲学范畴，见本书1.3.3）

归约性表达的是符号的规约特征——符号与其对象之间基于符码或法则而建立的规约限制关系。规约符通过解释项与其对象发生关联，没有解释项，它就不能作为规约符而存在。然而，即便规约符基于符码、规约、法则，而这些符码、规约、法则又基于符号之间无限推延和回用的开放过程。因此，就算是规约符，它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从来不是完全单一性的。归约性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符号之中，而不仅仅是规约符（当然，归约性是规约符的特征）。在前述致维尔比的信函中，皮尔斯提供了下述定义："我将规约符定义为一个由其动态的对象所决定的符号，仅仅是从它将被如此解释的意义上对其进行定义的。因此，它要么取决于规约、习惯，要么取决于其解释项或解释项场域的本质（解释项作为其决定因素的事物）。"（Hardwick，1977：33）此外，根据皮尔斯，第三性范畴在规约类型的符号中起主导作用，在这种类型中，与对象的关系的确立基于外部法则，而且一定依赖于解释项。第三性最终关注的是处在与解释项关系中的符号。

指示性指的是符号的强制性质、因果关系、必然的邻近性、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时空邻近性。正如皮尔斯所说："我将指示符定义为一个由其动态的对象所决定的、与其对象处于真正的联系之中的符号。"（同上：33）对于指示符来说（可不像规约符），并非解释项决定对象。这里，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关系先于解释而存在；事实上，是那种关系决定了解释。符号与该符号的对象独立于解释项并一起出现。然而，这不排除下述情况：为了确立一个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符号关系，人们不可避免地求助于规约。例如，在踪迹、症候和线索中，在火与烟之间、皮肤斑点与肝病之间、敲门声与门外有人想进门这一事实之间的关系中，符号的指示性特征占主导地位。指示符的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一种必然的邻近性关系（自然的邻近性、推理的邻近性，等等）。因此，这种关系独立于解释项而存在，指示符因而具有第二性范畴的特征。

像似符的特征是，符号与其对象之间呈现相似的关系，其形式多样，例如图像、隐喻和图表。皮尔斯说："我将像似符定义为一个由其动态的对象根据其本身内部结构所决定的符号。"（同上）像似性符号的主导因素不再是自然的因果关系，或是一套规约系统，或是任何其他邻近性形式。像似性符号的表意不依赖于符码、规约，不依赖于解释项赋予意义。像似性符号是自我表意的；它本身就有意义；它独立规定自己的意义；它能表意只是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在这里，符号达到

了最高的独立于其对象的程度，而解释项也许出现于很遥远的系统中。在极端的情况下，解释项也许甚至于是重新发明的——既不是通过必然的邻近性关系（指示符），也不是通过规约关系（规约符），而是通过假象的相似关系。尽管像似性关系包含归约性和指示性的痕迹，但它的特征是密切、吸引、革新、创造、对话和他性。鉴于像似符相对于对象和解释项来说，具有表意独立性，它表现的是第一性的现实。

334

像似性与对话性密切相关。事实上，像似性符号具有最高程度的对话性。像似性表现的不是规约、原因的机械结果等；相反，它与应答性理解、积极参与、对话性评价、观点、符号物质性、能指对抗性，不可约减为身份环境的特性、他性等等概念有关。为了更好地理解具有像似性和对话性的符号，一个有效的做法就是把它们想象为对话中的应答——把它们想象为对另一个对话者言语或非言语观点的创造性应答，无论那是挑衅、祈祷、威胁、质疑，还是其他类似的情况。

必然性是归约性和指示性符号都具有的特征。区别在于，对于前者来说，必然的关系源自接受规约，而对于后者来说，必然的关系是由于外部的影响而被动承受的。因此，在规约符和指示符中，对话性相对降低了。符号一般依赖于它们与解释项的关系；然而，尽管由于归约性的主导作用，这种依赖性在规约符那里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在指示符和像似符那里，这种依赖性的重要程度要轻很多。皮尔斯经常将指示符和像似符归类为退化的符号（这是从数学语言借用的术语）；相反，规约符是相对真实的符号。

解释符号学（相对于解码符号学）的一个根本特征与它对推理过程的阐述相关。推理是在符号与其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中发展的，这是一种对话关系。推理（或皮尔斯所说的议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演绎、归纳和试推。这些类型的特征分别由指示性、归约性或像似性的突显来体现。在演绎中，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受指示性支配；在归纳中受归约性支配；在试推中受像似性支配。

当我们将符号活动描述为由无限延伸的解释项构成的开放符号链时，我们迟早必须对这些术语和这种开放的意义加以考察。换言之，正如艾柯在其1990年著作的标题中所说，我们必须考察“解释的限度”。

335

艾柯发现了两种有关解释的思想。解释意味着强调文本的客观性，强调其独立于解释的本质；与此同时，文本受支配于无限解释。艾柯批判了第二种思想，视之为“密封的符号活动”，并认为——与表面现象、与某些学者的观点相反——皮尔斯的无限开放符号活动理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艾柯主要的批判对象是“解构主义”所阐述的雅克·德里达的“无限延伸”概念。

艾柯声称，德里达的“无限漂移”——尤其如解构主义者所阐述的那样——完全不同于皮尔斯的无限符号活动的概念。他的论证基于皮尔斯的习惯思

想——习惯与解释的主体间性特征有关，是由社团的规约固定下来的。“从社团就某一给定的解释达成一致意见那一刻起，即便不是客观的意义，至少有一个主体间的意义，它优先于其他任何可能的但未获得社团一致认可的解释。”（1990，英译本：40）

艾柯对皮尔斯“无限符号活动”的诠释似乎指的是解释的对话性特征。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是对话性的（换言之，解释项的逻辑是一种对话式逻辑），即，解释项符号不能武断地、命令式地或无条件地将自己强加给被解释符号。从对话链角度理解，皮尔斯的解释项链摆脱了被认为等同于“自由解读”的风险；在这种“自由解读”中，解释项的意愿（连同解释者的意愿）将被解释项塑造“成为服务于它们自己目的的形状”（同上：42）。

这使得蓬齐奥在皮尔斯和巴赫金之间建立的联系更为有趣了，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巴赫金也强调符号的对话性。蓬齐奥通过区分前提与结论之间，或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对话性程度，证明了皮尔斯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所考察的那三种不同类型的论证（归纳、演绎和试推）是如何完成的。从这一视角看，按照对话性和他性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试推排在第一位，然后是归纳，最后是演绎。

如同指示性符号，在演绎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受制于必然性——更精确地说，受制于必然的邻近性。前提中所述事实迫使我们接受解释项结论。这种制约关系以低程度对话性和他性为特征。就归纳而言，结论不是由前提无条件强加的；相反，一旦前提被接受，就有了接受结论的倾向，结论既不依赖于前提，也不直接源自前提。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具有归约性秩序，所以，推理主要由解释和规约决定。换言之，考虑到自由共识的已知界限，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它对应于归约性。归纳允许认知在数量上的增加。蓬齐奥评论说：

336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像在演绎中那样，凭借另一部分而预先确定论证中某一对话性部分的存在。在这里，相关部分之间具有一定的自治关系。无论如何，前提与结论之间的疏离只是量上的。与演绎类似的是，归纳过程是直线发展的，它的发展完全按照由起点至终点的顺序进行，其间没有中断或回动。（Ponzio，1990a：267）

相反，在试推法中（或者如皮尔斯所谓的回溯推理），推理是从结果到前提逆向进行的。在试推中，法则规律的探寻是根据观察和解释，凭经验完成的。法则规律对解释的依赖意味着法则可以被融合，一条法则可以被提及以取代另一条，依语境而定。有时，法则基于现存的认知百科；有时它必须是新创造出来的。这显示了从最高到最低程度的新颖性和试推创造性的可能性。在试推法中，前提与

结论之间的关系既不决定于邻近性的束缚，也不决定于归约性的武断。前提暗示结论，而且仅仅是通过相对相似性而暗示结论：我们从结果出发，由此唤起某一法则，依据该法则就可能尝试解释手头的问题。对于这类推理来说，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联只是有可能：这种关联受制于推测，受制于猜想的倾向，它有时是有风险的。其解释项结论相对于前提来说具有相对的自治性：创造性试推程度越高，对话性和他性程度也就越高。但无论革新、新颖和创造性程度如何，在试推法中，论证中的术语总是具有很高程度的他性，彼此总是处于对话性的联系之中。另外，由于相似性所起的作用，试推法与像似性相关联。在传播分析理论思潮中，语言劳动者的任务被简化为解码和识别，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被降格至信号的地位；与此相反，解释符号学必须从理论上阐述符号学与逻辑学相互之间的关联。

皮尔斯提出的两个重要分类——一是他的符号三分法：规约符、指示符和像似符；二是他的推理三分法：演绎、归纳和试推——并非两个分离的、彼此无关紧要的分类。相反，这些不同类型的符号与推理（或论证）互相之间在对话性上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我们知道，对话性程度是符号与解释项之间关系的一个应变量。皮尔斯系统地提出了有关符号与解释项之间关系的理论，这种关系类似于对话中两个应答之间的关系。因此，皮尔斯符号学与他的逻辑之间的联系（即，他的符号分类与推理或论证分类之间的联系）也是符号学与双向逻辑之间的联系。

当我们同时考察皮尔斯符号学和巴赫金语言哲学时，我们可以将符号置于推理、解释和对话性符号活动的动态语境之中；我们也可以逐渐揭示不同表意实践中符号间关系的其他方面。例如，通过同时考察皮尔斯和巴赫金，我们发现更容易从解释路径角度探讨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意义问题（参见 Ponzio，1990a、1995c）。事实上，将意义理解为“解释路径”，就是按照皮尔斯和巴赫金的符号思想，将意义置于对话关系的语境之中考察。意义被描述为符号网络中的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它与源自同一符号的其他解释路径交织在一起。当我们从多种意义轨迹交叉于其中的一个符号启程，我们就可能在多种路径之间进行选择和转换。意义成为符号网络中的一个表意路径，成为一个轮廓分明的解释路径，但与此同时，由于与其他解释路径之间有不断的对话性接触，它还会不断扩张和变化。通过符号在对话关系中的语境化，符号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符义可用性得到了解释。对话性存在于：

1. 与其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中，而在论证推理过程中，这又存在于，

2. 结论之间的关系中，对话性程度或大或小，取决于我们处理的问题是演绎、归纳还是试推（皮尔斯）；

3. 开放式解释路径的多种言语和非言语解释项的关系中；以及，

4. 解释路径的诸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中。

这样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交际的区别性特征——歧义性、多义性、多声性、杂语性、对话性、“符号物质性”（即表意他性），因此还有符号的自治性，符号和意义抵制其他解释项符号并同时抵制生成这些解释项符号的主体的能力。

解释与对话性之间的关系还清楚地阐释了翻译问题。在《翻译的经历》（Eco，2001）中，艾柯声称，翻译不是比较两种语言，而是以两种不同语言解读一个文本，这本身就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迁移。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翻译也涉及由符号他性逻辑调节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对话（包括言语的、非言语的和文化的对话）。翻译是处于交互他性关系中两个文本之间的对话（Petrilli，2003b：1—20）。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对话性概念解决了解释的限度问题以及皮尔斯提出的翻译与解释之间关系的问题（参见 Eco，2001：65—132）。

源语文本（被解释项）和译语文本（解释项）通过他性关系而互相发生关联，当皮尔斯说符号的解释项总是符号以外的东西时，他就是在表明，这种他性关系存在于所有符号之中。翻译不是仅仅“说几乎同样的话”（这让人想起艾柯 2003 年著作的标题），而是置身于一种关系之中，这远非“几乎”同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种从他性角度来理解的、基于差异的对话关系。由此，我们提出了术语“同样的他者”（Lo stesso altro，这对应于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三卷本著作的第三卷标题；见 Petrilli，2001a）来描述翻译文本，而不是简单地将它描述为说几乎同样的话。　339

生平简介

翁贝托·艾柯（出生于 1932 年）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畅销小说家，对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本章主要讨论了从《不存在的结构》（1968）和《符号学理论》（1975）到《康德与鸭嘴兽》（1997a）的艾柯符号学研究的发展。在本书第 10.1 节我们还会对《康德与鸭嘴兽》作深度讨论。　340



建模、书写和他性

第八章
建模和他者

8.1. 建模、交流和对话性

在本章里，我们将要论述对话性（dialogism）、建模和交流在符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8.1.1. 模型和建模

本篇中的术语"模型"（model）和"建模"（modelling）采用的是西比奥克和他的总体符号学理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

前文已经提到（见本书5.1.1），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模型，该词是从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参见Lucid，1977；Rudy，1986），后者以此区分了表示自然语的"第一建模系统"和表示人类其他文化系统的"第二建模系统"。然而，西比奥克把模型和乌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Umwelt）概念联系到了一起——他将其译作"外在世界模型"（outside world model），模型这一概念也由此超越了人类符号学的领域。在生物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知道建模的能力是一切生命体所固有的。符号活动可以被视为所有生命体所具有的、生产和理解其物种特有的世界模型的能力（参见Sebeok与Danesi，2000：5）。第一建模系统就是生命体所固有的、以物种特有的方式进行建模的能力。人属动物的第一建模系统就是语言（language）。第二和第三建模系统以语言为前提，因此它们是人类独有的能力。第二建模系统是文字语言，西比奥克称之为"言说"（speech）。第三建模系统指所有的人类文化体系——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建立在语言和言说之上的、以符号为基础的建模过程。 343

8.1.2. 重写托尔·冯·乌克斯库尔的符号活动类型学

在"生物符号活动"（见Posner等，1997—2004，1：447—456；亦见Uexküll，

“Varieties of Semiosis”, Sebeok 与 Umiker-Sebeok 编，1992：455—470）中，托尔·冯·乌克斯库尔从发出者和接收者的不同作用出发，区分出三种符号活动。他将其称之为：（1）信息或表意符号活动（semiosis of information or signification），（2）表征符号活动（semiosis of symptomatization）和（3）交流符号活动（semiosis of communication）。

在信息或表意符号活动中，无生命的环境作为没有符号功能的“准发送者”（quasi-emitter）存在。接收者——也就是生命体，或者生命系统——对接收到的信息赋予意义。接收者是通过感受器完成这一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行使所有的符号功能。

在表征符号活动中，发送者是通过行为或态度发出信号的生物体。发出的信号并不导向接收者，也不意图引起反应。接收者所接收到的信号是被称之为“表征”的符号。

在交流符号活动中，符号是发送给接收者的，后者必须追溯发送者的发送意图。（参见同上：449—450）

在我们的术语中，为了和皮尔斯（也为了和托尔·冯·乌克斯库尔在生物符号学方法中使用的术语）保持一致，必须从被解释符号和解释符号的不同作用出发，重写这三种符号活动。陈述如下：

> 1. 被解释项成为符号，仅仅是因为它接受了作为反应的解释项给出的解释（信息符号活动）。
>
> 2. 在被解释项被解释为符号之前，它已经是解释性的反应（表征），但已经是解释性反应的被解释项并不是专门为了被解释者解释为一个符号而出现的（表征符号活动）。
>
> 3. 在被解释项被解释为符号之前，它已经是解释性的反应，已经是解释性反应的被解释项是专门为了被解释者解释为一个符号而出现的；也就是说，被解释项就是倾向于引起解释性的反应（交流符号活动）。（参见同上：449—450）

344

托尔·冯·乌克斯库尔对符号活动类型学的这一重写，根据解释中被解释符号和解释符号的不同作用对其进行了区分，相较于建立在“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作用基础上的符号概念区分，它具有以下优点：

> 1. 解释项在符号活动中的作用得到了强调。
>
> 2. 信息或表意符号活动中“无生命的准解释者”被描述为“被解释项—

非解释项”（而在表征符号活动中，被解释项是由解释项进行解释，它并不专门作为要求解释的符号出现；在交流符号活动中，被解释项也是由解释项进行解释，而它是专门作为要求解释的符号出现的）。

3. 符号活动等于解释的能力——也就是反应的能力。

4. 确认了符号活动中符用维度的重要性。

5. 肯定并发展了托尔·冯·乌克斯库尔对生物符号学的定义：它是“解释之解释”，即“元解释”。

在重写中，我们采用了托尔·冯·乌克斯库尔用于描述生物符号学模型的术语，包括五个方面：解释者、解释项、解释对象、解释结果与元解释者。最后一项尤其存在于人类语言中（参见同上：456）。

信息（或表意）符号活动、表征符号活动和交流符号活动都建立在特有类型的建模之上，这种建模是具体生命形式的特征。物种要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处理和解释意识的输入，其建模能力必须是先在的。

8.1.3. 从“代替”到“解释”

西比奥克认为，对象和解释项都是符号（Sebeok，1994b：10—14）。因此，我们可以将对象写作符号对象（S_{on}），而将解释项写作符号解释项（S_{in}）。这样，对象和解释项之间的区别，以及后两者之间的区别都可以视为两种符号之间的区别。（参见同上：12—13）

我们和皮尔斯的看法一致，他重整了中世纪对符号“一物代一物”（aliquid stat pro aliquo）的定义中“代替”这一概念，称之为“解释”。符号首先就是一个解释项（参见 Petrilli，1998e：1.1）。　345

事实上，皮尔斯所说的符号包括了对象方面的被解释符号，解释者方面的解释符号，解释项在其间使得被解释符号的存在成为了可能。由于接受了解释，被解释项成为了符号元素；解释项也同样是一个符号元素，因为它具有产生新符号的潜力。因此，只要有一个符号，就立即会有第二个；考虑到解释项能够产生新的符号，就立即会有第三个、再下一个、永无穷尽。这就是皮尔斯提出的无限符号活动，或者说从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延伸链。

对符号的分析始于解释的对象——被解释项，也就是说，它始于第二个层面。换句话说，它始于延伸链或者说是符号链的某个点。但是，这个点不能被视为符号活动的起始点。我们不能为了解释符号活动，就在理论层面上把被解释项抽象化。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皮肤上的某个斑点可以被解释为肝脏疾病的症状表现。在解释过程中，这已经是第二个层面。回到第一个层面，这一皮肤的病变已

经是生物体对内部异常的反应和解释。它本身就是解释性的反应。

我们认为符号首先就是一个解释项,也就是说,它首先就是一种反应。我们也可以说,符号就是反应——但前提是,在这里“反应”意味着“解释”(这与莫里斯的行为论相近,但和机械论方法不同)。比起“刺激—反应”(stimulus-reaction),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请求—反应”(solicitation-response)这对术语,因为后者可以使我们得以避免落入与其对应的方法之间的表面联系。即使是对刺激(更好的说法是:请求)的“直接”反应也从来不是真正直接的,它总是通过解释来进行“调节”的。除非是“反射行为”,该反应的方程式包括对请求的识别、将其放置在语境之中并把它和给定的行为参数联系起来(不管是像捕食者—被捕食者模式这样简单的行为类型,还是和人类文化价值相关联的更复杂的行为)。

符号首先是一个解释项,是一个反应。另一被当作符号之物通过这一反应成为了它的被解释项;同时,它也具有产生无限衍义的符号链的潜力。

346

因此,在《符号学百科全书》(Paul Bouissac 编,1998)的“符号活动”这一条目下,“符号活动”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不仅是术语上的,也和符号活动的现象相关: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关系;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它是以符号为主体的行为,也是以符号为对象的行为;它包括了符号请求与反应,也包括了被解释项和解释项。

在皮尔斯看来,符号活动是个三分的过程或者说关系,它包括符号(或者说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在自然的三分关系中,一个符号或再现体是第一项的,它与第二项,即对象相关;这样它就能决定第三项,即它的解释项,假定了解释项和它本身,以及对象在同一个三分关系中是与同一个对象相关的。”(CP 2.274)因此,符号代表着另一物,代表它的对象,“不是代表其全部,而是和对象的某一方面相关”。(CP 2.228)但是,只有当“符号决定了解释项”(CP 8.343)——后者是由对象调节和决定的——之后,他才有这样的作用。符号活动是以符号为主体的行为,也是以符号为对象的行为;它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符号调节解释项和对象的关系”,就此而言,它指的是符号概括了对象的某个方面、概念或是主题,并且“用这样的方式使解释项和对象发生联系并与对象产生回应”,由此决定了解释项。(CP 8.332)

8.1.4. 解释项在“符号活动矩阵”中的中心性

托尔·冯·乌克斯库尔的模型足够宽泛,囊括了微符号活动、内符号活动、更高的生物体的符号活动和人类的生物符号元解释。它包含了马丁·克兰珀提出的“符号活动模式”设定的符号活动所必需的大部分要素(见 Posner 等,1997—2004,1:248)。以下的列表包含了被认为是描述完整符号活动所必须的十四个

要素，其中，用带括号的字母所标注出的要素是在解释者的生命体之内的：

1. 作为整体的符号活动：Z
2. 解释者的生命体：（O）
3. 解释对象（“信号”）：S
4. 渠道：（Ch）
5. 能指（生命体中表征的信号）：（Rs）
6. 解释项：（I）
7. 所指（生命体中表征的对象）：（Rg）
8. 解释结果（“对象”）：G
9. 对工具行为的处理：（Rbg）
10. 对信号行为的处理：（Rsg）
11. 工具行为：（BG）
12. 信号行为：（SG）
13. 外语境：（C）
14. 内语境：（c）

在这个列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如下描述一个符号活动：

> 符号活动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涉及了通过生命体外在的渠道 C 和解释对象 S，解释对象 S 和解释结果 G 相关，后者是通过解释者的生命体（O）内的解释者感知的，并且表征为能指（Rs）。能指（Rs）通过解释项（I）的调节和所指（Rg）相联系，在生命体（O）中表征了解释结果 G。通过解释项（I），这个用符号表现和归类的过程会引发对工具行为的处理（Rbg），或是对信号行为的处理（Rsg）。这两者和解释结果 G 以及符号活动的终结有关，在明显的工具行为 BG 或者信号行为 SG 中，通过合适的神经效应器，对信号行为的处理可以为下一步的解释提供解释。每个符号活动 Z 都交织在其他符号活动之中，也是发生在生命体（O）的外语境（C）和内语境（c）中的。（同上，251）

对符号活动的这一复杂定义的中心在于解释项（I）。事实上，如我们所论述的，解释项起着调节请求（解释对象）和反应（信号行为或工具行为）的作用。在皮尔斯看来，调节使得符号活动变得和纯粹的动力行为——“或者无理性力量的行为”——不同，后者是在两项的关系中产生的。符号活动是三项关系的结果：它“是

一个行为、一项影响，它本身也是包含了三个主体的协作，如符号及其对象和解释项”，而且它“无论如何不能分解到每两项之间的行为中”（CP 5.484）。解释项不会在物理现象或是非生物的互动中出现；简言之，它不会出现在非生命世界中。

由克兰珀给出的符号活动定义可以用“符号活动矩阵”的图形来说明（参见Posner 等，1997—2004，1：252，Figure 5.1）。矩阵中心的菱形就代表着解释项 I。

关于解释项在符号活动矩阵中的关键作用，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通过这一放置

348 在中心的菱形来表示它。

8.1.5. 符号和符号活动的对话本质

克兰珀的文章使用符号活动矩阵展示了各种不完全的符号活动，比如巴甫洛夫制约、“如果……就”的推论过程、假设形成和“想法链”。在所有的符号活动中，符号活动矩阵图都强调了解释项的中心作用（参见同上：253—257）。

符号活动矩阵也同样展示了对话。克兰珀认为，当信号发送者发出信号时，对话就开始了，意图在于传播关于对象的某个特质或者某一方面。他没有考虑到的是，“如果……就”的推论过程、假设形成和“想法链”本身就是对话形式。

在推论过程、假设论证以及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的符号链中，在被解释符号与解释符号的关联中，都包含着对话。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推论和假设论证的对话本质。

在演绎法中，前提和结论是指示关系，对话的程度最低。一旦前提成立，结论就无可更改。归纳法的特点也是单向的推论过程，在归纳法中，结论是由习惯和象征秩序决定的：尽管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但一致性和重复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相反，在试推法中，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是像似的且在实质意义上是对话的；也就是说，试推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话性和创造性，出错的风险也较高。认为试推过程具有风险性，也就是说，它是假设性的、很不确定的，规约（象征性）和机械论的必然性（指示性）的余地很小。因此，试推过程是在一个他者性和对话性程度很高的符号活动中产生的，它反过来又会再生产这样的符号活动。

在皮尔斯看来，（被解释的）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是对话性的。我们已经论证了符号和符号活动的对话本质。

在托尔・冯・乌克斯库尔提出的信息或表意符号活动中，非生命的环境起到了“准发送者”的作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则是由于被解释项接收了解释项的解释，它就成为了一个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反应—解释接收的过程是对话

349 性的。在交流符号活动中也有对话，被解释项在被解释项解释成为符号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解释性的反应，要求自己被作为一个符号来解释。在表征符号活动中，

对话也是存在的:被解释项类似于信息或表意符号活动中的解释性反应(表征),虽然它的意图并非是为了被作为符号来解释。

对话并非开始于发送者的信号行为,其意图在于传播与对象相关的某物。整个符号活动都是对话性的。这里的"对话"一词应该被理解为"双向—逻辑性"(dia-logic)的。符号活动的逻辑是整体性的,因此,克兰珀所说的符号活动矩阵的逻辑就是对话性的。这样的解释项,照克兰珀的话说,具有"回应的倾向"——他用这个词来描述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对话互动关系(参见 Posner 等,1997—2004,1:259)。

克兰珀的符号活动矩阵肯定了我们在对话和符号活动之间建立的关联。它表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在于对话是一个符号活动,还在于符号活动的对话性。克兰珀似乎没能意识到第二点。符号矩阵所代表的对话过程和"如果……就"的符号活动、假设形成、想法链以及托尔·冯·乌克斯库尔所说的功能圈相似。在克兰珀的文章里,符号矩阵展示了对话;两个正方形代表了对话的双方——也就是发送者和接收者——并且每个正方形中都有代表自己的解释项的菱形。尽管有这一不同,对话的这个图表解释和笔者用于解释其他类型的符号活动之图表是一致的。比方说,在"如果……就"的符号活动模型中,就有两个不同的解释项:这一关系中的前提,和单独的想法链的论证结论。

8.1.6. 对话和"功能圈"

乌克斯库尔提出的"功能圈"概念是符号活动的模型。它同样具有对话结构,并且包含了"如果……就"的推论过程,这一过程甚至可以发生在初级的层面上,如在巴甫洛夫制约的符号活动中或者是在认知推论(这一过程含有一个"准思维"的解释者)的符号活动之原型中。

在"功能圈"中,由"对象连接结构"产生的解释对象变成了解释结果(由生命体中的信号处理表征),并被转化成了行为处理。这一行为处理引发了"连接结构"中的行为。乌克斯库尔并没有运用对话结构;但在他描述的"功能圈"中,在被解释项(解释对象)和解释项(由另一解释项解释得来,以此类推)之间仍然存在对话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不是只是为了和被解释项保持一致,而是和它建立了互动性的关联。　350

反过来也是一样:"功能圈"具有对话结构;另外,严格意义上的、交流中的对话也可以根据功能圈来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想要就对象的某一方面进行交流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他们之间的对话关系可以被视为功能圈模型的体现。这里提到的对话类型,相当于功能圈模型所描述的过程——就像乌克斯库尔所展示的那样——它不是在信息(或表意)符号活动中,也不在表征符号活动中,而是在交流

符号活动中。在对话过程中，在被解释项解释为一个符号之前，被解释项就已经是发送给某人的一个解释性的反应，而接收者将识别和接收必需的、作为应答性解释的解释项。

在温弗里德·诺特1990年出版的《符号学手册》一书中（Nöth，1990）并没有“对话”这一条目；但是，在该书的“主题与术语索引”中可以找到“对话”一词，根据上面的提示，我们知道书中第三部分的章节“交流和符号活动”中提到过这个术语。同时，该章也提到了功能圈（参见同上：176—180）。这就在交流和对话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指向了乌克斯库尔在生物符号学中提出的功能圈这一概念。书中讨论了不同的交流模型和生物模型（如温贝托·马图拉纳、弗朗斯西斯科·J.瓦雷拉和托尔·冯·乌克斯库尔所提出的模型）——后者将交流描述为一个自我指涉、自我再生、封闭的符号系统——在根本上与线性范式（克劳德·香农和瓦伦·韦弗的观点）和循环范式（索绪尔的观点）有何不同。正如诺特指出的那样，托尔·冯·乌克斯库尔说明了，他的祖父在生物符号学中提出的功能圈概念具有自足的特点，它仅仅通过自身解释的需要来对环境做出反应。

只有当我们同意对话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概念时，自我再生系统的理论才和对话性相矛盾：这个概念的基础认为交流是个从发出者到接收者的线性的、随机的过程；或者认为对话模型受“共同循环”的规律支配。此外，自我再生系统还要求更新创造性这一概念，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自足的规则如何终止与作为个体的内在结构被感知的对话相适应，因而终止了与创造性和学习的相容？就像马图拉纳所说的那样（Maturana，1978：54—55），对话性的交换——它不同于将交流理解为从发出者到接收者的线性过程的看法，也不同于认为交流是参与者轮流充当发出者和接收者的循环过程的观点——应当被视为“前交流的或者反交流的互动”。

351

8.1.7. 对话性和生物符号活动

关于巴赫金“对话性”的概念，我们已经讨论过，在他的观念中（见本书3.1.4），对话并非信息的传播，也不是自我主动发起的；相反，自我一直和他者——也就是世界和他人——处于对话之中，不管自我本身是否对此有所意识，它始终在和他人的话语进行对话。身份是对话性的。对话性就是自我的中心。自我，也就是“符号自我”（参见Sebeok，Petrilli，与Ponzio，2001），从它以物种特有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世界进行建模这一点上来说，其本身就是对话性的。自我对话性地暗含在他性中，就如“怪诞身体”（Bakhtin，1965）暗含在其他生物的身体之中。事实上，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和身体交互性是交织在一起的：对话不可能存在于无实体的心灵之间，仅从生物符号学的符号观念出发也不可能理解对话性。

我们已经讨论过，那些最重要的对巴赫金著作的翻译者，如迈克尔·霍尔奎斯特、茨维坦·托多罗夫、弗拉基米尔·克里辛斯基和雷内·韦勒克，都从根本上误读了巴赫金和他的对话概念。这一点在他们对对话理论的解释中得到了印证，对话理论被当作和柏拉图、马丁·布伯、穆卡罗夫斯基和其他理论家的对话观念相近的理论。

对巴赫金而言，对话是身体——幻觉上的，仅仅是个人的、单独的、自主的身体——和其他身体之关系的内在表现。最能充分体现这一观念的形象是流行文化中的、公共场合粗俗语言中的，尤其是狂欢面具下的"怪诞身体"。身体处在和世界、和其他身体的重要而牢不可破的关系中。随着关注的焦点从同一性（不论是在意识或自我中的个体，还是群体、历史语言、文化系统中的集体）转向异质性，巴赫金的对话批评理论质问了西方哲学的普遍倾向，以及产生这一倾向的文化趋势，从而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 352

巴赫金引发的和自我、身份以及意识相关的"哥白尼革命"不仅涉及人类，还涉及了其他所有生物。意识本身就暗含了对话关系，它包括观察和判断。这种对话关系不仅仅只严格地存在于人类世界，也存在于生物的世界。巴赫金写道：

> 当意识出现在世界（存在）上的时候，也许是当生命出现的时候（也许不仅仅是动物，树木和青草也会观察和判断），世界（存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头仍然是石头，太阳也还是太阳，但作为（未完成的）整体的存在完全不同了，因为在地球的存在中有全新的重要之物——观察和判断——诞生了。太阳在物质特性上还是和以前一样，但它变得不同了，因为它开始被观察和判断所认知。它不再只是单独的存在，而是存在于自我之中，也为自我和他者存在，因为它反映在他者的意识之中。（见巴赫金 1970—1971 年间的笔记，收录于 Bakhtin，1986：137）

8.1.8. 巴赫金对话观念和"宏观经验"的生物学基础

巴赫金所说的对话，不是主体之间相互态度的结果，而是一种表现：在生物符号学的意义上，生命体不可能对所在的环境采取封闭或漠视的态度，它和环境共同形成了一个系统，用巴赫金的术语来说，就是建构。对人类而言，建构就是"应答性的建构"，是"应分的世界存在"的符号意识。它可以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单独的个体、家庭、职业或工作、伦理或宗教群体、某种文化或同时代的有限的生活环境之内——或者，与之相反，作为"总体符号"秩序（西比奥克的术语）的意识，它可以延伸至整个星球、太阳系甚至宇宙维度的世界（如维尔比所说）。巴赫金区分了"微观经验"和"宏观经验"。前者是一种狭隘的经验。

353 与之相反，

> 在宏观经验中，世界和它自己并不一致（它不是它已有的样子），它不是封闭的、完成的。记忆漂浮在其间，逐渐溶入带有人类之深度的物质中，溶入无尽的生命、世界和原子的经验中。由于有这样的记忆存在，一个单独个体的历史在它的认知开始之前很久就已经展开了。（巴赫金1950年的笔记，收录于Bakhtin，1996：99）

我们不能忘了，巴赫金在1926年写了题为《现代活力论》的文章，其中就讨论了生物和哲学问题。这篇文章的署名是生物学家伊万诺夫·I. 卡纳耶夫（参见1926），它是重建巴赫金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它反映了巴赫金早期对生物学的兴趣，因为生物学与符号研究相关。

这篇文章是在巴赫金最为狂热的那几年写成的（详见本书3.1.5），也就是1924到1929年他住在圣彼得堡（后改名为列宁格勒）期间。这段时间他著述甚丰，出版了四本研究主题各不相同的专著（分别是研究弗洛伊德、俄国的形式主义、语言哲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但只有最后一部书由他自己署名，其他几本书（和一些文章）都是由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署名的。

在圣彼得堡，巴赫金在卡纳耶夫的公寓里住了几年。卡纳耶夫激发了他对生物学和哲学家阿列克塞·A. 尤克托姆斯基的著作的兴趣，后者对他的小说"时空体"（chronotope）概念影响颇深。在巴赫金讨论活力论的文章里，也提到了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

在《现代活力论》一文里，巴赫金对活力论——也就是认为生命过程建立在基础外的动力之上的观念——进行了批评。他对生物学家汉斯·德里施的批评比任何其他论述都要有针对性，后者将有机体的体内平衡解释为个体之于环境的完全独立。巴赫金在描述有机体和环境的互动时，反对生命动力和物理—化学过程的二元论，认为有机体和周围世界一起构成了一个一元的整体。身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对话性的，身体以建模世界的方式来对环境做出反应。

8.1.9. 拉伯雷的世界：世界的生物符号意识

要想充分理解巴赫金所阐述的"狂欢"的范畴，以及"狂欢"在他对拉伯雷的研究中起到的作用，就必须结合他对符号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的总体观点（"宏354 观经验"）和生物符号学观的语境来进行考察。

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论著原有的标题——《弗朗索瓦·拉伯雷的著作和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文化》——一方面强调了拉伯雷著作之间的复杂关

系,另一方面强调了世界观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发展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过程中,是如何受到流行文化(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而复杂化的。在西欧,这种文化的发展最终走向了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身体构想为孤立的、互不相关的存在。照此理解,身体与身体之间只有两个相同点:第一,它们的价值都被同一标准所衡量,这个价值就是它们的工作能力;第二,它们都对商品的流通感兴趣,包括工作在内,其最终结果是满足个体的需求。这种意识形态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得到了延续,这也正好是巴赫金写作此文的时期:在这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整个阶段中,只有工作和生产的能力被视为共同体的因素;换句话说,工作和生产力是仅有的维系个体和他人关系的因素。因此,在这个最小公分母之外,个人的身体与他人毫不相关、互相隔绝。

狂欢参与了"宏观经验",为身体和符号复杂而微妙的生命提供了总体性的视角。巴赫金的看法强调了重要的身体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它展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如何与其他人的生命交融。在现有的能被称之为"宗教"(从拉丁词 religo 发展而来)的观点来看,这个概念之重点在于将所有生命彼此相连。此外,它还强调了多余的情况——身体对某一具体功能而言的多余,以及符号对某一具体意义而言的多余。符号和身体——身体作为生命的符号——都终结在自我之中。与之相反的是微观的、更为近代的意识形态传统,它被还原性的二元论所损害,将个人与社会对立,生物与文化对立,精神与身体对立,物理—化学动力与生命动力对立,诙谐与严肃对立,死亡与生命对立,高与低对立,正式与非正式对立,公众与私人对立,工作与艺术对立,工作与非正式的欢庆对立。巴赫金在拉伯雷的著作中发掘出了大传统,并且批评了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变体所固有的、对个人身体和生命微观的、更为近代的观念。如同巴赫金在对自己 1929 年写作的此书的第二版(完成于 1963 年)中呈现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大传统在世界观上是保持一致的。 355

自我不可能脱离记忆存在,在结构上,自我对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而言都是他者。我们这里所说的记忆,是即时的生物符号的"宏观经验"(在时间和空间上),它和人类身体经历的其他记忆之间有着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古老文化和狂欢的艺术中,而在我们的时代,"宏观经验"的感知却被狭隘的、还原性的"微观"经验所麻痹。

结论:在对符号活动的研究中,建模和对话性都是重要的概念。交流仅仅是一种符号活动——另外还有信息或表意符号活动、表征符号活动——建模和对话性的符号活动是它们的预设条件。如果我们首先将符号认为是一个解释项,这一概念就非常清楚,这也和皮尔斯的观点一致,他用"解释"改写了"替代"这一经

典概念——也就是说,符号是一个由特定类型的建模所预见到的对话反应。

8.2. 身份、他性及作为建模工具的原始义

8.2.1. 原始义,或者说母义

在维尔比未能发表的一系列手稿——包括1904到1910年间所写的"小短文"、笔记和信件——里,她提出了一个原创的、意味深远的概念:"母义"(她后来将其称为"原始义")。在她对表意能力的形成和世界观的建构的设想中,这一概念非常重要(见本书1.3.4)。

"母义"一词是维尔比在1890年左右提出的,之后她用"原始义"及其变体"初始义"代替了该词。然而,直到她讨论了弗朗西斯·高尔顿"研究改善和最优化人类的先天素质的影响因素"的优生学之后,这一概念才发展成熟。她的这两篇论文一篇于1904年5月16日在社会学研究协会组织的会议上得以宣读,另一篇则是在1905年2月在同会议上被宣读(参见Welby,1905、1906)。

维尔比区别了"母义"和"父义",但这两个词在性别意义上都是中立的;母义

356 并不为女性专有,而父义也不是男性的特权。

母义指的是通过感觉和感知来获取知识的宽广能力。但它不为女性所专有,是人类特有的能力。由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它通常是由儿童的主要看护人进行传递的。所谓的"父义",则是指以陈述和辩论为主要形式的知识和抽象思维,通过观察数据和科学、逻辑实验得到的概括能力。传统上它由男性来传递,但并不是男性专属的。通过思维(sapio)和感知(scio)的双重意识,就能理解母义。意义早就感知到抽象思维的存在,而且可以说,它是由抽象思维必须服务的对象"调节"的。抽象思维所试图发现的,身体早已感知了。事实上,科学研究范畴内的抽象思维必须有母义的滋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培养辩论和批判能力的前提。

从今天所说的"差异中的对话关系"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维尔比并没有在意义的概念基础上为两性建立纯粹的分野。"母义"或"母性"不能与"女性"和"女子气"混同——也就是说,这些名词的意义并不和"女人"等同。对于性别身份来说,母义或者说母性的概念作为感知、表意和批评的能力是先验性的;它象征着两性都有的一种特质——事实上,它也包含了男性气质,而"父性"则不包括女性气质。母义和母性在女性的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但并非她们独有。男性气质、抽象思维和女性气质、意识(母义)都是智力的来源,它们共存于每个个体之中——至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潜质。因此,"母性"并非一定就是心理意义上的,尽管后者是它可能的表现之一。

由于进化论在当时的流行——加之维尔比的批判态度——她颠覆了《圣经》故事，宣称女性代表了生产的力量和延续法则，而男性则引入了变化法则。照此而言，较之于男性，女性更能全面地象征人类本身。维尔比相信每个人，无论男女，如果缺乏或者否认母性的成分或者“母义”，都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在未发表的文章《男人的母性》中，维尔比进而详细解释道，母亲中的女性特质是被动的、同化的，而她所包含的男女同体是异化的，是发展的主动来源。作为一位母 357 亲，女性在结构上与男性合一，男性与女性的成分在其间相互联结：“人是个整体性的词语，它意味着人类。”母义是分析性的，也是综合性的；它意味着在质性与量性上认知发展的能力，并与改变态度和观点、完成认知飞跃的能力有关。“计算可以得出有用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对质性的感知和判断，它只能为事实提供一个描述。”从这一点而言，男性和女性的主体并非分裂的、单独的因子；相反，它们在原有的辩证的对话关系中得到了恢复。双方都有获得开放的、连续的螺旋型发展的潜力，而不是循环的、毫无创造性可言的自我重复。进一步说，多亏了它们彼此敞开，向互动性和相互关联性敞开，就人类在认知能力之外的表意实践的伦理维度而言，母义才成为了可能的发展之前提所在。

维尔比还把意义定义为“本能的宗教”知识，在这里，“宗教”的意思是“感受到与太阳相连的意识”。她指的是对相关性的普遍意义，尤其是女性体会到的这种普遍意义，指的是超越性的普遍能力，以及朝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的普遍倾向：这个世界是由人类和地球之外的其他起源和关系形成的，在我们的术语中，它最终朝向能够被“对话的他者”逻辑描述的所在。人类在其间是唯一拥有母义的生灵。如维尔比所说，母义并不意味着拟人论，它一方面指向（更广泛的）有机形态论，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宇宙形态论。

8.2.2. 原始义、建模和创造力

在母义、原始义或者说初始义的概念所暗示的表意过程中，有几个方面可以放在西比奥克理论中的“语言”或“建模工具”的语境中来进行理解和推进。

“第一建模系统”被描述为所有物种都具有的、本能的建模工具。在这一与生俱来的建模能力基础上，所有的物种都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对世界进行建模。西比奥克认为人类所特有的第一建模系统就是“语言”，他和言语不同，且先于言语产生。在还不会说话的原始人类身上就存在着这样的建模系统，它标志着整 358 个进化过程中的新起点，导致了智人的产生（参见 Posner 等，1997—2004，1：art. 18，§5 和 §6；亦见 Sebeok，1986、1991a、1991b；Sebeok 与 Danesi，2000）。人类的第一建模系统，也就是语言，和维尔比所说的母义非常相似，它是获得知识以及在构成人类行为的各种符号系统中交流的前提，这些符号系统包括了文字符

号和非文字符号。说到“语言”和“建模系统”,另一个需要提出的术语是“书写”（writing）——同样的道理,书写是先于字母和文字产生的（参见 Ponzio，1994a：63—66；亦见本书 8.3 和 9.1）。

“第二建模系统”现在部分地被重新定义为“第三建模系统”（参见 Sebeok，1991b：58），它和为人类文化固有的推导表意行为特征一起——这一表意行为包括了“言语”在内,言语是为了广泛的抽象思维工作和传播而专门产生的——共同地假定了“第一建模系统”的存在,西比奥克称之为“语言”,而维尔比称之为“母义”或“原始义”。第二和第三建模系统也和母义相关,它们建立在第一建模系统之上,与后者相互关联;它们是人类符号学领域内最高层次上的创造性建模能力。在这种相互关联中,人类有潜力生产出无数可供选择的世界观,这和其他动物完全不同。

作为一种建模能力,母义是以对话的他性逻辑和创造力为导向的;进一步说,它是在无限可能的论述与表意过程中创造出无数新世界的前提所在。作为被陈述、表征和认知的现实,人类推导出的世界是原始义的投射、解释和发展,同时也是它的简化。

费尔迪南·席勒在 1907 年 10 月 2 日写给维尔比的信中建议她用“共有意义”（common sense）一词代替“母义”,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解释时的过分简化和可能的误解,比如说可能有人会认为她的理论构想将男性排除在外:

359

> 但是,为什么你不把母义一词和共有意义等同起来,并(主要)使用后面这个名词呢?这个词实际上代表了你的意思——它意味着比圣人更聪明的“普通人”的智慧,在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程中随处可见,但在现有的逻辑术语中却鲜有提及,更不用说得到充分的论述。它不是某位创始人创造出来的,它是我们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基础,就这两点而言,它确实是“共有”的;从它所生产出敏锐的逻辑洞察力而言,它又是有“母性”特点的。我相信,只要女性在事务管理上得到自由,她们普遍是和这种力量具有紧密联系的,尽管她们看起来往往轻薄而愚蠢;举例来说,她们的“母性本能”的意愿(尽管她们的外表和这一意愿看起来相反)可以战胜“种族自杀”的诱惑。因此,你完全有理由把它称之为“共有意义”或“母义”,但前者被使用得越多,对男性读者而言就越容易理解。(Schiller，见 Welby，1985a：ccxlvi—ccxlvii)

无论如何,席勒都误解了维尔比的意思。比方说,当他坚持认为要解释直觉并不就等于要否认逻辑,以至于将它重写时,他认为自己和维尔比的看法有所不同,而事实上维尔比的看法和他一致。

维尔比回复席勒说，尽管“母义”和“共有意义”在某些方面有重合之处，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她还是决定避免使用“共有”这个词，因为它会引起负面的、简化的联想。同时，她同意席勒的看法，认为就她提出的这一术语而言，“母性”一词的使用确实有可能会窄化对其的理解——比方说，将其限定在了生命或者生物的范畴之内。

本书在之前已经说明，“母义”或“原始义”的概念指的是原始的表意材料（signifying material），是先于性别产生的原始的、性前的表意材料，两性主体在其中得以联合。通过这一概念，维尔比促使我们思考所有人类所固有的母性特质，她将其描述为抽象思维和逻辑能力的前提和先在，后两者是由它产生的。在施米茨为她编撰的文集《表意学与语言》中有一篇注明写于1908年6月30日的文章，维尔比写道：

> （经过深思熟虑）我把“母义”一词换成“原始义”（和它的变体“初始义”），显示了我们由于忽视表意学而所造成的困难。因为在我提供的语境中，人们应该马上明白，母义的意思不可能主要是指实际意义或生命意义中，对“母亲”一词之典型含义的精明的、实际的看法。
>
> 我自然指的是原始的、最初的、天生的意义，它被需求所滋养，能激起危险和兴趣。“母性”实际上或者应该是个宽泛的、普遍的词语，而“父性”一词的意思是专有的。性前的生命是母性的，它包含了父性的成分在内。我们已经认可了对母体（Matrix）一词在哲学和科学上的使用。我们从不使用父体（Patrix）一词，这很正确。刺激能确保“母性”去感知、发展和滋养新的生命。（Welby，1985a：ccxliii）

360

类似于语言——它在西比奥克沿着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脉络建立的理论中被称之为第一建模系统——种族的、原始的意义，或者说母义（维尔比还打算从母体一词出发称其为“母体”意识）从本体论和进化史上来说都是人类进化的前提条件，因此，它也是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社会实践发展的前提。

然而，好的观念和意图在发展中也会受到扭曲。优生学的例子就是明证，它所展开的一系列命题至少是让人性蒙羞的。整个20世纪，想要研究“如何将人类天生的素质改善和发展到最优化”的想法通过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得以表达，甚至到了进行种族清洗的地步，直到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可以看到这种想法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不同方式的实施。它足以唤起我们对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以及近来在巴尔干半岛、库尔德斯坦和卢旺达的种族清洗运动。我们必须牢记，纳粹的理论家在优生学运动中也能找到为他们的政策辩护的正当理由，而优生学在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相当繁荣的。

"种族义"、"种族母性"、"母义",在维尔比的理论中,它们是男性和女性共有的一种意识形式,是"人性普遍的遗产",并且常常通过一系列的看似陈词滥调的术语来得以表征:"直觉"、"判断"和"智慧"。它的初级形态可追溯到维尔比所说的"内意义"(in-sense)或者"前意义"(pre-sense)。但是,在历史—文化的视域中可以看到,它主要是通过女性传给下一代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照料和养育下一代的社会实践是通过母亲和妻子来履行的。这种社会实践是受相互给予和反应的逻辑、相互关照的逻辑所引导的。但是,在文明社会的人为条件下,"母义"或"种族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压抑:母亲的形象被压倒在儿子的暴力之下。361 事实上,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女性常常受到她自身的创造——男性——的虐待和伤害,尽管她们的角色和社会责任是如此重要。即使如此,考虑到女性在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所特别具有的种族义——人性所普遍具有的种族母义,维尔比指出,女性因此对恢复古老的智慧、对批评和创造都担负着特殊的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她强调了女性在言语或口头语发展中,以及象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她甚至为自己设定了任务,要展现女性特别的、和男性不同的智力活动。然而,矛盾的是,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由于那些至少可以说是削弱了整体的人性的实践,女性一直处于被抑制、被压迫的地位。

如维尔比所说,人类的历史处于不断偏移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失去母义并因此失去洞察力、批评能力的历史——失去母义是最严重的偏离,这使得我们只好满足于现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发展和完善人性,就需要一种永不满足的状态:"如今我们所有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趋于满足……满足于事物的现状。然而,我们所有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对它感到不满。"

在母义和种族母性的概念基础上,维尔比着手恢复人类智力批评和创造的能力,也就是创造性解释、翻译、转换、预言和创新的能力。母义因此也强调对社会、道德和宗教传统进行批评的需要,未来的目标在于改善实在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

下文摘自维尔比对席勒1907年10月2日的来信的回复,这一回复写成的日期没有标明:

> (A)母义从未"渴望"过任何"最钟爱的假说"(pet hypothesis):如果曾经有过,你我就不会存在,人类早就灭绝了。不,它采用一个又一个假说,相较于其他假说,它毫不让步地用仔细的审查严格地对待它所"喜爱"的那一种说法。母义的拥有者和她的后代的生命正是有赖于这种怀疑和测试的本能。这就是绝对的母义——智力上危险的本能——它在你、杜威、皮尔斯

和詹姆斯身上唤起了实用主义。家庭或部落的孩童面临着原始的危险,对这种危险符号的敏锐意识直接派生了实用主义,而这种意识则是由相对而言的弱者所保留的。但实用主义学家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可能在用一种谬论或过度使用的方法论与另一种或许与之相反的谬论进行交换。 362

(B)是的,所有的半词——尽管有些看起来像是个完整的单词——都是不完全的。它们在一开始就不自觉地让你陷入了二元论。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处于主宰地位的男性和他们专横的智力长久以来践踏着自身的起源:在托儿所(天哪,现在连这个地方也不保了)以外进行的任何活动都男性化了:语言,这一原本是女性用来看护她们的营地、创造她们的事业和训练下一代的第一个工具,现在被认为是"男性"的:整套社会规则已经被制定出来,女性被规定只能遵守男性的规定。比方说,谁曾经想到过和女性商量一下,讨论婚姻法的改革呢?毕竟这只会是徒劳无功的:你摆脱了一切束缚,除了那加诸于她们的、毫无逻辑可言的偏见和她们在感情上的主张,这些东西促使她们渴望着预设某种最偏爱的假说,或者依附于僵死的教条,仿佛它们还有着生命力。她们是阻碍特权思维的最后的难民。

轻薄和荒唐!除了这两个词,还有哪些词是用来形容那些"意志坚强"的女性,把她们视作可憎可恶的象征呢?当人类受压抑的能力得以在我们女性身上"涌现"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或许不是像现在一样总是夭折和有缺陷呢?

现在的"大学"和"技术"培训模式至多让女人成为二等或者三等的男人:她更多地失去了她所剩无多的人类天分——她用于解释、解决问题,建议和纠正错误的天然的、弥补的力量。再来看看她创造力的繁盛吧,比如说编织。女性当然是最早的编织者。看看编织针、钩针、梭子和缝补针的逻辑和算术。看看那些古老的蕾丝和刺绣。我自己就曾经"发明"过仅仅用一根钩针和一根缝补针就可以织就的复杂图案。现在没有一位男性看到女性在这方面的天分之重要,并把它运用到他的发明中去,或者用来训练他的学生。实际上,只有水手和渔夫才懂得编织的工作。

母义是"共有"的,这在我看来是一个自明之理。它当然是共有的。只不过,共有一词有不同的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着可鄙和"不洁";另一方面,洛布的向性理论(tropism)也是共有的!我所说的原始的、创造性的、能再生的、解释性的母义,对整个生命范围来说都是共有的,它超越了生命,并且是生命的深层动力。(Welby,1985a:ccxlix—ccl) 363

8.2.3. 原始义、他性和批评

在题为“原始义和表意学”的一文中(该文写于1907年,原标题为“母义和表意学”,首次发表是在出版于1985年的《表意学与语言》一书中),维尔比指出,母义、原始义和种族义是感知与意义产生的源泉,解释和发明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洞察符号与生命多重意义的能力都是由此而来。它是批评意识的最终来源。

维尔比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已有的象征秩序和有重要价值的认知方法,相反,她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在表意学的宗旨下——她选择用“表意学”一词为她的符号和意义理论命名——她将原始义描述为我们在使用逻辑、认知工具和解释模型时的既成习惯提供建设性批评的来源。

在该文中,维尔比称“原始义”为“意义之母”,认为它是理解性的、同源的能力,是做出反应和调整的生理和心理力量,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知识的生命形式。正因为如此,它还得以成为理性思维的来源,我们能借此生发出批评和建设的能力。接下来,文章谈到了表意学的任务:

> 不仅仅是批评,还要推导和建构原始义的主题,它提出的警告,它的洞见和远见,它的启示、对价值的敏锐诠释,以及它对现实的深刻认识。
>
> 只有在这一点上,在这一刻,表意学的位置和工作才得以确立:它是母义的持续“给予”和智力(在所有意义上的)持续“建构”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不是被当做解释交流的一个媒介而已。(Welby,1985a:ccxxxix)

维尔比强调了恢复智力的理性层面和原始义之间的关联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理解价值观、意义和一切经验的重要性的前提。事实上,维尔比赋予表意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恢复母义的恒定主题和智力的持续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解释的关系。原始义为我们提供了“觉察性和解释性的即时意识”的材料,从进化的视角来说,它代表了“动物本能在价值上的更高阶段”。从生物符号学的角度而言,它可以被视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新起点,它导致了智人的出现。原始义是“原始的,也是普遍的”,它以不同的程度存在于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中(同上:ccxxxviii);同样地,它在表意过程的前后都具有重要性。原始义既关注真实,因为它是人类实践的一部分;也关注理想,因为它是人性渴望不断自我进步和完善的前提。

364

一旦我们认识到了原始义和理性行为之间的关联,我们就有可能恢复孩童时期所拥有的符号切适性(symbolic pertinence)。维尔比认为,孩童总是喜欢进行调查,这是成人的一种可能的认知模式。不可避免地,这一批评性的工作需要由

语言来进行调节，要通过文字或非文字语言的严格意义以及人类用于表意和交流的各种符号系统才能被理解。因此，和维尔比对语言（维尔比表意学的中心议题）的批评一致的看法是：语言必须保持完美的秩序。她确定了语言和意识之间不可分割的一致关系：它们都与原始义紧密相连，这一点强调了发展“批评性的语言学意识”的重要性，也就是让语言的使用不至于影响“回应理解”（这是巴赫金的术语，见他的论文《对话和批评理解》）这一敏锐的人类能力。

皮尔斯认为逻辑是“思维的伦理”。维尔比用原始义的概念回应了这一点，将其描述为通往认知之外的伦理维度的路径。维尔比于 1909 年 1 月 21 日写给皮尔斯的信颇为有趣，她在信中再次提到了她对“significs”（而不是皮尔斯用来称呼符号学的“semeiotic”一词）的偏好，意在用这个词来命名她的符号和意义理论：

> 当然我完全能够理解，较之于我想要广泛推广的表意学（Significs）一词，“Semeiotic”更具有科学和哲学的形式。但对于我没有接受你提出的符号学（Semeiotic）概念——它更为抽象、在逻辑上更深奥、哲学意味更为深远——我觉得你不必失望。我当然同意你对逻辑推论的观点，也赞同在词语最深广、最高级的意义上来说，逻辑是道德的运用。这和原始义的见证完全一致。唉，比起道德这个词来（除了宗教以外），没有任何词语比其被当作是无意义之时更加危险。（Hardwick，1977：91）

365

表意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完全恢复逻辑和原始义这一意识的母体之间的联系，恢复它们之间相互的依赖和赋权。这就意味着要唤起在所有表意反应（从本能的生物反应到表意的层面）中的共有意义。通过恢复逻辑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以及从“表意”的角度——或者说，用我们更喜欢的一个词，从“符号学”（或者“终极符号学”；参见 Petrilli，1998a、1998e；以及本书第十二章）的角度恢复意识和价值的联系，表意学理论阐述了将逻辑延伸出严格的认知论界限的可能，并把它和人类的追求、生命的有机层面，以及表意过程的伦理和审美维度相联结。

8.2.4. 身份、原始义和爱的逻辑

从爱的演化论（agapastic theory of evolution）[1] 的角度而言，皮尔斯认为由爱的逻辑和他性产生的演化结果是以对具体之物（比如说，爱你的“邻居”）的爱为

1　皮尔斯提出三种演化论：“随机变异演化”（tychasm or evolution by fortuitous variation）、“机械的必然演化”（anancasm or evolution by mechanical necessity）和“爱的演化”（agapasm or evolution by creative love）。见 Charles Sanders Peirce，“Evolutionary Love”，1893：176—200。

导向的，也就是说，尽管有着空间的距离，它还是以密切关系和相似性为导向（参见“Evolutionary Love”，1893，CP 6.287—6.317）。维尔比的研究独立于皮尔斯的这一理论，它也指出了与具体对象的关系中的爱和他性的概念，但维尔比同时批评了“模糊而空洞的抽象化”倾向，例如对“未来”这一概念的错误使用。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皮尔斯的方法和维尔比讨论思维及主体性时使用的方法，就会发现他们的立场相近，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独立的。让我们用维尔比的观点来读一下皮尔斯的《逻辑与唯心论》（1905，CP 6.557—6.587）一文中论及思维中的“模糊部分”、直觉和意识支配的行为以及“母智慧”（mother-wit）的文字：

> 无数的事实使我们确信，受注意力和控制力支配的生动记忆，在任何时候，都是和我们心灵活动的碎片相连接的。我们要列出三点陈述，这和现有的目的无关，这些陈述也并不是有详尽解释的精确表达。（1）思维中的主要部分是模糊的。（2）它的运作比其余部分更加精确无误。（3）它在感性上的精确度几乎是无限的。除了对数学和测量这种机械过程的反应之外，人具有完全意识的推论是不具备量性的精密度的，它们常常会成为彻底的错误。但是“母智慧”所作出的无意识的或者半意识、未经考虑的判断，就像野兽的本能判断一样，能用反常的精确性回答“多少”的问题，而且很少是全错的。（CP 6.569）

366

在维尔比未发表的手稿中，有一部标为《主体性》的文件，收录了她在1903至1910年间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从“我”（I）和“自我”（self）之间复杂的链接关系出发讨论了主体性问题。主体在对话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身份是被这些关系所模式化的，是多元、多面、多音的身份。维尔比称之为“我”——或者，引入一个新词：我（Ident）——的，是在和“自我”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多个“自我”构成了“我”的多重面具。因此，在维尔比的讨论中，他性无疑是建构主体性的前提。

为了说清“我”与“自我”的关系，维尔比解释道：“‘自我’是包含在‘我’之内的，而不是相反……人类个体有不同的‘自我’，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我’。”（见未发表的论文《我与自我》，该文写成的日期没有标注）“自我”是“我”的表征，是它的一部分，是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是存在；而“我”是我们的存在，而不是拥有。“我”的“自我”属于他者，正如“属我的”为我所有（但并不与我一致）。维尔比试图通过对主体性建构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来表达这一概念，她使用了“人”（person）这个词的古老意思，用它来表示演员的面具。“我”是和“母义”、和母体相关的，而“自我”或者面具，是它可能表现的一种实现——或者我们可以

用维尔比的话来说，是它的“表征”。

维尔比在那几年间所做的科学研究中，将存在描述为一种动态的、生产性的概念，与之相同的是，她认为“我”是一种能量，是在“自我”中展示自己的主要行动者，它为“自我”——我们那多面而短暂的“自我”——赋予能量。和身体一样，“自我”——维尔比将它称作蜉蝣——是终有一死的、短暂的。相反，“我”超越了身体和“自我”的肉身，获得了不朽。“我”超越了交换和占有的逻辑，意味着给予这一行为。在维尔比看来，我意味着人类身份的一部分——主体的他性或符号物质性——在持续的改变中，它是抵抗性的他者，它的节奏打乱了多个自我的延续、叠加、繁殖和共存。在这种方式中形成的身份不仅仅是个体；它是具有逻辑价值的多余，在这里逻辑不仅仅是演绎和推理，还包括创造性的试推逻辑。在《我与自我》一文中（1907），维尔比解释说： 367

> “我”实际上是个复数，因为它属于这个宇宙的创造因子，它是概念的能量之源的一部分，既是生产性的，也是复制性和进化性的。因此，“我”和积极的因素、和“行为者”是一体的，后者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各种人和角色之间进行无穷的转换，同时保持着坚固的“自我”和无穷的再现性。（1907年11月23日）

在维尔比看来，“自我”并不和“我”一致，而是它的表征之一，是它的一次出演、一种方式、工具或是形式，而不是终点（亦见1907年7月7日的邮件）。因此，与那种提升自己的倾向相反——这种倾向意图在“自我”和“我”之间建立替代、篡夺、认同的关系——从构成我的多个“自我”之间的，也就是某人的“自我”和“我”之间的对话他性关系中产生了身份。人的同一性是“自我”和“我”之间由对话的疏离和差别产生的进行性、生产性和变化的结果。这种将人类意识视为生产性概念的看法使我们想起了皮尔斯，他在讨论思想和主体的关系时指出，就如身体是在运动中而运动并非存在于身体中那样，我们也应该说：是我们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不是思想存在于我们之中。（参见CP 5.289n.1）

皮尔斯认为“对自己的爱并不是爱”（CP 6.288），与此相似，维尔比也提出，“终极的‘罪’在于，我们沉迷于对满足、愉悦、舒适的要求中，追求它们的保障：以人性的代价去换取对福利的贪欲”（引自“Who ARE we and what HAVE we”，1910年4月9日）。换句话说，它允许自我将自我性转变成了自私。尽管这种自我的向心力作用对“此在的自我保存”和“此刻的生存”是必须的，这种单一的朝向却击败了演化发展，产生了“利己主义的自私”（self-regarding selfishness）。事实上，正如维尔比所说的，“然而，严格说来，自我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不能爱上或

者集中于自我，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自我’就是‘我’的辐射，是意识、生命和行为；这里我们批判的是利己主义，而并非自我主义”（《我与自我》，写于 1907 年 11 月 23 日）。

368

维尔比认为，享乐主义的道德观——在她看来，当今的主流道德观正好与之一致——暗含着将多重意义的宇宙还原为地球自我中心的纯粹附属状态。因此，它意味着要在自我之表现压倒自我的关系中还原二者之间的差别，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单一身份。相反地，她指出：

> “我”的“自我”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前者服务，两者共同产生、了解、熟知、美化和服务于实际的和可能的世界；我们的“自我”的使命是在差别中掌控身份的世界…… “我”是一中之众，也是众中之一。它的名字一开始是多元的，如“我们”；之后是复杂的，如“我”。它拥有一个或多个“自我”，并通过它们来进行工作。（《我与自我》，1910 年 1 月 19 日）

8.2.5. 作为他性、身体交互性的“我”和对话性

我们已经说过，主体的身份是在对话关系的参与中渐渐浮现的，通过“我”和“自我”之间的关系，被建模成为多元、多面、多音的身份。

“我”是多个自我之表现的生产中心，同时，在我们的“自我”中都存在着多元性。从个体发生的层面上来看，它和母义的系统发生是一致的，是所有反应和心理能力形式的生产源泉，不管这些能力是分析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它们使得人们不仅仅是能够反应，还能够创造。自我是“我”的表现，是它的发言人；它是多元的“我”运行和操作的方式和工具。尽管我们不能区分出不同的“我”，但我们不会混淆“我”和“自我”。要成为力量产生的内核——尽管不是原创性的——就意味着要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价值和表意的潜力既是个体发生的，也是系统发生的。如维尔比指出的那样，每个人对“我 / 我们 / 你们 / 他们”这一系列指称的称呼体现出我们对宇宙秩序的感知，体现出我们精神创造潜力的感知、对价值和现实的感知，以及在此之前又在此之上的，对符号及其重要性——自然的和意图性的重要性——的感知，也就是对意义的感知（《我与自我》，1910 年 1 月 19 日）。维尔比呼吁人们注意主体变化性的、生产性的本质，这和她所在的时代的科学进步是相符合的：“我认为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大的不幸就是他等同于他的自我（除了在反身的关系中，也就是说，他和他的自我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时）……就像我们从来不是他者一样，我们也从来不是自我。我们只是拥有这两者。”维尔比毫不犹豫地声称自己对“自我”和“我”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科学的”：“‘自我’是我的产物，是身体的活动，它的结构是它的功能的结果。”（《我与自我》，1910 年

369

1月19日）在维尔比的理论中，“我”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的符号和它的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态的等式，也不是差异的还原；而是不对应、是延迟、是差别、是交互的他性。主体是在对话各部分的相互关联中产生的。我/我们的角色和功能在结构上是由和“自我”的疏离、延迟关系决定的。包含多个“自我”的“我”服从于“运动”和“功能”的秩序，因此它不可能是利己主义的；“自我”属于“内容”和“结构”，因此，如同维尔比所说，它是已在的（参见《我与自我》，1906年11月26日）；而身份是待在的、是要行动的、是需要赋予的。

身份或“我”的生产性、对抗性的特点是由其三元模式所决定的，就如父亲—母亲—孩子、冲动—发展—结果和问题—答案—行动的模式，这样的模式被维尔比描述为“以真正的顶点为条件的过程，它达到了一个超越性的理想，自然在其中如同寓言般被视为理想”。事实上，在她看来，有意识的身份代表了目前的演化过程的最高点，它解释了一切，解释了宇宙的重要意义（参见1910年1月21日，该文献没有标题），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为“元符号学”增加了活力。

他性与给予和多余的逻辑相关，这一逻辑产生的身份被视为多个自我之表现在对话的相互关联中的共同体。作为结果的我是对话性、开放性的，对它的各个部分和多元自我之表现而言，它是溢出的、超越性的多余价值：

> 为了存在——实际上存在就是被给予——丰沃存在的贫瘠，即是没有存在；必须有多余，必须有意识的天赋。的的确确，在算术意义上，纯粹的单位是往上加的，往上乘的。但这是由于它没有内容，也没有身份，正如它没有丰富性一样。完全身份（full-identity）是生产性的，它自己就是给予者。（1906年12月11日）

在维尔比的描述中，“我”是离心的能力，而“自我”是向心力。“我”对“自我”的趋向是否定的，它重在形成、行为和给予，而不是接受、保有和变得自私。这马上能让我们联想到巴赫金，他提出的符号和主体的理论也指出了在口头和非口头的人类符号系统中，“向心力与离心力”、“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以及“一致化与非一致化”之间的结构对抗。符号和主体的（部分）可识别性，以及它们的难以定义、多音性和独特性——比如价值和那些在平衡空间中短暂出现的生产形态，它们总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在持续的不断角力中获得——是在这种对抗中被决定的（参见Bakhtin，1975、1981）。 370

人类意识的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和独一化（monologization）抑制并减少了它对他者的反应潜力，以及对话和批评的可能。与此相反，维尔比认为完全的人是最大化的敞开和朝向他者以及和他者相互交融的前提。她以爱和激情

的运动、利他的爱、天才的创造和文学为例来讨论这一点——在文学话语中，我们不可知的、难以描述的秘密和有关的存在出现在揭露与隐藏的游戏之中。维尔比讨论的他者既是属于我的、构成我身份的一部分，也是外在于我的身份的，但它关注“我”并与“我”相连，在这种关系中作为他者来取代“我”。维尔比写道：“激情的语言就是它，或者说另一个‘自我’的例子，我们在他者中找到的最有趣的东西，总是我们自己。”（参见《我与自我》，1906 年 11 月 26 日）

维尔比把主体性的他者作为论据，主体性要成为“我”，必须总是他者。事实上，有意识的身份是在多个“自我”的延异游戏中发展起来的，它意图超越自我之表现中单极化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是短暂的自我表现所必需的。而主体性是在和他者关系的开放空间中出现的，在这个空间中，主体的身份在多个“自我”和多元声音中被描述，而没有被降低为其中的一种。总之，“我”和“自我”作为认识者，本身是不可知的，就好像占有他 / 她自己的主体本身是难以定义的，呼喊他 / 她自己的主体本身是无法表现的那样。我朝向着他者，朝向作为他者的自我之表现。371 对于“自我”来说，“我”是多余的，是对本体之局限的不断迁移和超越。尽管“自我”代表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确认、衡量和计算的部分，“我”却只能暂时地在假设上被接近，而从来无法捕捉，也只能通过我们自己支配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多个“自我”才能靠近。

在维尔比的描述中（她的描述和皮尔斯的讨论颇为相似），人是由截然不同但并非彼此孤立的各部分组成的共同体。这些部分或者说这些自我之表现并不互相排斥，而是通过彼此的依靠关系相互连接。换句话说，它们是在他者的逻辑中、在对差异的无法视而不见中被建立起来的，这一逻辑排除了各部分之间毫无差异的混乱的可能，或者说将自我之表现和他者混同的可能。就像维尔比所说的那样，混乱就意味着牺牲不同（1906 年 11 月 26 日）。“自我”和“我”是各部分之和的多余，它不是“个体的”，而是“独特的”（参见《我与自我》，1907 年 6 月）。“因为我们能够表现出独特。这个词或许可以代替那个让人难以忍受的、不准确的词：‘个体’。事实上，我们的特性就构成了我们天资的丰富。我们可以但不是必须分裂，我们必须把可分割的部分纳入伟大的整体、有机的整体，它上升到了人类的高度，可以为我们每个人戴上独特的桂冠。”（同上）维尔比在这里说的“独特”和斯蒂纳的单一的分离主义（separatism）理论中的奇点（singularity）概念无关——它可以用列维纳斯的“非相对的他性”（non-relative otherness）概念或者他的“意味”（significance）概念来翻译，也可以放在维尔比的意义三分式，即“感知”、“意义”和“意味”的语境中来阐述。

8.3. 作为建模工具的书写

8.3.1. 书写与抄本

广泛存在的偏见认为，在当今社会，书写的地位已经被其他符号系统取代。这种偏见之所以存在，部分的原因是，人们相信相较之于书写，视觉形象占了主导地位，好像人类符号生产的其他形式本来就不属于书写一样。

这一事实是由对书写的局限性看法造成的：人们普遍把书写等同于抄本（transcription），视其为口头语的书面记录，并且认为它是一种语言的外层，受口头形态的影响，或者说附属于后者。用这种方法定义的书写不过是帮助记忆的一种形式而已。

372

这种对书写的局限看法和假定口头语为优先状态的看法有关，因此它具有语音中心主义的趋势；同时它还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趋势。说到后面这一趋势，是因为这种看法将书写降低至某些特定社会中的抄本的地位，而不是其他社会的语言抄本，并且认为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重要阶段。在这样的理解中，书写就成为了史前社会和有文字的历史的分水岭，是没有历史可言的“冰冷”社会和拥有历史和历史记忆且有能力进行演化的“温暖”社会之差异所在。

事实上，作为抄本的书写发明，预示了书写具有更复杂和根本的意义，比起人类的社会—文化演化来，它意味着一个更宽广的、无所不包的时间范围。其实书写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并不短于人化（homination）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这一种群形成的过程。

书写是人类种群所特有的建模工具，人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身体的和外在的工具——来组织他们对这个世界、对围绕他们的时空现实的经验。实际上，尽管人类手头可利用的因素有限，但他们却可以发明无穷的意义，并建构出不同的世界观。

所有的动物物种都能够建构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并赋予世界以意义。人类与之不同的特点是，他们可以建构出不同的、可能的多重世界，并由此对有限的、同样的因素赋予无尽的意义。

因此，这就意味着书写——在文字之前的书写，也就是在书面符号和抄本出现之前的书写，代表了人化过程的一个基本阶段。作为一种建模工具，它是先于言语而存在的，后者在和其他建模工具甚至是更早的传播手段相比较时，被错误地给予了太多特权。因此，书写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像言说和言说的抄本那样的交流方式；它先于所有的交流方式而存在，是它们的基础。

将书写理解为抄本，这和对“文化”的狭隘看法有关——也就是说，书写作为抄本，是和“非文化”相对立而归属于“文化的人”的。这种观点将书写和权利、

控制相联系，认为它有助于巩固人对人的宰制状态。事实上，人类特有的书写能力是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属于“文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写是与“自然”相对立而归属于人性的。

373

言语及其相关的口头符号系统的发展——也就是自然—历史的语言的发展——是以书写为先决条件的。如果人类没有书写的能力，就不能发声，也不能够识别出有限的、区别性的声音（也就是音素）并进行语音的再生产。如果人类没有这种固有的能力，就不知道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将音素进行组合，来形成各种不同的词语（语素），也不能用不同的句法方式来安排单词，以形成有不同意义的表述。

8.3.2. 书写和语言

书写作为建模工具，也可以被称为语言，属于人类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理解之下，语言就是人类所特有的，非人类的动物之间的交流中不包含语言能力，其间使用的符号在类型上和人类使用的符号是同源的。照此理解，非人类的动物符号系统并不固定在同样的建模结构之中或者语言这一属于人类的符号系统中。因此，从人类符号活动的角度来说，人类是唯一发展了语言的动物。

在聋哑人的身上，语音形式的语言发展是不可能的，作为建模工具的书写或者说语言可以通过其他的符号系统（姿势、绘图等等）发展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定要伴随着言语。

多亏了科技的进步，以及不同文化的相遇和互相交换，语言在今天得以繁荣。（边界的封闭和对社群身份的坚持不会阻止这些进程，它们不会被限制到市场交换的程度。）现今，作为建模工具的书写或语言在更宽广的范围内用不同的方式显示着自身。有了对语言的这种描述，其他形式的书写、其他语言或人类符号系统——包括摄影、电影、电视、DVD 和电脑——为书写提供了新的形式，它们依次增强了我们被皮尔斯称为“默思游戏”的能力。

此外，如戏剧、音乐和造型艺术等传统的表现方式也通过技术得到了加强。

374

它们因而可以在同样的符号系统之内，通过交互作用来发明新的书写方式。这就形成了表现体裁的新发展。设计、摄影、电影和音乐都是书写的形式，既然我们将书写理解为人类的建模能力或者说语言，我们就必须对它们进行重新思考，并且将其作为对高度创造力的反映来进行欣赏。

这真是书写的危机！过往的任何历史时代都不像当今的时代，书写是如此丰富。现今的文明就是书写的文明！应当向任何把书写和书面符号或者抄本混淆在一起的人，以及那些由于疏忽或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抱怨着书写的沉沦和失落的人们强调这一点。

现在我们必须要致力于为今天的书写系统的传播和扩散创造足够的条件，使它们得以从控制传播的任何形式中解放出来。

在今日的传播世界中，问题不在于“书写”和“形象”的对立。真正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存在于书写系统、语言和自由的“默思游戏”之间的客观矛盾，另一方面在于对传播的控制日益增强——在这方面的增强意味着这种控制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8.3.3. 文学书写和语言的创造力

文学书写是话语的另一个重要场所——或许是最古老的一个。在这里，书写获得了相对于抄本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书面的符号获得了独立，不再只是为口头语言提供辅助功能，因此书写不再只是记忆手段。爱森斯坦就清楚地指出，电影正好始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停止之时。同样的，当今时代其他形式书写的发展是为文学书写提供了补充。

文学书写获得了解放——从以抄本为特征的其他文学实践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换句话说，它从限制性的、有限责任的强加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这种责任被种种托辞所“牵制”。这一切使得文学书写具有了一种无限的责任——也就是绝对责任。无限的绝对责任及其完全表现体现了人类作为人类的特殊性所在——也就是将语言或书写视为建模时，人类所具有的默思游戏的能力，以及建构和解 375 构无数的新的可能世界的能力。是“游戏”而不是“工作”——在这个范围内，游戏和需求无关——它超越了功能性和生产性；因此代表着多余，与“必要领域”相对。

文学书写作为书写而不是抄本，对任何想要阻碍它发展的力量形式而言都是难以控制的。要再现始于1968年的标语，唯一被文学书写所承认的形式就是想象力。非功能性的、非生产性的创造性，创造性的想象力就像是上帝的属性：完全的人就在于人本身的类似于上帝的能力，人身上的神性。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他们具有语言和书写的超凡天赋。 376

第九章
书写和对话

9.1. 对话、他性和书写

9.1.1. 对话

巴赫金兴趣广泛，他的研究始终和两个复杂的问题紧紧相连：一是“对话”，这体现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文学研究上；二是拉伯雷所叙述的“狂欢”流行文化中的“怪诞现实主义”。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并非源自于我们决定对他者采取开放的态度（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关于“对话”的错误观点），也不是“我”采取主动的结果或者向他者敞开的结果，而是“我”形成和展示之所在。并不是说，由于“我”决定要尊重和倾听他者，因此产生了对话；相反，对话意味着封闭和事不关己的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任何封闭和事不关己的意图都被证明只是悲喜剧而已，这就是明证。巴赫金让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不在于展示人们之间对他者充满尊重的对话，他关注的是对话如何在主体和自我缺席的境况下产生。词语是对话性的，因为它被动地卷入他者的词语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由巴赫金进行理论阐述的对话，不可能对他者漠不关心，它意味着“你”对“我”的无法漠视——这种无法漠视甚至包括冷漠、敌视和仇恨在内。即便是这种无法漠视蜕变为仇恨，他者仍然是其他东西无法相比的。因此，对话并不仅仅是观点和同一性的组成；相反，它与集合是格格不入的，包括某人自己的同一性和自我的同一性的虚幻集合：如同“怪诞身体”的生命不可避免地和他者的生命交织与共，这种集合也不可避免地与他性相关涉，被对话性地分解，或者说去总体化了。

377

巴赫金的对话和他性概念是极具原创性的，因此，很难将他和其他关注这两个主题的学者进行比较；当我们以其他不同的相关概念为语境来阅读和阐释巴赫金时，往往容易对他的原意进行误读。

巴赫金告诉我们，文本必须要透过其他的文本来阅读。这种互文性并非文献

学家所说的互文，只是文本和它的来源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巴赫金认为文本有三种共文本（con-text）：

1. 远文本（remote con-text），指作者自身不一定能意识到的文本来源；

2. 同时文本（contemporary con-text），指作者，尤其是作家力图摆脱的文本；

3. 后文本（posterior con-text），指读者的文本，它决定了文本的有效解释，也就是应答性理解的解释，因此特别重要。

作为巴赫金的读者，而非文献学家或者哲学、思想历史学家，我们将在这一章里讨论第三种类型的文本和共文本。巴赫金的名字常常和马丁·布伯、萨特、海德格尔和赫尔曼·柯亨等思想家的名字并列出现，不幸的是，正因如此，他的思想体系常常被简化至这种或那种概念的范畴边缘。

在这里，我们要坚守巴赫金的他性观念。他性的问题一直是巴赫金研究的对象，事实上，也是他的研究基础之所在。巴赫金所理解的词语是在他者中展现自我的词语，它要求应答性的理解（answering comprehension）；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是对话性的。同时，它也在很大的程度上积极地回应和理解着他者的立场。这就解释了巴赫金的立场的原创性和它自有的价值，而不是将其简化成某种其他的他者立场。

巴赫金所理解的他者的词语和其他的他者词语是有着同源的联系的，巴赫金认为后者无法进入真正的对话。在当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脉络中，巴赫金的他者词语的概念具有深刻的原创性。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列维纳斯（见本书第330页的生平简介）。从对话关系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谈到他们的生活（并非是从文献学家所说的“文本来源”这层意义上而言）。巴赫金和列维纳斯的出发点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这位作家对两位学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78

列维纳斯帮助我们理解巴赫金的理论视野，而不会产生误解。尽管原因各异，两者的作品都相当难读。或许我们更容易读到巴赫金，但这种资料的容易获取性吊诡地使他更容易被误读。理解巴赫金和列维纳斯的困难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某种“风格”造成的，也不是由于两位作者意图使他们的作品显得复杂或者晦涩，或是在表象之下隐藏深刻的意义，并以此为乐；而是因为他们的话语和论述超越了一般的话语，达到了同一性逻辑的所在。

德里达对列维纳斯写作风格的描述极为出色。在接下来的引文中，他指出任何对列维纳斯的话语抱有天真的期待，认为可以对其进行简化或者合成的肤浅要求都是不可能的：

> 列维纳斯的写作本身就可以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它在体裁上的意图（尤其是在《总体性和无限性》一文中）不那么明显，使它的散文式表现没有成为一种概念式的框架，这种框架是所有评论的最初的暴力。当然，列维纳斯对散文体的使用得心应手，摆脱了酒神式的狂迷或暴力，而非毫无成效的诗意复现：在《总体性和无限性》一文中，对比喻的使用是话语中最具有决定性的运动。

德里达对《总体性和无限性》的描述可以用于列维纳斯的所有著作：

> （列维纳斯的著作）主题的进一步发展既不是纯粹描述性的，也不是纯粹演绎性的。它如同海浪对沙滩的永不止息的坚持：同样的海浪总是重复着返回沙滩，然而，每一次的返回都既是再现，也是更新，它丰富着自己；它总是在对批评家、对评论员们提出挑战。（列维纳斯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艺术，而不仅是论文。（Derrida，1967b，英译本：312n7）

列维纳斯对布伯、海德格尔、萨特以及新康德主义思想家们的批评，或者说至少和他们保持了距离，这和巴赫金的批评理论非常相似，有助于对其进行阐释，尽管这种助益不一定是直接的、明显的。

379

在早期的论文《行为哲学》中对哲学思想做出总结之后，巴赫金的讨论完全集中到了文学上，他发现文学体现了他者关系的发展，这是他最大的兴趣所在。他深深为之着迷的文学文本中的他者关系是三角的，存在于作者、主人公和读者之间。列维纳斯也对重新论述他性的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想要防止它被简化为同一性意识形态或者主体范畴。对这一问题，他坚持了自己的哲学方法，其目标似乎是要将巴赫金的隐性哲学转化为显性的。

因此，我们相信巴赫金和列维纳斯——这两位我们时代最重要、最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间的分歧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这些分歧可以避免巴赫金的对话和他性观念的模糊不清。蓬齐奥所用的“巴赫金革命”一词恰如其分（参见 Ponzio，1998），而且，一方面从巴赫金，一方面从列维纳斯（参见 Ponzio，1996a）出发，这两者的研究构成了对同一性范畴之上的所有西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重要空间。从海德格尔到萨特，对话理论从来不曾对同一性或西方的理性构成有效的批评；而列维纳斯和巴赫金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值得认真思考的另一种可能，它旨在发展以他性为基础的、双向的推论批评。

9.1.2. 他性、对话和身体交互性

从列维纳斯的角度去解读巴赫金，从巴赫金的角度去解读列维纳斯，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节的标题中列出的三个词："对话"、"他性"和"书写"。同样的，以巴赫金和列维纳斯的视域出发去重读皮尔斯，或是从皮尔斯的视域出发去阅读巴赫金、列维纳斯，也是极具启发性的。这三位学者都可以被视为研究对话和他性必须了解的哲学家，尽管他们的思想是彼此独立的。在他们三人看来，对话和他性都是相互关联的，而对话不能仅仅被视为形式或是话语类型的问题。

"他性"、"对话主义"和"他者"——其中，"对话主义"被视为朝向他者的、并不返回的运动（在获取和利益的意义上也是如此），而在列维纳斯看来，作品就是符号活动的不同方面，它们彼此关联，是符号中实现的独特的价值和关系。没有他性，就没有对话；这就像是如果对话不被视为在差别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关注和接触，他性就不存在一样。 380

要对他性、对话主义和书写进行反思，就要反思实现它们的"符号"环境，因此，也就是要反思"语言"、"传播"和"主体"这些同样是从口头或非口头符号，以及表意程序中产生的概念。要思考人文表意的潜力，也就同时要对人类和他们从他性、对话主义和书写的视角出发进行的表达进行思考，这开启了用批判的眼光质疑这个世界的可能。这一方法导致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他性的人文主义，或者说，这使我们想起了列维纳斯 1972 年出版的专著的标题：《他人的人文主义》。

他性和对话主义是在符号中实现的，而符号是为了他人的。换言之，从对话关系上来说，符号总是朝向他人。照符号学的观点来看，符号和主体是模型化的他性的实体，是在他性的关系中没有最终实现的表达。而自我对他性的经历——不管是他人的他性还是自身的他性——都在巨大的符号网络之中的符号对话关系中得以发展。

在皮尔斯看来，思维都是符号性的——也就是说，是由符号构成的。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对口头符号的使用，或者说口头符号是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上，口头符号只是各种可能类型的"符号"（"symbols"，或者"signs"——皮尔斯换用这个词来表示"符号"，而把 symbol 一词作为规约符号、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这一符号三分类型中的规约符）。

为了具体说明他的思想，皮尔斯有时候借助于图像，尤其是视觉图像，他称之为"自我交流的自然语"（如同他在《意义的研究》一文中所说的，参见 MS 619：8）。数学家往往通过心理图表来进行思考，艺术家主要是靠视觉形象，而音乐家则是使用音调。但不管表意过程中的某个时刻被哪一种符号所主导，调节思想过程产生的符号间的互动和谈话者的对话交流是类似的。思想就意味着双向的符号活动，换言之，这一逻辑使得思想朝着以对话主义为基础的方向发展。

在《有关现实的问题》(1868d)一书中,皮尔斯写道:"柏拉图说思想是灵魂和自己无声的对话。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无穷的;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其中很多问题都没有被意识到。"(1984a:172)后来,在1905年,他又写道:"一切思想都是对话性的,这一点怎么重复也不为过。"(MS 283:56)事实上,在他的著述中,皮尔斯曾多次重申这个观点。

381

一个符号所具有的最初属性就是他性和对话性。和单义性、复现、同一性这些以信号为特点的概念不同的是,对话性和他性在恰当的意义上是作为符号最初的、本质的属性存在的。换言之,符号作为符号而存在,符号自身的特点就是它和自身以外的他者相呼应、相关联。事实上,符号和作为对象的指称物和作为解释项的另一个符号都是不同的;没有解释项,符号便不成其为符号。

一个符号的表意潜力并不完全来自于它和任何单个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也不和其他符号赋予它的表意价值完全一致。更准确地说,被解释的符号的意义并不能被解释项全部概括,符号的意义价值、含义和意味,都不能被对它的任何解释路径所穷尽。论及解释项,被解释的符号代表的是表意的他性极限,它的物质性不能被简化为任何一个解释项,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单独成分和符号关系中单独的例子。从主体性的视角而言,巴赫金和列维纳斯发展起来的"绝对的、非相对性的他性"是个重要的概念,它意味着他者本身就是存在的而和自我无关,它并不是为了存在而等待着来自客体化意识、来自解释项的意义赠予。

列维纳斯在他的著作中贯穿了对有限的、非双向性对话的批评。在他看来,对话不是交换,也不是所谓的交流。言说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话主义,它和交换无关,通过言说,对话不是被理解为给予和接受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因此被视为尊重、相互承认、分享、结合、共同事业、一致、彼此统一和均衡分配。

言说是"无限的见证",是超越知识、交换和一致的"和他者的关系";是与他者无法避免的相遇的对话,意味着封闭的不可能,以及参与的必然性和必要的关怀;尽管有诸多托词和借口,但在必须回答他者、为了他者的情形下,它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到自己;它是应分的责任。列维纳斯因此对马丁·布伯坚持的对话观念和你我关系(I-Thou relation)中的相互性提出了质疑:

382

> 是否能在不引入你和我之间的悖论关系的情形下,对出现在对话形式中和问答之间的他者的异质性关系进行描述,我们对此感到怀疑。你我之间的独特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关系不是从外部得知的,而是由带来这段关系的我那里得知的。因此,它的位置和由你占据的位置是不可互换的。是什么构成了这种异质性(ipseity)位置?如果在言说你的行为中我成其为我,那我就是从和我相关的一方获得这一位置的,而你我关系就和所有其他

> 关系一样：犹如一个外在的旁观者在用第三人称来谈及我和你。这种形式上的相遇是可以存留下来的，无论从左至右还是从右至左的顺序上来看都是一样的。在他者高于或弱于我的伦理中，我和你的不同不是由于任何类型的“属性”造成的，而是由于维度的高低而形成的，这就打破了布伯的形式主义。（Levinas，1976a，英译本：32；关于对话和对他者的责任之间的关系，也见 Levinas，1993：217—218）

在另一段论述中，列维纳斯援引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关怀”（Fürsorge），或者说“对他者的关怀”（solicitude for others）、“对他者的关心”（care given to others）的概念来反对形式主义者的“对话哲学”：该文题目为“没有关怀的对话可能吗？”（Levinas，1976a，英译本：33）。在一封写给布伯的信中（1963），他写道：

> 我认为言说的你（布伯的术语“Du Sagen”）本身（ipso facto）已经是给予。一旦言说的你和这种给予相分隔，就会变成“纯粹精神的”、轻飘飘的、虚弱无力的友谊，就如在某种社会环境下可能发生的。言说的你即刻地、已然地通过我的身体（包括我伸出的双手）进行操作，因此预设了我的身体（是活生生的）、物（是愉悦的对象），以及他者的渴求，言说由此超越了身体化，即，超越了语言、歌唱和进行艺术活动的器官；而他者作为他者，总是贫穷匮乏的（同时又是我的上帝），实质上，关系总是因此而不对称：这就是我“反对”的缘由。（同上，38）

在这里，列维纳斯反对的是，将对话的概念视为两个决定交换想法的、先在的、自动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他所论述的（与他的看法相似的还有巴赫金），对话被动地见证着他者的无法逃避、无法躲藏的事实，见证着除了主体因为自发地呼求而对他者或为了他者作出的回答以外的和他者的联系。照此理解的对话正是巴赫金和列维纳斯所说的见证（testimony）或者目击（witness）。“我”在构成上、结构上是对话性的，见证着和他者的关系，不管这个他者是他人的他者（the other of others），还是自我的他者（the other of self）。 383

巴赫金和列维纳斯既明确又隐晦地表示了，对于将对话作为先在的、预先定义的主体之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柏拉图的著作）的问答交流这一传统，他们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对话是人类主体和意识的基础条件，因此，对话才是先在的。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巴赫金所说的实质性的对话（substantial dialogue），它和形式上的对话（formal dialogue）是不同的，对实质性的对话而言，形式上的对话也是“我”的符号物质。语言作为接触、临近和为了他者的存在——如列维纳斯指出

的，“这里的‘为了’并不能被简化为一种被说出的服从于另一种被说出的，或是一个主体化服从于另一个主体化”（参见 Levinas，1993：217）。——语言是见证者、是参与、是身体交互性、是对他者的展现、是主体交互性、是一致和不一致共有的先在，因此，它早已是对话。

9.1.3. 对话主义、他性和符号

巴赫金认为，“对话主义”指的是各项之间的实质性对话的条件，就对话的意义而言，各项之间并不一定在形式的层面上互相关联。对话者之间的、不同声音和观点之间的形式上的对话的实践很可能是独白性质的——也就是说，是想要退出和他者对话的，或是摆脱实质性对话中对他者的责任的令人遗憾的，甚至是悲喜剧元素混杂的尝试。词语固有的对话主义——对话主义存在于词语的内部，这是巴赫金专有的分析对象——作为可能的条件，是先于表面上的对话所产生的结果的。

总之，实质性的对话主义告诉我们，要把词语降低至单义是不可能的。它和形式上的对话是无关的——后者在性质上是简单的，因为它仅仅发生在就数量而言是不同的声音之中。实质性的对话并不是声音、对话者或者对话交流中涉及的身体的数量问题。相反，它描述了一种条件和态度，描述了自我朝向他者的、对话的倾向，甚至在一个单独的符号或者说单独的声音中也是如此。逃避对话主义是384 不可能的，正如逃避他者也是无法实现的一样。事实上，不论我们对他者喜欢与否，我们都服从于他者，以至于若非在和他者的相互关联中，自我的同一性就无法得以保持。在对他者漠不关心的幻象中，在每个人自己的视角、价值观系统、想法和声音中，对话主义都得到了最强烈的展示。

巴赫金让我们看到，对话主义发生之处并非一定是在声音（phoné）之中。绝对的他性和实质性的对话可以通过“书写”（writing）来实现，而“书写”是不需要字母的。他性和对话主义暗示了符号的条件或形态，它跨越了书面语言和非书面语言符号系统的分野，前者包括口语和文字，后者则包括姿势、音乐，以及绘画、摄影和影视作品中的形象。

衡量由符号达到的他性和对话主义程度的主要标准，并不在于这个符号采用的形式——比方说：口头符号、书面符号，抑或抄录的符号——也不在于被称为对话的“话语类型”的问题。事实上，就像巴赫金告诉我们的那样，所有的话语类型都代表着与他者相关的不同形态，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描述。以文学体裁为例，从史诗发展到抒情诗，再到单调小说，最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率先开创的复调小说，我们可以在其间建立起对话的渐进阶序。

说到皮尔斯的符号分类——规约符号、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其中对话主义

和他性程度最高且不可复归到独白性和同一性的是像似符号。像似符号和表征的距离最远，也就是说，它对对象、符码的认同是最低的。因此，它最具有自我表意的能力，它超越了传播中的等价交换逻辑，也就是信息的意向交换来进行自我表意。由像似性主导的符号活动具有描述、变化和疏离的能力。符号展示了它自身，但并没有完全揭开面纱：无形的变得可见，但符号的内部，它的秘密并没有被揭破。

实质的对话主义和他性总是相关的，后者被认为是先在的，是认识到主体同一性的可能前提，是被说（the said）之前的言说，是和他者的关联、对他者的敞开，是脆弱性、共谋和责任。在这里，"责任"并不是积极意义上的接受责任和采取立场，而是被动地向他者敞开的、涉及他者的意义的，因此被动地、不带感情地对他者负责，这即使不是和原有的意愿背道而驰，也是与之分离的。就像列维纳斯在《超在或超越本质》中所写到的： 385

> 对他人的责任并非是偶然成为主体的意外，而是先在于主体中的本质；它并非对自由翘首以待，在这种自由中会做出对他人的承诺。我什么也没有做，却一直受到谴责和迫害。不具有同一性的最初特征的被动中，这种异质性是一种抵押物。我这个词意味着我在这里，对所有人、对一切负责……
>
> （对他人的责任）也就是自我对自我所不希望的对象，即他者的责任。（1974c，英译本：114；亦见 Levinas，1993：182）

在言说——也就是被当作接触、包含、说明和一方对另一方的语言——的语境中，责任表现为接触、言说和词语产生之前的书写的对话性，后者与文字是无关的。作为言说的语言谈到了一个人对他者的责任。从这一点而言，不管我们的意愿是什么，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负有责任，或是在做出回应；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即使这种回应是不作回复或是没有行动（或反应）。如果在人类世界中我们被赋予一个中立空间的正当性，这是因为责任是从外部引入的条件，使其是不被需要和寻求的，但同时又是必须的、不可动摇的。无限责任的条件见证了我们对他者关系、对话性和书写的义务。这一切都没有预见到，自由选择将随着同一性，随着"我"的意图意识产生。相反，我们描述的是我们作为服从的、活着的存在的条件，我们忍受、被迫承受痛苦的条件，我们留下的印迹被这些条件尽可能地用同一性的逻辑掩盖和擦除了，但这些印迹镌刻在人类的建模之中，在主体间性的关系中，在广义的、生物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中。

这意味着哲学上不可阻挡的趋势：它试图确认意义、意图、知识的本体特权，因此获取了对从他者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整体性、同一性和本体论的权利。皮尔斯、 386

维尔比、巴赫金和列维纳斯的理论彼此独立,但都告诉了我们自我本身就已经是对话性的,已经是我和他者的关系。他性是同一性的中心所在:对同一性来说,它是结构性的,是同一性实现的先在条件。既然意识和语言是一致的,语言又属于他者,那么,像语言一样,自我也从来不是单一的;相反,它具有内在的他性,因此具有多逻辑性、多论述性、多音性和内在的多语性。

他性可能与角色、差别相对,换言之,它可能将自己作为一种选择或是对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的是独白论的逻辑,而非实质的对话性。和有效的、实质的对话性相对应的是他性的一些特质,即"绝对的、非相对的他性",这种形式的他性脱离了限定角色、相对的差别和相反的选择。

和"相对的他性"相比,"绝对的他性"是纯粹多余的,它的存在是额外而无用的,是被解释的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平等交换关系的冗余,因此也是以编码和解码的信息进行交流的冗余。它是"没有关系的关系"、没有回应的出逃:较之于为了得到而付出的逻辑,它是无功用的表意实践。绝对的他性的立场是波特拉奇冬季赠礼节(Potlach)的逻辑——这一逻辑延续了乔治·巴塔耶对马塞尔·莫斯的解释——是毫无回报的给予、对能指的浪费、没有产出的消耗,是一种花费(dépense)。在向绝对的他性敞开的情况下,表意的自我摆脱了叙述的经济性,并且在自指性、模糊性、含混性和矛盾性上得以表现。

我们相信,将巴赫金和列维纳斯进行比较,这对我们回过头来阅读皮尔斯是有启发的,后者在他的理论中能够一直保持对他性的敞开:他对符号活动的定义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和维尔比不同的是,巴赫金、列维纳斯事实上和皮尔斯没有直接的接触,他们两者互相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但他们的理论可能对我们理解皮尔斯的思想起到重要作用。将这两位作者以及维尔比进行对比,有助于明确皮尔斯的符号和自我概念中的他性成分。巴赫金和列维纳斯的著作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他性不能被降低为一种外部获取的条件,这种条件与同一性所表征的、内部的、预先构成的条件是相对的。重点在于,他性和对话指明了一种情形,它内在于认同、总体性和符号中——不管它是自我还是自我从属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因此,对话性和他性的条件对认同(事实上对所有的认同而言)都是本构性的。

387

9.1.4. 书写

较之于对话性,书写摆脱了对口头形式的从属地位。他性和对话性并非是在口头的词语中,也不是在抄本这种直接的书面类型中显明的,而是存在于以"间接言说"、文学类型为载体的书写中。这里的他性并不屈从于话语秩序,相反,它在书写中逃离了秩序;而书写被作为间接言说、有保留的言说,它在作者和文本之间拉开了距离,戏仿(parody)、反讽等"不同形式的沉默"由此出现。书写远未服

从于口头词语，它和“表现”、“面对”的概念（参见 Levinas，1961；Bakhtin，1986）有关，和身体交互关系有关，和先在于词语的、和词语无关的、向他者的敞开相关。

符号达到的对话性和他性的程度是根据文学书写的类型而变化的。文学类型使得词语之间可以彼此回响：连同说话人的意向性在内，他们允许了多重意向性的表现，其中包括对词语而言相异的意向性，并因此将其自身表现为了多音的词语。书写的可能类型范围宽广，徜徉其间，我们可能会途经对话性和他性很高的部分——它或者是起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作家为巴赫金和列维纳斯所钟爱）的复调小说，或者是类型对话，如柏拉图的《会饮篇》（该书不同于他的其他对话录），也可能经过以独白论和同一性为基调的部分——如指南式的、问答式传道的话语，由柏拉图所著的、结构上以论点的展示为结束的对话。在这种情形下，表意过程往往是单线的，它依附于意向性和主旋律的、单义的意识；因此，它对主体的同一性和主题的实现是有功能性的，是意向行为（noesis）和意向对象（noema）产生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列维纳斯的著作《论外在性》的意义模糊的题目是极其重要的，该书于 1987 年出版，其观点认为对主体的背离和对主题的背离是同等的。

388

不管一个词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独白论类型的、客观的、直接的词语都是倾向于单义的，正如它可能包含了其他词语的印迹、作为他者进行回应一样。从主体的视角而言，独白论类型的词语是由意向性所主导的，它不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外位化”（extralocalization）的能力，或者列维纳斯所论述的向“外在性”（exteriority）的敞开性。但同时我们要记得，独白论类型只是相对的，因为词语总是半他者（semi-other）的，由此总是对话性的；事实上，“独白论”这个词只是意味着对话性的程度较低而已。

对话性和他性的程度可以用书写来描述，书写不同于抄本，从声音中解放了出来。因此，书写是人类独有的建模能力——西比奥克的生物符号学将其称之为“语言”。

“书写”一词是多音的。它借用了罗兰·巴特的“不及物写作”和“及物写作”或者说“手抄本”之间的分别，以及由此借用了“作家”和“抄写员”之间的分别，也就是德里达的差异（“区别”，来自 différer）和延异（“推延、回用”，来自 renvoyer）之间的区别（Derrida，1967a、1967b）。它也考虑到了列维纳斯所说的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écriture avant la lettre）这一概念。我们所说的书写证实了是向无限的敞开，是他者，是总体性的碎片，它倾向于革新、创造和发明。书写是皮尔斯所说的“默思的游戏”，是列维纳斯所说的作品（œuvre），它是朝向他者的、不再返回的运动，是意味的意义所在。用列维纳斯的话说就是：“它先于口头语存在，随着语言系统和语义的暗示而变化，它是语言的序言，它就是对他者的接近，是靠

近他者的承诺，也是意味的指意性（signifyingness）所在”（Levinas，1974c，英译本：5；亦见 Levinas，1993：220）。

从这个视角来看，书写的实践也就是在创造性、发明和他性之下的对世界的建模实践；它是人类内在的、独有的建模能力，存在于传播之前。它出现在文字之前，先在于言语，它作为人类的符号物质对符号物质进行建模。

意味作为他者的表现，作为无限在有限中的凝结，作为“印迹”——列维纳斯

389 将其理解为“表意”的意味或指意性——如同书写一词与文字意义上的书写无关一样，这个词是被说出的言说、不在场的在场。书写存在于这样的语言中：在书面符号被发明以前它就已经存在。那么，语言显而易见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的意义不能被预先规定的、主题化的、确保意义的文字层面所穷尽。它是“表现”和“面对”之谜，渐渐地揭开自己；它也是关系中的文学性，其间存在着文本的引用、接触、呈现和娱乐形式，同时，所交流和表征的只是先文本。语言是印迹、书写，是不及物写作而不是抄本，是“文学书写”——这个词不能从文字层面上进行理解——它进行着呈现（是“表现”和“面对”），而不仅仅限于表征。

言说的意味被理解为接近——向着他者的接近、接触和身体交互性——和不及物书写。两者都有着从被说出获取的独立性，是信息交换无功用的冗余，处于多余的状态，是对存在、对过去用于描述它们的范畴的逃离。不及物书写并非是和书面符号绑定在一起的。列维纳斯认为，人类的词语本身就已经是不及物书写；因为语言的表意能力超过了它所言说的，也因为能指的意义超过了所指，言说的意义超过了被说出（参见 Levinas，1982b：preface）。

9.1.5. 口传、书写和他性

列维纳斯认为，他性的关系既不能简化为共在（being-with），也就是海德格尔说的“Mitsein”，也不是萨特说的存在（being-for）。他者存在于主体和自我当中，它本身就是对话，就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他者和自我（列维纳斯称之为“Même”）是无法分割的，但它作为局外人（Étranger）并不包含在自我的总体性之中，或者为后者所吸收。对自我和世界的构成而言，他者是必须的，同时，对所有想要消除它的符号物质性、他性和想让它服从于自我同一性的意图而言，它又是扞格难入的。和他者的关系在构成上阻碍了自我的整体性和闭合性，他性的关系就是多余的关系，是剩余，是对客观化思想的超越，它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从平等交换的关系中被释放了出来。

390 就是在对自我的构成中，他性变得活跃：在语言层面上，它引起了词语内部的对话化（internal dialogization），使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的词语；在语言美学的层面上，它造成了概念和现实的双重化；在道德层面，它引发了不安、对他者的念

念不忘以及应答性。

因此，正如列维纳斯所指出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有着伦理基础。然而，在这一语境中的“伦理”意味着什么呢？列维纳斯（Levinas，1974b，英译本：116n6）给出了如下解释：

> 我们所说的要素之间的伦理关系既不是由理解的综合体，也不是由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联接在一起的，而是一个人对他者有影响、关注他者、对他者有意义，在这种关系中，它们是由认知无法穷尽和拆解的结构相接合的。

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不可复归地超越了知识、概念、抽象思维的领域，尽管后三者是由于这一关系的存在才变得可能的。他性的关系和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同一性的条件）是相关的。

> 对萨特而言，自我是在自为（for-itself）的基础上得以安置的，这和黑格尔的看法一致。因此，我的同一性可以被还原，是对自身本质的返回。我、看起来是主体和条件的自我，或者在众多实体中以实体形式存在的自我，都可以真实地简化为从自我意识的具体过程中提取出来的抽象物。（Levinas，1974c，英译本：103）

和萨特、黑格尔不同的是，列维纳斯认为“意识到自我”的自我既不和意识一致，也不预设了意识；相反，自我存在于意识之前，它和意识通过他性和自主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列维纳斯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文化现象，根据他的描述，这些现象源自于他者的范畴而不是认同的范畴，其间的他性的关系被忽略了。在《他者的人文主义》（Levinas，1972；新版见 Levinas，1990）一书的题为“观念和作品”的一章中，就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用作品一词来指明朝向他者的运动，它排除了回到自我的可能：“从根本上构想出来的作品是从同一（the Same）朝向他者的运动，它绝不会回到同一。”（Levinas，1972：44）这一由他性的逻辑所驱使的运动在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中尤为明显。但它并非仅仅出现在艺术领域；相反，每当人类的作品所表现的意义超过了它的功能时——对需求、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生命、主体及其同代人的时期等限制性界限而言，它就是空间的冗余和价值的多余——这种他性的逻辑都会出现。这种朝向他者的、不会返回自身和同一性的运动意味着，在人类的视野中——“人类的所有作品中，商业的抑或外交的”，无论什么作品——都可以找到特有的人性。用列维纳斯的话说，人类事业超越了对自身目标的完美

391

适应,“证明了和某种外在于事物发展的命运的一致性,这种命运在世界以外,就像是遗迹那永被忘却的过去,和外来物那难以描述的奇异”(Levinas,1948,英译本:2)。他又认为,要接受作品这一观念是对特有的人性的标明,是人类将会实现的方向,意味着要支持一种人文主义,它倒转了哲学的寻常路径,也就是被设想为“尤利西斯所遗留下来的——这一角色历险的结果仅仅是回到他故乡的小岛——一种同一中的自我满足,对他者的不承认”的那种哲学(Levinas,1972:91)。

他者、他性的人文主义(这是列维纳斯著作的题目),在艺术生产中、在艺术作品实现的方向中得到了表现。

这样的视角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艺术与应答性之间的关系。从列维纳斯认为的作品意义而言,艺术可以被认为是自由(dégagé),这源自于它自身的他性,源自于它之于作者的独立性,源自于它所具有的超越它的生产之历史传记性、历史社会性界线的能力,以及它作为作品的多余。作者有多么想要介入(engagé),作品的解放就有多么难以避免。作品的本质就是自由。

但是,作品的自由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是无关的。作品和主体的距离、它从单个的作者—主体的界域和产生它的全球性社会语境中的逃离,以及它朝向他者的、不可逆转的运动都是在艺术和应答性之间建立联系的要素。应答性这个词并不是在权限的层面而言的,也不是在规约式的道德层面而言的,主体在后一个层面上对自我回应,而这种回应的意向和主体的权限——给定的符码、具体的责任、契约或特定的角色——是完全相对的。相反,在艺术的话语中,应答性不再是对自我的责任,而是对他者的责任:对他者的应答性超越了个体的应答性(道德规范、司法和政治秩序)的限制,超越了平等交换的规则,超越了由角色和社会地位限定的功能和法律认可的个体身份差别,每一个个体身份都有着自由和责任的私人领域。

392

在被视为绝对他性而非相对于自我的他性的他者关系中,他者不是被给出的对象,它在概念上不是可描绘、可定义的。列维纳斯在《现实及其影子》一文中分析了这种关系,尽管它只是朝向结束,而且只在和他人的关系中才显明出来。在文中,列维纳斯认为,艺术的基本过程是将对象替换为自己的形象,这种形象和概念是相对的。概念被抓取、被捕捉,就此而言,它就是对象。从这个视角来说,在知识和行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它们都是对对象的抓取。相反,是形象中和了和现实的关系。

艺术、形象,是无利害关系的,这种无利害性在于中性化之中。但是,这并不是对主体的自由和主动性的一个表现,它并不产生于权力情景中。相反,形象意味着主体原初的“受某物支配”的感知复苏了,它包含了被动的情况。在这里我

们不能运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概念；尽管缺乏主动性和意向性，整个过程是在场（in praesentia）的，就在我们眼前，就好像出现在“白日梦”中一般。这种特殊的情况以自动行为为特征，列维纳斯将自动行为和舞蹈相比较，其间“没有什么是无意识的，但在其自由表演被完全吸收到演出中之后，意识瘫痪了”。

形象就是所是（what is）的他性，是相对于自己而言的所是的奇异性（étrangété）和双重性。物是它自身和自身的形象，因此，形象，也就是替身，和某一物的所指这个事实一样真实。同一性和奇异性、他性：它们是真实的两副面容，这是现实主义无法捕捉到的。艺术注视着真实的双重性。艺术不代表现实，但我们可以说它描绘现实的双重性。

在《现实及其影子》中，列维纳斯也观察到了，在艺术中，真实世界似乎被置于圆括弧和单引号之中——这个过程根据使用的写作形式而有所不同。由于它逃离了对所是的认同，或者说艺术中描绘的形象，双重的他性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戏仿性的、漫画式的。和客观话语（objective discourse）不同，具体化的话语（objectified discourse）并没有受到严肃的对待；相反，它受到了误解。具体化的话语解释了主体没能抓取到的部分，因此，主体想要将其纳入自身同一性的任何尝试都变得窘迫而荒唐。列维纳斯对双重性的戏仿面进行了分析。他观察到，主体就是它的同一性——正是如此。此外，伴随着和主体一致的存在，这一主体戴上了漫画式的面具——它形象化的一面。列维纳斯指出，这种形象化总是具有漫画的某种特质。同样的，事物与作为知识和实践活动的对象并不一致，对于主体对它在和认知、实践功能的关系中的意图，它如重物般停滞不前。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物总是“静止的生命”： 393

> 存在不仅是它自己，还逃离它自己。某人就是他自己；但他没有让我们忘记，也没有消解掉，并且完全地涵盖了他所拿的东西和拿东西的方式，他的姿势、肢体、凝视、想法、皮肤，这些东西从他这一存在的同一性之下逃离了，就好像一个无法容纳他的破碎的袋子一样。就这样，它在和与他相一致的存在中，戴上了漫画式的面具，他的形象化。这一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漫画式的。习惯拿某物的手所熟悉的日常之物，已经完全适应了这只手，但同时它的质量、颜色、形式和位置在它的存在之下还和以前一样，就像被剥离下来的灵魂的“旧袍子”，就像“静止的生命”一样。（Levinas，1948，英译本：135）

因为艺术作品和死亡的关系，其双重性的漫画本质，以及形象讲述的时间是线性的、生产的、累积的，所以艺术作品多多少少总是同时具有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如同列维纳斯所说，每个形象都已经是一幅漫画，但这样的漫画是朝向悲剧

性的。

当我们开始从对话性和他性的条件来思考口头语言和书写的关系时，我们很快意识到，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寻求表现的他性的符号自主地存在着，而且先在于口头语言和写作。他性符号证明自己并不需要发声就可以存在。它和声音无关，在口头语言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同样，它也和书面符号无关，因为并非所有写下的东西都是对他性、对形象的描述。

他性和对话的具体符号问题穿越了口传和写作的两极。而且，它超越了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关系中的文字限制。对话并非口头互动中才有的，其间一个词语直接回应着另一个词语。事实上，因为它们在这个范围内是客观的词语，它们在身体交互性上是分离的，是独立的同一性的表现，而不是身体交互的互动和牵涉。另一方面，如果书写偏好对话类型的发展，就像“苏格拉底的对话”中那样，它也会生产出只保持对话形式而内容却是独白式的对话性文本。在这种情况下，对话仅仅是一种教学法的方式，用来详细解释一个论题或是学说。我们已经说过，柏拉图的对话（除了《会饮篇》之外）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种假的对话是客观的、自我肯定的词语的另一个例子。谈话会变成独白式的对话，这并非是它的书面形式造成的，而是因为对话的形式服从于直接的、客观的词语。在间接的、疏远的词语较多的地方，对话性和他性就盛行；为了和自己的词语（在报导和被报导的语言中）拉开距离，书写采取的是句法的、文学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把客观的词语变成了具体化的词语——就像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那样——对话的形式在内容中也重新发现了有效的对话性。

394

这样看来，书写并不是和书面符号的生产相一致的实践。在这些方面，“书写”也被用来暗示一种和声音无关的实践，它的印迹在符号中普遍可寻，不仅仅是在口头符号中才存在，而且每当我们进行单向的、不返回的运动时，或在“没有利益”的意义上也可以看到：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这种运动朝向他者，列维纳斯称之为作品。这种运动通过艺术得以表现，但不专属于艺术；相反，审美活动也具有作品的特征，它的印迹在美学界域之外也能看到，尽管它在美学界域内表现为基础的条件和方法。在这一语境中，“书写”是倾向于作品意义上的实践。

之前我们曾说过，我们可以用列维纳斯的词“印迹”来形容以作品的运动为特征的“书写”实践的标志。“印迹”就是他性和对话性敞开的标志。这就是列维纳斯在《总体性与无限性》以及《超越本质》两本书里所指出的，交流中的表意的意味——事实上，表意在言说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会被言说所穷尽。言说的意味具有如下特点：相对于“被说出”的独立性；对信息的交换而言它是无功用的剩余；不对称性和多余性（也就是说，言说的意味逃离了存在和描述它的范畴）；相较于“叙述”和“寓言”，在经济性上，它是无效且无用的；自指性、模糊性、含混性

和矛盾性；它所揭示的并不完全揭示它自己，而是保持着不可见性，并且不能被降低至客体的地位（换言之，它并没有失去自身的内在性和秘密）；最后，它向绝对的他性敞开。由于以上特征，言说的意味是接近、接触、身体交互性和被动的卷入，并且能够被书写——用我们的话来说，被不及物书写——所描绘。 395

要认识到列维纳斯的他性的关系是一种书写，以及这种关系是在言说的意味中获得的，就需要意识到一种含糊性，它包含在我们想要在列维纳斯提出的“面对面”的关系中看到的对口头话语的偏好，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书面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这回到了柏拉图那里）的贬抑中。

在《诗歌以外》一书的前言中（Levinas，1982b），列维纳斯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偏好：他指出，考虑到人类的词语具有一种能力，它表示的意义超过它所说出的；考虑到能指相对于所指、言说相对于被说出的多余性，人类的词语本身就是书写（同上，英译本：xi）。作为他性的表现、印迹、不在场的在场、保持秘密的同时将不可见转化成为可见的，词语本身就表现为与文学意义上的书面写作无关的书写。传播和语言并不仅仅是工具，在文学层面上，它们不会被规定的、主题化的、它们所揭示的意义穷尽。更根本的是，传播和语言是通过书写来传承的，而书写，如列维纳斯所说，是作品，是人类用铁针和笔把文字写在石板、羊皮纸和纸上之前就具有他性和对话性的能力：“文字之前的文学！”（同上）

9.2. 对话与狂欢化书写

9.2.1. 对话性的不同程度

在《行为哲学》[Bakhtin，1993（1920—1924）] 一书中，巴赫金分析了普希金的诗歌《格林卡》（又名《分离》），这是他的美学想象得以系统化呈现的一部分。后来，他关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并且发表了以此为标题的长文。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他再次分析了这首诗，并且提出了在最后一章残卷中所论述的几个概念。

巴赫金的研究发展的最后方向特别有趣。他的美学想象是从抒情诗开始的；在这里他从不同的视角中辨别出了对话的他性关系——在普希金的诗中，这表现为作者的语境和两位主角的语境之间的对话逻辑。在《离别》一诗中，即使是在一行诗句中，也可以辨认出三种不同的声音：离去的女主角的声音，为了离去的女主角而痛苦的男主角的声音，最后，是作者也就是诗人的声音，他知道女主角去世了。这些都证明了对巴赫金的错误解读是立不住脚的，此类解读认为巴赫金没有充分考虑抒情诗的类型；同时也证实了对他的对话概念的误解：对巴赫金而言，对话是一个程度问题。有的批评认为巴赫金在绝对的独白类型——比如说，抒情诗， 396

和各种对话类型尤其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为代表的复调小说之间进行了严格的两极划分。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性表现在所有的艺术话语中,在不同的类型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巴赫金对行为哲学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引导他走向他1929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道路,该书于1984年被译成英文。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分地表现了对话的可能性。

9.2.2. “节日时代”和书写的“伟大时代”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65)是巴赫金的著述的基本部分,包括署名为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所著的章节。

在《拉伯雷》一书中,巴赫金发展了《弗洛伊德主义》(Voloshinov,1927)一书中对正统意识形态和非正统意识形态的划分,将其和人文主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联系起来——尤其是中世纪喜剧流行文化中的低俗类型。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Voloshinov,1929)一书中,他继续研究普遍符号(而不仅仅是口头符号),分析了口头和非口头的狂欢符号向欧洲高级文学中的符号的转化。在他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的1963年版中,他特别将这一讨论融入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起源分析的章节中去,认为复调小说是“狂欢文学”的伟大表现,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流行文化中的半严肃半诙谐的类型,比如苏格拉底和梅尼普斯的对话。在《拉伯雷》中,巴赫金研究了小说词语的史前史,将其从流397 行类型的滑稽性和戏仿化(parodization)中辨别出来。

再者,他在《拉伯雷》一书中对“公共场合的语言”以及粗俗表达的双重特征的分析亦褒亦贬,肯定并发展了他将符号视为本质上是多音性的概念,尤其在口头符号中更是如此,这是语言生命中离心力量的表现。例如,他(Voloshinov,1929)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一段生动的对话所做的笔记的引用,这段对话是由一个单独的、有不同含义的粗俗单词形成的,在他对“狂欢”这一复杂现象的研究语境中,这和怪诞身体语言及其残余中的感觉的延展性和模糊性是紧密相关的。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在巴赫金的整体思想体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有关。巴赫金反对抑制阐释和将其过分简化,他发展了马克思所引入的观点:只有到了必然性的尽头,人类才能得到全面的实现。因此,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社会体系,是将自由时间——用于获取他性,获取自我和他人的他性的时间——而不是将工作时间作为真正财富的社会体系。巴赫金在他关于拉伯雷的专著中讨论的“非官方节日的时代”,是和文学的“伟大时代”紧密相连的。

9.2.3. 书写中的狂欢化

巴赫金在《拉伯雷》中告诉了我们狂欢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这部专著中，他用“狂欢”一词来表示一种存在于所有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在他看来，狂欢是由态度、观念、书面和非书面符号系统形成的，滑稽和欢乐的生活空间是它的方向。再有，狂欢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文化或俄罗斯精神；它触及到了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文化。

今天，在全球交流的时代，我们见证着生产力和效率的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扩展；这完全和狂欢、狂欢化的视野相背离。强调生产力和效率的意识形态以膨胀的个人主义为先决条件，这种个人主义和竞争逻辑相连，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和以身体交互性——也就是在和狂欢的关系中理论化的、自我的身体，和世界以及他者的身体的交汇——为基础的“怪诞身体”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尽管膨胀的个人主义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生产力和效率却不能消除人类对非功用性和他者的倾向。

398

人类是非功用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如文学书写所证明的那样，人性的特点就是狂欢化所坚持的。文学作品和所有审美活动一样，表现了人类对于无功用性的未曾写出的权利。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对社会体制的最终抵制是以由文学所代表的生产力和效率为基础的。由此，我们可以说，文学（以及广义上的艺术）是并将总是狂欢化的。

9.2.4. 巴赫金视域中的书写

由于超越了和人类本身相关的事实，人文科学可以被描述为人文性的；换言之，“人文”这个词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形容词，还是评价性的。我们可以把“人文”科学理解为承认人类的非功用性权利的科学。这应该是我们对符号、文本以及人性所生产的广义的作品进行理解的基础。不包含非功用性，以及无用的、非功用性的细节的人类作品是不存在的。主张非功用性，人类就成为了目的本身（end in itself），而不是工具（means）。

作品的创造性就在于，它自己就是作为自身目的的表现。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这种创造性表现只能在个体层面、在某个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到。相反，在之前的文化体系中，非功用性、剩余以及人类和人类的产品就是目的本身的主张在集体层面、在狂欢上都能得以表现。

巴赫金所说的拉伯雷式的想象力，它并不是由学术文章和科学著作的作者们所延续的，而是由文学作家尤其是小说家们延续下去的；而且，这些作家并非只是某一两个国家的，而是世界文学层次上的。除了西方作家（如费尔南多·佩索阿、伊塔洛·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之外，在

复调小说尤其是拉美小说中,这种叙述也得到了真正有趣的发展。要对巴赫金(1970—1971)进行阐释,我们可以说,巴赫金所说的拉伯雷式的想象力要庆祝自己的复兴,它的邀请对象是作家,而不是科学家、批评家和符号学者。

基于这些原因,巴赫金的拉伯雷专著不仅是他自身的思想体系的根本,也是总体的当代文化之根本。在1963年出版的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的第二版中,收录了关于他对话语、小说话语和狂欢化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重要修订。399 而他关于拉伯雷的专著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化学研究、文学理论和批评。同时,《拉伯雷》一书也直接和间接地启发了文学书写的灵感。除非一个作者在作品中清楚地写到自己的灵感是从何而来,否则是很难判断灵感来源的。而且,即使在有直接声明的情况下,也必须将作品本身和作者相对照,才能判定这一灵感来源是否属实。但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在意大利的文学圈内,艾柯的《玫瑰之名》、达里奥·福的《神秘的喜剧》,以及卡尔维诺的一些作品都至少处于巴赫金伟大作品的辐射之下。

9.3. 小说和戏剧中的对话与复调

9.3.1. 表征与描写

在巴赫金的整个研究中,对构成他称之为行为真实世界之"具体系统化"的不同方面,他都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是从他性的视角进行的。具体结构是整体的、独立的事件,依照所有的价值观、意义和时空关系而创造和组织而成。巴赫金认为形成这一结构的不同方面可以从我眼中的我(I-for-myself)、我眼中的他者(the-other-for-me)和他者眼中的我(I-for-the-other)这几个方面来描述。

系统化是围绕一个主体建立的,但是主体的位置并不能使它达成对这一事件的充分理解。事实上,主体的话语是直接的自指性话语,属于"忏悔"的类型,并不能俯瞰全局。主体停留在表征的区域内,这就意味着自我——作为表征的特征——对我之赖以形成的书面、非书面符号起到特殊的作用,因此不能将自己视为他者,无法离开自我同一性的区域。自我这一词语是客观的词语:自我很直率,它与其自身口头的、非口头的行为相一致。

想要通过外在于自我、以认知为目的、从知识论的单一视角出发的话语,对自我的具体结构进行全面的理解,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样一个视角是客观的、对他者漠不关心的,并且声称不带情绪性和价值判断的。因此,这一视角也不400 可能理解它所描述的事物;事实上,由于失去了使自我活着的、不可终结的视角,它往往会使自我变得贫乏。声称是中性的词语是另一种表征,它宣称自己客观地描述了他者口头和非口头的世界。表征的中性的、客观的词语是朝向同一性逻辑

的——也就是说，它意图将外在位置和不可交换的位置之间的关系降低为一个单一的视角，由此创造出一个不能有效地面对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的世界。

相反，巴赫金认为，对系统化的解释和理解就预设了他者的位置，这个位置既是不同的，又是关怀的、参与性的。在这里，不再是表征的问题，而是描绘或者描写的问题。被描写或描绘的不仅仅是被表现和描述的；它还是参与性的解释。"描述"这个词相当好地传达了这个意思，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翻译"。和表征正成对比，描绘或描写意味着，它在某一点上指向被描绘的对象，在这一点上的描绘几乎可以说是投降；同时，它也暗示着疏离和外位化，暗示着异质的关系，这种关系使被描述的内容留在了主体的位置上。

在《行为哲学》一书中，巴赫金指出，艺术——尤其是口头艺术，也就是文学——是以下洞见实现的所在："和我相互关联的世界在根本上、本质上是不能成为一个美学系统化的一部分的。我们之后会从细节上讨论，从美学上进行思考也就是把一个对象放在他者的评价面之上。"（Bakhtin，1993：74—75）在他 1979 年出版的书上，巴赫金紧接着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一文中发展了这一论述：

> 我和我自己的价值论关系在美学上完全是无生产力的：对我自己而言，我在美学上是不真实的……
>
> 所有美学形式中的组织性力量都在于他者的价值论范畴、和他者的关系；以跨梯度实现为目标的价值论的"多余"丰富了这种力量。（Bakhtin，1990：188—189）

对艺术作品而言，要在总体性上对主角的世界获取整体的反应，这是最基本的。这种整体的反应和单一的认知性的实际反应有所不同，尽管它对后者并非漠视；相反，它将所有单个的认知性、情绪性和意志性的反应整合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如果这种由人类进行的整体行为是为了获取艺术价值，它就必须让我们感觉到对现实、对生活、对主角作为表现的抵抗；让我们在描述上、在具体化上感觉到对客观的抵抗；感觉到主角的他性和它外在于艺术的价值。因此，这样的整体行为一定是从主人公在时空维度和价值观维度上的外位化位置开始的，特别是自传式的主人公更是如此。相反，如果不具备外位化的条件，自传式的主人公就会采用不具有艺术价值的忏悔式的暗示。 401

我们现在分析的巴赫金的文本预示了他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在 1928 年写成的署名为帕维尔·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形式主义思想。

巴赫金关于责任行为哲学的文章为他1929年写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提供了研究轨迹上的解释。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既不同于他小说中主人公们的具体概念和视角，也不同于作品的主题。相反，他在自己关于道德哲学的论文《行为哲学》中发现了系统化的印迹，这些印迹还存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整体结构中，而这些作品的基本特征就是它们是由对话性的逻辑组织起来的。当巴赫金声称“不应把其他人眼中的‘自我’作为一个客体，而是应该作为一个主体——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主导原则”（Bakhtin，1963，英译本：11）时，他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伊万诺夫在1973年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使得这一论述更加清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人物不再被“我”所描述，不再是一个对象。相反，人物自己就是他性的中心，因此是从他性的逻辑的角度来组织自己的世界的：

> 当巴赫金将从前严格的、确定性的权威定义变成主人公自我定义的一个方面时，可以说他展开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迫马卡尔·杰武什金阅读果戈里的《外套》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故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 杰武什金在《外套》的主人公的形象中瞥见了自己，这一形象是被限定的、被衡量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被定义了的：你的全部都在这里，再没有多余的、可多说的了。他觉得自己令人绝望地被预先决定了、已经玩完了，就像早已死去一样，但同时他又感觉到这种方法的虚假性……
>
> 也许可以这样表达这种反感的严肃的、更深层的意义：一个活生生的人类不能成为某个转述的、确定性的认知过程无声的对象。一个人身上总有些东西是他自己才能在自觉和话语的自由行为中揭示的，这种东西不会服从于外在的转述的定义……
>
> 只有通过对人物对话性的深入，才能看到他真正的生活，在这种对话性的深入中人物自由地、身体交互性地揭开了他自己。（Bakhtin，1963，英译本：49—59）

402

对巴赫金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描绘的对话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无论是否自觉，一个人的词语总是暗指着他人的词语。判断性的词语和对对象的判断都与其方向和立场不可分离，而这种立场一定是朝向他者的。这意味着词语并非直接指向其主题。一个词中总会有个折射的过程，因为它总是通过和他者的关系被调节，而这种关系既是认知秩序的，也是情绪秩序的。判断性的词语也是训示性的话语，因此也就是和其他话语进行对话接触的词语。在意识到

他人也有自我的背景下，自我得以完成，得到了理解；在“他人眼中的我”的背景下，“我眼中的我”得以实现。因此，在单一的声音、单独的表述中，对话性也表现着自己，因为在这一表述的每个“原子”中、在话语的结构最为精巧的要素中、在意识中，都存在着矛盾的多种声音。

9.3.2. 作者的词语和小说中的复调

叙述者并非只是停留在人物的外部，就像不参与对话的第三方那样。然而，如果叙述声音是外在的，它会表现为可以从对话中抽离的复调声音中的一个。在巴赫金看来，这就是小说和戏剧的区别所在。除非通过巴赫金所说的“小说化”的过程，在戏剧中复调是无法实现的。比方说，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就让一个傻子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声音中听到作者的声音。当代戏剧在小说化方面可以举出相当多的例子。

403

通过对复调的实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声音可以从对话中逃脱，包括作者和叙述者的声音在内。巴赫金指出，在某些例子中，叙述者与主角太过合一，以至于不能保持可以为主角的行为和事迹给出完整的形象的必要距离。相反，如果这种必要的距离已经建立，我们将会大致看到一个不参与对话的第三方，他对对话的立场是乐意地接受和客观地进行表征。在小说《双重人格》中，主人公戈里加德金用自己的声音取代了他人的声音，向自己求助，就好像自己是其他人一样，而且用这第二个声音来回应对他人肯定的需要，尽管他假装是独立的。叙述者的声音在这里趋向于和第二种声音会合，加强了嘲讽和讥笑的语调。巴赫金观察到，这就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叙述是对话性地朝向戈里加德金自己的，而且，出自他口的第二个声音作为其他人嘲讽的声音，是朝向他的双重人格的；而所有这一切都考虑到了还有一个包含在这一对话中的声音——接受者，也就是读者的声音。叙述者并没有抹去自己的声音和语调；相反，为了使人物做出回应并试验他的反应，叙述者愚弄和嘲笑着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就了这一切，并没有破坏叙述和主人公话语之间的连续性。在巴赫金的描述中，这就好比是我们目睹了一场处于单独的、分裂的意识边缘的饱受折磨的对话。

在后来的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低程度的复调或者说非单调，发展成了完全的复调，各种声音成为了真正的他者（甚至当他们在唱同一首歌时，也不是在齐唱），叙述坚持在对话性上朝向人物。对话性并不仅仅在于叙述话语的声调，这一话语往往是沉闷的、备忘录式的；它还在于叙述本身的总体方向。即便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的小说——例如《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不乏通过内部的对话对某些人物进行戏仿、嘲笑和奚落的叙述风格。但巴赫金观察到，即使这种沉闷的备忘录式风格占主导地位时，叙述话语通常总是和人物在对

话中，也总是朝向人物，吸引着他、触动着他，在对他说话而不是谈论他；而叙述话
404 语是在整体难以控制的距离上完成这些的：这就是复调的距离。

巴赫金向我们展示了，情节本身对于对话就是工具性的。情节为角色词语提供了试验的可能，通过激发它、揭破它，而使它和他者的声音相接触变得可能。人类并不是好像在对话之外就被给出，在进入对话之前就已经被定义了一样，以这样的方式来得以显明；对话也不是人类在对话之外所成就的序曲。人类是在对话中建构的，并不存在于对话以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的人物并不是作者的话语之对象。巴赫金认为，作者的词语是转向话语的话语，是转向在场的某人（他从关于他的话语中退场，以他的多余从代表他的词语中缺席）的话语，而不是转向某个不在场的人（他由此更屈从于在场的幻象）的话语。作者的话语把主人公的话语视为“第二人称”，将其转变为“你”而不是“第三人称”的、“他”的话语：这是一个正面的角度。作者的话语对话性地转向了主人公，他不是在谈论和主人公相关的，而是在通过小说的整体建构和主人公说话。毫无疑问，主人公的不可终结性和他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计划的一部分。主人公的话语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但是，巴赫金说，这些话语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创造的：为了作为他者的话语、人物自己的话语而得以发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是在认知关系之外的。它所建立的和他者的关系是完全处于主体—客体的模式之外的。这也是陀氏小说中的复调人物显身之处。

如果我们非要谈到“知识”，这样的知识就是在将人类的真正本质作为他者，作为一个独特的、无限的、未完成的“我”来理解的；它不是对某个人本身的理解，而是对自我，对作为他者、属于他者的“我”的理解（参见 Bakhtin，1929）。正如巴赫金所观察的，这是艺术层次上的人类知识，它在原则上和抽象的知识不同，并且和后者界限分明。和列维纳斯在《现实及其影子》中使用的术语一样，巴赫金将现实描述为以形象为特征的，而影子则是以概念为特点的。论及我和他者（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构成同等系统化中的人、物的关系）采取的形式，形象不会是中性的，形象不能从这些形式中抽象出来。形象在他自己的视野（主人公的视野）和他者的视野（作者的视野）中看见了为了自我和他人的个人，这一视野既是内
405 在的，也是外在的。形象不能通过单一的视角得以达成，而是需要外位化的立场、保持距离的参与、个别的参与和关怀性的不同。如果说这样的方向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学书写的艺术特征，那么作者在复调小说中的新位置就在于保持形象和外位化的立场，同时改变外位化的文学主题和多余的内容。

9.3.3. 对话和身体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当主角声称他完全和他者的承认、凝视和话语

无关时，对话的条件是最为清楚的；当人物表露出对他者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完全漠视时，对话就得以显明。这种态度在来自下层社会的人物的独白中最为明显。主角对独立念念不忘，使得他预见了自己的话语被否定的可能。但是，巴赫金（1929）指出，正是主角对他者回答的预期，以及它对这一答复的回复展示了他对他者的依赖。他担心他者可能会知道，他对后者的想法感到担忧。但是这种担忧揭示了他对他者的意识的依赖，以及满足于自我决定的不可能。

要在对话关系中表现出完全尊重他者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毫无兴趣。相反，他意在展示尽管存在自我和某个人自己的意图，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对话的情形。他让我们看到，作为被动的对他者话语的卷入，话语是具有对话性的。对话不是出现在各种观点和同一性的和谐构成中；相反，它构成于对整体的格格不入之中，构成于某人的同一性的虚幻集合中。事实上，由于同一性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异质性，就像"怪诞身体"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者的身体，同一性在对话性上变得破碎。

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的第一版（1929）中，巴赫金就关注了对话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在脱离实体的想法中不能获得对话性。对话是在声音中发生的——不是独白的、整齐的声音，而是内在对话的、分裂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暗指了在世界中具象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巴赫金强调了声音的具象化问题。他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的主角就是声音，作者并没有将其作为对象呈现给我们，406 而是让我们去倾听；这一论断被雷内·韦勒克（Wellek，1991）误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表现。这种误解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们对巴赫金的批评是相当一致的，后者不公正地将巴赫金称作"复调唯心主义"，认为他重申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建立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分别作为"灵魂预言者"和"身体预言者"而对立起来的观点。

巴赫金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身体对审慎话语的直接介入，这是很有意义的。他指的是暗示，一种经由主人公和他自己的身体的关系达到的效果，而身体是意识到他者并对他者非常审慎的话语的结果——当这种话语标榜自己具有最大程度的漠不关心、拒绝和反对时，事实上却精确地揭示了自己对他者的挂怀。书中下层人物的例子就非常明显，一个人的身体被各种声音所控制，因此被剥夺了自足性和单音性；身体不再属于主人公，不再是他自己，因为他暴露在凝视中、在他者的话语中。

身体使得个人所预设的独立性陷入了危机，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来看，身体在构成上都是和其他身体相交互的，因此，独立性的概念变得虚幻甚而荒唐。尽管分隔、归属、从属关系、分别和抹除对个体性而言是有用的，每个人的身体以及我们每个人都记得身体在构成上的交互性，尽管记忆是在"微观经验"而不是在

"宏观经验"(这个词是巴赫金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注文中使用的)中被决定的。对"自我的技术"和"个体的政治技术"(福柯语)而言,身体是难以控制的。就主体,意识和被驯养、等级化、过滤和适应了的记忆而言,身体是他者;对个人或集体的主体为了自身而建构的并且通过它来描述自己的同一性的叙述而言,身体是他者;对主体用作身份证明、用以展示主体并希望他者对其进行思考的形象而言,身体是他者;它是主体为了得到承认而戴上的脸谱,是在和同一性的关系中主体所吟诵的角色。被视为他者的身体是从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无功用性上被看待的,对于给定的目标、叙述和"真实"的选择而言它是多余的,在被认为是开放性结局的死亡中,它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活着的身体知道它是被知道的,在被感知以前就有感觉,在被经历之前就已经经历了,在被体验之前就已然体验了。这个身体和其他的身体相连,而没有破坏连续性;它被卷入了暗示着整个星球的生命之中,成为了广泛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没有技术可以帮助它从这个相互关联的复合体中解放出来。

407

和资本主义生产相关的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权力(biopower)的扩展,导致了身体对生产系统介入的被控状态,并且使将个体视为分离的、自足的实体的这样一种想法得到了肯定和强化。因此,以身体交互性、彼此依靠、身体的相互展示和开放为基础的文化实践和世界观一步步地、几乎是完全地消失了。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所谈到的流行文化对身体的不同感知方式已然绝迹,正如"怪诞现实主义"的不同形式已然绝迹。事实上,由流行文化所感知的身体,既不是完全个人化的,也不是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分离的,它和今天对身体、对肉身生命的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并不一致。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生物实体——一个属于个体的,由个体所支配的生命领域——怪诞现实主义所呈现的身体是未定义的、不囿于自身的,它和其他身体共生,个人生命的局限从中获得了转变和更新——这一点是根本性的——而且总是获得了超越。由于对身体的个体性的、私有的、静止的观念被不断地肯定,和怪诞身体的想法和实践相关的书面与非书面符号几乎消失殆尽。我们剩下的不过是民俗研究者们所关注的木乃伊式的遗物,保留在民族学博物馆和民族文学史中的考古遗迹。怪诞身体的符号包括仪式面具、流行的节日所用的面具和狂欢;如今我们只能感觉到这些符号已经褪色的形象。

怪诞身体的符号和语言解放并且赞美身体的多余部分和通道,那些倾向于和其他身体、和世界进行交流的部分。此外,这些部分还依赖于对人类和非人类不进行分界的种种混同与组合:

> 怪诞身体……是在形成过程中的身体。它永远不会结束,永远不会完

成；总是在被持续地建设和创造着，并建设和创造着其他的身体……怪诞身体忽视了无法穿透的表层，这一表层将身体作为分隔的、完成的现象，进行封闭和限制。 408

几千年来，艺术和语言的创造性形式中，盛行着对身体和身体生活的怪诞模式进行表征……

怪诞身体意象的海洋在时空中无边无际，延伸至所有的语言和文学，和整个手势系统；现代的艺术、纯文学和礼貌的谈话中的身体原则只是其间的一个小岛而已。在古代文学中，这种限制性的原则从来不占优势。它在欧洲的正统文学中到现在为止只不过存在了四百年而已……

在所有的历史变体和不同的类型中，新的身体原则代表着完全结束了、完成了并且受到严格限制的身体，对外在而言，它表现为个人之物。（Bakhtin，1965，英译本：317—320）

一旦用于维护统治阶级所建立的秩序和权力的官方意识形态和非官方意识形态相分离，怪诞身体就是正统文化所禁止的。在涉及身体部分的词语和表达中，怪诞身体有着非常丰富的语言，它们建立了相互依靠的关系，并且与世界和他者的身体达成了妥协。这样的语言可以在所有人、所有的历史时期中寻见，它总是指涉着不是严格意义上被描述的、稳定的、实现了的或者在自身中完整的身体，而是至少在两重身体关系中和其他身体相联系的身体：

新准则的身体只有仅仅一个身体；见不到双重性的影迹。它是自足的、以自我的名义说话的。它其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只和自己，也就是个人这个封闭的领域有关。因此，在它之内发生的一切都只有一个意义：死亡只是死亡，并不与生有关；衰老只是青春被迫离去。（同上：321—322）

在《拉伯雷》一书中，巴赫金用了更长的一章来讨论“市场的语言”。他分析了这种语言的形象和表现，展示了它是怎么和怪诞现实主义逻辑一致的。市场的语言充满了侵犯性的咒骂和责骂，但却常常以充满关爱和赞美的寓意结束。主体在交流中的一切距离都不见了。市场的语言是含糊的“两面神”（同上：165）。称赞和辱骂并不那么容易分开；称赞是讽刺性的、含糊的、处于辱骂边缘的；与之类似的是，辱骂也能很容易地转变为称赞。这种模糊性，这种否定和肯定的同时在场是滑稽文化的普遍特征——戏仿、反讽、诙谐——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滑稽文化内在的充满活力的、建设性的、总体性的想象，它产生的形象从来不是确定的、孤立的、缺乏生气的；相反，这些形象具有使双重性得以再生的能力。 409

达里奥·福对中世纪滑稽文化的资源及其戏仿的艺术作品(对宗教画像、祈祷文、礼拜仪式和秘密仪式的戏仿)涉猎颇多。在他从流行剧院中搜集到的,并且在《滑稽神秘剧》一书中进行重新组合的文件中,他对戏仿和嘲弄的形式赋予了某种特权。在他作为演员(他的戏剧化表现的主要模式)进行的模仿中,也可以看到流行的滑稽文化资源的表现:对他而言,表意的身体就是怪诞身体。流行文化具有颠覆和煽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它的特点,具有超越官方文化同源限制的趋势,其根本上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批判。为了展示流行文化如何可能对被动的屈从做出抵抗,即屈从于帮助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进行再生产的主流文化系统,达里奥·福使用了流行文化中的怪诞语言,可塑性、伸展性、流动性、喜剧性和含糊性是这种语言的典型特征。这是他的作品中的首要方面;他如何对身体进行描述,这也是很重要的;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作品是政治性的,也是艺术性的:"一切艺术都是政治。"(Fo,1975, *Attento te...! Il teatro politico di Dario Fo*:序言部分)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对文化同源化的挑战,这种同源化由那些通过传播进行控制的人而得以加强。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既不是辩证式的,也不是合成式的,因为在脱离实体的概念中并没有矛盾之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最后的给予并不是在独白式的结论中而是在相互应和的声音中被构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逻辑是以双向的逻辑展示的。这可能是相当精确的,因为概念是体现在对对方不可能漠视的不同声音中的,尽管这些声音甚至想要忽略对方,因而进行了种种误导性的尝试,逃避了声音的混合,差异在这种混合中得以蓬勃。对话性构成了话语和思想的真实生命,对此而言,独白式的对话是一种抽象,是从应分的责任中释放出的表征。事实上,我们所描述的对话性意味着,身体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的所有其他身体相互关联,也因此意味着无限责任/应答性,意味着我们所有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最初形式,这些都是通过声音表现来体现的,并且都处于一种存在关系中,在这里,身体在其单一性上占据了一个,不能和其他任何身体交换的位置。在1970至1971年的笔记中,巴赫金描述了从具体的、非合成式的双向逻辑到抽象的独白式辩证的过程,并宣称声音是双向思维和辩证思维不同的基础:"拿出一段对话并去掉它的声音(声音的分裂),去掉它的语调(情绪性的、个人化的),从栩栩如生的话语和反应中抽取出抽象的概念和判断,把所有这一切塞进一个抽象的意识中去——这就是你如何获取辩证思维的。"(Bakhtin,1986:147)

410

在巴赫金看来,声音和它的肉身(即身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和柏拉图的对话中明显不同,在后者的对话中(它并非完全独白式的、教授式的)声音的多样性在概念中被取消了。柏拉图感兴趣的是脱离肉身的理念,它在概念中是存

在，而不是对话的事件——这种事件本身就是对话。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参与概念并非参与对话，而是参与概念的存在。因此，在属于一个共同实体的联合中，不同的、关怀的声音被取消了。而且，巴赫金认为，另一个区分这两种对话的因素在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中，和柏拉图不同的是，对话既不是认知性的，也不是哲学性的。他倾向于将这种对话和《圣经》的、福音式的对话联系起来——比方说，在《约伯记》中——因为《约伯记》内部的无限结构，它不可能是合成式的，并且在知识的界域之外。然而，巴赫金也警告了我们，即使是《圣经》的对话也不能提供对话的更为实质性的特征描述，即那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写中可以寻见的特征描述。

9.3.4. 小说和戏剧世界中的戏剧化和复调

巴赫金探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中的戏剧化符号，但这种探索并不是在客观化和取消作者声音的意义上进行的；客观化和取消作者声音会使得作者成为一个不介入的第三方，从而取消了文本的对话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中的戏剧化在于它自身的不发展，它不会成为一个概念、对一种观点的解释、朝向结论的运动。就像巴赫金在 1929 年所说的，这种情形就导致了戏剧形式的倾向——然而，411 他补充说，这种形式并不意味着戏剧预设了一个单独的、独白论的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形态不是被放置在生成的序列中，就好像它们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不同阶段一样；相反，它们是在身体互动的同时性中被描述的。对话从叙述和历史朝向结论的单向途径中抽离了自己。这就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戏剧的时间统一性原则运用到了小说之上；这就倾向于描述那些对一个概念存在的历史形成无用的对话事件。同时性原则和复调是紧密相连的，在复调中，多种声音没有被一系列的想法所取消，没有被假定为辩证生成的阶段，也没有被导向一个结论。

巴赫金的对话性概念被普遍地误解了。韦勒克（Wellek，1991）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他对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的断言——以及他由此做出的对巴赫金的阐释——是不正确的。韦勒克认为，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写中的声音对话的主张将这些声音相互等同并且彼此独立起来（同上：498）。但是，巴赫金并不想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者的声音，否认作者的个人视角（同上）。相反，在巴赫金看来，作者并不是对主角漠不关心的，因为这会使得多种声音减少为被代表的对象；作者对主角也并不是采取着认同态度（在这里指的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和对生活的态度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出来的认同权力；同上）。如同巴赫金所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性并不在于彼此独立的声音的在场（同上：499）。复调也不在于他的小说对戏剧、客观性和非个人性的倾向，以及由此

而生的作者从文本中退场的学说(同上)。倘若确实如此,也就是说复调是个写作完全对话化的小说的问题,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不仅轻易地被他的追随者们所取代(韦勒克引用了这些追随者来支持他的论点)——比方说,海明威的《杀手》——而且会被他之前的作家取代。复调小说并非指的是小说采取戏剧的方法,因为这会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穷人》,以及他最具有复调性的第一人称小说《少年》(该书的形式预示了排除作者公开抒发感观的可能)成为巴赫金理论的反面。如果前面的假设属实,那无疑在戏剧类型中,而不是在小说中,复调的程度更高。但巴赫金的看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它使得对话性的互动不可避免。这一艺术作品没有什么方面是由不参与的第三方视角创造的。

412

韦勒克丝毫没有怀疑,自己对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概念的阐释是错误的。巴赫金清楚地分析了复调与客观性之间,作为类型的小说的复调可能与戏剧类型的限制之间的区别;而韦勒克从未提到这点。此外,巴赫金在他 1963 年版本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中,对自己在这一点上的立场谈得很清楚(Bakhtin,1963,英译本:32—34):他对卢纳察尔斯基对于这一专著 1929 年版的评论进行了批评性的回复,其中表达了他的立场。

韦勒克提到了卢纳察尔斯基初读巴赫金这一专著后的印象(卢纳察尔斯基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平淡乏味)。韦勒克对卢纳察尔斯基的看法几乎是肯定的,并且他补充说他对那一时期的巴赫金并不熟悉,忽略了教育部长卢纳察尔斯基曾经对巴赫金的这本专著做出了肯定评论的事实(Wellek,1991;同样在 1929 年,卢纳察尔斯基拒绝了本雅明为《文学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歌德的文章,参见 Benjamin,1980:148—151)。韦勒克完全忽略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对巴赫金的"复调"概念的理解和卢纳察尔斯基的理解是一致的,而巴赫金本人拒绝了这样的理解!

和韦勒克一样,卢纳察尔斯基是在作者完全消失的情景下,从客观性和戏剧化方面对复调进行理解的。因此,在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他都发现了复调的存在。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 1963 年版,即包含了巴赫金对卢纳察尔斯基的批评性回复的那一版中,巴赫金清楚地拒绝了这种解释,这可以很容易地延伸到对韦勒克的间接批评上。巴尔扎克的局限在于主观秩序,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的小说中,他未能在对角色话语的客观表征方面拉开距离。巴赫金说:"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小说的发展中同属一脉,而且是后者直观的、最直接的前辈……但巴尔扎克没有超越他的角色的客观存在,和他的世界独白式的确定化。"(Bakhtin,1963,英译本:34)

在巴赫金看来,莎士比亚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局限,这种局限是被我们之前提

到过的、本质上不是复调性的，而且只有一种世界观和意指系统的戏剧所决定的。413 我们也曾说过，莎士比亚和拉伯雷、塞万提斯、格里美豪森以及其他作家同属于欧洲小说中具有复调萌芽的一派，这种萌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得以成熟（同上：33）。在任何情况下，客观性和戏剧化都是和复调不一致的，甚至会损害复调。韦勒克认为，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描述为复调性的，这是建立在过度夸张小说的戏剧趋向的基础之上的；巴赫金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多种声音在任何戏剧中都可以看到（Wellek，1991：501）。韦勒克声称，他自己认为巴赫金陷入了慌乱，并以此得出了对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论的研究结论——换言之，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是由他想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开脱的动机所驱使的，因为当时的政府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罪人，这样的观点对当局而言更容易接受（同上：503）。韦勒克做出这一判断，是因为他坚信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是源于他对客观性这一教条的信仰（同上）。而事实上，韦勒克完全没有意识到巴赫金的外位化概念的意义，仅是这一个概念就应该让我们意识到，复调和相对主义及客观性毫无关系。

我们已经讨论过小说类型和戏剧之间相较于复调问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用以下的观点作为结论：巴赫金指出了小说类型和戏剧类型在对话能力上的不同。戏剧在本质上和真正的复调是不相符的；它可以采取多层结构，但却不能拥有多种世界观；事实上，它只承认一个而不是多个意指系统（Bakhtin，1963，英译本：29—31）。这是因为戏剧的声音是直接在舞台上进行展示的；在戏剧中，一个声音无法和另一个声音进行回应，至少不能普遍性地做出回应。由于非直接话语和自由非直接话语的不同形式，叙述的声音和角色的声音无法混合在一起，这就降低了不同话语和语言中西方化和反讽的可能性。

必须相对地看待我们的论述，它是在将戏剧和小说这种具有相当大的复调能力的类型进行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但是，当然，就它们作为“第二类型”，也就是提出具象化的、被描述的话语类型（其中多主题性在不同程度上被对话化了）414 而言，任何文学类型都是对话性的。从这个视角而言，戏剧相较于小说具有局限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戏剧中完全没有非直接的话语，没有双声的、内部对话的话语，或者说复调。此外，我们还必须牢记巴赫金对所有文学类型的“小说化”的思考：小说影响了其他类型，并且通过尽可能具有对话性和复调性意义的方式来重组话语，在这个过程中将其他类型“小说化”了。大部分的当代戏剧都受到了小说化现象的影响——想想看如布莱希特、皮兰德娄、萨特和加缪这样的作家就知道了。也有将舞台上的古典戏剧“翻译”为小说语言的例子。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就是意大利演员和剧作家马可·贝利亚尼的试验：他通过傻子的视角来讲述《李尔王》的整个故事，舞台上只有这一个声音；然而，通过不同形式的转述话语，

许多其他的声音进行了回应。

9.4. 在全球交流时代说故事：黑人的书面—口语文学

9.4.1. 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流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着重于交流的部分——尤其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全球交流。这当然也是本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会把全球交流和说故事(storytelling)的实践进行比较，特别会提到对话和身体之间的联系。

全球交流是受全球市场以及普遍的商品化影响的，这种普遍的商品化是现今的交流—生产社会的特点。全球交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同质化倾向和将所有的差异抹平的倾向。同质化鼓励个体和群体秩序中的同一性，以及个人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形成，这种秩序至少是误导性的。这些主义的形成伴随着竞争、冲突和相互排除的机制，是后者的补充。吊诡的是，对认同的寻求排除了他性的逻辑。事实上，对认同的肯定和自我肯定所必需的这种不同，是对其他差异漠不 415 关心的不同。这种漠不关心的不同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对他性的牺牲而达成的。这里我们指的是两种他性：内部的他性，它与内在的差异一致；以及外在的他性，即他者、他人的不同。

与之相反，讲故事是所有文化共有的实践。讲故事绝不是要否认差异，而是加强差异，并且因为对彼此的欢迎将差异联系起来。它有利于不同的人之间的相遇和身体交互性的理解。然而，在此之外，作为一种实践，讲故事还是对差异的结构—遗传学表现，这些差异在欢迎的基础上，对话性地跨越了不同语言和话语类型的差异。在历史上，讲故事发挥了一种连接网式的作用，许多个世纪以来，使不同的主题、主体、价值观和话语类型得以在不同的人群中流传。在这里，我们要牢记我们在传奇、传说、故事、神话、语言、格言、谚语等方面的共同遗产。在当代社会，和他者的交流主要是朝向全球的，它是导向个人利益的，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相反，在讲故事中，这种倾向被兴趣所推动的交流取代，重要的是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对他者本身的兴趣。

叙述实践通过不同种类的对话和话语类型得以发展，这些话语类型也包括了小说，它可以被认为是今天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类型。此外，这些实践还通过诸如电影之类的媒体得以发展，而不是仅仅通过书写和口语。在讲故事上，所有的文化和语言共有的特点是，它在讲述中构成了自己的结局，在给予他人灵感、唤醒他人、设计和倾听他人的愉悦中独特地得以建立。我们认为，讲故事的这种基本的特征使得它和那种为权力而服务的叙述有所不同：控制和惩罚的权力(讲给法官和警察听的故事)、信息的权力(新闻报告)、医治的权力(医疗案例的历史，心理

分析师感兴趣的故事)、救赎和拯救的权力(忏悔时的故事)、记录和建立历史意义的权力(历史学家重新建构的事实)等等都属于后一种叙述。

相反,讲故事的实践悬置了话语秩序,全球交流是为了服务于这种秩序而规划的,因为全球的或者说世界的交流对这种话语秩序是功能性的。这种悬置的结果是讲故事在交流—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停顿,从而允许了思考、批判性反思、对话、相遇和对他者的欢迎。正因如此,对于话语秩序,我们所描述的叙述实践是具有颠覆性的,因此或多或少是可疑的。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要探讨这个普遍的问题的一些方面,特别是会讨论到非洲和美国黑人文化中的讲故事的实践。 416

9.4.2. "口语文学"和书写

在本节小标题中使用的口语文学(oraliture)这个词,让我们想起了海然热(Hagège,1985)所创造的"口头文学"(orature)一词,该词是"书面文学"(écriture)的类比。口语文学或者口头文学规定了自身的口语性或者说是口语风格,并赋予了这种话语作为知识和经验工具的合法性,这和书写的合法性是类似的。约瑟夫・帕雷(Paré, 1997)使用"口头文学"一词来描述小说话语的口语元素——这些元素构成了口语性的一个方面。当我们谈到口传文学的不同类型,如短故事、传奇、谚语、韵文和歌曲时,相较于"口头文学",我们更青睐"口语文学"一词,它使得我们再次听到了口头的故事,但是是以书写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口语性被翻译成为书面类型,其形式是对口头讲述的记录,或者是多少有些复杂的文学表现。

口语文学催生了书面文学,也就是书写。"书写"这个词并不是仅仅让我们想起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口语文学在文学书写的各种形式中得到表现,它就成为了书写;或者说它是口语的变形,暗指了对口头进行记录的各种过程。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相互回应,这让我们想到了,非书面文学的各种形式已经是书写,是文字产生之前的书写。因此,口语文学代表了对世界进行建模的方式——它是"默思的游戏"之表现,它表现了发明性、相遇、卷入和倾听的愉悦——且在这一方面,较之于书面文学也毫不逊色。

作为研究叙述的初始方法,我们将要思考直接和间接源自于非洲黑人文化,也包括美国文化的书面—口语文学的一些文学表现。我们会特别提到非洲的后殖民小说,提到非洲的尤其是布基纳法索的短故事和儿歌,提到非裔美国人瑞莫斯舅舅讲述的、以兔子布雷尔为主角的故事,以及嘎勒黑人(居住在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林州沿岸海岛上的黑人)讲述的和布雷尔故事中的兔子几乎同名的兔子波的故事。

读者们不会看到对这个广泛的主题进行的详尽分析:我们的目标只是为对这

417 个复杂的领域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我们计划就这个主题出版一本专著，并且希望主要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来得出结论——尤其是比较文学（口头和书面的）——而不是从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民族语言学家的作品出发，虽然他们的研究对资料的收集和恢复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这些资料都会遗失。

我们认为，对我们提出的话语来说，作者的视角，也就是文学作者的视角才是基本的。在书写和书面—口语文学的形式中，比起作者来，谁更了解文学书写呢？像卡尔维诺那样的作家懂得"叙述的愉悦"、"创造出精巧情节的乐趣"以及他为《非洲童话》搜集到的"非洲传说"中有趣或恐怖的故事的"友好、交流性的幽默"。在这本由他编辑的童话的引言中，他强调，除了内容的趣味性，叙述形态也是非常重要的——风格、布局和叙述黑人故事时的姿势本身，都是重要的［Calvino，见Radin，1994（1955）：8］。

卡尔维诺坚持认为，相遇和交换是不以实用原则、对方的期望、给予和获得的逻辑以及利益为基础的——相反，它们的基础是巴塔耶所说的纯粹的"花费"。由于叙述和倾听的实践，花费和多余的逻辑在世界各处的不同人群的文化史中得以运转。这些实践和从兴趣主义角度理解的交流关系——也就是对达成既定目标有用的关系——是相抵触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关系都建立在敌意和冲突的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讲故事"利用了"市场、集市、表演、奴隶贸易和种植园中的奴隶劳动，以及在漫长战争时期建立的军事营区和商业航行等等场合，都是为了建立他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我们有了接触到口语文学的可能。

乔尔·钱德勒·哈里斯运用一个作者所具有的不同凡响的技巧，为我们写出了《老种植园的传说》和一群特别的黑人吟唱的歌曲，这些黑人的代表是瑞莫斯舅舅（据哈里斯说，这一形象是根据他所认识的三到四个真实人物塑造而成的）。

9.4.3. 相互远离的文本

这一类的研究最让我们好奇的地方，并非文本和语境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418 对理解文本非常重要，但是当文本被降低为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语言学或历史文献时，我们对这种关系并无兴趣。从生产这类文献的方法角度来说，文本不过是超越它本身的兴趣的前文本。我们关注的是文本和其他文本的关系，即使这两者在文化上、地理上或时间上距离遥远。

因此，在奥格·卡博雷的研究和他的《布基纳法索童谣集》中对我们来说最有趣的就是，不管这些歌曲只是一种游戏，还是作者为了将它们和它们的文化语境相连接、将它们在民族语言学方面和语言相连接而做出的努力，它们都体现出了游戏性。这些歌曲是口语文学清晰易懂的基调的一部分，并在卡博雷的记录中得到了忠实的表现。卡博雷将这些歌曲和布基纳法索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语境

联系起来，和他们受到的实际教育、和与传统的莫西社会（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相关的教育以及社会文化要求联系起来，使得这本丰富的资料集的文本主要成为了对歌曲、游戏和舞蹈带来的愉悦的表现。

卡博雷让我们原谅他称其为“参与性的观察”的研究方法，并解释说他是搜集歌谣的这个地方的当地人。他知道他的研究会有失去科学客观性的危险；他的判断可能太个人化，或是太受儿时记忆的影响（参见 Kaboré，1993：17）。事实上，按下他的道歉不提，我们对他的位置很感兴趣。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时间上的双重性，由于分隔它们的事件，两段时间不可避免地彼此远离：作者的童年时期，和作者履行搜集本书材料这一艰难任务的时期。毫无疑问，这种双重的时间性是和作者的科学研究相联系的，但它也和作者在儿童时期的寻找自我的愿望有关：将那时以口头文学的形式经历的事件转变为现在的书面符号。

作者致力于为莫西人如何特有地使用词语和语言提供一个详尽的解释。他所搜集的言谈和歌谣的模式是倾向于和语言进行游戏的，为语言设置陷阱和诡计，嘲弄并戏仿它，用它取乐。此外，和其他的语言学行为不同，这些歌曲逃离了要对既定目标有用的规范；它们唯一的实际作用就是创造孩子们的游戏。

419

在解释他的童谣时，卡博雷提到了莫西人的世界观这个象征意义上的关键，但他也借助了充满各种先在的象征符号的现代科学，如心理分析和文化人类学。然而，作者对这些童谣的象征意义进行解释时并没有在它们的固有价值上附加另外的东西。

我们相信，口头文学有将自己从即时的语境中解放出来，获得自我生命的潜力。甚至于，当它们的原有的语境被严重地改变、不复存在时——也就是说，当它们在和原有语境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被激活和发展时——这些文本依然有可能继续诉说、保持它们的重要性，依然有可能具有欢迎他者和倾听的能力。

卡博雷的童谣集的题目选得很好，叫做《小鸟在争吵》（*Les Oiseaux s'ébattent*）。多亏了这个题目的含糊性和它神秘的暗示，以及它最广泛的可能意义，它非常贴切地反映了童谣的特征。“小鸟在争吵”是对莫西语“Niuli zamzam”的意译——这个词组是由一个名字和一个拟声词构成的。它暗示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所充满的热情。而且，它运用了重复，重复除了是诗歌形式普遍的鲜明特征之外，还尤其是这些歌谣的特点。在童谣中，重复是很典型的，它表现了词语游戏中的欢乐，尤其是声音、节奏游戏中的欢乐。

毫无疑问，在词语游戏之外，这些歌谣参与了对它们的具体象征意义或特别功能的寻找。这种功能可以是教育上、道德上甚至智力上的——比如说为了训练记忆，或让某人习惯于逻辑和精确判断而背诵的长文本。然而，在或许是为了原有意图而存在的特定目标、结局、情况和行为模式之外，这些童谣还具有自身的固

有价值，也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作品的品质。换言之，这些童谣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宝贵的，然而它们没有获取什么，没有得到回报。这是真实的，甚至当它作为人性表现的最基础、最原始和具有功能性的工具时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是这样的事实：就功能价值和由此使得工具本身变得有价值和重要这一点而言，总会有一些符号——比方说装饰——是多余的。而且事实上，当这样的工具仅仅因为不再被使用，或者使得它们有用的语境或环境不复存在时，它们最后常常被陈列在博物馆中，受到（或者应该受到）极其严密的保护。 420

9.4.4. 兔子布雷尔的故事

路易斯・塔克西尔在其于1913至1916年间搜集的（由多丽丝・邦尼特于1985年编撰的）布基纳法索的故事中，也抵制了对这些故事做出道德化结论的倾向，拒绝将它们判定为不道德的。在这些故事里，占上风的是讲故事的乐趣。海尔，一系列动物故事中的主人公，他的行为说明了这一点。海尔和瑞莫斯舅舅故事中的兔子布雷尔，以及加纳的阿散蒂地区故事中的蜘蛛安纳西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在加勒比地区的传说中也有安纳西这一角色。有时候海尔为了正义而战，惩罚那些忘恩负义、自高自大的人物；有时候，他又是不公正的原因，还总能逃脱惩罚，是骄傲和狡诈的人物形象。尽管海尔的本质是夸张的、恶作剧式的，这一人物却引人发笑、惹人逗趣。因此，读者很容易被信任、友情、感激和慷慨的感觉所征服，这并非是由于它的内容或"故事的道德"，更多的是源自于叙述的结构和发展，它产生了一种总体的气氛，可以大胆地和他者一起参与其中。

蜘蛛安纳西是儿童插图故事书系列中的人物，该系列至少在20世纪初就在美国开始出版，至今仍受到读者的喜爱。对年幼的读者们而言这个角色的魅力至今长盛不衰，这应当归功于它讲故事的天赋。蜘蛛安纳西是故事之网的中心，这个网络不停地交织在一起，至今吸引着我们，因为它轻盈而灵巧地随着故事的经纬而展开，而不是为了最终的教育或非教育性的目的，或是导向和这个故事有关的道德、不道德的最终结局。

瑞莫斯舅舅的故事最初是由哈里斯在1880（事实上它们最初出现在1818年的期刊《亚历山大章程》上）至1948年间（该书第十卷的问世时间是在哈里斯去世之后）出版的。朱利叶斯・莱斯特（Lester, 1987、1988）对这一系列故事进行了重写。莱斯特（参见他的引言）试图展示出，在重建由他引发的混乱所破坏的秩序时，爱恶作剧的兔子布雷尔所扮演的道德角色。这个角色和我们潜意识的需求相呼应：为了重建秩序、重新将受到扰乱并陷入危机的总体系统化，我们需要混乱的出现。然而，故事中的兔子布雷尔也有自己的生命，对于坚持要赋予他预先设定的特别任务或功能的解释，他是与之无关的，甚至是与作者无关的。莱斯

特将兔子布雷尔从意识形态或政治秩序（将这只兔子视为某种地位的标志，或将其解释为对奴隶制、对种植园的抵抗精神等等）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他做得很对。但是，他陷入了另一个同样的重复陷阱，使这样一个人物发挥了承担维持话语的总体秩序的角色，而事实上他的主要职责是提供讲一个好故事的乐趣。当莱斯特宣称，无论我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奴隶抑或自由人、小孩或是成人，兔子布雷尔都是我们其中的一员时，我们当然可能对他表示赞同（参见同上：iii）；但是，毫无疑问，他所指的更是这样的事实：这些故事如今在比它们原有的语境所能预见到的宽广得多的范围中，都得到了流传。 421

多亏了哈里斯作为一个作家的特质，比起莱斯特来，他不仅和兔子布雷尔这个人物更加接近，也更接近于这样一个人物所预设的叙述者类型。实际上，在重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氛围方面，哈里斯是特别成功的，这与其说是由于他在适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在我们看来，这是次要的）将兔子布雷尔的故事净化了，不如说是因为他抓住了讲故事的松散形态。这尤其体现在瑞莫斯舅舅和他年幼的倾听者的对话中，兔子布雷尔的历险在其间复活，并获得了人类式的连贯性，因而有效地使这些故事的感觉得以复苏，好像它们延伸到了过去的时空一样。

在由普丽西拉·贾奎思编写并配图的一本书中（和哈里斯的书相比，这本书的时代更近）（Jaquith，1981），兔子布雷尔被转变成为了嘎勒黑人故事中的兔子波（但这并不是它唯一的变体）。尽管普遍的看法认为这些故事起源于安哥拉，该国的原住民在 18 世纪时被大量地卖往美国南方为奴，种植大米和棉花，但他们的源头并不完全清楚，也有假说认为嘎勒黑人起源于利比里亚。兔子波的故事最初是由阿尔伯特·H. 斯托达德用嘎勒方言搜集的（参见 Stoddard，1949），而在贾奎思的故事中它们是用由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嘎勒非洲语和当地英语所混杂而成的英语讲述的，试图以此再现嘎勒语言的感觉。

由于哈里斯作为一位作家而非故事搜集者或记录者的特质，他为兔子布雷尔的故事灌注了新的生命力和叙述的活力。以下是瑞莫斯舅舅的故事第一卷的第三十三个故事《为什么黑人的皮肤是黑色的》中的引文，它是个绝佳的例子，在其中我们也会看到试图重新创造南方种植园中的黑人故事讲述风格的混杂英语：

> 一天晚上，当小男孩看着瑞莫斯舅舅把一些鞋带卷起来，并且为它们上蜡时，他发现了一件让他非常好奇的事。他发现这个老人的手掌和他自己的一样白，这个事实让他疑惑，最后成为了他们的话题。瑞莫斯舅舅的回答引发了对一段未经书写的历史的热切吟诵，民族学家们一定会对此很感兴趣。 422
>
> “亲爱的，关于为什么我的手掌是白色的，”他安静地说，“嗯，说到这个，从前有段时间所有的白人都是黑皮肤的——他们比我还要黑哪，我和你们在

一起太久了，有点被漂白了。”

小男孩笑了起来。他想，瑞莫斯舅舅在让自己成为又一个笑话的受骗者；但这个孩子的想法再错误不过了。老人是认真的。不过，瑞莫斯舅舅并没有指责小男孩笑得不合时，他看起来好像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是的，先生。人们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样的，更别说以后了。现在黑人才是黑的，但过去我们的皮肤可都是黑的哪。”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瑞莫斯舅舅？”

“好久以前了。那时候我们的皮肤都是黑色的，这是许多年前我听来的。但是后来传来一个消息，在邻近的地方有一个水池，进去之后就可以洗成白色的。有个人找到了这个水池并且跳了进去，出来时就变成一个白皮肤的姑娘啦。感谢天神保佑！人们看到之后，就把水池打破，让水流了出来。身体最灵活的人最先跳进水里，出来就成了白人；那些第二灵活的人随后进去，出来后就是混血儿；到最后黑人才进去，他们到现在还是黑色的，因为他们只能把手掌和脚底打湿而已。”

小男孩似乎对种族起源的这个新说法很感兴趣，他又问了一些问题，因为瑞莫斯舅舅又特别补充说：

“印第安人和中国人都是混血的。我没见过中国人，所以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但他们告诉我说中国人的肤色在褐色和亮色之间。他们全都是混血儿。”

“但是妈妈说中国人的头发是直的。”小男孩说。

“亲爱的，这是因为，”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他们跳进水里时，时间不够了，他们就把头伸进了水里，水流把他们的头发松开，头发就变直了。从那以后，他们的头发就是那样的啦。”

瑞莫斯舅舅并不仅仅是在讲故事，他还和他的听者互为一体。他的对话非常 423 精彩，对他要讲的故事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意义，将其语境化了。尽管瑞莫斯舅舅只是个虚构人物（在类型学上他可能是真实的），哈里斯声称自己不能代替他回答问题，不具有他的智慧、诡计、滑稽和不一致性，因而赋予了他自身的生命和人格，和他保持了距离。哈里斯说自己仅仅是一个编辑者，无意中才成为了该书的作者（引自 Brookes，“Introduction”，参见 Harris，1880b：xii），这使得他作为一个作者却和他塑造的人物保持了外位化的位置。

哈里斯所写的、瑞莫斯舅舅所讲述的故事不是为了“写作的乐趣”，而是为了“倾听的乐趣”，这是他的家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感受到的（他曾经直接就此进行过

试验)。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在重塑一个曾经被创造、被世世代代传递下来的想象世界中找到了乐趣。他所关注的是想象世界,而不是时空中的遥远的历史语境,尽管这种语境可能是兔子布雷尔和它的同伴兔子波、兔子布厄和蜘蛛安纳西的系列故事的起源。他能够以极度的简洁来谈论人生,并且相信,较之于到"野人岛"的无用航行,较之于仅仅到最后发现了什么时候山里的部落和平原的住民会"向对方挥动拳头"之后才自行离去的故事,他的幻想世界观要生动得多(见 Harris, 1892 : vii)。

9.4.5. 小说和非洲口语文学的类型

在对非洲后殖民法语小说的分析中,帕雷(Paré,1997)指出,非洲小说是小说这一西方文学的典型类型和包括神话、传说、歌谣、谚语和语言在内的非洲口语文学类型的结合。巴赫金(帕雷回忆说)证明了小说这一类型在建构自己的话语时,是如何从不同话语类型的结合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小说这一类型继续着对混杂的偏好,文学和非文学类型、书面和口头类型、现代和传统类型都在复调的对话中汇集(见 Bakhtin,1975)。帕雷认为,因为非洲后殖民小说继承了双重遗产,要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就需要"杂糅的诠释学"。

从时间的角度而言,非洲小说的叙述结构中包含的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影响了非洲小说话语的自身结构。对于时间上普遍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小说中的、相互关联而没有彼此简化等同的时期与时间段的多样性,小说类型在这一层面上也进行了很好的回应。问题不在于要在时间的复数性中插入一个单一的、整体的时间,一个以单一的、整体的感觉为导向的、连续不断的时间流中包含了时间多样性的时间。相反,小说表现的是时间的他性,由于时间具有描述互为他者的、在小说中相遇的时间段的潜力——多亏了小说的对话性、多样逻辑和多音性——这造成了时间的碎片和不连续性。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小说是"反历史"的。就非洲在对它被殖民和统治的历史的抵制而构想的世界观而言,非洲小说再次将"反历史"作为从我们时代的主流历史观、从西方帝国主义历史和千禧年说的线性时间观中解放出来的方法。 424

在非洲后殖民小说的叙述中——它和短故事并列成为撒哈拉南部的法语非洲作者中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发展出了时间的泛时性形式。非洲的后殖民小说成为了非洲传统与现代性、书面和口语文学等不同叙述路径最后的相遇之地,它们相互交叉,彼此相生。混杂成为了具有创造性的综合,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说它是"对书写实践具有活力的再度挪用"。

这种再度挪用也对语言有所关注。文学书写的特有品质(首先是小说的话语)是用语言进行的,又在语言之外,在话语秩序之外,可以对语言保持更远的距离并

将其戏仿化、对话化和对其进行批评。在非洲后殖民小说中尤其如此，作者使用的是占主导地位的外国语言，比如法语。这种冲突不仅是在风格和语义层面上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尽管它不是以直接碰撞的、往往是独断而无用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对话化的辩证形式出现的。我们所说的语言冲突，并不是由用法语来表现沃洛夫语、阿拉伯语、马达加斯加语或班图语的事实所决定的。在此之外，语言冲突源自于，从另一个语言、类型和文化语言传统的角度去凝视一种语言和它的文学话语类型。

425

基于这样的思考，帕雷观察到，在法语欧洲小说和小说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关联，就像在其他的“边缘文化”之间，比如在法语小说和安哥拉语小说、马格里布语小说或拉美小说之间建立关联一样。而且，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并非仅仅是表面的类比类型，而是更为深刻的同源遗传结构序列。多亏了这样的“边缘文化”，小说到今天还能保持兴盛繁荣，得到更新。这样的书写实践作为他者的文化的共同感，为以趋向于加强对话化和差异之间的关怀为特点的文化作出了贡献，也为他者文化作出了贡献，这是对于全球交流的意识形态而言的，这种意识形态趋向于同质化，并且只能容下对彼此漠不关心的、非对话化的不同。

帕雷指出，通过这样的方式，处于边缘地位的共同文化得以出现；由于这种文化具有创造性地对书写实践进行再度挪用、对口语文学传统进行重建的创新能力，它开始质询边缘这一概念本身。

这种由来自“边缘”的他者共享的文化——这一文化是通过对书写类型和叙述（尤其是小说）中的口语文学资源的全面评价实现的，而这种评价来自于诸如非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文学生产中的“非洲文学”圈——指出了文学批评所坚持的“国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这一抽象概念的局限性。事实上，“国族文学”这一概念的结果是碎片式的、不完整的世界观——作为一种身份的新表现形式，它只能将国家权力的话语总体化，并且在最终的分析中，将交流—生产体系总体化。

“国族文学”的抽象概念遮蔽了“边缘文学”的颠覆特征。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有意或无意地）阻碍了边缘文学对自己所处的真正位置，也就是边缘地位的认识。这里我们指的是重建和再生的力量，它不仅可以描述和抽象意义上的文学（就像它属于博物馆一样）的关系，还可以描述和生命、和至少被认为是有人性的世界观之发展的关系。

阿比奥拉·F. 伊雷莱早在1977年就注意到，讨论与非洲文学有关的国族文学是不可能的，帕雷遵循了这一看法，对国族文学的概念进行批评，并且提议用“元国族文学”（metanational literatures）的概念来取代国族文学。“元国族文学”的概念并不关注归属和身份的条件，而是关注作品的属性——在这个语境下，“作

426

品”指的是“艺术作品”——它强调艺术作品不可约减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事实，由此强调艺术作品构成的非归属性和他性。“国族文学”和“元国族文学”：后者必要的复数形式暗示了差异，暗示了他性的逻辑，它在由差异、关怀性的差异和他性所构成的关系中加入了不同的文化。

帕雷认为，非洲小说对非洲口语传统类型的复兴功不可没，这些口语传统类型进入了和小说类型的对话接触中，其结果是非洲小说为重建小说传统自身，将其从僵死化的趋势中解放出来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样地，对于“从边缘而来”、“从下层而来”、“来自南方”的世界观的发展，它也贡献良多。来自边缘的、新的世界观并不仅仅是就这个世界提出另一种可能的世界观而已；更根本的是，它能够在主导型的交流圈里创造出有效的他性的条件，因此，也能在“世界”中、在“现实”中、在现今的交流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所生产和流传的“物的存在”中创造出这种条件。

非洲小说的概念证明了一些方法论的狭隘和贫瘠，比方说，它们否认继续用殖民者的语言写作的非洲作家的文本的非洲特征，或是鼓励人们去寻求一种无用的“考古学上的同一性”。与之相反，帕雷指出我们必须在非洲法语后殖民小说的叙述所提出的同一性和差异中吸取经验。这一提议是“多样态同一性”的，是非洲文化和西方元素的结合的创新性结果。对主导性的交流系统所采取的同一性概念而言，由此而建模得来的这种结合超越了同一性和他性。小说叙述的“综合混杂性”为多样态认同的概念赋形，这种同一性是在可辨识的差异（recognizable differences）的相遇中发展而来的。

非洲小说如何和外国语言相联系，并且使用它们，这是文学书写和语言（langue）之间关系的作品的范式。这也是对主导性的交流进行批评的作品的范式，是被抛状态（Geworfenheit）的边缘作品的范式，它证明了自身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帕雷用“语言吞噬”（glottophagia）这个词来描述语言和话语秩序之间的关系。非洲的语言贪婪地吞噬和同化了法语；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语言吞噬”和将其转化为多样态同一性的表现工具都是经历和建构这个世界的新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考古式的、误导性的同一性。

427

这就是文学书写的语言吞噬特征，西方作者对此也很熟悉，并且在实践中将其作为文学性的条件。利用当今的全球交流—生产系统来加强这种实践，赋予其力量，并以此来恢复和口语文学相关的叙述或讲故事传统，这是有可能的。非常明显，它是和殖民国家和新殖民国家的文化人类学的主流方法相对的——它致力于恢复口语传统，将其作为灵魂中将要保存下来的真诚性的表现——由于它是口语文学中的重要传统，非洲对这种类型的“文化人类学吞噬现象”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其他的“边缘”地区也能作出贡献）。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独

白式同一性的人文主义，进而有利于人文主义的新形式、他性的人文主义——或者，用我们更喜欢的词语，有利于多样态和多种逻辑同一性的人文主义。

生平简介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1906年生于考纳斯，1995年逝世于巴黎），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通过以本体论批判的方式处理异质性的问题，从而对符号语言学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代表了在与本体论重建相关的多方面运动中，能够与哈特曼、布洛克、海德格尔、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和巴赫金相提并论的原创性的贡献。这种重建和知识逻辑所垄断的，以认识论的方法进行还原性论述的哲学大为不同。列维纳斯在和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对话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在1928至1929年间他听了这两人的课程，并第一个将其引入到法国。

428



谓词判断、辩论和传播

第十章
理解和误解

10.1. 谓词判断的符号谱系学

10.1.1. 作为构成性现象学的符号学

符号学作为普遍的符号理论，关注的是基础、原则和可能条件，它必定是以哲学为导向的。从这一点而言，符号学与语言哲学是很难区分的。

本章所探讨的问题是将语言哲学和符号学都作为构成性现象学。我们从逻辑与知识理论的形成对这二者进行观照。

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话说（Husserl，1948：1），我们思考的领域转向了问题的起源（Ursprungsproblem），此外，逻辑和知识理论，或者说知识论（gnoseology）不可避免地和本体论相关联，后者是关于普遍的某物、普遍的存在的学说。这种关联性是因为如果没有谓词判断，预测和判断都是不可能的，而谓词判断包括了对某物之存在的预测。另一方面，一旦符号学将符号定义为被解释者解释的某物，"它必须对该物做出思考"，这种思考作为一种存在，是被称为本体论的哲学思考领域的一部分（参见 Eco，1997a：6）。

然而，问题的起源和本体论也是相关的，它也不能被简化为存在如何形成、如何通过文字符号和普遍的符号来揭示自我的问题，因为这会意味着本体论的非批判姿态。要理解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超越存在的视野；事实上，存在是从"退出"、从"外在"开始的——这种外在并不意味着虚空或空无。在存在的生产机制，也 431 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本质"(他用 essance 和 essament 这两个词来表示这一意义)中早已存在着空无；也就是说，空无早已是存在形成和持续中的一部分，空无在涉及存在再生产的辩证法中被预见了。列维纳斯指出："'本质'一词拼作 essence，而不是 essance，这种拼法将'实在'（esse)这一存在的过程或事件和'实体'（ens）区别开来，把'存在'（sein）和'存在者'（seindes）区别开来。"（1974c，英译本：187n1；亦见"Note"，同上：xii）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导向本体论界域之外的复杂而

明晰的问题，列维纳斯称之为"超在"（otherwise than being），这个术语出现在他1974年出版的著作题目之中。

"另一存在"（being otherwise）的概念仅仅提出了一种异质的存在，在本体论领域中的一种替代；"超在"与之不同，它不是存在所包含的，也不是存在的替代性选择，而是存在的他性。跟随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将这一对于本体论而言具有他性的方向称为形而上学。本体论预先假定了形而上学。超在并非存在的彼面，而是存在的此面——换言之，它是存在可能的条件，是它的基础。我们可将其形容为先验的存在，尽管如这种形容会使得超在看起来像是一种心理特性和认知条件，因而是异常的。他性是存在的条件，但并不仅限于此，这一功能并不能将其穷尽；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并非它的使命"，它"不是为此产生的"。最重要的是，超在的他性是存在于伦理维度而非认识维度之中的。它存在，兴盛，引发人的兴趣，让人萦绕于怀并承担起责任，但它的目的不是决定存在。我们稍后会说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仅仅这么说吧：和本体论的起源以及谓词判断相关——因此也和逻辑相关——的问题必然会涉及形而上学。

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符号学、语言哲学、知识论（知识的理论）、逻辑、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全都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把这些方面最为清楚地联系在一起的作者之一就是皮尔斯。事实上，在本章中我们最主要提到的就是他。比皮尔斯更为近代的列维纳斯通过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仔细辨析，为本体论不能排除形而上学这一论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讨论也将以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他的《经验与判断》一书为指导。许多其他的作者也对这一讨论作出了贡献；然而，在目前的语境之下，我们只会简单地提及维尔比夫人和罗瑟—兰迪，后者的《意义、传播和共通语》一书清楚地讨论了意义与传播的基础和可能条件的问题。

432

符号学必须反思胡塞尔所说的已经被给予、完成、构成和决定的世界的可能条件。如果我们从想要做出改变的视角去批评世界现有的构造，这种反思是必须的。我们可以说，符号学实现了胡塞尔称之为构成性现象学的学科的全部工作，这门学科旨在说明整个导致"可能世界的构成"的一系列行为（Husserl，1948：50）。我们对这一定理的进一步说明特别感兴趣，引用如下："当我们说'可能'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世界，而非我们真实有效地存在的世界的基本形式问题。"（同上）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在事实性、现实和历史方面，还要在潜在性和可能性方面对人类世界的建模结构和过程进行探索。这种探索处理的是人类这一物种建构世界的特有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独特的。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类这一动物的特点是拥有建构无限可能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遵循西比奥克的观点，同意将人类建模世界的工具称之为"语言"，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建模工具是人类所独有的；因此，只有人类可以建构无数真实或想象的、具体或幻想中的世

界，而不是囿于一个单一的世界。

符号活动的现象学能够解释构成可能世界所包含的问题，有鉴于此，符号学展现出胡塞尔所说的先验逻辑。它也证实了胡塞尔对心理学局限的批评，他认为事实上心理学所研究的主体已经被定义，被置放在一个各部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决定了的世界中。相反，作为先验逻辑，符号学的任务在于重建可能的工作，这些工作生成了已经被给予的世界和心理主体，使它们成其为它们。

433

作为语言哲学，符号学无法回避由艾柯抛出的如下问题（Eco，1997a：4）："使得我们生产出符号的某物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让我们言说？"艾柯提出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想到皮尔斯的"动态对象"概念，并回答说正是动态对象"促使我们产生了符号活动"："我们制造符号是因为某物要求被说出。动态对象使用的表达很难说得上是哲学性的，但却是有效的，它踢了我们一脚，让我们'说吧'——或者是'说说我'，又或者是'考虑一下我！'"（同上：5）艾柯认为，这一回答预先假定了知识论。然而，在我们能够将使得我们制造符号的某物视为动态对象、本体（noumenon）、固有之物（brute matter）之前，待定的某物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先在于感知，早已是符号性的。因此，艾柯采用了皮尔斯的"基础"这一概念，它并不是"某物产生的背景"，而是"从无法分辨的背景中产生的某物"（同上：46）。如果我们把这个词翻译为意大利文，正如皮尔斯所说的那样（Peirce，1980），也就是 base，"它并不是指动态对象的基础，而是我们想拥有的关于它的知识的基点和起点"（同上），是一种感觉。因此，它是"非形而上的（实体化的）认知过程"的"根基"或"基点"，"而基础与之不同，是物质，是含糊地自我展现的某物，并且成为了述谓的一般主体（subjectum）。它自己就是个可能的谓词，更多接近于'它是红色'这一表达，而非'这是红色'"（同上：81）。

10. 1. 2. 对象现象学的四个不同方面

接下来我们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对象的产生这一问题：

> 1. 作为感知的符号学起源问题，它始于就基础而言尚不确定的某种刺激。

从这一视角来看，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一书中已经对从"它是红色"到"这是红色"这一转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从受某种待定之物的"影响"的主体的完全被动的情景出发，讨论了"S 是 p"这一谓词判断的产生，这种待定之物使得"我"转向了"它"。胡塞尔将"我"作为他进行现象学重构的起点。换言之，这个起点是有意的意识，这是他的现象学方法的预设假定。但是，如同我们曾经指出

434

的，这个起点并不是心理上的自我，而是将自我作为建构心理自我的可能条件和与之对应的“已经被给予的世界”的条件的集合来进行理解。

事实上，就胡塞尔对身体及其周围的世界进行的现象学分析而言，进一步的“反推”是可能的。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个阶段，就纯粹的、单纯的结果或者说快感（jouissance）而言，这时主谓结构尚未形成，而是仅仅被身体所获得。这也是列维纳斯在《总体性与无限性》一书中所关注的。在这里没有主体也没有谓词，因为给予快感这一感知的是非人称的形式，比方说我们说“下雨了”或者“真热”时就是这样：就算我们在说一个红色的物体，我们既没有用“这是红色”，也没有用“它是红色”的句式。这种反推并不是从逻辑转向知识论，或是从谓词转向感知，就像这些界域是在不同的、分散的疆界中存在着一样；它是个从逻辑——知识论和谓词——感知返回到产生它们的层面的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断言：甚至在皮尔斯的思想体系中，也不存在着从逻辑到知识论或者说从谓词到感知的转变，我们可以将这个转折点追溯至1985年（参见同上：80）。事实上，在皮尔斯的思想中，与其说有着一个转折点或者转向，不如说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始于“某物自身”或者“动态对象”中的“直接对象”的起源。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不仅是逻辑的、知识论的，也是本体论的，存在本身和意识成为了先在的、超验层面上的问题——这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

此外，根据列维纳斯的非人称发生（impersonal happening）的观点——他用法语的“il y a”（无人称动词，意为“有”）的结构来形容这种情形——知觉既不是表征，也不是认知过程的初始阶段。相反，它与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因此，它意味着，即使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并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审美的，只是因为我们随着感觉被抛入了快感的维度，纯粹的、简单的自我享乐的维度。

435

2. 将人类文字和非文字符号的产生视为动态对象的解释项，它始于因为其物种特有的建模装置而强加给我们的基础，按西比奥克的说法，我们将这种建模装置称为“语言”。

正如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共享同样类型的符号一样，只要人类的符号和他们所特有的、能够使他们建构无穷的可能世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它们就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因此，通过使用有限的元素，人类可以生产出无数不同的意义和感觉界域：通过对两块石头的不同组合就可以“书写”，从而产生不同的意义，这不仅仅可以产生同一语域的不同意义（以打猎为例：猎物在左边，猎物在右边，个头的大小等等），还可以产生不同的语域中的不同意义（表达打猎、战争、爱的意义等）。

3. 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这是当我们一方面谈及符号学与逻辑的关系，另一方面将符号学视为先验逻辑时不可忽略的问题。

如上文指出的，存在和本体论不是自足的、自我封闭的。现实有着和它不可分割的影子；同一性包含着他性，就如它囊括后者一样；整体性是向"无限"敞开的，应当这样理解无限之"无"：它对局部价值既有否认，也有提倡——这是笛卡尔式的理念，少包含着多，包含着多余、无限或超越。

4. 意识和存在之间关系的伦理基础。

照艾柯看来，认知符号学作为语言哲学所处理的问题绝不仅止于终极（terminus ad quem）问题——也就是说，它还必须处理我们谈话或生产符号时所指的普遍条件。它也必须处理终极问题，即什么让我们言说、让我们生产普遍的符号。从根本上说，是什么让我们产生符号活动，让我们作为主体而存在并成其为我；如果我们仅在对象，也就是动态对象中寻求答案，像艾柯那样断言是对象"要求自己被说出"，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回答就会失之偏颇，并且没能对感知到说话需求的整体语境做出解释。换句话说，这个回答并没有解释这样的事实：和对象的关系总是由和他者的关系调节的——并非物的意义上的他者，而是作为另一个人的他者。事实上我们可以声称，是我们和他者的关系使得我们说话，这种关系要求主体应当说话。实际上，并不令人惊异的是，在艾柯对动态对象的讨论中，他就运用了暗指人际间关系的各种比喻：动词"要求"、"考虑一下我"和"说说我"这样的表达，以及另一个词——他开玩笑式地希望这个词能被译为德语，由此说明，"在意大利，它在哲学上得到了严肃的对待"（同上：389）——这个词就是"踢了我们一脚的某物"（something-that-gives-us-a-kick）（同上：5）。 436

如同巴赫金所详细阐述的那样（Bakhtin，1929、1963；亦见 Bakhtin-Voloshinov，1929），说话并不仅仅意味着要用他者的话语来说话，还意味着要不可避免地在卷入和暗示的关系中描述他人，以至于说话总是在回答，并总是在对之负责——从自己承担责任的意义上而言，说话就是在为自己辩护。我说话是为了回答别人。正如列维纳斯在《非意图的意识》一文中所说的（Levinas，1991，英译本：123—132），我被拒绝的第一种情况并非主格式的，而是直接宾格式的。他者对我提出了问题。某物或者说存在的问题和我自身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后者为了它在世界上所占据的位置，为了它和他者关联的方式，都必须先承担自己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就像巴赫金（特别参见 Bakhtin，1919、1922a）和列维纳斯彼

此独立又一致的观点所坚持的那样，第一哲学就是伦理学。就像列维纳斯所说的，主要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这不是空无而是存在"，而是"为什么我存在于此地、这一居所、这一情形中，而其他人被排除了？"人类符号活动的起源不是有意图的意识，而是列维纳斯说的非意图的意识，是从伦理意义上而非认知意义上理解的意识，更确切地说，是"坏的意识"，它想要为自己辩护，让自己安心，想要在面对他者通过自身的存在而提出的问题时心安理得，在这个过程中，它将自己调节成为了"好的意识"。

10.1.3. 作为先验逻辑的符号学：基础的问题

如同我们接下来会仔细讨论的那样，基础是皮尔斯的符号类型学中的第一性 437 (firstness)，它属于像似性的范畴。第二个阶段则是第二性和指示性。艾柯自问，基础的问题在于直接性直觉是先在于推理活动的，还是包含了推理过程，或者至少在直接相继的阶段上是如此？如果前一个假设是正确的——基础是先在于推理活动的直接性直觉的问题，所以我们只会有"某物在我面前的单纯感觉"，一种"不含任何智力因素"的直觉——那么"年轻的皮尔斯的反笛卡尔式争论"就会有一些不足(参见 Eco，1997a：81)。换句话说，它意味着返回笛卡尔式的关于明证性(evidence)的概念，这是在解释过程之外的。引入胡塞尔就可以避免这种矛盾。事实上，他的现象学分析基于这样的视角：过程解释了回到"直接明证性"的可能——或者说，照他说的，回到与"调适了的明证性"或"建立起来的经验"相对的"素朴经验"——而没有抛弃康德的先验逻辑视角；素朴的或直接的经验是由和法则或者和感知的基本结构相对的活动形成的，尽管只是在"反判断"的层面上如此。

在对谓词判断的重建和对逻辑形成过程的研究中，胡塞尔关注的是主体进行的活动，他将其和心理主体性区别开来，认为后者是预先建构的世界的一部分。胡塞尔所关注的、导致谓词判断形成的活动是由先验主体性进行的，这显然是康德的观念。在胡塞尔看来，明证性是直接的，它总是包含了由先验主体性进行的活动。尽管如此，关于"最大限度建立起来的经验"，他谈到了"最大限度的素朴经验"或"直接明证性"。和皮尔斯不同(想想看他在1868年写的所有文章，《有关人之某些能力的问题》和《四种不能的一些推断》)，胡塞尔拒绝这样的可能：想法会被其他想法完全破坏。同时，他采取了笛卡尔关于"明证性"的概念，但赋予其相对的含义。下面一段引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它引自《经验与判断》一书。为了肯定自己对先验活动的重建，胡塞尔在这里提到了笛卡尔。

换言之，我们在揭示这些意向性的隐含作用时，在对世界的意义积淀物

> 询问其在意向性作用中的起源时，是把我们自己理解为先验主体性的；这里的所谓先验，不应被理解为别的什么东西，而应被理解为笛卡尔所开创的那个原初的动机，即对一切知识形态的最终根源作进一步追问的动机，对认识者向自身及其认识活动进行自我反省的动机。（Husserl，1948，英译本：49—50）

438

皮尔斯和胡塞尔防止我们陷入经验论和天赋论的对立（但是乔姆斯基于1966年天真地再次提出了这种对立，他在语言理论上返回到笛卡尔那里，就像皮尔斯和胡塞尔从未出现过）。皮尔斯和胡塞尔的理论都来自于康德（这又和乔姆斯基相反）。除了对康德的先验主义和笛卡尔的理论进行推演之外，胡塞尔还详细说明了，客体和主体在感知的最低层面上的相遇并非客体和白板（tabula rasa）的相遇，就像天真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理解的那样：

> 至于前谓词判断作为自我主动性的一个较低阶段（作为接受性阶段），即知觉察觉、解释辩明等阶段，是如何与更高的阶段即谓词判断的自发性阶段区别开来，我们马上就要来详细地加以研究。
>
> 在较低或较高阶段的自我主动性这种最广意义上的判断活动不可与那种被动的信念，即休谟和追随他的实证主义假定为意识白板上的材料的信念相混淆。（同上：61）

艾柯的起点是青年皮尔斯对笛卡尔式的直觉观的批判——因此是对内省和直觉的力量信仰所作出的批判——和皮尔斯后来所持的，即使是在最低的感知层次上的认知也是由假设推理完成的观点，他由此对基础如何成为认知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提出了疑问（Eco，1997a）。当基础出现时，我们并不期望可以看到推理过程。如果推理过程存在的话，它也无法区分基础自己和直接对象。直接对象是由关于它本身的想法所再现的对象（参见 CP 8.343，5.286）。对于引发解释反应的、作为个别符的动态对象而言，它是类型符。由于直接对象是在作为类型符的基础上被解释的，它不再是像基础那样单一的、未定的知觉。相反，作为独立的实体，直接对象是类别的一部分，它已经是整体之内的个体。因此，艾柯认为，“从某种意义（当然不是全部）上而言，对于我们如何从印象导向观念，皮尔斯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Eco，1997a：47）。艾柯用马可·波罗、独角兽、康德和鸭嘴兽的例子（或者说寓言、比喻），向我们展示了当构成一个直接对象时，多亏了既定的“百科全书”中的某些相似性，我们是如何通过已知来决定未知（而未知从不是全然未知之物）的。

439

10.1.4. 相似性、基础和直接对象

相似性（similarity）的概念为区分基础和直接对象带来了一些困难。事实上，对皮尔斯而言，相似性是某物作为第一性、“就是如此”的所在和纯粹的质的特点；同时，因为相似性，直接对象成为了解释项、某个被解释符号的类型符、一个个别符。艾柯因此做出了以下的推理：

> 如果像似符（icon）是相似性，那么基础甚至不应该是像似符，因为基础除了它自己以外，不能和任何物具有相似的关系。皮尔斯在两个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基础是一个概念，一个梗概式的图表，但是若真如此，它就已经是一个直接对象，是对第三性完全的实现；另一方面，它是一种不类似于任何物的相表（likeness）。它仅仅告诉我，我所感受到的知觉是从动态对象那里以某种方式发散而来的。（同上：84）

当皮尔斯的论述不够精确时，艾柯对此采取了反对的姿态，他声称我们必须将相似性的概念从以“比拟（similitude）的关系”为基础的比较中解放出来。艾柯完成了这一“解放”，保留了相似性的概念（或者说看起来如此）——为了基础、像似符和第一性的概念，他将相似性和比较、比拟区分开来——他出人意料地总结道，我们不能通过说像似符是一个比拟来解释它，也不能通过“说它具有相似性”来对它进行解释。因此，“像似符是一种能找到所有可能的相似性判断的现象，但是不能建立在这些相似性判断之上”（同上）。此外，艾柯从像似符中排除了比较和比拟，并且（出乎意料地）排除了相似性，他继续对像似符和心理“形象”进行了区分。在皮尔斯的著作中，像似符的概念是和相似性、比较、比拟及心理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艾柯坚持要把像似符和这些分开，那是因为他谈到的是基础的“初级像似性”（primary iconism）：

440

> 我并不想说心理形象是不被允许的（很显然，我们关注的是像似符的概念），或者皮尔斯在某些时候（这并不明显）将像似符视为心理形象。我所说的是，为了构建初级像似性的概念——它是在基础形成的时刻被建立起来的——甚至是心理形象的概念也必须被抛掉。（同上）

正是艾柯指出了初级像似性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即使如此，我们也还不清楚可以怎么谈论和相似性概念及形象（如他所补充的，心理形象）分离开来的像似符。艾柯在这里对相似性和比拟的区分看起来是令人信服的。

在对自己正文的一条注释中，艾柯把自己将初级像似性和心理形象分开的决定和皮尔斯对心理学的批评联系了起来。他相信要这样解释初级像似性的过程"而不诉诸时间或心理再现"，并不是对皮尔斯精神的背叛。我们不是要展开对皮尔斯就"心理"概念之解释的讨论，该解释已经不具有心理学的内涵意义。皮尔斯用"思维"（mind）一词来指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的关系，而没有提及心理学上的主体。在皮尔斯看来，思维并不预设自我的存在，也不预设这一关系之外的、独立于我的主体。初级像似性使我们处于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的关系中非常低的构成层面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将初级像似性和相似性、（心理）形象或（非心理意义上的）思维分开。

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对"被动的前符号"（passive predata）进行了分析，它最初通过对已知的所有条件，所有熟悉的、影响我们的条件（多亏了这样的条件，被动的前符号维持在感知的层次上，并且已经是一致的、以某种方式解释的）进行抽象来表现自我，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层面上，相似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胡塞尔告诉我们，当我们以抽象的方式将指称和产生感知（第二性、指示性）的已知对象，和影响我们的习俗、习惯所产生的熟悉性分开时——这种熟悉性是已经被给予的（第三性、规约性、象征性）——如同它是未知的一样，它也是以某种方式已知的（独角兽或艾柯举的鸭嘴兽的例子），我们并不会陷入完全的混乱，陷入对符号的完全混淆。当颜色不是作为某物、某个表面的色彩、物体上的某一点被感知，而是仅仅是一种质时——也就是说，它在第一性的层面上展示自我（或者如皮尔斯所说，在某物不是任何东西的指称，而只是它自己，只在自我中有意味的层面上）时——这一指称自己的某物仍然是同质性基础上的，并与其他物的背景相对的一个个体，也就是说，它是在其他符号的异质性背景之下的：如白色上的红色。在初级像似性的层面上，相似性是异质中所突出的同质：胡塞尔认为，"同质性或相似性"随着不同程度变化，直到达到完全同质的边界——也就是没有差异的等同。和相似性形成对比的是，总会多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相似。同质性和异质性是联想集合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模式的产物。胡塞尔就"初级综合"方面讨论了"直接联想"，后者保证了一个已知的数据，一种自我展示的质，说明了"直接联想"是通过相似性达成的联想。我们可以说是相似性允许了初级像似性中的综合统一。

441

初级联想和心理无关，这一点现在应该已经很明显了。胡塞尔的反心理学主义在这里和皮尔斯的想法相遇了。我们可以将先验性的初级联想描述为构成符号的可能性的条件。在这一语境之下，"先验"毫无疑问是属于精神秩序的；然而，"思维"并不一定是指人类的思维；它也可以指"原符号活动"（protosemiosis）情形中任何的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参见 Prodi，1977）。

10.1.5. 相似性与形象

我们在论及像似符时，“相似性”的概念得到了恢复，“形象”这一概念也应如此——考虑到话语语境，显而易见，这里指的是心理形象：“初级像似性”的形象。从这一角度而言，最有意义的是列维纳斯1948年发表的论文《现实及其影子》（“La Réalité et son ombre”，Levinas，1994；亦见Levinas，1987b，英译本：5—8）中题为“形象与相像”的章节。列维纳斯也强调和对象之间的初始关系，此时“象征、符号和词语”还没有被感知和决定，他问道：“形象在什么上和象征、符号、词语有所不同？”（同上：6）列维纳斯的答案是：“在指称对象的方式上不同：形象靠的是相像”（同上）；在附文中他预设了思维会“在形象本身”上面停下来，由此停在了“形象的某种不透明性”之上。“符号自身是完全透明的，绝不解释自己。”442 列维纳斯继续说：

> 我们必须回到将形象作为独立于初始对象的现实的看法上吗？不，但条件是我们不把相像作为形象和初始对象之间比较的结果，而是作为引发形象的运动。现实不仅仅是它本身、是它真实地被揭开的样子，它还是自己的相似物、影子和形象。（同上）

这一看待相似性和形象与像似符之间关系的方法和真实、适当的符号是不同的，因此并没有被嵌入第三性和概念解释之中，这导致了对本体论的批判性质疑。事实上，对于已在而言，这一方法揭示了“另外”的存在（超在），它并非相应地“另外存在”着（超在之在），而是外在的，在存在、身份、决定和不同之先的。形象就是存在的他性，它的相似物和影子；现实也不能在其间被穷尽。现实在作为它自身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无法控制的他性，它看起来就像别的东西，和存在不同之物。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讨论关注的是“形而上学”：列维纳斯所理解的形而上学，以及梅洛—庞蒂在《意义与无意义》中对其的理解［Merleau-Ponty，1966（1948）］。在《现实及其影子》（1948）中，列维纳斯就存在对“多余”进行了分析，而他在1936年［Levinas，1982c（1936）］已经就“逃遁”讨论过存在，并且接下来在1974年又就“超在”对存在进行了讨论。如他所说：“存在不仅是它自己，还逃避它自己。”（Levinas，1948，英译本：135）一个人不仅是他/她自己；也是他/她的异他性。异他性从同一性逃脱，后者就像一个破旧的袋子，无法容纳前者。对熟悉的某物而言，它的质性、颜色、形式和位置躲藏在存在之后；它们并不完全和该物的身份一致：“在这个人、此物中存在着双重性，它的存在中的双重性。它就是它自己，但对自己也是陌生的，在这两个时刻中有一种关系。我们将会说，某物

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形象。这种物和自己形象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似。”（同上：6）

我们或许可以断言，形象是没有被直接对象的身份所穷尽的动态对象。相反，作为基础——也就是说，作为初级的像似符——形象一再地（胡塞尔会说，总是再一次地）将自己强加于解释项之上，作为它无法降低的他性。“初始对象给出了自己，”列维纳斯说，“它似乎和它自己保持了距离，似乎又缩回了它自己，似乎是存在中的某物却又滞后于存在。”（同上：6—7）对于直接对象和能指的在场而言，形象的特点是“对象的不在场意识”，如列维纳斯说的，它是“对对象之存在的改变，它的基本形式在其间表现得就像它在退场中丢掉的衣服一样”（同上：7；关于列维纳斯对同一性和他性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详见《现实及其影子》一文；参见 Ponzio，1994a、1995a）。

现在让我们回到初级像似性的问题上来。如胡塞尔所说，通过对悬置判断（epoché）的现象学还原而达到的抽象，通过界定已经被给予的世界和相关的解释习惯的边界，或者说通过艺术想象，我们只能到达这个初始的层面。形象就是初级像似性本身的他性，是它自己的陌生性，它的相似物。艺术精确地对形象进行指称，因为它描述了存在的另一面。换言之，列维纳斯所说的形象是艺术想象的形象；形象是被解释的对象的他者性，后者是艺术的外位化通过将对象作为“相似物”来展示而揭示出来的，所以它不仅是知识主体对于一个概念的对象，还是形象。如同梅洛—庞蒂在谈及塞尚时坚持认为的，绘画是寻找对熟悉的对象和习俗拥有习惯性态度的他者。塞尚说过，视域是必要的，这里视域指的是逻辑想象。这种逻辑想象是抽象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允许回归到和对象的关系上去，可以被描述为初级像似性的关系。如同梅洛—庞蒂在《塞尚的疑惑》一文中所观察的：

> 我们生活在由人类建造的对象构成的环境中，生活在器具中，生活在房子里、街道上、城市中，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通过人类可能对它们的使用来看待它们。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必然的，而且是无法改变的。塞尚的绘画悬置了这样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他刻画的人物是如此陌生，仿佛是通过不同物种所存在的视野来观察的……他的世界是一个毫无熟悉性可言的世界……
>
> 他的绘画既没有否定科学，也没有否定传统……它完全将科学放在一旁，像一个新生的生命体一样通过科学再次抓取全景的构成……对那幅绘画而言，一种单一的情绪是可能的：疏离的感觉，一种单一的强烈情感：对于存在而言总是全新的再次开始。[Merleau-Ponty，1966（1948）：28—30]

在塞尚的绘画中存在着回到感知关系的问题，第一性（如皮尔斯所理解的）

444 的范畴几乎完全占据了这一关系，形成了一个对于形成中的秩序的印象，一个对于在出现过程中、在我们凝视下的聚结过程中的对象的印象（参见同上：25）。这种聚结是以建立在相似性之上的联想过程为基础的。

列维纳斯所说的形象也建立在相似性之上，就像皮尔斯所说的像似符一样，它独立于与自身所相像的。因此，用皮尔斯的术语来对列维纳斯进行阐释的话，我们可以说形象和透明的规约符、指示符不同，它是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不透明性的符号。"一个像似符，"皮尔斯说道，"是一个具有赋予自身意味的特点的符号，尽管它的对象是不存在的；就像画出几何线条的铅笔纹路一样。"（CP 2.304）

这就是为什么在推论中，以像似符为基础的试推法可以让它自己和被给予的世界、已经构成的世界、习俗及固化了的习惯保持距离，由此发展成为"形成解释性假设的过程"（CP 5.172）。关于试推法，皮尔斯补充道：

> 它是引入任何新的想法的唯一具有逻辑性的做法；因为归纳法仅仅是决定一种价值，而演绎法只是推导出一个纯然的假设的必然结果。
>
> 演绎法证明了某物应当如何；归纳法实现了某物实际如何；而试推法仅仅暗示某物可能如何。（同上）

在现有的话语语境中，我们必须分析推理网络的单元及其核心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表述、谓词判断作为推理辩论的文本中的单元的起源问题（关于符号活动、他性和推论过程，在本书 1.2、1.3、2.3.3、2.3.5 也有论述）。

10. 1. 6. 谓词判断的起源

我们对谓词判断形成的分析始于我们所说的初级像似性，或者说原符号活动的层面，在分析中我们将遵循胡塞尔给出的种种指示。我们会在皮尔斯符号学方法的背景下对胡塞尔的著作进行思考。事实上，皮尔斯的符号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相距并不遥远，这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同时，胡塞尔的思想体系也是以符号学为导向的，尽管它完全独立于皮尔斯的体系［胡塞尔写过一篇题为"符号学"

445 （Semiotik）的论文，在《逻辑研究》艺术中，他也广泛地讨论过符号及其类型］。

胡塞尔考察了感知活动、触发、被动的前符号和它们的联想结构的最低层次，将感知活动的最低层次上的接受性归结于"我"。这个"我"，如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不是心理主体，而是先验的自我。我们必须说清楚这一点，并且解释为什么我们一旦对和他者相关的所有指称、社会习惯、任何客观性的假定——也就是说，任何含蓄或清楚的证明或请求，或可能包含他者的证词——进行抽象，就能够谈到"我"的问题。"我"是个相对的概念，它假定了"你"的存在。相反，在胡塞尔

（1948）的讨论中，“你”是被放置在括弧之中的。

我们称之为“我”的抽象概念关注胡塞尔描述的归属范畴和列维纳斯描述的“内在性维度”（见 Husserl，1929）。当我们对“为了自己的存在”或“为了他者”（换言之，对意识的存在）进行抽象时，我就失去了自我的意义（作为意义，“我”不是单独存在，而总是伴随着“你”的），然而，尽管如此，它仍然作为纯然归属的身体、肉体、活着的身体而继续生存着。由于每个人的肉体生活，“我”的复数性成为了可能；事实上，肉体生活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他者来说都成为了不可取消的他者。个体间在意识上的差异是建立在我们每个人的肉体生活的差异之上的。从这一点而言，在意识到自己之前，每个自我都是为了自己的存在——如列维纳斯指出的，为了自己，“但从一开始并非为了自己才存在。它也不是自我对自己的再现。它为了自己，就像‘人人为己’这一短语所表达的，就像‘没有耳朵的饥饿的胃’，可以为了自己消化掉一整块面包”（Levinas，1961，英译本：118）。为了它自己而存在的我，作为归属实体或胡塞尔的原自我（Ur-ego）的我，是和世界直接关联的，世界仅在意识中间接而部分地揭示了自己。我的结构是社会性的，但是（如胡塞尔所坚持的）它对人类的环境，对现实或仅仅是“他者”的真实可能一无所知，因此，它对他者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对其他主体可能对同一个世界这一事实进行思考一无所知（见 Husserl，1929）。

由此，独存的我（solus ipse）这一术语指的是去除了他者的意识的、先验的我。它是将世界的人际视野放置在括弧之中这一行为的结果。独存的我指的并不是理想的主体或虚构的某物，而是具体的主体的真实维度，是对作为身份的主体本身而言的主体的他性，它独立于为了自己的存在的范围，独立于某人自己的意识和他者的意识。和萨特的看法不同，列维纳斯讨论的为了自己而存在的我，后者已经是意识。相反，它可以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自我（Ego）进行比较。自我是体验（Erlebnisse）——一个人自我的经验——的同一性的主角，它不属于意识的范畴（见 Sartre，1961：150）。一个人对我的意识不会将其穷尽，意识也不会使我存在：自我总是将自己作为存在于意识之前的某物，它的深度只能被慢慢揭开（同上：151）。 446

我在自身之中并非是为了自身。它只是存在着，并且要求意识赋予它个人化的存在；尽管如此，在自身中的我仍是意识和个人化的基础。意识之外的存在是身体的直接生活层次上的存在。如梅洛—庞蒂所展示的，先于为了我或他者而存在的身体在感知的最基本层面上是为自身而活的。

因此，一旦我们对我和世界的主体间视野进行抽象，我之为我就不是看待、描述、衡量、占有和转变现实的某种特别的方式；所有这些行为无疑都预设了主体间的关系。在未经分类的、直接经验的层次上，列维纳斯说，“我将成为既不反对

也不代表其自己的某物的方法，它既不使用某物，也不渴望某物，而是享有某物”（Levinas，1961，英译本：120）。和陌生感的直接关系是由快感体验构成的。在这个层面上，我和个人身体、和我的兴盛之间没有距离。我就是我得以兴盛之所在。列维纳斯告诉我们，通过个人的身体体验事物的特别方式，个体性得以达成：“个人的个性、我的异他性——不仅仅是核心构成物和个体的独特性，还是幸福和享受的独特性。”（同上：115）快感是假定和分类层面上的身份界限，是对于身份的异他性和世界之存在的超在。正是我的肉体生活构成了每一个我的最初独特性和特点，防止它和另一个自我完全相同。然而，使得每个存在如此独特的同一个肉体生活，也将我和他者在先在于意识、决定、惯例和约定的任何形式的层次上联系了起来。

447

因此，当我们就他人的意识对这一抽象的层面进行思考时，我们就不再拥有一个万物皆为了我的世界，当我习惯性地对待和他者共有的、客观的世界，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了的、清楚的客体，它们被赋予了特定的物理特性，特定的价值和用处。在快感的抽象层面上，自我被卷入了，并且是不可消解的；就快感发展的意义而言，它完全是无法辨别的。它不能在某物之中被辨别出来，它不是某种底层的决定基础；相反，它是纯粹的质性。我们处在皮尔斯所说的第一性的层面上，和认知的解释过程无关。与前者相反，我们处理的区域是纯粹的获得，是直接的经验。我直接经历到的并不指称作为被感知到特性的主体的对象。引入列维纳斯，我们就可以说，直接经历是以完全非人称的方式得以发展的，就像“下雨了”或者“天很热”这样的事实一样（同上：114）。世界并不是被我们视为作为非人称的存在物的集合和感知的系统，引起这些感知的某物是无法追溯的，由此假定了第二性的范畴。我们暗指的是，在“有”（il y a）的范围（如列维纳斯所说）内，

> 这里的一切都存在于不稳定、不明确的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它或许可以和《克拉底鲁篇》中的河流进行比较，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要在我和世界彼此还不分明，物还没有在它们的个体性中被经历的层面上，即时地感知世界，就意味着不是处于某物面前，而是“在它的里面，在它的内部”。（同上：108；关于对列维纳斯这些方面的研究，参见 Ponzio，1995b、1996b）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进行两点讨论：

（一）把指称和异他性，和社会的、已经构成的主体——这一主体预设了异他性和社会性——归入同一范畴（这是为了分析而进行抽象的结果），仅仅意味着要纳入社会和异他性的意识。皮尔斯对心理主义的批评和一种非相异性的误解风

险相关。解释过程的“无法辨别化”和“非人称”并不意味着对主体间性的否定。如果说皮尔斯似乎也对主体间性很“敏感”,这并不是基于事实的——这一来自 448 《解释的局限》一书的作者的声明是何等罕有！——“如我们所知,皮尔斯的理论可以被解释为任何东西,这取决于你从何种角度对他进行解读。”(Eco,1997a：394)在我们讨论的作者——皮尔斯、胡塞尔、列维纳斯、梅洛—庞蒂——的理论视野中,内在性的维度、归属域或身体自己是异他性关系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身体是独立于这一关系存在的。独立于我的意识的肉体生活早已经是社会结构的。列维纳斯说,我是和后代相关的,在这一范围内,我并非始于快感(参见 Levinas,1961：151),而是始于和他者的关系,始于和与自己共存或先在于自己的他者的关系。通过指称他者对一个人身体的生活维度进行抽象化的可能,仅仅意味着这一维度并不会为了继续存在而要求他者的承认,或者和他者进行交流。相反,这一维度预设了这样的承认,预设了作为我和他者而建构的自己。

(二)对归属域、内在性或原自我的抽象只能通过始于自我意识已经存在、他者已经存在的层面的抽象来达成,在这一层面,世界并非是由我独自决定的,而是作为“我们的世界”、一个客观的世界被决定的。如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沉思和巴黎演讲》中所观察的,如果将作为纯粹的敏感性的我的初始领域和作为存在被感知的他者的初始领域有效地分开,它们交流的可能性就会成为一个谜：当这两个初始领域界线分明时,这个谜就出现了。这种分隔预设了陌生化的经验已经起了作用(参见 Husserl,1929)。

10.1.7. 元语言学和前分类层面

如果我们现在从符号学方面来分析谓词判断的形成问题,我们首先要说,符号学使我们从语言学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从这一点而言,符号学是作为元语言学出现的,因为逻辑不能建立在这种或那种语言系统的语言学法则之上。符号学作为先验逻辑,它必须是一种元语言学。如果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自然)语言不仅有自己的生理、心理(在传统的自然主义心理学的意义上)和历史文化基础,还有自己的先在基础(参见 Husserl,1900—1901：162),那么符号学在寻找谓词 449 判断的起源时必须关注这些先在的基础。

先在并不是由某种固有的普遍法则所给予的,这种法则是乔姆斯基的研究方向(Chomsky,1986；1988)。相反,胡塞尔认为这样的先在是先验的秩序,必须通过基本形式来进行追溯,在这些基本形式中,知觉的、有形的界域在前分类层面上得以构成,这种看法尤其体现在《经验与判断》一书中。

乔姆斯基(自 1965 年以来)致力于寻找生成句子表层结构的深层结构,假定了一种固有的普遍法则；而胡塞尔则在对感知和判断形式的发展的分析中寻

找着深层结构(从这一视角进行的对乔姆斯基和胡塞尔的比较研究参见 Ponzio, 1974:第3章)。如果说通过乔姆斯基我们可以分辨出表层结构("桌子上的书是红色的")和深层结构("书是红色的"、"书放在桌子上"),胡塞尔则与之不同,他认为这种分别不是源于固有的心理机制,而是源自于主体和客体互动的初始模式,这种互动始于感知或符号活动的最低层次。胡塞尔展示了"Sp 是 q"("红色的书在桌子上")这样的判断是如何从"是 p 的 S 是 q"("是红色的书在桌子上")的形态变化中发展来的,以及后一个判断是如何从简单的判断"S 是 p"和"S 是 q"的形态变化中发展来的。

这些判断和被解释项—解释项的关系相关;每一个判断都是解释,而解释源自于主体对确定"p"的兴趣差异。在符号解释的过程中,从最后一种判断到第一种判断,这种兴趣在渐渐降低。在形式为"S 是 p"、"S 是 q"和"是 p 的 S 是 q"的判断中,对"S"的主题兴趣均等地存在于所有对"S"的确定之中:"在循序而进的观察中,一切按照顺序出现的确定性对于主题性的视线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Husserl, 1948, 英译本:228)相比之下,当知觉的兴趣因不同的对"S"的确定而异时,我们获得了上文所说的另一项判断。胡塞尔说:

> 兴趣可以直接奔向 q 的确定性,而只把附带的兴趣放在 p 身上。在接受性中这就是说:一方面在 p 身上只投以匆匆一瞥,它只是附带地得到把握,另一方面主要的重心则放在 q 身上,它被优先纳入视线……于是在谓词领域内,与此相应,就不会存在一个"S 是 p 和 q"形式的简单循序而进的确定活动,相反,主动地实现出来的综合"S 是 q"将具有主句的特征,而主动地实现出来的综合"S 是 p"则将具有从句的特征——这两种表达方式即使是在这里也显而易见,原初并不表示什么语言性质的东西。(同上)

450

在形式为"是 p 的 S 是 q"的判断中:"正是这个自我并没有以一种简单的视线指向身份的综合,而是以一种自身分裂成主要视线和附带视线的双重视线指向身份的综合。"(同上)在"Sp 是 q"中:"这就不再有什么视线,甚至不再有什么附带的视线会指向 S 和 p 的综合了,相反,这个 S 立即就被作为 p 来看待并自发地只进行向 q 的过渡。"(同上:230)我们到达了一个点上,深层和表层结构能够被交付到句子的无穷范畴中——这也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生成语法"的控制能力——而这建立在主题兴趣层次形成的基础上,并通过感知和练习达到:在这里,符号活动处于一个较高的层面。接下来,我们要思考"S"和"p"的综合是如何从"S 是 p"的判断中产生出来的。

我们必须进行的抽象关注的是包含了指示符和规约符的感知符号活动,也

就是说，感知指称对象在和感知的任意的和（或）连续的关系中刺激我们、影响着我们；或者是指称被给予的、习惯性的世界的符号活动，这个世界建立在如今自动地、被动地发生作用的习惯和习俗的基础上。用胡塞尔的名词来描述，抽象就意味着假设只有一个所谓的“浮雕的场域”（field of reliefs），它不能被归结于某个对象的属性，不属于为了他者而存在的客观世界。这个浮雕的场域在自我中是有意味的；在这个意义上，就三种符号，即像似符、规约符和指示符而言，它以像似性为特征。显然，我们是在说某人的“浮雕”——也就是说，是某个没有将自己作为我、主体和意识，而是作为前文所描述的形式中的知觉的身体的解释者的“浮雕”。

10.1.8. “我为”

浮雕的场域并非完全的混沌，信息的混乱出现在我的感觉对其发生作用之前；相反，它具有自己的意义，并且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像似地构造起来。如之前所说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导致了初始的综合性——比方说，白色上的红色这一感知；而相似性是在这个意义上起作用的。在直接联想的基础上，敏感数据可以被相似性所感知，如胡塞尔所说，它“总是以这种被凸显性为基础”才发生的。（同上：76）没有相似性感知的直接联想，就不可能有“浮雕”和“凸显”。这里，指称的是所有类型的像似符，听觉、视觉、触觉和本体感觉的符号。胡塞尔说，从背景中凸显出来的前符号，451

> 这个感性材料将凭自己的强度而从众多刺激物中凸显出来。例如，在感性领域内，一种声音、一种噪声、一种颜色，都或多或少是扰人的，它们存在于知觉场景中，并且从其中凸显出来，它们在还未被把握时就对自我施加了一种较强或较弱的刺激。同样地，一种凸显出来的思想也可能是扰人的，或者说，一种愿望、一种渴求也能够从背景中对我们造成讨厌的侵扰。这种强迫接受是以或多或少带有刺激性的凸显为条件的，在感性领域内则是以对比，以带有明显距离的质的不连续性等等为条件的。当然，在非感性的领域内，还谈不上这样一些质的非连续性；但在这里毕竟也有某种类似的情况：在各种模糊的思想冲动之下，有一个思想骚动着我们，它在一切别的思想前面凸显出来，并由于对自我施加的压力而对自我产生了某种感情上的影响。（同上：76—77）

我们可以把凸显出来的某物不准确地称之为“客体”，就像我们不准确地谈到“我”一样。就像胡塞尔在注释中说明的（同上），我们无法在“初始被动性”的层面上准确地谈论客体。因此，在用到“客体”和“我”这两个术语时，我们必须

一直牢记这个说明。刺激越强烈，我转向这一对象的倾向也就越强。我的这种转向可以被形容为趋从了被对象所吸引的倾向，或者用个更好的词，被刺激。积极的感知就此展开：如何主动地在感知域中抓取凸显出来的对象。从我的注意力转向客体那一刻开始，我的存在就被客体“唤醒”了，开始了注意和兴趣的过程，我对物体的觉察也逐渐加强，我在其中趋从了这样的倾向：要从不同的方向使客体变得可以获取。胡塞尔将这种倾向的发展描述为“我”的“多种活动”（同上：87）。“我”总是想要获取新的、源于初始的幻象，来使得对象可以从所有方面展示它自己。胡塞尔将这种我致力于产生的幻象称之为“形象”。这里的“形象”是从“对某物进行描绘”的意义上而言的，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看见它。我们可以谈到变化的触觉、听觉、嗅觉和本体感觉的形象等等。我们可以这么说，我倾向于为自己创造出像似符，这一像似符逐渐地、单向地产生出客体的像似符。客体，也就是动态对象，在跟随我的运动感觉（眼睛或头部的转动、身体的移动、转身等等）所产生的幻象中展示它本身，使得对象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展示自己。在这里有着我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的、接受性和生产性之间的关系：

452

> 印象的出现处于“我的权力范围中”；我也能让这个印象系列中止，例如我能够闭上眼睛。但处于我的权力之外的是，当我让运动感觉停止时，就会有另一个印象出现；在这个印象面前我只是单纯接受性的：如果我把如此这般的运动感觉面对客体发动起来，就会有如此这般的一些印象出现。这对于静止和运动、变化和不变是同样有效的。（同上：84）

我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实用本质非常有趣；我的转向可以被形容为“我的活动”；转向理解客体的运动——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运动感觉——也可以被形容为“我的活动”。胡塞尔对此做出了区分：（一）并非“我为”的举动，它是在转向之前的活动，它是由散漫的、还未集中的注意力所构成的；（二）“我为”，它不包括任意的行为：当我的注意转向对象时，我做出的转动眼睛等活动是非任意性的（同上：85）。

当我通过转向成为主题的对象而自由地跟随转向这一倾向时，谓词判断就开始形成了。要准确地谈论主题，就要求我的兴趣应该相对持久，并且对客体的理解要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当我们仅仅是短暂地转向某物，只是经过它时——比方说，一个噪音——这时我们的兴趣是集中在别处的，在经过它之后我们立即回到了处于我们兴趣中心的对象上，这个物就不是准确意义上的主题。因此，我们必须分辨出具有时间长度且产生主题的造成我的转向的行为；和其他与之相反的短暂行为。在这方面，胡塞尔谈到了“自我的兴趣行为”（the I's act of inter-est；同上：

453

92)。为了逐渐形成某物的存在，以阐明“S 是 p”这一谓词判断，必须将转向某物之存在作为主题的行为渐渐从“自我的兴趣行为”中分辨出来，后者关注的是周围的环境和主体世界。

我对解释的倾向并非是盲目的、无方向的，而是由期望推进的；而对客体的兴趣是和这样的期望密不可分的。从一个感知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形象到另一个形象，期望可能得到满足，或者受挫。当客体从感知场域退出，或是被移出，或是由于其他客体的介入吸引了我的注意，从而离开感知场域时，客体的幻象可能会被中断。然而，对期望的阻碍还可能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客体随之而来的形象可能会否认我所塑造的关于它的整体形象。这就导致了一种与之不像的另一种结构形态：之前对整体形象进行描绘的各个阶段被新的形象取消并取代了。这就是胡塞尔所描述的否定性的起源，或者说是不同的现象：“否定并不是谓词判断才有的事情，而是在其原始形态中就已经出现在接受性经验的前谓词领域里了。”（同上：90）

随着感知的发展，我的期望并不总是完全受到迷惑。期望的意图也可能在怀疑的形态中陷入危机，期望由此不会被新的感知完全取消。这就造成了两种感知，它们在两者都有效且属于不一致存在的形态关系中并不互相排斥，而是重叠的。在否定的情况下，在有倾向性的感知兴趣的过程中存在着阻碍，在“与之不像的另一种”形式中，否定得到了解决、获得了胜利，怀疑持续了一个更长或更短的时期。当这两种感知中的一种更加可信时，可能性的状态就得到了发展（胡塞尔的例子：我在窗户里看到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模特？）（同上：92—93）。 454

在谓词判断的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一步是，我的兴趣从 S 转向 p，这不应该是将 S 抛掉，相反，正是由于对 S 达成了更深的理解，这种转变才得以达成。随着这一步，我们离开了接受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进入到我表明态度的领域。我对 S 的兴趣继续保持着，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转向了 p，它成为主题是因为它是 S 的确定。在从 S 转向它的确定 p、q 等等的单独行为中，S 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了更深的理解：“这个过程是一种展开着的观察，一种被分解了的观察的统一。由于这整个过程，S 便保持了主题的特征。”（同上：113—114）这就意味着，S 在一方面，而 p、q 等在另一方面，是分布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S 接受了基底对象的意义，而 p、q 作为这个基底对象的阶段、特性或确定，或是作为在 S 的展开中的判定被解释。胡塞尔说，随着作为“确定”的“某物”之“基底对象”的形成，我们会发现自己站在了那些所谓“逻辑范畴”中的最初范畴的源头处（同上：114—115）。在这里出现的是“解释性的巧合”，必须把它和“辨别性的巧合”分开，后者在于相信被感知的客体总是同一个对象 S、总是同样的基底对象。事实上，解释性的巧合在于相信所有 p 和 q 等等的确定都是 S 在其中得到解释的确定，都是 S

自己的特性。这两个感知的综合——也就是辨别性的巧合和解释性的巧合的感知综合——是"S 是 p"这一判断的可能条件。

10.1.9. "好像"和作为行为的述谓

我们必须考虑构成谓词判断的符号活动现象中的两个特别有趣的方面。其一是,在由我进行的、通过解释对象的确定而构成了对象的行为方面,它也应该被视为我安置了"好像"是某物的行为。这就是想象的"好像"形态(同上: 167—171)。它建立在建模能力之上,西比奥克称之为语言,有了这种能力,人类(不像其他动物)才能够产生无穷的可能世界(见本书第五章),谓词判断才能逃脱真实世界的局限,在想象的世界中漫步。然而,"好像"的关联性关注的不只是构建想象对象和想象世界的可能性。谓词判断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隐喻程序,以至于即使要分清表面的和隐喻的描述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如维尔比所说[Welby, 1983 (1903)],即使是表面的表达也是隐喻性的,它使得我们可以将口头语言作为书写来进行谈论。"好像"的关系使某物可以在另一物的基础上被确定,后者在"好像"的形式中正好可以作为前者的解释项。因此,"好像"是判断的构成部分。

455

我们想要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是,如同已经指出的,"我"对对象充满兴趣的转向是活动的一种形式,就像随之而来的认知过程是活动一样。述谓就是活动,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实际行为类似。胡塞尔在下文中区分了认知活动和实际活动:

> 我们在这个词那里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外在的举动,一种把外在对象(物)作为自身被给予的对象从其他自身被给予的对象中制造出来的活动。在认知行动中虽然这些新的对象性也被预先建构起来了,但这种产生却与从物中产生物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且,在此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范畴对象性的产生在认知行动中并不是最终目的。所有这些认知活动——尽管它只能随着认知的进步经过漫长的历程而在那些已被产生的对象、那些逻辑构成物的范围内,在清晰的明证性中进行活动——最终都是与判断基底相关的;它的目的不是产生对象,而是产生关于一个自身被给予的对象的知识,因而是把这个对象作为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识别的东西而据为己有。(Husserl, 1948,英译本: 200)

如果我们要避免将谓词判断和与感知、某人的身体、周围环境相联系的活动分开——这些活动是谓词判断开始的起点——实际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类似就变得尤为重要。从这一点而言,认知倾向也应该被描述(这也是一种"好像"的确定)

为“好像”充满期望的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胡塞尔说，在认知倾向和充满期望的努力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类推”，事实上可以用“同源”关系一词来描述它。和认知倾向十分类似，

> 欲求性的努力导致一种以“命令”（fiat）来启动的实在化行动，而在这种行动的前进中它才日益凸显出来，由最初单纯的目的而变成达到目的。通向目的的道路可能是简单的，它存在于某个简单的行动中，或者，它也可能是复合的，可能会经过一些中间目的，这些中间目的倾向于一个特别的意志行为，并且与统治性“意图”相反，它们具有服务性意图的特征。伴随着在这个行动过程中目的的日益满足和对这个目的的逼近，就引出了日益增长的满意感。（同上：201—202） 456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认为，就组合轴结构的结构性描述而言，我们认为谓词判断的起源来自身体的体验和它的行动感觉，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换言之，乔姆斯基预设了一个前提——也就是认知——其语境是一个被给予的句子、一个名词语段、动词语段和形容词语段——如果我们在非范畴性的符号活动层面上思考对于感知的分析，比方说用胡塞尔的现象学，那么我们不需要承认乔姆斯基的固有生成语法的概念就可以对上述语段进行解释（参见 Ponzio，1974：100—6；1994b：87—128）。

如同胡塞尔所展示的，除了回到另一种类型的构成——核心构成物——之外，我们不能对主词的句法形成、谓语等等进行解释。核心构成物“为句法的定形，为那些功能形式例如主词形式等等把核心结构打扮成句法材料提供了前提。作为主词的定形以某种带有名词形式的材料为前提”（Husserl，1948，英译本：210）。

主词以直接性的核心构成物形式为前提，而后者又以感知过程中实物的形成为前提。谓语以形容词性的核心构成物形式为前提，而后者以感知过程中将某物识别为一个确定为前提。直接性的形式意味着作为自己，作为基底对象和实质性的条件——这种实质性并非已经被给予的，而是源自基底对象化和产生基底对象的过程。形容词性的形式是在某物中的存在形式；它指出了确定的对象的非实质性。

让我们回到基础的概念上，将其作为在兴趣驱使下转向动态对象的符号活动的起点。由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说基础事实上是感知的起点，是通过基底对象和一个或几个对它的确定的解释性巧合而对未确定的基底对象做出的解释的起点。兴趣一旦从基底对象过渡到对基底对象的判定、最后到更远的判定，它就会 457

再次转向基底对象,然而,作为对判定理解的结果,它在意义上已经得到了丰富。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阶段,基底对象在其间被清楚地看作是判定的基底对象;因此,对象—基底对象预设了述谓主词的形式。起点(terminus ad quo)——这是艾柯(Eco,1997a:4)的术语,但胡塞尔也用它来描述我们讨论的这个过程——从基础转变为了主题—主词;之后述谓活动朝判定和谓语发展,将其作为相应的终点(terminus ad quem)。动态对象是从基底开始的对象,它在对自己的不同判定中,或者是关于它的不同的谓词判断中得以展示。

10.2. 客观的误解和语言的神秘化

> 问题在于,物的状态是否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必然的。当然,只要我们对以下这一愚人所乐见的假设感到满意:假设只有故意作对的、心怀偏见的、愚蠢的、傲慢的人才有可能误解我们的意思,假设我们对他者的误读只是由于他们"难以理解"或"是诡辩",抑或是因为他们不具有文字能力,我们就将自己造成对情形的绝望。但是这是一个不能以偶然的方式来对待的学科;它是未来的希望,实际上是诸学科中——也是意义的条件和变化中——最为有用的之一,将会受到严肃的对待。
>
> ——维尔比(Welby,1893b,参见 1985a:512)

10.2.1. "语言的疾病"

普通的和科学性的经验的复数性可以被集中在意义的问题上,而这一问题为存在、语言和传播的万花筒般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视角。研究意义的问题意味着要分析它的可能条件,以及它与口头和非口头行为相关,并由此和语言、非语言符号相关的表现和变化。表意学的奠基人维尔比夫人不仅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的问题感兴趣,还关注所有只要是人类符号活动的表现的学科(也见本书第二章);事实上,她的兴趣包括整个表意范围内的所有解释和表现过程。458 感知、经验和认知总是通过符号来进行调节的;因此,在解释的过程中,分析对象和认知主体的关系也是通过符号调节的。我们和所谓的"客观"现实的关系是由符号调节的,因此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符号——口头的或非口头的——的解释中;鉴于这一点,我们都是潜在的"表意者",具有追问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一能力。

语言常常使用来自生命世界——我们现在可以用生物符号学的视角来描述

这一世界——的形象，对此，维尔比公开批评它是“语言的疾病”，是“语言学病理学”现象，并认为它的起因大量体现在语言使用的陈旧本质中。她注意到陈旧的词语和主题、过时的比喻和类比被广泛使用，认为这是虚假问题和误解经常出现的根源，这种问题和误解不仅出现在特定的语言中，也出现在普通对话的日常交流中。维尔比从对语言和表达的病态描述开始，强调了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批判性的语言学意识。因此，她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正确诊断“语言学病理学”提供足够的理论基础，这一诊断通过改善人类感知诸符号之间的真实差别，并由此更为准确地揭示它们的感觉和意义，成为表现性再生的起点（参见 Petrilli, 1998a：4.3，4.4）。作为符号和意义的科学或理论，表意学设定了双重任务：理论分析的任务，和努力为表现的问题提出实际解决的建议，从而开出治疗药方的任务。当维尔比对语言学病理学进行分析时——尤其是引起语义双关的模糊形式问题——她将注意力转向了普遍意义上的说话者——转向街上的人群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尽管这样做承担了额外的责任。总之，缺乏对语言和逻辑程序的批评意识而导致的混乱状态是和我们所有人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表意世界里的说话者和解释者。

10.2.2. 模糊性、“精确性”和“定义的万能药”

对于“模糊性”的价值和“定义”的作用这样的问题，维尔比就意义的确定，表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关系，隐喻、类比、同种性对增加语言表达潜力所起到的作用等进行了讨论。她认为语言的“弹性”命题是发展、语言学再生、表现性的充实和暗指指称的可能条件（参见 Welby，1985a：ccxli，ccliv）。口头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表达模糊性”的潜力。这里我们必须对语言的基本多音性意义上的模糊性和不明确性意义上的模糊性做出区分：前者是一个积极的属性，它倾向于多种形式的、渐渐通过不同感觉得以丰富的对现实的想象方式，是表现和理解的必要条件；而后者是产生混乱和语义双关的表现不足。维尔比持续地对模糊性造成的有害表现效果进行批评，它在认知层面、实际层面和元话语层面上，在日常生活和知性生活中被消极地理解；在这一研究计划中，她从口头和书面的、来自于不同作者和兴趣领域的话语类型中举出了大量丰富的例子（同上：XIII，37—38）。因此，使用生命体类型的类比来对语言进行讨论是其自然结果，这种倾向是很有特点的，她需要以此来展示出，“弹性”和“适应性”是我们的“表达潜力”的鲜明特征，因此也是广义的语言和符号，以及逻辑过程形成的特征。

459

语言的“弹性”和“适应性”因为“坏的语言学使用”的结果而被完全损害，或者说遗失了，它们需要得到恢复；又因为不适当的语言概念而被误解，它们需要被重新思考。维尔比一方面在身体的适应性和词语、语境之间，一方面在将生命

体和环境联系在一起的适应机制上建立了类比:“我们必须假设语境和环境之间的类比关系:词语对语境的适应就像生命体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它反过来又会影响周围环境。如果我们在一堆工作语境的词语中推崇一个女王式英语的单词而不是另一个,它们会表现得非常不一样。它们会将这个词驱逐出去,使其消亡或是将其自然化。”[Welby,1983(1903):40,注释]

如维特根斯坦也说过的那样,从阻碍语言的自然发展和改进的所谓“语言学陷阱”中将语言解放出来,是促进表现潜力、知识、创造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我们对环境的掌控能力发展的前提。

和意大利哲学家、数学家乔瓦尼·瓦伊拉蒂和罗瑟—兰迪、沙夫、巴赫金这样的近期的哲学家一样,维尔比相信多义性除了是词语的必然性之外,也是它的积极方面。此外,她认为通过充分地利用语言资源本身——比如说,在详细解释和说明这些不同上,将仅仅是明显相似的词语和仅仅是明显有不同意义的相关词语进行区分——可以获得表现上的精确。

然而,成为一个表意者并不意味着要成为为了“语言的机械性精准”而努力的“精确主义者”;相反,它意味着要强调,对意义的含糊本质缺乏理解是如何产生出单一的解释行为的,而这种解释行为是教条和正统的专制产生的条件。维尔比在元话语层面和技术主义保持着距离,甚至在为语言和意义研究提出新术语时也是如此。尽管她对去除词语模糊性和多义性的虚假客观化提出了批评,她还是尽量让自己的术语更为准确。在对异他性和同一性的最后分析中,维尔比也意识到了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之间的逻辑互补和相互依赖。

由此,“语言学意识”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对我们在使用逻辑推断和语言时,在普遍的行为上服从于教条主义、学究气和无秩序性进行解释和批评的能力的发展。如维尔比所说,要注意到多义性、模糊性和语义的弹性,就要让我们自己对语言的表现潜力敞开,培养我们的语言学批评能力。表意过程和交流是在语言的编码方面和不能仅仅被降低为解码过程的解释工作这两方面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这就有利于对新的、变化的表意语境,对语言和行为习惯的适应。事实上,符号表意的弹性是人际交流的前提。

维尔比承认有限目的之定义的有用性——也就是,定义的目的是为了在特定的语境下辨认出词语和观点的意义——但她没有在抽象的意义上对这种有用性进行延伸,事实上,她对“严格的定义”和“可塑的初始定义”做出了区分,由于前者具有将意义冻结,使之固定地朝单一的、单音的意义发展的趋势,它总是次要的;而后者考虑到了语言的鲜活本质,因此考虑到了它对新的表意语境的适应能力(见 Welby,1907c)。瓦伊拉蒂也认为定义是扩展的、具有弹性的,他没有将这一看法限定在单独的词语上,而是将其运用在对观点意义的看法上。事实上,单

个词语的意义是由和其他词语的关系、语言学语境和观点的语境决定的。瓦伊拉蒂用"是"、"行动"、"生产"、"代表"、"显示"等表达说明了这一点。相应地，整个语言学语境的意义也是由单个词语和整体的表意语境的关系决定的，因此是由口头和非口头符号的关系决定的（见瓦伊拉蒂致维尔比的信，1898 年 7 月 12 日，收录于 Vailati，1971：140—142；以及维尔比致瓦伊拉蒂的信，1907 年 2 月 27 日，该信没有发表）。但是，如维尔比的朋友、英国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1838—1900）有一次在写给她的信里所说的，一旦我们关注对定义的依靠，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这个过程自身——也就是定义的形成过程，而非它的实际形成结果。在任何情况下，最具有表现力和解释力的往往不在定义之内；此外，它的有效性在和知识、科学相关的具体领域内能够最好地得到检测［参见 Welby，1983（1903）：10］。

从表意角度来说，意义的概念化并不和区分两极，区分"隐喻的、间接的或是反映的意义"和"表面的、直接的或是实际的意义"这种严格的两分观点相对应。事实上，维尔比认为，"表面的"一词比"隐喻的"一词更有隐喻意义。维尔比超越了意义的两分视野，假设了意义的第三个领域，一个朝向表意和解释的实践领域——意义的"第三个价值"既不完全是表面的，也不完全是比喻的，其中"隐喻的"和"表面的"意义有着不同程度的结合［见 Welby，1983（1903）：139，292；亦见 Rossi-Landi，1985a：115—120］。

维尔比假设了意义的"第三种价值"或"第三个领域"，从而提出了接触区域的理论，它在解释符号之间没有精确的边界，总是在互动，并且产生新的解释路径。她承认隐喻意义和结构意义在意义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是广泛存在的。因此，隐喻意义并不局限于艺术领域和文学书写。事实上，意义不确定的第三种价值充满在所有的语言中，包括普通语言，其间事实语言和象征语言、真实语言和理想语言、直接语言和表现语言像在一幅画中互相混合。维尔比展示了，同样的表达在不同的时刻如何能够在语言价值的整个领域内移动，揭示出它的含糊本质和表意潜力、它的适应和转变能力，就像它在真实的、直接的条件下，或是在象征的，或是由传播情形所要求的某种结合形式中都可以被不同地使用一样。

462

在历时轴上，词语暗含的和外在的意义，以及它们所表现的价值都在感觉的层理间积累，这些层理是彼此重叠的，同时也被转化、取消、再生等等。在共时轴上，一个说话者的独有经历对词语如何被感知和解释产生着影响，决定意义价值的因素由此起着作用；意义价值是由一个从来不和自己等同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由具体的交流语境、生命语境、社会环境、语言学语境、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话者的文化和智力背景、推论程序、感觉、思想状态、心理氛围、注意力的程度和焦点、交流意向、联想、暗指、假设、暗喻、省略三段论法、记忆、环境、语言学用法、象征化或图像化的趋势、语言的先在条件等所决定的（参见《意义与隐喻》一文，

收录于 Welby，1985a：512—513）。考虑到语言在发生和结构上充满活力、模糊性、创造性的鲜活特点，这些变数使任何将对定义的依靠作为对语言神话化的绝对的、决定性的治疗方法的做法都成为不合理的、无用的。

即使在我们对它浑然不觉的时候，隐喻意义也留下了它的痕迹。我们可以对追溯而来的隐喻表意轨迹和可以即刻辨认出的隐喻表意路径进行分析；前者是如此深植于表述者和解释者的意识中，以至于我们似乎是在处理简单的、固定的、确定的意义，而后者由于它们的发明力、创造性和创新能力而能被即刻辨认出来。在符号网络中相聚甚远的解释者们进行配合时最能达成这样的情况，并可能由此产生全新的、出乎意料的甚至是无法预测的表意结果。就如我们可以在“表面的”和“隐喻的”意义中进行有计划的选择一样，它在现实中只是个伪选择，并且只会导致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虚假夸张（参见 Petrilli，1995a：第 13 章）。

10.2.3. 语义双关和比喻语言

类比和隐喻的无意识的、内含的行为不仅充斥在科学、哲学和文学语言中，也漫布在日常语言之中。维尔比由此建议，要将对这样的意义装置的分析系统地引入教育计划，并且根据交流中的对话者的有效性标准在实践层面上持续进行测试。为此，维尔比和瓦伊拉蒂（后者全力支持维尔比）都强调对形象化进行批判的需要，并且坚持认为人从婴儿时期开始就需要培养分析、核查和对普遍的符号，特别是对口头符号（有意识的理性生活的典型符号）之表现意义进行分类的习惯。正如瓦伊拉蒂在 1898 年 7 月 12 日致维尔比的信函中所写的：

463

> 我相信对口头谬误——首先是对它们的滑稽模仿（在文字游戏中）——的说明和分类是培养感知语言模糊性的习惯的最有效的教育发明之一。这个方法和古代斯巴达人的方法有些相似，他们为了让后代将醉酒的荣耀保持下去，强迫他们协助自己对被灌醉的希洛人所做出的令人厌恶的言行。（Vailati，1971：142）

对语言的不良使用伴随着对逻辑的不良使用，并且在习俗和价值观方面对人类发展都有着消极后果。为了促进对“语言学习”的需要，维尔比坚持强调语言、思考过程、行为和价值观之间严谨的相互关系。比如，她认为贫乏的或者错误的概念化，以及对不真实问题的提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自由”和“必然性”之间的错误对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追溯到语言问题和不良的语言学使用上。语言和逻辑是相互依靠的，就像符号和推论过程一样。

在对口头语言的分析中，维尔比不仅想要对语言进行描述，还要对其进行解

释，由此转变它并让它再生，让它在有意识的批评使用上变得可以改进。这是表意学的任务，为了展开这一工作，她建议以孩子为可能的模型。她将孩子描述为由于自己自然的好奇心而具有卓越批评力的人，因此具有调查和质疑的能力。为了反驳作为话语秩序的独白论的压制，维尔比提倡批评、质疑、挑起问题、不同的视角、对比、比较和相互关联性。她号召进行“表意教育”，鼓励使用表意学方法从孩子们的入学的第一年对他们进行教育。在这方面，她在 1911 年 3 月 24 日写给查尔斯·凯·奥格登的信非常重要，该信没有发表。维尔比认为表意教育必须在幼儿园和小学就开始，清晰的天性在传统压抑之下变得迟钝，必须通过击败传统来对它进行鼓励和刺激。表现、求知和推论的欲望总会被刺激和定向：用这种方式，混乱的、教条的趋向会渐渐转化为解释的趋向，使得我们可以说出我们真正想说的，并且按我们真正的意向行事（见 Petrilli，1995b：286—288）。 464

瓦伊拉蒂是维尔比最忠实的读者，他完全支持维尔比的目标。比方说，在他于 1903 年 3 月 19 日写给维尔比的信中，他指出维尔比的研究和他自己的研究中有三点是一致的：

> （一）你强调需要对比喻进行批判，需要对类比和隐喻进行测试（特别是当它们“无意识地”或“半无意识地”被使用时，在当前的、普遍的情况下总是如此）。
>
> （二）你警告说学究式的言行和学校教育通过对那些由基础成长的必要条件所自然产生的变化进行压制，会阻碍语言学资源的发展。
>
> （三）你评价了将语言从物理性的、本能的层面上升到理性的、意志的层面的实践上和假设上的重要性；语言在后一层面中被认为是为了实现确定的功能（再现、推论、交流等）和达到指定目标的一种方法或设计。（Vailati，1971：144）

这两位学者重复地强调，我们需要关注意义问题、语言学表现性和辩论，因此需要关注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如维尔比 1907 年 2 月 27 日写给瓦伊拉蒂的另一封信中所谈到的）。作为对语言学混乱状态的反应，他们极为强调我们需要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对语言进行批判性反思，需要对“语言问题”（questioni di parole，瓦伊拉蒂的术语）和“口语问题”（verbal questions，维尔比的术语）进行反思，因为它们和辩论、和知识获取的过程相关。在《逻辑的比喻》一文中 [Vailati，1987（1905），1：21]，瓦伊拉蒂从物理世界考察了隐喻的使用问题。他直接受到了维尔比的《什么是意义？》（1903）一书的影响。但是，早在《一些观察》[Vailati，1987（1895），2：71—72] 一文中他已经讨论了和维尔比在《感觉、意义和解释》

(1896)中所提出的问题相似的问题;他在文中分析了类比和比较在知识发展中的作用。465 瓦伊拉蒂的理论是在符号和符号活动领域中使用比较和对立的方法,目标在于强调不同学科、知识领域和普遍的文化部分中的一致与分歧。在《对不可能的研究》[Vailati,1987(1905),1]一文中,他对比了道德话语和几何学话语的规则;在《代数的语法》[Vailati,1987(1908),1]一文中,他将口头语言和代数语言进行了比较。瓦伊拉蒂所提出的方法和维尔比的解释—翻译方法是相对应的;事实上,维尔比将其视为对她的表意学研究的贡献。两位学者都强调,我们需要将固有的逻辑—语言学机制上升到有意识的生活层面上,将其作为主要解决我们推理不足、解释能力不足的应用。维尔比在《什么是意义?》一书中讨论了事实和观念的区别,并且为了改进我们的解释能力进一步讨论了她所关注的问题,她认为我们的解释能力和对敏锐感知能力、表意能力的改善有关。在元语言学层面,这也和发展我们对意义的理解有关。下一段摘录很有趣,它和书中的许多段落都相似:

> 在广泛接受的英语的意义上去看事实和观念这两个词,它们之间最终的区别是什么?它们的基本含义是什么,这种基本含义如果被改变,就必须用新的词来表达我们所失去的意义?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能说出任何虚假的假定的事实:它们从一个视角而言是和事实相反的,从另一个视角而言是不真实的(这两者从来不会混淆),它不再是事实。没有事实可以是和事实相反或者是不真实的,只有我们对事实的观念才会这样。不然,我们也可以说真实存在同时也可能是虚幻的,真实的也可能是欺骗性的。当然,由于我们推理的不足——这也是由于我们的解释能力发展不良造成的——"真实存在的"往往对我们而言是虚幻的,而真实的往往是欺骗性的。然而,当我们学会将感觉、意义和表意作为我们关注的中心,并且发展我们敏锐感知和表意的本领时,这种解释能力会变得更为充足。[1983(1903):40—41]

10.2.4. 不变的"简单而明显的常识"意义之假象

在《意义与隐喻》(1893)一文中,维尔比批评了"简单意义"(plain meaning)的概念,并且从教育和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我们需要承认语言的象征特点,需要认识到对类比和隐喻的广泛运用——尽管这种运用常常是不自觉的,因此需要检验象征系统和它们所象征之物间的关系:

> 我们大概可以从更好地了解象征性在表现的仪式中起到的作用开始,并且自问,除了象征性之外,语言自身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重新检验之于

> "真实存在"的"象征"的关系；检验形象、象征、隐喻之于我们所说的表面和事实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所关注的。可以这么说：意象从"象征"世界进入"真实存在"的世界，再从"真实世界"返回。（Welby，1893b，参见1985a：511）

466

维尔比提出意义多元和变化的理论，这和她对"简单的常识意义"和"简单明显的意义"的神话的批评是一致的，她认为这种神话仅仅是个假象，因此认识到了我们需要使文本摆脱在解码过程中受到的限制性解释偏见的影响。此外，尽管她认为"我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它是对澄清意义，对理解表达的意味、重要性和终极意义的邀请；通过对简单意义的批评，她也批判了还原论和过分简化的倾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假象，即认为文本可以发展为单独的阅读，并由此发展为一直都有效的、绝对而确定的解释项［同上：513；1983（1903）：143］。

吊诡的是，由于还原论的简单机制和运作其间的神话化，"清楚"、"简单"和"具有说服力"的话语能轻易地变成晦涩而顽固的话语。当"简单意义"、"常识"和"寻常事物"这些词在"简单化"和"清楚性"的指示下被运用，从而强迫多音性减少为单一意义的独白论时——比方说，当隐喻意义交换成为单一的、固定的、确定的意义时——甚至对这些词语而言，前文所述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Welby，1893b，参见1985a：510—516）。神话化往往是下述情况的结果：一是未能意识到解释和表意过程中基本的、未经承认的方面——如省略三段论法的作用，话语中暗含的、未经说出的部分（它可能变化和发展）；二是未能意识到普遍的词语和符号各有自己表意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为符号定向的他性逻辑）。这样的方面可以被归纳到符号的"符号学物质性"的概念之下。事实上，理解和传播是建立在未经说出的、暗含的意义上的，是建立在被理解的意义以及表意和解释过程的他者维度之上的。

467

维尔比提出了意义的动态性的、结构上的、生产性的概念理论——这和她对不变的、单一形式的、单音的意义之批评是一致的，和她批评将词语和措词描述为数字、标签和普遍认同的象征的做法是一致的。隐喻化和象征化的过程既没有系统边界，也没有类型边界。相反，它们覆盖了整个符号网络，有时候在解释路径的范围内，解释路径是如此地深深镌刻在语言之中，以至于它们看来就像赞同"简单意义"一样——尽管这样是错误的。因此，维尔比通过对语言的"多音"和"多逻辑"能力的重新评价（尽管她没有用这两个术语），批判了和对意义自身的还原性描述联系在一起的模糊性！[1]

1　维尔比于1892年在实验心理学国际会议上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心理学上对内在和外在的使用：隐喻

事实上，如维尔比所观察到的，她立刻认识到了在限制性的情况下进行定义的有用性，以及当这种做法在大部分其他情况下——解释语言的模糊性和异他性时——的不足，这种模糊性和异他性共同构成了表意和成功交流的前提。在为语468 言问题寻找答案时，她提出了表意学，这是她的意义理论，特别提到了她的意义三项式“感觉”、“意义”和“意味”，以及她对“简单意义”，“实际的”、“表面的”、“直接的”意义，和“比喻意义”，“间接的”、“思考的”意义的区分。尽管定义从来不是解决语言学语义双关问题的方法，但是在意义的充分理论下，它能够以任何方式派上用场；因为它在价值之外能有效地揭示专业语言的局限，定义去除了词语的表现可塑性或是弹性，因此不充分地回应了它们内在的活力［参见 Welby，1983（1903）：2；Petrilli，1998a：6.1］。

10.2.5. “一般语言”的假象：共有言语

维尔比批评了依靠一般语言（universal language）并将其作为克服相互理解中的障碍的手段的做法。不管是通过将一门现存的自然语加之于其他语言之上，还是通过建立一门人工语言来遮蔽语言的多样性，都只是在表面上解决语义双关的问题。语言、方言、行话和俚语等的丰富多样有利于语言学认知资源以及普遍意义上的表现性和意味的发展。维尔比不是将一般语言在理论上人为地强加于人，由此消除我们的人类文化、语言学和心理遗产的差别，而是承认了表意、解释和交流过程的丰富来源在于语言的差别和多样性。在她对世界的展望中，不同——它产生了另外的不同，这些另外的不同是在持续进化中开放的整体性的一部分——不一定是分隔和沉默的原因；相反，它们可能有利于相互连接的可能，因此有利于相互表意的丰富性的过程［参见 Welby，1983（1903）：212］。

维尔比使用“共有意义”（common meaning）一词来指作为作品的个体性和

是帮助还是阻碍？》，该手册在与会者之间分发，并且得到了适时的讨论。手册中收集了一系列从不同的心理学和哲学出版物中摘录的引文，以支持她的论点：不良的语言使用降低了观点的清晰性和精确性，并且导致了虚假的问题。维尔比用对比喻语言使用的批评性反思分析了这些引文，特别提到了隐喻和类比的作用。她证明了消极认知的结果——比如，对对立词组“内在 / 外在”、“内部 / 外部”和“里 / 外”等等的错误使用——将它们作为指定“心理 / 生理”、“主观 / 客观”、“想法 / 物体”和“意识 / 无意识”这些反义词组的隐喻。维尔比在会议上遇见了詹姆斯 · M. 鲍德温，他们的通信从此后保持到 1908 年。她还遇到了弗雷德里克 · 凡 · 伊登，这是一次成果丰硕的会面，因为在她的思想影响之下，伊登在荷兰致力于表意学运动的推动（见 Petrilli，1998a：7.2）。《“思想”选录》（1876 年 1 月—1892 年 7 月）、《自然》（1870，1888—1892）和《自然科学》（1892）则是维尔比另一系列出版物的题目，她在文中继续了对语言的批评，强调成功的人际交流的重要性。这些选集和维尔比的其他出版物——如《对模糊性的见证》（1891b）——是同时出现的，该书是对术语的批评；以及《意义和隐喻》（1893，1985b），该文收录在《一元论者》一书中，维尔比在文中从理论术语上更为广泛地反思了意义的问题。继该文之后，维尔比发表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感觉、意义和解释》（1896，现见于 1985a），在《思想》一书的两个部分中得以出版。

特点——也就是它的特异性和异他性——的前提条件的表意材料，这一词也指作品的普遍有效性的前提。就像罗瑟—兰迪提出的“共有言语”（common speech）概念一样［参见 Rossi-Landi，1998（1961）］，维尔比提出的术语“共有语言”、“共有言语”和“共有意义”并不特指英国分析哲学家们理解的“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或“日常语言”（everyday language）。相反，这些表达是用来指共有的表意材料和符号学材料，后者在语言和行话的丰富多样性中运作，形成一门单独 469 的自然语言和所有不同的自然语言、文化和符号系统，不管这些符号系统是口头的还是非口头的。维尔比在 1882 至 1885 年间写给赫胥黎的一封信里说到（Cust，1929：102），这样的材料构成了“言语所有部分间的不同的基础”，构成了“纯粹的技术性或间接意义”的基础，并由此在表意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表述中构成了所有表意过程的基础。

术语“共有意义”和“共有言语”表明了在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一种语言的先在性——所有语言共有的指称层面，它是全部人类共有的重复性的、不变的物质，是形成不同语言中的表现条件的一组行为。共有意义关注的是构成全体人类群体之基础，并将其统一的生物和社会结构的同源秩序的所有相似性，它超越了历史文化的差异和地域的不同，以及它们的局部变化。为了辨认出这一共有的领域——这一社会交流技巧的共有遗产，它使得一个领域的话语向另一个领域转变成为可能，使得形成一门单独的自然语和不同自然语的各种技术性的语言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罗瑟—兰迪说到，我们必须研究基础性的经验程序——翻译、教学、学习或是简单的对话——研究任何特定语言的所有语言使用者所遵循的这些程序［Rossi-Landi，1998（1961）：204ff］。

“共有言语”、“共有语言”、“共有意义”和“共有意识”这样的术语并不是想要低估语言的多样性，也不是想将语言的多样性单向地转向一种神秘化的初始语言，转向一种原始语（Ursprache），转向某种逻各斯的普遍语言学结构，或是控制和统一所有人类语言的生物法则。相反，这样的表达承认言语的多元语言性和多种离散性的特征；它们避开了独白论的诱惑，这种诱惑能够在如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中找到，它所思考的一切并没能解释语言的交流功能，以及语言的社会和主体间性的维度。如罗瑟—兰迪观察到的，共有言语的概念并不和多元语言主义——多种语言的同在——相矛盾；相反，共有言语指向不同语言所执行的功能中的相似性，这些语言在多样性中满足了表现和交流的类似需求。因此，就发展 470 不同对策、寻求不同的方法、使用不同的资源的需求而言，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被作为不同文化传统和人类经验领域而被感知的表现和交流中基本且共享的需要，共有言语的概念解释并证明了语言中的不同、变化性和多样性。

10.2.6. 批判性的常识主义和实用主义

维尔比和皮尔斯认为，即使是在对适当的技术术语提供科学的说明时，考虑到技术语言中广泛存在但未被意识到的日常用语，起点也应当是对后者的批判性阅读（有关时空关系的术语的讨论见皮尔斯1904年12月16日写给维尔比的信，收录于Hardwick，1977：48）。然而，如同皮尔斯在"什么是实用主义？"（1905a）一文中[1]——他在该文中对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的所有专门的话语领域中的科学性进行了思考——所说的，为了具有科学性，研究必须要有"合适的技术术语系统"，它的每个术语都有这门学科的学生普遍接受的单独的、确定的意义，它的词语外壳不具有可能会让不严谨的作者滥用它们的甜蜜或迷人的特性——这是一个科学术语系统甚少为人所欣赏的优点（CP 5.413）。此外，皮尔斯认为，一个有效的科学术语系统会破除个人的习惯和偏好，会满足专家们对于一致的必需，而且会得到唤起得体和尊重感的道德原则的支持。哲学上的新概念的引入就要求整个科学界都接受的新术语诞生，科学界可以根据原有的意义使用它们，而不用引入其他的技术术语来表示同一个，在同样的关系中的东西（同上）。

在"术语伦理"[《逻辑的某些主题纲要》（1903）中的一章，收录于CP 2.219—2.226]一文中，皮尔斯已经评论道，和其他科学相比较，哲学的情况非常独特，它体现出在普遍意义上对流行用语的需要，这并非它自身的技术术语装置的一部分，而是它的研究目标。事实上，哲学语言要求有专门的术语——就像柏拉图、经院哲学家和康德所做的那样——这种术语必须和被理解为普通语言的共有言语保持距离和不同。皮尔斯说："对哲学而言，最经济的就是为它自己提供一套生僻的词汇，以至于不严谨的思考者不会想要去借用它。"（CP 2.223）在皮尔斯看来，康德这个苦恼的实用主义者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在充分的专门化意义上使用修饰性的"宾语"和"主词"；因此，这些术语失去了它们在哲学中的有用性。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皮尔斯为建立理想的哲学术语和逻辑象征系统列出了七条原则（参见CP 2.226）。

471

根据皮尔斯在《实效主义和批判性常识主义》（CP 5.497—5.501）[2]一文中描述的批判性常识主义，我作为人类的一员拥有深入我的心灵秘密之处的确实的内省力量，可以准确地知道我自己的信仰和疑惑。然而，总存在着多少具有永恒性的、超越疑惑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存在于广义上的本能之中的，它们关注的是人

1 这是在《一元论者》上发表的三篇关于实效主义的系列论文中的第一篇。另外两篇是《实效主义问题》（1905b；CP 5.438—5.463）和《为实效主义致歉的序言》（1906；CP 4.530—4.572）。

2 这篇文章和1905年的一篇原题为《实效主义基础》的简短手稿是相对应的，这一手稿以"朱尔斯"——暗示对实用主义进行批评的意大利批评家普雷佐利尼（Giuseppe Prezzolini）——和"回答者"也就是皮尔斯自己这个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话进行讲述。该文选择"对话"的话语类型是为了表现对思想本身的有效讲述，后者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对话性。

类亘古就有的、模糊的命题，尽管不完全如此。皮尔斯说，只有当我们系统地尽力去对它进行怀疑之后，才能把一个重要的命题视为明确无疑的——但是，皮尔斯也记得，真正的怀疑并不是来自于意志的纯粹努力，它必须是经验的表现。明确无疑的命题可以是假的，但只要我们没有对它提出怀疑，就必须将它作为是完全真实的、确定的。当我们承认某些命题每一个都是各自完全确定的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有这个可能：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也许是假的（CP 5.498）。

无论如何，批判性的常识主义者的理论中的怀疑并非牛津的知识分子所设想的怀疑——也就是说，后者的怀疑是为了怀疑自身，是为了辩论的纯粹乐趣而怀疑。聪明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爱上兽性力量的欺骗效力，而是热爱理性的创造性力量，后者征服了所有形式的力量，以知识和爱的名义管辖着它们。作为理性的支持者，实用主义者赋予怀疑高尚的道德价值。 472

如皮尔斯的理论所指出的，批判性的常识主义是和实用主义相关的，它们都指向信仰的条件特征，“他人的思考实质在于作为条件的决心”（ CP 5.499），指向寻求真理的需要，将这种寻求作为满足心中希望的独特部分。实用主义者必须是开明的、不抱任何偏见的；此时，他是向信仰敞开的，仔细地分辨真与假、可能与不可能。实用主义者对推理和推理源自的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调查，并由此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近似关系研究——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思想和行为之间的近似关系研究。实用主义始于一个假设，即通常的行为都是主要受本能引导的（皮尔斯描述了人们屏住呼吸五分钟的不可能性，即使对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它让人们接受这样的看法：信仰也涉及本能和欲望。尽管随着物种进化，本能在不同程度上被自我控制所管辖的看法是对的，但自我控制并不能完全主宰本能。因此，考虑到无法抵抗的本能欲望是亲密而近乎不变的，我们应该毫不怀疑实用主义和批判性常识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

10.2.7. 一般性与模糊性

对实效主义而言，唯一重要的替代选择就是传统逻辑——皮尔斯对其进行了批判——对传统逻辑而言，思想只有在逻辑之中才是有意义的，物质是一种范畴，事实上它是功能的不规范的多元论（CP 5.500）。逻辑学家们给出了数种范畴的不同列表，但他们都认为等同于范畴的观念是简单的，只是单一的观念。然而，在一个范畴内可能为真的某物在另一个范畴内可能为假，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区别是明确的、是一次性地被定义的：“每一个都和其余的有所不同，但这一区别是无法一一列举的，因此也是不明确的。同时，在概念中，没有什么是不明确的。”（CP 5.501）皮尔斯进而在描述的不同之间建立了近似性关系——这一关系连接了概念和感觉的不同特性。不同是以像我们感受不同花朵的气味那样的方式被 473

感知的，但是基于每一种气味而判定的不同特性并不构成那些气味，它们不是这些气味的一部分。对于它们的关系，只能用"每一个都和其余的有所不同"(同上)来描述。因此，它们的关系是不明确的，而与之相关的感觉却是完全明确的。皮尔斯认为，逻辑学家们分析的概念指的是另一类的感觉特性，尽管他们不会承认这点，因为概念是一般性的，而感觉并非如此，但他们不能证明这一命题。皮尔斯断言，概念和感觉

> 毫无疑问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的不同完全是不明确的。这就正如气味和颜色之间的区别一般。这是肯定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概念定义为感觉的特性，当然原话不是如此，但当他们说到作为直接对象的概念每一个都具有他们所具有的所有特性，而不考虑其他任何情况时，他们就是这个意思。(CP 5.501)

就像我们在"批判性常识主义的后果"[1] 一文中读到的那样(1905，CP 5.502—5.537)，个人主义的支持者们同意现实和存在的共存——换言之，每一个主体的现实和存在既像是真的，也像是假的，它们具有同样的意义，或者说内容(Inhalt)。许多逻辑学家都拒绝个人主义的归谬法命题，声称两个意义明显不是相同的："现实意味着某种之于思想的非依赖状态，因此是一种认知性的特性，而存在意味着对环境的反应，因此是一种动态的特性。"个人主义者特有的一种误解就是，他们相信其他所有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包括他们认为相信"存在一般性"的学者型的现实主义者在内；事实上，从前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并不相信"一般性"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个体决定的模式"，并且承认这样的模式是思想的本质。皮尔斯说，实用主义形而上学试图通过接受"真正的一般性"的存在，通过寻求"一般性用什么方法可以不受任何有关它的思想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答案来解决问题(CP 5.503)。

474

皮尔斯澄清的另一个误解是：对实用主义者而言，一个概念的意思或充分的最终解释项包含在"行为的习惯"或者"可能将要形成的任何程序的普遍道德决定"中。任何词语(也许除了代词之外)的意思并不仅限于表述者心中实际的(actualiter)意思，相反，它或许甚至不是表述者心中习惯性的(habitualiter)，而仅仅是实质上的(virtualiter)意思。每一个动物都有习性和天生的习惯，就如它具有认知能力一样，它也"可能有天生的认知习惯"。这是皮尔斯对天赋观念的解释。

1　该文是继"实效主义和批判性常识主义"一文之后写成的，并且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其是题为"实效主义，布拉格"(1905)的手稿的重写，该文被分为了四个部分："个人主义"、"批判哲学和常识哲学"、"可能的一般性"和"评价"。

实用主义者带着批判性常识的哲学共享了这一立场,不管是从形而上学的类型而言还是从认识论的类型而言,他们都不应该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者。

皮尔斯声称,和批判性常识一致,所有的信仰都是模糊的——事实上,它们越是不容置疑,就越是模糊。这就承认了对模糊性进行误解的重要性,即使在数学思维中也是如此。模糊性对信仰是构成性的;它是信仰和表现信仰的命题所固有的。模糊性是"与一般性相对的类比":

> 符号在客观上是一般性的,它的有效解释是不确定的,它将为解释者完成定义的权力让渡给了解释者。"人终有一死。""什么样的人?""你认为的任何人。"符号在客观上是模糊的,它的解释项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它为其他的可能符号或解释项保留了完成定义的功能。"在这个月,"历书上的语言说,"会发生重大事件。""什么事件?""噢,我们会看到的。历书上没有说到这个。"一般性大概可以被定义为:排中律所不适用的。一般而言的三角形既不是等腰的也不是等边的;也不是不等边的。模糊大概可以被定义为:矛盾律所不适用的。因为(模糊意义上的)动物既不是雄性也不是雌性这一说法是假的。(CP 5.505)

一般性和模糊性并不一致,在有的方面它们甚至是相反的,尽管在形式的层面上它们总是相等的。既然定义的权利并没有被清楚地交给解释者,而是保持在 475 表述者手中,一个符号就不可能在同一方面既是一般性的,又是模糊的。此外,如果一个符号是不确定的,那么它就可以避免成为模糊的或一般性的,但是没有符号能够是绝对和完全确定的。根据皮尔斯的关系逻辑[1],没有命题的主词是单一的;相反,它有不同的指称层次。即使不是明显的,所有的命题也必然指称着事实,"所有宇宙的宇宙";因此,它们指称着同一个确定的、独一无二的主词,表述者和解释者都明白这一主词,并且所有人都假定它是真实的。在一个更为受限和直接的层次上,所有的命题也指称着一个非一般性的主词。

皮尔斯继续了他对模糊性的作用的思考,坚持认为对话者之间的交流从来不是完全确定或毫不模糊的,因为可能有变化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准确。因此,他除了表达他的希望——有一天不同的人之间的感觉特性可能会被生理学家比较,由此不再成为误解的根源——之外,还在交流的理性意图和不同的人之间经验的多样性中辨认出了导致误解的缘由。交流必然是模糊的,"因为没有人对世界的解释是基于与其他人完全一致的经验"(CP 5.506)。所以,就像我们注重于某幅画的细节而忽略了它的整体语境时,就会对这幅画的整体意义视而不见一

1　见皮尔斯的文章"将读者介绍给关系事物",首刊于《开放法庭》(1892, CP 3.415—3.424)。

样，同样地，我们越是想要准确——忽略掉前文中维尔比所说的意义的弹性——似乎准确就越是遥不可及，即使当我们在处理知识概念时也是如此。

皮尔斯描述的模糊性是以他性的逻辑为导向的，进入了我们认为的符号物质性领域。由此，模糊性可以被描述为构成交流之基础和交流自身可能条件的普遍物质，被描述为形成被表现的命题的先在条件。照此理解，模糊性确实地依靠对我们中每个人的不同经验的指称，这些经验的范围从有机的、本能的生活延伸到理性生活。像维尔比一样，皮尔斯通过这样的方法，将模糊性作为交流的可能条件，而不是造成误解的原因。它是通过对话达成交流的结果，不管是内在的对话，还是和对于某人的自我而言外在的、其他的说话者之间的对话。

476

单个的个人经验的变化性意味着明确解释层面上的变化性，以及在暗示理解层面上的变化性。因此，在交流中协商的对话和理解确实地是由模糊性、变化性和暗示的、未曾说出的内容决定的。

多亏了已经被理解的意义、省略三段论法和暗示，理解变得可能。更有趣的是，正是对于理解的可能性而言，模糊性是结构性的——事实上，我们越想要在维尔比所说的意思上更为准确，就越不可能互相理解。要说明不确定的东西且使其变得可见，就要追随着新的解释轨迹、新的表意路径，并因此引入新的暗示、变化和新的模糊性。总之，就话语的指称物而言，交流是对话者和解释项之间的对话性的调查和靠近——指称物包括一般性的指称物、事实和受限的、直接的指称物。说话、说明、判定和（由此而来的）理解都预设了被理解的、未说出的、暗示的意义，以及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如维尔比和皮尔斯告诉我们的，所有这些方面促成了我们的话语表意世界的生产力。

477

第十一章
全球交流中的封闭群体和开放群体

11.1. 全球交流中的逻辑、论证和对话

11.1.1. 全球交流原因的批评

全球交流这个说法就默认了交流—生产网络已经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个事实，因此，逻辑的平等交流现在也扩展到了全球范围。然而，更为彻底地说，全球交流意味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整合到了交流—生产网络之中。不管是发达、幸福和消费主义的生活；还是不发达、贫穷和难以忍受的生存方式；健康或疾病；正常或异常；融合或摩擦；就业或失业；把合格人员送到工作场所（外迁移民的特征）或移民的迁移特征不需要什么热情好客；合法货物的交换和贸易或非法货物的运输，从毒品到非常规武器、人体器官，不管是否有上述何种区别，这些情况都有着深刻的含义。此外，并入到交流网络不但影响到人类生活，也影响到地球上所有物种的生活，而这些往往很容易被伤害，也会给所有的人类带来负面后果。（见本书 12.2.3）

全球交流已经改变了空间、距离、时间，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和情感。所以，我们有必要解码这个过程所涉及到的各个符号，识别商品流动所开辟的新途径，学习读懂全球交流系统所带来的信息，以星球延伸和速度的角度来测算这个系统，记录这个新价值体系所盛行的标准，以及等等。换言之，现在有必要 478
用符号学的方式对全球交流系统中新的感觉和推理（思维）进行思考，最后得出对全球交流原因的批评。

这个问题，又将我们带回到论证推理中对话的中心问题上来——也就是说，推理还没被强化到成为身份的护卫与复制，但却是开放的且对他性逻辑很敏感。

巴赫金（1970—1971）证明了僵硬的对话如何衍生出了单向性、僵化、直线式的辩证法。被理解为独白式的、直线前进的、总体性的辩证法应该被视为综合和结论，这就对“对话理性批评”提出了要求（参见 Ponzio，1994a、1998；亦见本

书3.1.6)。在这些问题上,巴赫金的作品是最重要的参照。事实上,他所有的研究,包括1974年他晚期的文章关于人类科学的方法论的论述(见Bakhtin,1979),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人对人类的知识和理解是否只有特定的方法,还是需要构想出新的理由?这个问题和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讨论的问题相似。然而,这个问题不像萨特所认为的那样,在思想和客体之间设定一种新的关系就完全得到解决。事实上,萨特的辩证法仍然囿于独白式辩证法的局限,其原因在于他把他者的关系削减到身份和相互客体化的关系:为己和为他的辩证是总体意识的辩证法,其主要趋向是主张个体自己的、在他者之上的客体化观点。

对话推理批判即是对同一性范畴的批判,这一范畴如今主宰了西方的思想和实践。从同一性的角度而言,意识和部分的、有限的利益是一致的。不管是在个人、群组、民族、语言、文化系统的同一性问题,或是一种扩展群体的同一性问题,比如欧共体、整个西方世界、联合国等等,同一性逻辑和有限利益的相互关系都只会带来神秘化的过程。

同一性范畴是通过实在的抽象物来实现如今的主导地位的,它基于这个世界,并形成了我们所体验的现实:这些实在的抽象物是在当今世界主导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内部"的,包括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真理、知识、平等、正义、自由、有限责任、需求、平等交换等等的概念。然而,并不仅仅是说,一个实在的抽象物被作为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结果而被建构出来,更为根本的是,整个体系本身是基于同一性范畴的基础的,同一性范畴也被视作是普遍的,因此对世界整个范围内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市场和消费过程而言是结构性的、构成性的。当今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具体抽象物的逻辑本身就是同一性的逻辑。拥有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个人、拥有利益的社会、拥有务实政治的国家、拥有需求的平等交换,所有这些范畴,都遵循同一性逻辑的原则。

479

话语秩序内部的论证所在即是同一性逻辑的所在。同一性的理由包括了战争的缘由,即便是以极端暴力形式出现的战争,它都把其看做是合理、正义和合法的,以及消灭他者的理由。这样的同一性逻辑是通过包围、孤立、驱逐或消灭他者得以维护的,由此,如同预期的一样,它们包括了具体又抽象的"个体",个体必须牺牲自己的他性,以便在同一性上维持自己。

对推理和论证的批判需要他者的视角。这种方法要求首先承认他者,或者更进一步,认识到承认他者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个事实(参见Ponzio,1995a、1996a)。因此,对他者的承认不能被视作一种让步,一种个人、主体、同类的自由选择,而是异化,是意义的丧失,以及从国家、政治和法律这样的实在抽象物中产生的,而不是神话式地先在于后者(如霍布斯的错误理论所说的!)的"每个人对于他人都是狼"(Homo homini lupus)那样的情况所强加的必然。

11.1.2. 对话、符号活动理论和论证理论

支撑我们对对话和论证的关系进行讨论的概念，并不就仅仅指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次推理都是处于我们和他人对话的语境中，甚至当这个人就是我们内心的第二个自我时也是如此，通过这第二个自我，我们衡量了一个被给出的论据的正确性。

在考虑对话和论证关系时，我们特别关注的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对话多多少少都明确地包含了论证。 480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它迫使我们把关注点从对话—论证转移到它们的可能性条件上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的问题关注的是基础，由此意味着这样的讨论：它必须从可以被描述为“符号对话”（semiodialogic）的视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出发，沿着将论证或逻辑研究和对话分析、符号学联接起来的边界展开。

对于这样一个视角的充分发展，有两位作者是基础性的：皮尔斯和巴赫金。还可以加上两个名字：维尔比和莫里斯。我们认为，维尔比关于意义的理论，或者说“表意学”，以及莫里斯的“价值论”，对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全面理解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建议。他们每个人（尽管都是独立进行的）都研究了符号、价值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都研究了符号学、价值论和实用主义的相互关系，并且展示了这些相互关系之于认知过程和一般实践的重要意义。价值是有符号承载的，或者换个更好的说法，符号是创造出价值的材料，而反过来却未必正确——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有价值，比如非人类动物世界的符号，或者构成我们基因编码的符号等等。最后，符号和价值又依次与行为相关联。

莫里斯把意义分为“表意”（signification）和“意味”（significance）。前者是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指的是“拥有意义”的条件；后者是价值论研究的对象，是指“有意义”（being meaningful）或“有意味”（significant）的条件。维尔比同样也有指出过相似的三分法，即“意识”（sense）、“意义”（meaning）和“意味”（significance）。维尔比和莫里斯等使用“意味”这个术语来强调符号、意义和价值，以及和人类行为的关系。

维尔比和莫里斯都认为符号活动，特别是语言（verbal）符号活动，是知识和真正的价值产生的所在。但除此之外，符号活动也被视作伦理和美学判断的所在，因此，它是具有批判和责任能力的所在。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对话潜力最大的情况下，对表意过程（从广义角度而言）进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要理解意识而必须做出的回应是以他性逻辑为基础的，并且要求采取某种视角。价值、 481
符号和论证对话之间的这种关联使得“伦理符号对话”或“符号伦理学”这些术

语比“符号对话”更恰当，它们表明了对对话性论证进行恰当分析的必要的、基础的视角。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回到对话理论、符号活动理论和论证理论之间的关联上来。连接这三种理论，或者用个更好的说法，联接“符号对话理论”所包含的三个方面的公分母就是解释。事实上，解释在对话、符号活动和论证中都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要证明论证、符号活动和对话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要证明解释的对话特征，然而解释不只是辨认和承认，还是“应答性的理解”（这一术语改编自巴赫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识别解释项和应答性理解的解释项一起进行思考，对于前者，我们往往是在索绪尔学派对“所指”（signifié）的理解的意义上，也就是在依赖于“符码”的意义上达到的；后者则将自己限制为对符号的承认，并且，进一步地，对它们进行对话性的回应，采取某种立场，做出某种选择，因此内在地涉及了价值、习俗、行为标准、典型和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对话的类型学必须从行为类型学开始。

让意识变得可以理解的逻辑是对话性的。对意识的理解总是意味着对话结构的论证。意识总是对问题的回应，一种对话式的回答，其中问题和回答并不只是信息交换，还是价值和价值定位。这个问题需要实用主义的、价值性的立场，正如在理解意义所作出的回应上也需要一个立场一样，不管这个立场是模糊的还是明确的。

决定意识的问答逻辑摆脱了独白论的限制。我们所说的问答，并不是指逻各斯绝对的、客观的抽象范畴，而是指对话的具体方面。和看似没有时空和价值限制的，或者说处于独白式话语时空中的独白式符号关系不同，对话性的问答关系有清晰而多样的时空和价值定位，这就决定了这种关系被赋予的、不能削减的他性的程度。

巴赫金对可能性条件的问题，对对话性论证的基础作出的最大贡献，可以追482 溯到他对刚才所讨论的意识问题所使用的方法上去（参见 Ponzio，1993a）。

接下来，我们会检验论证类型或推论（归纳法、演绎法和试推法），符号（规约符号、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类型学和对话性之间的关系。

按照解释符号和被解释符号两者关系所体现的对话性和他性的程度，推理论证和皮尔斯的符号类型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建立，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皮尔斯最为有名的三分式——规约符号、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时更是如此。

对于规约符号，被解释符号和解释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由习俗调节的，因此它是规约性的。对于指示符号，被解释符号和解释符号之间的关系由因果的必然性调节，因此它是约束性的。对于像似符号，被解释符号和解释符号的关系由相似

性调节，因此也是由相互的独立性调节的。

如果我们把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看做是被解释符号和解释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些范畴同样适用于论证。在归纳法中，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习俗之上的，因此这种关系属于规约符号的类型；在演绎法中，结论是前提的必要推论，因此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指示符号类型的；在试推法中，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是像似符号一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这也就意味着高度的创新性，和产生错误的高度风险。试推过程的对话性是很高的，它产生的反应可以说是最有风险、发明性和创造性的。

在演绎法中，只要前提被接受，结论就是强制性的，就对话性而言，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的关系中的对话程度是最低的。在归纳法中，前提和结论的关系不是必然的，但是推论过程保持一种单线性，因此同一性的逻辑和重复的逻辑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相反的情况是，在试推法中，论证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实质意义上是对话性的，而且事实上，对话性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种程度越高，推理就越有创造性。试推法的论证过程是具有风险的，换言之，它主要是试验性和假设性的，留给规约（规约性）和机械必然性（指示性）的边缘空间很小。试推法的推论过程是由像似性主导的。试推也就意味着，超越了同一性逻辑和平等交换的逻辑，并且产生了由高度的他性和对话性主导的符号活动。

483

11.1.3. 具有修辞技巧的符号

被理解为颂词、歌颂话语的修辞话语，并不只是商业世界中的宣传所使用的虚假和欺骗性话语。除了在宣传中的使用，这种修辞还是修辞机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维护着清白的良知，捍卫着现有的价值观。这种修辞话语用种种理由为良知辩护，而良知在对自明的基础概念的呼求中，也就是对包括同一性，角色，以及诸如民族、群体精神、契约义务、公民契约等概念的呼求中，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和确保我们具有受保证的、有限的责任，让我们安分守己。只要修辞捍卫了“固有的信仰和习俗”——正如皮尔斯在他著名的短文里面所说的，它就是让人鼓舞的。

修辞手法是信息游戏的一部分。要从种种固定形象中获取认同，编织故事，让事实以更令人接受的方式呈现，修辞手法在其中起着基础的作用。

除了告知以外，信息似乎没有别的目的，也就是说，信息就是为了告知，它是令人满意之物，是吉兆性的任务。事实上，这真正的含义在于，信息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对信息的消耗而再现信息过程本身。如同罗瑟—兰迪的“同源原则”告诉我们的（见本书 6.1.7），为了信息的信息不亚于为了生产的生产的负面。

我们正在描述的信息是按照流水线生产的逻辑被建模的。它的目的就是获

得同源化的消费行为，这种消费行为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重复：对同源化的新闻和信息的消费，日用品和时尚的消费，在这种循环中符号相互指涉，以一种单调的交替方式连续不断的相互引用和重复——这是一种倾向于使价值观和态度上的相异越来越小的消费。日常信息的生产循环应该被打断；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逃离的陷阱，要致力于成为不是被被动告知的，而是能进行思考的。

为了市场消费，修辞手法生产、重复适当的固定形象，并将其强行推广。我们可以说，符码符号学就是一种修辞方式，因为它把解释过程简化为解码过程：其中，修辞技巧就在于为了孤立和加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小的环节，使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衍义被中断。就此而言，解释符号学是通过对话和论证，建立 484 在开放和冒险原则之上的。这种方法强调并强化了一个观点的内在的对话性特征，即我们所说的内部的对话性。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所认为是确定的意义的模糊性。对话语而言，对话是结构性的，这是由被解释符号和解释符号之间的差异和疏远造成的，同源化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抹去这些差异。因此，对话并不是不同主体之积极活动的结果，而是主体存在的条件本身。

在当今社会，较之于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在主体“是积极的”、“主体”之于既定的“客体”的意义上，在和“积极主体”相关的，诸如创造性、发明性和创新性等概念的意义上，对“主体”的功能进行思考。试想一下欧盟委员会所信奉的教育话语——例如《创新绿皮书》中的标准化政治。在这份文件中，市场是创新的唯一参考指标，而产品本身的创新特征就在于，它能对市场上现有的、相似的产品进行破坏。《绿皮书》中的一个例子是：在相对而言较短的时间内，CD 现在已经使得传统的唱片及播放设备变得过时而无用，更新的例子则是 DVD 正在取代传统的录影带。对于希望了解规范着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任何人来说，这种发明性和破坏之间的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个阶段，有两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在形式层面上，一个问题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辨别出错误的推理使用技巧，从而使自己的陈述显得真实，或者说，至少是有效的、可以接受的；另一个问题关注的则是我们如何找到工具——包括话语体裁，或者更为广泛的符号学体裁——它可以将基础充分的批判性论证包含在内。

关于第一个问题，最好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佩雷尔曼和奥尔布莱希特—泰特卡关于论证的著名文章。但是我们必须记得西班牙的彼得（见第 408 页生平简介）更古远得多的作品《讲道集》，或称《逻辑大全》[1972（1230？），该书意大利语版本于 1985 年由蓬齐奥翻译，拉丁语和意大利双语的新版于 2004 年面世]。和中世纪的逻辑学的其他书籍不同，该卷书的优点是它有一整套定义和辩证法的规则，但和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关系。本卷书的第七册名为《谬论》，是对解决上述第

一个问题很有帮助的出发点。至于媒体话语——尤其是电视话语，它被赋予了可信度，期望观众不会觉得自己的话语是可疑的、有问题的，而事实上它真正寻求的是利润、选票和顺从——这是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重要传统，从《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作者波德里亚到罗瑟—兰迪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 485

11.1.4. 以符号学为基调的电视传播批判

我们对媒体和大众传播的检验，尤其是对电视传播的检验，既不是社会学方法的，也不是心理学上的。如果不通过对符号的研究，就不可能充分理解程序设计、计划和意识形态。多亏了传播，也因此，多亏了符号，文字和非文字的，社会再生产的整个体系才成为可能。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将符号作为它们从属于的过程的构成性部分来进行检验。这一方法有助于证明传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证明研究它们的学科间的关系，即符号学、一般符号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传播不应该只是从和符号交换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也应该从和符号生产及消费系统的关系来研究。而且，作为社会再生产总体性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也必须从它和符号系统的必要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我们的视角是符号学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和职业相关的、简单的选择问题。

现在，任何人如果希望获得共识，实现“可抵抗的上升”(布莱希特语)，都必须控制传播系统，包括报纸和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业，更要控制电视网络。的确，在现在这个时代，对专研营销的符号学家的控制，也是大有益处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考虑到罗瑟—兰迪对大众传播的符号学批判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开创的研究值得仔细的考察。罗瑟—兰迪把统治阶级定义为“对一个既定群体的文字、非文字符号之散播和流通具有控制权的阶级”[Rossi-Landi，1994（1972）：203—204]。现在的阿图拉·乌依必须借助于电视，和布莱希特笔下的那位求助于喜剧演员的乌依不同，如今的乌依必须求助于广告商乃至营销界的符号学专家，去学习这个行业的技巧，最后把自己成功地呈现给公众。 486

这种方法就是现在的现实。电视和广告是如此紧密的相互联系，以至于它们已经变为彼此依赖。电视在经济上依赖于广告，同时两者都依靠于传播的控制者。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同一个网络、同一个文本，也就是广告网络的一部分。任何想向公众发言的人都必须进入这个网络。不仅仅是政治已经被电视化了，不仅仅是电视化的政治话语成为了宣传之所在，连政治消息自己也成为了进行中的广告系列中的一个图像。于是，符号学可能能够起到作用，事实上，这种作用的展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符号学被用于劝说，它的策略已经不再隐藏，符号学服务于电视化了的信息流通，服务于营销。这种作用又通过符号学的一种趋势得到补充，即讨论符码、意义、传播、表意、指涉和非指涉的符义学，而不考虑符号活动的实用主

义层面，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欺骗性的、“不可能中立”的名义进行的，这让我们想到了邦凡蒂尼的一本颇具时代性的著作的标题。

当今传播再生产体系的一个特征是，传播的渠道主导了信息，这样传播是为了传播本身，为了传播的再生产而被生产出来的。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终止这种状况。传播必须在人际间对话性、批评意识和非疏离性的实践中恢复自己的使用价值。

一个根本问题是，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形式（包括电视）和世界的关系。在规划的层面上，世界已经和政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投射。世界和政治相关联，而政治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整体看法和功能系统；一个满足需求的空间；为了维护已然如是的现实的生产力和效率的策略；求生意志（conatus essendi）的保障；对个体主体和集体主体的利益（拉丁语是 inter-esse，它在存在这一概念中起重要作用）的调节；对待在的意识和控制，它始于对当下的现实主义视角，并且使过去适应于当下；为了生存而不惜代价地坚持着稳定的经济性。甚至是以战争的代价，战争的极端武力，战争被视为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所预见的战争是它的逻辑的一部分，是求生意志的一部分。

世界是建立在同一性的逻辑之上的，由此，为了保存、加强和广泛地再现同一逻辑，它将战争视为剥削他人的方式。世界已经做好准备，要牺牲他性。世界、历史、现实、同一性、真理、力量、理由、权力、生产力、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联，都被镌刻在我们作为西方人的经验和文化中。事实上，这种关系一直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和激怒着，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世界，传播为社会再生产服务，并强化了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关联。电视网络——或许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传播渠道——在这个意义上也被利用了。不然，我们怎么解释电视网络在海湾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呢？这场战争在现代历史上成为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成为了两种不同阶段的分水岭，第一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反战，第二个阶段是由资本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阶段，特点是普遍的支持战争。事实上，海湾战争所取得的影响深远的一个胜利是，战争的现实如今最终被广泛接受，成为了维护和平、差异和身份权利的正当而又必要的手段。

487

电视使得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商品。它也促成了服务于市场、振兴生产—传播流通的具体化过程，而这种促成不仅仅是通过它和广告的链接进行的。对于具体化：更好的词是流动化（fluidification）。岗瑟·安德斯观察到（Gunther Anders，1956、1980），广播和电视所提供的并没有采用客体或资产的形式，而是保持了流动性。远程信息处理也是如此：它所提供的被流转在工厂之外的同一种流动性所吸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双重意义的“传输”一词是症候式的——实际上，它既指定了传输的过程，又制定了被传输的对象。人们所拥有的是商品传输的设

备而已，不是被传输的商品本身。“以悖论的形式陈述，”安德斯说，“我们是完全被动的主宰者……滑稽性不低于马克思·施蒂纳所嘲讽的，‘自身饥饿的主人’那样的人物。”（同上：48）“‘具体化’一词被用于描述上个世纪左右的情形，它已不能充分展现现在局势的特点。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中，避免了物的形式和流动化的物。或者至少说，这个阶段中对象的流动化和非对象的具体化一样具有特征性。我们建议使用‘液态化’这个被理论界已经忘记的词来指这种状态。”（同上）

按照安德斯的看法，“流动状态中”的录音机、录像带和生产周期中的生产产品的利益并不冲突。但他仍然被迫承认，这样的发明不是为了“生产的利益”，而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想拥有它们的传输，将其变成如同书本和图画一样的固态形式，尽管离开了资本，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只要生产新商品的机会一出现，资本主义工业就即刻准备利用它，“即使新产品和生产的原则相违背也在所不惜”（同上：49）。然而，为了促成变革性的对话主义，录音带和录像带所带来的矛盾或许能够被倒转。 488

11.1.5. 对话和说谎

由于媒体的力量和无处不在的影像，谎言不再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掩盖之上。比方说，让我们想想现在主流信息服务业所使用的各种技术。在渴求“透明性”、玻璃性（“玻璃制品没有什么‘氛围’”）的文化中，建立在秘密之上的不透明性已经不再可能，“玻璃是秘密的特别敌人”（Benjamin，1933）。将事情组织起来，使见到并不意味着理解，其结果是意识的获得以及对事情和情形进行改造性的干预变得不可能（相反，这些情形本应按原样得到保持、隐藏和传承）——甚至相反，见到也只会阻碍理解。现今的“破坏性特点”（现今意味着被如此特征化的社会，它的特点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传播而传播），展示并揭开了它所具有的，构成性的令人厌恶性。如本雅明所说的，破坏性的工作需要公众，需要见证。以“透明”的名义进行的信息快速交接和分层，满足了广泛存在的“窥视癖”，导致了现实中的存在被降低到了表面的层次上，由此破坏了公众意见对于控制的看法。关注被混乱所取代，丑闻的意义变成了妥协和习惯，理解也变成了误解。确实，如本雅明所说（同上），最终一个人为了避免被误解而允许自己被人误解，更确切地说，破坏的倾向需要持续不断的带来误解。

在“为了好的目的而说谎”（或者“不怀私利地说谎”）、“如实汇报”、“显示”、“揭示”和“说实话”这样的表达暗含的，表层的积极含义之外，对说谎的话语和外在的话语进行另一种分类，也是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思考，这些分类中的哪些部分使得话语偏离了获得和巩固对话的目标，因此在他性和实质性对话性的 489

方向上偏离了同一性的范畴。

11.1.6. 电视和良知的保持

海湾战争的例子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让人理解观点是如何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电视进行传播的。海湾战争成功地把战争推广成为正当、必要、合法和合理的概念。这场战争也让我们了解了知识分子、记者、政治评论员、历史学家（比如法国专家勒高夫）和哲学家（意大利思想家博比奥）通过电视发挥的作用，所有这些人都在帮助推广这个看起来像是时代错乱的观点。战争的理由和“疯狂”相反，当然“疯狂”一直指的都是“他者”的“疯狂”。公众，或者说“观众”准备好了接受战争的思想，这只能从电视的力量才能得以解释。对意大利来说，我们必须牢记战争和宪法第 11 条完全冲突；从国际层面来说，它和赫尔辛基公约相违背；并且，从整个世界的层面来说，它促使联合国赞同奥威尔式的口号“战争即和平”（引自《一九八四》）——而联合国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世界的和平！借助电视，对战争的一致同意成为了可能，而且全世界范围的直接参与也成为了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来，尽管海湾战争主要是由美国所实施的，但它实质上是一场世界战争。从来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在世界的层面上取得过如此高度的参与、相互的牵连和责任，当然我们所指的责任具有“良知”的特点。当我们说到“共识”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系列的可能意义：支持、道歉、接受、被动的同意、惰性的非拒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包含了同谋和责任。

在海湾战争期间广为流传的一种看法是，事实上有两场战争：一场真实的和一场虚幻的战争。真实的战争是两军对垒，充满了死亡、鲜血和破坏；而另外那场通过电视屏幕看到的战争，却是“智能”炸弹击中“军事目标”的飞行轨迹，看不见任何鲜血、破坏和死去的人们留下的痕迹。就我们而言，我们相信只有一场战争，这场“虚幻”的战争对于真实的战争是结构性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作为 490 电视观众，实际上也在这场战争的成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观众，我们都参与了这场战争（尽管我们都保持着自己的良知），接受了电视屏幕前的“岗位”，带着多少具有主动性的共识，和多少带有被动性的对战争的接受，最主要的是，装作一副中立、置身事外的样子，参与了这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确保死亡、鲜血和破坏的景象的一部分。于是，我们作为电视观众，也参加了这场海湾战争；并继续参与着在中东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类似的战争。对这一循环的成功复制，电视要负起很大部分的责任，它不但把海湾战争当做娱乐，还促进了这样的观点：战争是合法和必要的。

当今的传播技术和主导的意识形态使得批判意识的发展变得愈发困难。事实确实如此，以至于宣告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关联的社

会体系也受到欢迎，被视为提出了人类关系的可接受形式。符号学分裂成各种应用符号学或特定的符号学，它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其批判功能，因为它使自己为传播服务，有时候，通过参与从营销到选举运动的各式活动，它甚至为与现有秩序有关的一些共识服务。

今天，对批判意识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实现批判意识的困难在于日常生活中的错误意识和社会异化的普遍环境，而这种困难又强调了对这样的意识的需求。

11.2. 赫尔辛基会议的论证逻辑和传播—生产意识形态

11.2.1. 传播—生产和战争

全球交流的世界也就是，利用所有必要的可能手段，包括战争，来实现生产、利益和再生产的传播。全球交流的毁灭特征（“毁灭特征”这个词是本雅明在1931年，纳粹主义诞生的前夕，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时用到的）在下列的问题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从对环境的破坏、贫穷的增长、结构性的失业，到北半球国家对南半球国家的剥削，以及世界财富的不均衡分配。因此，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陷入了极度危险之中。

491

如果符号学家只是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到他们所专攻的领域，而没有考虑到这种悖论性的情形，他们就会陷入对符号学研究的特定对象——符号活动——视而不见的危险。如果我们还记得，符号活动和生命相一致，这一后果就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在现阶段的全球传播—市场体系发展中，资本主义破坏性特征最有力的表现还是战争。全球传播的世界就是无限战争的世界。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所谓的“正义和必要的战争”调整的，而战争被描绘成“人道的”和“预防性”的。

建立这一世界秩序的新方法的开始，应该就是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这场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标志着战争的观念和方式上的决定性变化。从那以后，战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生产循环中得以传播，变成了“正当且必要的”、“警察行动”，甚至成为了“人道的行动”。现实主义的政治（不过如果政治不现实，也就不是政治了）适合于世界交流的现实，和传播—生产的存在。政治和本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参见列维纳斯的观点）。正是由此，政治往往倾向于战争，而战争是存在最残忍、最兽性的现实面。在当今，政治被描述为和世界的传播—生产本体之间的关系。传播—生产关系就是世界的交流本身。这

是世界的交流，并不只是从遍及这个星球的交流这一意义而言的，也是就交流和这个已然如是的世界一致、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的意义而言的。更有甚者，在世界的交流中，交流和现实，交流和存在是一致的。政治的现实性必须和本体论一致，使其能够接受战争的极端武力和物的力量的严格法则相符合，从而传播战争，生产战争。

世界的传播—生产体系所要求的，正是全世界范围的控制形式，以此维持"世界秩序"，让世界的传播—生产体系能够进行再生产。这样获得的世界秩序，必须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议、条约、同盟来保证和维持。国际间的协议专注于维持所谓的世界秩序，与之相关的条款比其他的更有特权，对世界或全球传播—生产体系范围内的"发展"和"竞争"来说也是必需的；它们保证了国际层面上的"发展"和"竞争"的必要空间。根据这种逻辑，要优先考虑的是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各种战略性有效协议。此外，这样的协议，即使是过去所议定的，比起现在的协议来，也更能和当今世界的需求相吻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新产生的欧共体会服从已有50多年历史的北约。在对世界秩序的维护上，美国和欧共体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共同利益；从科索沃战争到近来的"预防性战争"，这种矛盾解释了这些国际大国集团的行为。

492

把战争视作"正当和必要的"，这一概念于1991年被提出，此后就在大众的意识中活跃开来，取代了二战后欧洲的关于战争的主导性概念，这一概念是经过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官方确认的（参见 European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in Social Sciences，1990），该文件由欧洲安全和合作大会所制定（1975）。它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无条件地把战争这种解决方法排除在外，其指导原则就是，如果国家之间的问题诉诸武力，或者是威胁，那就是不正当的，不管这些国家签署这个协议与否。现在我们必须思考一下，为什么赫尔辛基公约会失败，为什么这样一个善意、具有说服力的表达，却无法调节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赫尔辛基最终法案采用了三种论证方式，以支持为了欧洲和世界整体性的和平、安全和保护而合作的理念。其中两种论证方式是基于同一性的逻辑：其一，合作源于各国之间的一个公约、一个协定，而各个国家被构想为相互独立的、自足的同一性；其二，合作是由共同的历史的同一性——也就是共同的文化经历、传统和价值观——证明的。然而，第三种论证方式是建立在异他性的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是依据无法漠视的差异，和国家、民族之间的消极团结来理解的。产生这样的描述，是由于这些国家和民族都不是自足的同一性，它们也不能从共同命运中撤离：国际关系必须涉及到他国的责任，这是没有借口的、应分的。不幸的是，第三种论证方式只占了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世界层面上的和平与

合作的目标得不到完全的支持和证明。

493

11.2.2. 对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符号学分析

现在我们要专门讨论下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目的在于检验它的论证逻辑。赫尔辛基最终法案是由三十三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于1975年8月1日签订的，被一致认为是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科学研究与文献协调中心（维也纳）在欧洲的不同国家中，推动并举办了一系列的会议，从符号学视角分析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这些会议举办地包括：布达佩斯（1985年1月）、布拉格（1985年11月）、的里雅斯特（1986年5月）、莫斯科（1986年11月）、佩奇（1987年5月）、杜布罗夫尼克（1987年10月）、莱比锡（1988年5月）、索非亚（1988年11月）、鹿特丹（1989年1月）。

1984年的杜布罗夫尼克会议设立了一个课题，其标题是"符号学的比较研究。国际关系的话语：赫尔辛基最终法案"。

（来自12个不同国家的）与会者有：欧洲协调中心荣誉主席亚当·沙夫（见409页生平简介）、欧洲协调中心副主任维纶—岗多斯、罗瑟—兰迪、保罗·法基、克劳斯·博赫曼、莫米尔·米洛杰维克、亚诺什·凯莱门、克里斯蒂娜·沙夫纳和奥古斯托·蓬齐奥。

项目的成果包括：由欧洲社会科学研究与文献协调中心编写的新版赫尔辛基最终法案（1990），该版本增加了对该案所主张的概念的科学分析结果；以及《欧洲的概念》一书（Villain-Gandossi 等，1990）。

11.2.3. 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论证轨迹和不足

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示范价值，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个过程的内部原因。我们认为，这可以追溯到形成该文件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论证轨迹和逻辑上去，特别是，与战争逻辑相关的论证并无说服力，这是该文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验证这种假设，有必要对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论证逻辑的前提进行分析。

494

在欧洲安全和合作大会形成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中（参见 European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in Social Sciences，1990），国族（nation）等同于国家（state），因此，对"国族"一词的讨论，要么是就"国家"这一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国家而言的（如"成员国与非成员国"），要么是在国家所表达的人民利益和渴望（如"国家和它的人民"）、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这一意义上而言的。成员国（当时的欧洲国家和前苏联、土耳其、加拿大、美国）承诺尊重民族

间的平等和自主决定权。如文件中所声明的，成员国家“将尊重各国司法平等、领土完整、自由以及政治独立，也同样尊重各国自由选择和发展自己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系统和决定自己法律法规的权力”（同上：78）。

“国族”这个词参考了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名称，也借助了在“国际关系”或“和平、安全和国际正义”之类表达中使用的“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的模糊暗示，这都指的是国家和民族间关系的问题。然而，“国族”一词也间接地作为形容词，使用在“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这个词里。这里的“国族”一词，明显地指民族群体，和“生存在国家领土上”的民族。国家致力于尊重和保护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的权力，以此保证国族和人民的“根本权利”，以及“实际上享受人类权利的全部机会”（同上：80）。

赫尔辛基大会的目标是“推动它们（国家）彼此间的关系，并保证人们在真正持久和平的环境中生活，摆脱有悖于他们安全的各种威胁和企图”（同上：77）。成员国将在“双边关系和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中，避免使用威胁或危及领土完整和国家政治独立的暴力，也避免使用与联合国宗旨相违背的任何其他方式。不得考虑授权使用任何与这一原则相悖的威胁，或者武力”（同上）。

因此，赫尔辛基最终法案最后成为了在自主的、主权的同一性之间调整相互关系的一种协议，其基础是“主权平等”。（同上：78）另一方面，在差异方面，除了“个体性”之外，它没有国族与国家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他性的范畴内，暗含的意义被限制在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相互的他性上，这是国族—国家的同一性致力于尊重的；就“国家少数民族”（族群）而言，这就涉及到国族—国家领土内部的民族，他们的权利是受到承认和尊重的。

495

现在，关于“国族”一词的双重含义的看法将更清晰：它既被视为同一性，也被视为差异性。

11.2.4. 作为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国族”

国族的概念是一个实在的抽象物，群体的同一性通过它得以实现。这种实在的抽象物既是虚构的，又是物质性的。不过，对于所有的社会—政治构成来说，它都是真的：因为这些构成都是由符号、符号物构成的，包括被称之为世界的这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甚至于，这是一种建构，一种规划（地理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规划，即社会规划的产物），国族的同一性是它的一部分。

国族既属于同一性的范畴，也属于差异性的范畴。这样的双重性也从“国族”这个术语本身得到了证明，它既有双重含义，同时又是矛盾的。

1. 基本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的：

指人民拥有主权国族和国家。

2. 民族学—语言学上的意义，这是在浪漫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是以每一国族对于彼此的差异为基础的。

这两种意义指向了对国族同一性起源的两种不同方式。第一种国族同一性的来源被描述为政治、法律和经济性的，因此同一性被视为所是，即一种历史社会建构；而第二种国族同一性被视为是自然存在的。诸如语言、文化传统等历史社会因素与血统、领土等"自然"元素紧密相关；即便如此，历史、社会元素本身也被视作是自然的（共有语言中的"自然语言"表达是症候式的），或者，无论如何，被视作能够自然地决定国族差异的元素。

从同一性的角度考虑，国族就是以人民拥有主权为特点的国家，反之，如果"人民—国族"这个实在的抽象物并不具有主权，那它只是一种领土意义上的国家。无论如何，国族是一种其历史、社会特征被广泛承认的群体。从差异性的角度考虑，国族是一种自然的群体，可能，也可能不能在国家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当国族作为国家、人民和公民群体时，它是肯定的法律实体。当国族作为"自然群体"时，它受自然法则所约束，自然法则以看起来可区分的自然特征为基础，主张差异的"自然权利"。 496

和被视作肯定的同一性并和国家的意义相一致的国族相反，被视作自然差异的国族意味着"民族"（nationality）。作为自然的同一性—差异性，"民族"是先于国族—国家存在的，可能并不与之一致，甚至在一个国族—国家内会出现，如"少数民族"或"被压迫民族"的情况。

依据差异性所理解的国族，被视作根据自然法则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学—语言学"意义上的群体，它挑战了被称之为世界的这一政治结构体系，对现有的国家是颠覆性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对国族的第二种解释支配了第一种——政治方面的解释——并在历史转换期间处于领先地位（想一想"资产阶级的上升"，或在亚洲和非洲的反殖民反帝运动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国家的同一性得到肯定，当国家想要用同一性的权利压倒差异时，这两个概念最终发生了冲突。

按照自然差异角度理解的国族，涉及到和同一性概念无法分割的血统、语言、文化和领土。这里，差异的概念事实上是建立在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差异有利于强化国族作为实际政治身份的概念，以至合法的镇压——甚至是种族灭绝——都是以国族的名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进行的，认为不同的民族"自然"是不同的。国族的政治同一性依赖于地区和世界秩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知道在语言差异的原则应用问题上不受领土限制。国族政治的同一性可能会诉诸以民族—语言差异为基础的吞并（将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的），来扩张

它的领土；或者，它可能把单独的、大的政治体系割裂为小的民族群体（想想南斯
497 拉夫、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由此，“国族国家”可能变成“地区国家”。

11.2.5. 以公约和同化他者为基础的相互认可

捍卫成员国家人民之间的差异与相互合作的权力，以保障实现“真正的、长久的和平”的必要条件，这是赫尔辛基最后法案最重要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把国族的概念重新引导到法律和经济—政治（而非民族的）起源上来，这和按照经济—政治同一性和国家民族主权构想的国家相一致。

这些原则也对被作为差异性而理解的国家进行了解释：

> 1. 从相互的他性，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以及“规模、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说（同上），这样理解的差异不能阻碍彼此的合作和尊重；而且
>
> 2. 从形成国族—国家的“少数民族”的最终存在来说，领土并不和国族国家自然地相一致；尽管成员国同意彼此尊重“每一个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同上：79），但同时也同意“根据国际法，边界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和协议改变”（同上：77）。

在赫尔辛基大会的文本中，国家并不被认为是为交流、生产或国家服务的，后三者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国家也没有被描述为自然的文化实体，它必须通过国族—国家这一实在抽象物，找到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相反，它被视作“提高人民幸福，有助于实现人民理想的工具”（同上：81）。同样地，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还有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和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且，不同国家致力于改善各民族的总体生活状况，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也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同上）。

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全部都采用假言命令的形式（“如果……，那么……”），文件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人们的福祉，而且这并不只是成员国的福祉问题。
498 实现这些福祉的条件是：民族间的和平、相互理解、平等、正义、相互意识、相互责任和团结。

赫尔辛基最终法案没有强调国族同一性之间的差异，而是强调它们的“主权平等”，把它们既视作国家，也视作民族，强调我们需要对彼此不可能漠视的关系。如果说对国族之间的差异性有所考虑的话，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内部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假定，每个国家都应该通过共同努力来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承认他们与其他国民的司法平等权。

由此，之于国家民族同一性的他性，是被视为与其他的同一性既不相反也毫不关心的差异的；也就是说，这些差异既没有被忽视，也没有融入到共有的同一性之中。而且，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和帮助关系，是建立在相互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的。

然而，如果更近地检视，很快就能明显地看到，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中的他性关系在两种他性概念间摇摆不定：

1. 将他性理解为以自足实体之间建立的规约为基础的相互承认关系，它自由地接受既定的相互义务，自由地签署这一公约的意识形态强加的同一协议；

2. 将他性理解为对他者的同化。这里，国家之间合作的条件是寻找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过去、共同的传统和价值观。同化的意识形态与从民族角度理解的国家同一性相对，与同一的意识形态，以及拥有相同历史、相同传统，相同文化的群体间的理解相对。因此，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并没有为世界层面上的理解和相互合作提供任何理论上的理由，而后者无疑是它想要推动的。

11.2.6. 理解国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三种方式

然而，赫尔辛基法案也提出了第三种意义，由此可以理解国族—国家之间的他性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非自主的妥协、不确定的团结和强加的责任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

499

1. 经济在世界层面上的相互依赖；

2. 先进的技术，以至于以领土为界对污染进行限制（辐射的危险、温室效应等等）变得不可能。而且，技术创新带来的新需求无法被限制在领土边界之内，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3. 世界的一个部分（欧洲、西方国家、北半球国家）的安全和福利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和福利无法分开的事实。这就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离不开国际（国家之间）的合作。

根据这一理解国族同一性之间关系的第三种方式，他性关系是无法对彼此漠视的差异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是基于公约或一个条约的相互承认，也不是以共有的传统、价值观等为名进行的同化过程。尽管国家之间有着差异和外部性的条件——最终，这甚至是基于一个公约或条约而认可的关系——理解他性关系的第三种方式承认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被动团结，这是基于自足同一性的不可能之上的，因此，它的前提是同一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彼此命运的相互关联，以至于这种

关联不一定是主动的，相反，可能完全是被动的。

在以下情况下，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于是朝这个方向发展起来，比如，当它承认：

- 欧洲和世界安全的不可分割性是一个整体，这和最终的协定、条约无关；
- 国际合作的需求；
- 保护环境的需求；
- 欧洲的和平依赖世界范围的和平，以至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排除武力或威胁）同样也可以适用于非成员国。

500

根据第三种意思——合作与和平可以由此实现——“促进国家间更好关系的目标”只是充当了一个中项，也就是说，作为小前提的部分，推论的大前提为“全体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幸福”。结构如下：

大前提：“成员国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幸福”；

小前提：但是，考虑到“欧洲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欧洲和整个世界和平、安全的紧密关系”，如果各国（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改善，那和平、安全和幸福也无从谈起。

结论：因此，各国（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得到改善。

整个论证建立在妥协和责任的（在小前提中表达的）概念之上，和与他者不可避免的（必需的、无法对彼此漠视的）团结之上。

我们能够理解的合作与相互责任的概念的另外两层意义，也涉及到这种论证：由自治的、自足的实体自由签署的协议，其中的合作与相互责任的概念的意义；以及诉诸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过去、共同的传统和价值观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为了达成合作和相互责任。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和对“传统和价值观共同成分”的承认，后者使得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善成为了可能（同上：77）。

在第一种论证中，责任被理解为有限的责任，这种责任是由签署的协议所决定的，并且假定了可能实现的自由选择目标：“全体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幸福。”

在第二种论证中，国家间相互的责任源自在它们过去的传统和历史中追寻共同成分的可能。这和就民族的差异性而构想的国家观念之基础是同一种类型的论证，尽管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使自己避开了将国家定义为政治经济体的做法。

501

两种论证所提出的取向都涉及到了一种责任，它不是建立在同一性之上的，

是无法逃避、无法逃逸的责任，换言之，这样的责任是应分的，是无限的责任。这种责任完全地涉及了主体，揭开了主体。尽管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并不是没能唤起这种责任，但它的关注点也不在这种责任之上。

既然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并没有关注第三种意义，而在这种意义中我们能够理解国家同一性之间的他性关系（因此，它也并不关注第三种论证的方式），那么，国际合作的原因，包括改善非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原因，就没有得到完全的分析。这就是说，世界层面上的和平与合作目标没有得到充分地阐明，其结果是，这一重要的文件仅仅成为一种良好愿望的清单，缺乏论证的力量。因此，这份文件未能对国际政治解释产生任何实质影响，这在 1991 年海湾战争后变得更加明显。

11.3. 符号机器：语言工作和全球交流

在当今全球交流的世界中，可以从三个层面对符号机器，或者说智能机器进行分析：技术层面，经济层面和符号学层面。由于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进步，现在的机器都内置了语言，这些语言被视作建模能力，这和交流大不相同，或者更严格地说，和通过由文字符号组织而成的历史自然语言而进行的交流大不相同。所以，和人类（机器是人的延伸）相似，符号机器有了创新和创造的能力，也就是说，有了被理解为元符号活动的“符号学”能力，以及终止行动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像这个学科的名字一样，仅仅是机器。多亏有了高功率的智能机器，语言和工作（表达为符号工作或语言工作）第一次彼此相连，自动化也变得更有效率。这有助于智能机器和人类之间创造性的对话互动，也减少了人类参与操作这些机器的必要时间。从经济—社会角度来说，这样的过程导致了失业，事实上，这 502 种情况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交流—生产阶段中，处于上升趋势。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在获取愉快的生活、开放群体和创造性的方面，和自由市场利益所希望的冷漠和非责任化方面之间，存在着矛盾。其后果就是，这本来应当被视为特殊权利的进步——也就是摆脱以小时为单位的量化工作——却在社会疏离的方面被消极地体验着。

11.3.1. 符号活动、交流和机器

在当今世界上，工作从属于机器，这和符号（知识、能力、专业化、科学进步）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确，这种从属的一个特定形式就是，语言工作从属于符号机器。如今，语言工作和符号机器这两极的关系，与其说是同源关系，不如说是同一性关系。生产和交流之间再也不能相互孤立开来。和机器的关系变得与文字、非文字符号之间的关系一致。这不仅仅是商品被理解为信息，或者信息被理解为商

品的问题。

如果我们遵循罗瑟—兰迪的建议，把我们的关注从市场层面提升到生产层面和一般的符号产生过程，就会发现，自动化不但和机器系统相关，也和语言系统（这里不但是通指一般语言，也指历史—自然语言和特殊语言）相关，这些语言不能单独进行操作。这种思考必然地，会和当今世界或全球的交流相关。它不但和现在交流网络已经遍及整个星球这一事实相关，而且，"世界或全球交流网络"这一表达表明，现在社会体系的特征是机器和符号相互融合的一个新阶段，电脑的硬件和软件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单元的事实就是证明。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现今阶段，机器已经可以胜任智能工作。这就意味着，自动化已经达到一个极为复杂的高水平，它以交流的形式展现自己，因此，机器也是作为符号来产生作用的。

503

可以从经济和符号学的角度，对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一进步进行思考。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都遇到了一个新的事件。从经济角度来说，交流已经不再局限于生产周期的一个中间阶段——也就是交换——就像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那样。现在，生产过程自身是根据交流过程实现的，就此而言，交流过程就等同于生产过程。的确，即便是生产周期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消费阶段，也是以交流的方式呈现的。现在的消费首先是交流的消费。在本章中，我们既不关注交换阶段，也不关注消费阶段。相反，我们关注的是交流和机器的关系。然而我们强调，就马克思主义的发现，即商品就是信息这一观点（如马克思所说，这与"对商品的拜物教"相反）而言，交换和商品的交流是人与人的交流，也就是人类之间的交流；当今交流—生产社会的新鲜之处就是，信息本身也变成了商品。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自动化已经将交流延伸到了人工产品，也就是人工和无机产品，而以前这种介入是人类智力所独有的。一直以来，交流被视为生命具有的特权。如果我们使用"符号活动"这个术语指符号和交流活动起作用的过程，我们可能说，符号活动和生命是一致的（参见 Sebeok，1991b、2001a）。然而，自动化机器的发展意味着，交流在无机领域内也能实现，而不只是在生命世界中。就如其他人所观察的一样，这并不会使符号活动和生命相一致的观点变得有问题。确实，交流和机器的关系是可能的，但机器仍然是生命世界的一部分，因为机器以生物符号活动，特别是人类符号活动为先决条件。换言之，机器以一定水平的历史社会发展为条件，也就是以人类符号活动的范围为条件，这是机器可以成为符号的唯一语境。

无论如何，由于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机器发展到了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水平，这标志着在整个星球的符号活动中出现了新事物。毫无疑问，传统的自动化机器，也就是取代劳动力的简单机械设备，在单件机器的内部和机器之间都具

有交流能力。但是，现在自动化的高水平发展意味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比机器 504
类型之间的信息交换关系要远远复杂得多。机器给我们带来了被理解为语言的符号活动，换言之，就是我们到现在认为的，人类独有的建模能力。所以，从理论上说，现在的机器可以被描述为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实质的物理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的部分——换言之，就是硬件和软件两部分（见本书5.2.1）。

通过各种比喻方式和隐喻，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得到充分表达。比如，我们可以说，机器是由身体和灵魂，或身体和思想构成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谈到"精神的机器"（Geist der Maschine）。"人工智能"这一表达也是比喻语言的一个例子。

11.3.2. 具有符号学能力的机器

继续我们从符号学角度进行的分析，更确切地说，所有这一切都这样形容：取代人类智能的机器不但具备符号活动的能力，也具备符号学的能力。这里说的"符号学"是指元符号活动的能力，即解释其他符号活动的能力，因此，它是元交流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特征。如果"语言"这个术语也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能力，那我们可以说，语言，或者说符号学，只有在人类符号活动中才是可能的。所以，能取代智能工作的自动化机器，是具有符号学能力的机器，是具有语言能力的机器。

这样考虑的话，现在的自动化不仅仅是包括把"符号活动"延伸到无机世界，它也包含了被视为一种建模工具的"符号学"。于是，令人惊奇的是，在人类生命之外的领域，也就是人类符号活动之外的领域中不可能的事——正如交流延伸到了整个生命世界，是生命本身的前提一样——事实上在无机世界中得到了实现。换言之，和所有非人类的有机生命不同，非生命体现在也可能获得建模工具，或者语言，能够进行元符号活动，因此，能够达到交流的非常复杂水平。这一创新可以说是革命性的：非生命体有了建模能力，因此变得可以交流，不但是在符号活动中，也在元符号活动中实现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具有语言能力的机器 505
是可交流的非生命体，这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的唯一例子。而且，它是唯一不但能够从符号活动，也从符号学角度进行交流的非生命体。到进化发展的这个程度，我们一直以来都把生命形式的特征描述为具有建模、符号活动、交流和对话的能力，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说到的那样。我们还可以说，在整个生物域的生命形式中，只有人类具有称之为语言的、独特的模式工具，因此具有元符号活动的能力。现在，随着自动化的发展，不但是人类，也包括人现在能够生产的机器，也具备了被理解为建模工具的语言，因此拥有了元符号活动的能力。

机器驱逐了人类劳动，不管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皆是如此。这种传出

(extromission)是利润的一种功能。固定资本,即机器,取代了可变资本,即人类劳动,包括身体和大脑两个方面的劳动。然而,高度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机器和人类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这和传统自动化机器所建立的关系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机器是人类劳动的工具。但是,渐进的自动化过程也成为对机器工具角色的逐渐否定的过程。人类所生产的工具执行、加强甚至完善了人类的工作活动,这些工具都是人类手中的人工制品,而人类才是使用他们的主宰。然而,当机器变得更加自动化,它们也变得自主起来,不再是使用机器的工人手中简单的工具了。与之相反,工人却转变成了工具,从属于机器及其功能。在半自动化的机器中,人类只是对机器所执行的操作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这个阶段,是人类被赋予了工具的特征。随着机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人类在结束机器执行的工作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人类的工具性仅仅在于,充当机器自动执行工作的监督者。

现在,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机器失去了作为工具的地位(马克思《大纲》中专门讨论机器的部分中分析过这个过程),智能的自动化机器和人类建立了新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机器重新发现了它作为工具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和现在的主流观点相矛盾,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质疑的。

506

11.3.3. 人机互动

粗略看来,似乎是被推动至人工智能水平的机器自动化完成了人类从属于机器的过程,机器随之失去了其作为工具的特征。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倒转了这个过程。在和智能机器的关系中,人类再次变成了积极的主体,并且再次发现了自己作为工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作用,这种与机器之间的参与关系可以称之为互动。此外,人工智能在技术上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和自动化机器一起工作的人员的能力,这不仅是从量的角度,也是从质的角度而言的。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对情况的分析经过了三个明显不同却相互关联的层面:技术、经济和符号学的层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关系,都是专注于技术层面的。毫无疑问,在这个层面上,智能机器要求人类的积极回应,如果我们胜任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技术和能力,这种回应就必须是持续更新的。人类不会因为机器的效率而觉得窘迫,如同在自动化的早期,人类的工作都是以流水装配线的形式呈现的(想想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滑稽而讽刺性的表演)那种情况,现在,人类的智力不断地被受到激发和挑战,而激发和挑战它的不是重复性的劳动,而是要求对个人的智力和实践能力进行重新确立、重新定义和更新的劳动。

继续在技术层面上的分析,我们必然会注意到,不具有语言能力的自动化机

器，即非智能的机器，为了机器自身的生产，它的技术发展也要求发明性、创新、首创精神和智能上的提高。带来新服务、更高的效率和速度的新机器的生产，需要科学的进步，事实上，它刺激了科学的进步。当然，对于智能机器的生产，也是如 507 此。但是，和不具有语言能力的机器不同，对于智能机器而言，积极的回应、创新和更新、永久的培训等等，不但对于机器的发明者，对使用者也是必要的，无可避免的。换言之，不仅仅发明者是主动的，使用者也是主动的。

从自动性的视角，可以进一步发展这种话语。自动化机器需要有自动性。在早期的机器，即没有语言功能的机器中，只要获得了自动性，这种特性就会一直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基于简单反应的基础上的。确实，自动化效率的提高是以最大化地减少人类关注、运用、参与和主动干预的需求来衡量的。与之相反的是，第二代机器，即"智能的"机器，需要不断的更新知识和能力，以至于单方面的专业化受到了阻碍，而培训永远不会完结。这都是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但是，除此之外，甚至就是在和单独一台机器的关系中，使用者也从来不是被动的。即使自动性是可操作的，它也是复杂的，需要持续监督、关注、互动和参与。在这里，用户的智力不断地得到激发，自动性也不是重复性的。即使和机器相关的整个系列行为是自动的，机器所引发的反应也不见得一直是相同的。而且，这里的互动关系关注的不只是使用者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也关注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工作的过程是通过相互参与、彼此帮助、信息和数据的相互交换等来实现的。这种功能规划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循环的，毫无疑问，最接近这样的图形就是网络。这类机器要求在网络中发展的互动。

11.3.4. 作为资源的人类智力

人机关系的另外一个分析层面，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经济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传统的自动化机器和智能自动化机器的差异是很小的。两种情况都是自动化取代了劳动力，使得失业率上升。操作智能机器需要的能力和技巧很复杂，但是，由于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人员不断减少，质性上的复杂化和量性上的简单化是一致的。智力工作的自动化和体力工作的自动化都驱逐了人类的工作。 508

人类工作从人机关系中被排除出来——换言之，我们所说的工作的"传出"——是这种关系的经济社会维度的作用。从技术角度而言，可能说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更恰当，因为所需的人力和工作时间都减少了。然而，假设技术层面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层面之上的，而且我们讨论的是交流—生产结构的社会的急速发展，抽象意义上的"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事实上就变成了工人从生产过程中的传出，也就是失业。总的工作时间减少会带来利润；由此，在现实的层面上，工作时间的减少被最终变成了工作岗位的减少。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现今阶段，培训已经成为了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智力成为了基本的资源，不只是在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上如此，在科技进步所生产的机器的功能上也是如此。假定机器本身也是智能的，并且为了发挥功能必须和人类互动性关联，那么，在机器的生产、使用和维护中，人类智力从来没有变得如此必需。智能机器也导致了语言的增生，操作人员学习这些语言不但是为了编程，也是为了恰当地使用机器。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培训成为了交流—生产这一阶段的重中之重。在欧洲委员会，这个欧洲共同市场负责计划任务的特别机构所制定的全欧工业发展和竞争计划文件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

智能机器的技术发展需要持久的培训，使操作人员能够更新他们的能力，以适应越来越高效的机器，适应新的语言，包括和机器相关的语言，以及使任何使用机器的人都可以与之交流的语言。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补充，在今天的交流—生产体系中的持久培训的动力，并不一定会在呼求新的智力人员的持久培训中得到反映。我们知道，这种情形和自动化紧密相关，并且引起了人类劳动力的传出。在具有相当准备和竞争力的人群中，失业情况处于上升趋势。同时，在劳动市场中，具有不同层次资质的人们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劳动力高度而复杂的分层。在熟练掌握智能机器新语言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一些工人具有较高的技术文化程度，而另一些完全不能适应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新的迫切需求。

509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严格区分劳动力和生产方式，前者为无产阶级自由拥有，而后者为资本家拥有。现在，劳动力和机器之间的区分被描绘为两个不同的方面：它和生产方式有关，但现在也和培训过程有关。前者涉及到就业和失业率，后者则通向充分的培训。考虑到长期培训涉及的高额成本，包括个人电脑的费用，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这导致了一种双重失业的情形：一种是能承担长期培训的、更有资质的人员的失业，另一种是无法获得必需的持续更新方式的、没有资质的人员的失业，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今天，传出和排斥是资本主义发展语境中的两大高度可见的后果。

我们已经讨论过，在建造机器的过程（因此也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和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其中包含的复杂的自动性是受不断调整的影响的——智能机器要求人类做的工作的类型。现在，我们必须补充说，这样的工作——也就是需要在智力和长期培训方面进行投入的工作——它已经被同化成一般性的工作，变成了无差异的工作。在当今社会，这种同化是评估工作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和智能机器相关的工作，它也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使用的购买和销售工作的参数来量化的；由此，它也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

在现今的资本主义交流—生产社会中，智能机器所引发的工作类型包括了人

类所具有的特质,也就是语言、"符号学"层面上的符号行为的能力,因而是能够创新和创造的复杂的推理过程,这就是它的崭新性。由此,和智能机器相关的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唯一衡量体系进行了抵制:按照工作时间做出的衡量。这里,人类的工作揭示出了它在衡量和时间量化上的不可约性——换言之,和智能机器相关的人类工作展示了它在时间上构成性的不可比性。这种类型的工作本质上是质性的,所以工作量不能成为衡量工作质量的标准。机器所涉及的工作避开了以前人们所预见和描绘的轨迹,因此,它不能在以小时重复计数的持续性的基础上被充分地获取。 510

11.3.5. 智能机器,语言工作和工作市场

我们现在讨论下第三个层面:符号学层面。人类工作包括和自动化技术相关的交流—生产环节,并且已经发展到了智能机器阶段,它是语言工作。如罗瑟—兰迪[1992b(1968)、1994(1972)、1998(1961)]所展示的,一方面,工作和其产品之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同源性,另一方面,语言工作和其产品也具有同源性。人类工作能力的这两方面在语言工作和其产品上合二为一,就像电脑的硬件和软件难以分离一样明显。

当谈到语言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被理解为人类特有的符号学上能力的语言。按照西比奥克(见本书第五章)的说法,我们用语言这个术语专门指人类特有的建模工具。所有动物都具有建模工具,从康德哲学的意义来说,这种手段是先验的,它出现在交流之前,是交流的基础。所有的物种都运用自己独有的建模方式,在自己的世界进行交流[参见 Jakob von Uexküll,1967(1934)、1992]。早在人类原始阶段,人类就拥有了能产生无限多的世界的建模工具,这解释了进化到智人的过程。这个特殊的建模工具,也就是语言,能产生无限的可能世界,因为它是一种句法手段,也就是说,它能依靠有限数量的成分建构、解构和重构无限数量的世界。语言的多样性,以及相互构成的成分(音位学上的、句法学上的、语义学上的)的多样性,都建立在这个建模工具的基础上。把曾经组织成的句子换一种方式重建的可能性(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描绘的那样,人类思维可以进行"杂凑"的工作),意味着语言有反思自我的能力。换言之,多亏了句法能力,人类拥有了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能力,这意味着人类有能力对建模的材料、工具和模型进行反思,以便在新的建模过程中对它们进行重新的使用。这种能力被理解为元符号活动,或者研究符号的科学之外的"符号学"。因此,语言以及句法工作是符号学的工作。 511

当我们说到句法学(syntactics)的时候,我并不是简单地指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符号学可分为符形学、符义学和符用学,参见 Charles Morris,1938c)。句

法学在这三个具体维度都有所体现。而且,如果从文字语言方面来讲,按照乔姆斯基的做法,我们把"语法"描述为音位学,语义学和句法学成分的组合。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句法学也是另外两个成分的组成部分:我们有产生语素的音位句法学,有甚至在句法组织的这些词汇(可单独使用的和不可单独使用的词汇)被适当地理解之前,就产生了语言词汇的形素句法学。所以说,从语言的建构、解构和重构能力来考虑,句法学就是语言本身;就像符号学就是被作为元符号活动能力的语言一样。

语言工作被视作是一种建模工具,和非语言工作相比,它具有一种基本条件。非语言工作以语言工作为先决条件。所有的非语言工作,都是以语言工作提供的工具、材料和模型为基础的。在现今交流—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从非语言工作的组织及其产品,到语言工作的和它的产品,自动化机器代表了发展的最高水平。语言工作参与了研究、生产、计划和消费的所有阶段,智能机器在其中得到了使用。

尽管人类工作是所有社会—历史价值的来源,但它已经从属于商品化的过程,沦为商品的地位;以小时量化的抽象工作正是现今社会体系的基础。对于语言工作而言也是如此,以至于我们会说到"语言异化"(参见 Rossi-Landi,1992a)。512 资本利润从未如此依赖于语言工作的商品化。像"无形投资","对人类资源的剥削"或者"人力资本"这样的术语,都指的语言工作的使用,因此,指的是公司发展和竞争力必不可少的资源,即智力、心智、人类大脑:这正是这一新局势的症候。

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了这样的意愿,将人类符号活动中的——迄今为止,这种符号活动以元符号活动能力为特征——发展和提高的源头进行商品化。因此,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是人类工作的不可比性,对于量化过程和无差异的抽象劳动的不可约性,另一方面是把人类工作看作仅仅是另一种商品,这两方面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交流—生产和智能机器而进行的充分培训的需求,也就是对语言工作以及将它投入劳动市场的需求,使它获得优先权利,并且尽可能地给予它空间。

就语言工作和工作市场的矛盾而言,工作的不可约性和量化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糟糕。这种矛盾加强了被理解为语言工作的工作性质,它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交流—生产阶段中的特有现象,是在人类工作和智能机器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

另外一种矛盾,是智能机器和非语言工作之外的语言工作商品化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划提供了培训的动机,这对交流—生产和智能机器是有用的;然而,这也同时愈加驱逐了语言和非语言工作,因此造成了失业的情况。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考虑到语言的创新、创造和建构不同世界的能力，用于交流的建模工具语言和同一个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目标是相互矛盾的。社会体系是以维持和发展自身为导向的；全球交流的整个体系也是如此。为了实现将对交流有用的同一个交流生产体系进行再生产的任务，而进行语言工作，这意味着为了使物的存在保持原样，就要使用最不适用于重复的工具。由于它释放了语言工作的新力量，智能机器有助于现在生产系统的发展，这不仅是从量的角度，也是从质的角度而言的。 513

我们在论述中，一直使用"语言工作"和"非语言工作"这两个术语。到目前为止，这种抽象概念是很适合分析的发展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补充说明，考虑到它们不但是书桌前进行的概念工作的结果，也是历史—社会现实的结果，所以它们是两种实在的抽象物。从这点看来，这两种实在的抽象物有效地存在于真实世界，是历史现实的一部分。但是，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指出，"语言工作"不是文字语言，尽管这和罗瑟—兰迪的看法方向一致，但并不相同［参见 Rossi-Landi，1975a、1985a、1992a、1992b（1968）］。从我们所开展的讨论来看，在我们的术语中（沿用莫里斯），"语言"指的是人类符号，换言之，它指的是符号学的领域。"语言的"这个术语包括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这些符号不只是符号意义上的，换言之，是直接性的，自动性的（我们在这里指的是物种和个体所特有的自动性），而且是从它们所暗示的，包含了反思、解释项之解释项（我自己就是解释项之解释项，其最终解释项就是自我）的意义而言的，因此，这些符号是元符号，或者我们愿意的话可以说，是符号学的符号行为。

在现有的语境下，我们不是要对行为和活动进行区分。在人类的非语言行为方面，我们发现，所有以语言工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以计划、组织、材料选择、工具准备等形式进行的思考为前提——的活动，都是这样定义的。然而，尽管这些非语言活动以语言工作为前提，它们是可以立即执行的，就像物理的自动化工作为了实现便捷和快速，脱离了，事实上也必须脱离思考，可以立即执行一样。

如上所述，语言工作和非语言工作的差异是具体的差异，考虑到这种差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被格外强化，它是属于劳动的分工：一方面，我们有具体的体力劳动等等，另一方面，我们有语言的、脑力的和智力的各种工作。很显然，由于这两种工作无法分割，这是一种空泛的划分。正是两者都可以作为工作的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两种工作都不是直接的。现在我们回到"工作"和"活动"的区别上来，这种区分是由罗瑟—兰迪所确立的（见本书第六章）。我们可以声称，尽管工作和活动都属于符号学的范围，然而，考虑到工作和活动具有区别，只有人类才能 514

够进行工作，因而工作属于符号学的秩序，但活动不是如此；由此，就对这种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所以，当我们区别语言和非语言工作时，我们就进入了符号学的领域。所有的人类活动，除了纯粹的动物符号行为，都和建模、思考、计划相关：换言之，人类的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是通过语言工作来调节的。同样，作为工作问题，“语言工作”和“非语言工作”的区别，是符号学范围内的程度区别的问题。然而，这种差异，即精神和身体，脑力和体力的差异，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合理的，甚至是明显的，因为它是我们的社会体系中一个真实的部分，正如它是为了进行分析才有效的虚假区分一样。

即便如此，现在的情况是，符号机器，或者说智能机器，使得语言工作和非语言工作的区分在社会现实中陷入了危机。真相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再可能区分脑力工作和体力工作。智能机器充分激活了语言工作和参与其中的人类，包括脑力和身体层面。想想在数据化过程中，以及体力工作所要求的能力中的琐碎“劳动”吧——任何人在操作电脑时，体力工作和脑力工作都已经难以分割了。在分析智能机器或符号机器和工作的关系时，我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一事实，它包含了在质性秩序上的一个飞跃。

11.3.6. 语言、建模、异他性和开放群体

现今的机器包含了语言，这指向了机器和当今生产体系之间的另一种矛盾。语言是物种所特有的，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包含了从自然秩序到历史—社会秩序的转向。人类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种历史—社会动物。语言不能只从生物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以某种方式接受了生物主义的视角。语言蕴含着异他性，如果不以和他者的关系为基础的话，它就无法被理解。朝着他者的运动和他者的表现产生了语言。对他者的倾听和欢迎，是语言的前提。如果不以有利于他者的多余和考虑到他者的回避为基础，就无法理解思考，以及元符号的维度(即符号学的维度)。语言建模了这个世界，然而，对人类而言，这个世界必然是一个共有的场所，也就是，能和他者分享、有他者参与的所在。语言建模了许多不同的世界，但是，多亏了来自他者的激发、由他者激起的质疑，以及和他者的对话关系，多元逻辑的、多音的建模才成为了可能。

515

符号机器，或者说智能机器，使人类的智力提升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高度，它要求对语言和语言工作进行超乎寻常的使用。这就意味着，符号机器和对机器的私人占有、方法或工具与工作的分离，以及依照资本主义进行的、为了私人目的而对语言工作进行的剥削是相矛盾的。在结构上，智能机器属于群体维度，不仅是因为要操作机器就需要社会性的参与，还因为赋予机器生命的语言也是属于群体维度的，而群体是在开放群体的意义上，因此是在以他性而不是以同一性为基础

的交流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照此理解的开放群体在阶级、民族、种族或性别上都没有界线。语言就意味着共享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确定的，而是按照他性的逻辑，不断被重新创造、解构和重构的。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提示说，现在的机器是物质的。如果我们理解的“物质”就是先于意识出现，并且决定意识的，我们就可以区分不同程度的物质性。程度最低的是物理的物质性。正如它可以抵御人类的干涉一样，它最终也屈服于人类的干涉。紧接其后的，是人的身体，它具有抵御的能力，以及意识难以控制的自主能力。程度最高的是既不是由物理异他性，也不是由个人身体异他性形成的，而是由作为他者的他者的异他性形成的，即他人。在这里，物质性充分地展现了它对于意识的抗拒和自主。它被赋予了语言，并且，考虑到语言涉及了异他性、开放群体、欢迎和聆听他人等方面，符号机器是物质性程度最高的物质，在这里异他性与他者相遇了。如今，对于我们理解机器所开创的社会维度而言，它的这一方面 516 是决定性的。对我们理解机器带来的矛盾，这也是决定性的，这种矛盾必须包含被视为被动结果的、在各自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后验性相遇的社会性——换言之，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所理解的社会性。

符号机器和语言相关，和最高程度的物质性相关，和他人的他性相关，就此而言，符号机器超越了纯技术的维度，超越了功能责任，超越了那种融入到程序和系统之中的维度，相反，它引发了（这对生命而言是更为重要的）对他者的责任，伦理责任，以及不仅是认知秩序还是伦理秩序上的意识。从这点来看，另一个矛盾则是，在个人主义，在各自利益间的，彼此争竞的、准备相互破坏的、互相漠视的同一性间的表演和对比（这些都是现今的社会体系的特征），和一旦智能机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对人类提出的要求之间，所存在着的矛盾。

11.4. 他性和交流：从封闭群体到开放群体

11.4.1. 交流的狭义概念

当我们想到“交流”时，一般想到的是内部内容通过表达的外化过程。因此，交流就是信息的传播，它发生在作为起点的信息发出者和作为终点的接受者之间。交流就是，作为信息发出者的一方和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另一方之间的活动。根据这一描述，我们首先要有交流方，才有交流，所以一般而言，交流方的存在是先于交流，并且独立于交流行为的。

交流的这一概念不但在普遍观念中流传甚广，也为其他差异很大的理论观点所共有（比如天赋论和经验主义、唯心主义和行为主义）。我们可以把交流看做一种外化过程来进行分析，而不对这个过程中的外化和接受方提出质疑；或者，我们 517

也可以对双方的任何一方进行质询，一方面分析交流中外化的内在，另外一方面则分析另一方，即信息接受者。换言之，在交流过程中有双方参与，而我们要将分析限定在交流中的某一方——也就是，思考交流方在交流中的行为——或者质疑他们的存在，试着确定他们是什么（可以这么说，确定他们的本质），然后描述他们的构造。这两种情况中，我们的描述的基础都是将交流视为从一方到接受的一方的传播。

这种对交流的理解方式显然是和存在的既定概念，和既定的本体论相关的。就像一般的交流被视为从一方——发出信息的一方——开始的过程，一般意义上，这一信息发出方，被视为交流的前提和基础。交流理论和本体论紧密相连：所有的交流理论，不管是明确的还是暗指的，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反过来，所有的本体论也都有交流理论，即使这个理论没有被清晰地阐明。

11.4.2. 存在和交流

不管是什么理论，哲理理论或交流的意识形态理论所主张的，对交流和存在之间关系的一个不同概念在当今世界都得到了肯定。我们可以用“交流就是存在”这句话来概括这个概念，反过来也可以说，“存在就是交流”。但是，“交流就是存在”关注的是交流理论，因此在现有的语境中直接和我们相关；第二种说法“存在就是交流”与之不同，考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忽略第二种说法，尽管我们现在只是把它作为本体论和交流理论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来进行简短的思考。如果考虑仅与交流理论相关的局部本体论（换言之，作为进行交流的存在，作为交流中的存在），第一句（“交流就是存在”）可以转换成第二句（“存在就是交流”）。

当今世界中，由知识和实践的两个主要领域——科学和经济——所清楚地带 518 来的后果，就是交流即存在，反之也一样，存在即交流。科学调查所关注的，专心于交流的、在生物符号学的大标题下可被共同辨识出的一系列学科范围是特别重要的，它们专注于生命世界的多重方面，从大的生物界到小的微观有机物界。在这个特别的科学研究领域，生命和交流已经被视作彼此相同了。交流不只是生命的状态，也是鉴别的标准：只有能交流的生命才能被视为活的生命（遗传基因密码，对环境刺激做出反应等等）。生命等同于符号活动，其中的符号是活动的，或者能被探测到的（更确切地说，就是有“生命的迹象”）。相反，根据这样的描述，交流就是生物本身。在生命世界，交流即存在，存在即交流。交流也就是持续自身的存在，维持生命的存在，是对自己作为存在的确认，是存在的意向（conatus essendi）。

从经济的层面而言，交流等同于存在，在存在中延续。在这里，我们不仅仅不

再单独在生物符号活动的领域中遨游，也不局限于更严格也更宽泛的动物符号活动领域，这两个领域都是人类和其他生命共享的。说到经济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具体的人类符号活动的领域，这里的存在——指的是人类——不但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存在。这是语言开始起作用的地方（言语或者文字语言是它的许多表现中的一种）。语言意味着，会交流的人类不只是和其他生命一样的符号存在，而是符号学的存在，是符号动物，也就是，具有符号学能力的动物，或者我们愿意这么说的话，是具有元符号活动能力，能思考的动物，因此是有意识的动物。语言是原始人类所特有的，它使人类过去和将来的进化得以实现；因此，符号学动物的进化不只是生物上的进化，也是历史—社会上的进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现今阶段，经济确定了存在与交流的等同。在这个阶段——其特征是自动化的革命、全球交流和市场自由（不仅是量上的扩展事实，更重要的是质上的变化，除了生产新的商品物之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转化成商品）——交流已经不再仅仅是生产周期（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一个中间阶段；更为根本的是，交流已经成为了生产和消费过程本身之中的构成性的形态。现在，交换已经是一种交流；不仅如此，生产和消费也是交流。换句话说，整个生产周期都是交流。我们把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新阶段描述为“交流—生产”阶段。 519

交流—生产是这个已然如是的世界的交流。它是全球交流，这不仅是从它已经扩大到整个地球这一意义而言的，还是从它和这个已然如是的世界相关，附着于这个世界，适应了这个世界的意义而言的。换句话说，全球交流就是这个世界的交流。交流和现实，交流和存在，完全一致。现实主义的政治（但只有现实主义的政治，才算得上真正的政治）是对全球交流而言，对交流—生产而言唯一适当的政治。如今，政治学和本体论（政治对战争的倾向，存在最为残酷、最为兽性和现实的一面）之间的关系特指的是和存在—交流的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世界的、全球的交流，是交流—生产。

所以，在理论的宇宙法则和哲学上的联系这一层面上，我们还有一个世俗的、物质性的联系，它存在于交流和本体论之间，是以现今的生产形式为特征的。交流—生产就意味着在存在中坚持，意味着坚持存在，意味着在存在中延续，意味着存在的意向。

11.4.3. 交流—生产中的延续作为同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延续

一般意义的社会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从物质和文化方面进行自我的再生产——包括了再生、维持和延续。社会再生产往往坚持存在，人类群体的存在。人类历史中，社会再生产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从阻碍社会再生产的形式（由于社会关系和人类智力、变革和创造的能力之间的不均衡），到更合适

和有力的形式。实际上,多亏了作为既定的社会体系而建立的逃避存在—交流的可能,社会再生产才得以实现。要是通过对以人类解释和反应,而不是以存在—交流基础的社会关系进行再创造和重组,逃避就成为了可能,可以使人远离现实,避开和超越产生了存在—交流的世界的限制,以及存在—交流所适应的世界观。在社会再生产中,交流和存在相一致,这是普遍生命的特点,生命存在和存在—交流一致,超越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应对的是符号学动物,也就是有交流关系的动物(其他动物,如马克思所说,不具有适当的关系),但是这些动物也具有评估关系的能力,形成意识的能力,负责任的、审慎的能力,特别是对交流关系进行规划的处理能力。换言之,多亏了这些能力,符号学动物才能逃避存在—交流。

520

与之相反的是,交流—(再)生产中的延续是同一个社会体系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延续。通过不断的调整和变化以维持自身的延续,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停止和终结,还没有完成它的结束,尽管它只在日暮时出现(在黑格尔所说的黄昏时分),尽管它会终结的符号已经出现。只有能维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也就是交流—生产,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的存在—交流一道,将与资本主义相应的特定社会体系变得看起来对我们而言是自然的,成为人类自我本质的一部分。换言之,作为人类存在的必要方式,在社会再生产特定阶段出现的存在—交流才得以发生,而根据线性发展的逻辑,这种方式无法立即被改进到已经取得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程度。

尽管有这样的神秘化,当今的意识形态——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即和交流—生产逻辑一致的意识形态)——的视角,和形成我们能够视为"生物符号学"的不同研究领域的那些学科的视角并无不同。它们所共有的也就是被我们称为存在—交流的本体论。

11.4.4. 交流—存在的本体论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所讨论的,尝试勾勒出存在—交流的基本特征。交流应该从存在的角度来考虑,但是存在也是变化,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不是所有的存在都是交流,但交流就是存在。交流就是延续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自我保持。交流不是出于自身的外化形式,而是内在的坚持自我。交流和存在是一致的。交流是内化的活动,是一种回归,是自我主张。根据这一描述,交流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外化过程,而是一种内化过程。所有存在的事物都会交流吗?对于这个和局部本体论以及交流相关的问题,我们并不关心。我们想知道的是,对于交流的存在,存在是不是就是交流?如果我们想冒险进入普通本体论的术语中,我们可能会列出这样的公式:存在 = 交流,否;交流 = 存在,是。我们可以不交流而存在吗?可以的,但不是在进行交流的、是交流的存在的情况下。让我们把存在—交流关系

521

的问题限制到进行有效交流的存在上去：它们的存在在于交流。觉得饥饿，甚至在给自己补充营养这种行为之前，就已是交流。生命体是交流，生命体就是自己内部的，为了自己的，作为生命体的交流的存在。生命体是自我交流或自我保持的手段，因此是能够延续自己的存在。

人类就是交流，这和其他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包括人体上的生命体，即真核生物，也包括居住于人体和人体表面的生命体，即原核生物或细菌。但是人类也是像保证繁殖和延续的系统那样的交流——如基因编码，神经—植物系统以及免疫系统。和其他生物，其他动物一样，人类靠内部和外部的交流而繁盛，但是，人类具有一种物种特有的建模工具，并依靠它建构了自我“世界”，自己的主体世界。生命体和“外部现实”（位于生命体的“世界”之外，因此难以察觉）之间的接触区域是由符号构成的，所以，这个接触区域是由各个物种所特有的建模工具进行折射和组织过的，即建模过的。我们指的是宏观生命体，以及相对于宏观生命体的“外部现实”。但是，显然我们可能也会谈到细胞间交流、细胞和病毒之间交流环境中的“外部现实”。这种类型的交流处于宏观生命体内部，也发生在由符号组成 522
的接触区域的微观生命体和“外部现实”之间。

11.4.5. 交流和语言

我们知道，人类特有的建模工具就是语言。现在我们必须强调，语言不能和言语（speech）相混淆。这种混淆可以被描述为“语言学家的谬论”，语言学家毫无限制地谈论“语言”，而他们的意思是“文字语言”（即“言语”，不管文字还是非文字的）。所以，语言学家也会用到“一般语言学”来指对文字语言和相关语言的研究。

和“语言学家的谬论”相反，语言这个词事实上已经在普通语中被使用，它指的是非文字的符号系统（比如“手势语言”、“聋哑语言”、“图像语言”、“绘画语言”、“时装语言”，以及“商品语言”）。在这些情况下，普通的言语，或者说普通的说话方式，比语言学家所说的更为清楚。

所有的人类特有的符号行为都是语言，甚至于，离开语言，人类特有的符号活动就根本不存在。这里说的“人类特有”指的是人类在其作为历史—社会存在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我们在生物学上被赋予了一种被称之为“语言”的、物种专属的建模工具。作为一种生命体，人类同时也拥有和其他生命体那样非语言的交流过程，这些生命体包括组成人体的微观生命体，以及人类所携带的微观生命体。人类符号活动不是单由语言构成的，就像人类的符号活动不是全部由符号学（即能够进行元符号活动的符号活动）构成一样。语言的范围，以及符号学的范围，它们只占总的人类符号活动的相对小的一部分。人类符号活动并入了内

符号活动（和人类生命体相关的符号活动，其使前者得到发展、保持和复制），它是动物符号学的一部分，而且（重要的是），它参与了交流——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整个符号生物域都在起作用。

依据莫里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一般语言学”从“语言学家的谬论”中解脱出来，用它来命名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符号活动的学科，即在人类符号活动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符号学的范围内。 523

每一种动物都具有该物种特有的建模工具，用来建构自己的世界，这种手段为生命体和外部环境之间的鸿沟架起了桥梁（如同所指出的，这种鸿沟是由符号组成的）。我们也知道人类特有的建模工具，即这样理解的语言，既然是一种句法的建模工具，就具有以有限的元素产生无数世界的能力。换言之，同样的元素可以在新的建构中重复使用，因此，使用相同的元素可以不断地进行结构和重构活动，形成无数的世界。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原始人类到晚期智人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这远远早于言语或文字语言的形成，以及以其他形式交流的流行。文字语言的出现是以交流的形式做出的适应，如果不指涉句法，或者说被视为语言的初级建模系统，文字语言就是无法理解的。随后，在人类的进化中，文字语言经历了可以被称为联适应（exaptation）的内部化过程。也就是说，在进化过程中，文字语言或者说言语，在它们一开始为了交流的目的而出现时，就假定了建模的功能。言语作为思想的材料，促成了原始建模系统的加强，自己也成为了“再度建模”手段。再度建模工具和特定的语言及话语的秩序相关；反过来，它也是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紧密相关的。

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中的存在—交流关系是作为物种特有的建模工具基础上的特定世界的一部分而被建构的。然而，在非人类的动物中，只要该物种保持本质上的不变，除了其亚种的变种以外，建模和存在—交流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应、对称和饱和的。考虑到人类的存在—交流，人类这一物种所特有的建模工具促成了它，即语言（包括语言的句法功能，解构、重构的能力，以及建造无穷可能世界的能力）——它并不和存在—交流一致：语言在存在—交流中没有被穷尽，它也不需要适应存在—交流关系。人类的建模工具就是这样，它允许解释、评估，和对积极的、对话性的、创造性的交流存在的回应。由此，这些都要求外在于、超越于存在—交流的视野。 524

我们建议用“符号学”这个词来指人类特有的元符号活动能力，所以，它在指研究符号的科学这一意义之外，获得了新的意义。此外，我们也知道，人类的元符号活动能力依赖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人类特有的建模工具。句法学，解构和重构，无限可能世界的生成，具有评估能力的符号学，对责任的假定，创造性以及规划，所有这一切都是语言特有的。在语言中，交流的存在会发现它的超在。人类

被赋予了语言，人类是符号学的动物，就此而言，人类行为不可能被限制在交流、存在和本体论的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展现了自己的他性能力。人类能够让自己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并提出了由交流世界的存在所预见的替代性之外的别样可能。这里，我们不仅仅指的是对于存在而言的另一存在的能力，更根本的是，我们指的是作为超在的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也就是说，与存在—交流不同。超在的能力事实上是另一存在的所有可能的基础；换句话说，超在正是另一存在的条件。而且，超在超越存在和交流世界的能力——是人类这一符号学动物特有的能力——它使得人类不仅要对社会的再生产，也要对整个星球的所有生命负起完全责任，当然，我们要记得社会再生产和生命是无法分割的。超在的能力否认了符号学动物的任何借口，这些借口想要限定对世界上的交流存在的解释、回应和行动，想要限制之于这个世界的替代选择——因此，没有对符号学动物事实上在生物性上被赋予的他性能力进行思考。

11.4.6. 当今全球交流—生产体系中的交流—本体论关系

现在，让我们回到当今全球交流—生产体系中的交流—本体论之间的关系上来。如前所述，当“全球”一词和交流联系在一起，它不但表达了交流已经扩展到全球这个意思，也表明了，交流附着于这个已然如是的世界，是之于这个世界的充分性。由此，交流和存在彼此交汇，交流就是现实。如我们已经描绘的那样，政治的现实主义必须保持对本体论的忠诚，以至于甚至接受力量法则所控制的，战争的极端武力。对交流发展及其控制的世界规划确认了，也加强了交流—生产的存在。这种规划是建立在交流即生产的意识之上的，所以，在当今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中，交流和存在彼此交汇。但是这个规划也同样建立在控制资本的唯一方式，也就是对交流意识的控制之上的。这个规划是按照交流—生产意识形态进行解释的。交流—生产意识形态宣扬关于意识形态目的的各种好消息，它是如此的现实主义，和事物已然如是的存在如此一致，以至于它看起来更像是逻辑，而不像是交流—生产的意识形态。因此，关于全球交流—生产，我们提议用意识形态的这个词。确实，我们知道能维持交流—生产体系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最终都把这样的特殊社会体系转换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但是反过来，社会再生产必须避免已有的存在—交流秩序，重新创建和重新组织社会关系，以摆脱阻碍和危害社会再生产的体系，就如现在的交流—生产体所做的那样。

525

保持交流—生产关系的存在是破坏性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

交流—生产关系的存在，以及它对维持和再生产的坚持，阻碍和危害了社会再生产。这是因为交流—生产的存在阻止了人类的历史—社会存在把交流重新组织到社会体系中来：

交流—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对。

交流—再生产加强了交流本身,对创造、革新、再规划和重构能力是不利的,526 这些都是语言建模工具带来的人类特有的形态:

交流—生产与语言(符号学)相对。

交流—生产体系的再生产危害了人类的存在本身,人类不仅是作为具有智力能力、符号学能力的智能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存在。换言之,被危及的是极为重要的符号活动,生命、健康和生存的可能性:

交流—生产与人类生命(符号活动)相对。

不计代价地对现今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也就是交流—生产体系,进行保持、强化和扩张,给整个星球上的生命带来了致命的威胁。这种威胁反映在臭氧层破洞,环境灾难,由日常再生产周期导致的、被认为是正常的大灾难(比如战争的交流—生产循环)上,反映在核武器的破坏性使用,以及相关实验对环境,包括人类环境的破坏性影响上:

交流—生产与整个星球上生命的存在—交流(符号活动)相对。

11.4.7. 超越交流的存在

只有以他性的逻辑,即公正的逻辑引导的行为,允许对交流—生产之存在的逃避。同一性感兴趣的,是交流—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对他性的敞开取代了那一类的有限责任,它是由对同一性及其功能有用的借口所保护的。这种责任在功能之外,超越了功能。它是无限责任,不知道逃避的可能,不能交托,因此是以完全卷入他者、完全向他者敞开的倾向为特点的。我们说过,交流是一种内化活动,是回归,是对自我的坚持——它不应被理解为外向性,而应该是内向性。他性在交流之外,是超在。这种朝向他性的运动是不能返回的,它不需要任何收获,是一种元符号活动的运动,所以是符号学的运动。这是人类所特有的。语言使得人类行为无法囿于交流活动、存在、本体论和替代选择,它们是交流世界的存在所预见的;这就意味着无限责任的条件,即是被理解为回应他者,回答他者,为他者负责的责任,这种回答和负责不仅是对作为我的自己而言的,也是对自我之外的他者

而言的。存在—交流在语言中有着其他一面，这个事实意味着语言是为了他者，为了他性的。所以，急切地希望不失去某人的存在—交流的条件（对交流的忠诚是对他者的本质上的不忠），会被急切地希望不失去存在—交流的另一面的条件所取代，后者是避免失去他者、失去自我和远离自我的他者的不顾一切的努力。 527

11.4.8. 作为封闭群体和无差异劳动的社会性

只要一个单独的存在和另一个单独的存在在工作的基础上没有区别，假定它们都从事同一类型的工作，有着同样的使用价值，这个单独的、无差别的存在就是一个个体。个体和其他个体分别开来，作为身份的个体和不同形式的劳动存在紧密相关，也就是和劳动分工相关。当劳动的分工带来了产品的生产，个体之间的社会性被赋予了平等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之间的相互转换性成为了抽象劳动，没有质量差异的劳动，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也就是一般的人类劳动的规范。社会性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由单个个体从事的劳动以一般性的抽象出现，劳动产品假定了一般等价的形式。把个体劳动分别地、孤立地进行看待，它就成为了被赋予抽象价值的社会劳动，具有抽象的一般性［参见 Marx，1961（1859）、1974c（1857）］。

我们可以使用“群体”一词来指这样的社会性。群体，被视为与开放群体相对的封闭群体，是单独个体之间的交流。开放群体以个体之间交流为特征，它被视为对彼此无法漠视的差异，按他性逻辑彼此相连；而封闭群体是由无差别的个体组成，通过肯定个体的差别，即对他者的漠视，它复制着存在，一般的、无差别的存在。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变成了商品，这样理解的群体是按照劳动时间来衡量其财富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arx，1975（1843—1844）］一文中，马克思认同了在无产阶级中局部的集体主义主体，它是实在的抽象。局部的集体主义主体对它作为局部的集体主义主体的消失有着实在的兴趣，这意味着，它具有克服部分利益和人类（也就是已然如是的人类）的普遍利益之间的纯粹区分的兴趣。 528

要在无产阶级中确定主体，即寻求解放的、局部的一般主体，意味着要承认对解放的寻求，即从劳动力买卖的逻辑中解放出来，从人类劳动的商品化中解放出来，从将自由劳动当作劳动力出卖的条件中解放出来，从被理解为抽象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在集体主体中，马克思辨认出存在于无差别的劳动中的，对其他差异漠视的差异的形式，这种劳动通过对自己的解放，解放了其他的差异，其他局部的、一般性的主体。尽管它也具体，但部分类型的抽象化和阶级相关的抽象化，想要看到阶级社会和剥削的终结，加上其他无差别劳动的实在的抽象化，劳动被作为商品出售，按照小时获取报酬，应该能实现社会更新和将群体（即无差别的社

会）转化为共有（即理解为为了他者存在的社会性，由先前所描述的、对彼此无法漠视的差别所构成的开放群体）。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情形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历史的突发事件（首先，是因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癌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变得不一致）。然而，在无差别的劳动中正在发生着质变。换言之，无差别的劳动变得很普通，这不是从阶级的意义而言的，而是从全球化和普遍化的意义来说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说的质变，是在质上而不是在量上发生。无差别的劳动和市场相关，甚至以消除阶级差异的形式出现，是跨阶级的劳动形式：无差别的群体社交超过了部分类型的差异，这往往是阶级所代表的。这种无差别的社交趋势和对其他差异阵发性的寻找，对其他从属于阶级的同一性（民族、族群、宗教和语言）的寻求汇集起来。此外，具有群体特征（超过了阶级特征）的无差别劳动现在要走向末路了：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生产过程驱逐了劳动力。新职业的形成，也不能抵消从无差别劳动解放带来的增长。确实，对社会有用的职业能够吸收被解放了的无差别劳动时间，它在市场社会没有什么作用：对社会有用的职业往往 529 和私人领域相联系（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私人企业”和“私有化”中的“私人”，这是指“公共的私人领域”；而“私人的私人领域”是指私人关系，这也预见到了“对社会有用的职业”）。所以，考虑到当今社会—经济世界的最新发展，我们不能接受对无差别工作的“解放”能力的观念——无差别的工作是跨阶级的工作，一直处于下降中，同时，在整个群体中，它又处于被一般化的过程中。

从现在的交流—生产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对交流—生产社会而言，劳动，一般意义上无差别的劳动，既是根本的，又是特有的，以至于在规划其他可替代的社会体系时，除非是在“为了所有人工作”的语境中，一般而言，劳动以外的社会财富来源都是难以想象的。按照本雅明的说法，这种神秘化的踪迹在德国劳动者的《哥达纲领》中出现过，它把劳动定义为财富和文化的来源，成为了调节点，以及从社会主义到纳粹主义的过渡。

劳动不是所有财富的来源，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此作出了澄清，并补充说，资产阶级有充分理由，将超自然的创造力进行劳动上的投资。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批评了粗俗和物质的共产主义（更不消提存在于书写之前的、事先存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通过将私人财产进行普遍化，粗俗和物质的共产主义压制了私人财产。这就是说私人财产和普遍的私人财产对立，也就是将所有权延伸到所有的人。马克思反对对新社会的误解，比如资本家继续把一般劳动视为财富的来源，所以，劳动不应该被压制，而应该延伸到全部领域。从粗俗共产主义的视角来看，群体不过是个人的群体，平等也不过指的是同样的工资。

在纳粹德国时期，群体（Gemeinschaft）一词取代了社会（Gesellschaft），这就

意味着,根据同一性建立的群体排除了所有的差异和所有的异他性,成为封闭的群体。这样理解的群体无可争辩地属于它的成员,是绝对的同一性(没有异他性的多余),完全的团结,完美的结盟和彻底的汇合。这样的群体标志着所有意识形态差异的结束,甚至阶级差别也被抹除了。任何属于该群体的人都必须具有群体意识(Gemeinschaftssin)和群体意志(Gemeinschaftwille)并且遵守群体秩序(Gemeinschaftordnung)。 530

对群体——社会——彻底认同的过程,纳粹德国的整个文字都为之服务,如果我们不从一般意义的劳动,无差别的劳动的定义开始,这就始终会无法理解。在现在的主流社会体系中,无差别的一般劳动是结构和构成的要素,在交换价值方面能产生价值。在纳粹德国的词典中,"工作"(Arbeit)一词不但指"抽象劳动"和"无差别的劳动",后者被量化并以小时付报酬,也指跨阶级的无差别劳动,即从"阶级"、"异化"和"剥削"解放出来的任何劳动。

从跨阶级的角度来说,过渡是直接从阶级差异(也是一种无差别的差异)的无差别工作,过渡到没有任何阶级含义的工作。群体成员在劳动的商品化、付酬工作、"劳动"的抽象范畴、"一般意义的劳动"中有"原始的意义"(这使用了弗洛伊德的一个表达),把他性(自己本身的他性,和他者的他性)从其身份之中排除出去。这样的抽象化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中第一次变得真实而具体,变成了它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现在这个阶段,阶级劳动的含义已经丧失。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时期,"劳动"一词假定具有普通意义上的跨阶级含义,被视作法西斯统治给意大利语带来的创新的一个标志。说到"劳动",朱塞佩·博塔伊在1934年满意地写下了以下内容:"该词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涉及到所有的组织和执行形式,包括智力的、技术的和手工的秩序,并且不和特定的阶级劳动联系在一起";他还称赞了"datore di lavoro"(字面意思是劳动的给予者,即雇主)这个表述,这个表达取代了"padrone"(主人、所有者)这个词,当时后面这个词已经不再使用了。此外,他把"datore di lavoro"(雇主)这个词描述为"被革命性的法律所神圣化的……人们的意识中的一个单一的身份证明,以及作为我们的社会秩序支撑的司法平等性"。

11.4.9. 交流,或者由他性调整的社会性

随着消费主义的传播和交流—生产体系的全球化,跨阶级的概念变成了资本主义"劳动"和"群体"的意识形态所固有的,这已经成为了现实,在其中,财富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 531

然而,这个方向和一个事实相矛盾:资本的发展构成了从自由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终结当今社会—经济体系的条件,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力的买卖上的。

作为资本发展的结果，新的社会关系形式必须是基于劳动的解放之基础上的。

共有，即开放群体，意味着社会性不可能实现全球化，意味着向他性敞开，从同一性的困扰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性。如此说来，社会性是之于自我的外社群主义（extracommunitarian）；它指的是他性的条件，指的是没有边界的关系，没有领土，没有根基，没有随之而来的归属感。从这点来理解，社会性建立在不可比较、无法控制的劳动之上，其中财富是按照他性的时间来衡量的。

悖论性的是，资本的发展创造了非领土化，和从无差别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条件。下一步是，想象出社会关系的新形式和职业，这些职业能减少工作时间，生产成本也并不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换价值的增加。与之相反，劳动时间的减少应该被视作个人个性财富增长的标志。随着劳动时间的不断减少，一直到整个社会的最低水平，因而也该增加个人发展的自由时间［参见 Marx，1953（1857—1858）］。根据对社会再生产的这一描述，财富是从每个人的自由时间来理解的。因此，不是把减少的劳动时间理解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异化的多余价值和失业，减少的劳动时间应该成为个人和全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所以，在这样的框架下，真正的社会财富是从社会个体的发展来考虑的。与马克思相呼应，自由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才是财富的衡量标准（同上）。

抽象劳动的时间是无差异的时间，有用劳动的时间是有差异的时间。自由时间是对彼此无法漠视的时间。与抽象的无差别劳动和有用劳动的情况不同，这两者为了同一性而牺牲了异他性，而在对彼此无法漠视的时间中，建立在同一性之上的社会关系被建立在异他性之上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对自我和他人而言的）。

抽象劳动和有用劳动的时间，无差异和差异的时间是作为存在—交流之功能的时间，是作为从使用价值、需求和生产力来理解的存在。然而，对彼此无法漠视的时间是“超在”的时间，是他性的自由时间，它具有自己的物质性和对同一性的抵御能力。他性的时间随着劳动的结束而发展，就像固定资本建立在以后殖民社会为特征的社会体系之上一样，后殖民社会的特征不再是以量化工作的买卖为基础的。他者的时间指的是就最终的抽象化、同一性、差别 / 无差别而言的不可约减的他者，它和同样的、同一性的时间是相反的——个体的同一性，国族的同一性，生产体系的同一性，阶级同一性，国际的同一性或者抽象、无差别劳动的同一性。关于同一性的时间，他性的时间是多余的、非生产性的、逃逸的时间。

532

生平简介

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又称为 Petrus Hispanus，大致是在 1205 年前的某个时间出生在里斯本。1220 至 1229 年间，他在巴黎大学学习，当时巴黎大学是著名的逻辑学、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中心。它在萨莱诺或蒙特利埃学习过医学，

大约于1235年毕业。13世纪30年代初，或者更早几年，他写出了自己的著作《逻辑学概要》（*Summule logicales*），或《讲道集》（*Tractatus*，该书的评注本于1972年出版），这段时间他可能是生活在西班牙的北部（但丁的《天堂篇》中对此有所提及）。他于1276年成为教皇，被称为约翰二十一世。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在维泰博教皇宫殿旁，建有他的一处寓所。他于1277年在该寓所书房房顶的塌陷事故中去世。

在《讲道集》一书中，西班牙的彼得对当时的逻辑学进行了深刻的、原创性的系统化和解释。他把符号放置在复杂的符号活动过程中，来辨别它的各个基本方面。他的符号模式先于皮尔斯。事实上，两种模式的对应性表明了该书的方向和皮尔斯受他影响的程度：vox significativa（表意表现）= representamen（再现体）；significatio 或 representatio（符号呈现）= interpretant（解释项）；res significata 或 representata（表意之物）= immediate object（直接对象）；acceptio pro（取代）= to stand for（代表）；aliquid（acceptio 的意指，某事物）= dynamical object（动态对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皮尔斯对他如此感兴趣，并且多处引用了他。

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年生于伦贝格），是一位负有盛名的波兰哲学家。他的很多著作都是研究符义学、语言哲学、逻辑、知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在沙夫看来，语言除了是一种基因现象之外，还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对人类的实践是功用性的。在认知过程和实践行为的层面上，语言是人类个体的发明和建构能力的根基。它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还是形成意义的材料，没有它，意义就无法存在。沙夫批评了对语言还原论、天生论和生物学式的解释，如由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生物学家伦尼伯格提倡的观点，以及对语言的行为性的、决定论的概念。 533

沙夫认为，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拜物教”中解放出来，他称其为反映在符号关系的具体化概念上的“符号拜物教”。分析必须始于交流的社会过程，符号关系必须被认为是在具体的社会和交流语境中使用和生产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了看待与语言和符号的研究相关的问题的新方式——比如，语言和知识，语言和意识，语言、意识形态和规则，语言和责任之间的关联问题。知识理论，语言理论，人类个体的理论都是相互关联的。语言理论必须考虑到对语言的反思，反之亦然。关于人类个体的问题，对诸如“选择”、“责任”和“个体自由”这样的概念的充分理解，要求与语言及其使用相关的问题——“词语的暴政”，“语言的异化”及其原因等——也应该被考虑到。 534

第十二章
全球交流、生物符号学与符号伦理学

12.1. 符号伦理学、群体和他性

接下来，我们会将总体符号学向我们想要称为符号伦理学的方向推进。人类作为独一无二的符号的动物——唯一能对符号和交流进行反思的动物——对（由符号和交流构成的）生命，也就是生命的质量，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就现有的讨论而言，这样的责任不只是有限责任，而更多的是一种无限责任——是应分的责任，是绝对责任。我们所说的“生命”，所指的并非只是人类的生命，而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人类的生命无法与之分割。从这个意义而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化传播—生产阶段，我们对生命负有巨大的，可以说是跨界的责任。作为研究符号的学说，符号学不能回避这个责任。符号学一开始被称为“症状学”（semeiotics，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关注的是各种症状。如今，我们必须用“符号伦理学”这一名词来恢复和重构古代的这一符号学职业，它原本的宗旨就是“关爱生命”。随着历史—文化领域和生物学领域之间、文化领域和自然领域之间，以及符号域和生物域之间的交流日益增长，这一问题在当今显得尤为紧迫。符号伦理学是在两种推力下产生的结果：一是生物符号学，二是生物伦理学。

生物伦理学为与医学和药物发展——例如基因工程、神经生物学和药学研究领域——相关的伦理问题提供了统一的批判性视角，伦理问题也随之成为了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然而，即使在这门新学科被引入之前，伦理问题就已经是两大总体性问题的组成部分：符号（生物）域和当今的全球社会经济交流—生产体系。考虑到生物伦理学的哲学倾向既是批判性的也是基础性的，当它在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时有必要注意到这两个语境。

535

生物（符号）域是总体符号学，或者说是生命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它研究范畴宽广，为了解决问题，总体符号学不管是在量上（对符号活动的各个领域

的跨越）还是在质上，都可以为生物伦理学提供足够的语境化。“足够的语境化”一词，意味着批评重构的可能。总体符号学为生物伦理学提供了既是基础性的又是批评性的方法论。

总体符号学是现象学，也是本体论。但是，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地理解和生物伦理学相关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第三种语境：社会经济的语境。生物伦理学的问题必须被放置在当今的社会经济语境，也就是全球化传播—生产的语境中来考虑。在生物伦理学的视域中，现象学、本体论和社会经济的语境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事实上，当今的符号学——也就是总体符号学——必须要负起责任，对全球体系中的不和谐性做出批判；因此，它必须要终结同一个系统所产生的、对整个地球生命的威胁（见本书 12.2.1，12.2.2）。

12.1.1. 全球交流和总体符号学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今发展阶段的特点，可以用“世界性交流”和“全球化”这两个词来概括。交流已经扩展到全球，并且已经适应了这个已然如是的世界，“世界性交流”一词看来是尤为贴切的。此外，既然交流已经渗透了整个生产循环，而生产循环不仅介入了人类的生命，也影响到普遍的生命，毫无疑问，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因此，要对当今的资本主义做出适当的分析，需要一种宽泛的、包容性的视角——换句话说，需要真正的全球视角。单独的专门科学并不能提供这样的视角；符号的一般科学或者说符号学才能为此提供适合的工具。这并不意味着当今的符号学研究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视角，要是说有什么的话，情况可能恰好与之相反。然而，如果不考虑到现今世界化、全球化的交流发展情况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对符号学进行充分研究的，尤其在面对交流理论和交流科学时更是如此。 536

再者，一个没有考虑到世界交流之总体本质的交流模式——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对符号学分析来说是不充分的。至少，这样的模式是缺乏远见而又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时代，一般符号学被重新构想为总体符号学，要承担解总体化的功能：总体符号学必须对声称是整体性的系统进行批判，从世界和全球交流的总体性开始进行批判。如果一般符号学或者说总体符号学做不到这一点，那它就是无用的，抑或更糟：它要么只是对各种门类符号学的糅合，是对各门统一科学的百科全书式记录语言的横截面，又或者仅仅是哲学上的含糊其辞，想要对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知识做出全知式的概括。

想要理解交流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就必须研究它的基础。采用这一方法，意味着我们要丢弃被罗瑟—兰迪称之为邮包交流模式的概念，它描述的是一个预先形成的信息如何被信息源发送并被接收者接收的交流过程，因而也是还原

论的、过分简化的。早在1961年——那时候交流还不像现今一样成为了普遍现象——罗瑟—兰迪就对这一模式做出了严厉的批评。罗瑟—兰迪写作的时间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意大利尚未达到像今天的传播—生产系统带来的近似于社会重构的程度。要用邮包交流模式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一模式的基础是平等交换观念——就要采用还原论的、过分简化的但至今仍有影响的交流模式。这一建立在信息传输概念基础上的交流模式无法对交流过程中的任何组成部分（包括发送者、接收者、符码、信息、语境、推动交流的需要）作出批评性的分析。事实上，这一模式认为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先构的，它们在交流实际发生之前就已经被充分地定义了（参见 Ponzio，1997a、1999）。这一描述没有考虑到交流的特有本质，相较于将交流限制性地定义为在共有符码基础之上的、在不同的单独个体之间的意图性的信息交换的模式，交流的本质更为宽泛，也更为复杂。

537

想要充分的理解全球交流，就要充分理解当今的交流所包含的风险，包括交流可能结束的这一风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风险并非是在电影或文学中再现的、理论化的、称之为“不可交流性”的那种无关紧要的现象——一种在向当今交流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主体—个体病症，且这一病症与生产无法分割，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传播—生产”的现象。交流结束的这一风险是更为根本性的，考虑到当代社会所拥有的巨大的、在社会系统发展的过往阶段从未有过的破坏潜力，这种风险指的是地球上生命终结的风险。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应该把交流等同于生命本身。如同西比奥克的生物符号学方法所清楚展示的那样，符号活动和生命是相互交会的，交流和生命也是相互交会的。这和我们所说的交流的结束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是同一个道理（见本书第五章）。

符号学必须采取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全球的”（planetary），也就是时空意义上的总体（global）视角，才能充分理解当今时代的交流。当今的交流被视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社会方面的特异性，也被视为和整个星球的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别忘了生命和交流、生命和符号活动是一致的）。这样的全球视角可以使得批评和对同时性（contemporaneity）的解释保持必要的距离，并不再囿于当代性本身的界限。

12.1.2. 责任与符号伦理学

随着“生命权力”（福柯语）这一概念的普及以及身体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性介入，世界性和全球交流的扩张与将个人视为孤立的自足体的这一观念的传播一并进行着。身体被作为属于个体的、孤立的生物体来理解和体验，也就是说，它是个体范畴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建立在身体的交互性、相互依赖、展示和开放之基础上的文化实践和世界观几乎消失殆尽。我们剩下的不过是民俗研究者们所

538

关注的木乃伊式的遗物，保留在民族学博物馆和民族文学史中的考古遗迹，而这些都是普遍"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的表现。

想想大众文化的代表是如何看待身体的吧（讨论见 Bakhtin，1963、1965），想想各种"怪诞现实主义"对待身体的方式吧，它并不普遍性地从个体的方面，或者从与地球其他生命、与世界其他部分相互孤立的方面，来看待身体、看待肉体生活。怪诞身体的符号（它们在当今时代只留下微弱的痕迹）包括了仪式面具，如流行节日中使用的各种面具和嘉年华面具。在与资产阶级兴起相关的个人主义得到发展之前，中世纪流行文化中的"怪诞现实主义"将身体展现为一种无法清楚界定的、难以封闭的实体——相反，它在和其他身体的共生关系中、在超越了个体生命限制的变化和更新中得以生长。而全球化传播—生产远没有弱化个人的、私有的、静态的身体观，而是强化了这样的观念。

正如，尤其是福柯指出的那样（但是同时，我们也别忘了罗瑟—兰迪在 20 世纪 70 年代做出的敏锐洞悉），科学之间的细分和区隔是服务于"个体化身体的新准则"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需要的；而这种新的准则转而服务于将身体控制性地介入现在的传播—生产系统的再生产循环。

符号学的全球化和去总体性方法论是和对话逻辑相联系的，它要求了对他者的高度可用性、倾听他者的准备和向他者敞开的能力，这种敞开不仅仅是量性的（这里指的是总体符号学所具有的全面包容性），还是质性的。符号学者们的符号学解释——尤其是在元符号学层面上的解释——都不能脱离和他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事实上，如果符号学的方法论既要是全球的又是向地方性、向具体性敞开的，而不是被包含、被囊括，那么对话主义就是其基本条件。因此，这一方法论也可以被描述为是具有解总体化倾向的。

539

就像由列维纳斯首先阐明的，他性使得整体性在和他称之为"无限"（infinity）、皮尔斯称之为"无限符号活动"的概念相关的过程中，持续更新地进行自我重构。这种和无限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认知事件：它超越了既定的秩序，超越了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超越了规约和习俗，它是牵连和责任的关系。和无限的关系是和绝对他性的关系，它与整体性是最为格格不入的。因此，和无限的关系意味着和他者的他性、和另一个人的他性之间的关系，它不像是另一个自我、另一个他我（alter ego）、另一个同属于一个群体的我，而是相异的他者意义上的，是外来性、陌生性，是差异和不同，尽管它是我和自我的同一性之反面，我们却不能对它漠视。

根据特定的意识形态计划，我们所描绘的方向并不是导向符号学的；相反，被如此描绘的符号学关注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与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的、独一无二的责任相关的行为。理解正确的话，"符号的动物"是具有符号之符号（signs

of signs）能力的责任主体，整个星球的符号活动都具有意识，并且有能力进行调节和反思。从这个意义而言，总体符号学必须充分地以认知符号学为基础，但它同时必须向量性和理论之外的第三维度，也就是向伦理维度敞开。既然第三维度涉及到我们渴望达到的终极目标，在旧文里我们也将其称为“目的符号学”（teleosemiotics）或者“终极符号学”（telosemiotics）。而在本书中，我们也称之为“符号伦理学”。

如果符号学要履行“符号活动的健康”（health of semiosis）这个承诺，要培养理解整个符号宇宙的能力，就必须不断地提炼自身的倾听功能和批评功能，也就是倾听和批判的能力。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区别认知符号学、总体符号学和符号伦理学之间的三分法是决定性的，这不仅仅是就理论方面而言的，也是就治疗目的而言的。

12.1.3. 同一性和异他性：论主体性与合理性

从个体主体的同一性和集体主体（西方世界、欧盟、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的同一性而言，“同一性”和“主体性”（这一概念和“同一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世界性的全球交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540

个体同一性和群体同一性这样的概念也必须用符号学来加以分析。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同一性，都要么是由朝向独白论的逻辑——我们称之为“单一逻辑”（mono-logic）——支配，要么是由朝向对话主义的逻辑——也就是“双向逻辑”（dia-logic）——支配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深远而普遍的。

皮尔斯的思考对我们重新定义主体这一概念贡献良多（参见本书1.2；Colapietro，1989；Petrilli，1997d；Sebeok 等，2001）。人类，也就是我（I），是由文字和非文字语言构成的、具有复杂秩序的符号：“人自己就是他所使用的词语和符号……就像人种（homo）和人（man）这两个词是同义的一样，人和外部的符号也是一致的。”（CP 5.314）主体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符号活动——事实上，作为解释—命题过程中承担义务的结果，主体是由潜在的无限的表意途径所构成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符号，主体是一个对话关系体，是一个在和其他符号、其他主体的内我和人际关系中逐渐浮现出的开放主体。因此，主体和符号之间边界的确定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它们出现在和其他符号、其他主体的对话性相遇中，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

人是在社会性中，也就是在和他者的经验关系中，而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发展的。的确，自我、主体是若干个遵循他性逻辑的自我之集合。自我在对话上相互关联的多个自我之集合。如果我们把“个体”（in-dividual）这个词按字面意思理解为“未分裂的、不可分的”，那么，用皮尔斯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绝对不

是一个个体”(CP 5.314;亦见本书1.2.1)。皮尔斯拒绝有限自我或者自足自我的“幻象”。事实上,维尔比也支持皮尔斯的这一看法(尽管她的观点是独立于皮尔斯的),并且表达了相近的立场,她认为“正是我们的可分性构成了我们丰富的天赋”。

自我的社会特性和群体特性与自我的单一性、独特性并不是矛盾的,就任何可能与之相关的解释过程而言,这和自我所意指的他性也不矛盾。自我是难以描述的(CP 1.357),是已然说出之外的言说。自我的表述传达了词语的传统含义之外的意味。但同时,自我的难以描述和独特性并不意味着不可交流性。

我们曾讨论过,皮尔斯的同一性让我们想起维尔比的观点;反之亦然。两种看法都认为,主体的同一性是一个复合体,是多面的、多音的,它在各个组成部分的对话关系中被勾画和建模出来。如同之前(见本书1.2,8.2.1)所说的,在维尔比未能出版的手稿中——包括题名为《主体性》的文档,这些文章写于1903至1910年间——她将我和自我进行了区分(见多伦多约克大学档案馆的维尔比资料汇编;关于有档案可查的资料的描述,见Petrilli,1998a)。维尔比对她称之为“我”(I,或者用她创造的新词Ident)和“自我”(self)之间复杂而明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由此讨论了主体性的问题(参见1907—1910年的手稿)。在她看来,同一性是在“我”和“自我”之间的对话关系中建构出来的。在维尔比看来,“我”并不是“个体的”,而是“独一无二的”。“自我”也有一个相应的新词ephemeron(意为“蜉蝣”),它被描述为不能永生的、如身体般的短暂易逝的。相反,“我”被描述为可以超越身体和“自我”的不能永生,而朝向永生的。如此形成的同一性不是单一的、简明的;相反,相对于它所超越的同一性本身而言,它代表着多余。

541

不可避免地,主体是身体化的主体、是身体交互性的存在——也就是说,身体从一开始和其他身体就是相互关联的,主体是历时和共时层面上的身体交互性的表现,这是为了整个的后续生活而言的——即主体的身体化并不是发生在孤立于其他身体的身体中,无论如何,主体都不是和我们对“作为人类的人”的看法无关的。从生物进化和物种角度,从社会性和文化历时的角度而言,主体都是身体化的实体。在意识发展的过程中,身体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意识是身体化的意识,身体是意识全面发展、是人类发展成为符号动物的条件。身体化的主体和其他身体相互关联地发展着,通过后者扩展了自我的边界,后者也就是它所经历的世界的边界。皮尔斯反复地使用“血肉之躯”一词来形容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参见CP 1.337,7.591),然而,它只能以抽象的方式才能和符号意义上的身体区别开。这与以下两者的区别有相仿之处:一方是身体性、超符号及工具物质性,另一方是具有身体指称的符号物质,尽管在做梦或沉思时,这两者的区别不是很明显(参见Petrilli,1998e:38—48,146—147)。

542

符号学的研究范畴极为宽广，因此，它必须要考虑到“事物的缘由”，并为其提供解释。然而，解总体化的能力，以及批判和对话整体性的条件都意味着，找出事物理由的能力和合理性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不妨这样描述要探讨的问题：考虑到当今符号活动和生命的社会再生产中固有的风险，人类必须及早把自己从合理的动物转变为合理性动物。

维尔比和皮尔斯都为真正的总体符号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门学科可以解释所有的表意过程的复杂性和它们的关联，它不仅能在表意方面，也能在意识和意味方面对意义进行考虑。维尔比和皮尔斯都认为，对符号的生命和生命的符号之研究是不能完全通过描述性的词语——也就是中立的言辞来完成的。维尔比创造了“表意学”一词，意在表明建立一门综合性的、批判性的、能够毫不回避地面对符号与价值之间关系问题的学科之可能。“表意学”一词表明了这一学科的价值评价倾向，因此，价值被加之于符号及其相关性、表意的潜在可能，以及意味之上。

维尔比认为，享乐主义者的道德观——也就是她那个时代和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将广袤而多样的宇宙降低至完全附属于地球中心主义者和寄生者的地位。

皮尔斯在其研究的最后阶段也将研究重点集中到了规范科学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把逻辑和伦理学、美学联系了起来，认为逻辑是关注自控思想的规范科学，伦理学是研究自控行为的规范科学，而美学作为一门规范科学则致力于确定最有价值的终极信条。他在这一语境之下讨论了终极的善，也就是圆善，或者说终极价值的问题。皮尔斯拒绝将圆善等同于个体的欢愉（如享乐主义）或是社会的善，比如人类幸福在范围和程度上的最大化（如英国的功利主义）。相反，他认为只能在和“进化过程”——也就是发展的符号活动过程——的关系中，才能定义圆善，并专门将最高级别的善定义为“具体合理性的发展”。

自我与他者（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和自我的他者）之间的对话关系，是创造过543 程的连续性的最重要条件。这一创造过程的推动力量，就是圣爱（agape）意义上的爱。事实上，在皮尔斯看来，正因为有了合理性的创造性力量和圣爱的转化性劝导，合理性与知识的最高级发展才有了可能。

由是观之，合理性被赋予了这样的力量，它可以把某个人对陌生人、对异己的恐惧，以及对他者、对他者经验的害怕转化为同情，从而使他者变得可爱。如果把皮尔斯的话语向列维纳斯主体哲学的方向推进，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在同一性的坚硬外壳之下，主体通过爱重新发现了自己对他者安全的担忧。这样的担忧使主体惶惶不定，萦绕于怀。爱、合理性和创造力都是建立在他者和对话的逻辑之上的。就如我们从以上引用的作者们那里所学到的，根据他们的描述，他性和对

话性不仅是推动人类意识发展的动力，还是推动远超于人类意识之外的整个宇宙的发展的动力。

皮尔斯以实用主义思考主体性问题和作为一系列行为、实践和习惯的集合的自我，他将“权力”(power)当作和“力”(force)相对之物，并把这种权力视为这个问题的基本特点。皮尔斯把自我描述为朝向目的的中心，是致力于多少具有完整性的“目的”的行动者。目的和维尔比的术语“主旨”(purport)或“终极价值”(ultimate value)相关，后两个词是她根据自己的意义三分式中的第三项——意味——来描述表意价值时用到的。权力并非“蛮力”，而是“合理性的创造力”，因为它对圣爱的趋向而支配着所有形式的力量(参见 CP 5.520)。我们可以说，权力——也就是合理性之理想——是对他者加之于自我的吸引力做出回应的能力；权力和合理性都和对他者的回应能力相关，而回应的形态是对话性的。

一方面，自我的羞耻和自我的脆弱，另一方面，自我为朝向他者而冒险的意愿中包含的危险，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柏拉图关于爱神厄洛斯的神话(见《会饮篇》)中得到了描述。厄洛斯是贫穷之神佩尼亚和富裕之神波洛斯之子，他是神祇或者魔鬼的某种调和，他具有一种能力，能够在即使被隐藏起来的情形下也找到道路。维尔比论及人类世界时，将自我充实和向他者敞开的冒险之间的联系视为基础，它产生了一种倾向，可以发展出对“满足”的批评——因此也就是对现实(即已然如是的世界)、对一次性被给出和决定了的本体论的“超越”：“我们往往认为，男性和女性对事物本来的样子感到满足。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我们都对它感到不满。”“不满”是“母义”或者说“原始义”的基本要素，它标志着复苏人类理智能力的批评立场的需求。它在认知能力之外暗指着他性的能力、对创造和革新的结构能力，以及意义的转换和变化。尤其是由于试推逻辑的方法，这种批评立场允许预测和“翻译”，后者可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超越了语际翻译的局限，如将翻译作为对文字和非文字语言符号的解释和验证的做法。在维尔比认为的“原始义”的基础上、在皮尔斯提出的圣爱逻辑过程的基础上，推理的科学缜密性是可能的。这意味着要有勇气承认，对于符号、主体、意识等的进化而言，合理性因素在结构上必然是与推理相反的，因此他者、身体交互性、对话、爱、不准确、不稳定和危机在结构上也是如此。

544

维尔比在 1909 年 1 月 21 日的信中，赞同了皮尔斯认为逻辑是“智力的伦理”的看法——她把皮尔斯的观察和自己的“原始义”观念相联系，这一观念是她人类表意世界理论的基础(见本书 8.2.1)：“我当然同意你对逻辑推论的定义，也赞同逻辑实际上是这个词最大、最高意义上的伦理应用。这和原始义所见证的完全一致。”(见 Hardwick，1977：91)这一点对我们的讨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12.1.4. 人的符号和符号的人

根据之前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符号伦理学提出了人文学科的新形式。事实上,它超越了认知层面,进入了伦理的视野,也因此上升至符用学层面。通过和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科学,和历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联接,它意在超越科学之间的分离论,从而恢复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之间缘由的内部联系,尤其是人文主义的问题和异他性逻辑之间的关系得以浮现。

545

在列维纳斯的所有论述,尤其是《人文主义与作为他者的人》(1972)一书中,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文主义的新形式就是异他性人文主义。对人权的要求是以同一性为趋向的——这一方法迄今为止占据着历史的主流观点,而这种看法使得他者的权利被排除在"人权"的概念之外,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也看不到明显变化的迹象。如今总体符号活动的健康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险;由此看来,这种方法非常需要异他性人文主义的反制,在异他性人文主义中,他者的权利是首先要得到承认的东西。到此为止我们的暗示已经相当明显了:他者的权利不仅仅是与自我之外的他者所拥有的权利,也是自我本身的他者、自我的他者的权利。同一性人文主义指向这样一种境况:自我有着强烈的排除、抑制和分隔他者的趋势——也就是将他者放上了同一性的祭坛。但是,由此而获得的同一性是虚假的,因此,任何维系和恢复它的努力都注定徒劳无功。

符号学为人类整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符号网络赋形,从而为异他性人文主义作出了贡献。这种相互联系不仅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交流在世界范围内的散布实际上意味着,交流符号体系是在全球层面上进行的,它包含了全世界所有有生命的有机体;可以从共时的角度去分析这一全球性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更广义地说,所有有生命的有机体——都是在共时关系上相互联系的生命体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同样的,如同所有的生命形式一样,单独个体的命运是包含在人类的整体命运之中的,而人类整体和所有的生命形式又包含在单独个体所作出的一切决定、行为和事件中——从最遥远到最近、从过去到演化中的未来,以及生物意义和历史—社会意义两个层面皆如此。这也使得共时的分析尤为必要。通常意义上的符号系统关注的是人类建构的符号域,一个仅仅包括符号、象征、人造物等的文化域;然而,总体符号学告诉我们,文化符号域只是更宽广的一个符号域,也就是符号生物域的一部分,后者是人类的栖息之地,我们起源的母体,注定要登上的舞台。

546

符号学表明人类的一切都与符号有关。事实上,它暗示着更多:任何生命体的一切都与符号有关。这还仅仅是认知符号学和总体符号学所到达的范围。符号伦理学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把这一看法进一步推向伦理学的方向,甚至超越伦理学范畴。从符号伦理学的视角而言,在最根本的层面(界定义务和价值观)上,

我们有着不容逃避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准则——不止如此,还有宇宙本身——都在我们的责任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它意味着我们将人类的符号行为放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下来进行解释:既然人类的一切都与符号相关,那么反过来,所有的符号也都是与人类相关的。这种人类主义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提倡人类的(独白式的)身份,也并非要提出另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相反,它意味着最根本的去中心化,并不亚于另一场哥白尼革命。如维尔比所说,"地球中心说"必须被超越,"太阳中心说"亦如是,直到我们接近真正的宇宙观——作为对地球符号学和太阳符号学视野的批判,我们可以称之为宇宙符号学视角。获得或者接近这一视角是我们最终目的的一部分,它是总体符号学和目的符号学或者终极符号学——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符号伦理学——的交汇之处。如同我们所观察到的,在人类责任问题中,是异他性逻辑而非其他面临着危险。然而,异他性逻辑,以及我们提议的可以确立基础和方向的人文主义形式之逻辑,意味着他者不同于我们普遍所认为的;换句话说,它不仅仅是我们的邻居或者空间距离层面(有了全球交流之后,空间距离被极大地拉近了)上的他人的他性问题,还是无论从时空和基因层面上都离我们最远的生命体的他性问题。

特伦斯有一句名言:"我是人:凡属人性,我皆有之。"雅各布森(Jakobson, 1963)将其改为:"我是语言学家:凡属语言,我皆有之。"就符号学家而言,对凡属语言学的——实际上,对凡属被赋予了符号价值的(不仅对于人类符号活动是如此,或者说对于动物符号活动如此,而且对于整个符号生物界都是如此)——参与,都应该不仅从认知上,还从伦理上进行理解。这种关怀不仅仅是"与……相关"这一意义上的,而且是"关心"和"关爱"意义上的。从这一视角看来,对他者的关心和关爱他人意味着对责任的承担能力,这种能力不受同一性逻辑以及归属、相邻和社群逻辑的限制,它不是"语言学家"或者"符号学家"所专有的。如果我们对雅各布森的话稍事改动,就可以说,并非是因为语言学家或者符号学家,而是(保留特伦斯原话的"我是人"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作为人,凡属符号,"我皆有之"。作为人,我们不仅仅和其他任何动物一样是具有符号能力的动物,而且是具有批评性思维和责任的符号学动物;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只要是符号活动——包括产生符号活动的生物域和进化中的宇宙——对作为人的我而言都是他者,因而"我皆有之"。

547

符号伦理学没有对意向目标和实践行为的计划,也没有什么戒条,没有多少显得正经的适用原则,看起来多少像是空谈。它和思维定势、规范、意识形态都有所不同,更像是对这三者的批判,对莫里斯在《意谓和意义》中所标识的各种不同价值的批判(想想看他提出的"操作价值"、"以为价值"和"对象价值",以及进一步细分而来的"疏离"、"主导"和"依附"的三分法)。符号伦理学是一种批判的

能力，它的特殊工作是使得那些看上去不存在的符号网络显形，突显出那些无法逃避的关联、暗示、关涉、历史和故事，并对此作出评判。在这些地方，似乎仅存在着纯然的分隔、界限和距离，那些隐形的东西都相对的不在场。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这种不在场是有利于对责任感的捍卫的，因此它也就保证了个人“清白的良知”。“终极符号学”和“目的符号学”这两个词中的词根“telos”不是指某种外在价值或是预先达成的结果，也不是指符号网络之外的“圆善”。相反，它指的是符号活动本身的结果，这种结果被理解为去总体化、超越了既定实体和既定存在的那种能力，是无限符号活动的过程，是朝向无限的运动，也是朝向他者的渴望。548 在现今的语境中，我们认为符号伦理学的一个特殊使命在于，它要揭示出“漠视彼此的不同”这种态度的虚幻性，也就是说，差别之间的彼此无视仅仅是一种幻觉（参见 Ponzio，1995d）。

12.1.5. 作为一种态度的符号学以及符号伦理学的批判工作

符号学不仅作为一门科学，也作为一种态度，是在人类符号活动的范围中兴起并得到发展的。换言之，符号学是独一无二地和人类的主体世界、和人类特有的建模能力相关联的，而不是和其他动物的主体世界相关的。人类的这种建模能力能够产生多个不同的世界及世界观。符号学是人类这一物种的一个事实，是人类历史性地、社会性地生产出的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符号学实现的有效可能以及它赋予人类的理解和意识的能力，是超越了生物意义的历史文化结果。我们的主体世界是由物种决定的，但同时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因此，它发生转变的可能性或者说替代的假设，随着在符号活动中逐渐出现的历史社会现实，而有着批评和计划所必需的有效立场、出发点、对抗条件和材料。

符号伦理学的批判工作指出了，相互之间彼此冷漠的差异状况为何只是一种幻觉，相反，归根到底，整个星球的命运是如何被蕴含在人类的选择和行为之中的。符号伦理学必须始于对社会体系的公正分析和质询，它本身在这个体系中被孕育出来，又被这个体系所提倡。也就是说，它必须始于今天就历史—社会而言所处的位置，始于共时状态下的严格而精确的分析，因此必须始于全球的交流—生产关系。

在生产的社会模式的同一性中，全球化程度和交流、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程度更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对符号伦理学是个优势。如今，单一的市场模式主导着总体，而单一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导致的同一性，表现在人类行为、习惯、时尚（也包括服装时尚）和想象生活上。整体的社会再生产系统主宰并覆盖了总体，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说，从替换性意义上理解的差异正在取代他性意义上理解的差异。549

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优势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分析对象。这意味着，我们在分析中不必考虑各种不同的方面，那样做是精力上的浪费。但同时，显而易见，“优势”这个词是带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把现实视为一个单一的复合体。这是独白主义的优势，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使批评能力无功而返，阻碍了批评分析，这和赞同创造性解释和批判质疑的多音、多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此外，批评的工作还造成了另外的困难：我们没有现成的、适合的概念工具，因此必须创造这样的工具；作为对革新的回应，我们还必须建构在主流领域之外的领域，并引入和那些历史发展阶段中认为理所当然合理的理念所不同的假设。

我们相信，符号伦理学为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提供了一个有史以来可能最宽广的视角，使之成为在宇宙意义上的负责任的行为者。或许就是在今天，而不是在以往的任何时刻，我们必须为这一视角提供解释，并且强调以最有良知、想象力和责任的可能方式来培养这一视角的无法阻挡的需求。这就是他性所要求的一切。

12.2. 生物伦理学、生命符号学和全球交流

12.2.1. 生物伦理学与总体符号学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随着生物伦理学的引入，与生物和医疗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一门特殊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是，其实在生物伦理学被引入之前，这些问题就已经至少是两个总体部分，也就是符号生物域和当今的全球交流—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为了对符号活动保持一个既基本又批判性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两个整体。

我们也提到过，总体符号学或者说生命符号学是从整体上对符号生物域进行研究的，尤其是西比奥克以“符号学说”为基础的表述更是如此。“学说”一词源自约翰·洛克（他用该词表示可以大致形成一个知识领域的一套原则或是观点）。西比奥克使用“学说”这个词，而没有采用更高端的“科学”或是“理论”，这意味着他和乔治·贝克莱，以及稍后的皮尔斯是同属一个思想传统的。 550

和康德一样，皮尔斯也关注表意的条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由此有了统一的可能。多亏了皮尔斯的“范畴学说”，两个长期对立的、一直主宰着西方哲学思想的关于现实的观念终于互相融合了。在这里，我们指的是：其一，源自亚里士多德的现实观，它认为事物是脱离于意识的本质存在；其二，与之相反，另一种现实观认为现实是由我们的意识、由他者所决定的。这两种思想传统的遇合点就是符号学的视域，它将对象和意识都描绘为共同的符号活动的一部分。

“符号的学说”这一表达也突显出西比奥克研究所具有的教学法特点——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事实上，西比奥克通过对这个名词的使用，恢复了符号学的批评本质。从这个角度而言，符号学的任务不仅仅是对符号活动进行观察和描述，还要以康德的方式对符号活动的可能条件进行探询，正如它探询了研究符号活动之规则的可能条件一样。

我们一再声称，总体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域。现在我们要补充的是，符号域这个词来自于尤里·洛特曼，但是它的范畴远远超越了洛特曼的定义。事实上，洛特曼的“符号域”指的是人类文化，然而，从总体符号学的观点来看，符号域与生物域是相互交汇的，可称之为符号生物域。我们知道符号活动和生命是一致的，因此总体符号学也就是“生命符号学”。总体符号学的立场就是要为符号网络赋形；毫无疑问，这包括了人类和包含了符号、象征、人造物等人类文化所建构起来的符号域。但总体符号学同时也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符号域只是一个更宽广的符号域，也就是符号生物域的一部分；人类从未离开过这个符号网络，而且，既然他们是生命体，他们就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符号网络。

近来对总体符号学最系统的阐述包括了西比奥克 1991 年出版的专著《符号只是符号》（*A Sign Is Just A Sign*）的意大利文版。该版本于 1998 年出版，收入了西比奥克发表于 1994 年的一篇文章：“总体符号学”。1994 年 6 月 18 日在伯克利召开了第五届国际符号学研究会议，此文是西比奥克的会议发言稿译文。此后西比奥克于 2001 年出版了同名的专著《总体符号学》，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西比奥克于同一年去世）。

551

在国际的层面上来看，总体符号学最为系统的出版物当属由罗兰·波斯纳、克劳斯·罗伯林和西比奥克共同编著的四卷本著作《符号学：自然和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这部书的作者多达一百七十五位，来自于二十五个不同的国家。该书收录了西比奥克的文章“符号活动的演变”，改写自他在《符号只是符号》一书中发表的同名文章。在文中，西比奥克指出，生命和符号活动是一致的。书中还收录了总体符号学这一学说中不同领域的诸多文章，包括“生物符号活动”（托尔·冯·乌克斯库尔）、“微观符号活动”（F. E. 叶茨）、“内符号活动”（托尔·冯·乌克斯库尔和 W. 佳杰思）、“真菌符号活动”（G. 克雷珀林）、“植物符号活动”（马丁·克兰珀）、“动物符号活动”（W. 施勒）、“人类符号活动”（F. M. 伍克第茨）、“机器符号活动”（P. B. 安德森、P. 海斯勒、P. A. 布兰特）和“环境符号活动”（G. 提布罗克）。

由于总体符号学和生命符号学可以为生命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提供宽阔的语境，它们对后者非常重要（尽管这不是它们重要性的唯一原因）。既然从符号学的视角而言生命和符号活动是一致的，这一语境就比索绪尔的符号学要宽广得多，

后者对符号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之内的。

总体符号学与人类符号学、动物符号学（对包括人类非口头符号在内的动物交流的研究）以及内符号学（从个体和系统的角度作出的对有机体控制系统的研究）紧密相关。西比奥克认为，人类的交流和表意过程是在生物基础上，也因此是在生物符号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对人类的符号活动而言，这一基础应当是研究的重心。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研究将其他领域为了适应专科化的秩序而相互分隔的知识和实践统一了起来，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分隔经常是以无用且有害的细分化的名义进行的，而且，在它致力于建立科学秩序的面具之下常常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取向。

12.2.2. 存在与符号：生物伦理学基本的、批判性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看到，总体符号学不仅在范围和量性上，也在质性上为生物伦理学提供了足够的语境化。这里所说的“语境化”是指批判性的塑造。总体符号学为生物伦理学，以及为把它作为一门理论和哲学学科来进行描述提供了基本的、批判性的方法。 552

总体符号学的方法主要是本体性的。它清楚地将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研究作为路标；毫无疑问，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方法都相当宽泛——如我们所知，皮尔斯就认为整个宇宙即使不全是由符号构成的，也是由符号所充满的。但是，皮尔斯和莫里斯将符号活动等同于现象规律的描述，反而限制了他们的思考；而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超越了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研究，在本体论的符号学方法上进行了重构。

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研究从生命的视角追问了存在这一概念。如黑格尔所说，不可避免的，存在的问题就是对谁的特定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它不仅仅是关注人类这一特别的存在或者是整个人类的生命；在占据主宰地位的当今社会体系中，它还关注了全球的交流和生产，包括它的覆盖程度和它对当今的人类符号活动的破坏可能，这一问题涉及整个星球的生命。总体符号学认为生命和符号活动是相同的，并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这一本体性的问题。

在西比奥克提倡的“总体符号学”这一学说中，他可被视为本体视角层面上的创始人；正是他从符号学家，包括名不见经传的符号学家们在这方面的分散论述中抓取出了这一视角。事实上，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符号学：自然和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一书中，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他们专科化的讨论中使用了这样的视角。因此，该书是对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和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的一个正式的承认。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生物理论学不能否认总体符

号学对于它自身作为一门哲学性的科学带来的益处。这不仅是因为总体符号学在现象的层面上对不同领域的生物符号活动做出了科学的分析，还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作为生命符号学所采取的方法是本体性的。

总体符号学假设生命和符号活动是同一的，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它关注的是符号之间的相互关联。它从能量信息的原始符号活动开始，进而研究整553 个星球生命进化的复杂符号活动；从对原核细胞的研究推进到单细胞动物、到真核细胞的集合体，它们形成了超级王国中的多细胞有机体。后者和微观世界共存并互相作用，并且一起构成了宏大的符号生物域。这一切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符号网络的产物：在西比奥克看来，这一符号网络始于分子基因学和病毒学的小人国，经过格列佛大小的世界，最后到达了大人国，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大地之母盖亚的由巨型生物、地理和化学构成的生态系统。这一体系粗略看来是由彼此独立的诸多生命体构成的，但是如果仔细地考察它就会发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具有内在关联的。从它的全球性来考虑，就可以说，这样一个生态系统是唯一可以被视为全球性的系统（尽管它也只是相对的）。

12.2.3. 生物伦理学与全球交流

我们已经谈到，要用总体符号学或者说生命符号学的工具和方法论充分地解决生物伦理学的相关问题，还需要超越现象性和本体性的第三种语境化——也就是和全球交流—生产体系相关的社会经济方法（见本书 12.1.1）。

这些语境是和伦理学的视角紧密相关的。事实上，当我们在全球交流的情形之下检视总体符号学对生物伦理学的贡献时，会清楚地看到：作为总体符号学的符号学研究面临着巨大的责任，即将当今交流—生产社会的局限揭示出来。要充分地了解全球的交流和生产，就必须对交流和符号活动采取一种全球性的方法。尽管个别地看来，专业化的科学不能提供这样一种全球性的视角；如今正在国际图景中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总体符号学的符号的综合学科或者说符号学研究，却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特别要归功于西比奥克富于前瞻性的研究。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沿着这一思考的路径，今天的符号学必须承担起责任，去公开地批评全球的交流—生产体系自身所产生的，在能源、工具和社会机会方面与全球体系不协调的地方。符号学家必须做好准备，去对这一体系中固有的，对全球生命的威胁554 进行批判。

我们知道，“全球交流”一词代表了晚期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今发展阶段，这一点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理解：（一）它意味着交流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二）它意味着交流自我调适以适应这个世界的趋势。全球化暗示着交流在整个生产周期中无处不在，它不仅像在更早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那样进

入了交换关系，还渗透了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全球化就意味着交流和生产不仅对人类生命，还对全球的普遍生命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全球交流生产”一词指出了这样的事实：正如基于公平交换的市场已经扩展至全世界范围，交流网络也是如此；而且，总体性上的生命——包括人类生命的各个方面——都被整合进了交流生产体系（见本书 10.1.1）。

要在当今的生物伦理学所属于的语境，也就是全球化的语境中思考和它相关的种种问题，需要的就是全球性的方法。这意味着需要这样一种方法：它在对交流生产体系自身进行内部分析时不会只停留在体系的部分和细分的方面；它在处理心理问题，以及社会科学中用参数进行描述的问题，也就是可以用数据进行描述的问题时也不会仅仅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上。全球的交流和生产需要一种方法论上和理论上的视角，它是全球性的也是对现象存在的观察，它可以理解全球交流—生产的逻辑，因此能够对其进行充分的批判。

对当今的全球交流社会的分析在其所有的复杂性上都要求有相应的概念工具。概念工具必须尽可能的精确，并且只能是通过新的交流理论来配备的。它必须尽量准确，从这一点而言，它只能由足够的哲学基础进行配置。

全球交流生产体系中的社会再生产是破坏性的。生产周期中的社会再生产也是破坏性的。这一生产周期破坏了：（一）机器：新的机器不停地取代原有的机器——并非由于原有的机器已经破损，而是因为它们不再具有竞争力。（二）工作：自动化代替了工作，失业的现象加剧。（三）市场上的产品：市场完全由同一个生产周期的再生产逻辑所控制，从而引起了新形式的消费主义。（四）已有的产品：购买它们是对需求的消耗，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被设计成会立即过时而陈旧的，以便将相似的新产品引入市场。（五）商品和市场：它们无法在全球交流—生产的体系中应对进一步的竞争。

555

欧盟委员会向来对发明性、对和利润相关的创新、对“公正的投资”和“竞争力”格外注意，在充分考虑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后，它将创新等同于破坏，这绝非偶然（见 1995 年的《创新绿皮书》）。如今，产品的创新特点存在于它的破坏能力之中：新产品必须具有破坏市场上已有的相似产品的能力。衡量创新的标准已经完全被市场利益和逻辑左右，从这一点来说，创新能力就是破坏能力。

交流—生产的本质冲动对自然环境和生命形式造成了破坏。正如它破坏了文化的差异一样，它也破坏了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系，在市场逻辑的同一化过程中这些经济体系都将被铲除。在当今的交流—生产世界中，所有的需求和行为习惯都变得相同了（尽管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能性从来都是不同的）；甚至连欲望和想象也都被同质化，并且变得相同。这种本质冲动也破坏了任何违背或是妨碍发展、生产和竞争逻辑，或是对这些逻辑无用的传统和文化遗产。交流—生产将要破坏

那些逃避生产逻辑的创造性力量，它以这样的方式来惩罚智力、发明性和创造性，它们被“市场理性”所否定，或者服从于后者（当生产必须向“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时，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发达地区以及充满了剥削和痛苦而无法生存的地区日益增加，而这正是全球交流—生产体系的发展条件，这个事实也表明了它的破坏性。这一逻辑也是日益增长的移民现象的基础，由于客观的内部空间的限制，“发达”国家已经无法容纳这些移民——无怪乎较之于社会体系的更早阶段而556 言，今天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重。

要将市场全球化，这是具有破坏性的；换言之，要通过不加分别地把商品的地位应用于任何的实体和关系，从而将其全球化，这种做法是破坏性的。商品越是非法的、违禁的——毒品、人体器官、儿童、代孕——也就越昂贵。剥削他人工作的原则是破坏性的。显然，有越多可以产生利润的工作，成本就越低；在诸如全球生产—交流体系这样的强有力的支持体系的帮助下，发达国家更加依赖于不发达国家的低成本工作（“就在那不动好了，我们会给你们工作做”）。在蔓延开来的对童工的剥削上——他们承担的是最繁重、最危险的劳动——生产—交流体系尤其显得可耻。那些在穷困中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也就是生活在痛苦、疾病、战争中，或者是露宿街头、在工厂和市场上做着苦工的儿童，非常需要我们在语言和行动上的帮助。

世界范畴内的生产和交流的破坏性特点被战争证明了，战争几乎总是丑闻性的。全球的生产—交流就是战争的生产和交流。战争需要一个新的繁荣的市场，这个市场是为了常规性武器和非常规性武器的交流和生产存在的。战争还要求赢得人们的广泛认可，认为它是在日益增长的具有威胁性的“他者”的危险面前用于防护的必要手段：于是，战争成为了获取对“身份”和“差异”的尊敬的方式。但事实上，“他者”并不会威胁和破坏身份和差异。现今的社会系统才是真正的威胁，它一边鼓励、提倡身份和差异，一边破坏着它们，使它们成为虚假的、虚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按照完全符合战争生产—交流的逻辑满怀热情而又不可理喻地固守着这些价值观的原因。

如我们之前所说，随着“生命权力”和全球交流的扩展，个体作为单独的、自足的实体这一概念已经得到了承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应用在人类身体、利益之上，以及个体和集体主体的生命之上的分隔技术都是为了生产、为了将消费与生产相等同——这是今天社会再生产体系的一个特点——所服务的。总体符号学或者说生命符号学考虑到了这一切，多亏它的本体性视角，它对一系列的符号作出了相反的解释，揭示出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是如何与这个星球上所有其他的生557 命形式相联系的。承认了这种关联性，也就意味着提出一种超越了如今所有积极责任和有限责任的责任。服务于生产的生产和全球交流的动机越多地被用在阻

止和扭曲身体与环境交流的生态条件之上，采取这一责任立场的需求就越为迫切。

从总体符号学或者生命符号学的背景下对生物伦理学进行本体性的重构，这考虑到了全球交流和它的社会经济语境，强调了对两大基本原则——我们称之为剥离和外位化——的需要。这两个原则意味着人类个体作为生命体经历的一个状态——和地球上其他所有形式的生命体相互连接的状态，因此它也是共时和历时的身体交互状态。因此，我们特别提议用“剥离”一词来表示将人的身体剥离，将它从对生物政治学知识权力的从属地位的支持和偏好中解放出来的需要，而用“外位化”一词来表示从共时性的时空并列体，也就是从服务于全球交流的再生产秩序的计划、结构和角色中解放出来的需要。

身体有着要从想要主宰和控制自己的技术中“一刻不停”地逃离出来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剥离和外位化这两大原则显得更为清晰；总之，这两大原则在身体“垂死中的坚持”上得到了体现。因此，我们在处理这两大原则时必须要考虑到我们在序言中所说的，生物伦理学的方法必须是批判性、哲学性和理论性的。这也是承认这两大原则的道德和合法地位的条件。 558

术语表

试推（abduction）：三种推理类型之一。另两种是演绎和归纳。在试推法中，解释事实的规则是依据它与事实之间的相似关系（像似性关系）而假定的。

异他性（或他性）（alterity or otherness）：异他性（或他性）指的是某物的存在自身自治的独立于自我的主动、意志、意识或认可。异他性与物质性（可以理解为客观性）是同义词。

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研究人类对符号的使用的学说。

论据（argument）：一组陈述语句，包括支持结论的前提。

二分法（binarism）：（在音系学、语法、结构人类学等中）从二元对立视角分析对象的方式。

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研究生物符号的科学。从生物符号学视角看，符号活动与生命是一致的。生物符号学的分支包括植物符号学、真菌符号学、动物符号学、内符号学等。包含生物符号学在内的符号学理论是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学说。

符码（code）：由发出者对信息进行编码、接收者对其进行解码的一套规则体系。从符码来看，传播就是信源与信宿之间的信息交换。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对语言与思维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说。

语言知识（competence）：根据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语言知识指的是某一门语言的理想说话人有关该语言的语法知识。语言知识是一套规则，它包含并解释某一门语言的言语行为（即：语言运用）。

意指对象（denotatum）："当被［符号］指称的内容的存在实际上是指称某个所指对象时，它便是一种意指对象。"（Morris，1938c：5）例如，"独角兽"这个符号在神话世界中有一个意指对象，但在动物界却没有意指对象。作为符号，所有符号都有意指对象；一个符号是否有意指对象，这取决于其所指是否存在于所考虑的世界之中。

对话（dialogue）：对话由同一性逻辑或者异他性逻辑所支配。就前者而言，对话

往往是对观点、兴趣、价值等的重新确认，因而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对话。就后者而言，对话的特点是，愿意对观点、兴趣、价值等提出质疑，因而没有任何东西是预先形成的、预先确定的，或是有保证的。这就是真正的对话。换言之，形式不是对话存在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也许有对话的形式却没有真正的对话性，反之亦然。

对话性（dialogism or dialogicality）：与他者一起参与、被动参与的环境。这并非选择性的参与，并非某人主动决定参与的结果。对话性不仅存在于对话形式之中。实际上，形式上的对话或许只具有很小程度的对话性；相反，在形式上不具对话性的话语——不以对话形式而存在的话语——或许具有很高程度的对话性。对话性既存在于外部话语也存在于内部话语之中。此外，对话性并非话语的特权。任何符号环境或符号活动都是一种关系过程，因此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对话性。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就具有对话性，其对话性程度也各不相同。

第一性（firstness）：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所识别的三种宇宙现象范畴之一。另两种范畴是第二性和第三性。第一性有助于解释逻辑—认知过程，以及符号的形成。从符号学视角和皮尔斯的符号分类来看，第一性与像似符和相似性有关。从逻辑学视角和皮尔斯的议位分类来看，第一性与试推有关。

基础（ground）：皮尔斯（参见 CP 1.551；2.228）引入“基础”这个术语来表示某物的“某个方面或性能”，它基于此而成为符号或再现体（换言之，它能代表别的某物，即对象），这当然还需要另一符号充当解释项。例如，当我说“这张桌子是黑色的”，其直接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便由“黑色”所包含了，而此处黑色便是解释项的基础。从感知现象学（胡塞尔、梅洛—庞蒂）视角看，基础本是某种原本未区分的材料，但后来得以区分，从而成为解释项的符号。

像似符号（icon）：皮尔斯所识别的三种类型的符号之一。在这一三分法中，另外两种是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像似符号的特征是，符号与其对象之间呈现相似的关系，然而，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像似符号与其对象之间具有依赖关系：“像似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即使其对象不存在，它也拥有使它有意义的特征；例如代表几何线条的铅笔线。”（CP 2.304）

指示符号（index）：皮尔斯所识别的三种类型的符号之一。另外两种是像似符号和规约符号。指示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通过临近关系和（或）因果关系或通过其他物理联系来表示对象。症状、线索、踪迹等是三种类型的指示符号。

解释项（interpretant）：解释项是皮尔斯提出的一个概念；皮尔斯认为，符号活动是关涉三个成分的三元过程，另外两个成分是符号（或再现体）和对象。某物成为符号，并指代另外的某物——其对象的某个方面，或其思想或其基

础——因为它由开放的解释项符号链（无限符号活动）上的另一符号（即解释项）来解释。

建模（modelling）：建模指的是依据某一模式或图式完成某事或再生某物的过程。在符号学中，模式依据的是相似关系，因此与像似符有关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扎里兹涅雅克、伊万诺夫、托波罗夫、洛特曼）使用“建模系统”来区分自然语言（“第一建模系统”）与其他文化符号系统（“第二建模系统”）。西比奥克将第一建模的特征归于不同于言语的语言。第一建模——以这种方式理解的语言——解释了构建多种可能的多元世界的能力。语言的创造性和自然语言的多元性都充分表明，语言具有充当人类所特有的第一建模机制的能力。

对象（object）：对象指的是任何可以被感知的、可以对其作出反应的，或需要回应的东西。对象可以属于物理秩序，也可以属于心智（精神）秩序。在皮尔斯符号学中，对象指可以由符号表征的任何东西。

他性（otherness）：见“异他性”。

符用学（pragmatics）：在莫里斯的理论中，符用学研究的是符号活动的三个维度之一——符用维度，它属于“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Morris，1938c：6）。莫里斯的另外两个维度是符义（关涉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和符形（关涉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维度属于符义学和符形学的研究对象。

再现体（representamen）：在皮尔斯理论中，再现体是与对象、解释项构成三分符号结构的相互关联物之一。多数情况下，符号被用作再现体的同义词。

第二性（secondness）：皮尔斯所识别的三种宇宙现象范畴之一的名称。另外两种是第一性和第三性。第二性有助于解释逻辑—认知过程，以及符号的形成。第二性是在因果关系、反应关系、对立关系，或邻近关系中，相对于别的某物而考虑某物的范畴。从符号学视角和皮尔斯的符号分类来看，第二性与指示符以及邻近性、因果性密切相关。从逻辑学视角和皮尔斯的议位分类来看，第二性与演绎相关。

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符号伦理学反映了这样一种符号学思想：即恢复符号的“症状学”（或症候学）这一古代职责，其关注焦点是症状。符号伦理学关注的是“对生命的关爱”，不过采取的是总体符号学视角，认为符号活动与生命是一致的。

符号论（semiology）：不可与符号学（semiotics）混淆。英语中 semiology 一词来自法语 sémiologie，是由索绪尔发明的术语。它是对“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符号生命”的研究。符号论排除了“自然”符号以及所有非归约性符号和不参与交流的符号。

符号活动（semiosis）：一种符号过程或符号环境或符号关系。符号活动是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符号学（semiotics）：（1）对符号活动的研究，或关于符号的普通科学。（2）从特定的人类视角看，这个术语强调的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反思符号（即：让符号成为反思对象）的能力。第二个意义上的符号学特指人类的符号活动，或人类符号过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可以描述为"符号动物"。

症状学（semeiotics）：症候学（symptomatology）的另一个术语，是医学中研究症状的一个分支。

符号（sign）：符号可以是索绪尔及其追随者们意义上的二元（能指/所指）符号结构或是皮尔斯意义上的三元（符号或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符号结构中的一个因素。与索绪尔符号论相对照，从皮尔斯符号学视角看，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符号，条件是：通过解释项的解释，该事物在某一方面代表另外一件事物，即其对象；只有该事物能够决定解释项，这个符号便通过对象而间接确定下来了。"在真正的三分结构中，一个符号或再现体是第一项的，它与第二项，即对象相关；这样它就能决定第三项，即它的解释项，假定了解释项和它本身，以及对象在同一个三分关系中是与同一个对象相关的。"（CP 2.274）

表意/意味（signification/significance）：莫里斯区分了表意与意味，因而阐明了"意义"的两个不同方面：符义学意义和价值论意义。"假如我们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许问的是有关'生活'这个术语的意指问题，也许问的是有关生活的价值或意味问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Morris，1964：vii）维尔比（见"表意学"条目）使用"意味"作为她的意义三分结构中的第三个术语，另外两个分别是"感知"（sense）和"意义"（meaning）。

表意学（significs）：维尔比为她的专门研究方法发明的一个新词，用于研究符号的各种形式和关系。这一研究方法超越了价值论研究和关于如何让有意义行为成为可能的纯粹描写论、知识论或逻辑—认识论的界限。

符号/规约符号（symbol）：这是一个多义的术语。术语 symbol 或是 sign 的同义词[例如，在卡西尔那里，symbol 表示符号动物所特有的符号，而对于奥格登和理查兹（Ogden 与 Richards，1923）来说，symbol 代表他的由"符号、思维或指称关系、指称物"语义三角关系中的符号]，或用来表示特定类型的符号。在弗洛伊德那里，就揭示无意识而言，symbol 是表示各种精神活动的符号。对于索绪尔来说，symbol 指的是一种并不完全具有任意性的符号（如同标志司法正义的不同级别一样）。根据阿福林切夫（Averinchev，1971）提供的百科词条"symbol"，巴赫金（Bakhtin，1974）从同一性与异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考虑，将 symbol 描述为一种最需要应答性理解的符号。巴赫金认为，

符号不可能局限于一个直接的语境;相反,它与遥远的语境相关,这便解释了它对异他性的开放性。在我们自己的论述中,我们沿用皮尔斯对该术语的使用——用该术语表示构成其著名的符号三分法的三种特别类型的符号中的一种(另外两种是指示符号和像似符号)。然而,在皮尔斯的描述中,该术语表示一种归约性符号,是习惯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它是一种"由于习惯(我使用这个术语包括自然倾向)的缘故"所导致的符号(CP 4.531)。

第三性(thirdness):皮尔斯所识别的三种宇宙现象范畴之一。另外两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第三性有助于解释逻辑—认知过程,以及符号的形成。从符号学视角和皮尔斯的符号分类来看,第三性与规约符和归约性紧密相关。从逻辑学视角和皮尔斯的议位分类来看,第三性与归纳(即:前提与结论之间基于习惯的推论关系)相关。

参考文献

Abbagnano, Nicola (1971). *Dizionario di filosofia*. Turin: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

Abrahams, Roger D., ed. (1985). *Afro-American Folktales: Stories from Black Traditions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Anders, Gunther (1956 and 1980).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Vols. 1 and 2. Munich: C.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Anderson, Myrdene, and Floyd Merrell (1991a). Grounding Figures and Figuring Grounds. In M. Anderson and F. Merrell, eds., 1991b, 3—16.

——, eds. (1991b). *On Semiotic Modeling* (=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1997).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Apel, Karl-Otto (1981). *Charles S. Peirce: 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Aristotle (1936). *The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rkhurst, Joyce Cooper (1964). *The Adventures of Spider: West African Folktales*. Illustrated by Jerry Pinkney. Boston: Little Brown.

Arriaga Florez, Mercedes,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1995). *Tres miradas sobre Bajtin*. Documentos de trabajo, Centro de Semiótica y teoria del espectáculo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 Asociación Vasca de Semiótica, vol. 64. Valéncia: Eutopías.

Ashby, Ross (1952). *Design of a Brain*. New York: Wiley.

—— (1956).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Augé, Marc (1993). *Non lieux*. Paris: Seuil.

Austin, John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Ed. J.O. Urm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rev. ed. 1975, ed. J.O. Urmson and M. Sbisà.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verinchev, Sergei Sergeevich (1971). Sinvol. In *Kratkaja literaturnaja enciclopedija*, vol. 6, coll. 826—831. Moscow. It. trans. in A. Ponzio and P. Jachia, 1993, 197—207.

Averinchev, Sergei Sergeevich, and Sergei Georgievich Bocharov (1979). 'Notes.' In It. trans. of M. Bakhtin, 1979: 399—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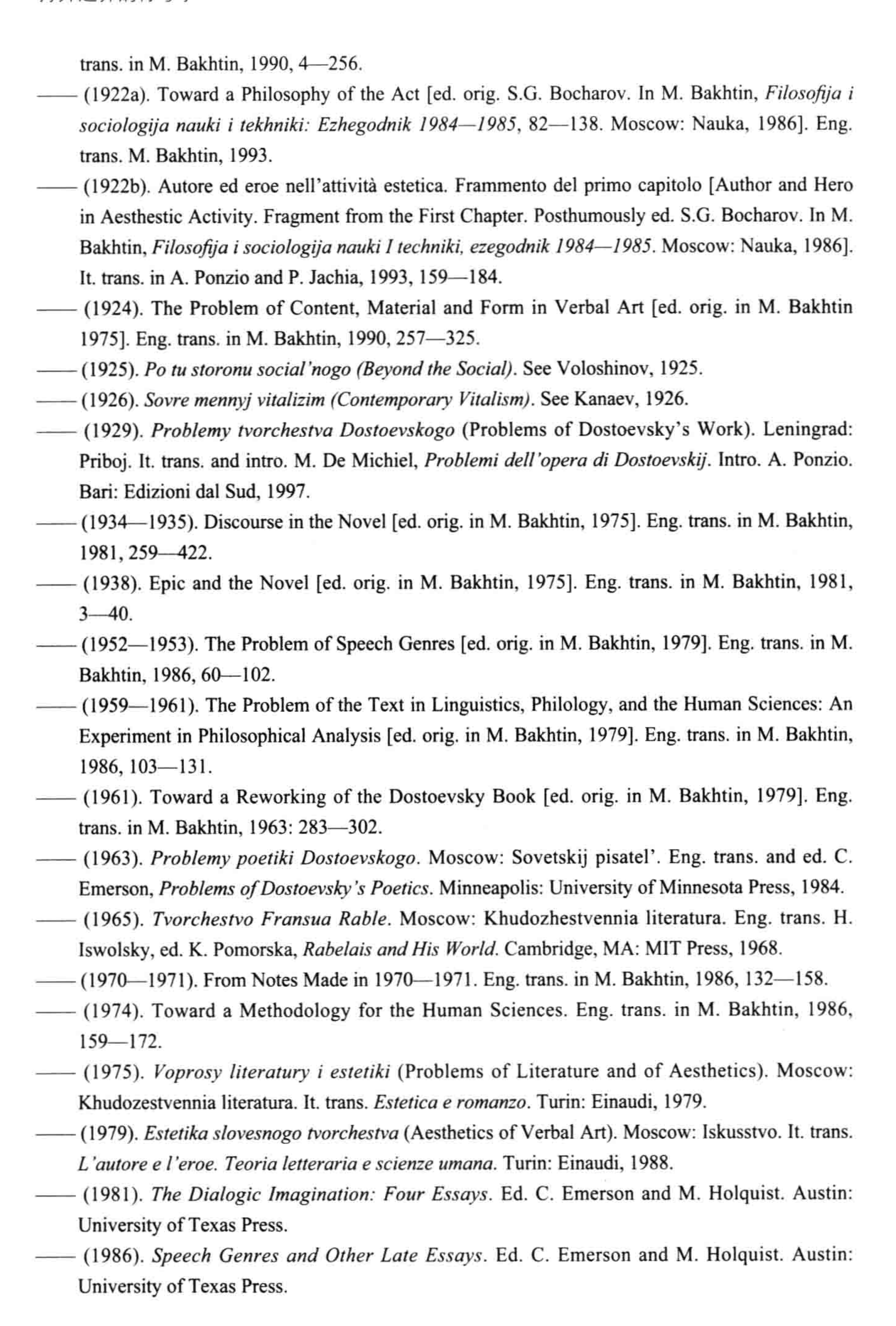
Ayer, Alfred (1968). *The Origins of Pragmatism*. London: Macmillan.

Baer, Eugen (1987). Thomas A. Sebeok's Doctrine of Signs. In *Classics of Semiotics*. Ed. M. Krampen et al., 81—210. New York: Plenum Press.

Bain, Alexander (1859).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London: J. W. Parker and Son.

Bakhtin, Mikhail M. (1919). *Art and Answerability* [ed. orig. M. Bakhtin, 1979].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90, 1—3.

—— (1920—1923). *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stic Activity* [ed. orig. in M. Bakhtin, 1979].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90, 4—256.

—— (1922a).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ed. orig. S.G. Bocharov. In M. Bakhtin, *Filosofija i sociologija nauki i tekhniki: Ezhegodnik 1984—1985*, 82—138. Moscow: Nauka, 1986]. Eng. trans. M. Bakhtin, 1993.

—— (1922b). Autore ed eroe nell'attività estetica. Frammento del primo capitolo [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stic Activity. Fragment from the First Chapter. Posthumously ed. S.G. Bocharov. In M. Bakhtin, *Filosofija i sociologija nauki I techniki, ezegodnik 1984—1985*. Moscow: Nauka, 1986]. It. trans. in A. Ponzio and P. Jachia, 1993, 159—184.

—— (1924). The Problem of Content, Material and Form in Verbal Art [ed. orig. in M. Bakhtin 1975].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90, 257—325.

—— (1925). *Po tu storonu social'nogo (Beyond the Social)*. See Voloshinov, 1925.

—— (1926). *Sovre mennyj vitalizim (Contemporary Vitalism)*. See Kanaev, 1926.

—— (1929). *Problemy tvorchestva Dostoevskogo*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Work). Leningrad: Priboj. It. trans. and intro. M. De Michiel, *Problemi dell'opera di Dostoevskij*. Intro. A. Ponzio. Bari: Edizioni dal Sud, 1997.

—— (1934—1935). Discourse in the Novel [ed. orig. in M. Bakhtin, 1975].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81, 259—422.

—— (1938). Epic and the Novel [ed. orig. in M. Bakhtin, 1975].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81, 3—40.

—— (1952—1953). 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 [ed. orig. in M. Bakhtin, 1979].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86, 60—102.

—— (1959—1961). The Problem of the Text in Linguistics, Philolog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n Experiment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ed. orig. in M. Bakhtin, 1979].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86, 103—131.

—— (1961). Toward a Reworking of the Dostoevsky Book [ed. orig. in M. Bakhtin, 1979].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63: 283—302.

—— (1963). *Problemy poetiki Dostoevskogo*. Moscow: Sovetskij pisatel'. Eng. trans. and ed. C. Emerso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1965). *Tvorchestvo Fransua Rable*. Moscow: Khudozhestvennia literatura. Eng. trans. H. Iswolsky, ed. K. Pomorska, *Rabelais and His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8.

—— (1970—1971). From Notes Made in 1970—1971.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86, 132—158.

—— (1974).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Eng. trans. in M. Bakhtin, 1986, 159—172.

—— (1975). *Voprosy literatury i estetiki* (Problems of Literature and of Aesthetics). Moscow: Khudozestvennia literatura. It. trans. *Estetica e romanzo*. Turin: Einaudi, 1979.

—— (1979). *Estetika slovesnogo tvorchestva* (Aesthetics of Verbal Art). Moscow: Iskusstvo. It. trans. *L'autore e l'eroe. Teoria letteraria e scienze umana*. Turin: Einaudi, 1988.

——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Ed.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90). *Art and Answerability*. Ed. M. Holquist and V. Liapunov.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93 [1920—1924]).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Eng. trans. V. Liapunov, ed. M.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96). *Sochineny* [collected works]. Vol. 5 *(1940—1960)*, ed. S.G. Bocharov and L. A. Gogotishvili. Moscow: Russkie Slovari.

—— (1997). *Hacia una filosofía del acto ético. De los borradores y otros escritos*. Comentarios de Iris M. Zavala y Augusto Ponzio. Sp. trans. T. Bubnova. Barcelona: Anthropos,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San Juan.

—— (1998 [1920—1924]). *Per una filosofia dell'azione responsabile*. Ed. A. Ponzio. Lecce: Manni.

Bakhtin, Mikhail M., Julia Kristeva, and Viaceslav Ivanov (1977). *Semiotica, teoria della letteratura e marxismo* (collection of papers). Ed. A. Ponzio. Bari: Dedalo.

Bakhtin, Mikhail M., Ivan I. Kanaev, Pavel Medvedev, and Valentin N. Voloshinov (1995). *Il percorso bachtiniano fino ai* Problemi dell'opera di Dostoevskij (*1919—1929*). Ed. A. Ponzio, P. Jachia, and M. De Michiel. Bari: Dedalo.

Bakhtin-Medvedev. *See* Medvedev.

Bakhtin-Voloshinov. *See* Voloshinov.

Bakhtin, Nikolaj M. (1995). *Iz zizni idej*. Moscow: Labirint. It. trans. M. de Michiel, ed. A. Ponzio, *La scrittura e l'umano. Saggi, dialoghi, conversazioni*. Bari: Edizioni dal Sud, 1998.

Baldwin, James M., ed. (1901—1905).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3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Barabási, Albert-László (2002).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Plume. 2nd ed. with a new afterword, 2003.

Barsky, Robert F., and Michael Holquist, eds. (1990). *Bakhtin and Otherness. Discours Social/Social Discourse* 3, nos. 1 and 2.

Barthes, Roland (1953). *Le Degré Zero de l'écriture*. Paris: Seuil. Eng. trans. A. Lavers and C. Smith, *Writing Degree Zero*. Pref. Susan Sontag.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7. 9th printing, 1999.

—— (1957). *Mythologies*. Paris: Seuil. Eng. trans. A. Lavers, *Mythologies*. London: Vintage, 2000 (Paladin edition, 1973).

—— (1963). *Sur Racine*. Paris: Seuil.

—— (1964).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 (1966). *Critiques et vérité*. Paris: Seuil.

—— (1967 [1964]). *Elements of Semiology*. Eng. trans. R. Howard. London: Cape.

—— (1970a). *S/Z*. Paris: Seuil. Eng. trans. R. Miller, *S/Z. An Essay*. Pref. R.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 (1970b). *L'Empire de signes*. Geneva: Skira.

—— (1971). *Sade, Fourier, Loyola*. Paris: Seuil. Eng. trans. R. Miller, *Sade, Fourier, Loyola*.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973). *Le Plaisir du texte*. Paris: Seuil. Eng. trans. R. Miller,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With a Note on the Text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 (1975). *Roland Barthes*. Paris: Seuil.
—— (1977a). *Leçon*. Paris: Seuil.
—— (1977b). *Image-Music-Text*. Essay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London: Fontana Press.
—— (1977c). *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 Paris: Seuil. Eng. trans. R. Howard, *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 London: Vintage, 2002.
—— (1980). *La Chambre claire*. Paris: Seuil.
—— (1982). *L'Obvie et l'obtus.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Eng. trans. R. Howard,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Critical Essays on Music, Art and Critical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2). *OEuvres complètes*. Vols. 1—5. Ed. éric Marty. Paris: Seuil.
Bataille, Georges (1970). La Notion de dépense.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 302—320. Paris: Gallimard.
—— (2001 [1954]). *Eroticisim*. Eng. trans. M. Dalwood, Intro. C. MacCabe. London: Penguin.
Bateson, Gregory (1951). Information and Codification: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I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 Ed. J. Ruesch and G. Bateson, 168—211. New York: Norton.
——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antine Books.
Baudrillard, Jean (1972).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aris: Gallimard. Eng. trans. C. Levi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gn*. St. Luis: Telos.
Benjamin, Walter (1931). Der destruktive Charakter.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 Tiedermann und H. Schweppenhäuser, vol. IV. Frankfurt/M 1972. It. trans., 'Il carattere distruttivo.' In W. Benjamin et al., 1995. Eng. trans., 'The Destructive Character.' In Benjamin, 1986b, 301—303.
—— (1933). Erfahrung and Armu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 Tiedermann and H. Schweppenhäuser. Vol. II, 1, 213—219. Frankfurt/M 1977. It. trans., 'Esperienza e povertà.' In W. Benjamin et al., 1995, 15—21.
—— (1963).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 (1980). *Moskauer Tagebuch*. Pref. G. Scholem, ed. G. Smit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 (1986a). *Illuminations: Walter Benjamin: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and Intro. 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edition, 1978).
—— (1986b). *Reflections: Walter Benjamin: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Ed. and Intro. P. Demetz. New York: Schocke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edition, 1978).
—— (1999).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1927—1934*. Ed. M.W. Jennings, H. Eiland, and P.G. Smith. Eng. trans. R.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 Walter, et al. (1995). *Il carattere distruttivo*. Millepiani 4. Milan: Mimesis.
Bennett, John (1908). Gullah, a Negro Patois.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October 1908, Part I: 332—347, and Part II: 39—52.
Bentley, Arthur F. (1945a). On a Certain Vagueness in Logic, I. *Journal of Philosophy* 42: 6—27.
—— (1945b). On a Certain Vagueness in Logic, II. *Journal of Philosophy* 42: 39—51.
Benveniste, Emile (1971). *Problem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Eng. trans. M.E. Meek.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Bernard, Jeff (1997). Thomas A. Sebeok und die Zeichen des Lebens. In *Jenseits von Kunst*. Ed. P. Weibel. Vienna: Passagen Verlag.
Bernard, Jeff, et al., eds. (1991). Dialectics, Semiotics, Materialism. In *Memoriam Ferruccio Rossi-Landi. S.-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3: 1—2.
—— (1994). *Reading on Ferruccio Rossi-Landi*.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Bernard, Jeff, Peter Grzybek, and Gloria Withalm (2000). *Modelling History and Culture*. 2 vols. *Angewandte Semiotik*. Special Issues 16/17. Vienna: ÖGS.
Bernstein, Richard J. (1983). *Beyond Objectivity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eynon, John, and David Dunkerley, eds. (2000). *Globalization: The Reader*. London: Athlone Press.
Blachère, J.-Cl. (1993). *Négritures. Les écrivains d'Afrique noire et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l'Harmattan.
Black, Max (1937). Vagueness, an Exercise in Logical Analysis. *Philosophy of Science* 6: 427—455.
Blackburn, Simon (1984). *Spreading the Word: Groun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Blanchot, Maurice (1949). La Littérature et le droit à la mort. In *La Part du feu*. Paris: Gallimard, 1949.
—— (1955). *L'éspace littéraraire*. Paris: Gallimard.
—— (1959). *Le Livre à venir*. Paris: Gallimard.
—— (1969). *L'Entretien infini*. Paris: Gallimard.
—— (1980).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Paris: Gallimard. Eng. trans. A. Smock,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Allen & Unwin. New ed., 1939.
—— (1974). *Linguistic Aspects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ntro.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Blumenberg, Hans (1981). *Die Lesbarkeit der Wel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Bocharov, Sergei Georgievich (1993). à propos d'une conversation et autour d'elle. In Depretto, 1997. Orig. ed. in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1993, 2.
Bonfantini, A. Massimo (1984). *Semiotica ai media*. Bari: Adriatica. New ed., 2004.
—— (1987). *La semiosi e l'abduzione*. Milan: Bompiani.
—— (1993). Semiosis of Projectual Invention. In Bonfantini and Martone, 1993, 328—329.
Bonfantini, Massimo A., and Christian J.W. Kloesel, eds. (1988). *Peirceana. Versus* 49.
—— (1990). *Peirceana* 2. *Versus* 55—56.
Bonfantini, Massimo A., and Arturo Martone, eds. (1993). *Peirce in Italia*. Naples: Liguori.
Bonfantini, Massimo A., and Augusto Ponzio (1986). *Dialogo sui dialoghi*. Ravenna: Longo.
Bonfantini, Massimo A., Augusto Ponzio, and Susan Petrilli (1996). *I tre dialoghi della menzogna e della verità*.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Bonfantini, Massimo A., and Giampaolo Proni (1980). To Guess or Not to Guess? *Scienze Umane* 4: 249—266.
Boole, Mary Everest (1931a). *Collected Works*. Ed. E.M. Cobham, Pref. E.S. Dummer, 4 vols.

London: C.W. Daniel.
—— (1931b [1905]). *Logic Taught by Love: Rhythm in Nature and in Education* (1890). In M.E. Boole, 1931a, vol. 2, 399—515.
—— (1931c [1909]). *Symbolic Methods of Study* (1884). In M. E. Boole, 1931a, vol. 1, 239—333.
—— (1931d [1910]). *The Forging of Passion into Power*. In M. E. Boole, 1931a, vol. 4, 1337—1413.
Booth, Wayne C. (1988).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sco, Nynfa (1959). *La filosofia pragmatica di Charles S. Peirce*. Turin: Edizioni di Filosofia.
—— (1977). *Dalla scienza alla metafisica. Studio sul pragmatismo di C.S. Peirce*. Turin: Giappichelli.
Bouissac, Paul, ed. (1998). *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issac, Paul, Michael Herzfeld, and Roland Posner (1986). *Iconicity: Essays on Nature and Culture: Festschift for Thomas A. Sebeok on the His 65th Birthday*. Tübingen: Stauffenburg.
Bradley, Francis Herbert (1958 [1883]). *Principles of Log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éal, Michel (1897). *Essai de sémantique. Science des significations*. Paris: Hachette. Eng. trans. H. Cust, Pref. J.P. Postgate, *Semantics: 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 London: Henry Holt, 1900. New ed. 1964,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 Whatmough.
—— (1898). The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 *Popular Scientific Monthly* 52: 832—837.
Brent, Joseph (1993 [1960]). *Charles Sanders Peirce: A Lif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røndal, Viggo (1950). *Théorie des prepositions*. Copenhagen: Munksgaard.
Brookes, Stella Brewer (1950). *Joel Chandler Harris-Folkloris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Buber, Martin (1947). *Dialogisches Leben*. Zurich: Gregor Müller.
Bühler, Karl (1934). *Sprachtheorie: Die Darstellung-funktion der Sprache*.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Eng. trans. D. Fraser Goodwin, *Theory of Language: 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s of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ulbeck, Chilla (1998). *Reorienting Western Femmi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yssens, Eric (1943). *Les Langages et le discours*. Brussels: Office de Publicité.
—— (1967). *La Communication et l'articulation linguistique*. Paris and Brussels: P. U. F.
Calabrese, Omar, and Egidio Mucci (1975). *Guida alla semiotica*. Florence: Sansoni.
Calderoni, Mario (1906). *Disarmonie economiche e disarmonie morali*. Florence: Lumachi.
Calvino, Italo (1986). *The Uses of Literature*. Eng. trans. P. Creagh. London: A Harvest Book, Harcourt Brace.
—— (1988). *Lezioni americane*. Milan: Garzanti.
Capozzi, Rocco, ed. (1997). *Reading Eco: An Anthology*. Foreword by T.A. Sebeo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aputo, Cosimo,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eds. (1998). *Basi. Significare, inventare, dialogare*. Lecce: Piero Manni.
Carnap, Rudolf (1939). *Foundations of Logic and Mathe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39). *Foundations of Logic and Mathe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5). On Some Concepts of Pragmatics. *Philosophical Studies* 6: 89—91.
Cassirer, Ernst (1923—1929).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vols. 1—3. Berlin: Cassirer. Eng. trans. by R. Manheim,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3 vol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38). Zur Logik des Symbolbegrifs. *Theoria* 4: 145—175.

—— (1944). *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46). *Language and Myth*. Eng. trans. S.K. Lange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Chesterman, Andrew (1996). On Similarity. *Target* 8(1): 159—164.

Chomsky, Noam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 (1959). Review of B.F. Skinner 1957. *Language* 35: 26—58.

—— (1964).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The Hague: Mouton.

—— (1965). *Aspects of a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66). *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68).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1980).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Amsterdam: Foris.

——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Praeger.

——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1). *Deterring Democracy*. London: Verso.

—— (1993). *Year 501: The Conquest Continu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1995a).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5b). *La sociedad global*. Mexico: Ed. Joaquín Mortiz.

—— (1996). *Powers and Prospects*. London: Pluto Press.

—— (1999). *Acts of Aggression: Power, Media, Control*.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 (2000a). *The Chomsky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 (2000b).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 (2000c).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2002a). *September 11*. Crows Nest, NSW: Allen Unwin.

—— (2002b). *Understanding Power: The Indispensable Chomsky*. Ed. P.R. Mitchell and J. Schoeffel. Melbourne: Scribe.

—— (2003). *Power and Terror: Post-9/11 Talks and Interview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Chomsky, Noam, and Michel Foucault (1974). *Human Nature: Justice versus Power*. London: Souvenir.

Clark, Katerina, and Michael Holquist (1984). *Mikhail Bakht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William Kindgon (1879). *Lectures and Essays by the Late William Kingdon*. Ed. L. Stephen and L. Pollock. London: Macmillan.

Cobley, Paul (2000). *The American Thriller: Generic Innov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1970s*. New York: Palgrave.

—— ,ed. (2001).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obley, Paul, and Litza Jansz (1997). *Introducing Semiot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Icon and Totem.

Cohen, Robin, and Shirin M. Rai (2000).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Athlone.

Colapietro, Vincent (1989). *Peirce's Approach to the Self*. Alban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olapietro, Vincent M., and Thomas M. Olshewsky, eds. (1996). *Peirce's Doctrine of Signs: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Connection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ollier-Harris, Julia (1918).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el Chandler Harri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lloque de Cerisy (2000). *Au nom du Sens. Autour de l'oeuvre d'Umberto Eco*. Paris: Grasset.

Corona, Franco, ed. (1986). *Bachtin teorico del dialogo*. Milan: Franco Angeli.

Cortelazzo Michele, A., et al. (1976). *La lingua italiana e il fascismo*. Bologna: Consorzio Provinciale Pubblica Lettura.

Corvino, Francesco et al. (1983). *Linguistica medievale*. Bari: Adriatica.

Courlander, Harold (1957a). *The Hat-Shaking Dance and Other Ashanti Tales from Ghan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1957b). *Terrapin's Pot of Sense*. New York: Henry Holt.

—— (1962). *The King's Drum and Other African St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urlander, Harold, and George Herzog (1947). *The Cow-Tail Switch and Other West African Stories*. New York: Henry Holt.

Cumings, Bruce (1992). *War and Television*. London: Verso.

Cust, Henry (Nina). (1928). *Wanderers: Episodes from the Travels of Lady Emmeline Stewart-Wortley and Her Daughter Victoria, 1849—1855*. London: Jonathan Cape.

—— ,ed. (1929). *Echoes of Larger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London: Jonathan Cape.

—— ,ed. (1931). *Other Dimensions: A Selection from 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London: Jonathan Cape.

Danesi, Marcel (1993). *Vico, Metaphor,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5). *Giambattista Vico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Enterprise*. New York: Peter Lang.

—— (1998). *The Body in the Sign: Thomas A. Sebeok and Semiotics*. Toronto: Legas.

—— (2000). *Metafora, lingua, concetto. Vico e la linguistica cognitiva*. Intro. A. Ponzio. Bari: Edizioni dal Sud.

Darwin, Charles (1998 [1859]). *The Origin of Species*. Ed., intro., and notes G. Be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ely, John (1990). *Basics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4). *The Human Use of Signs, or Elements of Anthroposemiosi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ed. (1995). *Thomas A. Sebeok: Bibliography: 1942—1995*. Bloomington, IN: Eurolingua.

—— (1998). Thomas A. Sebeok. In *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 Ed. P. Bouissa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2002). *What Distinguishes Human Understanding*?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Deely, John, and Susan Petrilli, eds. (1993). *Semio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yond: Problems,*

People, and Perspectives.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97(3/4).

Deledalle, Gérard (1971). *Le Pragmatisme.* Paris and Montreal: Bordas.

—— (1983). *La Philosophie américaine.* Lausanne: L'Age d'homme.

—— (1987). *Charles Peirce: Phénomenologue et sémioticie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Eng. trans. S. Petrilli, *Charles Peirc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0.

—— (2000). *Charles S. Peirce's Philosophy of Signs: Essays in Comparative Sig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1999). *A Thousand Plateaus*. London: Athlone.

Delors, Jacques (1994). *Libro bianco. Crescita, competività, occupazione*. Milan: Il Saggiatore.

Depretto, Catherine, ed. (1997). *L'Héritage de Mikhaïl Bakhtine*. Bordeau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Derrida, Jacques (1967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Minuit. Eng. trans. G. C. Spivak,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967b).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Seuil. Eng. trans. A. Bas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1981). *Positions*. Eng. trans. A. Bas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7). *Psyché. Inventions de l'autre*. Paris: Galilée.

—— (1988). *Mémoires de Paul Man*. Paris: Galilée.

—— (1999—2000). Che cos'è una traduzione rilevante? It. trans. J. Ponzio [from unpublished paper.] *La traduzione*, ed. S. Petrilli,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10(2): 25—68.

Dewey, John (1938).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 Henry Holt.

—— (1939). Theory of Valuation. In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crot, Oswald (1972). *Le Dire et le dit*. Paris: Minuit.

Dyke, Charles (1988). *The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Complex Systems: A Study in Biosocial Complex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gleton, Terry (1991). *Ideology*. London: Verso.

Eco, Umberto (1962). *Opera aperta*. Milan: Bompiani. Partial Eng. trans. A. Cancogni. *The Open Wor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963). *Diario minimo*. Milan: Mondadori. Partial Eng. trans. W. Weaver, *Misreadings*. London: Harcourt Brace, 1993.

—— (1968). *La struttura assente*. Milan: Bompiani.

—— (1971). *Le forme del contenuto*. Milan: Bompiani.

—— (1973). *Segno*. Milan: ISEDI.

—— (1975). *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 Milan: Bompiani. Eng. trans.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978). Codice. In *Enciclopedia*. Vol. 3: 243—281. Turin: Einaudi.

—— (1979). *Lector in fabula*. Milan: Bompiani. Eng. trans.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981a). Segno. In *Enciclopedia*, vol. 12, 628—688. Turin: Einaudi.

—— (1981b). Guessing: From Aristotle to Sherlock Holmes. *Versus* 30: 3—19.

—— (1984). *Semiotica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Turin: Einaudi. Eng. trans. *Semio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Macmillan, 1984.
—— (1985). *Sugli specchi e altri saggi*. Milan: Bompiani.
—— (1986).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Eng. trans. W. Weaver.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89). 'Whatever Lola wants.' Rilettura di una rilettura. A proposito di Rossi-Landi, *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une*. In A. Ponzio, 1989, 291—308.
—— (1990). *I limiti dell'interpretazione*. Milan: Bompiani. Eng. trans.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991). Pensare la guerra. *La rivista di libri* 1.
—— (1993). *La ricerca della lingua perfetta*. Rome and Bari: Laterza. Eng. trans. J. Fentress.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1995.
—— (1994).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a). *Kant e l'ornitorinco*. Milan: Bompiani. Eng. trans. A. McEwen. *Kant and the Platypus*. New York: Harcourt, 1999.
—— (1997b). *Cinque scritti morali*. Milan: Bompiani. Eng. trans. A. McEwen. London: Harcourt, 2001.
—— (2001).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 Eng. trans. A. McEwe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2003). *Dire quasi la stessa cosa*. Milan: Bompiani.
—— ,et al. (1992).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Ed. S. Colli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co, Umberto, Claude Gandelman, and Julia Kristeva et al. (1993). Migrazioni.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Special Issue 4.
Eco, Umberto, and Thomas A. Sebeok, eds. (1983). *Il segno dei tre*. Milan: Bompiani. *The Sign of Three: Dupin, Holmes, Peir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dward, G., and Richard S. Robin, eds. (1964).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Second Seri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Emerson, Caryl (1997).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merson, Ralph Waldo (1844). The Poet. In *Selected Essays*. Ed. L. Ziff. London: Penguin, 1982.
Empson, William (1995 [1930]).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London: Penguin, in association with Chatto & Windus.
Engel-Tiercelin, Claudine (1992). Vagueness and the Unity of C.S. Peirce's Realism. *Transactions of the C.S. Peirce Society* 28(1): 51—82.
Engels, Friedrich (1940). *Dialectics of Natu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Erlich, Victor (1964). *Russian Formalism*. The Hague: Mouton.
Eschbach, Achim, ed. (1981). *Zeichen über Zeichen über Zeichen*. Tübingen: Gunter Narr.
European Commission (1994). *Libro bianco. Crescita, competitività, occupazione*. See Delors, 1994.
—— (1995a). *Libro bianco su istruzione e formazione. Insegnare e apprendere. Verso la società conoscitiva*, typescript.
—— (1995b). *Libro verde sull'innovazione*, typescript.

—— (1996). *Libro verde. Istruzione, formazione, ricerca. Gli ostacoli alla mobilità transnazionale*, typescript.

European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in Social Sciences (1990). *L'Acte final d'Helsinki*. Wilhelmsfeld: Gottfried Egert Verlag.

Evans, Jonathan D., ed. (1987). *Semiotica mediaevalia.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63(1/2).

Evans-Prichard, Edward, ed. (1976). *The Zande Tricks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nn, Kuang T. (1970). *Peirce's Theory of Ab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Fano, Giorgio (1972). *Origini e natura del linguaggio*. Turin: Einaudi. Eng.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Feyerabend, Paul K. (1975). *Against Method*. London: NLB.

Fisch, Max H. (1978). Peirce's General Theory of Signs. In *Sight, Sound, and Sense*. Ed. T.A. Sebeok, 31—7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6). *Peirce, Semeiotic, and Pragmatism*. Ed. K. L. Ketner and C. J. W. Kloes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o, Dario (1975). *Attento te ...! Il teatro politico di Dario Fo*. Ed. L. Binni. Verona: Bertani.

—— (1977). *Mistero buffo*. Milan: Mazzotta.

Foucault, Michel (1970). *L'Ordre du discours*. It. trans. A. Fontana, *L'ordine del discorso*. Turin: Einaudi, 1972.

——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Eng. trans. S. Smith. London: Tavistock.

—— (1977). *Power/Knowledge*.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1994). *Dits et écrits*. Paris: Gallimard.

—— (1997).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Seuil-Gallimard.

Foucault, Michel, et al. (1996). *Biopolitica e territorio*. *Millepiani* 9. Milan: Mimesis.

Frazer, James George (1951).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1922). New York: Macmillan.

Freud, Sigmund (1899). *Die Traumdeutung*. Leipzig and Vienna: Verlag Franz Deuticke. It. trans. ed. G.L. Musatti, *L'interpretazione dei sogni*. In S. Freud, *Opere*. Vol. 5. Turin: Boringhieri, 1980.

—— (1953—1974).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Hogarth.

Frisch, Karl von (1962). Dialects in the Language of Bees. *Scientific American* 207: 79—87.

—— (1967). *The Dance Language and Orientation of Bees*. Cambridge, MA: Belknap.

—— (1974). *Animal Archite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Gadamer, Hans-Georg (1975). *Truth and Metho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0). Practical Philosophy as a Model of the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9: 74—85.

Garroni, Emilio (1977). *Ricognizione della semiotica*. Rome: Officina.

Gellner, Ernest (1997). *Nationalism*. London: Phoenix.

Gerbner, George (2002). *Against the Mainstream*. Ed. M. Morgan. New York: Peter Lang.

Gerbner, George, Everette E. Dennis, and Yassen N. Zassourky, eds. (1991). *Beyond the Cold War*.

Newbury Park, CA: Sage.

Gerbner, George, and Larry P. Gross, eds. (1973).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Wiley.

Gerbner, George, Michael Morgan, and Jim Shanahan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bner, George, Hamid Mowlana, and Kaarle Nordenstreng (1993). *Global Media Debate*. Norwood, NJ: Ablex.

Gerbner, George, Hamid Mowlana, and Herbert I. Schiller, eds. (1992). *Triumph of the Image*. Boulder, CO: Westview.

—— ,eds. (1996). *Invisible Crisis*. Boulder, CO: Westview.

Gerbner, George, and Nancy Snow (2000). *Future Media*. New York: Seven Stories.

Geyer, Felix, and J. Van der Zouwen (1990). *Self-Referencing in Social Systems*. Salinas, CA: Intersystem Publications.

Gibbins, Peter (1987). *Particles and Paradoxes: The Limits of Quantum Log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del, Robert (1957). *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 Geneva and Paris: Droz-Minard.

Goffman, Erving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oodman, Nelson (1965).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 (1976). *The Languages of Art*.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Gordon, Terrence W. (1990a). Significs and C. K. Ogden: The Influence of Lady Welby. In H.W. Schmitz, ed., 1990, 179—186.

—— (1990b). *C.K. Ogden: A Bio-bibliographic Study*. London: Scarecrow.

—— (1991). The Semiotics of C.K. Ogden. I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History: The Semiotic Web 1990*. Ed. T.A. Sebeok and J. Umiker-Sebeok, 111—177. The Hague: Mouton de Gruyter.

Gorlée, Dinda L. (1990). Degeneracy: A Reading of Peirce's Writing. *Semiotica* 81(1/2): 71—92.

—— (1992). Symbolic Argument and Beyond: A Peircean View on Structuralist Reasoning. *Poetics Today* 13(3): 407—423.

—— (1994).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12].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Gorz, André (1988). *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 Paris: Galilée.

Goudge, Thomas (1950). *The Thought of C.S. Peir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Gould, Stephen J., and Elizabeth Vrba (1982). Exaptation. *Palebiology* 8(1): 14—15.

Gramsci, Antonio (1975). *Quaderni dal carcere*. Turin: Einaudi.

Green Book On Innovation, 1995.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Greenlee, Douglas (1973). *Peirce's Concept of Sign*. The Hague: Mouton.

Greenstein, George (1988). *The Symbolic Universe: Life and Mind in the Cosmos*. New York: Morrow.

Greimas, Algirdas, J. (1987). *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 Eng. trans. and ed. P. Perron and F. Colli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rice, Paul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uissou, Basile (1995). *Burkina Faso. Un espoir en Afrique*. Paris: Harmattan.

Habermas, Jurgen (1967). *Zur Logik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Mokr.

Hagège, Claude (1985). *L'homme de paroles*. Paris: Fayard.

Hall, Edward T. (1959). *The Silent Language*. New York: Doubleday.

Halliday, Michael, (198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wick, Charles S., ed. (in collab. with J. Cook) (1977). *Semiotic and Signific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arles S. Peirce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Intro., ix—xxxiv.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James F. (1992). *Against Relativism: A Philosophical Defense of Method*. LaSalle, IL: Open Court.

Harris, Joel Chandler (1880a). *Uncle Remus: His Songs and His Sayings*. Illustrations by F.S. Church and H. Moser. New York: Appleton.

—— (1880b). *Uncle Remus*. With 79 Illustrations by A.B. Frost, Intro. S. Brewer Brookes. New York: Schocken. New ed., 1965.

—— (1892). *Uncle Remus and His Friends*. Illustrations by A.B. Fro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983). *The Complete Tales of Uncle Remus*. Compiled by R. Chase, Illustrations by A. B. Frost, J. M. Conde, F.S. Church, E.W. Kemble, and W.H. Bea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usman, Carl R. (1989). *Metaphor and Art: Interactionism and Reference in the Verbal and Nonverbal Art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Charles S. Peirce's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wkins, Gay, and Stephen Muecke, eds. (2003). *Culture and Waste: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Hediger, Heini (1968).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Animals in Zoos and Circuses*. New York: Dover.

—— (1980). *Tiere verstehen: Erkentnisse eines Tierpsychologen*. Munich: Kindler.

Heidegger, Martin (1927). *Being and Time*. Eng. trans. J. Macquarrie and E.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Heijerman, Eric, and Walter H. Schmitz, eds. (1991). *Significs, Mathematics and Semiotics: The Significs Movement in the Netherland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onn, 19—21 November 1986. Monaco: Nodus Publikationen.

Hermans, Theo, ed. (1985a).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 (1985b).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In Th. Hermans, 1985a, 7—15.

Hinde, Robert, ed. (1972).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jelmslev, Louis (1953).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Baltimore, MD: Waverly.

Hoffmeyer, Jesper (1996). *Signs of Meaning in the Univers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offmeyer, Jesper, and Claus Emmeche, eds. (1999). *Biosemiotica I.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127(1/4).

Holquist, Michael (1990).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oopes, James, ed. (1991). *Peirce on Sign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1969 [1942—1944]).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Horn, Robert E. (1983). *Trialectics: Toward a Practical Logic of Unity*. Lexington, MA: Information Resources.

Husserl, Edmund (1890). *Zur Logik der Zeichen (Semiotik)*. In *Husserliana*, vol. 12. The Hague: Nijhoff, 1970.

—— (1900—1901).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vols. 1—2. Tübingen: Niemeyer. Eng. trans. J.N. Finlay, *Log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0.

—— (1929).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The Hague: Martin Nijhoff. Eng. trans. D. Cairns, *Cartesian Meditations*. The Hague: Martin Nijhoff, 1960.

—— (1948). *Erfarung und Urteil*. Ed. L. Landgrebe, Prague: Akademia. New ed.,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0. Eng. trans. J.S. Churchill and K. Ameriks,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Investigations in a Geneology of Logic*. Rev. and ed. by L. Landgrebe, Intro. J. S. Churchill, Afterword by Lothar Ele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954 [1936—1937]).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d. W. Biemel. The Hague: Nijhoff. Eng. trans. D. Carr,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964). *The Phenomenology of Internal Time-Consciousness*. Ed. M. Heidegger. Eng. trans. J. S. Churchil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deologie (1967—1972). *See* Rossi-Landi 1967—1972.

Instituto de investicaciones humanisticas Universidad V Veracruzana, ed. (1992). *Semiosis* 26—29, número dedicado a Thomas A. Sebeok por sus 70 años.

Irele, Abiola F. (1977). *The African Experience in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1990.

Ivanov, Vjacheslav V. (1973). Significato delle idee di Bachtin sul segno, l'atto di parola e il dialogo per la semiotica contemporanea. In M. Bakhtin, J. Kristeva, and I. Vjacheslav, 1977, 67—104.

Jacob, François (1974). *The Logic of Living Systems: A History of Heredity*. London: Allen Lane.

Jakobson, Roman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tyle in Language*. Ed. T.A. Sebeok, 350—37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63).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Minuit.

—— (1971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260—266. The Hague: Mou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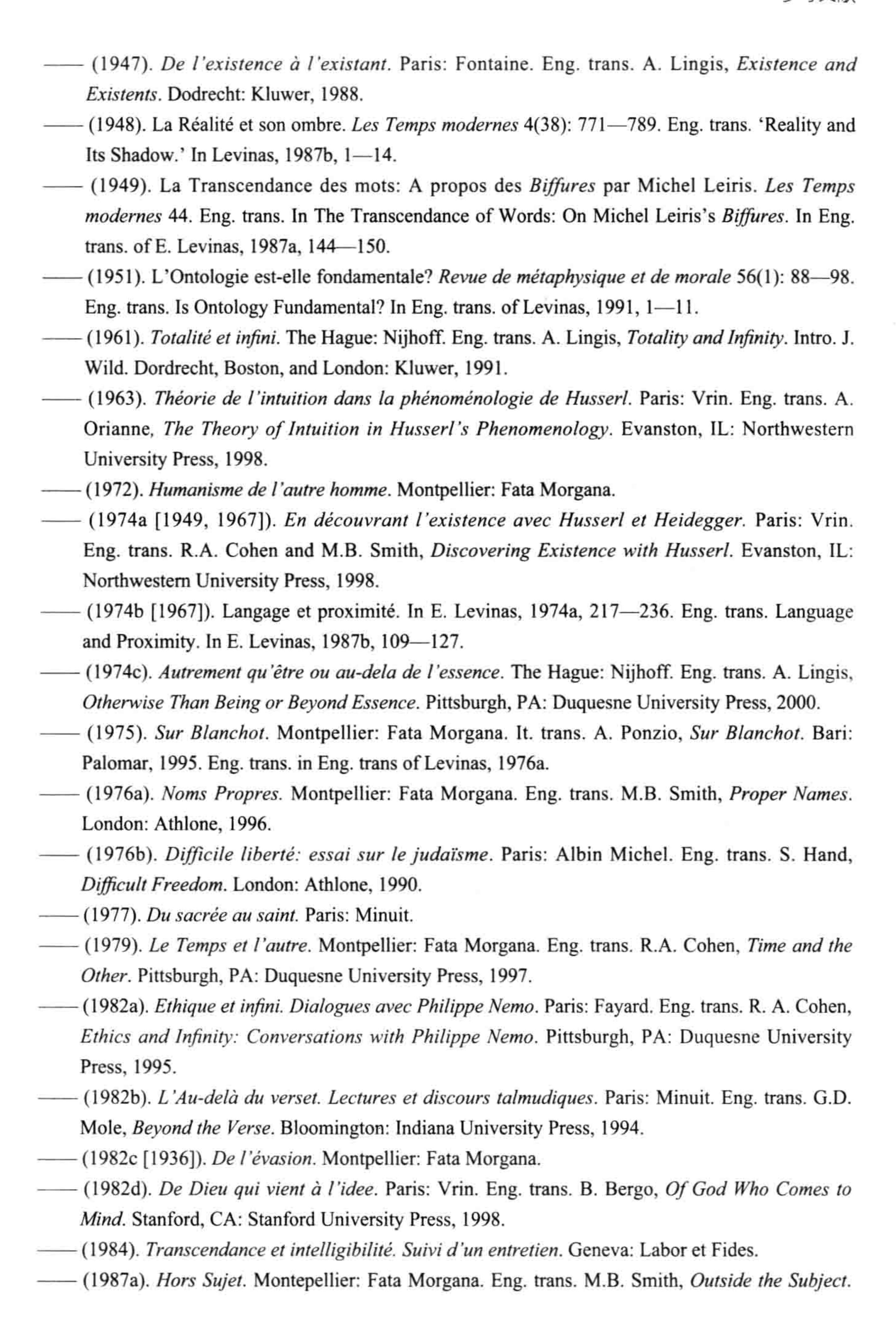
—— (1975). Coup d'oeil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sémiotique. *Studies in Semiotics* 3. The Hague: Mouton.

—— (1977). Préface a Mikhail Bakhtine. In V.N. Voloshinov, *Le Marxisme et la philosphie du langage*. Fr. trans. of Voloshinov, 1929, 7—8. Paris: Minuit.

—— (1987). *Language in Literature*. Eds. K. Pomorska and S. Rud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On Language*. Ed. L.R. Waugh and M. Burst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William (1897).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New York: Dover.
—— (1975—1988).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Ed. F.H. Burkhardt and F. Bow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981 [1907]). *Pragmatism*.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Jameson, Fredric (2002).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1992.
Jaquith, Priscilla (1981). *Bo Rabbit Smart for True: Folktales from the Gullah*. New York: Philomel.
Jeudy, Henri P., Adam Schaff, Serge Latouche, Ferruccio Rossi-Landi, and Augusto Ponzio (1975). *Linguística, sociedade e politica*. Lisbon: Edições 70.
Johansen, Jørgen Dines (1993). *Dialogic Semiosis: An Essay on Signs and Mean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6). Iconicity in Literature. *Semiotica* 10(1/2): 37—55.
Jung, Carl G. (1956).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Trickster Figure. In *The Trickster: A Study in American Indian Mythology*. Ed. P. Rad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Kaboré, Oger (1993). *Les oiseaux s'ébattent. Chansons enfantines au Burkina-Faso*. Intro. G. Calame-Griaule. Paris: Harmattan.
Kampis, George (1991). *Self-Modifying Systems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New Framework for Dynamics, Information, and Complexity*. Oxford: Pergamon.
Kanaev, Ivanov I. (1926). Sovremennyj vitalizim. *Chelovek i prioda* 1: 33—42; 2: 9—23. New ed. in *Dialog, Karnaval, Chronotop* 4: 99—115. It. trans. 'Il vitalismo contemporaneo. In M. Bakhtin et al. 1995, 175—198.
Kerényi, Károly (1956). The Trickster in Relation to Greek Mythology. In *The Trickster: A Study in American Indian Mythology*. Ed. P. Rad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Kimmel, Eric A. (1988). *Anansi and the Moss-Covered Rock*. Illustrated by J. Stevens. New York: Holiday House.
—— (1992). *Anansi Goes Fishing*. Illustrated by J. Stevens. New York: Holiday House.
—— (1994). *Anansi and the Talking Melon*. Illustrated by J. Stevens. New York: Holiday House.
Korsch, Karl (1971). *Karl Marx*. Paris: Champ.
Kosko, Bart (1993). *Fuzzy Thinking*. New York: Hyperion.
Kovala, Urpo (1996). Translations, Paratextual Mediation, and Ideological Closure. *Target* 8 (1): 119—147.
Krampen, Martin (1981). Phytosemiotics. *Semiotica* 36: 187—209.
Kristeva, Julia (1969a). *Semeiotikè. Recherche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Seuil.
—— (1969b). La Sémiotique, science critique et/ou critique de la science. In J. Kristeva, 1969a, 34—40.
—— (1970). Une Poétique ruiné. Présentation à la tr. fr. de Bakhtine. In *La Poétique de Dostoïevski*. Paris: Seuil.
—— (1974).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Paris: Seuil. Eng. trans. M. Waller,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980) *Pouvoir de l'horreur: essais sur l'abiection*. Paris: Seuil. Eng. trans. L. S. Roudiez,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1).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Eng. trans. T. Gora, A. Jardine, and L. S. Roudiez. Oxford: Blackwell.
—— (1982 [1969]). *Le Langage, cet inconnu*. Paris: Seuil. It. trans. A. Ponzio, *Il linguaggio, questo sconosciuto. Con un'intervista di A. Ponzio a J. Kristeva*. Bari: Adriatica, 1992.
—— (1983). *Histoires d'amour*. Paris: Denoël. Eng. trans. L.S. Roudiez, *Tales of Lo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987). *Soleil noir. Depression et mélancolie*. Paris: Gallimard.
—— (1988). *étrangers à nous mêm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Eng. trans. L. S. Roudiez, *Strangers to Oursel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994). *Le Temps sensible. Proust et l'expérience littéraire*. Paris: Gallimard.
—— (1999) *Le Génie féminine*. Tome premier. *Hannah Arendt*. Paris: Fayard.
Krysinski, Wladimir (1984). Bakhtine et la question de l'ideologie. *Études Françaises* 20: 21—36.
—— (1998). *La novela en sus modernidades. A favor y en contra de Bajtin*. Madrid: Iberoamericana.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ndera, Milan (1986). *L'Art du roman*. Paris: Gallimard. Eng. trans. L. Asher, *The Art of the Novel*.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New revised ed., 1999.
Lacan, Jacques (1966). *Ecrits*. Paris: Seuil.
Lackey, Douglas, ed. (1973). *Bertrand Russell: Essays in Analysis*. London: Allen & Unwin.
Lakoff, George, and Johnson Mark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e, Eric, ed. (1993). *Telling Tales: New One-Act Plays*. London: Penguin.
Langer, Susanne K. (1927). The Logical Study of Verbs. *Journal of Philosophy* 24: 120—129.
—— (1942).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szlo, Ervin (1995). *The Interconnected Univers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disciplinary Unified Theor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ers.
Lee Bacchi, Carol (1999). *Women, Policy and Poli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y Problems*. London: Sage.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enneberg, Eric H. (1967).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ew York: Wiley.
Lester, Julius (1987). *The Tales of Uncle Remus: The Adventures of Brer Rabbit*. Vol. 1. New York: Dial.
—— (1988). *More Tales of Uncle Remus: Further Adventures of Brer Rabbit, His Friends, Enemies, and Others*. Vol. 2. Illustrated by J. Pinkey. New York: Dial.
Levinas, Emmanuel (1936). De l'évasion.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5, 373—392. This paper was exclu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shes of the author from Levinas, 1987b. It is also published in French as an independent book (Levinas, 1982c).



—— (1947).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aris: Fontaine. Eng. trans. A. Lingis, *Existence and Existents*. Dodrecht: Kluwer, 1988.

—— (1948). La Réalité et son ombre. *Les Temps modernes* 4(38): 771—789. Eng. trans. 'Reality and Its Shadow.' In Levinas, 1987b, 1—14.

—— (1949). La Transcendance des mots: A propos des *Biffures* par Michel Leiris. *Les Temps modernes* 44. Eng. trans. In The Transcendance of Words: On Michel Leiris's *Biffures*. In Eng. trans. of E. Levinas, 1987a, 144—150.

—— (1951). L'Ontologie est-elle fondamental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56(1): 88—98. Eng. trans. Is Ontology Fundamental? In Eng. trans. of Levinas, 1991, 1—11.

—— (1961). *Totalité et infini*. The Hague: Nijhoff. Eng. trans. A. Lingis, *Totality and Infinity*. Intro. J. Wild. Dordrecht, Boston, and London: Kluwer, 1991.

—— (1963).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Paris: Vrin. Eng. trans. A. Orianne, *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972). *Humanisme de l'autre homme*.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 (1974a [1949, 1967]). *En découvrant l'existence avec Husserl et Heidegger*. Paris: Vrin. Eng. trans. R.A. Cohen and M.B. Smith, *Discovering Existence with Husserl*.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974b [1967]). Langage et proximité. In E. Levinas, 1974a, 217—236. Eng. trans. Language and Proximity. In E. Levinas, 1987b, 109—127.

—— (1974c).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a de l'essence*. The Hague: Nijhoff. Eng. trans. A. Lingi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975). *Sur Blanchot*.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It. trans. A. Ponzio, *Sur Blanchot*. Bari: Palomar, 1995. Eng. trans. in Eng. trans of Levinas, 1976a.

—— (1976a). *Noms Propres*.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Eng. trans. M.B. Smith, *Proper Names*. London: Athlone, 1996.

—— (1976b). *Difficile liberté: essai sur le judaïsme*. Paris: Albin Michel. Eng. trans. S. Hand, *Difficult Freedom*. London: Athlone, 1990.

—— (1977). *Du sacrée au saint*. Paris: Minuit.

—— (1979). *Le Temps et l'autre*.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Eng. trans. R.A. Cohen, *Time and the Other*.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982a). *Ethique et infini. Dialogues avec Philippe Nemo*. Paris: Fayard. Eng. trans. R. A. Cohen,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982b). *L'Au-delà du verset. Lectures et discours talmudiques*. Paris: Minuit. Eng. trans. G.D. Mole, *Beyond the Vers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982c [1936]). *De l'évasion*.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 (1982d).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ee*. Paris: Vrin. Eng. trans. B. Bergo, *Of God Who Comes to Mi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984). *Transcendance et intelligibilité. Suivi d'un entretien*. Geneva: Labor et Fides.

—— (1987a). *Hors Sujet*. Montepellier: Fata Morgana. Eng. trans. M.B. Smith, *Outside the Subject*.

London: Athlone, 1993.
—— (1987b).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Eng. trans. and ed. A. Lingi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1988a). *à l'heure des nations*. Paris: Minuit. Eng. trans. M.B. Smith, *In the Time of the Nations*. London: Athlone, 1994.
—— (1989). *The Levinas Reader*. Ed. S. H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0). Le Sens et l'oeuvr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1: 5—10.
—— (1991). *Entre nous. Essai sur le penser-à-l'autre*. Paris: Grasset. Eng. trans. *Entre nous. On Thinking-of-the-Other*. London: Athlone, 1998.
—— (1993). *Dieu, la mort et le temps*. Paris: E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 (1994). *Les Imprévus de l'histoire*.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 (1996). *Nouvelles lectures talmudiques*. Eng. trans. R.A. Cohen, *New Talmudic Readings*.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98).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It. trans. and ed. J. Ponzio. Bari: Graphis.
Lévi-Strauss, Claude (1958).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Plon. Eng. tran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Lewis, Clarence Irving (1946).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 LaSalle, IL: Open Court.
—— (1955). *The Ground and Nature of the Ri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68). *The Philosophy of C.I. Lewis*. Ed. P.A. Schlipp. LaSalle, IL: Open Court.
—— (1969). *Values and Imperatives*. Ed. J.F. Lan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iszka, James Jakób (1981). Peirce and Jakobson: Towards a Structuralist Reconstruction of Peirce.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17(1): 41—61.
Llewelyn, John (1995). *The Geneology of Ethics*. London: Routledge.
Locke, John (1975 [1960]).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P. H. Nidditch. Oxford: Clarendon.
Lomuto, Michele, and Augusto Ponzio (1997). *Semiotica della musica*. Bari: Graphis.
Lotman, Jurij M. (1975). *La semiosfera*. Venice: Marsilio.
—— (1977a [1967]).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mmunication-Modeling Systems. In D.P. Lucid, 1977, 95—98.
—— (1977b).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Contributions.
—— (1984). O Semiosfere. *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17: 5—23.
—— (1991).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Eng. trans. A. Shukm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Lotman, Jurij. M., and Boris A. Uspenkij (1984).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Contributions.
Lovelock, James E. (1972). Gaia as Seen through the Atmosphere. *Atmosphere and Environment* 6: 579—580.
—— (1979).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ucid, Daniel P., ed. (1977). *Soviet Semiotics: An Anth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cintyre, Stuart, and Anna Clark (2003). *The History of Wars*. Melbourne,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Manetti, Giovanni (1987). *Le teorie del segno nell'antichità classica*. Milan: Bompiani. Eng. trans. C. Richardson, *Theories of Sign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ed. (1988). *Signs of Antiquity / Antiquity of Signs*. Eng. trans. S. Petrilli. *Versus. 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 Special Issue 50/51.

Marcellesi, Jean-Baptiste, et al. (1978). *Linguaggio e classi sociali. Marrismo e stalinismo*. Ed. J.-B. Marcellesi, It. trans. and intro. A. Ponzio. Bari: Dedalo.

Marcialis, Nicoletta (1986). Michail Bachtin e Aleksej Uchtomskij. In F. Corona, 1986, 79—91.

Marcus, Solomon (2001). *The Algebraic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Intro. D. Kelln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New ed., 1999.

Margulis, Lynn, and Dorion Sagan (1997). *Microcosmos: Four Billion Years of Microbial 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rone, Gianfranco, ed. (1986). *Dove va la semiotica? Quaderni del Circolo Semiologico Siciliano* 24.

Martinet, André (1960). *é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Colin.

—— (1962). *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 (1985). *Syntaxe générale*. Paris: Armand Colin.

Marx, Karl (1953 [1857—1858]).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Dietz-Verlag. Eng. trans. with a Foreword by M. Nicolaus, *Grund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London: Penguin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1973.

—— (1956).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Ed. T.B. Bottomore and M. Rubel. London: Penguin. Reprinted 1988.

—— (1961 [1859]).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Dietz.

—— (1962). *Das Kapital*. Vols. 23, 24, 25. Berlin: Dietz. *Capital*. Books 1, 2, and 3. Eng. trans. E. and C. Paul, Intro. G.D.H. Cole. London: Dent.

—— (1968). *Mathematicheskie Rukopsi*. Moscow: Nauka. It trans. *Manoscritti matematici*. Ed. F. Matarrese and A. Ponzio. Bari: Dedalo, 1975. Eng. trans., *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London: New Park, 1983.

—— (1973a).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Political Writings*. Vol. 1. Ed. and intro. D. Fernbach. London: Penguin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 (1973b). *Surveys from Exile. Political Writings*. Vol. 2. Ed. and intro. D. Fernbach. London: 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 (1974a).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olitical Writings*. Vol. 3. Ed. and intro. D. Fernbach. London: Penguin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 (1974b [1875, 1891]).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In Marx, 1974a, 339—359.

—— (1974c [1857]). *Introduzione del '57*. With the text in German. Intro. B. Accaro. Verona: Bertani.

—— (1975 [1843—1844]).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 *Early Writings*. Eng. trans. R. Livingstone and G. Benton. Intro. L. Colletti, 243—257. London:

Penguin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 (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Eng. trans. B. Fowkes, intro. E. Mandel. London: Penguin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 (1978).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Eng. trans. D. Fernbach, intro. E. Mandel. London: Penguin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 (1981).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Eng. trans. D. Fernbach, Intro. E. Mandel. London: Penguin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8a).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68b [1845—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Ed. S. Rayzankaya. Moscow: Progress.

—— (1970 [1845—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One, with selections from Parts Two and Three, together with Marx's 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and intro. C.J. Arthu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turana, Humberto N. (1978). Biology of Language: The Epistemological Reality. In *Psychology and Biology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Ed. G.A. Miller and E. Lenneberg, 27—6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0). Autopoiesis: Reproduction, Heredity, and Evolution. In *Autopoiesis, Dissipative Structures, and Spontaneous Social Orders*. Ed. M. Zeleny, 45—107. Boulder, CO: Westview.

Maturana, Humberto R., and Francisco J. Varela (1980).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ordrecht: D. Reidel.

McDermott, Gerald (1972). *Anansi the Spider: A Tale from the Ashanti*.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McMaster, Don (2002). *Asylum Seekers: Australia's Response to Refugees*. Melbourne,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Mead, George Herbert (1922). A Behavioristic Account of the Significant Symbol.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 157—163.

——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38).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 Ed. C. Mor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dvedev, Pavel N. (and Mikhail M. Bakhtin) (1928). *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Poetics*. Eng. trans. A. J. Wehrl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It. trans. *Il metodo formale nella scienza della letteratura*. Ed. A. Ponzio. Bari: Dedalo, 1978.

Merleau-Ponty, Maurice (1942). *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Eng. trans. C. Smith,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 (1964). *Signs*. Eng. trans. R. C. McClear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66 [1948]). *Sens et non-sens*. Paris: Nagel.

—— (1968).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Eng. trans. A. Lingi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3). *The Prose of the World*. Ed. C. Lefort. Eng. trans. John O'Neill.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errell, Floyd (1992). *Sign, Textuality,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3). Is Meaning Possible within Indefinite Semio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10(3/4): 167—196.
—— (1995a). *Semiosis in the Postmodern Age*.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 (1995b). *Peirce's Semiotics Now: A Primer*.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 (1996). *Signs Grow: Semiosis and Life Process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97). *Peirce, Signs, and Meaning*.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98a).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Pondering Literature, Science, and Paint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8b). *Sensing Semiosis: Toward the Possibility of Complementary Cultural 'Log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9). *Signs, Science, Self-Subsuming (Arti)facts.* Dresden: University of Dresden Press.
—— (1999—2000). Neither Matrix nor Redux, but Reflux: Translation from within Semiosis.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10(2): 83—101.
—— (2001). Charles Sanders Peirce's Concept of the Sign. In P. Cobley, ed., 2001, 28—39.
—— (2003). *Sensing Corporeall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incu, Marin, ed. (1982). *La semiotica letteraria in Italia.* Milan: Feltrinelli.
Morris, Charles W. (1932). *Six Theories of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37). *Logical Positivism, Pragmatism and Scientific Empiricism.* Paris: Hermann.
—— (1938a). Scientific Empiricism. In *Encyclopedia and Unified Science*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1(2)], 63—7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38b). Peirce, Mead, and Pragmatism. *Philosophical Review* 47: 109—127.
—— (1938c).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1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t. trans. F. Rossi-Landi, *Lineamenti di una teoria dei segni.* Turin: Paravia, 1954. New ed., S. Petrilli. Lecce: Manni, 1999.
—— (1939). Science, Art and Technology. *Kenyon Review* 1: 409—423.
—— (1942a). William James Today. In *Commemoration of William James*. Ed. H. M. Kallen, 178—18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42b). *Paths of Life.* New York: Harper.
—— (1946).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New York: Prentice Hall. It. trans. S. Ceccato,*Segni, linguaggio e comportamento*. Milan: Longanesi, 1949, 1963.
—— (1948a). *The Open Self.* New York: Prentice-Hall. It. trans. S. Petrilli, *L'io aperto: Semiotica del soggetto e delle sue metamorfosi*. Bari: Graphis.
—— (1948b). Signs about Signs about Sig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9: 115—133. Reprinted C. Morris, 1971, 434—455. It. trans. in C. Morris, 1988, 129—153.
—— (1956). *Varieties of Human Val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7). Mysticism and Its Language. In *Language: An Inquiry into Its Meaning and Function*. Ed. R.N. Ashen, 179—187. New York: Harper. Reprinted Morris, 1971, 456—463. It. trans. in C. Morris, 1988, 191—199.
—— (1964). *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Signs and Valu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It. trans. in C. Morris, 1988 and 2000.
—— (1966). *Festival.*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1970). *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1971). *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 Ed. T.A. Sebeok.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 (1976). *Image*. New York: Vantage.
—— (1988). *Segni e valori. Significazione e significatività e altri scritti di semiotica, etica ed estetica.* It.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Bari: Adriatica.
—— (1993 [1925]). *Symbolism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Nature of Mind*. Ed. and Pref. A. Eschba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2000). *Significazione e significatività*. It. trans.,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Bari: Graphis.
Morson, Gary Saul (1990). *Mikhail Bakhtin: Creation of a Prosa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ounin, George (1970). *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logie*. Paris: Minuit.
Mukarmovsky, Jan (1977). Monologue and Dialogue. In *The Word in Verbal Art*. Ed. J. Burbank and P. Sten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Müller, Horst M. (1987). *Evolution, Kognition, und Sprache*. Berlin: Paul Parey.
Murphey, Murray (1961). *The Development of Peirce's Philoso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urphy, John P. (1990). *Pragmatism: From Peirce to Davidson*. Boulder, CO: Westview.
Nida, Eugen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Nöth, Winfried (1990).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gden, Charles K. (1994a). *C.K. Ogden and Linguistics*. 5 vols. Ed. T. W. Gordon.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 (1994b).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In Ogden, 1994a, vol. 1, 1—47.
Ogden, Charles K., and Ivor A. Richards (1923).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With suppl. essays by B. Malinowski and F.G. Crookshan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
Olshewsky, Thomas M. (1996). The Construction of a Peircean Hermeneutics. In V. Colapietro and T. M. Olshewsky, eds., 1996, 441—449.
Orwell, George (1949). *Nineteen Eighty-Four. A Novel*. New York: Penguin, 1982.
Pacere, Titinga Frédéric (1979). *Ainsi on a assassiné tous les mossé.* Sherbrooke, QC: éd. Naaman.
Panofsky, Erwin (1991). *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Eng. trans. C.S. Wood. New York: Zone.
Paré, Joseph (1997). *écritures et discours dans le roman africain francophone post-colonial*. Préface du F. Lambert. Ouagadougou: Editions Kraal.
Pareto, Vilfredo (1970 [1986—1997]). *Corso di economia politica*. Turin: Utet.
Parret, Herman (1983). *Semiotics and Pragma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ed. (1994). *Peirce and Value Theory: On Peircean Ethics and Esthetic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asero, Nicolò, ed. (1984). *Saggi su Bachtin. L'immagine riflessa*. Special Issue 1/2.
Pasolini, Pier Paolo (1972). *Empirismo eretico*. Milan: Garzanti.
—— (1976). *Lettere luterane*. Turin: Einaudi.
—— (1990). *Scritti corsari*. Milan: Garzanti.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867). On a New List of Categories. In Peirce, 1931—1966. *Collected Papers* (*CP*), 1.545—1.549.
—— (1868a). Questions Concerning Certain Faculties Claimed for Man.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2: 103—114. In *CP* 5.213—5.263.
—— (1868b). 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2: 140—157. In *CP* 5.264—5.317.
—— (1868c). Grounds of Validity of the Laws of Logic: Further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2: 193—208. In *CP* 5.317—5.357.
—— (1868d). Questions on Reality. In Peirce, 1984a, 162—187.
—— (1877). The Fixation of Belief.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November. In *CP* 5.358—5.387.
—— (1878a).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January. In *CP* 5.388—5.410.
—— (1878b). The Doctrine of Chance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March. In *CP* 2.645—2.660.
—— (1878c). The Probability of Induction.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April. In *CP* 2.669—2.693.
—— (1878d). The Order of Natur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3, June. In *CP* 6.395—6.427.
—— (1878e). Deduction, Induction and Hypothesi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3, August. In *CP* 2.619—2.644.
—— (1878f).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In *CP* 5.388—5.410.
—— (1890). A Guess at the Riddle. In *CP* 1.354—1.414.
—— (1891a). The Architecture of Theories. *Monist* 1: 161—176. In *CP* 6.7—6.34.
—— (1891b). 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Examined. *Monist* 2: 321—337. In *CP* 6.35—6.65.
—— (1892a). The Law of Mind. *Monist* 2: 533—559. In *CP* 6.102—6.163.
—— (1892b). Man's Glassy Essence. *Monist* 3: 1—22. In *CP* 6.238—6.271.
—— (1893a). Evolutionary Love. *Monist* 3: 176—200. In *CP* 6.287—6.317.
—— (1893b). Mind and Matter: Includ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c.1893]; The Materialistic Aspect of Reasoning [1893]. In *CP* 6.272—6.286.
—— (1893c). The Religion of Science. Includes The Marriag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The Open Court* 7: 3559—3560 [1893]; The Church (from Religion and Politics) [c.1895]. In *CP* 6.428—6.450.
—— (1896). The Logic of Mathematics. An Attempt to Develop My Categories from Within. In *CP* 1.417—1.519.
—— (1903a). On Pragmatism and the Normative Sciences. In *CP* 5.14—5.40.
—— (1903b). On Pragmatism and Abduction. In *CP* 5.180—5.212.
—— (1905a). What Pragmatism Is. *Monist* 15. In *CP* 5.411—5.437.
—— (1905b). Issues of Pragmaticism. *Monist*, October 1905. In *CP* 5.438—5.463.
—— (1905c). Logic and Spiritualism. In *CP* 6.557—6.587.
—— (1906). Prolegomena to an Apology for Pragmaticism. *Monist* 16: 492—546. In *CP* 4.530—4.572.

—— (1907). Pragmatism. In Peirce, 1998, 398—433.
—— (1908). A Neglected Argument for the Reality of God. *Hibbert Journal* 7: 90—112. In *CP* 6.452—6.493.
—— (1923). *Chance, Love and Logic*. Ed. Morris R. Cohen. New York: Harcourt.
—— (1931—1966).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Ed. C. Hartshorne, P. Weiss, and A.W. Burks. 8 vols. Cambridge, MA: Belknap. (References are to *CP*, followed by volume and paragraph numbers.)
—— (1953). *Charles S. Peirce's Letters to Lady Welby*. Ed. I.C. Lieb. New Haven, CT: Whitlock's.
—— (1955a). Abduction and Induction.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 Buchler. New York: Dover.
—— (1955b). The Principles of Phenomenology.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 Buchler. New York: Dover.
—— (1955c). Logic as Semiotic: The Theory of Signs.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 Buchler. New York: Dover.
—— (1958). Letter to Lady Welby, 12 October 1904. In *Charles S. Peirce: Selected Writings*. Ed. P. Wiener. New York: Dover.
—— (1975—1979).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 3 vols. Ed. K. L. Ketner and J. E. Cook. Lubbock, TX: Tech Press. (References are to *CN*, followed by volume and page number.)
—— (1980). *Semiotica. I fondamenti della semiotica cognitiva*. Ed. M.A. Bonfantini, L. Grassi, and R. Grazia, Intro. M.A. Bonfantini. Turin: Einaudi.
—— (1982—1993).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5 vols. Ed. M.H. Fisch et 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3). *Studies in Logic*. Ed. Members of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Intro. M.H. Fisch, Pref. A. Eschbach.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1984a).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Vol. 2. *1867—1871*. Peirce Edition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4b). *Charles S. Peirce. Le leggi dell'ipotesi*. Ed. M.A. Bonfantini, R. Grazia, and G.-P. Proni, Intro. M.A. Bonfantini. Milan: Bompiani.
—— (1992a). Types of Reasoning. In *Reasoning and the Logic of Things: The Cambridge Conferences Lectures of 1898*. Ed. K.L. Ketn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b).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 1., Ed. N. Houser and C.J.W. Kloes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3 [1893]). *à la recherche d'une méthode*. Ed. and Fr. trans. M. Balat and J. Deledalle-Rhodes. Perpigna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erpignan [= Fr. trans. of *A Search for a Method*.]
—— (1998).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 2. Ed. by Peirce Edition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03). *Opere*. Ed. M.A. Bonfantini and G-P. Proni. Milan: Bompiani.
—— ,MS. =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Manuscripts in the Houghton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 as identified by Richard S. Robi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 and in The Peirce Papers: A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Transactions of the C.S. Peirce Society* 7 (1971): 37—57.

Perelman, Chaïm, and Lucie Olbrechts-Tyteca (1958). *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essoa, Fernando (1989). *Una sola moltitudine*. Vols. 1 and 2. Milan: Adelphi.

Peter of Spain (Petrus Hispanus) (1972 [1230?]). *Tractatus*, called afterward *Summule logicales*. First critical edition from the manuscript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 M. De Rijk. Assen: Van Gorcum. It. trans. A. Ponzio, *Tractatus. Summule logicales*. Bari: Adriatica, 1985. New bilingual edition by A. Ponzio. Milan: Bompiani, 2004.

Petrilli, Susan (1986). On the Materiality of Signs. *Semiotica* 62(3/4): 223—245.

——, ed. and Intro., 7—9. (1987). *Per Ferruccio Rossi-Landi. Il Protagora.* Special Issue 27(11/12).

—— (1988). *Significs, semiotica, significazione*. Intro. T.A. Sebeok. Bari: Adriatica.

—— (1990a). The Problem of Signifying in Welby, Peirce, Vailati, Bakhtin. In A. Ponzio, 1990a, 315—363.

—— (1990b). On the Materiality of Signs. In A. Ponzio, 1990a, 365—401.

—— (1990c). Dialogue and Chronotopic Otherness: Bakhtin and Welby. *Discours social / Social Disourse* 3(1/2): 339—350.

—— (1990d). Sign and Meaning in Victoria Welby and Mikhail Bakhtin: A Confrontation. In H. W. Schmitz, ed., 1990, 197—215.

—— (1991a). For a Semiotic Narration of Semiotics. *Semiotica* 87(1/2): 119—146.

—— (1991b). From Peirce (via Morris and Jakobson) to Sebeok: Interview with Thomas A. Sebeok. In T. A. Sebeok, 1991a, 95—105.

—— (1992a).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Ideology. *TTR. études sur le texte et ses transformations* 5(1): 233—264.

—— (1992b). The Detotalizing Method, Human Sciences and the Dialogic of Values in Mikhail Bakhtin. *Social Semiotics*. Special Issue 2(2): 98—113.

——, ed. (1992c).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orris and Rossi-Landi.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88(1/2).

—— (1992d). Iconicity at the Origin of Language: C.S. Peirce and G. Fano. Introduction. In G. Fano, 1972, Eng. trans., xvii—xxvii.

—— (1992e). Linguistic Production, Ideology and Otherness: Contributions by Augusto Ponzio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cripta Semiotica* 1: 89—117.

—— (1992f). The Unconscious, Signs and Ideology. *Semiotica* 90 (3/4): 379—387.

—— (1993a). Signs and Values: For a Critique of Cognitive Semio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 239—251.

—— (1993b). Dialogism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tudy of Signs. *Semiotica* 97 (1/2): 103—118.

—— (1993c). Thomas A. Sebeok and Semio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norama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talian Semiotics. In J. Deely and S. Petrilli, 1993, 337—352.

—— (1994a). Exchange in Alice's World (with A. Ponzio). In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in Alice's Worlds*. Ed. C. Marello and R. Fordyce, 74—78.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1994b). Signs and Values in Linguistic Work. In *Reading su Ferruccio Rossi-Landi. Semiosi come pratica sociale*. Ed. J. Bernard et al., 135—159.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1995a). *Materia segnica e interpretazione*. Lecce: Milella.

—— (1995b). Between Semiotics and Significs: C.K. Ogden and V. Welby. *Semiotica* 105 (3/4): 277—309.

—— (1995c). For a Global Approach to Semiosis. *Cruzeiro Semiotico*, September: 27—36.

—— (1995d). La Iconicidad en la 'Doctrina de los signos' de Thomas A. Sebeok. *Cruzeiro Semiotica*, September: 303—313.

—— (1996a). *Che cosa significa significare?* Bari: Edizioni dal Sud.

—— (1996b). Communication, Mass Media and Critique of Ideology: Ferruccio Rossi-Land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ocio-Semiotics. S.-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7 (1/2): 165—188.

—— (1996c). La metafora in C.S. Pierce and V. Welby. In *Simbolo, metafora e senso*. Ed. C. Augieri, 145—174. Lecce: Milella.

—— (1996d). Bakhtin Read in Italy (1980—1994). In *Bakhtin around the World: Bakhtin Newsletter*. Special Issue, ed. S. Lee and C. Thomson. 5: 89—115.

—— (1996f). Linguistic Production, Ideology and Otherness: Augusto Ponzio's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emiotica* 112(3/4): 263—287.

—— (1997a). Towards Interpretation Semiotics. In *Reading Eco: An Anthology*. Ed. R. Capozzi, 121—13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7b). TV Is Dead, Video Is Born: Dialogue on New Intermedia Communication. In *Semiotics of the Media: State of the Art, Projects, and Perspectives*. Ed. W. Nöth, 441—464.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1997c). La luce del testo fra sacralità e profanazione. *Luce. Athanor* 8, 26—33.

—— (1997d). Subject, Body and Agape. In *Working Papers and Pre-publications*. Centro Internazionale di Semiotica e di Linguistica, Università di Urbino, 1—39, 261—262.

—— (1998a). *Su Victoria Welby. Significs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1998b). Women in Semiotics (Victoria Lady Welby 1837—1912) (with T. A. Sebeok). In *Interdigitations: Essays for Irmengard Rauch*. Ed. G. F. Carr et al. Bristol: Thoemmes.

—— (1998c). Argumentative Dialogues and Non.Conditions of Dialogic Argumentation (with M.A. Bonfantini and A. Ponzio). In *Dialogue Analysis VI: Proceedings of the 6th Conference, Prague 1996*. Ed. I. Svetla Cmejrková et al., teil 1, 91—100.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 (1998d). Bakhtin's Research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and Semiotics. *S.-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10 (1/ 2): 203—216.

—— (1998e). *Teoria dei segni e del linguaggio*. Bari: Graphis. New ed., 2001.

—— (1999a). About and beyond Peirce. *Semiotica* 124 (3/4): 299—376.

—— (1999b). Charles Morris's Biosemiotics. *Semiotica* 127 (1/4): 67—102.

——, ed. (1999c). *Semiotic Studies in Bari. S.-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Special Issue 2(4).

—— (1999d). Semiotic Phenomenology of Predicative Judgment. *Semiotic Studies in Bari. S.-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Special Issue 2 (4): 563—594.

—— (1999e).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Victoria Welby's Significs. *Semiotica* 127 (1/4): 23—66.

——, ed. (1999—2000). *La traduzion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10(2).

——, ed. (2000a). *Tra segni.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11(3).
—— (2000b) (with M.A. Bonfantini and A. Ponzio). Three Dialogues on Rhetoric, Argumentation and New Media. *Semiotica* 128 (1/2): 69—112.
——, ed. (2001a). *Lo stesso altro.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12(4).
——, ed. (2001b). *Signs and Light: Illuminating Paths in the Semiotic Web.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136 (1/4).
—— (2001c). Light between Sacred and Profane: Victoria Welby from Biblical Exegesis to Significs. *Signs and Light: Illuminating Paths in the Semiotic Web.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136 (1/4): 173—200,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 (2002). Linguistic Production, Ideology and Otherness. In A. Ponzio 2002a, 55—84.
——, ed. (2003a). *Nero.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14(6).
——, ed. (2003b).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msterdam: Rodopi.
——, ed. (2003c). *Linguaggi.* Bari: Laterza.
—— (2004a). *Ideology, Logic, and Dialogue in Semiotic Perspective.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148 (1/4),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 (2005). *Percorsi della semiotica.* Bari: Graphis.
Petrilli, Susan, and Patrizia Calefato (2003). *Logica, dialogica, ideologica. I segni fra funzionalità ed eccedenza.* Intro. S. Petrilli, 9—14. Milan: Mimesis.
Pezzini, Isabella, ed. (1991). *Semiotica delle passioni.* Bologna: Esculapio.
Piro, Sergio (1997). *Introduzione alle antropologie trasformazionali.* Naples: La Città del Sole.
Polman, Linda (2003). *We Did Nothing: Why the Truth Doesn't Always Come Out When the UN Goes In.* London: Viking.
Ponzio, Augusto (1972). On *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 Semiotica* 6 (4): 378—389.
—— (1973). *Produzione linguistica e edeologia sociale.* Bari: De Donato.
—— (1974).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e prassi sociale.* Bari: De Donato.
—— (1976). *La semiotica in Italia.* Bari: Dedalo.
—— (1980). *Michail Bachtin. Alle origini della semiotica sovietica.* Bari: Dedalo.
—— (1984). *Segni e contraddizione. Fra Marx e Bachtin.* Verona: Bertani.
—— (1984). Semiotics between Peirce and Bakhtin. *Recherches sémiotiques* 4: 306—326.
—— (1986). On the Signs of Rossi-Landi's Work. *Semiotica* 62 (3/4): 207—221.
—— (1988). *Rossi-Landi e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Adriatica.
—— (1989). Semiotics and Marxism. In *The Semiotic Web.* Ed. T.A. Sebeok and J. Umiker-Sebeok, 387—414.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1990a). *Man as a Sign: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d. and Eng. trans. S. Petrilli. Appendices I and II by S. Petrilli.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990b). Theory of Meaning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Vailati and Lady Welby. In H.W. Schmitz, ed., 1990, 165—178.
—— (1990c). Significs and Semiotics: Victoria Welby and Giovanni Vailati. In A. Ponzio, 1990a, 94—106.
—— (1991).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2. Segni, valori, ideologie.* Bari: Adriatica.
—— (1992a). *Tra semiotica e letteratura. Introduzione a Michail Bachtin.* Milan: Bompiani. Original

ed., 1980. New ed. 2004.
—— (1992b). *Production linguistique et idéologie sociale*. Candiac, QC: Les Editions Balzac.
—— (1992c). Interview with Julia Kristeva. In J. Kristeva, *Il linguaggio, questo sconosciuto*, 9—27. Bari: Adriatica.
—— (1993a). *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 It. trans. and ed. S. Petrill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93b). *La ricerca semiotica* (with Omar Calabrese and Susan Petrilli). Bologna: Esculapio.
—— (1994a). *Scrittura, dialogo, alterità. Tra Bachtin e Levinas*.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 (1994b). *Fondamenti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with Patrizia Calefato and Susan Petrilli). Rome and Bari: Laterza. New ed., 1999.
—— (1995a). *Responsabilità e alterità in Emmanuel Levinas*. Milan: Jaca Book.
—— (1995b). *El juego del comunicar. Entre literatura y filosofía*, ed. M. Arriaga. Valencia: Episteme.
—— (1995c). *Segni per parlare dei segni. Signs to Talk About Signs* (bilingual text). Eng. trans. S. Petrilli. Bari: Adriatica. 1st ed., 1985.
—— (1995d). *La differenza non indifferente. Comunicazione, migrazione, guerra*. Milan: Mimesis.
—— (1996a). *Sujet et altérité. Sur Emmanuel Levinas. Suivi de Deux dialogues avec Emmanuel Lévinas*. Paris: Harmattan.
——, ed. (1996b). *Comunicazione, comunità, informazione*. Manni: Lecce.
—— (1997a). *Metodologia della formazione linguistica*. Rome and Bari: Laterza.
—— (1997b). *Elogio dell'infunzionale. Critica dell'ideologia della produttività*. Rome: Castelvecchi.
—— (1997c). From Moral Philosophy to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Directions in Mikhail Bakhtin's Research from 1919 to 1929. *Symbolon* 1 (1/2): 57—83.
—— (1998). *La revolución bajtiniana*. Madrid: Catedra.
—— (1999). *La comunicazione*. Bari: Graphis.
—— (2001). *Enunciazione e testo letterario nell'insegnamento dell'italiano come LS*. Perugia: Guerra.
—— (2002a). *Augusto Ponzio 2002. Bibliografia e letture critiche*. Bari: Edizioni dal Sud.
—— (2002b). *Il linguaggio e le lingue*. Bari: Graphis.
—— (2003). *Globalità e infinità*. Bari: Cacucci.
—— (2004). *Semiotica e dialettica*. Bari: Edizioni del Sud.
Ponzio, Augusto et al., eds. (1998). *Levinas Vivant. Riflessioni sul pensiero di Emmanuel Levinas*. Bari: Edizioni dal Sud.
Ponzio, Augusto, and Paolo Jachia, eds. (1993). *Bachtin & ...* Bari: Laterza.
Ponzio, Augusto, and Susan Petrilli (1996). Peirce and Medieval Semiotics. In V.M. Colapietro and T. M. Olshewsky, eds., 1996, 351—364.
—— (1998). *Signs of Research on Signs. Semiotische Berichte*. Österreich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emiotik. Special Issue Jg. 22 (3/4).
—— (1999). *Fuori campo. I segni del corpo tra rappresentazione ed eccedenza*. Milan: Mimesis.
—— (2000a). *Il sentire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Rome: Meltemi.
—— (2000b).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rt and Answerability in Mikhail Bakhtin*. New York and Toronto: Legas.

—— (2001).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 London: Icon Books.
—— (2002). *I segni e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A. Sebeok*. Milan: Spirali.
—— (2003). *Semioetica*. Rome: Meltemi.
Ponzio, Augusto, and Luciano Ponzio (2001). Writing and Designing Light. *Signs and Light: Illuminating Paths in the Semiotic Web.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ed. S. Petrilli. 136 (1/4): 377—402.
Ponzio, Julia, ed. and trans. (1998).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y Emmauel Levinas. Bari: Graphis.
—— (1999). *L'oggettività del tempo. La questione della temporalità in Husserl e Heidegger*. Pref. Aldo Masullo. Bari: Edizione dal Sud.
—— (2000). *Il presente sospeso. Alterità e appropriazione in Heidegger e Levinas*. Bari: Cacucci.
Ponzio, Luciano (2000). *Icona e raffigurazione. Bachtin, Malevich, Chagall.* Bari: Adriatica.
—— (2003). *Visioni del testo*. Bari: Graphis.
Posner, Roland, Klaus Robering, and Thomas A. Sebeok, eds. (1997—2004). *Semiotik/ Semiotics: A Handbook on the Sig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Nature and Culture*. 4 vol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s.
Potter, Beatrix (1989). *The Complete Tales of Beatrix Potter: The 23 Original Peter Rabbit Books*. London: F. Warne.
Potter, Vincent G. (1996). *Peirce'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Ed. V.M. Colapietro.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rezzolini, Giovanni (1907). *L'arte di persuadere*. Florence: Lumachi.
Prieto, Luis (1966). *Messages et signaux*. Paris: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 (1968). La sémiologie. In *Le Langage.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Ed. A. Martinet. Paris: Gallimard.
—— (1975). *Pertinence et pratique. Essais de sémiologie.* Paris: Minuit.
Prodi, Giorgio (1977). *Le basi materiali della significazione*. Milan: Bompiani.
—— (1982). *La storia materiale della logica*. Milan: Bompiani.
—— (1983a). *L'uso estetico del linguaggio*. Bologna: Il Mulino.
—— (1983b). Linguistica e biologia. In *Intorno alla linguistica*. Ed. C. Segre, 1983, 172—201.
Prodi, Romano (1995a). *Governare l'Italia*. Rome: Donzelli.
—— (1995b). *Il capitalismo ben temperato*. Bologna: Il Mulino.
Proni, Giampaolo (1990). *Introduzione a Peirce*. Milan: Bompiani.
Proust, Marcel (1954).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Paris: Gallimard.
Putnam, Hilary (1969). Is Logic Empirical?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Boston Colloquium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66—1968*. Ed. R.S. Cohen and M.W. Wartofsky, 216—241. Dordrecht: D. Reidel.
—— (1971). How to Think Quantum Logically. In P. Suppes, *Logic and Probability in Quantum Mechanics*, 47—53. Dordrecht: D. Reidel.
——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3a). Vagueness and Alternative Logic. *Erkenntnis* 19: 297—314.
—— (1983b). *Realism and Reason.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uaranta, Mario, ed. (1989). *Giovanni Vailati e la cultura del '900*. Bologna: Arnaldo Forni.
Quine, Willard von Orman (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69).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adin, Paul, ed. (1994 [1955]). *Fiabe africane*. Pref. Italo Calvino, It. trans. A. Motti. Turin: Einaudi.
Rai, Milan (2002). *War Plan: Ten Reasons against War on Iraq*. With a chapter by Noam Chomsky. London: Verso.
Ransdell, Joseph (1976).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Peirce's Semiotic. *Transactions of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12 (2): 97—110.
—— (1980).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In *The Signifying Animal: The Grammar of Language and Experience*. Ed. I. Rauch and G. F. Carr, 135—18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jeznikov, Lazer Osipovich (1964). *Gnoseologicheskie voprosy semiotiki*. Leningrad: Leningrad University.
Roberts, Don D. (1973). *The Existential Graphs of Charles S. Perice*.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Robert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Robin, Richard S. (1967).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Romanes, Georges John (1888). *Mental Evolution in Man: Origin of Human Faculty*. London: Kegan Paul.
—— (1896).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John Romanes*. London: Longsman-Green.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si-Landi, Ferruccio (1953). *Charles Morris*. Milan: Bocca. New ed., F. Rossi-Landi, 1975c.
——, ed. and It. trans. (1954). *Charles Morris*. *Lineamenti di una teoria dei segni*. Milan: Paravia.
—— (1955). *Lo spirito come comportamento*. An Italian version of *The Concept of Mind*, by Gilbert Ryle. Turin: Einaudi. Reprint, 1982.
—— (1957—1958). Materiale per lo studio di Vailati. *Rivista critica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12 (4): 468—485; 13(1): 82—108.
—— (1961). *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une*. Padua: Marsilio, 1980. See Rossi-Landi 1998.
—— (1965). 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Nuova Corrente* 36: 5—43.
—— (1966a). Sul linguaggio verbale e non-verbale. *Nuova Corrente* 37: 5—28.
—— (1966b). Per un uso marxiano di Wittengenstein. *Nuovi argomenti* n.s. (1): 187—230.
—— (1967a). Nota introduttiva. In G. Vailati, *Il metodo della filosofia. Scritti scelti*. Bari: Laterza.
—— (1967b). Presentazione di tre scritti di Charles Morris sulla semiotica estetica. *Nuova Corrente* 42/43: 113—117.
—— (1967—1972). *Ideologie*. Journal edited by F. Rossi-Landi. Rome: Edizioni di Ideologie.
—— (1970). Linguistic Alienation Problems. In Rossi-Landi et al., *Linguaggio nella società e nella tecnica*. Milan: Edizioni di Comunità. Now also in S. Petrilli, 1992c, 158—181.
—— (1972). *Scritti programmatici di Ideologie*. Rome: Edizioni di Ideologie.
—— (1973). *Ideologi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The Hague: Mouton.
—— (1975a). *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The Hague: Mouton. New ed., 1977.

—— (1975b). Signs about a Master of Signs. *Semiotica* 13 (2): 115—197. Reprinted F. Rossi-Landi, 1992a.
—— (1975c [1953]). *Charles Morris. Una semiotica novecentesca.* Milan: Feltrinelli.
—— (1978a). *Ideologia.* Milan: ISEDI. New expanded ed., Rossi-Landi, 1982.
—— (1978b). On Some Post-Morrisian Problems. *Ars Semeiotica* 3: 3—32.
—— (1979—1980). *Scienze Umane*. Journal edited by F. Rossi-Landi. Bari: Dedalo.
—— (1980). Introduzione to new ed. of F. Rossi-Landi, 1961. Venice: Marsilio.
—— (1982 [1978]). *Ideologia.* Milan: Mondadori. Eng. trans R. Griffin, *Marxism and Ideology*. Oxford: Clarendon, 1990.
—— (1985a). *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Milan: Bompiani.
—— (1985b). L'autore fra riproduzione sociale e discontinuità. *Lectures* 15: 149—174.
—— (1988). A Fragment in the History of Italian Semiotics. In *Semiotic Theory and Practic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ASS, Palermo, 1984. Ed. M. Herzfeld and L. Melazzo. Vol. 2, 1053—106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8. It. trans. S. Petrilli, in A. Ponzio, 1988, 243—261.
—— (1992a). *Between Signs and Non-Signs*.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92b [1968]). *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Ed. A. Ponzio. Milan: Bompiani. Eng. trans. M. Adams et al., *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1983.
—— (1994 [1972]). *Semiotica e ideologia*. Milan: Bompiani.
—— (1998 [1961]). *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une*. Ed. A. Ponzio. Padua: Marsilio.
—— (1999). Introduzione to Ch. Morris, *Lineamenti di una teoria dei segni* (1st ed. 1954). New ed. S. Petrilli. Lecce: Manni.
Rudy, Stephen (1986). Semiotics in the USSR. In *The Semiotic Sphere*. Ed. T. A. Sebeok and J. Umiker-Sebeok, ch. 25. New York: Plenum.
Russell, Bertrand (1903).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05). On Denoting. *Mind* 14(56): 479—493.
—— (1910). Review of G. Mannoury, *Methodologisches und Philosophisches zur Elementarmathematik* (1909). *Mind* 19: 438—439.
—— (1914).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fo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Chicago and London: Open Court.
—— (1920).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ymposium with F.C.S. Schiller and H. H. Joachim. *Mind* 29(116): 398—404.
—— (1940).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London: Allen & Unwin.
—— (1956). *Logic and Knowledge: Essays 1901—1950*. Ed. R. C. Marsh. London: Allen & Unwin.
Russell, Bertrand, and Alfred N. Whitehead (1910—1913). *Principia Mathematica*. Vols. 1 (1910), 2 (1912), and 3 (19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yle, Gilbert (1949).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Hutchinson's.
—— (1954). *Dilem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id, Edward W.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The Pen and the Sword: Conversations with David Barsamian*. Intro. Eqbal Ahmad.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 (1996).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London: Vintage.

—— (2002).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lvestroni, Simonetta (1986). Il dialogo, il confine, il cronotopo nel pensiero di Michail Bachtin. In F. Corona, 1986, 17—34.

Santucci, Antonio (1963). *Il pragmatismo in Italia*. Bologna: Il Mulino.

Sapir, Edward (1962). *Selected Writings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rtre, Jean-Paul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 (1961 [1943]).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Eng. trans. H.E. Barnes, *Being and Nothingness*. Intro. M. Warnock. London: Routledge, 2001.

—— (1988). *What Is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 Intro. S. Ung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 Ch. Bally and A. Séchehaye. Paris: Payot, 1964. Critical ed. R. Engl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4 vols., 1968—1974.

Savan, David (1976). *An Introduction to C.S. Peirce's Semiotics*, Part I. Toronto: Monograph Series of Toronto Semiotic Circl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91). La teoria semiotica dell'emozione secondo Peirce. In I. Pezzini, 139—157.

Schaff, Adam (1960).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Eng. trans. O. Wojtasiewics. London: Pergamon, 1962.

—— (1967). La définition fonctionel de l'idéologie e le problème de la 'fin du siècle de l'idéologi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4: 49—59.

—— (1968). Die Sprache und das menschliche Handeln. In A. Schaff, *Essays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Sprache*. Frankfurt: Europaische Verlagsanstalt.

—— (1973). *Language and Cogn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1974). *Strukturalismus und Marxismus*. Vienna: Europa Verlag. Eng. trans. *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 Oxford: Pergamon, 1978.

—— (1975). *Humanismus, Sprachphilosophie, Erkenntnistheorie des Marxismus*. Vienna: Europa Verlag.

—— (1992). *Umanesimo ecumenico*. Ed. A. Ponzio. Bari: Adriatica.

—— (1995). *Il mio ventesimo secolo*. Ed. A. Ponzio. Bari: Adriatica.

—— (2001). *Meditazioni*. Ed. A. Ponzio. Bari: Edizioni dal Sud.

Scheflen, Albert E. (1968). Human Communication, Behavioral Program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 Interaction. *Behavioral Sciences* 13(1): 44—45.

Schiller, Ferdinand Canning Scott (1907). *Studies in Huma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1908). *Plato or Protagoras*. London: Blackwell.

—— (1912). *Formal Logic: A Scientific and Social Problem*. London: Macmillan.

—— (1920).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ymposium with B. Russell and H. H. Joachim. *Mind* 29(116): 387—397.

—— (1921a).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ind* 30(118): 185—190.

—— (1921b).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ind* 30(120): 444—447.

Schmitz, H. Walter, ed. (1990). *Essays on Significs: Papers Present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Victoria Lady Welb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Scholes, Robert (1982). *Semiotics and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holtz, Gunter (1991). *Zwischen Wissenschaftsanspruch und Orientierungsbedürfnis. Zu Grundlage und Wandel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Frankfurt/M: Suhrkamp.

—— (1992). Significatività. Sulla storia dell'origine di un concetto fondamentale della filosofia ermeneutica. *Discipline filosofiche* 1: 13—28. Orig. version in G. Scholtz 1991, 254—268.

Schultz, Emily A. (1990). *Dialogue at the Margins: Whorf, Bakhtin, and Linguistic Relativ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cienze umane (1979—1980). *See* Rossi-Landi, 1979—1980.

Searle, John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beok, Thomas A. (1963). Communication among Social Bees, Porpoises and Sonar, Man and Dolphin. *Language* 39: 448—466.

—— (1967). Discussion of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among Primates*. Ed. S.A. Altmann, 363—36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ed. (1968). *Animal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of Studies and Results of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sity Press.

—— (1972). *Perspectives in Zoosemiotics*. The Hague: Mouton.

—— (1974). Semiotics: A Survey of the State of the Arts. In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Ed. T. A. Sebeok, 12(1/2): 211—264. The Hague: Mouton.

—— (1976). *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It. trans. M. Pesaresi. *Contributi alla dottrina dei segni*. Milan: Feltrinelli, 1979.

——, ed. (1977a). *How Animals Communicat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77b). Zoosemiotic Component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In T. A. Sebeok, 1977a, 1055—1077. It trans. in T.A. Sebeok, 1998a, 109—137.

——, ed. (1978). *Sight, Sound, and Sense*.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79). *The Sign & Its Master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nd e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It.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Il segno e i suoi maestri*. Bari: Adriatica, 1985.

—— (1981a). *The Play of Muse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t. trans. M. Pesaresi, *Il gioco del fantasticare*. Milan: Spirali,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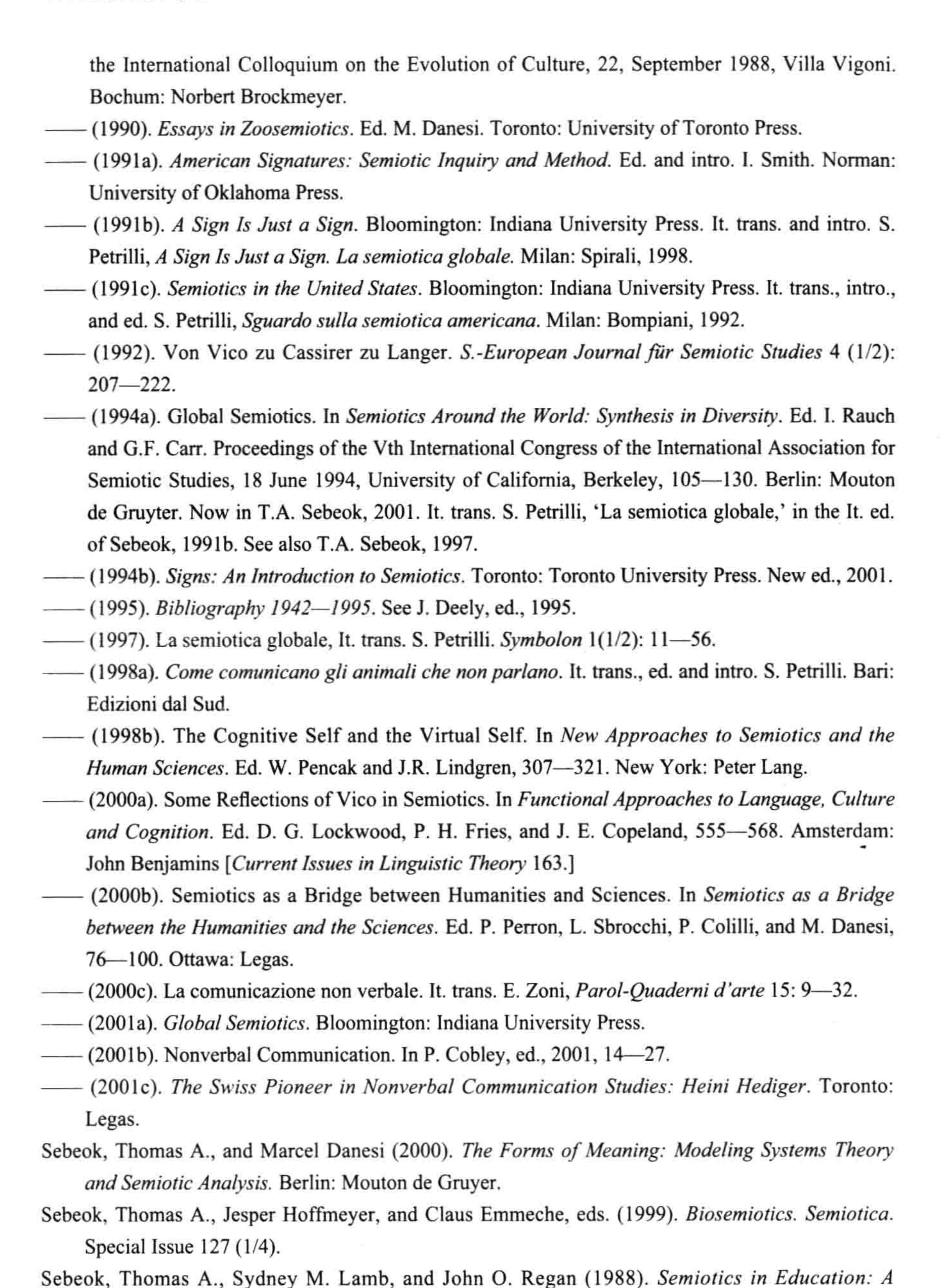
—— (1981b). The Image of Charles Morris. In *Zeichen über Zeichen über Zeichen*. Ed. A. Eschbach, 267—284. Tübingen: Gunter Narr.

—— (1982). Peirce in Italia. *Alfabeta* 35.

—— (1986). *I Think I Am a Verb*.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It.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Penso di essere un verbo*. Palermo: Sellerio, 1990.

—— (1987). Messages in the Marketplace. In *Marketing and Semiotic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igns for Sale*. Ed. J. Umiker-Sebeok.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989). Darwinian and Lamarckian Evolution of Semiosis. Lecture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22, September 1988, Villa Vigoni. Bochum: Norbert Brockmeyer.

—— (1990). *Essays in Zoosemiotics*. Ed. M. Danes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91a). *American Signatures: Semiotic Inquiry and Method*. Ed. and intro. I. Smith.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1991b). *A Sign Is Just a Sig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t.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A Sign Is Just a Sign. La semiotica globale*. Milan: Spirali, 1998.

—— (1991c). *Semio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t. trans., intro., and ed. S. Petrilli, *Sguardo sulla semiotica americana*. Milan: Bompiani, 1992.

—— (1992). Von Vico zu Cassirer zu Langer. *S.-European Journal für Semiotic Studies* 4 (1/2): 207—222.

—— (1994a). Global Semiotics. In *Semiotics Around the World: Synthesis in Diversity*. Ed. I. Rauch and G.F. Carr. Proceedings of the 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18 June 199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05—13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Now in T.A. Sebeok, 2001. It. trans. S. Petrilli, 'La semiotica globale,' in the It. ed. of Sebeok, 1991b. See also T.A. Sebeok, 1997.

—— (1994b). *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2001.

—— (1995). *Bibliography 1942—1995*. See J. Deely, ed., 1995.

—— (1997). La semiotica globale, It. trans. S. Petrilli. *Symbolon* 1(1/2): 11—56.

—— (1998a). *Come comunicano gli animali che non parlano*. It. trans.,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Bari: Edizioni dal Sud.

—— (1998b). The Cognitive Self and the Virtual Self. In *New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d. W. Pencak and J.R. Lindgren, 307—321. New York: Peter Lang.

—— (2000a). Some Reflections of Vico in Semiotics. In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Cognition*. Ed. D. G. Lockwood, P. H. Fries, and J. E. Copeland, 555—56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163.]

—— (2000b). Semiotics as a Bridge between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In *Semiotic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ciences*. Ed. P. Perron, L. Sbrocchi, P. Colilli, and M. Danesi, 76—100. Ottawa: Legas.

—— (2000c). La comunicazione non verbale. It. trans. E. Zoni, *Parol-Quaderni d'arte* 15: 9—32.

—— (2001a).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01b).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P. Cobley, ed., 2001, 14—27.

—— (2001c). *The Swiss Pioneer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Heini Hediger*. Toronto: Legas.

Sebeok, Thomas A., and Marcel Danesi (2000). *The Forms of Meaning: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 Berlin: Mouton de Gruyer.

Sebeok, Thomas A., Jesper Hoffmeyer, and Claus Emmeche, eds. (1999). *Biosemiotics.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127 (1/4).

Sebeok, Thomas A., Sydney M. Lamb, and John O. Regan (1988). *Semiotics in Education: A Dialogue*. Claremont, CA: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 Issue of *Communication* 10.]

Sebeok, Thomas A., and Susan Petrilli (1998). Women in Semiotics. In *Interdigitations: Essays for*

Irmengard Rauch. Ed. G.F. Carr et al. Bristol: Thoemmes.

Sebeok, Thomas A.,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2001). *Semiotica dell'io*. Rome: Meltemi.

Sebeok, Thomas A., and Jean Umiker-Sebeok (1980). *'You Know My Method': A Juxtaposition of Charles S. Peirce and Sherlock Holmes*. Bloomington, IN: Gaslight.

——, eds. (1992). *Biosemiotics: The Semiotic Web 199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egre, Cesare (1969). *I segni e la critica*. Turin: Einaudi.

—— (1974). La gerarchia dei segni. In *Psicanalisi e semiotica*. Atti del Convegno di Studi, 23—25 May, Milan. Milan: Feltrinelli, 32—42.

—— (1979). *Semiotica filologica*. Turin: Einaudi.

——, ed. (1983). *Intorno alla linguistica*. Milan: Feltrinelli.

Semerari, Giuseppe (1965). Sintassi e scienza nuova. In *La lotta per la scienza*. Milan: Silva.

Shannon, Claude E. (1948).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form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379—423, 623—656.

Shannon, Claude E., and Warren Weaver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aumyan, Sebastian K. (1965). *Strukturnaja linguistica*. Moscow: Nauka.

—— (1987). *A Semiotic Theor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hort, Thomas L. (1981a). Semeiosis and Intentionalit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17(3): 197—223.

—— (1981b). Peirce's Concept of Final Causation. In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17(4): 369—382.

—— (1982). Life among the Legisigns. In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18 (4): 285—310.

—— (1994). On Hermeticism in Semiotics. In *The Peirce Seminar Papers* II: 231—259. Ed. M. Shapiro and M. Haley. Providence, RI: Berghan.

—— (1996). Interpreting Peirce's Interpretant. In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32(4): 488—541.

—— (1997). Hypostatic Abstraction in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Rule of Reason*. Ed. J. Brunning and P. Forster, 289—308.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98). What's the Use? *Semiotica* 122 (1/2): 1—68.

Shukman, Ann (1983). *Bakhtin School Papers. Russian Poetics in Translation* 10.

Shusterman, Richard (1997). *Practicing Philosophy: 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Singer, Peter (2002).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sation*. Melbourne, Australia: Text.

Smith, Iris (1991). Thomas A. Sebeok: The Semiotic Self in America. In *American Signatures: Semiotic Inquiry and Method*. Ed. I. Smith, 3—18.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Solimini, Maria (1974). Patterning e drift nella lingua e nella cultura. In *Scienza della cultura e logica di classe*. Bari: Dedalo.

—— (2000). *Itinerari in antropologia culturale*. Bari: Edizioni dal Sud.

Sonea, Sorin (1993). *Le strutture biologiche: Batteri*. Milan: Jaca Book.

Sonea, Sorin, and M. Paninisset (1983). *A New Bacteriology*. Boston: Jones and Bartlett.

Sontag, Susan (2001a [1961]). *Against Interpretation*. London: Vintage.

—— (2001b [1966]). *Styles of Radical Will*. London: Vintage.

Steiner, George (1975).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t. trans. *Dopo Babele. Aspetti del linguaggio e della traduzione*. Milan: Garzanti, 1975.

Stewart, Ian (1989). *Does God Play Dice? The Mathematics of Chaos*. London: Blackwell.

Stewart, Ian, and Martin Golubitsky (1992). *Fearful Symmetry: Is God a Geometer?* London: Penguin.

Stoddard, Albert H. (1949). *Animal Tales Told in the Gullah Dialect*. Archive of Folk Song Recording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Stokoe, William C. (2001).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In P. Cobley, ed., 2001, 40—51.

Symbolicity (1993).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emioticians Conference in Honor of Thomas A. Sebeok's 70th Birthday*, Budapest and Vienna, 30 September-4 October, 1990. *Sources in Semiotics* 11.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Tagliagambe, Silvano (1986). L'origine dell'idea di cronotopo in Bachtin. In F. Corona, ed., 1986, 35—78.

Tarasti, Eero, ed. (2000). *Commentationes in Honorem Thomas A. Sebeok Octogenarii*. Imatra, Finland: International Semiotics Institute.

Tasca, Norma, ed. (1995). *Essays in Honour of Thomas A. Sebeok. Cruzerio Semiótico* 22—25.

Tauxier, Louis (1917). *Le Noir du Yatenga*. Paris: Larose.

—— (1985). *Contes du Burkina (anciennement Haute-Volta)*. Recueillis par Louis Tauxier entre 1913, ed. D. Bonnet. Paris: Fleuve et Flamme, Edicef.

Thom, René (1968). Topologie et signification. *Age de la science* 4: 219—242.

—— (1970). Topologie et linguistique. In A. Laefliger and R. Narasimhan, eds., *Essays in Topology and Related Topics*. New York: Springer.

—— (1973). De l'icône au symbole: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u symbolisme.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ymbolisme* 22/23: 85—106.

—— (1974). *Modèles mathématiques de la morphogenèse: Recueil de textes sur la théorie des catastrophes et ses applications*.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

—— (1977). *Stabilité structurelle et morphogénèse. Essai d'une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modèles*. Paris: Interéditions.

—— (1983). *Mathematical Models of Morphogenesis*. Chichester, UK: Ellis Horwood.

Thompson, Manley (1953). *The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C.S. Peir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dorov, Tzvetan, ed. (1965).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 Paris: Seuil.

—— (1981). *Le Principe dialogique. Mikhail Bakhtine*. Paris: Seuil.

—— (1982). *Theories of the Symbol*. Eng. trans. C. Port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7). Pourquoi Jakobson et Bakhtine ne se sont jamais rencontrés. *Esprit*, January, 5—22.

Tursman, Richard (1987). *Peirce's Theor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 System of Logic Conceived as Semiot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Uexküll, Gudrun, von (1964). *Jakob von Uexküll, seine Welt un seine Umwelt. Eine Biographie*. Hamburg: Christian Wegner Verlag.

Uexküll, Jakob von (1909). *Umwelt und Innenwelt der Tiere*. Berlin: Springer Verlag.

—— (1940). *Bedeutungslehre*. Leipzig: Verlag von J. A. Barth.
—— (1967 [1934]). *Streifzüge durch Umwelten von Tieren und Menschen.* Reimbeck: Rowohlt. It. trans. *Ambiente e comportamento*. Ed. F. Mondella. Milan: Il Saggiatore, 1956.
—— (1973 [1920, 1928]). *Theoretische Bi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82 [1940]). *The Theory of Meaning*. Ed. T. von Uexküll. *Semiotica* 42(1): 25—85.
—— (1992). *Jakob von Uexküll's 'A Stroll through the Worlds of Animals and Men.'* Ed. T. von Uexküll. *Semiotica*. Special Issue 89(4).
Uexküll, Thure von (1981). The Sign Theory of Jakob von Uexküll. In M. Krampen et al., *Classics of Semiotics*, 147—179. London and New York: Plenum.
—— (1982). Semotics and Medicine. *Semiotica* 38(3/4): 205—215.
—— (1986). Medicine and Semiotics. *Semiotica* 61(3/4): 201—217.
—— (1989). Jakob von Uexküll's Umwelt-Theory. In *The Semiotic Web 1988*. Ed. T. A. Sebeok and J. Umiker-Sebeok, 129—15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Uexküll, Thure von; and Wolfgang Wesiack (1988). *Theorie der Humanmedizin: Grundlagen ärtzlichen Denkens und Handelns*. Munich: Urban & Schwarzenberg.
Ukhtomsky, Aleksej A. (1966). *Dominanta* [The dominant]. Moscow: Nauka.
Ullmann, Stephen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Oxford: Blackwell.
Vailati, Giovanni (1911). *Scritti.* Ed. M. Calderoni, U. Ricci, and G. Vacca. Florence / Lipsia: Seeber-Barth.
—— (1971). *Epistolario 1891—1909*. Ed. G. Lanaro, intro. M. Dal Pra. Turin: Einaudi.
—— (1972). *Scritti filosofici.* Ed. G. Lanaro.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 (1987). *Scritti*. 3 vols. Ed. M. Quaranta. Sala Bolognese: Arnaldo Forni.
—— (2000). *Il metodo della filosofia. Saggi di critica del linguaggio*. Ed. F. Rossi-Landi. New ed., A. Ponzio. Bari: Graphis.
Valesio, Paolo (1967). Icone e schemi nella struttura della lingua. *Lingua e stile* 3: 349—355.
Vaughan, Genevieve (1978). Saussure and Vygotsky via Marx. *Ars Semiotica* 2: 57—83.
—— (1980).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Semiotica* 29(1/2): 113—143.
Vernadsky, Wladimir I. (1926). *Biosfera*. Leningrad: Nauka.
Vico, Giambattista (1976). *Principi di Scienza nuova*. 3 vols. Ed. F. Nicolini. Turin: Einaudi.
Villain-Gandossi, Christiane, Klaus Bochmann, Michel Metzeltin, and Christina Schäffner (1990). *The Concept of Europ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SCE.* Tübingen: Gunter Narr.
Voloshinov, Valentin N. (and Mikhail Bakhtin). (1925). Po tu storonu social'nogo (Beyond the Social). *Zvezda* 5: 186—214. It. trans. Al di là del sociale. Sul freudismo. In M. Bakhtin et al., 1995, 125—158.
—— (1926). Discourse in Life and Discourse in Poetry. Eng. trans. in A. Shukman, 1983, 5—30.
—— (1927). *Frejdizm.* Moscow-Leningrad. Eng. trans. I.R. Titunik,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Ed. I.R. Titunik with N.H. Brus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It. trans. *Freudismo*. Ed. A. Ponzio. Bari: Dedalo, 1977.
—— (1928). The Latest Trends in Linguistic Thought in the West. In A. Shukman 1980, 31—49. It. trans. Le più recenti tendenze del pensiero linguistico occidentale. In V.N. Voloshinov, 1980, 165—200.

—— (1929). *Marksizm i filosofija jazyca*. Leningrad: Priboj. Eng. trans. L. Matejka and I.R. Titunik,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It. trans. *Marxismo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Ed. A. Ponzio. Lecce: Manni, 1999.

—— (1930). What Is Language? Eng. trans. in A. Shukman, 1983, 93—114.

—— (1980). *Il linguaggio come pratica sociale (1926—1930)*. Ed. A. Ponzio. Bari: Dedalo.

Vygotsky, Lev S. (1925). Soznanie kak problema psichologii povedenija. In *Psichologija i marksizm*. Ed. K.N. Kornilov. Moscow and Leningrad.

—— (1962[1934]).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einsheimer, Joel (1983). The Realism of C.S. Peirce; or, How Homer and Nature Can Be the S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2 (1/2): 225—263.

Welby, Victoria (1852). *A Young Traveller's Journal of a Tour i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during the Year 1850*. London: T. Bosworth.

—— (1881). *Links and Clues*. London: Macmillan. 2nd ed. 1883.

—— (1886a). The Evolution of Heliology. *Spectator*, 24 April, 545. Also in Welby, 1897, 129—136.

—— (1886b). Threefold Laws/Law of the Three Stages/The Triad/The Tendency to Triads, 6 pp. Grantham: W. Clarke. [Proofs.]

—— (1886c). Light, 1 p. Grantham, UK: W. Clarke. Also in *The Expositor* 4 (2), 1886: 148—150.

—— (1887). Mental Biolog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Welby Collection, York University Archives, Box 28,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Canada.

—— (1888). Truthfulnes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Church Quarterly Review*, October, 101—120.

—— (1890a). Is There a Break in Mental Evolution? Paper held at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Leeds, 5 September 1890. *Repor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60: 972—973.

—— (1890b). Abstract of 'An Apparent Paradox in Mental Evolution.' Grantham: W. Clarke.

—— (1891a). An Apparent Paradox in Mental 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1 May: 304—329.

—— (1891b). *Witnesses to Ambiguity: A Collection*. Grantham: W. Clarke.

—— (1892a). The Significance of Folk-Lore. In *The International Folk-Lore Congress, 1891. Papers and Transactions*. Ed. J. Jacobs and A. Nutt, 395—407. London: David Nutt.

—— (1892b). *The Use of 'Inner' and 'Outer' in Psychology: Does the Metaphor Help or Hinder? A Small Collection of Extracts Bearing upon This Question Respectfully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ugust 1892*. Grantham: W. Clarke.

—— (1893a). *A Selection of Passages from 'Mind' (January, 1876, to July, 1892), 'Nature' 1870, and 1888 to 1892), 'Natural Science' (1892), Bearing On Changes and Defects in the Significance of Terms an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ogic*. Grantham: W. Clarke.

—— (1893b). Meaning and Metaphor. *Monist* 3 (4): 510—525. Reprinted in Welby 1985a. It. trans. in Welby, 1985b, 79—107.

—— (1896). Sense,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Mind* 5 (17): 24—37; 5(18): 186—202. Reprinted in Welby, 1985a. It. trans. in Welby 1985b, 109—170.

—— (1897). *Grains of Sense*. London: J.M. Dent.

—— (1898). *The Witness of Science to Linguistic Anarchy* (A Collection of Extracts, Chiefly from

Nature,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Grantham: W. Clarke.
—— (1901). Notes on the 'Welby Prize Essay.' *Mind* 10 (38): 188—204, 209.
—— (1902a). Lady Welby about Her Acquaintaince with Prof. F. M. Müller. In F. M. Müller,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Friedrich Max Müller*. 2 vols., 62—63. London: Longmans-Green.
—— (1902b). Translation. In J.M. Baldwin 1901—1905, vol. 2, 712.
—— (1903).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London: Macmillan. New ed., Welby 1983.
—— (1905). Written Communication on 'Eugenics.' By F. Galton. *Sociological Papers* 1 (1904): 76—78.
—— (1906). Written Communication on 'Eugenics.' By F. Galton. *Sociological Papers* 2 (1905): 43—45.
—— (1907a). Time as Derivative. *Mind* 16(63): 383—400.
—— (1907b). Primal Sense and Significs. In Welby, 1985a, 238—243.
—— (1907c). F.C.S. Schiller On 'Mother-Sense' (from a letter to Lady Welby dated October 2, 1907); and V. Lady Welby's Reply to F.C.S. Schiller (from an undated letter). In Welby, 1985a, 245—247, 249—252.
—— (1908a). Essays by Lady Welby: What Does It Signify? In Hardwick, 1977, 182—184.
—— (1908b). June 30th. 1908. In Welby, 1985a, 243—245.
—— (1908c). The Social Value of Expression. In Welby, 1985a, 252—264.
—— (1911a). Significs. In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 vol. 25, 78—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Hardwick, 1977, 167—175. It. trans. in Welby, 1985e, 171—187.
—— (1911b). *Significs and Language: The Articulate Form of Our Expressive and Interpretative Resources*. London: Macmillan. In Welby, 1985a. It. trans. (selection) in Welby, 1985e, 189—229.
—— (1929). *Echoes of Larger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Ed. and intro. H. Cust. London: Jonathan Cape.
—— (1931). *Other Dimensions: A Selection from 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Ed. H. Cust, intro. L.P. Jacks. London: Jonathan Cape.
—— (1965). What Is Meaning? In *Classics in Semantics*. Ed. D. E. Hayden and E. P. Alworth. London: Vision Press [= ch. 1 from Welby, 1983, 1—11.]
—— (1977a). Lady Welby on Significs. In Hardwick, 1977, 167—175 [= Welby 1911a.]
—— (1977b). Essays by Lady Welby: All Saints' Day (1 November 1907). In Hardwick, 1977, 178—182.
—— (1983 [1903]).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Ed. and pref. A. Eschbach, intro. G. Mannoury. In *Foundations of Semiotics*, vol. 2.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1985a [1911]). *Significs and Language*. Ed. and intro. H.W. Schmitz. In *Foundations of Semiotics,* vol. 5.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1985b). *Significato, metafora, interpretazione*. It. trans.,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Bari:

Adriatica.
—— ,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Welby Collection, York University Archives,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Canada.
Welby, Victoria, James Mark Baldwin, and George Frederick Stout (1902). Significs. In J.M. Baldwin, 1901—1905, vol. 2, 529.
Welby, Victoria, and George Frederick Stout (1902). Sensal. In J. M. Baldwin, 1901—1905, vol. 2, 515.
Welby, Victoria, and Ferdinand Tönnies (1901). Notes on the 'Welby Prize Essay.' *Mind* 10(38): 188—209.
Welby, Victoria, and Giovanni Vailati (1971). [Selection of letters]. *See* Vailati, 1971.
Wellek, René (1991). Mikhail Bakhtin. In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scott, Roger W. (1971). Linguistic Iconism. *Language* 47: 416—428.
Whorf, Benjamin Lee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Ed. J.B. Carrol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73).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iew* 82: 3—16.
——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tgenstein, Ludwig (1921).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Eng. trans. C. K. Ogden, Intro. B. Russell, 1922. 2nd ed., Eng. trans. D. F. Pears and B. F. Guinness, Intro. B. Russe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
—— (1930).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Ed. R. Rhees. Oxford: Blackwell.
—— (1953).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Eng. trans. G. E. M. Anscomb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1957). *Letters to C.K. Ogden*. Oxford: Blackwe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58). *The Blue and Brown Books*. Ed. R. Rhees. Oxford: Blackwel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61). *Notebooks, 1914—1916*.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67). *Zett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69). *Philosophical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 (1973). *Letters to C.K. Ogden. With Comment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Ed. and Intro. G.H. Von Wright, Appendix: Letters with Frank Plumton Ramse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74). *Letters to Russell, Keynes, and Moore*. Ed. and Intro. B. F. Mcguin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77). *Remarks on Colour*. Ed. G.E.M.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0). *Culture and Value*. Ed. G.H. Von Wri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Yerkes, Robert M. (1943). *Chimpanzees, a Laboratory Colon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liznjak, A.A. et al. (1977). Structural-Typological Study of Semiotic Modeling Systems. In *Soviet Semiotics: An Anthology*. Ed. D. P. Luci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Zeeman, Christopher E. (1965). Topology of the Brain. In C. E. Zeeman et al.,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277—292.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Zeman, Jay J. (1983). Peirce on Abstraction. In *The Relevance of Charles Peirce* (= Monist Library of Philosophy). Ed. E. Freeman, 293—311. LaSalle, IL: Hegeler Institute.
—— (1977). *Catastophe Theory: Selected Papers 1972—1977*. London: Addison-Wesley.

索引

（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
"filename":
"5omT5byA6L6555WM55qE56ym5Y+35a2mICDnqb/otornrKblj7flvIDmlL7nvZHnu5znmoTop6Pph4rot6/lvoRfMTM4MjcxMDMuemlw",
"filename_decoded": "\u6253\u5f00\u8fb9\u754c\u7684\u7b26\u53f7\u5b66
\u7a7f\u8d8a\u7b26\u53f7\u5f00\u653e\u7f51\u7edc\u7684\u89e3\u91ca\u8def\u5f84_13827103.zip",
"filesize": 99341324,
"md5": "7edc8937e0910b16326275f6630a7ae4",
"header_md5": "89dfd3f918011de993b6c4511f2a124d",
"sha1": "f22ed236e467a0b7db15ed87f8e80b80d53b1be8",
"sha256": "17fb8c685f03fe197dd0964f001821102e8881575596ba6047b2b17b8a1c3af4",
"crc32": 288522589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17726415,
"pdg_dir_name": "\u2524\u2265\u2510\u00ac\u2592\u2580\u255c\u03c4\u2561\u2500\u2556\u221a\u2551\u253c\u2564\u00ba \u2524\u2310\u2558\u255c\u2556\u221a\u2551\u253c\u2510\u00ac\u2556\u253c\u2550\u00b0\u252c\u03c4\u2561\u2500\u255c\u0393\u2569\u2550\u252c\u2556\u255b\u2562_13827103",
"pdg_main_pages_found": 493,
"pdg_main_pages_max": 493,
"total_pages": 528,
"total_pixels": 212943814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